

李作鵬回憶錄

李作鵬 著



香港北星出版社

內容提要

李作鵬，農民的兒子，十六歲參加工農紅軍，戎馬生涯四十一年。1971年，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發生了，李作鵬成為那次黨內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出獄後，歷經二十余年，完成了這部《回憶錄》。

本書真實記錄了作者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而奮鬥的經歷，真實記錄了作者為新中國軍隊建設而不懈的努力。也真實記錄了作者身陷文革旋渦，無奈沉浮的困惑與心聲。

本書不僅披露了作者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中鮮為人知的情節，而且公布了從未面世的大量珍貴歷史照片。

李作鵬

回憶錄

(下卷)

李作鵬 著

香港北星出版社

在海軍工作期間



1963年天安門國慶觀禮



1962年6月調海軍工作，任海軍副司令員。



1964年作者夫婦海軍禮照合影

方块字读书社区



視察海防部隊



方块字读书社区



視察艦艇部隊



方块字读书社区



視察海防工程和軍工廠

林彪元帥視察海軍



視察海軍基地和空軍部隊

方块字读书社区



觀看軍事演習

檢查軍用基地設施



作者陪同林彪視察海軍直屬機關。



在海軍作戰指揮室

方块字读书社区

與林彪及家人



林彪全家合影 1962年

方块字读书社区



1965年6月9日 北京 毛家湾 方块字读书社区



《葉群與豆豆》攝于1945年前後，作者保留這張照片60餘年。

與豆豆合影



方块字读书社区

葉群(前排左三)、林立果(前排左一)與作者全家及工作人員合影

文革初期的海軍



接見群眾



接見戰鬥英雄麥賢得



1969年6月24日隨周恩來接見蔣軍駕機起義人員。左一作者，左二黃永勝，右一吳法憲。

1970年2月20日海軍領導接見擊落美無人駕駛高空偵察機有功人員。



方塊字讀書社區

軍委辦事組工作期間



軍委辦事組領導與工作人員在西山合影。
前排左三起：邱會作、吳法憲、黃永勝、李作鵬。



1970年5月13日 八達嶺長城



方块字读书社区、李、邱在天安門城樓上合影



葉群(前左三)和黃永勝(後中)、項輝芳(前右二)、吳法憲(前右三)、陳綏圻(前右一)、李作鵬(後左)、董其采(前左一)、邱會作(後右)、胡敏(前左二)在京西賓館合影。



辦事組視察海軍直屬機關(上圖)和23訓練基地(左圖)。前者黃永勝,旁邊是作者。



在朝鮮駐華使館大會上講話



接見莫桑比克軍事代表團

陪同朝鮮軍事代表團。
前右者為吳振宇大將



隨國防部領導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後排右二為作者。

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與家人



作者夫婦和家人在西山駐地合影。



方块字读书社区

1981年 離開秦城安置太原



出獄後的第一張照片



分別十年後的合影

1982年山西太原，出獄後第一個春節與家人團聚。



方块字读书社区

在太原保外就醫期間



練字



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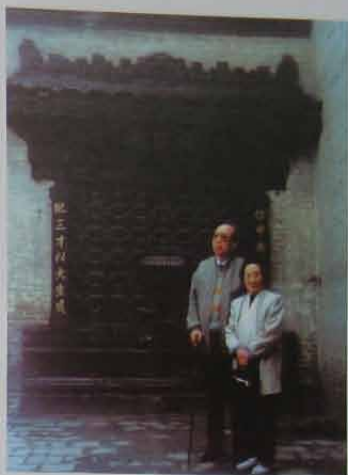


寫作



在汾河邊散步
方块字读书社区

1988年 刑滿釋放後



到山西晉祠(左)和喬家大院(右)瀏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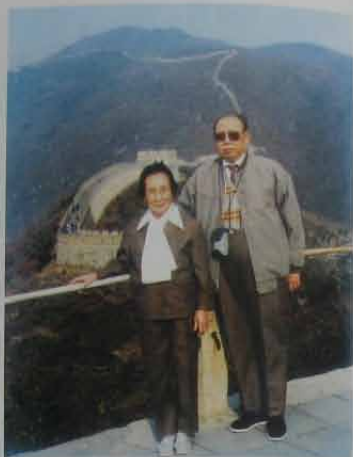


到北京北海公園(上)和頤和園(右)游玩

方块字读书社区



沈陽故宮



慕田峪長城



北戴河海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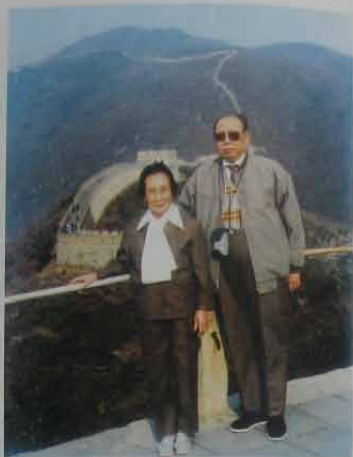
黑龍江五大連池

大連

方块字读书社区



沈陽故宮



慕田峪長城



北戴河海濱



黑龍江五大連池

大連

方块字读书社区

北京生活的最後十年



深圳、珠海、廣州一行



濟南、泰山、曲阜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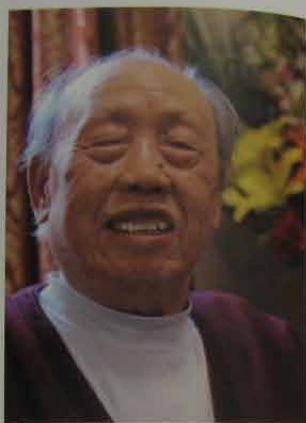


參觀抗日戰爭紀念館

作者夫婦與邱會作夫婦、林立衡、黃春光、邱路光、李大征、李冰天在北京。



方块字读书社区



2007年8月1日，家鄉
建成將軍園，此銅像
安放在園中。



方块字读书社区

目 錄

上 卷

前 言	1
-----------	---

第一篇 走向革命

第一章 走上革命道路	5
------------------	---

一、我的家鄉	5
--------------	---

二、參加紅軍	9
--------------	---

三、轉入中國共產黨	14
-----------------	----

第二章 紅軍時期	16
----------------	----

一、破譯敵軍密碼電報	16
------------------	----

二、渡大渡河，過雪山草地	20
--------------------	----

三、抗大學習	24
--------------	----

第二篇 游擊齊魯

第三章 挺進山東	27
----------------	----

一、建立山東抗日根據地	27
-------------------	----

二、泰西陸房勝利突圍·····	30
第四章 梁山抗敵·····	35
一、獨山莊戰鬥大捷，蔣介石來電嘉獎·····	35
二、反掃蕩，中彈負傷·····	38
三、北平治傷·····	40
第五章 建立魯南敵後根據地·····	44
一、以抱犢崗山區為中心·····	44
二、先攻南大頂山寨·····	47
三、陶峪會議·····	51
四、再攻天寶山石寨·····	53
五、剿匪中，負重傷·····	55
第六章 魯中反掃蕩·····	58
一、軍事守勢，政治攻勢·····	58
二、濱海整軍·····	59
三、戰火中的婚禮·····	61
四、日寇沂蒙大掃蕩·····	63
五、跳出敵人的合圍圈·····	66
六、綠雲山殲敵戰，又一次負傷·····	69
七、濱海養傷和反掃蕩總結·····	72
第七章 積蓄力量和反摩擦鬥爭·····	74
一、黎明前的黑暗·····	74
二、精兵簡編，積蓄力量·····	76
三、甲子山地區反摩擦·····	79

第八章 由守勢轉為攻勢	84
一、整風運動	84
二、自己動手、生產自給	86
三、全民皆兵，反“蠶食”鬥爭	87
四、春季攻勢	90
五、夏季攻勢和秋季攻勢	92
六、裏應外合，解放莒縣	94
第九章 全綫大反攻	99
一、春夏攻勢，將戰略地區連成一片	99
二、大反攻，攻占要塞臨沂城	102

第三篇 血戰東北

第十章 向東北進軍	109
一、濱海支隊挺進東北	109
二、再調六萬部隊，限期到達東北	111
三、陳毅率部接防山東	113
四、隨羅榮桓渡海去東北	116
第十一章 且戰且退	120
一、形勢緊迫	120
二、山海關失守與放棄錦州	123
三、“忍、等、狠”三字方針	130
四、“一點兩面”、“三三制”的戰術方針	133
五、東北鬥爭需作長期打算	135
六、秀水河子殲滅戰和撫順運動戰	144

方块字读书社区

第十二章 四平保衛戰	152
一、必須控制北滿地區	152
二、堅決迎擊北進之敵	153
三、四平浴血保衛戰	159
四、拖住敵人，配合四平作戰	166
五、我軍準備主動轉移	168
六、放棄四平，戰略後退	174
第十三章 三下江南	179
一、在林彪司令員身邊工作的八個月	179
二、敵人的“南攻北守”與我軍的“南打北拉”	184
三、首下江南	190
四、再下江南	194
五、三下江南	201
六、扭轉了東北戰局	207
第十四章 夏季攻勢	209
一、由戰略防禦轉為戰略進攻	209
二、夏季攻勢第一階段	212
三、四平攻堅戰	215
四、反思四平攻堅戰	225
第十五章 秋季攻勢	229
一、部隊休整	229
二、確定作戰方針	232
三、我縱執行打援和破襲任務	234

第十六章 冬季大進攻	240
一、縱隊黨委對戰訓的指示	240
二、敵我態勢和冬季作戰意圖	242
三、攻克彰武與圍殲新5軍	243
四、圍殲新立屯之敵	247
五、轉戰遼南與解放法庫、開原	249
六、攻克四平	251
第十七章 遼沈大決戰（之一）	255
一、決戰前的東北形勢	256
二、林彪提出“大兵團、正規化、攻堅戰” 的作戰方針	258
三、初定戰役主攻方向	261
四、調任6縱，首戰告捷	262
五、全軍大練兵	264
六、南下作戰部署與繼續圍困長春	266
七、錦州、長春相繼報捷	269
第十八章 遼沈大決戰（之二）	273
一、林彪下達殲滅西進兵團的命令	273
二、向臺安方向強行軍	276
三、厲家窩棚阻擊戰	278
四、“部隊打光了，也不能讓敵人退回沈陽”	282
五、廖耀湘回憶被殲的經過	287
六、乘勝直搗沈陽	289

第四篇 追寇南下

第十九章 三千里路烟和塵.....293

一、參加平津戰役.....293

二、南下先遣兵團.....295

三、向中原挺進.....297

四、勝利渡江.....300

五、湘贛戰役.....302

第二十章 摧枯拉朽占廣州.....308

一、“兵強馬壯”運動.....308

二、向廣東進軍.....311

三、廣東戰役.....313

第二十一章 粵桂邊圍殲戰.....319

一、桂系孤軍已四面楚歌.....319

二、向廣西進軍.....321

三、擊潰魯道源兵團.....323

四、圍殲張淦兵團.....325

五、追殲殘敵.....328

第二十二章 解放海南島（之一）.....331

一、準備進攻瓊崖.....331

二、渡海作戰會議.....336

三、渡海準備與大練兵.....339

第二十三章 解放海南島（之二）.....345

一、一個加強營，潛渡強攻.....345

二、一個加強團，再次潛渡強攻.....350

方块字读书社区

三、主力部隊的渡海準備·····	356
四、大舉強渡·····	358
五、攻占福山和黃竹、美亭圍殲戰·····	360
六、乘勝追擊，解放全島·····	362

第五篇 回顧輝煌

第二十四章 勝利詩篇·····	368
-----------------	-----

一、紅軍贊歌·····	368
二、抗日贊歌·····	372
三、解放贊歌·····	381

附 錄

一、民兵游擊戰術問題·····	387
二、在林彪同志指揮下·····	399
三、四平保衛戰·····	409
四、三下江南·····	422
五、東北戰場上的遼沈大決戰·····	434

下 卷

第六篇 風雨十二年

第二十五章 軟禁陳光，我之所見……………449

一、陳光是我的老領導、老戰友……………449

二、接受特殊任務……………452

三、軟禁前後……………455

四、歷史懸案……………458

第二十六章 在武漢高級步校五年……………460

一、為部隊培訓了大批基層幹部……………460

二、向蘇聯學習正規化與改進教學……………464

三、步校老同事的往事回憶……………467

四、辦學體會……………470

第二十七章 在南京軍事學院學習……………476

一、一隻舊木箱……………476

二、教員的授課提綱……………479

三、學員們的討論、作業和期末復習……………483

第二十八章 在軍委訓總和總參軍訓部五年……………489

一、1958年，在批判教條主義中度過……………489

二、1959年，半年抓訓練，半年批“彭、黃”	494
三、1960年，向國防部長的兩封建議信	498
四、1961-1962年，改革訓練，貫徹“少而精”	502

第七篇 文革前期之我見

第二十九章 調入海軍	507
一、參加軍委檢查團	507
二、由陸軍調到海軍	511
三、海空戰大捷，全殲入侵之敵	517
四、“三頭”司令	523
第三十章 山雨欲來	526
一、“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526
二、糾正“軍事衝擊政治”， 海軍黨委意見分歧	528
三、中央會議，批判羅瑞卿	536
四、未參加的海軍黨委 “三·三”會議和擴大會議	543
第三十一章 天翻地覆（之一）	550
一、海軍機關開展“四大”	550
二、軍隊院校造反派衝擊海軍機關	554
三、軍委決定揪鬥蘇振華	560
四、對李、王、張的衝擊圍鬥仍未停止	563
五、《中央軍委命令》和“三支兩軍”	565
六、我與賀龍不熟悉	568

第三十二章 天翻地覆（之二）	570
一、海軍仍處于兵慌馬亂的大動蕩中	570
二、青海流血事件與軍委“十條命令”	578
三、“五·一三”流血事件	581
第三十三章 天翻地覆（之三）	589
一、“痛打落水狗”和革命大聯合	589
二、震驚全國的武漢“七·二〇”事件	592
三、毛主席視察大江南北時的講話	600
四、海軍召開學習毛著積代會	605
第三十四章 天翻地覆（之四）	609
一、祇要部隊穩定，就能打勝仗	609
二、“楊、余、傅”事件	612
三、參加軍委辦事組工作	617
四、解放幹部和處理層層站隊問題	626
五、在工作中發生意見分歧	630
第三十五章 天翻地覆（之五）	633
一、召開八屆十二中全會	633
二、珍寶島武裝衝突	637
三、林彪說：“無名小卒，野心不小”	640
四、“九大”召開	646
五、海軍第四次黨代表大會	650
第三十六章 廬山會議（九屆二中全會）	652
一、在修改憲法小組工作期間	652
二、上廬山之後	658

三、林彪在開幕式上講話	659
四、分組討論	661
五、全會休會	668
六、全會復會	673
第三十七章 批陳整風與南巡秘密講話	676
一、毛主席說：	
“你們的問題在我這裏已經完了”	676
二、華北會議和“批陳整風”會議	679
三、在武漢與劉豐的談話	682
四、毛主席講關於黨內十次路線鬥爭	685
五、南巡講話是策劃批鬥林彪的前奏曲	686
第三十八章 “九·一三”事件	692
一、周總理的電話指示	692
二、政治局緊急會議	697
三、總理圈閱了電話記錄報告	700
四、處理山海關機場的善後工作	702

第八篇 獄中人的心聲

第三十九章 天塌地陷（之一）	705
一、特殊的會議	705
二、馬廐裏的隔離人	709
三、究竟為什麼	711
四、生活條件略有改善	714
五、學習與鍛煉	718

第四十章 天塌地陷（之二）.....721

一、多次上書.....721

二、與中央專案組的交鋒.....727

第四十一章 天塌地陷（之三）.....738

一、悲喜交加.....738

二、打入十八層地獄.....741

三、共產黨監獄的滋味.....743

四、平靜中的波瀾.....748

第四十二章 預審抗爭.....754

一、預審的折磨.....754

二、請求澄清我的三個冤案.....761

第四十三章 公審實錄.....765

一、起訴書中的五大“罪行”.....765

二、四次庭審和一次辯護陳述.....768

三、判 決.....776

第四十四章 自辯和沉默後的話.....781

一、對“最關鍵罪行”的自辯.....781

二、誰是真正的責任人？.....787

三、我的沉默和其他“罪行”.....792

四、什麼叫“審罪不審錯”？.....795

第四十五章 判決之後流放并州.....799

一、與家人見面、通信，是最欣慰的事.....799

二、寧願把勳章丟到大海中.....802

三、保釋出獄，流放.....803

方块字读书社区

第四十六章 悲愴詩篇	806
一、逆境白話	806
二、通縣隔離	807
三、秦城囚禁	815
四、審判風雲	818

第九篇 到太原之後

第四十七章 在太原的酸甜苦辣	824
一、治病送瘟神	824
二、生活苦與樂	830
三、拙筆寫春秋	834
四、家中被盜	838
五、刑滿釋放	839
六、在誕辰家宴上的講話	842

第四十八章 看到中央[1972]24號文件後	846
一、流傳很廣、影響極大的中央文件	846
二、文件中說：	
“九屆二中全會期間發動反革命政變”	848
三、文件中說：“李作鵬篡改中央命令的陰謀”	852
四、吳法憲說：“林彪怎麼辦，往那裏擺？”	855

第四十九章 老伴日記和我寫的悼詞	857
一、艱難歲月的記錄	858
二、悼 詞	865

第五十章 與律師再見面	867
-------------	-----

附 錄

- 一、給中央寫的兩封信.....878
- 二、步兵營進攻演習的幾點經驗.....892
- 三、戰略上以一當十，戰術上以十當一.....898
- 四、“八·六”海戰的基本經驗.....920

後 記.....李冰天 928

第六篇

風雨十二年

第二十五章

軟禁陳光，我之所見

一、陳光是我的老領導、老戰友

首先就我知道的陳光其人，做簡要介紹。

陳光是湖南郴州人，1905年出身貧農之家，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參加湘南農民暴動，然後上井岡山。在中央蘇區反圍剿戰爭中，曾任紅一軍團12師師長和少共國際師師長，二萬五千里長征時擔任紅一軍團紅2師師長職務。到陝北後，任紅4師師長。“西安事變”後，他接替已調任紅軍大學校長的林彪，任紅一軍團代理軍團長。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後，曾擔任115師343旅旅長，115師副師長、代理師長。

抗日戰爭時期，在山西、山東敵後的廣大地區，他率領115師

方块字读书社区

英勇打擊日寇和敵偽頑固勢力，多次粉碎日寇和敵偽頑固勢力的圍攻、封鎖和掃蕩，堅持抗日游擊戰爭，為創建抗日根據地，不斷擴大抗日武裝力量，立下了大功。

1943年由山東敵後抗日前綫，調延安參加整風學習。

解放戰爭時，陳光赴東北，先擔任東滿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後任松江軍區司令員兼哈爾濱衛戍司令員和第四野戰軍副參謀長。



八路軍115師代理師長陳光

全國解放後，任廣東軍區第一副司令員。

他南征北戰，出生入死，在槍林彈雨中，多次光榮負傷，歷來以衝鋒陷陣，英勇善戰著稱。其身經百戰，并戰功累累。

在山東抗日戰爭初、中時期的五六年中（1938年至1943年），我一直在他身邊工作，陳光是我的老領導和生死戰友，交往也十分密切。

記得1950年2月，我參加兵團在廣州召開的解放海南島渡海作戰會議時，他請我到他家裏吃狗肉，他邊吃邊言兵談政的發表了一通不平凡的議論。

他問我：“海南島是戰爭辦法解決好，還是和平辦法解決好？”

我說：“當然是和平辦法解決好，可是現在根本沒有和平解決的可能性，唯有用戰爭辦法解決。”

他說：“和平解決的辦法是存在的，祇要葉劍英讓出一個職位就行，你們就可以避免一場血戰。”

我說：“能不能把你的高見和辦法說給我聽聽？”

陳光把話匣子打開了，他說：“我的辦法就是找陳濟棠搞統戰工作，爭取用和平解放長沙的方式來解決海南島

方块字读书社区

問題。我有關係人可以找到陳濟棠，陳現在來往于香港與海口之間，現在海南島的部隊多數是陳的老部屬，他與薛岳矛盾很尖銳，薛岳拼命排擠他。陳濟棠歷來是反蔣的，中央蘇區對我‘圍剿’時，他的態度是消極應付的，他參加1933年福建反蔣事變，1936年又策劃兩廣抗日反蔣。如果葉劍英把廣東省主席的位置讓給他，我看問題就解決了。現在葉劍英挂名官銜太多了，什麼華南分局書記、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廣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廣州市委書記、廣州市人民政府市長等等，太多了。我認為讓出一個位置，爭取和平辦法解決海南島問題，是劃得來的，對我們是有利的。”

當時我聽了之後，心裏有兩點懷疑：第一，陳濟棠已無實際兵權，他能把蔣介石的嫡系薛岳搞掉嗎？第二，葉劍英是統戰工作老手，對廣東軍閥情況又非常了解，在團結反蔣力量方面經驗豐富。再說，是否爭取和平辦法解決海南島問題，中央肯定全面的考慮過。

因此我問他：“你向葉參座和林總提過建議沒有？”

他說：“還在考慮。”

1950年4月30日，解放海南島戰役結束後，我們43軍進行了戰後休整工作，大家忙了一個多月，事情剛剛結束，稍稍喘口氣，就

接到第四野戰軍總部命令，調我任15兵團參謀長兼廣東軍區參謀長，遺缺軍長職務由副軍長龍書金擔任。

我把工作交待之後，即離開海南島，于6月底回到廣州，來到新的崗位上工作。

當時朝鮮戰爭已經爆發。兵團司令員鄧華、政委賴傳珠、副司令員洪學智等幾位領導人，都非常關心朝鮮

局勢，成為每天議論的



廣州，時任15兵團參謀長

中心內容。

7月初的一天，陳光知道我已回到廣州，又邀請我到他家裏吃飯。由於陳光是我的老首長、老上級，私人友情甚深，因此到他家裏去吃飯和閑談，是很平平常常的事，我當然不會推辭，按時前往。

一進門，陳光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就是一句出人意料的話：“我不十分歡迎你回廣州擔任參謀長職務。”

我有點莫名其妙，一邊落座，一邊驚異的問：“爲什麼？”

他說：“這是你最大的失策，軍長有兵權，四五萬人是個很大的力量。你當兵團參謀長名義上提升了，但沒有什麼實權，沒有司令、政委同意，一個團、一個營你也無權調動。”

我說：“這是上級命令。”

陳光改變口氣說：“沒有辦法，既然來了，好好幹一段再說。”

之後，我們兩人就談到朝鮮戰爭形勢，陳光又大發議論說：“爲了破壞美帝國主義在東方的新侵略計劃，策應朝鮮人民軍作戰，我主張，我們中國應向東南亞出擊，向越南、緬甸出擊，有兩三個兵團就可以打得他們落花流水，打得美帝國主義顧此失彼。”

他問我的看法如何，我說：“我沒有你這樣高的戰略水平，我還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在進餐過程中還談到，他在港澳和臺灣有一些情報關係，通過這些關係，不但可以得到臺灣情報，還可以掌握遠東美軍的行動情報。他說：“你現在是兵團參謀長了，以後我可以把這些情報關係全部交給你，可能對你今後掌握敵情有幫助。”雲雲。

這是我與陳光最後一次吃飯閑談。

二、接受特殊任務

大約是7月中旬的一天，葉參座（葉劍英）通知鄧華、賴傳珠和我三人到他家裏開會。方塊字讀書社區 葉劍英宣布陳光有嚴重政治問

題，中央已決定把他先控制起來，軟禁在家，然後再調查處理。

陳光有什麼嚴重政治問題呢？葉參座主要談了四條：第一是通敵。與蔣介石在香港、澳門的特務混在一起，以情報資敵。第二是反對領導。對廣東現在的軍政領導人不滿。第三是可能外逃。據說他已準備最近到香港去。到了香港，蔣介石特務就可能把他弄到臺灣去。第四是家中私藏了大量武器。

葉參座說：“因此要盡快採取斷然措施，先把他控制起來，軟禁起來，再聽從上級的處理。”

葉、鄧、賴事先似有商量，對處理陳光的意見也基本一致。他們你一言我一語，說：“陳光這個人很橫蠻粗野，脾氣暴躁。”又說：“他家裏經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包括國民黨特務、流氓打手，這些人都會使用武器。”還說：“陳光住的樓底下有個武器倉庫，不但有長短槍，還有輕重機槍，數量不少。因此，搞得不好可能發生槍戰。”等等。

這個宣布對我簡直是晴天霹靂，太突然了。我雖然知道陳光數年來對沒有被重用，有所不滿。從延安到東北後，按照資歷和軍事才能，他應該擔任林彪的主要副手之一，但沒有被重用。也聽說，在我到任軍區前的某次會議上，葉劍英曾對陳光提出批評，因此兩人發生了激烈爭吵，還拍了桌子。可是萬萬沒有想到，他現在已經“墮落”到“通敵”、“外逃”。我心裏七上八下，很不平靜，也很不理解。

在戰爭年代，我們并肩戰鬥多年，出生入死，流血流汗，從私人感情與戰友情誼上一時轉不過彎。但既然是中央批准的，又是葉參座親自安排和處理此事，作為下級，就不能不執行組織做出的決定。

如何把陳光控制起來，軟禁起來呢？當時，幾位領導已經有了行動計劃，叫我來就是通知我按照這個行動計劃執行。

葉參座面對我說：“你不是和陳光私人關係很好嗎？我們商量過這樣辦：軟禁的地點，就在他現在的駐地那座小樓，你設法把陳光引到外面去游山玩水，家事由鄧、賴負責指揮兵團政治部

和省公安廳，把他家裏的武器全部收繳，人員全部調出處理。另外安排新的人員進去擔任看管監視。他的私人文件也全部清出審查。”

又對鄧、賴說：“一切工作秘密準備完畢後，在陳光外出游玩時，家裏就動手，務必在他回家之前，全部處理完畢。”並說：“指定一位幹部在陳光返回後，向他當面宣讀限制他自由的決定及指出其錯誤要點。”

接受任務的當夜，我翻來覆去睡不着。心想，如果上級讓我完成消滅日寇或國民黨軍隊的任務，不要說一個團、一個師，就是一個軍、一個兵團也不在話下。但現在接受和執行的任務，是誘捕自己的老上級，老戰友，執行這樣違心的任務，有生以來第一次。再者，葉參座所說陳光如此嚴重的問題，我從來沒有聽說過，真讓人難以相信。心中反復思忖，但最後我還是認定了，軍人是要服從命令的。今天的會，看來葉、鄧、賴已按中央指示事先商量過，我祇能按中央和上級的指示和部署辦。

次日，我就到陳光那裏去了。我的態度平常如故，但稍微留意觀察他家裏，是否有什麼異常現象，結果沒有發現任何可疑徵候。我們兩人東拉西扯地閑談，從朝鮮戰爭到廣東剿匪，說得隨便自然。

陳光以好烟好茶相待。最後我說：“我幾次來廣州，除了去過越秀山、黃花岡之外，其他什麼地方也沒有去過。你對廣州情況熟悉，還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可以帶我去玩玩。”

他想了想後說：“現在天氣很熱，可以坐游船到郊區去玩玩。”

我說：“郊區有什麼好玩的？”

陳說：“有！山清水秀。”

我說：“那就明天上午去吧。”

他又思忖片刻說：“明天不行，我還有點事情，後天可以。”

告辭出來後，我就到賴方塊字讀書社區，把同陳光一起出游的準確時間告訴了他。

陳光仍蒙在鼓裏，既不可能料到他已走到譽毀榮辱的邊沿，也不可能料到他的行動自由很快就要結束，更不會料到他南征北戰、出生入死的二十多年戰鬥生涯，竟會如此結束。

三、軟禁前後

按照約定游玩的時間，于當日上午8時，我同陳光各帶兩名警衛員，在廣州東山駐地附近的河道碼頭登上游船。

游船開始悠悠蕩蕩緩慢前進。我們呼吸着郊區清新空氣，觀看河道兩岸田園風光。雖然我內心極為沉重痛苦，也要假裝輕鬆愉快的樣子。觸景言景，無話找話，力求讓陳光高興。我完全明白，這是上級交給我的一項特殊任務，一定要理智戰勝感情，圓滿完成。

約一個半小時，游船到達陳光指定的地點，靠近碼頭，陳光手指岸上一座房屋對我說：“這裏是有名的廣州‘鸕鶿菜’老板的家，我和他是相識友好，我們下船到他那裏休息、飲茶去。”

我們下船，進到那座花樹圍繞的中國式寬大平房內，結果主人不在家。由他的女兒和兒媳等接待。由于陳光來過，他們見面很熟悉。

女主人彬彬有禮說：“陳司令來了，歡迎，歡迎！”以好茶好果招待，談話很自然。那位年輕女主人看樣子不過二十歲左右，在什麼學校學音樂的。舉止大方熱情，服裝入時，長像不凡。

陳光知道她的鋼琴彈得好，就叫她彈琴。我對鋼琴不懂，尤其演奏外國音樂，簡直等于對牛彈琴。可是在那種場合，不懂也不能表露出來，并且每演奏一曲，還要稱贊幾句：“彈得好”，“曲子也好”，“比戰場上的槍炮聲、人叫馬嘶的衝殺聲好聽多了。”姑娘彈彈歇歇，歇歇彈彈很高興，陳光的情緒也不錯。

手表指向11點，陳光**方块字读书社区**提醒才告辭離開。

12時半，我們回到東山碼頭，登岸後各自回家，我則繞到賴傳

珠家裏去了，鄧華也在那裏。他們從樓上窗戶已觀察到我們回來了。賴傳珠住的小樓與陳光住的小樓是並排鄰居，中間祇隔一條不寬的馬路，兩樓相互都可以聽到對方的大聲叫喊。我們三人就在樓上靠陳光小樓那個方向的一間室內，利用窗戶觀察陳光回去後的動態。

陳光回到家後不久，我們就清清楚楚聽到他在樓上那間辦公室內，發瘋似的大吵大罵：“我陳光有什麼罪？”

“我陳光打了幾十年反動派難道是罪？”

“我陳光什麼時候對敵鬥爭動搖過？”

“我陳光有什麼事情對不起黨，對不起革命？”

“你葉劍英有什麼了不起？你在我們軍隊戰史上沒有一寸戰功，你指揮過哪一次重要戰役？”

“你林彪現在爬上了高位，當了大官，早把我們這些人忘了！你現在又支持葉劍英一起陷害我陳光，你們的心太惡毒了。”

大鬧了將近一個小時他才停下來。據說送去的午餐也不吃，躺在床上生氣。

當天下午4時，葉參座打電話要我立即到他家裏去談問題。我到達後，葉參座面露微笑對我說：“你今天為黨立了一次大功，我們交給你的任務完成得很好，解決了一個棘手的問題，我們很高興。”以後又問了問上午同陳光外出的情況，又問了問我過去同陳光的關係情況，我均如實地回答。談話時間並不太長，就離開了。

在軟禁陳光的第四天上午，陳光乘內衛和外衛疏忽，一下跑出院子外面去了，沿着馬路奔向水上俱樂部方向。

警衛人員在後面邊追趕邊問他，“你幹什麼去？”

“我去找李作鵬參謀長”陳光說。

“他不在那邊。”

“他住在哪裏？”陳光問警衛人員。

“你先回去後再告訴你。”

“我有急事要找他。”

方块字读书社区

“先回去再說”，警衛人員七手八腳，你拉我推，把他弄回家去了。

次日上午葉參座打電話給我說：“據說陳光有急事要找你，你可以到他那裏看看他有什麼急事。然後把了解的結果打電話告訴我。”

我遵照葉參座的指示，當天下午就到陳光那裏去了。陳光雖然情緒不好，但見到我仍很平靜。

待我坐下後，他說：“他們把我關起來，你事先知道嗎？”

陳光兩眼血絲密布，一看便知休息的不好。

“知道要把你軟禁，但上面有嚴格紀律，不能告訴你。”我坦率如實地回答。

“這個我理解，我不怪你。”陳光又說：“我想找你商量一件事情，你看我現在落到這個樣子，怎麼辦？廣州和武漢（指葉劍英、林彪）都不可能解決我的問題。我想請你到北京去走一趟，先找羅（指羅榮桓），請羅找老毛（指毛主席），把我的情況向老毛匯報，加在我頭上的‘通敵、外逃’的罪名是他們捏造的。在港澳建立情報關係，就是‘通敵’，隨便談談想到香港去看看就是‘外逃’，這是天大的冤枉。我希望北京派人來廣州調查，我希望羅、毛說句公正話。”

我以同情和誠懇的態度回答說：“祇要葉參座同意，我願意到北京去一趟。你的問題快點解決，也是我的心願。如果不同意我去，那就無能為力了，我不能自由行動。”

沉默片刻後，陳光又說：“真急死人，現在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除了請求黨中央、毛主席解決外，別無辦法。”

我說：“急也沒有用，我很快請示葉參座，如果同意，我盡快出發北上。”

說完我起身就走，他送我到樓梯口，我邊走邊說：“你千萬保重，注意身體。”他祇點點頭而已。

當天晚上，我把情況用電話如實地報告了葉參座。葉指示說：“你告訴陳光，現在你工作離不開，我不同意你去北京。他的問

題我們已經報告了黨中央、毛主席，黨中央和毛主席同意我們對他的處理。”

次日下午，我又到陳光那裏，把葉參座的指示全部轉告給他。他聽完後，脫口而出說：“那好，聽天由命。你曉得他們是怎樣報告中央的？”看樣子陳光情緒又在激動，滿臉充血，煩躁不安，想說什麼沒有說出來，室內空氣沉悶緊張。我又想不出什麼適當話語來緩和他的情緒，祇好陪着靜坐。

過了一會兒，無話找話，我問了問他最近生活情況，他低聲說：“生活是小事。”

我說：“生活方面有什麼要求你盡管說，上面並沒有規定降低你的生活待遇。”他低頭不語。我看沒有什麼可談的，就起身告辭。

這次他不但沒有送我到樓梯口，坐在藤椅上連身也沒有動。從此之後，我再也沒見到陳光了。

四、歷史懸案

直到1950年秋，我調離廣州時為止，陳光問題調查結果如何，我一點也不知道。事後，曾聽賴傳珠在閑談中談到兩件事情：第一，原來說陳光住的樓下有一個秘密武器庫，根本無其事。除了警衛班每人一支槍外，沒有發現其他武器。第二，清理審查陳光的私人文件，也沒有發現什麼重大問題。這說明當初葉參座宣布陳光所犯的四條主要錯誤并依此作為處理陳光的依據，與事實是有很大出入的。

是年冬天我到北京開會，曾去看望羅榮桓并順便談到陳光問題。記得當時我主要向羅說了兩點：一是向羅匯報陳光曾表示對他如此處理很有意見，希望中央過問他的事；二是我提到陳光是有戰功的。羅榮桓說此事已由葉參座處理，并要我守口如瓶，不必再過問此事，也不要再多說話，防止別人說是山頭主義、宗派

主義。以後我見到林彪時就再沒有提此事了。

後來，有人說軟禁陳光是林彪所為，我不相信。林、陳之間有誤解，有成見是可能的，甚至據說在延安整風時他同林彪吵過架，但這畢竟是同志間的內部問題，陳光畢竟是戰功遠遠大于過失。全國剛剛解放，林彪不可能，也沒有道理致陳光于死地。

據我所知，陳光在紅軍時期還捨命救過林彪。那是在1930年1月，紅4軍到達寧化，獲悉贛、閩、粵三省敵人共十四個團，對閩西地區發動“三省會剿”，其目標是消滅紅4軍于閩西地區。2月，紅4軍轉到吉安陂頭鎮地區休整。此時，蔣介石嫡系獨立第15旅唐雲山部，由吉水、吉安分路向紅軍進犯。我軍在水南施家邊（此地離筆者家鄉十五華里）將其殲滅，俘敵一千六百餘人，繳槍二千餘枝。

在殲滅唐雲山旅戰鬥中，林彪的指揮所設在靠近火綫的一個山坡上。敵人發現後，來了一個反擊，把指揮所重重包圍，並進行攻擊。陳光見此情況，立即親率部隊向敵人猛烈衝鋒，把敵人打退，替林彪解了圍，陳光因此也負了傷。當時如果讓敵人打進了指揮所，後果就不堪設想了。事後，林彪很高興，親自去慰問負傷的陳光。

這是陳光在山東抗日期間，親口對我講的。

1953年，據說給陳光做出的政治結論是犯了反黨錯誤，組織上開除黨籍，並將陳光由廣州轉到武漢關押，不久他就死去了，傳言是他引火自焚，究竟是什麼情況我一直不得而知。一代風流人物、紅軍老戰士、抗戰將領，至此無聲無息地終結。陳光死得非常遺憾，死得非常悲慘，死得不明不白。

陳光的問題以及陳光的死，多少年來始終如同一塊石頭壓在我的心頭，沉重無比。後聽說，中央重新審查了陳光問題，並給予了平反，恢復了黨籍和榮譽。

1994年春，我在北京，聽說陳光的愛人史瑞楚病重，我立即與老伴前往醫院看望。看到老戰友史瑞楚，就想起老領導陳光，百感交集。不久，史瑞楚去世了，這也是我們的最後一次見面。

參加處理陳光問題的人，有的已經作古了，但也還有健在的，相信他們會提供更加全面、準確的資料，以澄清多年之久的歷史懸案。希望我的這一點回憶能夠助一臂之力。

第二十六章 在武漢高級步校五年

一、為部隊培訓了大批基層幹部

全國解放初期，部隊幹部戰士普遍文化低，文盲和初小水平占相當大的比例。隨着我軍各軍兵種的建立（當時已建立了海軍、空軍、炮兵、工程兵、裝甲兵等）和蘇式武器大量裝備部隊，加強文化教育和專業化培訓日顯重要。為適應正規化軍隊建設的需要，迫切要求我軍指揮員，無論是文化水平，還是軍事指揮與政治理論水平，都要有進一步的提高。

1950年初，中南軍區曾召開兵團、軍區負責人參加的高級軍事幹部會議，林彪在會議上強調，文化教育關係部隊今後發展帶關鍵性的問題。會議決定，在一段時間內的部隊訓練中，以文化訓練為主。

1950年8月，毛澤東提出：“鑒於人民解放軍的指揮員戰鬥員一般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情況，為了要完成偉大的新任務，就必須提高全體指揮員戰鬥員的文化科學與技術水平，並從軍隊中培養大批的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因此，中央決定，全年除執行規定的作戰任務和生產任務外，必須在今後一個相當時期內着重學習文化，以提高文化為首要任務，使軍隊形成一個巨大的學校，組織廣大指揮員和戰鬥員，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幹部，參加文化

方块字读书社区

學習。”¹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新建和改建多所軍事院校，使之成為大批培養我軍指揮員的基地。

中南軍政大學是第四野戰軍創辦的軍事院校。原是東北軍政大學，在東北、華北及華中解放後，于1949年遷至武漢市。林彪兼任校長，羅榮桓兼任政治委員，倪志亮為副校長，劉其人為副政委。軍政大學原有的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廣西、廣東分校，也在1950年8月，依次改稱為第一至第六分校。

1950年秋，四野總部調我擔任中南軍政大學副校長。

1951年3月，中南軍政大學改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高級步兵學校。

我任高級步兵學校校長，劉其人為政委。後劉其人調北京，張駕伍為政委。我與他們一起工作了五年。

同時，原下屬六個分校，也依次改稱為第二十（商丘）、第二十一（信陽）、第二十二（長沙）、第二十三（南昌）、第二十四（桂林）、第二十五（廣州）步兵學校。

高級步校領導機關設有校務部、訓練部、政治部、供給部、衛生部、幹部管理處，下面直屬三個軍事總隊和一個政治大隊。

當時高級步校的任務是負責培養以中南地區為主的解放軍中級（團、營）軍政幹部。分校主要負責培訓連、排幹部。

高級步校第一期培訓的軍政學員是營、團幹部，學期為兩年。另有一個軍事理論隊，負責培訓師職幹部。

高級步校（含原中南軍大）培訓學員情況大致是這樣：

按照中央軍委“速成的，聯繫實際的，但又是正規化的”的教育方針，在1950-1953年期間，主要承擔了五類對象的培訓任務：

第一類學員：速成培訓部隊急需的補習文化和掃盲教員。從1950年下半年開始，經政治審查合格後，從地方招收青年知識分子，經過在校一學期（半年）的速成政治教育和軍事基礎訓練，畢業後大部分學員分配

方塊字讀書社區

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698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的主要目的，是使這批教員，盡快幫助解決部隊各基層連隊文盲多文化低的狀況。

到1951年底，在三個學期中，我們總校和各分校培訓的補習文化和掃盲教員數量已達幾千人。

1951年底，中央軍委決定自1952年起，部隊執行以文化教育為主的訓練計劃。總政治部下發的《1952年文化教育計劃大綱》，要求全軍開展以掃盲為重點的文化學習運動。用50%的訓練時間學習文化，爭取在一年左右的時間內，全軍幹部戰士基本掃除文盲，並將各級幹部中的初小和高小文化水平，分別提高到高小和初中文化水平。

為實現這一目標，我校必須抓緊培訓更多的為基層部隊服務的補習文化和掃盲教員。校務會決定自1952年初開始擴大招生。

當時，總校直屬軍事一總隊和六個分校均承擔了擴大招生任務。總校招生十二個連隊；六個分校，每校各招生十六個連隊，共招生一百零八個連隊。每連隊約有九十至一百人，每學期培訓一萬人左右。學員從1952年初陸續入學。

與此同時，我校還抓緊編寫了部隊適用的中、小學文化速成補習課本。

到1953年夏的一年半（三學期）中，我校共培訓了近三萬多名補習文化和掃盲教員，這些教員和我校編寫的文化速成補習課本，不僅為部隊大規模開展文化教育創造了非常有利的條件，而且這批教員也成為解放後，我軍自己培養的第一批有文化的基層幹部。

第二類學員：為了適應總校和各分校擴大招生的需要，急需培養學員隊的軍政教員。總校開設了軍教、政教二個大隊，共四個連隊，每隊約一百人左右。學員主要是從文化水平高的部隊在職幹部中抽調，以及少量政治表現好，文化水平高的國民黨起義和解放軍官中挑選的。經過一學年（兩學期）的培訓後，分配到總、分校擔任學員隊的軍政教員。部分以後成為總、分校的教育骨幹，有的還被輪送到兄弟院校任教。

1951年初，軍委連續下發了《部隊教育的指示》、《補訓團教育的指示》和《參謀人員學習的指示》等三份文件，強調進一步提高部隊軍事幹部的訓練。中南軍區為此做出了《關於開辦教導隊、輪訓隊的決定》，決定要求，各軍區要成立教導大隊，軍分區要成立教導隊，堅持軍事幹部的在職培訓。

我校也隨即開設了軍事訓練課程。

第三類學員：培訓在職的參謀人員。總校參訓大隊承擔了這一任務。學員大多來自中南軍區和華東軍區的師、團司令部機關的參謀人員。每期共設四個隊，每隊約一百人。經過一學年的培訓，這批參謀學員在技術科目和戰術科目的教學和考評中，要達到會講、會寫、會算、會圖上作業的“四會”要求，基本達到適應各軍兵種對參謀人員業務的要求，解決部隊指揮機關業務骨幹的來源問題。畢業後，主要分配到部隊師、團司政機關，做參謀或幹事工作。

第四類學員：培訓野戰部隊的初、中級軍事幹部。1951年總校開辦了二個軍事幹部訓練大隊，包括六個訓練中隊，每中隊不超過八十名學員。學員主要來自四野各部隊的營、團職幹部，也有少量師級幹部。先學一年文化後，師職幹部轉到相關的軍事學院學習（少量回部隊），營、團幹部繼續學習軍事、政治一年。

從1952年第二期開始，為滿足更多野戰部隊初、中級軍事幹部的培訓要求，總校決定開設三個軍事幹部大隊（九個訓練中隊），另開設一個政治幹部大隊（三個訓練中隊），這樣，每期的學員達到了一千人左右，各分校則接收一年制的連、排職軍政幹部的培訓工作（半年學文化，半年學軍事）。一般每校設四個大隊，十六個連隊，每連隊約九十至一百人。每學年各分校則培訓近萬名連、排幹部。

第五類學員：改造國民黨舊軍官。1950年開始接收國民黨張軫部的起義軍官的教育改造工作，總校直屬軍事三總隊承擔了營職以上起義軍官的教育改造任務。經過一學期的政治教育改造，除少量作了遣送回原籍的處理外，大部分在部隊和地方分配了工

方塊字讀書社區

作。營職以下起義軍官的教育改造在湖南南岳進行，隸屬於長沙分校負責。

建校最初近三年的統計，我總校和各分校為中南軍區短（半年）、中（一年）、長（兩年）期培訓初、中級軍政幹部（包括改造張軫部起義軍官和為越南訓練軍政幹部）數萬人。為部隊培養了大批有一定文化基礎，有一定政治素質，懂軍事業務的基層幹部。

二、向蘇聯學習正規化與改進教學

1951年秋，軍委訓練部在北京召開軍事院校會議，由訓練部長蕭克主持，會上提倡並強調軍事院校的教育方向，應全面向蘇聯軍隊的正規化學習，應全面建立正規化的軍事院校，軍事院校應全面為軍隊的正規化建設服務。

我和總校訓練部長參加了這次會議。我和與會的不少院校領導，在會議上發表了基本一致的意見，大意是（1）擁護正規化、擁護向蘇聯學習；（2）但中國與蘇聯情況也不同，例如中國城市差不多都有城牆，這樣就有一個攻堅問題；又如中國地形山多河多，南北氣候條件也差異很大，對軍事行動既有利又有弊；（3）因此向蘇聯學習的同時，應照顧中國特點。

蕭克向國防部長彭德懷匯報會議情況時，彭德懷指示說：“誰不好好向蘇聯學習，就叫他滾蛋！”這句話似乎是對我們提出意見和看法的批評，當時對我的震動很大，也印象極為深刻。

回到漢口，在學校黨代會的講話時，我就特別傳達了“正規化地向蘇聯學習”的上級精神，並相應地提出了三個治校行動口號：“堅決地、全面地、不走樣地向蘇聯學習，反對經驗主義；以教學為中心，反對官僚主義；堅決貫徹條令，反對游擊習氣。”這次講話對全校向蘇軍學習正規化建設有促進作用。

當時學校的教育計劃、課程設置和使用的教材基本是照搬

蘇軍步兵學校的模式制定的，在學習貫徹紀律、衛戍等條令條例時也參照學習蘇軍，例如軍事訓練中，就特別強調隊列條令，班隊列、排隊列，點名報數都要整齊劃一。每天早晨5點半，全校廣播起床號，6點整，不論機關幹部，還是學員隊都必須出操練隊列，齊步、跑步、踢正步，隊列口號此起彼伏。又例如內務條令，特別強調軍容風紀，教員上課必須把皮鞋擦亮，學員的軍裝洗乾淨後，必須疊好，壓在床墊下。學員隊宿舍規定床上的被子、床下的鞋子都必須擺成一條綫，等等。

1952年11月，中南軍區命令，第四高級步校又改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高級步兵學校。對上，學校直接歸軍委軍校管理部領導，對下，各分校與總校脫離領導關係，由各省軍區領導，但與高級步校仍保持業務指導和交流關係。

學校番號改了，我們教育工作的任務、方針沒有任何改變。學校不再為基層部隊培訓補習文化和掃盲教員（轉為分校負責），而成為了專門培養和訓練初、中級軍事幹部的基地。學員是來自全軍各軍區經選拔推薦的骨幹。學員雖比前幾年少了，但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因此對教學水准有了更高要求，學校辦的更加正規化、現代化了，推動了學校整體水平的提高。

軍委軍校部曾派了兩名蘇聯軍事顧問常駐學校，蘇聯顧問向我們介紹蘇聯院校和軍隊正規化、現代化的建設情況，對我們工作幫助不少，我們與顧問的關係也很密切。

學校的正規化軍事教育，受到多方面的表揚和鼓勵。1953年，全軍軍事院校參觀團來我校全面檢查工作，參觀團團長、總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同志在檢查後，稱贊我校為名副其實的“第一”高級步校，給予的評價是：“領導堅強，教育有方，生活正規，情緒高漲。”

幾年來，我逐步積累了一些辦學的經驗，在全面向蘇軍學習的大背景下，開始注意和改進教、學雙方存在的問題：

其一是教學方面存在着教條主義的傾向，理論學習與實際操作脫離，學員死背教條，追求高分，形成學員“高分低能”的現

象，如射擊理論學習得高分的學員，在實際射擊中成績却不及格；

其二是錦標主義思想嚴重，爲了追求分數，死背條文，不求甚解。有些教員和學員，對考核的目的不明確、不正確；

其三是教學與學習中的形式主義傾向，有些學員條文背的爛熟，教員就給高分，但問其一知道，問其二就不知道了。不求甚解的學習方法，多半是由于死記條文而造成的。不是所有的條文都要死記，而是記住某些重要問題的特點、結論、定義、重要數字等，這點在教育學上均有明確的指示；

其四是大量擠占學員的課外業餘時間，搞疲勞戰術。等等。

存在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是教學指導思想問題，是學員的學習目的問題。是學爲看，還是學爲戰；是祇看高分，還是重在效果的問題。

1954年5月，我在《八一雜誌》上發表了《改進教學方法 提高教學效果》的文章，就是闡述了我對辦學中存在問題的幾點看法和改進的意見。

在高級步校，我在南征北戰多年後第一次安了家，學校分配了宿舍，老伴帶着三個孩子穩定地住在了身邊，從此結束了流動不定、聚少散多的生活方式。

在高級步校工作的五年，我完成了戰爭年代與和平年代之間的過渡。衝鋒打仗與學校管理之間的距離，真如一個天上一個地上，工作內容、工作節奏、工作方式完全不一樣。校園內除了早晚和周末，出奇的安靜，學員們都在教室裏埋頭讀書。日常的教學與管理按部就班地進行，火燒眉毛的事情幾乎沒有，每天的時間對我來說好像長了許多。

我認識到應該拿出一定的



方塊字讀書社區

1953春 武漢高級步校

精力和時間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適應新時期需要的工作水平。參加紅軍的時候我祇有私塾四年的文化，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中，我祇能是用什麼學什麼，根本談不上系統的學習。和平時期了，我的工作又允許我“近水樓臺先得月”，一邊工作，一邊爭取系統的學習文化和軍事知識是完全可以辦到的。我把學員每期的教材拿來通讀，不懂的地方就到課堂上與學員一起聽課。我還請了文化教員，系統地教了我兩年初中文化，收獲很大。後來，我到南京軍事學院學習，深感在高級步校補習的文化和軍事知識對我之後的學習幫助甚大。

三、步校老同事的往事回憶

前幾年，我向原在高級步校與我一起工作的周倫等同志作了一點調查。他們為我寫了一些材料，非常感謝他們的幫助。下面轉載周倫同志的材料：

《作鵬在中南軍大和高級步校工作期間的一點情況》

作鵬在中南軍大、高級步校工作期間，正在全面落實毛主席發出：“向蘇聯學習，為建設強大的國防軍而奮鬥”的號召，向蘇聯學習，建設正規化的軍事院校，是這個時期工作的中心。作鵬的活動，工作中的成績與失誤，也大都反映在這個問題上。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兩次講話：

(1) 1951年在學校第二屆黨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提出了三個頗有影響的口號，即“全面地、不走樣地向蘇聯學習，反對經驗主義；以教學為中心，反對官僚主義；堅決貫徹條令，反對游擊學習氣”。報告是根據全軍院校會議精神，結合學校的實際情況做的。代表大會通過了這個報告，並作了相應的決議。

(2) 在同年下半年左塊字读书社区行管會上的講話，總校《教學導報》全文刊載了這個講話。講話實際上是對第二屆黨代

會提出的有關正規化建校工作的初步總結，也是把高級步校建設成爲正規化的軍事院校再動員。講話肯定了第二屆黨代會以來正規化建校的成績，初步總結了這方面的經驗，提出了進一步加強正規化建校的措施。這兩個報告對統一幹部思想、動員全校人員齊心協力把高級步校建設成爲正規化的軍事院校起了良好作用。當時三個口號可以說是深入人心，成爲全校人員的自覺行動，在全校掀起向蘇聯學習、建設正規化軍事院校的熱潮。當時各方面工作都有起色，特別是在加強正規化軍事訓練和貫徹條令抓教育上是走在全軍前面的。在此期間，羅帥、葉帥、陶鑄、譚政、伍修權、蕭華、甘泗淇、孫毅等領導同志先後來過學校檢查指導或參觀。譚政同志每年都要來幾次，軍委、總部統一組織的以及各院校自己組織的參觀團，足有不下幾十個。1953年春夏之交，總部組織的全軍軍事院校參觀團在全面檢查高級步校工作之後，參觀團團長、總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同志贊賞并鼓勵高級步校爲名副其實的“第一”高級步校，給予的評價是：

“領導堅強，教育有方，生活正規，情緒高漲。”

如果說失誤，主要是在向蘇聯學習這個問題上，當時提出向蘇聯學習是正確的，但是加上兩個副詞，即“全面地”、“不走樣地”就有失偏頗，其理由不言自明。實際上，在後來的實踐中已經逐步糾正了這個口號中的不適當的提法。

關於作鵬在學校的表現，就我所見所聞，可以用幾句話概括：工作勤奮，學習刻苦，作風緊張，生活儉樸。

工作勤奮就其主要者列舉如下：在學校工作五年多的時間內，舉凡比較重要的講話、報告，他都喜歡親自動手，不要機關、秘書代筆，部門和秘書起草的文稿，幾乎他都要親自作過修改，有的改過多次。對學校建設上的重大問題，他主動提出的建議比較多，這是劉其人政委的評價。劉其人同志說：他與許多人共事，合作得最好的是洪學智、李作鵬。在學校工作期間，除了做一次鼻病手術，在家休息十多天外，他沒有住過醫院，一直堅持在工作崗位上。祇要他人在學校，每天都提前十分鐘到達大操

方块字读书社区

場，檢查機關幹部和學員連隊的早操，一直到他離開學校到軍事學院學習。關於這一點，直到現在，在高級步校工作過的幹部談起來，還交口稱贊。

關於學習，他的寫作水平，總結能力是很強的。據我看大學畢業生寫出的總結也不一定能比得上他。但是作鵬在參軍前不過祇讀過小學，算術在五十年代初也就是高小程度。當全軍五十年代初掀起學文化的高潮時，他與劉其人政委一起請了一位文化教員教他們數學。經過近兩年的學習，數學達到了初中或略高一點的程度。當時全軍倡導學習《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他也是很認真的。中南軍區考核時，他得了滿分。至于對現代軍事科學，他抓得很緊，除了與學校幹部同樣參加全校組織的學習外，更多的是抓緊自學，甚至星期天也常在書房裏學習。在北京總部組織的高級幹部集訓，他與別的首長不同，以一個普通學生身份，同其他首長帶來的參謀、秘書一起進行圖上作業，表現的十分刻苦。他對不熟悉的學科也敢去碰。當時提倡學習心理學，在這方面，我覺得他和許多同志一樣可能也很陌生，但他却承擔了給中南軍區幹部集訓班講解心理學的任務。總之，作鵬給我的印象，在他的活動日程上，除了工作，就是學習，打撲克、跳舞之類的活動與他是無緣的。

作風緊張，他本人的學習、工作、生活以及對部屬的要求，都體現了這個特點。他辦事乾脆、利索、不拖拉。我記得1951年為修建射擊場徵用土地問題，學校曾向武漢市人民政府打報告，並派人多次請示催促，拖了很長時間未能解決。在這種情況下，作鵬出于對建設正規化軍事院校的責任感，再次向市府寫報告，提出強烈抗議，不久問題得到解決。聽說市府為此對學校還有些意見。

關於生活，除制度規定的他應得的享受外，作鵬沒有特殊要求，也沒有得到特殊照顧。剛遷到礄口營區時，他全家住三間房。作鵬夫婦住一間大屋，方缺字读书社区保姆與小孩住一間。後來給蘇聯顧問建立一棟小樓，不知什麼原因，顧問沒有進來，這

棟小樓即由作鵬與劉其人政委共用。作鵬用六間，約80平米左右。保姆房、會客廳都在內。當時政治風氣都比較儉樸，除了必要的應酬（如顧問赴任或回國，重要的參觀團等），平時根本沒有請客送禮之說。我記得總、分校領導參加第一次軍教會議，考慮到大家在勝利後頭次進京開會，便請大伙到全聚德吃了一頓烤鴨，用掉人民幣40多元。三反時作鵬為此還作了檢查。作鵬離校時，校領導與四部一處領導為作鵬餞行，也是由這些同志自己掏腰包。

周 倫（1992年春節于武漢）

四、辦學體會

隨着辦學的逐步規範化、系統化和辦學經驗的逐步積累與成熟，1954年，我在當時的軍隊權威性刊物《八一雜誌》上，發表了辦學過程中實踐經驗的總結專題文章《改進教學方法 提高教學效果》。通過這篇文章可以看出，高級步校的辦學方針，已經從盲目“全面地向蘇聯學習正規化”，不走樣地照搬蘇軍教學的那一套，逐步轉變為突出中國軍校的辦學特點，更切合我軍實際作戰水平。教案以改進教學，提高教學效果為目的，強調按照實際情況，決定教學方法，強調學以致用的教學風氣。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通過幾年的辦學實踐，不斷摸索、完善辦學思路和教學辦法的過程。

文章發表於1954年5月，在《八一雜誌》第51期。

《改進教學方法 提高教學效果》

我校自轉入本科學習之後，教學上已取得相當成績，教學效果是逐漸上升的。但根據各科的成績發展不平衡，不鞏固。有些科目的實際效果仍然不夠好，甚至沒有達到應

有的要求。例如在去年十、十一月份，步槍基本射擊第一練習全校不及格；衝鋒槍基本射擊第一練習雖然全校平均及格，但有九個教學單位不及格；輕機關槍基本射擊第一練習就已進行的單位計算尚有十一個單位不及格。其他所屬理論性的科目，從測驗統計數字來看成績很好，但實際效果還有一定的距離，死記條文不求甚解的現象仍較嚴重。如對於支撐點的形成或戰鬥隊形組成的原則，背的與原案幾乎一字不差，但究竟如何形成支撐點或戰鬥隊形，顯示在圖上便有錯誤，或顯示不出來。有些學員作業成績很好，但抽測時往往成績很差。

產生這些缺點的原因在哪裏呢？除了課目進度的安排上有缺點，射擊練習時間擁擠，預習時間少，趕進度走過場的現象仍然存在外，主要的是在教學方法上還存在問題。

(1) 在教的方法上存在的主要缺點是教條主義。就是在講解課文時，往往把理論的內在聯系加以分割，沒有把問題有機地連貫起來闡明其實質，並且不善于使理論與實際聯系，忘記把學員親身經驗及最熟悉易理解的事實列舉出來，印證原則溶化理論，結果有些生動的課目都講的枯燥無味，不能開導學員的思路。許多疑難問題不能獲得解決，對重點問題的深透講解，認識上還存在着片面性，過分地遷就學員們喜歡簡單的思想，而盲目地強調“抓重點”。如有的教員對學員說：“記住這幾條就行了”。這樣做的結果，破壞了教學內容的系統性和完整性，而把“重點”孤立起來。

(2) 在學員學習方法上存在的問題是：對“彈鋼琴”的學習方法領會還不深刻，仍存有重此輕彼“單打一”的現象；對如何苦練與掌握要領還掌握的不够好，做筆記與不做筆記以及做筆記的方法問題，還沒有明確解決。這些都使學習效果不能提高。

(3) 在教學雙方，都還存在着一些錦標主義的現象。主要地表現在學員單純追求分數，教員定分數上尚有偏差。如學員祇要背過條文，教員就給五分，[方块字读书社区](#)要扣分。測驗題目太簡單，注重記憶而不注重發揮，對聯系實際重視不足。在記分上一

般偏高。有些學員爲了追求分數，常常死背條文，不求甚解。

爲了提高教學效果，根據上面所說的原因，應該採取以下方法：

（一）加強對教員業務能力的培養，不斷地改進教學方法。

要使學員學習成績好，圓滿地完成每個課題的教學要求，其關鍵有三。第一是依靠教員把課講好，把實際作業領導好；第二是依靠學員的自習；第三依靠輔導與互助。以上三點是缺一不可的。而其中以教員把課講好和把實際作業領導好是根本的關鍵。有的教員不重視把正課領導好，而依賴於課後輔導解決問題，這是本末顛倒的。如果正課時間解決了應解決的問題，那麼不僅可避免學員在課後的過度緊張負擔，而且也可避免教員在輔導中互相爭時間的現象。要想把課講好和把實際作業領導好，必須強調課前充分準備。課前準備主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一，在教學內容上，既要按照教育計劃的要求，又要考慮到學員的實際接受能力；第二，在教學方法上，必須在一定的時間之內，教授一定的內容，同時又要使學員能在一定時間內確實接受。如果沒有正確的方法，常常使講課的效果大大降低。任何一堂正課，都要考慮充分地發揮學員聽、看、做相結合的方法。

理論與實際，既不可不聯繫，也不可亂聯繫。死啃條文不聯繫實際或者祇是現象羅列，甚至東拉西扯、張冠李戴地亂聯一通，都不能使學員深透地解決問題。既反對急于求成的做法，也反對死背條文不求甚解脫離實際教條主義的偏向。對課題進行重點講透是對的，但不能理解爲孤立地講透重點而忽視系統全面，必須是在系統全面的基礎上的重點講透。

（二）克服錦標主義正確進行對學員的考核

要想克服錦標主義，就要用正確的方法考核學員的學習成績，使考核真正達到這樣的目的，即：一方面督促學員鞏固學習成績並克服學習中的缺點；另一方面了解教員教學工作中的優缺點，以便及時改正。

方块字读书社区

對學員學習成績考核的方法，基本上有三種：

第一種是教員對學員的平時考核。其方法有三：一是教員領導課業時進行個別的有系統的日常考查，即在每次上課或實際作業時經常抽問學員，檢查其了解程度，其中一部分記分，一部分則不記分；一是在教員監督下進行作業，由教員評定其成績分數，一是教員在日常與學員接觸談話及輔導中去考核學員的知識水平，根據這種了解記在自己的日記本中。

第二種是對學員的定期考核，其方法也有三個：一是“單元測驗”或“課終測驗”，就是根據教育計劃對某些已進行的章節內容加以復習進行普遍測驗，使學員把每課零碎片斷的知識，歸納成為系統的較完整的知識。這個方法一般是由訓練部計劃組織實施；一是學校按照教學檢查計劃，每月對一定的教學班進行重點的抽測或普測，次數不能過多，大約每個學期對每個教學班進行一次，至多兩次。一是升級考試，檢查學員對每個學期中各種科目的學習成績，決定其是否可以升級抑是留級，並找出全學期教學工作中的優缺點。這種考試是由校首長命令成立考試委員會及科目小組委員會進行的。

第三種是全學期教學內容結束，進行國家考試。經軍委命令成立國家考試委員會及若干科目小組委員會，代表國家進行對學員全期學習的總檢查，並決定其是否可以畢業、肄業，或進行補考，同時是對學校全盤工作的總考察。

以上三種考核方法，如能正確掌握，認真貫徹實施，就能正確掌握學員的實際知識狀況。除了以上三種考核方法之外，營、連及各科系不要隨便增加測驗。頻繁的測驗，會使學員負擔過重。如果有必要時，亦必須經過校領導批准，以免影響教學正常進程。

關於考核成績的評定問題，必須完全按照五級記分的統一標準執行，並採取實事求是的客觀公正態度。凡評為五分者，在理論上一定是確實融會貫通了，並能聯系實際加以發揮，決不是背出了幾條原則就是五分。在實際動作上則必須是完全合乎標準的要求，不是一般地會做就是五分。理論與實際作業題目，應

以實際作業題為主，記憶與發揮題則以發揮題為主。可高可低者一般從低定分。當然故意壓低學員成績也是錯誤的。屬於第一種日常考核形式者完全由主講教員個人負責定分，其他任何人不能干涉。如果其記分有偏差時，可按級向上報告，由其直接上級給予批評和糾正。關於單元測驗的成績評定一般由指定的教員評定之後，由主任教員、系主任及訓練部首長分別進行重點復查，親自審閱若干卷子，以便了解其定分標準是否正確，並從中了解上、中、下各種不同成績學員的實際知識水平。而升級考試及國家考試的評定，任何人無權單獨決定，必須由科目小組委員會評定之後，經過校或國家考試委員會審查批准才算合法，以保證成績評定的最大客觀性和公正合理。

(三) 加強復習鞏固學習成績

為使學員學到的東西大部確實變成自己的東西（部分的忘掉是不可避免的），就必須對課目內容反復地復習，以求消化，防止前學後忘的現象。

復習的方法是多樣的，不能認為每天兩小時的自習才算復習，這是一種狹隘的看法。

在開始講解正課之前，檢查一下學員對舊課的了解程度和記憶程度，在講解新的教材時，講解一段就提問一兩個問題，最後教員給以結論，把重要問題重新提示一下，這都是進行正課時的復習。其次，學員自修時獨立思考和獨立作業，對重要理論性課目的課題討論及屬於戰術與技術問題的搞通原則後的實際作業，單元測驗時的較有系統的綜合性的復習，以及期末考試（包括考試後的休假期間的復習）及國家考試前的總復習，都是最基本的復習。祇要每個環節都抓緊了，課目內容就能夠求得消化，成績也就能夠鞏固，前學後忘現象就可以克服。至於課外的復習輔導及各種配合雖很重要，但在復習中祇起輔助作用（如俱樂部的配合，專修室的講座，以及教員的課外個別輔導等）。如果把應該復習的機會放鬆了，不改進方法，大家祇注意去搞課外復習輔導，同樣是本末顛倒。課外休息并不是浪

費，而是養精蓄銳準備更好的學習，學員過度疲勞，學習效果也是不會好的。所以該休息時必須盡量休息。

目前我們在復習與輔導上，仍存在混亂現象，如在每天自習時間中有個別教員爭時間的現象，戰術教員交待復習三個戰術題目，坦克教員來了就把黑板上三個戰術題目擦掉，寫上坦克復習題；有的課目復習時間超過正課一倍以上，有的則不及正課的七分之一；亦有過分限定學員機動的現象（對自習內容上的必要機動）。爲了糾正這種混亂現象，自習時每天以不超過兩個課目爲宜，應允許學員必要的機動。有些課目要逐漸轉變以預習爲主，教員應着重於個別輔導。其次是大家都抓晚上遊戲時間，抓不到就不高興，弄得學員筋疲力盡，甚至把理髮洗澡時間都占去了。這樣做是不對的。除周末晚會及少數人的必要會議與講座輔導之外，應貫徹自覺自願參加體育娛樂或其他活動爲主的原則。遊戲時間應由俱樂部掌握，盡量少搞統一的大集體活動。

（四）運用正確的學習方法

必須認識，不求甚解的形式主義的學習多半是由于沒有開動腦筋死記條文而造成的。那麼今後條文還記不記呢？必須指出，盲目地反對記憶條文是不對的，必須記的仍然要記，但必須是在理解的基礎之上記憶。知識上的遺忘現象常常是因爲印象不深刻或機械記憶而造成的後果，如果印象深刻確實懂了的問題是比較難忘的。另一方面不是所有的問題都死記，而是記住某些重要問題的特點、結論、定義、重要數字等，這點在教育學上均有明確的指示。筆記問題：過分強調筆記的作用是不對的，但有筆記能力根本不記，否認其作用也是不對的。課堂上，邊聽教員講邊記筆記，自修時將讀過的書或教材內容之要點加以摘要筆記（但不是抄書）或按照習題作答案，均應提倡，不應禁止。以我們現在學員的水平，不能過高要求。重此輕彼的思想，應糾正，以求全面科目獲得良好效果。因爲教育計劃上規定的課目都是重要的，都是必須學習的。抓住中心，必須兼顧全面，不能理解爲祇抓住某一科目，而是各個科目各個課題都

有中心問題，都要抓住同時又都要兼顧其他。祇有這樣學習，我們才能既深透又能全面地提高。

作為我軍軍校建設的親歷者，高級步校的成長過程，既反映出我軍在和平年代的建設、調整與進步的過程，也反映了我在解放初期的適應、轉變與提高的過程。我為自己能够在創建新中國強大的新型軍隊的過程中貢獻一份力量，深感欣慰與自豪！

第二十七章 在南京軍事學院學習

一、一隻舊木箱

至今，我珍藏着兩件東西，這兩件東西都是在南京軍事學院學習期間得到的，一件是國家給予我的，一件是軍事學院給予我的。從南京學習結束後，到北京工作的幾十年中，從1981年到太原生活，直到回北京養老，這兩件東西始終伴隨在我的身邊（當然也有例外，那是1971年到1981年的十年中，這兩件東西保存在中央專案組，木箱上的多處封條還依稀可見。所幸的是，之後退還給我了）。

是什麼東西我如此珍愛呢？

一件是1955年授予我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軍銜，並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我把勳章視為我



一生中最高的榮譽，因此珍藏在身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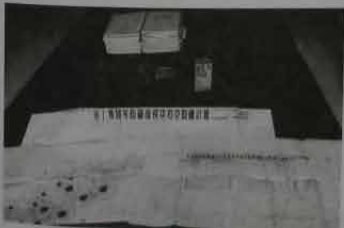
而另一件，就是在南京軍事學院戰役系學習期間發給我的教材。我全部裝在用炮彈箱改成的木箱內，保存到今天，算算已有五十多年了。我保存的教材包括：四十八冊（其中半數為合訂本）教科書，六十五份教學用軍事地圖，十本學習筆記和三份作業試卷。我把在南京軍事學院學習的這些教材，視為我終生的財富，因此與勳章一起珍藏在身邊。

每當我看到這隻木箱，就使我想起在南京軍事學院緊張的，但十分有意義、有收獲的學習與生活。

1955年夏天，我接到上級的通知，調我到南京軍事學院戰役系學習。這真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大好消息，有機會再次到我軍的最高學府學習（第一次是1937年在延安抗大學習），是我十分渴望的。

第一期（也是唯一一期）戰役系學員共五十二人，全部是從當時全軍各部隊，正軍級以上的幹部中抽調而來的。1955年12月，我們在學院參加授銜時，戰役系學員全部授予將軍以上軍銜，其中李天佑、楊得志、陳錫聯、韓先楚、劉震被授予上將軍銜，我與吳克華、吳富善、張震、秦基偉、黃新廷、曾思玉、廖漢生等人被授予中將軍銜，丁盛、劉賢權、江燮元等人被授予少將軍銜。

1955年8月，在開學前，我從武漢乘船，順江而下，到達南京，開始軍事學院的學習生活，隨身祇帶了一名炊事員，幫我做做飯。



用地彈箱改成的木箱，及其中保存的部分教材和教學用地圖

戰役系學制為兩年（也有人說，戰役系學制為三年，第一年為預科，部分學員補習文化，但我沒有參加，因為我在高級步校五年期間，文化補習已達到初中畢業水平）。雖然全系都是軍以

但院長劉伯承對我們的學習和管理是相當嚴格的，自

入學開始，劉伯承院長就要求我們要做到“三個轉變”，即從領導轉變為學員，從工作轉變為學習，從家庭生活轉變為集體生活。

對於學院的學習和生活的嚴格管理，我不僅不陌生，而且早已習慣。因為在全軍向蘇軍學習正規化的同時，全軍院校學習的榜樣就是南京軍事學院，我在第一高級步兵學校對校機關和學員隊的管理，也是按照條令，進行相當嚴格的正規化管理。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陸續看了一些當年與我一起在戰役系學習過的老將軍們的回憶錄文章，從方方面面，回憶了當年戰役系學習和生活的情況，比較真實、生動。

但是我們在戰役系學習的兩年中，到底學習到了什麼？到底開設了那些課程？學習的本質東西又是什麼？

從1958年開始的“反軍事教條主義”，一棍子打在劉伯承元帥的頭上，戰役系及南京軍事學院的教學，被無端扣上“軍事教條主義”的帽子，而被全盤否定了，從此很少有人再提起那段時期的教學內容。而當年還曾要求我們全部上交這些教材，以“清掃餘毒”。可是對於這些被我視為精神食糧的課本，真是難以割捨，于是我“違抗軍令”，悄悄的保留下來一部分。

我在這篇回憶中，不再重提學員們如何緊張的學習，學院如何嚴格的生活管理。而是從我親身經歷的，和我至今保存資料的其他方面，說說在南京軍事學院我的學習情況，並從一個側面反映當年的戰役系到底學習了什麼。

我認為，南京軍事學院創辦的戰役系，為我軍實現正規化、現代化和戰鬥化建設，開創了極其重要的先例，為我軍培養和訓練高級指揮人員，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對我而言，真可用“久旱恰逢春雨”來比喻。對我學習之後的十年中，負責全軍訓練工作和海軍的作戰工作幫助極大。

二、教員的授課提綱



保存的教材課本

一個好的學校，除了有校長的正確領導外，教員隊伍的業務素質和教材質量是最關鍵的環節。特別是對我們這些紅小鬼出身的“土包子”的教學，更是要循序漸進與深入淺出相結合，灌輸式與啟發式相結合，書本知識與實戰經驗相結合的

教學方法，這樣，才能使我們對教材讀得懂、理解深、記得住。

這裏我選擇當年兩個科目的學習筆記，從中可以看到，我們上課的部分內容。

《集團軍海岸防禦的戰役原則》（四課時）

第一課時：集團軍轉入海岸防禦的目的及轉入海岸防禦可能的情况、條件

第一項 集團軍轉入海岸防禦的目的

- 一、什麼是集團軍海岸防禦戰役；
- 二、集團軍海岸防禦戰役的目的；
- 三、集團軍如何達到海岸防禦戰役的目的。

第二項 集團軍轉入海岸防禦可能的情况、條件

- 一、預有準備的轉入海岸防禦；
- 二、倉促的轉入海岸防禦；
- 三、對集團軍在任何條件下轉入海岸防禦戰役的要求。

第二課時：集團軍海岸防禦戰役的基本原則

第一項 海岸的地區防禦的影響

第二項 集團軍海岸防禦的基本特點

一、正面寬大；

二、重點設防。

第三項 集團軍組織海岸防禦的基本原則

第三課時：集團軍海岸防禦的戰役準備

第一項 集團軍海岸防禦的決心

一、海岸防禦的戰役企圖；

二、海岸防禦戰役決心內，應確定的事項。

第二項 集團軍海岸防禦的戰鬥編成

一、集團軍海岸防禦的戰鬥編成的根據和需要；

二、集團軍海岸防禦的戰鬥編成內，可能有的兵力和兵器；

——集團軍建制的兵力和兵器；

——加強的兵力和兵器；

——在海岸防禦戰役中可能由集團軍指揮的兵力和兵器；

——支援的航空兵和海軍艦隊的兵力；

三、研究戰鬥編成的意義

第三項 集團軍海岸防禦的戰役布勢

一、集團軍第一梯隊

(任務、兵力、防守港灣的部署、防守半島的部署)；

二、集團軍第二梯隊(任務、部署)；

三、集團軍的炮兵群；

四、集團軍的高射炮兵群；

五、集團軍防坦克地域；

六、集團軍的諸預備隊及快速的障礙物設置隊。

第四項 集團軍海岸防禦的工程保障

一、海岸防禦工程保障所包括的事項；

二、各種地形條件的工事構築。

第四課時：集團軍海岸防禦的實施

第一項 抗擊敵人登陸時的情況特點

方块字读书社区

第二項 反擊準備

- 一、對象與目的；
- 二、時機；
- 三、使用的兵力；
- 四、實施的程序；
- 五、目標的分配；
- 六、持續時間。

第三項 抗擊敵人陸戰隊登陸和空降兵的着陸

- 一、抗擊敵人陸戰隊；
- 二、消滅敵人空降兵。

第四項 反衝擊的實施

- 一、海岸防禦中對反衝擊的要求；
- 二、反衝擊的時機及反衝擊實施的掌握；
- 三、集團軍首長對反衝擊的支援和應下達的指示；
- 四、兵力和兵器的機動；
- 五、航空兵和海軍艦隊兵力的行動指揮。

第五項 集團軍反突擊的實施

- 一、為反突擊的實施創造有利條件；
- 二、反突擊的目的；
- 三、反突擊的時機和對象；
- 四、反突擊的方向；
- 五、反突擊部隊的戰鬥隊形及任務；
- 六、反突擊的火力準備；
- 七、反突擊部隊的展開程式；
- 八、反突擊時航空兵和海軍艦隊兵力的行動；
- 九、反突擊部隊的側翼保障；
- 十、反突擊的戰鬥行動。

教員的授課內容中，相當比例是講解戰例。其中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的蘇德戰例為主。也講剛剛停戰的抗美援朝的

戰例。

《斯大林格勒會戰講授綱目》(三課時)

第一課時：引言

第一節：蘇軍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防禦

(1942年7月17日-11月18日)

第一項：1942年夏軍事政治概況；

第二項：1942年夏雙方作戰計劃

一、德國法西斯統帥部的計劃及對該計劃的批判；

二、蘇軍統帥部的計劃。

第三項：防禦組織

一、斯大林格勒方面軍的防禦組織；

二、第62集團軍的防禦組織；

三、第181師的防禦組織。

第四項：

一、斯大林格勒接近地的防禦戰鬥

(1942年7月17日-9月12日)；

二、斯大林格勒城市的防禦戰鬥

(1942年9月13日-11月18日)。

(1) 城市防禦的組織及蘇軍最高統帥部1942年10月14日對城市防禦的指示；

(2) 強擊群的編成及其戰術。

第五項：斯大林格勒防禦小結和戰役戰術結論

第二課時：蘇軍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反攻

(1942年11月19日-1943年2月2日)

第一項：最高統帥部提高蘇軍戰鬥技能的措施。

第二項：反攻開始時斯大林格勒地域的戰役戰略情況。

第三項：蘇軍最高統帥部的反攻企圖和各方面軍的任務。

第四項：戰役的計劃和準備

方块字读书社区

一、各方面軍司令員的決心；

二、反攻開始時雙方的兵力對比；

三、戰鬥訓練和偵察組織；

四、反攻準備中的黨政工作。

第五項：反攻第一階段的戰鬥行動

一、西南方面軍突擊集群的戰鬥行動；

二、斯大林格勒方面軍突擊集群的戰鬥行動；

三、頓河方面軍的戰鬥行動；

四、反攻第一階段小結。

第六項：反攻第二階段的戰鬥行動

一、雙方企圖；

二、殲滅意大利第8集團軍和多爾麥辛集團軍；

三、殲滅柯吉爾尼克瓦集團軍。

第七項：反攻第三階段的戰鬥行動

一、戰役企圖、計劃和準備；

二、全殲敵人被圍集團軍戰鬥概述；

三、反攻第三階段小結。

第三課時：蘇軍軍事學術在斯大林格勒反攻中的發展

第一項：蘇軍的戰略；

第二項：蘇軍的戰役法；

第三項：蘇軍的戰術與各兵種戰術；

第四項：斯大林格勒會戰的政治軍事意義。

三、學員們的 討論、作業和期末復習

根據教材進度，教員每講完一個單元，就組織學員們進行兩天至三天的討論，通過全班或分組討論，加深對授課的理解。這

方块字读书社区

樣的討論課大約每月兩次。

在我的學習筆記中，這樣記錄着第一學年的兩次《討論課計劃》。

筆記片段之一：

《在使用原子和化學武器條件下，
集團軍進攻的組織與實施》

一、課題討論的目的：聯系戰役法的基本原則，提高和加強對集團軍進攻戰役基本問題的體會和理解。

二、課題討論的時間：獨立準備12小時，課題討論8小時。

三、課題討論的題目：

1. 集團軍進攻戰役的基本原則

——集團軍進攻戰役的性質：（見集團軍進攻戰役的組織與實施第一項，參考戰役法原則第四節）。

——集團軍進攻戰役目的和任務：（見集團軍進攻戰役的組織與實施第二項，參考戰役法原則第五節）。

——集團軍進攻戰役的規模。（見集團軍進攻戰役的組織與實施第三項，參考戰役法原則第四節第二項）。

2. 在集團軍進攻戰役中考慮與定下戰役決心，及戰役計劃的擬定

——任何定下有根據的正確的決心：（見集團軍進攻戰役的組織與實施第12頁倒數第8-3行，參考戰役法原則第29頁第14-18行）。

——主要突擊方向的意義及選擇：（見集團軍進攻戰役的組織與實施第12頁第1-11行，參考戰役法原則第29頁第19-28行）。



方塊字讀書社區

聽課筆記

——原子武器和化學武器的使用原則；（見集團軍進攻戰役的組織與實施第15頁第10-13行，參考戰役法原則第30頁第3-24行）。

——戰役布勢的編成及各部分任務、配置；（見集團軍進攻戰役的組織與實施第一節第五項，參考戰役法原則第30頁第25-28行）。

——計劃戰役的目的與方法；（見集團軍進攻戰役的組織與實施第二節第二項）。

——擬制原子準備、炮火準備、航空火力準備計劃的原則。（見集團軍進攻戰役的組織與實施第二節第三項全部）。

3. 突破敵人的戰術地幅及向戰役縱深發展進攻

——突破敵人戰術地幅；（見集團軍進攻戰役的組織與實施第三節第一項全部）。

——快速集群進入突破口；（見集團軍進攻戰役的組織與實施第20頁12行-21頁11行）。

——集團軍第二梯隊進入交戰；（見集團軍進攻戰役的組織與實施第21頁12行-22頁5行）。

——抗擊敵人反突擊，及擊毀敵人的戰役預備隊；（見集團軍進攻戰役的組織與實施第22頁6行-23頁12行）。

——攻破敵人縱深及強渡江河。（見集團軍進攻戰役的組織與實施第三節第三項全部）。

4. 合圍殲滅敵人的重兵集團及戰役追擊

——合圍殲滅敵人；（見集團軍進攻戰役的組織與實施第三節第四項全部，參考戰役法原則第六節第一項）。

——戰役追擊。（見集團軍進攻戰役的組織與實施第三節第五項全部）

5. 參考資料：

——1948年條令第一章全部，207-298條；

——在使用原子武器條件下戰役實施的特點第22-41條和教令42-107條；

——在使用化學武器條件下戰役實施的教令第39—119條。

筆記片段之二：

《集團軍防禦戰役》

一、課目：集團軍防禦戰役的組織與實施

二、訓練目的：加強對理論的理解，並結合實際經驗，進一步體會在使用原子武器與化學武器條件下組織與實施集團軍防禦戰役的基本原則。

三、實施方法：先由學員準備，之後在教室內，以學習小組為單位進行討論。

四、討論的題目與時間分配

1. 集團軍防禦戰役的目的及轉入防禦的條件（90分鐘）

2. 集團軍防禦地帶的編成和戰役布勢（100分鐘）

——集團軍防禦地帶編成的要求；

——集團軍防禦地帶的編成，各道地帶（斜切陣地）的用途，及其位置的選定；

——集團軍防禦戰役布勢的要求；

——集團軍防禦戰役布勢各部分的組成和使用及配置。

3. 任何計劃與實施反準備（80分鐘）

4. 任何計劃與實施集團軍的反突擊（100分鐘）

5. 參考資料：

——集團軍防禦戰役的組織與實施；

——在使用原子武器條件下戰役實施的特點和教令；

——在使用化學武器條件下戰役實施的教令。

經過學員們反復地、認真地、熱烈地討論之後，下一步，就是完成教員布置的作業了。作業時間一般是下午，但多數時間在課堂上無法全部完成，祇好拿回宿舍，再加夜班了。

我保留至今的是三份《戰術考核想定作業試卷》。在我的記

憶中，這種《作業試卷》相當於學期中的階段作業，或階段性的開卷小考試。

《作業試卷》通常都是教員出一命題，並給出若干條件，例如假設的敵我態勢、敵我兵力與兵種、地形地貌等，學員們按照學習的知識，根據命題的要求和對學習內容的理解，學員本人可自由發揮，並在規定時間內完成。

我的三次《作業試卷》的題目分別是：

1955年9月16日20點完成的《第5軍戰鬥命令 第13號》；

1955年9月26日23點30分完成的《呈第2集團軍司令員 第5軍戰鬥報告》；

1955年12月18日21點完成的《步兵第3軍作戰命令 第5號》。

教員對《作業試卷》（見圖1）很重視，看的很仔細，不僅有總

的評語，而且每一段落都有評語。判分也很嚴格，我的三次《作業試卷》的總評分都是剛剛“及格”。

教員給我12月18日作業的評語是：

總的評判及格

1、主突方向基本正確；

2、戰鬥隊行能保障決心；

3、兵力區分基本正確；

4、任務給予正確；

5、戰鬥命令一般的合格式；

6、工作備標的正確、明顯。

1956年5月，戰役系經過一年的軍事專業學習，進入期末考試前的總復習。5月20日，系下發了復習大綱。（見圖2）

第一學年，我們學習的主要課程基本反映在復習大綱的目錄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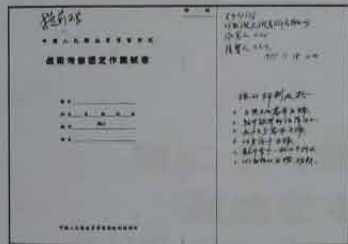


圖1，作業試卷和教員評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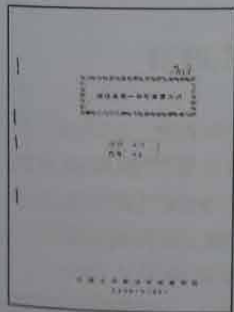


圖2，復習大綱

《戰役系第一學年學程復習大綱》

目 錄

戰術部分：

第一項：概述

1. 現代諸兵種合同作戰原則；

2. 進攻戰鬥原則；

3. 現代防禦原則。

第二項：進攻部分

4. 軍進攻戰鬥；

5. 步兵軍強渡江河進攻；

6. 軍夜間進攻戰鬥的特點；

7. 軍山林地進攻戰鬥的特點。

第三項：防禦部分

8. 軍防禦組織與實施；

9. 步兵軍城市防禦；

10. 步兵軍山林地防禦。

第四項：司令部

11. 軍進攻戰鬥的軍隊指揮；

12. 軍防禦戰鬥的軍隊指揮。

兵種部分：

13. 裝甲坦克機械化兵；

14. 炮兵；

15. 航空兵；

16. 對空防禦；

17. 工程保障；

18. 化學保障；

19. 偵察；

方块字读书社区

20. 通訊聯系；

21. 後勤；

22. 外國軍隊。

通過上面這些教案的介紹，可以看出劉伯承元帥的治學嚴謹和用心良苦，他不愧為我軍現代化教育的開拓者。對於我們這些文化水平參差不齊的學員，祇是“從戰爭中學習戰爭”的部隊高級指揮員，南京軍事學院的學習，可以說是對現代戰爭理論的啓蒙教育，初步對諸兵種合同作戰，陸海空立體進攻與防禦，原子、化學條件下的生存和戰鬥，有了一定的了解，為今後我軍的現代化建設和針對美蔣軍隊的作戰方針，奠定了極為重要的理論基礎和具有現實指導意義。

第二十八章 在軍委訓總 和總參軍訓部五年¹

一、1958年， 在批判“教條主義”中度過

1957年，我在南京軍事學院戰役系學習畢業後，于9月底接到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9月27日發出的命令，任命我為軍委訓練總監部陸軍戰鬥訓練部部長。

我回到武漢，稍作家事安排後，即于10月到北京報到。

中國人民解放軍訓練總監部成立於1955年，該部下設計劃

¹。本章部分時間表和內容，[方块字读书社区](#) 總參軍訓部 1999年11月編《總參謀部軍訓部簡史》

和監察部、陸軍戰鬥訓練部、軍事院校部、軍事科學和條令部、軍外訓練部、軍事出版部、軍事體育訓練局、軍訓物質保障局、戰鬥訓練雜誌社等單位。



1959年，北京復興路29號軍訓部住宅

最初是劉伯承任部長（因他擔任南京軍事學院院長，一直未到任），後由葉劍英任代理部長。

其他部領導為：張宗遜副部長兼軍事院校部部長，蕭克副部長兼陸軍戰鬥訓練部部長，李達副部長兼計劃和監察部部長，彭紹輝副部長兼軍事科學和條令部部長，郭天民副部長兼軍事出版部部長，周士第副部長兼軍外訓練部部長。

中央軍委明確規定訓練總監部是在中央軍委領導下，指導和監察中國人民解放軍戰鬥訓練的統率機關。其職責是組織和計劃全部武裝力量及諸兵種的戰鬥訓練。

1957年11月，軍委主席毛澤東，任命訓練總監部副部長蕭克為該部部長，這樣就免除了劉伯承、葉劍英的部長和代理部長的職務。

1958年1月，我到任不久，就參加了訓練總監部在廣州舉辦的戰術集訓，參加集訓的有軍長、師長、步校校長、訓練部長共五百餘人，參加集訓人員不論職務高低，一律着戰士服裝，按班、排、連編制，每人一枝步槍，完全過戰士生活，作戰士動作，主要是體驗戰士和班排的戰鬥動作配合。集訓時間半個月，對大家鍛煉不小。

1958年2月，中央軍委批准，同意增補我為訓練總監部副部長，並兼任訓練總監部黨委委員。

方块字读书社区

從3月下旬開始至5月中旬，訓練總監部黨委召開四級幹部會議，參加會議二百餘人。會議期間，訓總領導之間就全軍訓練方針等問題發生了重大的意見分歧。當時主要分歧和爭論的焦點是兩條（因為這兩條與我之前在高級步校期間的教育方針和在南京軍事學院的學習內容有相當的關係，所以我特別注意爭論雙方的觀點。也記憶深刻）：一是全面向蘇軍學習問題。蕭克、李達認為，蘇軍是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考驗和鍛煉，有豐富的現代戰爭的實戰經驗，科學技術在武器裝備中的應用水平也是很高的，要使我軍實現現代化、正規化建設，蘇軍的寶貴經驗仍然是我軍學習的重點。這也是中央、中央軍委的精神。而張宗遜認為，學習蘇軍的先進經驗，不能死記硬背，不能生搬硬套，這是教條主義，要保持我軍的傳統。二是在什麼戰爭環境下和作戰條件下訓練部隊的問題。蕭克、李達認為，未來戰爭不同以往的常規武器戰爭，也不同以往我軍主要依靠單一步兵的戰爭。未來戰爭是常規武器與原子彈及各類化學武器共同使用的戰爭，是多兵種聯合作戰的戰爭。為了能取得未來戰爭的主動權，我軍應開展以現代戰爭為背景和條件下的軍事訓練。張宗遜認為，這是脫離我軍實際的教條主義，是唯武器論。總之，以蕭克、李達為首的一派意見，主張我軍的訓練指導思想和方針要以反對經驗主義，反對保守思想為綱，而以張宗遜為首的一派意見，則主張我軍的訓練指導思想和方針要以反對教條主義、反對脫離中國實際為綱。

多數發言人認為，反教條主義的意見，是拒絕軍事訓練中學習蘇軍先進經驗，是最大的保守思想。當時我也是傾向同意蕭克、李達的意見。

可是毛澤東和國防部長彭德懷支持張宗遜的意見（毛澤東的觀點與當時中蘇關係開始惡化的國際背景有關）。據說毛澤東當時也罵“蕭克是個壞人”。這樣蕭克、李達在會上和會後就以“單純軍事觀念和推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錯誤受到了激烈的批判。而張宗遜成了反教條主義的正確代表。

我雖剛到新的工作單位才半年，但也在會議後期做了檢討。

5月下旬至7月下旬，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高級幹部有千餘人，訓練總監部二級部長以上主要幹部參加會議。

會議主要内容有兩個：

第一是毛澤東提出“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排除迷信，解放思想”。彭德懷在開幕發言中講“要嚴肅批判教條主義，要恢復和保持我軍的優良傳統”。這與他在1952年12月24日全軍參謀長、政治部主任聯席會議上說的：“這些事實鐵一般地證明了蘇聯軍事科學的優越性，軍事制度上的完整性和正確性。蘇聯軍隊是世界上第一等的軍隊，還有什麼可以懷疑的呢？”對於學習蘇聯的阻力，彭德懷斥責：“或者趕快趕上來跟大家一起前進，或者就請滾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會議以整風的方式開始批判蕭克、李達，同時也批判劉伯承。對軍事訓練和軍事教育的所謂“教條主義”，進行了相當嚴厲的批判，把當時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中的一些工作、認識、方法上的分歧，上綱為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把學習蘇軍先進經驗的正確思想，說成是“崇洋媚外”，是單純軍事觀念、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把訓練總監部說成是“教條司令部”，把南京軍事學院說成是“教條大本營”。

記得當時，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在會議期間給中央軍委、毛主席寫了一份報告，講了自己對部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一些意見，實際上是對當時軍委工作中的不足提出了批評。這個報告得到了參會各總部、軍兵種和各大軍區不少領導的贊成。而彭德懷和會議領導小組認為這個報告是堅持了蕭（克）、李（達）觀點，嚴厲地批評了他，並責令黃在大會上做檢討。這是會議上影響較大的事情。

這次批判教條主義的會議，不僅是思想意識上的鬥爭，有的同志還受到了組織處理，嚴重傷害了許多分管軍事訓練和軍事院校工作的領導幹部。 方块字读书社区

第二是解決總參謀長粟裕與國防部長彭德懷發生將帥不和

的矛盾。據我所知，在3月訓練總監部黨委召開的四級幹部會議發生了重大意見分歧後，粟裕的觀點是傾向同意蕭克、李達的意見。

會後，粟裕借病休息。不久，黃克誠接任總參謀長。

軍委擴大會議結束後，為貫徹會議精神，訓練總監部黨委召開擴大會議，開了一個多月，對所謂“資產階級軍事路線”進行了批判，揭發黨委書記蕭克及李達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黨宗派活動”。

會議通過了“關於以蕭克同志為首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和反黨宗派活動問題的決議”，並建議撤消蕭克、李達國防部副部長職務。對於所謂參與蕭克反黨宗派活動的十二人，也受到不公平的處理。

總政副主任劉志堅帶領的工作組一直參加會議，對蕭、李的鬥爭態度堅決。

因為我是支持蕭克、李達意見的，所以在會議中祇能聽取別人批評及檢討自己錯誤，沒有資格批判別人。但對那種無限上綱的批判，內心也存有懷疑，祇好一言不發。

我被卷入到這場運動中，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全軍開展反對教條主義的另一重點，是以南京軍事學院為代表的軍事院校，漢口高級步校也不例外。雖然我早已離開步校，但學校在批判教條主義時，仍以我為重點，抓住我曾提出“全面地、不走樣地向蘇聯學習”的口號為批判重點，說我也積極地執行和貫徹了軍事教條主義，並將批判我的材料送到北京，我都看到了。不免思想上有些壓力。

9月，總政批復訓練總監部黨委，同意停止蕭克訓練總監部黨委書記職務，由郭天民代理書記，郭天民、譚希林、孫毅、李作鵬、楊秀山為訓總黨委常委。

1958年12月11日，根據中共中央決定，中央軍委發出通知，撤消訓練總監部，將所屬各部局整編為軍事訓練部、軍校部、軍事出版部，並納入總參謀部。

12月18日，訓練總監部黨委在呈送給中央軍委的關於訓練總監

部整編情況的報告中提到，整編後，軍事訓練部編制為一百四十四人，李作鵬任部長；軍校部編制為七十一人，郭天民任部長；軍事出版部編制為四十八人，孫毅為部長。中央軍委批准了這個報告。

剛剛到訓練總監部工作的第一年，就在批判“資產階級軍事路綫”和“軍事教條主義”中度過，而對我這個到京赴任的“新官”，還沒有來得及“三把火”，就被“老賬”（在高級步校貫徹“教條主義”）、“新賬”（在總監部支持蕭克、李達的觀點）當頭一棒，心裏十分不是滋味。

二、1959年，半年抓訓練， 半年批“彭、黃”

1959年1月，中央軍委批准下發由總參軍訓部擬制的《1959年陸軍訓練的指示》，確定了當年全軍軍事訓練的三大基本任務：一是加強幹部訓練，以學習毛澤東軍事著作為主；二是全軍各軍兵種和各級部隊，要根據實際編寫訓練教材，並明確了編寫訓練教材的指導思想；三是加強部隊訓練，並對各兵種的訓練提出了具體要求。

1月下旬，按照總參謀部指示，軍訓部組織在廈門召開戰備訓練現場會，參加會議的有各總部、各兵種的領導；北京、南京、武漢、廣州、沈陽、福州等軍區；第15、20、24、28、31、40、41、60軍及二十八所院校，共三百餘人。會議內容主要是觀摩第31軍在海門島舉行的加強步兵團在海空軍協助下渡海登陸作戰的實彈戰術演習，會議研究了渡海登陸作戰和全軍的軍事訓練問題。會議結束時，副總參謀長張宗遜作了總結。會議後，全軍的訓練工作按計劃展開。

方块字读书社区

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按照總政的要求，機關幹部重點學習毛主席軍事著作。要求讀《矛盾論》、《實踐論》、《論持久戰》。

“十大軍事原則”，為此軍訓部組織了三期、每期一個多月的幹部集訓。

2月份開始，根據中央軍委關於幹部下連當兵的指示，軍訓部黨委決定，分期分批組織部機關的幹部下連當兵鍛煉。我安排好工作，帶頭于3月份到舟山一個岸炮團的連隊當兵，在一個月的時間中，與戰士同吃、同住、同操練、同娛樂，並幫助連隊附近的農民群眾插秧勞動。四十多歲的人雖然笨手笨腳，行軍訓練後也腰酸背痛，覺得辛苦，但還是堅持下來了。能每日與戰士們摸爬滾打在一起，互相見面都稱我“老李”，心情特別愉快。

下連隊當兵回京不久，軍訓部在杭州召開全軍訓練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各軍區、各兵種負責訓練的領導和訓練部門的領導及擔任戰備訓練的野戰軍主要領導，共一百餘人。會議內容首先觀摩南京軍區組織的穿山半島渡海登陸作戰實彈演習，而後交流了上半年的訓練和編寫教材的情況和經驗，討論了下半年諸兵種進行合練問題。我在會上就上半年全軍的訓練工作和教材編寫工作做了小結，並強調下半年的訓練重點是在單兵種訓練的基礎上，加強諸兵種的聯合作戰訓練和演習。

會上還討論了由總參軍訓部、總政青年部共同擬制的《步兵一專多能標準》。之後，總參、總政聯合頒發了這個《標準》。這

個文件對步兵一專多能的統一標準、考核辦法、獎勵辦法、批准權限等作了具體規定。《標準》對鼓勵士兵努力鑽研軍事技術，熟練掌握多種武器裝備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7月下旬，軍委總直機關黨委批復總



1959年9月，參加社會主義國家友邦軍事體育運動委員會會議

方块字读书社区

參軍訓部，同意由李作鵬、劉少卿、韓復東、吳偉、趙凌汗、張文渲、王月德、李玉波、鞏樹祥九人組成軍訓部黨委，我任書記，劉少卿任副書記。

總的講，1959年上半年，軍訓部的工作開展的比較順利，領導班子也很團結，相互支持。

9月下旬，建國十周年大慶即將來臨。為慶祝建國十周年，社會主義國家友軍體育運動委員會第三屆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參加會議有蘇聯、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中國、朝鮮、蒙古、波蘭、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共十二個國家的軍隊體育代表團。

中國人民解放軍代表團團長由我擔任，并司職會議執行主席。

會議開始由國防部副部長譚政向大會致詞，友軍體委常委會主席蘇軍列文科少將致答詞。會議聽取了常委會的工作報告，交流了開展軍事體育活動的經驗。代表們還出席了全國運動會的開幕式和閉幕式，賀龍和譚政接見了各代表團。會議之前，各代表團由我陪同，在北京、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參觀游覽。

與此同時，根據中共中央和總政指示，軍訓部召開黨委擴大會議，開展以粉碎“彭黃反黨集團”和“反右傾機會主義”的整風運動。

所謂“彭黃反黨集團”的來由是：1959年7月，在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後開中央全會）。彭德懷在會議期間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後稱“意見書”），信中對1958年“大躍進”以來的工農業生產發展指標過高，發展速度過快，發展比例失調，并由此產生的浮誇虛報、“共產風”、小資狂熱性等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和看法。

毛主席對這封信的看法是：是有組織、有計劃、有準備的向黨進攻，目的是動搖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鋒芒直指中央領導。是右傾機會主義向黨的關

方塊字讀書社區

席還說，他與彭的

關係，歷史上就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毛主席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定為“反黨集團”，把黃克誠、周小舟等人定為彭德懷“軍事俱樂部”的主要成員。

廬山會議結束後，軍委立即在北京召開會議，面對面的批判彭、黃。部隊高級幹部千餘人參加會議。我因工作關係，斷斷續續地參加了會議，大致了解了廬山會議發生的情況。

軍訓部的整風運動首先是學習中央有關文件，提高對總路線、大躍進的認識，並揭發批判“彭黃集團的罪行”，以後又聯系本部的具體情況，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重點清肅右傾錯誤思想。半天業務工作，半天開會學習，拖拖拉拉，黨委擴大會前後開了兩三個月才結束。我因參加外事活動和其他工作，沒有全部參加。當時我沒有什麼右傾可言，主要是去年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因此整風的矛頭不是對准我。

部黨委擴大會開完已近年末，按訓練計劃，我立即組織軍訓部和各軍兵種及有關部門參加的七個全軍軍訓考核工作組，對九個軍區三十二個全訓師的軍事訓練進行年終考核，我帶着工作組，跑了一半以上的軍區和三分之一以上的全訓師實地考核，由於全年訓練工作安排早、落實快、抓得緊、訓練效果突出，因此，對這些師的訓練成績總評為良好。

此間，軍委成立“軍委軍事訓練與學術研究小組”，組長是葉劍英，副組長是粟裕、張宗遜、劉志堅。我是十四名小組成員之一。

12月下旬，召開的全軍訓練工作會議，由軍訓部承辦了會議組織工作。會議增加了批判“彭黃反黨集團”和“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內容，會議傳達了國防部長林彪提出的四條訓練方針，同時交流了各軍區全訓部隊的訓練工作經驗，討論了1960年訓練綱要，最後葉劍英元帥在會議上做了總結講話。

三、1960年， 向國防部長的兩封建議信

由于受國內自然災害和蘇聯經濟封鎖的影響，軍費開支也受到一定的控制。這关系到當年全軍全訓師數量、訓練經費和訓練彈藥基數配備的確定。這個問題在全軍訓練工作會議上進行了研究，并將研究方案報軍委和總參。

3月上旬，總參批准下發了軍訓部擬制的《關於全軍訓練工作物質保證工作規定》，《規定》明確海、空軍戰鬥訓練經費和通用彈藥器材，由海、空軍司令部向總參軍訓部提出年度申請計劃，報經總參批准後，由海、空軍司令部具體掌管。陸軍各兵種戰鬥訓練的經費、彈藥、器材等，由總參軍訓部和各級合成軍隊訓練部門統一掌握，按照兵種技術專業分工管理的原則進行管理。

到總監部和軍訓部工作已是第三個年頭了，我對全軍，特別是陸軍的軍事訓練工作的思路方案、經費分配、組織安排、協調檢查、考核總結等已比較熟悉，並對訓練中的不足也十分了解。

為了使全軍在和平時期的訓練更接近實戰的要求，我結合全軍的訓練情況，兩次向國防部長林彪寫信請示，提出全軍訓練方面的建議。

第一次是4月13日，我向國防部長林彪寫信（這是我建國後第一次向林彪直接請示）建議：“每年度每個軍爭取一個師進行全訓合練，三年內使每個師能輪流進行一次師的全訓合練。”

4月23日，林辦電話傳達說“林彪同志同意李作鵬的意見”。

第二次是4月21日。當時林彪對我軍訓練方針提出四條指示：1. 全軍研究毛澤東軍事著作；2. 繼續總結人民解放軍的戰鬥經驗，編出自己的條令；3. 研究原子彈等條件下的作戰與訓練；4. 限于軍以上的幹部選學一門外軍的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軍事理論和批判地選讀克勞塞維茨的軍事著作。

在聽取林彪的四條指示後，我又向國防部長林彪寫信，建議對林彪提出的四條訓練方針稍作修改。

我建議對四條訓練方針的“第四條”稍作改動，即不要“限于軍以上”，改為“主要是軍以上”或“有自學能力的幹部應讀一部分馬恩列斯的軍事理論，軍以上幹部還應批判地選讀克勞塞維茨的軍事著作”，因為有“限于軍以上”幾個字似乎對發揮全軍幹部學習馬恩列斯軍事理論的積極性容易產生誤解。

4月25日，林彪批示：同意李作鵬的意見。

兩次向林彪的書面請示，均得到林彪的重視及肯定，我自然十分高興。

5月初，總參批准下達了由我部擬制的《1960年軍事訓練指示》的文件，《指示》中把林彪提出的四條訓練方針作為1960年的全軍訓練的總方針。其中第四條根據林彪批准我的意見進行了修改，即：有自學能力的幹部應選讀一部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軍事著作，軍以上幹部還應批判地選讀克勞塞維茨的軍事著作。同時《指示》還明確了1960年軍事訓練任務，一是繼續深入地學習毛澤東軍事著作；二是進一步加強各軍區、各軍兵種的戰役戰鬥訓練；三是培養部隊優良的作風；四是積極幫助民兵進行訓練；五是貫徹試行新條令，進一步修改新編制的訓練教材。

為貫徹落實林彪提出的訓練方針，軍訓部立即組織了三個工作組，于7月開始，分別對沈陽軍區16軍、46軍，南京軍區27軍、60軍和廣州軍區42軍、47軍的訓練情況進行了全面檢查。檢查結果，各軍、師落實執行訓練指示的情況比較理想，不論在幹部訓練、部隊基礎訓練，還是在培養“三八”作風¹方面，均取得一定成績。存在問題是幹部工作與學習和部隊生產與訓練的矛盾突出，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同時學習與訓練中的弄虛作假時有發

註1，“三八”作風：指解放軍在長期革命鬥爭中養成的優良作風。毛澤東把它概括為三句話八個字。三句話是：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八個字是：團結，緊張，嚴肅，活潑。

生，訓練成績不够扎實等等。我部將檢查結果的優點與不足和改進訓練的建議及時報告總參，並舉一反三地通報全軍訓練部隊。

在場地建設上，由軍訓部向總參寫報告，利用原坦克學校射擊場，改建成立長辛店射擊場，解決了駐京部隊輕武器射擊集訓、射擊比賽和專業射擊隊訓練困難問題。

當年，有力促進、提高和檢驗部隊軍事訓練成果的重要手段之一是組織全軍各種軍事科目的比武，這種比武既能促進軍事訓練，又能考核訓練成果，還能提高戰士對苦練基本功的興趣。

9月1日，經軍委和總參批准，由我部和總政宣傳部聯合主辦，在北京舉行全軍步兵武器射擊競賽大會，這個射擊競賽大會在那時的影響是很大的，它不僅僅是簡單的比賽，而是對近幾年全軍訓練成果的檢閱，是對一兵多能和新武器裝備使用與保養的檢查。各軍區都十分重視這次射擊競賽，選派最優秀的基層幹部和戰士參賽，使用最新裝備的步兵武器。

參加競賽的有十四個代表團的四百餘名射手。

總參張宗遜副總長、總政甘泗淇副主任及總部有關部門領導參加開幕式。

我代表總參和軍訓部在大會上致開幕詞：這次射擊比賽的目的，是為了檢查部隊射擊訓練的效果，總結交流射擊訓練和射擊技術的經驗，進一步推動全軍步兵武器射擊訓練。我們的射擊訓練貫徹了從實戰需要出發，堅持在復雜條件下訓練部隊的指導思想。開展了轟轟烈烈的“一專多能”和特等射手的群眾運動，出現了持續躍進的局面。林彪元帥再三指示我們，必須進一步加強技術訓練，一定要把部隊技術訓練搞好，特別是射擊訓練。我們應當堅決響應這個號召，並以積極的實際行動貫徹執行。

甘泗淇副主任講話指出：部隊訓練必須重視培養優良作風——“三八”作風。林彪元帥給我們的指示是：業務重要，作風更重要。作風好，仗就打的好；作風不好，仗就打不好。這是歷史經驗。

張宗遜副總長指示：我們一定要狠抓射擊，認真貫徹執行林彪元帥加強射擊訓練的指示。射擊是專，作風是紅。又紅又專，我們就能消滅一切敵人。¹

經過七天的激烈競賽，廣州軍區代表隊獲得團體總分第一名。團體總分前六名依次為廣州軍區、北京軍區、蘭州軍區、濟南軍區、沈陽軍區和南京軍區。

9月10日，競賽大會閉幕。張宗遜副總長在閉幕式上講話指出：這次大會的經驗再次證明了射擊訓練一定要政治掛帥，一定要發揚“三八”作風。在部隊訓練中，如果政治沒掛帥，成績就會不鞏固，不扎實，就會防礙團結，就會在戰鬥中造成不良後果。

我致大會閉幕詞。我在發言中指出：經驗告訴我們，要搞好射擊訓練，第一，必須堅持政治掛帥，思想領先。林彪元帥說政治思想工作是我軍戰鬥力諸因素中的重要因素，這是鐵的真理。第二，一定要按照實戰要求，嚴格訓練部隊。祇有這樣才能經得起復雜戰鬥情況地考驗。第三，今後的射擊訓練，一定要堅決貫徹少而精的原則。第四，必須切實搞好基礎訓練。第五，一定要加強領導，發動群眾，大搞群眾運動。²

林彪對競賽大會的召開很重視，也很滿意，並為大會題詞：“一定要把射擊訓練搞好”。

軍訓部成功地主辦了這次全軍競賽大會，不僅軍委和總參的領導滿意，而且有力地促進了部隊訓練再上一個新臺階，我也為工作取得成果而感到高興。

在這一年中，我部還分批分期的與各軍區、各軍兵種聯合組織以師為單位召開的軍事項目運動會。全年共有一百一十一個師召開了軍體運動會，競賽內容主要是射擊、投彈、刺殺、通過障礙、快速行軍等等，空軍和海軍也根據訓練特點，開展了豐富多樣的比武競賽。既推動了部隊訓練，又活躍了部隊生活，同時發揚了我軍的光榮傳統。全軍的軍事訓練熱火朝天的開展起來。

方块字读书社区

註1.《解放軍報》1960年9月2日

註2.《解放軍報》1960年9月11日

同年，軍委決定籌建解放軍體育學院，總人數編制二千四百人左右，以原廣州軍事體育學校校址為基礎進行擴建，此籌建工作由我部負責並提出擴建計劃，並爭取當年把學院辦起來。經過各方努力，11月底，中國人民解放軍體育學院正式成立。

10月初，總參頒布了軍訓部編制。根據該編制，軍訓部設辦公室、組織計劃處、幹部訓練處、會同戰術訓練處、步兵技術訓練處、軍事體育訓練處、海空軍訓練處、物資計劃處、經驗研究處、軍教影片科、雜誌社及政治協理員，共九個處，及一室、一科、一社，定編一百八十八人。軍訓部領導機關的逐步健全，使我部領導主抓軍事訓練工作更加得心應手。

從10月下旬開始，軍訓部機關學習和貫徹軍委擴大會議《關於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決定》和中央軍委副主席林彪《關於正確處理政治工作領域中四個關係問題》的講話精神，以整風方式對照檢查黨委和部首長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存在的問題。當時我承認，這幾年中，我抓軍事訓練比較多，而對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還認識不夠，重視不夠。

四、1961-1962年， 改革訓練，貫徹“少而精”

1961年1月下旬，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由葉劍英主持的全軍訓練工作會議。與會人員首先學習國防部長林彪《關於我軍訓練條件重大變化的指示》。葉劍英、蕭華、楊成武均在會議上講了話。

會議根據“少而精”的訓練方針，着重討論了全面改革訓練的措施。會後，軍委下發了《軍委訓練會議紀要》。

《紀要》強調1961年要全面改革訓練工作，軍事訓練主要是貫徹“少而精”的方針。方塊字讀書社區 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時間，團以下幹部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時間學習毛澤東著作，

林彪元帥 軍事論文選集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軍訓部編印
1961.4.

戰士訓練以技術為主，戰術訓練重點是搞好連以下基礎訓練。總參還下發了由我部根據軍委訓練會議精神擬制的《安排1961年軍事訓練》的通知。

全軍訓練工作會議之後，我部在北京召開全軍戰術訓練業務會議，參加會議有各軍區、各軍兵種的戰術訓練業務幹部，着重討論如何在戰術訓練中貫徹“少而精”的方針，貫徹毛澤東軍事思想，加強基礎訓練與提高戰術合練質量等問題。

從3月開始，我部先後派出工作組，分別到沈陽軍區67師201團、南京軍區58師172團、蘭州軍區55師163團，解剖“麻雀”，調查研究，重點了解“少而精”訓練方針的落實情況。並將調查情況及我部建議報總參領導。

根據《軍委訓練會議紀要》精神，我部還着手編印了《林彪元帥軍事論文集》，并于4月發至全軍團以上幹部，此書是經部黨委同意並報總參領導批准的，經過我親自審查定稿的。下發此書的目的，就是為了配合部隊更好的學習毛主席的軍事著作。林彪知道此事後，曾對我說：“現在主要宣傳毛澤東軍事思想，不要編印我的東西。”我認為林彪的軍事文章是他將毛澤東軍事思想與作戰實踐相結合的產物，以學習毛澤東軍事著作為主，同時學習林彪的軍事著作，並不矛盾。因此總參批准下達了由軍訓部擬制的《關於學習林彪元帥的軍事著作問題》的通知，明確今後各部隊學習林彪軍事著作，均以此書為準。

7月，中央軍委決定成立軍事訓練和學術研究委員會（簡稱軍委訓研委員會），葉劍英（方塊字讀書社區）部長粟裕，副總參謀長張宗遜任副主任，我任秘書長。軍委訓研委員會的職責是負責統

一管理指導全軍部隊、院校的軍事訓練、軍事學術研究和條令條例的審查驗收等工作。訓研委員會的前身是1959年11月成立的軍委軍事訓練與學術研究小組，當時，葉劍英為組長，粟裕、張宗遜、劉志堅為副組長，我和宋時輪、李聚奎、郭天民、陳伯鈞、周希漢、曹里懷等人為組員。但小組的作用不大，開過一兩次會，沒有進行什麼具體工作。現在是進行改組，並規定了具體的職責。

為加強我軍多兵種協同作戰，我部于8月在北京舉辦兵種知識集訓，主要學習和介紹裝甲兵、炮兵、工程兵、防化兵、鐵道兵等兵種的建設情況、作戰及戰術運用原則、發展方向等。為加強對集訓的領導，成立以張宗遜為首的集訓委員會，我為秘書長，軍訓部副部長曹誠為副秘書長。軍訓部會同各兵種有關部門承辦集訓的組織工作。集訓分兩期，每期時間半個月，第一期為各軍區軍以上領導和軍事院校的領導，第二期為院校的訓練科研幹部。

1961年12月23日，為來年打好訓練工作基礎，總參下發了由軍訓部擬定的《1962年軍事訓練工作指示》，要求部隊以“四好”為綱，切實搞好軍事訓練。戰備值班部隊必須全訓，一般部隊進行半訓，生產和施工部隊訓練不少於兩個月，守島和邊防部隊訓練應根據所擔負的任務，提出不同的要求。要求部隊在隨時保持戰備的前提下，積極參加農副業生產，正確解決訓練與生產的關係。

1962年1月，根據軍委直屬機關黨委《關於開展四好運動的指示》，軍訓部所屬處科室和基層單位，積極開展“四好”運動，要求各單位全年工作爭取做到“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風好，完成任務好，生活管理好”。

我到軍訓部後，組織新編寫的條令條例和訓練教程教材幾經修改已日臻完善。貫徹條令和訓練教材成為當年工作重點。

1962年1月初，中央軍委批准下發由我部參與擬制的《軍委關於頒發和驗收條令、教令、方快字讀書社區規定的規定》，確定上半年驗收合成軍隊戰鬥條令，下半年驗收軍兵種戰鬥條令。凡屬諸軍

兵種會同戰鬥條令和全軍共同條令教程教範，均由軍委訓研委員會驗收，經軍委審批頒發。凡屬軍兵種專業戰鬥條令和專業戰術、技術教範等，專業由軍兵種黨委負責驗收，以軍兵種名義頒發……。

同時，我們仍然堅持把軍事訓練的重點放在基層、落實在士兵的原則。當時，總參、總政頒發由我部和總政青年部制定的《神槍手、神炮手和技術能手基本標準》，以此作為全軍開展“三手”活動的基本依據，同時利用軍報開展廣泛的宣傳和動員。各部隊以爭當“三手”為目標的練兵活動十分火熱。

當年6月，隨著戰備形勢的變化，全軍的訓練也發生重大的變化。根據軍委和總參的緊急指示，我部會同有關部門擬制了《關於當前戰備訓練工作指示》，此指示是針對東南沿海戰備形勢日趨嚴重，臺灣蔣軍不斷叫喊反攻大陸，不斷組織有針對性大規模軍事演習，不斷有敵機敵艦侵犯我領空領海和多股匪特襲擊騷擾我東南沿海地區而發的，《指示》要求凡有戰備任務的部隊，應迅速改變原定年度訓練計劃，立即轉入戰前的戰備訓練，根據預定作戰方案，針對蔣軍的作戰特點，進行戰備訓練。

隨着形勢的發展，總參隨即下發了由軍訓部擬定的《關於戰備訓練的補充指示》，具體要求部隊有針對性訓練應強調的五個方面：1、根據任務不同進行幹部訓練，守備部隊應反復演練防禦動作，機動部隊應以組織機動和進攻戰鬥為重點；2、加強部隊基礎訓練；3、搞好戰備行軍訓練；4、加強部隊行政管理教育；5、注意節約彈藥。

根據新的戰備形勢，我部向中央軍委呈報《關於部隊訓練和執行其他任務情況的報告》。《報告》中說：近年來，執行全訓任務的部隊逐年減少，而執行其他任務的部隊逐年增加。陸軍全訓師1957年為全部陸軍師的72%，逐年下降，至1961年為20%。《報告》建議全軍應安排四十個陸軍戰備值班師，進行全訓。非值班部隊應保證三年中有一年方塊字读书社区 施工部隊要堅持天天練、經常練。中央軍委根據我部的建議，向毛主席及中共中央作

了報告，之後，中共中央批准安排四十個陸軍師為戰備值班師，並從1963年起，進行全訓。

此後，我調離了總參軍訓部到海軍工作。軍訓部由副總長張宗遜兼任，並將軍校部、出版局與軍訓部合併。

我擔任總參軍訓部部長五年的時間，忙忙碌碌，未敢偷閑地做了大量的日常工作。剛到軍訓部不久就“出師不利”，受到反教條主義的打擊，結果不得不小心謹慎，不敢大膽工作，部隊正規化、現代化的訓練也不敢提了。林彪擔任國防部長後，提倡以我為主，政治思想掛帥，全軍學習毛澤東軍事著作。而對於同時學習外國先進軍事經驗，特別是學習蘇軍的先進軍事經驗，我仍顧慮重重。政治與軍事的關係、政治與業務的關係也不是完全理解的，唯一辦法就是緊跟上級，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

第七篇

文革前期之我見

第二十九章 調入海軍

一、參加軍委檢查團

1962年初，在參加中央七千人大會聽取劉少奇、林彪、毛澤東三人講話之後不久，我就帶工作組到東北遼東半島，巡察部隊新年度訓練準備與開始情況。

3月下旬，我正在旅順海軍基地檢查工作時，忽然接到北京的電話，要求我立即返京，準備參加軍委檢查團，檢查海軍東海艦隊工作。

回到北京後，稍事組織準備，3月底即隨楊成武（軍委檢查團團長）、劉志堅（軍委檢查團副團長）等出發。

當時，林彪為什麼同意派軍委檢查團，檢查海軍東海艦隊的工作呢？這是因為海軍東海艦隊在兩、三多的時間內連續發生嚴重的政治事件和訓練事故，其中最嚴重的是兩件：一是發生飛機

方塊字讀書社區

叛逃臺灣的政治事件。1962年3月，海航6師16團飛行員劉承司從寧波路橋機場駕機叛逃臺灣成功，在國內外、軍內外造成極壞的影響。而這次駕機叛逃臺灣事件，又是近兩年多的時間中的第二次。上一次發生在1960年1月，海航2師5團飛行員楊德才也是從寧波路橋機場駕機逃往臺灣，後在臺灣宜蘭墜機。二是1959年12月一艘蘇式418號潛艇在舟山群島附近訓練中，與參加訓練的護衛艦相撞沉沒。艇長以下近四十名艇員，除一人生還外，其他全部犧牲。這是我海軍有史以來最嚴重的訓練事故（當時全軍還沒有在訓練中一次死亡幾十人的現象發生）。林彪看到海軍的此種現象，心裏當然着急。

我在軍訓部工作期間，也多次隨總參領導到部隊檢查訓練工作，但參加檢查嚴重的政治事件和重大的訓練事故的調查還是第一次。在我的記憶中，以軍委名義派出的專門檢查政治事件和訓練事故的檢查團，在全軍也是第一次。

軍委檢查團先到上海，再到舟山，後到寧波。先後檢查了東海艦隊艦艇、航空兵、駐島部隊等二十多個單位，聽取了艦隊、基地、東航等軍、師以上單位領導的情況匯報，實際調查發生事故的原因及處理結果。檢查團還召開了幾十次座談會，有師團幹部



1962年隨軍委檢查團視察海軍東海艦隊

參加的座談會，有專門飛行員參加的座談會，還有基層幹部、戰士參加的座談會。當時發現的大小問題真是不少，除駕機投敵和潛艇沉沒外，還有劉承司事件發生後沒有幾天，路橋機場又發生防化參謀唐彥優槍殺地方幹部，串聯多名復員戰士携械投敵和護衛艦6支隊在舟山盲目射擊等四項重大事件。

我軍飛行員的選拔，從入伍到航校學習再分配到作戰部隊，是經過了層層政治審查、技術考核、身體檢查，選拔條件是非常嚴格的。為什麼會出現駕機投敵事件呢？在檢查中，我們發現重要原因之一是部隊對飛行員的政治教育不強，生活管理鬆懈，少數飛行員長期偷聽敵臺的情況未被發現。當時臺灣無線電臺對我大陸沿海部隊有專門的策反節目，一天要重複播出數次，對我大陸沿海各機場、碼頭到臺灣島各機場、碼頭的距離、航向、時間、航線氣象、識別方式、獎金等都介紹的非常詳細。劉承司、楊德才之所以能從我軍的優秀飛行員蛻變成駕機投敵的蛻化變質分子與長期偷聽敵臺，思想發生變化，革命意志動搖有直接關係。檢查團也發現，偷聽敵臺現象也同樣發生在遠離陸地的島嶼部隊中。

在同樣的條件下，當時空軍部隊在東南沿海各省有十幾個軍用機場，幾百架作戰值班飛機，却没有發生一起駕機投敵的政治事件。而東海艦隊在同一地域，在不長的時間內連續兩次發生駕機投敵事件，檢查團認為，問題雖然出在下面，但各級領導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駕機和携械投敵”這樣嚴重的政治事件不斷發生，恰恰說明在基層部隊，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够，政治思想工作 and 政治思想教育薄弱，從而使資產階級腐朽思想有機可乘，侵襲了少數指戰員們的思想。是沒有把“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真正擺在第一位的後果。

檢查中還發現，各級黨委內部不團結的現象普遍存在。不少基層黨支部起不到應有的作用，有些海島哨所，班無黨員，排無黨小組，政治思想工作實際上已癱瘓了。有的艦艇在戰備值班期間，艦（艇）長帶頭違反紀律請客喝酒，有的單位個別幹部管

理教育不當，連續發生戰士自殺，或報復幹部的他殺現象。還有的基層單位政治思想工作放鬆，軍事訓練稀稀拉拉，紀律鬆懈，甚至少數幹部生活作風糜爛，成為當時被稱之為“爛掉了的單位”。

經過二十多天的工作，檢查團認為所發生的各種嚴重問題并非偶然現象。回到北京，檢查團向中央軍委呈報了《關於海軍工作情況的匯報材料》。《匯報材料》共分三大部分，大意为：

第一部分談到了海軍建設的工作成績。指出，海軍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在海軍黨委的領導下，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一定要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的指示和中央軍委的一系列戰略方針，我人民海軍已經建設成為一支現代化的、能抵禦帝國主義的外來侵略、有戰鬥力的海上武裝力量，結束了我有海無防的歷史。成績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

第二部分談到了存在的問題。主要是政治思想和政治教育工作不突出、不落實、不扎實，領導官僚主義作風嚴重，基層管理工作薄弱。突出表現在：“問題成堆，基層薄弱，關係緊張，風氣不好”。部隊的訓練工作在反教條後也有很大削弱等等。根本的原因是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是“四個第一”沒有擺在第一，犯了方向性的工作錯誤。

第三部分是檢查團提出的加強和改進海軍工作的六條建議。

4月下旬，軍委檢查團對海軍的檢查情況和《匯報材料》由楊成武向林彪及軍委領導匯報，林彪聽完匯報後又指示楊成武親自向海軍司令員蕭勁光匯報。

4月28日，在廣州軍委召開的編制裝備會議上，林彪十分生氣地批評海軍“把四個第一變成了四個第二，沒有把政治工作擺在首要地位”；“放着大路不走走小路，已找到了好藥方子不用，又去亂找藥方子”；“不是緊張地做工作，而是鬆鬆垮垮，是懶婆娘管家，管得稀稀拉拉，亂七八糟”。

這就是後來被稱為林彪對海軍的“指示”。

方块字读书社区

二、由陸軍調到海軍

軍委檢查團完成工作回京後，大約是5月中旬，林彪找我談話：“軍委已決定調你到海軍擔任常務副司令員。原決定調李天佑去，蕭勁光不同意，他指名要求調你去。”當時林彪指示：“根據海軍當前情況，第一位是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第二位才是加強軍事工作。並爭取以政治思想工作為重點，扭轉海軍的被動局面，爭取海軍工作同全軍工作並肩前進。”

當時我請示林彪：“常務副司令員的主要工作是什麼？”

他說：“在司令員的意圖下處理全盤日常工作。如果司令員因病或不在家時，則代替司令員先處理問題，然後再報告。”

幾天後，羅榮桓元帥找我談話，他的談話主要是批評海軍領導幹部不團結，勾心鬥角，先是整羅舜初，把他搞走了，以後又整王宏坤，又想把他趕走。他們沒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蹲在北京很少下部隊，下基層，連續發生那麼多嚴重問題也不着急。指示我到海軍工作後應多到下面去，幫助基層幹部解決問題，把基層工作搞好等等。

之後，總政治部副主任蕭華又找我談話，他說的大意是：蕭勁光已經六十多歲了，身體很不好，腦血管末稍破裂，經常頭昏，你去海軍是幹實際工作的。海軍近年來發生的一系列嚴重問題，主要是領導班子問題，另外是放鬆了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軍委調你和張秀川兩人去海軍，主要是加強海軍的領導班子和加強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

經過幾位軍委、總政領導人的談話，又結合在軍委檢查團中的所見所聞，我深深覺得海軍當前是個問題成堆的單位，是個老大難單位。

林彪決定調我到海軍，雖然，也對是否能把工作做好心中無底。原因有兩點：一是我沒有搞過海軍，不但沒有

海軍工作經驗，連建設海軍、指揮海上作戰的常識也可說是白紙一張，打海南島的渡海作戰與建設現代化的海軍不可同日而語；二是當時我已聽到反映，海軍黨委領導間對軍委檢查團的檢查結果和向軍委報告的《匯報材料》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扭轉海軍的被動局面”困難很大，結果如何，很難預料。雖然我當時感到有很大壓力，但軍委對我寄予很大希望，我深知任務非常艱巨，我決心盡自己最大努力去做好工作。

1962年6月，根據國防部命令，任命我為海軍副司令員，張秀川為海軍政治部主任。

1962年7月初，我到海軍報到上任。當時海軍黨委在海軍大院禮堂召開歡迎大會，由蕭勁光致歡迎詞，內容非常簡單，但頗為熱情。他宣布軍委對我和張秀川任命之後，祇講了三句話：“第一是歡迎，第二是歡迎，第三是熱烈歡迎”。我也講了幾句謙虛客套話，沒有什麼動人言辭。最後由海政歌舞團演出歌舞劇《小刀會》。

歡迎會隔日，蕭勁光設家宴，請我及我的夫人吃飯。在飯前閑談中蕭勁光說：“我非常歡迎你來海軍工作，是我親自向林總建議調你來的。1950年海軍開始建立時，我就向林總建議調你到海軍工作，未獲同意。今年春天在廣州召開編制裝備會議的時候，我再次向林總建議才獲林總的同意。”

我說：“擔子太重，可能挑不起來，會使你失望的。”

蕭說：“在東北解放戰爭時期，我就對你有較深的了解，我相信你能把這個擔子挑起來。”

吃飯時還順便談到海軍工作中的若干問題。蕭勁光對我說：“海軍黨委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認真學習林總的‘三條指示’和落實軍委檢查團提出的加強和改進海軍工作的六條建議。”

我同意蕭的意見，因為這是我初到海軍的工作重點。

到海軍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參加海軍黨委常委“通氣”會議。這次常委會議，有海軍黨委常委，加上我和張秀川兩人。

方塊字讀書社區

首先由蕭勁光傳達了軍委檢查團對海軍工作檢查的意見，然後各委員聯繫實際，對海軍工作和領導發表意見。由過去到現在，由領導到基層，由個人到組織，各抒己見，暢所欲言。會議開了一個多星期，發揚了民主，但對會議引導不夠，沒有集中到幾個主要問題進行充分討論。例如：對海軍目前的工作應如何估計和評價，成績和優點是什麼？缺點和錯誤是什麼？經驗和教訓是什麼？今後海軍工作方針任務是什麼？應採取主要措施是什麼？對這些問題都沒有得到明確的、一致的結論。似乎有點互相通氣交換意見、議而不決的狀態。雖然如此，但對我了解常委情況、海軍情況很有幫助。

不過有一條是大家一致同意、一致擁護的，就是軍委檢查團提出的今後海軍工作應以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為重點，貫徹林彪主持軍委工作以來，提出的一系列建軍方針、政策和任務。

最後常委分工，確定張秀川協助蘇振華、杜義德負責政治思想工作，組織領導對中央軍委關於加強政治思想工作方針任務的貫徹執行。確定我協助蕭勁光工作並主管海防作戰和海防工程建設。

1962年8月底至10月初，根據鄧小平的指示，中央辦公廳和總政派出檢查團，對海軍駐京領導機關的工作進行了一個多月的檢查。主要是檢查領導機關的工作作風、機關體制、幹部住房等問題。最後總政檢查團的結論意見是：機構龐大，管理混亂，政治工作軟弱無力，違紀違法事件嚴重，幹部住房緊張，大院內風氣不好等等，檢查情況上報了軍委。

1962年12月5日，海軍召開師以上黨委書記參加的黨委擴大會議。會議根據軍委檢查團《關於海軍工作情況的匯報材料》，重點檢查了海軍黨委對1960年軍委擴大會議《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和今年4月28日林彪對海軍的“三條指示”的貫徹執行情況。

蕭勁光、蘇振華、方塊字讀書社區、張秀川等常委先後發言。

我的發言，是根據軍委檢查團對東海艦隊種種嚴重政治事件和重大訓練事故等事例說明展開的。我最後說：“林副主席提出‘四個第一’已經兩年多了，別的單位都雷厲風行的貫徹了，並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而海軍的情況表明，在軍委檢查團檢查工作之前還沒有把位置擺對。造成政治思想工作薄弱，結果是問題成堆，基層薄弱，關係緊張，風氣不好。有些工作不但沒有進步，反而在開倒車。”我又說：“1963年海軍的工作，第一位是政治思想工作，這是海軍當前工作的薄弱環節，是搞好海軍工作的關鍵，要用最大努力把它突上去，加強起來。”

會議在討論林彪的“三條指示”時，不少代表提出確實存在林彪批評的“大路不走走小路”“找到了好藥方子不用，又去亂找藥方子”的偏向。如軍委提出“四好為綱”，海軍則提出“以四好為綱，以軍訓為重點”，又如軍委提出“立足于準備大打，同時照顧小打”的作戰方針，海軍則提出：“首先抓好應付當前鬥爭，準備小打，應付大打”。1960年林彪提出“四個第一”，軍委擴大會議作出了“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的兩年多的時間裏，海軍一直在強調“人與技術的矛盾是海軍建設最基本的矛盾”。

有些代表還提出海軍黨委內部長期不團結的問題，認為海軍的班子不算弱，由於不團結，力量相互抵消了。

會議期間，軍委在京常委賀帥、羅帥多次與海軍主要領導同志談話。羅總長在軍委辦公會議上，專門召集海軍常委們座談，指出海軍問題的嚴重性，提出海軍建設的方針。

1963年1月15日，羅瑞卿總長到會並做了重要講話。羅總長在講話中肯定了軍委檢查團向軍委的《匯報材料》，嚴肅批評了海軍不突出政治，不突出“四個第一”、官僚主義作風嚴重、領導不團結等錯誤，並指出這是海軍連續發生政治事件和訓練事故的根源。他指出：“海軍當前的主要問題是正確認識錯誤的問題，是端正海軍今後工作方向”坊間字讀書社區還說：“當前建設一支精幹的、有戰鬥力的海軍是海軍建設的方針。”羅瑞卿總長的講

話，對落實“四個第一”，端正海軍工作方向非常重要。

羅總長在海軍黨委擴大會議期間的海軍黨委常委會上曾說：

“鑒于蕭勁光同志身體不好，不能堅持日常工作，海軍主要工作的安排應為：李作鵬和張秀川擋在第一綫，蘇振華、王宏坤擋在第二綫，蕭勁光擋第三綫，有了三道防綫，海軍的工作就能搞好。”

1月17日，黨委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堅決貫徹執行林彪同志的三條指示，加強海軍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

這次海軍黨委擴大會議前後開了四十餘天，一百多人參加會議。在會議上，各級黨委領導認清了海軍的形勢，總結了經驗教訓，統一了思想，端正了下一步海軍的工作方向，對扭轉海軍當時的被動局面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與會同志反映，這是海軍建立以來，開得最好的一次會議。

會議結束後不久，軍委起草了給中共中央、毛主席的《軍委關於海軍問題向中央的報告》。《報告》指出：“十多年來，海軍在中央、軍委的領導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已建成一支初具規模的海上戰鬥力量。總的看來，海軍工作的成績還是主要的。”“可是，海軍在進行肅清彭、黃影響的同時，却没有正視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尤其是單純軍事觀點的錯誤，所以工作轉變不快，進步不大，海軍政治思想工作上的薄弱情況，已經嚴重地妨礙了海軍戰鬥力的鞏固和提高，影響了海軍的建設。”“軍委、首先是林彪同志，對海軍存在的問題早有察覺，在1960年，林彪同志就曾懇切地指出過，海軍問題不是人和技術的矛盾，根本問題是政治思想工作問題。”

《報告》中說：“根據林彪同志的意見，軍委于1962年3月下旬派出了由楊成武、劉志堅同志率領的軍委檢查團，到發生問題較多的東海艦隊，進行了一個多月的檢查。經過檢查，發現海軍政治思想工作極為薄弱，軍委關於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許多重要指示，在海軍沒有落實。方塊字讀書社區”再一次肯定了軍委檢查團的《匯報材料》。

《報告》指出：“海軍問題最本質的是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不高，四個第一沒有真正擺在第一，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某些單位則極為薄弱。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部隊問題成堆，政治事故嚴重，駕機投敵事件接連發生。（二）基層工作異常薄弱。（三）關係緊張。（四）風氣不好。”

報告中點名批評了海軍的主要領導：“蕭勁光同志作為黨委第一書記，官僚主義和家長作風都相當厲害。第二書記蘇振華同志，堅持原則不夠，沒有把主要精力去抓政治思想工作，沒有在思想政治領導上起到應有作用”。看的出，對海軍蕭、蘇的批評是有側重地。

《報告》最後指出：“海軍問題的性質，總的看來，還是工作方向上的問題，思想認識和工作作風上的問題，是執行工作中的問題。”

5月初，毛主席在軍委的報告上批示：“關於海軍的報告已經看過，認為很好，照此執行，每年檢查一次執行情況。希望海軍各級黨委同志們團結起來，以大局為重，煥發精神，努力工作，發揚成績，糾正缺點錯誤，同其他軍種一樣，把海軍工作做好。有錯誤並不要緊，祇要改正就好了。”

1963年，在各級黨委的共同努力下，海軍的工作有了可喜的變化。6月，東海艦隊派出的海上編隊，順利完成了調查“躍進”號遠洋貨輪沉沒原因的任務，得到周總理的表揚。10月，海軍黨委召開二屆三次全會，會議肯定了八個月來，各項工作有了新的起色，部隊工作有了新的氣象，工作方向得到端正。

當時軍委領導對海軍的可喜變化給予了充分肯定。賀龍元帥、羅瑞卿總長多次在軍委辦公會等不同場合表揚海軍的工作“有很大的起色”，部隊的精神面貌“有很大的變化”，“貫徹落實‘四個第一’後，各方面工作也搞上去了”等等。我到醫院去看望羅榮桓元帥，他拉着我的手說：“海軍工作有起色，上上下下都高興，要多到基層去，把政治工作落實好。”葉帥也多次當面表揚我：“到海軍後工作有成績，海軍有了不小的變化，扭轉了被動

局面，要繼續把海軍的工作做好。”有一次，我到葉帥家匯報工作後，葉帥笑着拿出兩隻山鷄對我說：“這是我打獵打的山鷄，你拿去吃吧，犒勞犒勞你。”我當面道謝。我知道，海軍的變化，使老帥們都非常高興。

從1962年4月到1963年底，這是海軍發展的十分重要的歷史階段。在這一時期發生了一系列對海軍有重要影響的事情：這其中有軍委檢查團、總政檢查團對海軍工作的檢查并給軍委的報告；有海軍黨委擴大會議和海軍黨委二屆三次全會；有軍委向黨中央、毛主席關於海軍情況的報告；有林彪關於海軍問題的“三條指示”，也有毛主席對海軍的重要批示和羅瑞卿總長對海軍工作的指示。所有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端正海軍的工作方向，扭轉海軍的被動局面，“同其他軍種一樣，把海軍工作做好。”

當時，海軍各級黨委和部隊精神面貌的可喜變化，也為日後在海空對美蔣作戰中，取得連戰連捷的巨大勝利打下了思想基礎。

“文革”結束後，我看了一些了解當時情況的海軍黨委常委老同志的回憶錄，對這段海軍的重要歷史，不是輕描淡寫，就是不顧歷史真相地說“在林彪的指使下，李作鵬被派到海軍奪權”。這是實事求是嗎？是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嗎？還是讓史學家和讀者評說去吧！

三、海空戰大捷，全殲入侵之敵

1962年6月下旬，新華社發布消息，指出蔣匪幫在美帝國主義唆使和支持下，從年初起，就瘋狂策劃竄犯大陸，并指出全國人民必須做好準備，徹底消滅來犯的敵人。這一情況，我在總參軍訓部工作時已了解的比較詳盡，并布置全軍開展戰備訓練。

臺灣蔣幫錯誤地估計形勢，認為大陸經過三年天災人禍之後，人心浮動，政權動搖，中蘇關係惡化，是反攻大陸的好機會，因此公開大喊大叫要“反攻大陸”。

方块字读书社区

當時我們分析，蔣幫力量有限，美國也還不敢直接參加作戰，因此敵人祇能是以政治攻勢為主，虛張聲勢。但軍事上可能有三種竄擾形式相配合：第一是小股匪特竄擾；第二是一個團以上兵力的竄擾；第三是一個師以上兵力的竄擾。

爲了粉碎敵人竄擾企圖，我們做好了各種情況下的作戰準備，決心來多少殲滅多少，小股來殲滅小股，大股來殲滅大股，來的愈多愈好，送貨上門，求之不得。

海軍部隊是首當其衝的戰鬥在第一線，也正是提高我指揮海軍作戰的良好機會。實戰鍛煉比和平時期練兵要優越十倍，因此加強海軍戰備工作也是我到海軍首先碰到的一個邊幹邊學的問題。

我對海軍作戰毫無經驗，日本投降後，組織山東部隊渡海去東北，算是我對船和海的初次接觸。解放海南島戰役是我第一次組織海上作戰，但是，用帆船打敵人軍艦，有一定的特殊性。而我在南京軍事學院學的東西，僅停留在書本上，沒有經過實踐考驗。

我要求作戰部門提供了不少相關的參考書，例如《蔣幫海軍手冊》，《敵情參考圖冊》等，仔細閱讀。一方面抓緊時間學習海軍作戰指揮的專業知識，另一方面也熟悉並研究敵情。

當時，我把主要精力放在部隊作戰準備與訓練和戰備工程建設兩大方面。

首先我領導作戰部門研究制定了配合陸、空軍粉碎敵人大、中、小竄擾的各種作戰方案。然後我多次到海防前線實地視察，調整兵力部署，加強實戰訓練與演習，趕修戰備工程，補充戰備物資，進行戰備動員等工作。

作戰方案確定後，重要的是加強有針對性的實戰訓練與演習。

爲了加強東南沿海的海空防務，打擊蔣敵空中騷擾和偵察，同時又根據敵空軍的裝備不斷更新，不斷變化的特點，我海軍航空兵對殲擊機2師、4師和6師在山東流亭機場、浙江路橋機

場和寧波機場的部署進行了重新調整。針對敵機窺犯的戰術特點，從難從嚴地組織了各種技戰術科目的演練。

水面艦艇的戰備訓練主要是各種艦艇的進攻編隊訓練及艦炮對海對空射擊、魚雷攻擊、反潛攻擊、掃雷布雷等戰術技術訓練。

爲防止蔣海軍在臺灣島附近海域和臺灣海峽對我海岸、島嶼及商船、漁船的襲擾，並爲我護航艦艇獲取相關的海洋資料，1964年10月13日，總參謀部批復同意129潛艇到公海訓練。全文如下：“海軍司令部：1964年9月29日司潛字26號報告悉。同意129潛艇按第一方案進行公海訓練。望細心組織，周密準備，確保安全”。

這次北海艦隊129號潛艇的公海訓練，針對蔣海軍的實戰意義十分重大：

其一，是我海軍潛艇部隊首次離開我領海範圍，遠航公海訓練；

其二，當時裝備的國產“03”型潛艇，續航設計時間爲三十晝夜，而129號潛艇海上持續活動了四十二天，對戰時使用要不要作超三十晝夜準備，平時要不要按三十晝夜或更長一些時間的訓練做了肯定的答復；

其三，對艇上人員、機械、通訊、物資消耗等各方面進行了全面的檢驗；

其四，對我預定陣地海域內，航道上往來的船隻，特別是軍用船隻進行了潛望照相。查明了臺灣海峽及周邊海域國際航道的寬度、深度等水文資料。

該艇的公海訓練，不僅爲我海軍各艦隊的艦艇編隊，在之後的公海訓練和護航、護漁的任務執行，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而且收集了大量水文、氣象、航道寬度、深度、島嶼地貌、海水溫度等海洋資料，填補了我軍用海圖上的許多空白。

1965年1月18日，在129號潛艇公海訓練總結報告上，我的批示是：海軍黨委、首長對潛艇部隊一九六四年的訓練是滿意的。

方塊字讀書社區

經過海軍上下齊心協力及各方面的配合協同，到1964年底，在廣東、福建、浙江、山東沿海，共消滅蔣軍竄擾的武裝匪特二十餘股，擊沉擊傷一批特務運輸船和登陸小艇。

1964年6月11日夜間，在山東萊陽地區，海軍航空兵4師飛行員陳根發駕駛米格-15殲擊機，在轟-5石振山機組的配合下，擊落入侵蔣匪P2V-7型偵察機一架。這一仗，參戰部隊克服我機夜航裝備和低空性能明顯落後敵機的劣勢，群策群力，充分發揮“人的因素第一”，不畏困難，發揚我地面雷達引導優勢，采用轟炸機在敵機上方空投照明彈，殲擊機低空目視攻擊的全新戰法，取得勝利。同年12月18日，航4師10團副團長王鴻喜駕駛殲-6飛機，在浙江溫嶺地區上空擊落美制蔣軍RF-101型偵察機一架，並俘獲飛行員謝翔鶴。此時，王鴻喜剛剛改裝殲-6飛了幾個起落，而對方是獲得蔣軍四枚勳章的王牌少校。參戰部隊受到周總理的親切接見。

1964年下半年，美國侵略越南北方不斷升級，戰火日益擴大。美艦和美機不斷侵犯我領海、領空，我南海的安全遭到威脅。

根據軍委指示，我海軍作戰部隊不但要防止蔣匪軍在東南沿海的襲擾，也要抗擊美艦和美機對我南海領海領空的侵犯。

1965年初，海航第4師進駐海南島海口機場，並立即進入一級備戰。

3月24日下午，美無人駕駛高空電子偵察機一架，竄入我海南島萬寧上空，我海軍航空兵第4師10團中隊長王相一單機起飛攔截，連續開炮，命中美機左翼，美機隨後墜海。這是我海軍航空兵部隊第一次擊落美機。

3月31日下午，美無人駕駛高空電子偵察機一架，竄入我海南島陵水、保亭地區上空，我海軍航空兵第4師10團副大隊長舒積成駕駛殲-6飛機，在地面的正確引導下，一次躍升抵近敵機，僅用二十發炮彈一舉擊落敵機。戰後，國防部發布命令，授予舒積成同志戰鬥英雄稱號。

方块字读书社区

1965年4月9日，航8師24團谷德合中隊駕駛殲-5飛機，在海南

島白沙地區上空，攔截美軍四架當時性能最好的F-4B“鬼怪”式飛機。這是我海軍航空兵部隊在國土上空第一次與美軍飛行員交手。交戰中，我機機動靈活，敢打敢拼，迫使敵機發射“麻雀”型導彈，擊落自己飛機一架，我機全部安全返航。此次戰鬥充分說明，決定戰鬥勝負的關鍵，是人而不是武器。

8月21日，舒積成再次擊落美無人駕駛電子偵察機一架。

不到半年時間，連續打下三架美軍裝備先進的無人駕駛電子偵察機，沉重打擊了美軍囂張的氣焰。而我航空兵打得勇敢，打得果斷，打得堅決，打得非常漂亮。

1965年5月24日，國防部授予我南海艦隊護衛艇41大隊3中隊先鋒1號艇為“海上先鋒艇”光榮稱號。

8月6日，我南海艦隊護衛艇41大隊及快艇11支隊，在兄弟嶼海區進行了一場激烈的海戰，經過近四小時激戰，一舉擊沉蔣匪“劍門”、“章江”兩艦。這一仗，是一場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以小艇打大艦，以弱勝強的戰鬥，是一場英勇頑強的海上近戰夜戰，更是一場漂亮的海上殲滅戰，是海軍在近幾年來海上作戰取得的最大的一次勝利。

戰鬥結束後，海軍發布命令，授予護衛艇41大隊611艇“海上英雄艇”稱號，授予快艇11支隊1中隊119艇“英雄快艇”稱號。

在這場海上戰鬥中，護衛艇41大隊611艇機電兵麥賢得，在頭

部負重傷的情況下，堅守戰鬥崗位三個多小時，體現了我海軍戰士的大無畏硬骨頭精神。戰後，國防部發布命令，授予麥賢得戰鬥英雄稱號。

在戰後的記功評獎中，由於金剛山觀通站掌握敵情準確，



方塊字讀書社區

視察參加“八六”海戰的護衛艇41大隊

報告敵情及時，海軍發布命令，給予該站雷達分隊記集體一等功。

8月17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八·六”海戰有功人員。毛主席稱這次海戰“打得好！”

我代表海軍向黨中央、中央軍委匯報的《“八·六”海戰的基本經驗》（見附錄），受到毛主席的好評。毛主席不僅仔細地審閱，還在很多地方劃了着重綫，有的地方劃了雙道。

9月20日，美F—104C型戰鬥機一架，侵入我海南島西部地區上空。我海軍航空兵第4師10團大隊長高翔及黃鳳生當即起飛戰機迎戰，一舉擊落敵機，並生俘美上尉飛行員史密斯。此戰中，高翔發揚我軍敢于近戰，敢于空中“拚刺刀”的精神，抵近敵機到二百九十一米開火，直打到距敵機三十九米才脫離，打得美機凌空爆炸，敵機碎片將我機擊傷，可見兩機的距離之近。史密斯被俘後說：“這麼近的距離開炮，我看也不敢看，想也不敢想”。擊落敵機後，高翔又駕駛受傷的飛機安全返航。

這次勝利，粉碎了美軍吹噓的“海上空中優勢”。戰後，周總理、羅總長接見了參戰有功人員。

海航第4師進駐海南島不到一年的時間，共擊落美機四架、擊傷一架，是一支政治思想、戰鬥作風、軍事技術都過硬的部隊。10月，海軍黨委決定樹立該師為海軍標兵單位，號召海軍各部隊向航4師學習。12月，國防部授予該師10團“海空雄鷹團”稱號。

11月14日，我海軍福建基地護衛艇第29大隊、31大隊的高速護衛艇六艘和快艇6支隊第31大隊的魚雷艇六艘，于福建崇武以東海面，一舉擊沉蔣匪“永昌號”護航炮艦和擊傷“永泰號”大型獵潛艦，取得海上作戰的又一重大勝利。周總理、羅總長接見了張逸民等參戰有功人員。不久，國防部授予護衛艇29大隊588艇“海上猛虎艇”光榮稱號。

方块字读书社区

1965年是海空對敵作戰捷報頻傳的一年。全年兩次海戰，四次空戰全殲入侵之敵，打了六場漂亮仗。是我海軍艦艇部隊、航

空兵部隊成立以來，對敵作戰取得最輝煌勝利的一年。這不僅是參戰部隊的光榮，也是全海軍的驕傲。黨、政、軍、民皆大歡喜。我作為海軍主管作戰的副司令員，當然更加高興。

但在實戰中，並不是毫無失誤的。無論海戰、空戰，失誤和錯過戰機的情況是有的。例如有一次，敵人兩艘中型艦竄到沙埕外海，我幾艘護衛艇勇敢迎戰，一頓猛打，當即擊傷一艘，另一艘見勢不妙，掉頭逃竄。被擊傷那艘敵艦已失去機動能力，漂泊頑抗，我護衛艇因火炮口徑小，無法將其擊沉。當時東海艦隊有一艘大型護衛艦在附近，這條艦裝備有大口徑火炮，如果及時加入戰鬥補上幾炮，就可以將敵艦擊沉。但沒有這樣行動，結果敵艦經過一段時間搶修，仍然逃走了。至于與入侵敵機的空戰，更是幾分鐘、幾秒鐘就決定勝負的。我機未能及時起飛，或在空中待機位置不當，都易喪失擊落敵機的戰機。但打一仗，總結吸收一次經驗教訓，就可以不斷提高部隊作戰能力，越打越聰明，越打辦法越多。

四、“三頭”司令

我到海軍後的另一項主要工作是戰備工程建設。

海防戰備工程的修建是一個復雜的工程，它的內容包括軍港碼頭建設工程，各種艦艇停泊補給工程，飛機一線二線機場建設工程，空防、海防、陸防相結合的海岸防禦工程，對海對空雷達工程、通訊網工程，艦艇、飛機維修工程，師以上部隊陸上指揮所工程，後勤油料、彈藥、物資器材倉庫工程，部隊營房建設工程等等。

建設這些工程，涉及海防前綫戰略和戰術相結合的指導思想，既要能够應付當前對敵鬥爭的需要，又要能够應付今後帝國主義可能發動的侵略戰，[方块字读书社区](#)散，以防原子彈襲擊，又要加強機動能力，以保證部隊適時集中；既要以基地建設為主，

又要建設地下洞庫和深水泊位；既要全面規劃，又要分先後、有步驟地進行；既要加強主要方向的工程，又不能忽視次要方向的工程；既要有足夠的數量，更要有堅固實用的質量；既要研究現實情況的需要，又要考慮財力、物力、人力的可能。我



踏勘地形

將全部精力和心血都投入到提高部隊戰鬥力、建設現代化海防工程之中。

爲此，我每年中都用相當的時間在沿海各地反復勘察定點，確定規模和要求。在施工現場反復檢查工程進度和質量，反復調整財力、物力和人力。到海軍的前三年中，我曾兩次帶領有關人員翻山越嶺，乘風破浪，北從鴨綠江口，南到中越邊界的防城，沿海岸綫和長山列島、舟山群島、海南島等大島嶼進行全面的戰備工程視察，每次行程上萬里。每年中有一半以上的時間在基層、在海島、在深山、在工地。幾年來，碼頭、機場、岸炮陣地、雷達通訊、洞庫等重點海防工程建設有了很大的變化和可喜的成果。

當時，陸續開工建設了一批陸上指揮所、長波臺、觀通站和導航站等工程，其中，長波臺建設的深遠意義尤爲突出。

長波臺是使用長波波段發射信號的臺站，是岸上指揮所對潛艇和遠航艦艇編隊實施指揮的重要通訊設施。

五十年代，我國政府曾與前蘇聯政府達成援助建設意向，但赫魯曉夫却利用此事提出搞“聯合艦隊”和“共同使用長波臺”的無理要求，遭到我國政府的強烈反對。爲此，蘇聯放棄了對我的援助。六十年代初，中坊缺字读书社区和建設長波臺。這不僅是我海軍潛艇和遠航艦艇編隊能否走向太平洋的問題，也是一



視察工地

個涉及到政治上獨立與國家自強的問題。當時長波臺的建設時期，正是國家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工程建設困難重重，不僅有種種技術難題，而且施工部隊的物質生活也十分艱苦。

我多次到施工工地視察，檢查工程進度和質量，協調解決問題。經過幾年的艱苦奮鬥，终于在1965年8月建成我海軍第一座大功率長波臺。

當時就有人稱我是“不突出政治”的日頭、人頭、石頭的“三頭”副司令。什麼是日頭呢？就是規定施工部隊每年施工時間不應少于二百四十天。什麼是人頭呢？就是規定施工部隊必須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員參加施工。什麼是石頭呢？就是對施工部隊的工程進度按定額石方標準檢查。工程進度快，工程質量好的施工部隊，我就現場表揚，反之我就批評。

這算不算不突出政治呢？當時流行一種不正確的觀點，即爲了“突出政治”而“突出政治”，把突出政治與軍事訓練，戰備工程相對立、相割裂。不了解“突出政治”的真正意義，既是爲了促進部隊思想革命化，爲了更好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又是爲了促進部隊戰鬥化，有力地推動部隊軍事訓練和國防建設等各項工作的健康的、全面的發展，保證部隊招之能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全殲入侵之敵的目的。

第三十章 山雨欲來

一、“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毛澤東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毛澤東親自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并非毫無徵兆地突然發動起來，而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先進行輿論動員、思想醞釀，及連續不斷地“批這鬥那”的局部前哨戰鬥。浪潮迭起長達數年之久。

文化大革命的準備階段，大體上應從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和“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開始，逐漸發展到全國範圍，最終演變成史無前例的大動亂、大破壞、大倒退、大悲劇。

1962年年初，毛主席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七千人大會）發表了重要講話，論述了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階級鬥爭。強調指出：“已經被推翻的階級還企圖復辟，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着階級、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我們的專政工具不能削弱，還應當加強。”又指出：“有些人挂着共產黨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階級而是代表資產階級。”

當時毛主席的講話是有背景的。在國際上，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路線，蘇中兩黨在國際方塊字讀書社區有了重大分歧，毛主席說蘇共執行了修正主義的路線，在國內，特別是在七千人大會上，

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提出對“三面紅旗”要“總結經驗教訓”，認為三年自然災害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不同意見。毛已感到來自內外兩方面的壓力。

1962年8月，毛主席在北戴河主持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在這次會議中，毛主席提出了三個問題：一，社會主義國家存不存在階級；二，國際國內形勢問題；三，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並且指出“社會主義國家內階級的存在是長期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也是長期的，不是幾十年而是幾百年。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剝削階級所有制，不等於政治上、思想上的鬥爭沒有了。”

接着，在9月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主席指出：“社會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社會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他號召全黨：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否則“我們這個國家還有可能走向反面，所以階級鬥爭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從現在起，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

已多年不曾強調的階級鬥爭問題從此重新強調，並且調子越來越高，調子越來越尖銳，成為醫治百病的“靈丹妙藥”。

1964年，開始了全國範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及農村“四清運動”¹。毛主席指出：“這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但包括階級鬥爭問題，而且包括幹部參加勞動的問題。這場鬥爭是重新教育人的鬥爭，是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向着正在對我們猖狂進攻的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作尖銳的針鋒相對的鬥爭。”

又說：“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後的”，

“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當社教運動中揭露所謂的“階級敵人破壞活動”時，毛主席又興奮地說：“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方块字读书社区

註1. 四清運動：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3年到1966年3月先後在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工礦企業和學校等單位開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的運動。

1964年，毛主席多次指示：“官僚主義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是鬥爭的對象，是革命對象。”又說：“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誰戰勝誰的鬥爭，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

1964年夏天，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中國如果出了修正主義的中央，各省要頂住。”又說：“如果出了赫魯曉夫怎麼辦？要縣委頂住修正主義的中央。”

在全黨進行了一年多“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輿論準備後，毛澤東將“鬥爭”目標指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1965年12月，毛澤東在杭州又有所指地說：“在北京，我的話沒人聽了，所以才去上海組織寫批《海瑞罷官》的文章。《海瑞罷官》這出戲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我們1959年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又說：“中宣部扣壓左派文章，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又說：“北京市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北京市委要解散。”

1966年8月召開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中說：“聯想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毛澤東將“鬥爭”矛頭直指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二、糾正“軍事衝擊政治”， 海軍黨委意見分歧

1962年下半年至1963年，海軍工作根據毛澤東、林彪的指示，根據中央軍委提出的方針，經過海軍全體指戰員的努力，各項工作發展比較順利，成績顯著。“四個第一”、“三八作

方块字读书社区

風”、爭創“四好連隊”和“五好戰士”運動¹深入軍心。海軍黨委團結也是好的，全海軍正氣上升，邪氣下降，學毛著、學雷鋒形成熱潮，好人好事不斷涌現出來，整個海軍的工作面貌和精神面貌有了新的起色。

1964年1月18日至30日，海軍召開了第三次黨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海軍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決議中指出，1963年1月海軍黨委擴大會議決議體現了軍委擴大會議決議和林彪同志“三條指示”的精神，經過一年來的實踐證明，海軍黨委擴大會議決議是正確的，今後應繼續貫徹執行。

在海軍黨委三屆一次全會上，選舉了海軍黨委常委委員、書記、副書記等。之後經中央批准，蕭勁光、蘇振華、王宏坤、李作鵬、杜義德、劉道生、趙啓民、周希漢、張秀川、張學思十人爲常委委員。蕭勁光爲第一書記，蘇振華爲第二書記，王宏坤、李作鵬、杜義德、劉道生爲副書記。

讓人意想不到的，1964年開始的全軍大比武，成爲黨內、軍內矛盾爆發的導火索。

全軍大比武，是1964年1月下旬由羅瑞卿總參謀長在南京主持召開推廣郭興福教學方法²現場會議提出引起。當時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均有負責幹部出席，海軍是我和劉道生兩人參加。

這次現場會議由南京軍區事先準備了戰術、技術項目進行表

注1. “四好連隊、五好戰士”運動：1960年10月，軍委擴大會議決議要求部隊開展“五好戰士”運動，“五好戰士”標準爲：政治思想好，軍事技術好，三八作風好，完成任務好，鍛煉身體好。12月30日，中央軍委辦公廳又傳達了林彪對1961年部隊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個連隊爭做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風好，軍事訓練好，生活管理好的“四好連隊”。從此，一個創造“四好連隊、五好戰士”的活動作爲基層建設的內容在全軍開展起來。“九一三事件”后這一運動即告終止。

注2. 郭興福：南京軍區某部連長。他在步兵單兵和小分隊戰術訓練中，研究摸索出一套教練員戰術教學訓練時做到“四會”（會講、會做、會教、會做思想工作），并接“思想紅，作風硬，技術精”。方塊字讀書社區 這套訓練方法受到總參和軍委領導的重視和贊揚，被譽爲“郭興福教學法”。

演，並且表演得比較熟練精彩，大家看了都認為好。羅瑞卿總結講話時，要求全軍迅速推廣，“掀起軍事訓練高潮”。回到北京後，我和劉道生整理了匯報提綱，并向海軍常委們做了匯報。

我當時認為學習和推廣郭興福教學法是正確的。2月初，海軍黨委下發指示，號召海軍各部隊行動起來，掀起學習郭興福教學方法的熱潮。

從此，海軍各單位就開始掀起以學習郭興福教學方法的“軍訓高潮”，並從下而上的搞起“比武運動”。6月在舟山，海軍召開了學習和推廣郭興福教學法現場會，“尖子”單位進行了表演，賀龍、葉劍英元帥和羅瑞卿總長到會觀看，海軍有蘇振華和我到會。12月在青島，海軍舉行了更大規模的比武大會，蕭勁光、劉道生到會。這樣一來，全軍學習、推廣郭興福群眾性軍事訓練教學方法，在一些基層部隊，就變成個別單位和少數“尖子”的“大比武”活動（實際上郭興福教學方法還包括政治思想工作、戰鬥作風培養、貫徹群眾性練兵活動等內容），並由局部的小型比武活動發展到全海軍性的大比武。

學習和推廣郭興福教學法的目的不是為了比武，軍事訓練的目的也不是為了比武。比武僅僅是郭興福教學法中考核訓練成果的手段之一。但在各種輿論工具的大力宣傳下，“練兵為比武”、“訓練為比武”的空氣相當濃厚，而比武、練兵的真正目的倒有所淡化。在海軍有些領導也提出“比武壓倒一切”，“海軍工作的中心轉到比武上來”。在大比武中，還發生弄虚作假現象。例如，拼湊“尖子”（將幾個單位的技術能手拼湊在一起）參加比武的錦標主義現象和花架子“練為看”的形式主義現象等等。當時，對林彪提出的建軍方針和路線，雖然沒有聽到公開反對，但是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空氣很自然的逐漸淡薄起來。

1965年初，由羅瑞卿主持召開軍委辦公會議，海軍照例是我參加。

會議傳達和討論了林方塊字讀書社區“衝擊了政治”提出的批評。

林彪批評意見的主要內容是：“大比武使有的部隊祇抓軍事技術，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在大比武中弄虛作假，搞錦標主義和形式主義，這樣下去，必然會把政治工作衝垮，把其他一切衝垮，結果也會把軍事訓練本身衝垮。”林彪說：“一定要突出政治，要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為我們全盤工作的基礎。政治工作搞好了，其他工作才能搞好，軍事工作也才能搞好。”林彪又說：“要研究和接受前幾年海軍的教訓，過分突出軍事訓練，就衝擊了政治。海軍吃虧就吃在這個地方。他們後來轉變過來了。”

軍委辦公會議傳達林彪的指示後，不但羅瑞卿震動很大，對參加軍委辦公會議的其他人也震動很大。羅瑞卿覺得林彪批評過重，他認為對1964年的軍事訓練成績還是應該肯定。他在會上說，去年（指1964年）的軍事訓練工作是建國以來最好的一年，成績是主要的。“氣可鼓，不可泄”。因此對林彪的批評意見，在向下傳達時，是按照羅瑞卿“軍事、政治應該並重”的指導思想作了不少修改。

這樣修改林彪的批評意見，我心中雖有疑惑，但我們帶“耳朵”參加會議的人是有資格提出自己的看法的。這就是後來批判羅瑞卿“對林彪指示進行歪曲篡改，塞進自己私貨，力圖阻止林彪指示貫徹執行”的情況。

1965年初，全軍開始糾正“軍事衝擊政治”的錯誤。就海軍而言，下面部隊問題不大，上面怎麼指示，下面怎麼執行，同時已有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基礎，部隊戰備工作的情況仍然不錯。

可是在海軍黨委常委內部卻發生了問題。對於全軍開始糾正“軍事衝擊政治”的錯誤，有的常委態度比較明朗，如蕭勁光，但也有的常委態度不明朗，糾正工作不積極，不堅決，採取消極的態度。有的常委借口抓海軍裝備工作，形成政委不抓政治思想工作，對於糾正海軍存在的“軍事衝擊政治”的工作和措施，不聞不問也不管。有的常委借口海軍裝備技術複雜，因此對於糾正“軍事衝擊政治”表面擁護，實際反對。

雖然有林彪對全軍大比武“衝擊了政治”的批評，但羅瑞卿

“軍事、政治應該並重”，“氣可鼓，不可泄”的意見是以軍委辦公會議精神傳達的，在各級領導的思想中仍占了相當重要的地位。因此海軍黨委常委內部產生新的意見分歧並不奇怪。

1965年夏天，我向蕭勁光司令員和蘇振華政委建議，開一次常委通氣會，發揚民主、交換意見。檢查海軍黨委，對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和批評“軍事衝擊政治”的思想狀況和改進措施。他們採納了我的建議，在“八·六”海戰之後，開了幾天相互通氣交換意見的常委會議。

會上我比較尖銳的講了一些意見，我指出，在全軍糾正“軍事衝擊政治”的錯誤時候，目前常委中出現新的指導思想上的不統一，反映在工作中出現不協調、不配合、不團結的現象。特別指出，對如何落實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如何糾正“軍事衝擊政治”，常委中存在三種態度：第一種是認真貫徹林彪指示，積極糾正“軍事衝擊政治”；第二種是對林彪指示既不積極也不抵制；第三種是對林彪指示既消極又抵制。

我提出意見的中心思想是：希望海軍黨委把思想統一在貫徹落實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和糾正“軍事衝擊政治”上。雖然我在會議上沒有點明“軍、政並重”論，實際上已表明我的態度。

這一下大概把蘇振華刺痛了，很快就把我的發言記錄整理後，送給了羅瑞卿。

9月中下旬，有一天我到三座門參加軍委辦公會議，會議結束後，羅瑞卿叫我留下，並有梁必業、劉志堅、徐立清在座。

羅對我說：“你在海軍常委通氣會議的發言記錄稿我已看過了。”

我說：“可能有錯誤，請總長批評指示。”

羅說：“要委曲求全，忍辱負重，夾起尾巴做人，搞好團結。問題是否就到此為止？不要再去扯了，大家集中力量把工作搞好。”

我說：“同意總長指示，目前海軍有些情況值得注意，希望總長加以重視。”

方块字读书社区

談話結束後，梁必業邀我到他家裏去坐一會兒。在梁必業家

裏閑談中，我說了一句：“北京情況不太平，軍隊有人要鬧事。”

梁必業追問我：“誰？”

我自悔失言，一直沒有敢告訴他，祇說：“以後你會知道。”

其實此時我已知道林彪與羅瑞卿有矛盾，幾個老帥對羅瑞卿也有意見。葉群、葉劍英也曾向我打過招呼。

我又從小道消息知道，全軍中將以上的幹部定級方案已報中央，羅瑞卿親自將梁必業的行政級別由六級提為五級，因此我不敢實情實告。

自1964年底，林彪提出“突出政治”和對全軍大比武進行批評後，林彪和羅瑞卿兩種建軍思想的矛盾逐步公開化。但當時，我祇看到了表面現象，並沒有認識到這個矛盾產生的背景和深層的原因。

當時我認為，政治和軍訓應該是軍隊整體工作中的兩個方面，我們在具體工作中的體會是，兩個方面都不可偏廢。但是在當時，突出政治是首位的。在林彪和羅瑞卿對軍隊建設指導思想發生矛盾的大背景下，海軍黨委常委的分歧“到此為止”，顯然是辦不到的。並且進一步由意見分歧發展到行動和情緒的對立。

1965年秋天，海政經過調查研究，組織起草了一份《關於貫徹執行1963年海軍黨委擴大會議決議的基本總結》（後稱《三年工作基本總結》），送海軍黨委審查，並提議召開海軍黨委擴大會議進行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總結。

海軍黨委同意海政的建議，確定10月下旬召開海軍黨委三屆二次會議，並向下發了開會通知。

可是會沒開幾天，主持黨委工作的海軍政委蘇振華却拍屁股走人了，他說要到南海艦隊檢查工作去。一部分會議代表，看到蘇振華走了，也借口工作忙或搞四清，不來參加會議。老實說當時我對蘇振華的行為是非常氣憤的，很明顯，他是從行動和情緒上表現出反對林彪“突出政治”的態度，表現出對林彪批評羅瑞卿的不滿，表現出對軍委檢查政治思想工作不滿和三年來調整海軍建設方向的不滿，並把這種情緒公開暴露到全會上，引起部

方塊學讀書社區

隊幹部的思想混亂，簡直不像個政委樣子。

第一書記蕭勁光對蘇振華的如此行爲也不滿意，他對我說：“他不在，會議照樣進行。”蕭仍按原計劃主持會議，並組成了會議領導小組。不少參加會議的代表，看到海軍黨委常委內部這種思想不統一，工作不團結的現象，連海軍政治委員都不參加海軍黨委的三屆二次全會，因此在討論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總結中，就不能不談到海軍領導思想分歧和團結問題。

會議通過了《三年工作基本總結》。總結中指出：總的來看，工作方向已經端正，海軍工作落後的狀況已基本改變，比三年前，有了較大的轉變和進步。總結中還提出了海軍對“四個第一”是高舉、是猶豫、還是反對的三種態度，指出了目前仍存在和需要加強的十五個問題，也分析了今後工作中可能出現的兩種前途。

全會雖然通過了《三年工作基本總結》，但對總結中提到的存在問題，仍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見，爭論還是相當激烈。我認爲這也是黨內民主生活的正常反映。

幾周後，林彪從全會簡報中知道了會議情況。有一天，由林辦秘書給我打電話，傳達林彪對海軍工作指示。記得有三條：一條是說，海軍這幾年工作有很大進步，不是小的進步。現在的樣子與三年前的樣子有明顯的不同。主要是抓了政治思想和基層工作的結果。另一條是說，林彪表揚崇武以東海戰打的好，在國防部的嘉獎令中，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林彪說這不僅是對海軍說的，也是對全軍說的。最後一條是要我們把這次全會上，海軍領導對近幾年落實“突出政治”中的兩種思想分歧情況搞一個材料，不用寫文章的辦法，而用拉條條的辦法，並限期送去。

我立即向蕭勁光司令員匯報了林彪的指示，他表示完全同意，還決定向會議領導小組傳達林彪的電話指示。經會議領導小組討論決定，由政治部主任張秀川負責組織寫這個材料。大約11月底，他們搞出初稿後，給我送來了。我對該材料作了若干修改，其中最重要的修改是材料中凡提到“蕭、蘇

認為……”，或“蕭、蘇、劉認為……”的地方，我都把“蕭”字刪掉了。我一直認為，蕭、蘇兩位領導雖然在海軍工作的時間較長，但1960年後，對落實軍委擴大會議決議和海軍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等問題上，兩人的態度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原因之一：軍委檢查團檢查海軍工作後，特別是1963年1月海軍黨委擴大會議後，在端正海軍工作方向上，蕭的態度是正確的；原因之二：雖然海軍在去年（1964年）也積極參加了全軍大比武活動，但今年初，蕭對林彪批評全軍大比武“衝擊了政治”，要糾正“軍事衝擊政治”的態度也是正確的，與蘇是不一樣的；原因之三：海軍這次全會上，對如何“突出政治”，如何落實林彪“三條指示”在態度和行動上，蕭勁光也是積極的、正確的。此外，我知道，林彪對蕭勁光多次給予好評：1、在中央蘇區受王明路線打擊迫害；2、在東北解放戰爭時期，幾個副總司令中，他是最好的一個；3、對海軍的創建工作有成績、有貢獻。

這份準備上報林彪的材料就是《海軍黨委常委內部爭論問題的情況報告》。

12月初，海軍蕭、蘇和我參加了中央在上海召開的揭發批判羅瑞卿的會議。會議結束後，我們仍回海軍繼續參加三屆二次全會。此時我看到，將要上報林彪的《情況報告》中又增加了新的觀點，大意為：“黨委常委內部爭論的實質，是兩種建軍思想的爭論，是高舉不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突出不突出政治，堅持不堅持‘四個第一’的爭論。是對軍委擴大會議、林副主席‘三條指示’、軍委檢查團報告、1963年海軍黨委擴大會議決議，所採取的不同態度問題的爭論。”由於剛剛參加了中央解決羅瑞卿問題的會議，蕭勁光和我對這種提法都沒有反對。

12月21日，在海軍三屆二次全會閉幕前，黨委常委們基本同意了《情況報告》，並報林彪和軍委。

此次海軍三屆二次全會之後，海軍黨委常委內部的意見分歧，就更加日益尖銳化，日趨公開化了。

方块字读书社区

三、中央會議，批判羅瑞卿

1965年11月14日，我海軍艦艇部隊在福建崇武以東海面，一舉擊沉蔣軍“永昌號”護航炮艦和擊傷“永泰號”大型獵潛艦。戰後，經林彪批准，由國防部向海軍作戰部隊頒發嘉獎令，嘉獎令中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這就是以後稱之為林彪提出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1、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別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書當作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2、堅持“四個第一”，特別要大抓狠抓活思想；3、領導幹部要深入基層，狠抓“四好連隊”運動，切實搞好基層，同時要切實搞好幹部的領導作風；4、大膽地提拔真正優秀的指戰員到關鍵性的負責崗位上；5、苦練過硬的技術和近戰夜戰的戰術。

後經毛主席批示：“此件已閱，同意五項原則”，中央軍委決定把“突出政治五項原則”作為1966年全軍工作方針。

1965年12月2日，毛主席對蘭州軍區黨委《關於55師緊急備戰中突出政治情況報告》批語中指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毛主席的這一批示就是針對羅瑞卿“軍、政並重”論而言的。

1966年1月，總政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進一步強調指出突出政治的戰略意義，蕭華在會議上說，林彪提出的繼續突出政治五項原則，不僅是我軍今年各項工作總方針、總任務，而且是我軍建設的百年大計。解放軍報連續發表七篇論突出政治的社論。通過毛主席的明確支持，通過各級領導、各種會議、多份文件的強調，通過各種輿論形式與渠道的宣傳，當時在解放軍中突出政治的空氣極為濃厚。

1963年前後，林彪身體不好，毛主席決定在林彪養病期間，由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而此時，羅瑞卿已是中央書記處書記、

方块字读书社区

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等要職在身。他除了向賀龍請示報告外，還可以直接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請示報告。據說劉少奇對羅的工作十分賞識，要讓羅當國防部長。

隨着羅瑞卿權力越來越大，據我所知，當時已有老師對羅在軍委的日常工作中，小事不請示，大事不報告，對老師工作不支持等頗有微詞，葉帥、聶帥就是其中的兩位。當然向軍委第一副主席林彪的請示報告就更少，林彪批評羅瑞卿“根本不來見面”。

1965年上半年，據說羅瑞卿曾授意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向林彪提出四條要求：其大致內容是要林彪“不要多管軍隊工作”，“軍隊事情一切由羅管”。由於劉亞樓已死，沒有直接證據，此事確否成為懸案。但據我回憶，當時我參加上海中央批羅會議和北京中央工作小組批羅會議時，所聽到的發言中和看到的揭發材料上，不止葉群一人證明了此事是有的，而且劉亞樓還親自向林彪談過此事，受到林的批評。

鳥之將亡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快要死的人為什麼進此之言？臨死之前劉亞樓有必要再說一次假話嗎？據我所知，劉與羅瑞卿私人關係很好。

其實林彪自擔任軍委第一副主席後，對羅瑞卿是重用的。從歷史上了解，林、羅的關係也是好的。我從來沒有聽說在歷史上林、羅有重大分歧和矛盾。林養病後，也是希望羅在工作中多給他“通氣”。但從1965年秋天，林彪就曾對人說：“1960年以前羅瑞卿和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從1961年起便開始疏遠我，封鎖我，到1965年，便反對我了。”

1965年初秋的時候。有一天葉群給我打電話說：“首長（指林彪）要我給你打個招呼，羅長子（因羅瑞卿個子特別高，大家給他起的外號）有野心，想當國防部長，要林彪讓賢休養。”又說：“羅瑞卿要林彪不要干涉軍隊工作，軍隊工作由羅負責。”她說：“老師們對羅的意見也很大，羅的情況主席（指毛澤東）和首長都知道了。”

方块字读书社区

我明白，如果主席和林彪不知道羅的問題，葉群也不敢給我

打招呼。

葉群還說：“他（指羅瑞卿）正在組織新班子，又是提級，又是提職。”她提醒我：“對當前局面提高警惕。”

我當即表示：“請轉告林總，請放心，我決不會做出對不起林總的事情。”

葉群又說：“你們那個姓蘇的是反‘雙一’的。”

我心裏明白姓蘇的是指蘇振華，但反“雙一”是什麼意思，我未聽懂，因此反問她：“什麼叫反‘雙一’？”

她解釋說：“就是反一方面軍、一軍團。”

她又說：“你從海軍角度看到有什麼問題，可以寫點材料送來。”

葉群電話之後，我找王宏坤、張秀川到我家，把葉群電話精神告訴了他們，並商量寫材料問題。我沒有首先表示寫什麼內容，王宏坤也沒有表示意見，主要是張秀川談了一些問題，圍繞羅瑞卿搞軍事大比武，與林彪“突出政治”相對立和海軍黨委常委內部在糾正“軍事衝擊政治”問題上的意見分歧等等，我就要張秀川在我的辦公桌上寫出來。寫出後我看了轉給王宏坤看，他也沒有意見，我看了雖然不十分滿意，但沒有提出更多的意見，祇說：“就這樣吧，整理出來，用我們三人名義送去，以後想到什麼問題再寫。”

後來的赫赫有名的海軍“李、王、張”就是從此開始的。

時隔不久的一天，葉帥找到西山他家裏談工作，同時也談到羅瑞卿的問題。

葉帥說：“這個人（指羅瑞卿）很霸道，目空一切，到處伸手，要注意哩。過去我們想巴結他，也巴結不上，這種人不會有好下場。”

稍後，葉帥又提到蕭勁光問題說：“那也是個老虎屁股。”我靜靜的聽着，既沒有表示反對，也沒有表示贊同。因為我知道林彪對蕭勁光是有好評的。方块字读书社区

葉帥接着又說：“蘇振華這個人不錯。”我還是靜靜的聽着。

既沒表示反對，也沒表示贊同。

在我與葉帥的接觸中，他除了了解和指示部隊工作外，極少涉及人的問題。而這次與我談話中，一下就談了對羅、蕭、蘇三人的看法。

當時，我還不知道中央要召開批羅會議，事後想想，這是葉帥在向我打招呼吧。

12月8日到15日，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揭發批判羅瑞卿反黨篡軍問題。海軍蕭、蘇和我三人參加。

會議先看文件，後揭發批判。羅瑞卿當時在昆明，會議進行中，用飛機接來上海的，到達上海後就將他軟禁了。整個會議是背靠背的揭發批判，羅本人沒有參加會議。

我和蘇振華共在一個小組，我沒有發言，蘇也沒有發言。但從察顏觀色中可以看出蘇振華有些坐臥不安。不過鄧小平在小組會上，插了一句話：“海軍那個材料沒有什麼重要問題。”這可能對蘇振華是一個很大的安慰。

會議最後由鄧小平講話，給羅瑞卿做了五條結論，主要是軍事路線、組織紀律和工作作風方面的錯誤，指出大比武衝擊了政治，重大問題不請示報告，是無組織無紀律的錯誤。對於羅瑞卿向劉亞樓提出的四條問題，沒有做出肯定的結論。關於羅瑞卿篡改林彪對1964年大比武衝擊政治的批評，毛主席說：“要恢復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稿。”這是鄧小平向大家傳達的。

會議期間，毛主席、林彪均在上海，毛實際上主持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但沒有在會場露面。

回到北京後，蕭、蘇決定由我負責向參加海軍三屆二次全會的正式代表和海軍直屬各大部的黨委成員傳達上海會議精神，以及中央做出的撤銷羅瑞卿總參謀長職務和楊成武任代總參謀長的決定。全會代表和各大部黨委成員聽了傳達後，都覺得事情發生的很突然，很驚訝！關於羅瑞卿的副總理、國防部副部長等職務什麼時候撤銷的，我

方塊字讀書社區

1966年3月4日開始，中央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小組會議，部隊

和地方的領導參加了會議，對羅瑞卿問題做進一步的揭發批判。中央指定鄧小平、彭真、葉劍英三人負責對會議進行領導。其實他們三人祇在會議開始前，把大家召集在中南海懷仁堂，宣布會議如何開法，並指定葉劍英、楊成武、蕭華三人對會議進行具體指導，以後鄧、彭兩人就沒有參加會議。會議在京西賓館進行，開了一個多月。羅瑞卿軟禁在他原來住處，會議基本上是背靠背地揭發批判。

3月12日羅瑞卿作了檢查，我記得羅在檢查中主要談到了大比武問題和反對突出政治的問題，還談到了對葉劍英等老師不尊重等問題。他對問題上綱很高，什麼“嚴重的路線錯誤”、“反黨性質的錯誤”等等。

會議初期，批判的溫度並不太高。但會議中途的3月18日羅突然跳樓，自殺未遂，將腿骨折斷，並立即送醫院治療。葉帥當時填了一首詞，詞的其他內容我都忘記了，祇記得一句“將軍一跳聲名裂”。羅跳樓後，三人小組決定由蕭華到醫院探望，探望中兩人的對話情況向會議作了傳達。其中有一點我記憶猶新。羅說：“揭發我反對林總，真是天大的冤枉，你把我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一點我反對林總的東西。”鄧小平在羅跳樓後曾說：“如果你羅瑞卿認為你是正確的，為什麼不堅持呢？還有揭發的事情，你不同意可以保留意見嘛！彭德懷實際上已經作了結論。他寫了幾萬言書，企圖翻案，現在還分配工作。我們黨從來不強迫人承認錯誤。”據說毛澤東知道羅跳樓後說：“為什麼跳樓，真沒出息。”

羅的跳樓自殺，引起會議極大義憤，揭發批判的溫度也逐步上升。我記得，在會議上葉劍英、楊成武、蕭華等人都做了長篇講話。從羅瑞卿反對學習毛主席著作，到堅持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擅自決定全軍大比武；從反對突出政治，搞折中主義，到向黨伸手，進行篡軍反黨活動；從“一言堂”到封鎖林彪和不尊重軍委常委各位老師；從這次會議上羅是“假檢討，真對抗，猖狂反撲”，跳樓自殺和遺書問題，到建議撤消羅中央書記處書記、副

總理職務等等，全面、系統地揭發批判了羅瑞卿。羅瑞卿的不少事情是他們的發言中揭發出來的。比中央上海批羅會議詳細的多。

會議在揭發批判羅瑞卿的過程中還涉及到劉亞樓、蕭向榮、梁必業等人的問題。

我没有聽到林彪對此會議做任何指示。

說幾句我的想法。我始終認為羅瑞卿是有錯誤的。第一，毛主席對林彪“突出政治”的建軍指導思想給予了肯定，這是不容質疑的。早在1960年軍委擴大會議上就通過了《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林彪提出“一定要突出政治，要把政治工作擺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要堅持“四個第一”，毛澤東曾表揚林彪：“四個第一好，這是個創造”；第二，從領導與被領導的工作關係而言，領導強調突出政治，被領導強調軍訓大比武，不是有意形成對抗嗎？總參謀長與主持軍委工作的副主席相對立，這是組織紀律不能允許的；第三，林彪曾說：“要研究和接受前幾年海軍的教訓，過分突出軍事訓練，就衝擊了政治。海軍吃虧就吃在這個地方。他們後來轉變過來了。”我親身參加了軍委檢查團，當時海軍的狀況使我看到了放鬆政治思想工作而造成多起重大政治事件和訓練事故的惡果，我認為“突出政治”是必要的；第四，突出政治與加強軍事訓練，不應該是對立的關係，而應該是相輔相成的關係，上下級之間有不同意見，原本可以通過正常交流溝通的辦法解決；第五，應該說林彪與羅瑞卿矛盾的產生，不在於林彪強調“突出政治”，而在於羅瑞卿不僅不接受林彪的批評，反而採取修改、不執行和對抗的辦法對待林彪的指示。毛主席說：“要恢復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稿。”

但我想，如果當時從團結教育的願望出發，真正想解決問題，完全可以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林彪雖然對羅有過嚴肅的批評，但絕不是想一棍子打死。即使羅的問題像葉劍英、楊成武、蕭華說的**地方读书社区**的問題採取人民內部矛盾的解決辦法，採取批評和自我批評，給出路的政策，以觀後效。

羅也不會發生跳樓自殺事件，“走上自絕于黨、自絕于人民的道路”。

書歸正傳。

在京西會議上，我沒有發言，但寫了一個書面發言稿，送給會議秘書組，請求印發。過了幾天仍未見印發出來，我心裏有些猜測。

有一天，秘書組負責人通知我說：“你的書面發言稿，經領導小組審查，認為其中埋伏有四根刺，不能印發”。

埋伏四根什麼刺呢？並未指出來，搞得我莫名其妙。（直到現在，也沒人告訴我，“四根刺”是什麼！）就是在羅瑞卿跳樓後，我的主觀認識中仍把羅的問題當成人民內部矛盾對待。既然開會要求我們揭發批判羅的問題，對羅的批評就是公開的，是暢所欲言的，我的發言稿中根本不存在什麼“埋伏”問題，什麼“刺”不“刺”的問題。

我的書面發言稿中心內容是按照當時的批判口徑，聯系我的思想認識，批判羅瑞卿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我認為羅瑞卿的錯誤主要有三條，第一反對突出政治，第二企圖奪林彪的領導權，第三海軍黨委常委在糾正“軍事衝擊政治”問題上的意見分歧的根源在于羅瑞卿。

可能在我批羅的書面發言中，某些言辭旁敲側擊涉及到了蘇振華，所以主持會議的葉帥決定不能印發。為什麼不能印發，還說“有四根刺”呢？因為葉帥也參加了中央上海批羅會議，看到李、王、張寫的那個揭發材料，涉及到蘇振華，這次京西會議我的書面發言又暗指了蘇振華，這就完全違背了他的看法和他曾對我打過的招呼，從而對我存有成見，因此不准印發我的書面發言稿，我猜想，可能原因在此。

後來我又想改為口頭發言，可這樣就要得罪葉帥，但又考慮：上海批羅會議沒有發言，京西批羅會議又不發言，林彪知道後肯定不會滿意，可能要責怪我。我到底該發言還是不發言？兩個老師對蘇振華的看法截然相反，涉及還是不涉及？這個分寸到底

方块字读书社区

怎樣把握？我左右為難。

在這種複雜情況中，為人真是難啊！雙重壓力下，我的心臟病發作，住進了解放軍301總醫院。幾天之後，葉群到醫院看我，要我安心養病。我當時向葉群談到“四根刺”問題。在醫院裏，我曾寫信想見葉帥一次，請求批評指示，結果葉帥沒有答應，祇批准我離開北京到外地休養，“願到南方就到南方，願到北方就到北方”，由我自己選擇。

在住院期間，我看到了中央五月在對羅瑞卿問題的文件中說：“中央認為羅瑞卿同志的錯誤是用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對無產階級軍事路線的錯誤，是用修正主義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反對林彪同志的錯誤，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野心家篡軍反黨的錯誤。……羅瑞卿不但不認真檢查自己的錯誤，反而於3月18日跳樓自殺（受傷），走上自絕于黨、自絕于人民的道路。”

四、未參加的海軍黨委 “三·三”會議和擴大會議

5月中旬，我決定離開北京到廬山休養。當時海軍黨委已經決定5月27日召開三屆三次全體會議，主要內容是：一、學習討論中央《五·一六通知》和中央關於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二、貫徹中央上海會議和中央工作小組會議精神，以徹底肅清羅瑞卿的錯誤對海軍工作的影響為中心議題，繼續揭發批判羅瑞卿的錯誤；三、傳達貫徹毛主席的“五·七”指示。¹當時還徵求

註1，五七指示：是指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審閱軍委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副業生產的報告》后給林彪的信。信中講到人民解放軍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要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與國家等方塊字讀書社區學校；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我對開會的意見。我寫了一封信，對會議討論內容、參加會議人員、會議時間等提出了我的建議，供他們參考。

5月下旬，我和老伴，還有秘書、醫生、保衛員等到達武漢，住在東湖曹家花園軍區招待所。在武漢稍住幾日，6月初我們一行就到廬山去了。



1966年 廬山仙人洞

當時海軍全會將會議簡報一批一批的送上廬山，供我了解會議情況。從簡報中我

了解到，會議在學習討論中央關於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階段，與會人員一致擁護中央《五·一六通知》的決定和一致擁護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會議還傳達了中央上海會議和中央工作小組會議精神，批判了羅瑞卿的錯誤。

會議進行得很順利。

6月16日，三屆三次全會結束。第二天召開海軍黨委擴大會議，除參加三屆三次全會的代表外，增加了軍、師一級的領導幹部參加會議。

擴大會議在傳達中央上海會議和中央工作小組會議精神的同時，繼續揭發批判羅瑞卿問題。

會議上，確實有人在揭發批判羅瑞卿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和“軍事衝擊政治”時，聯系海軍的工作實際，或不點名的，或指名道姓的提到在過去幾年中，海軍也執行了羅瑞卿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海軍也存在軍事衝擊政治，搞軍事大比武等問題，作為海軍的主要領導人是有責任的。也有人提出去年秋，海軍黨委召開三屆二次全會，討論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三年工作基本總結”時，海軍主要領導人之一的蘇振華不參加會議，海

方块字读书社区

軍黨委常委內部對“突出政治”存在思想不統一，工作不團結現象。有人也提出海軍黨委常委在糾正“軍事衝擊政治”問題上爭論的根源在於羅瑞卿和蘇振華。從會議簡報看，會議代表對政治委員不“突出政治”，不抓政治思想工作意見最大，最集中。

當時我認為，海軍三屆三次全會和黨委擴大會議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貫徹中央上海會議和中央工作小組會議精神，徹底肅清羅瑞卿的錯誤對海軍工作的影響為中心議題。那麼，會議代表在黨的會議上，在揭發批判羅瑞卿錯誤的同時，聯系海軍實際工作，提出自己的看法，甚至指名道姓的對上級領導提出不同意見，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做法是完全正常的。會議按中央要求肅清羅瑞卿錯誤在海軍的影響，樹立經毛主席和黨中央同意的，林彪提出“突出政治”的建軍思想是完全必要的，是與中央上海會議和中央工作小組會議批羅是“兩種建軍思想，兩條建軍路線的鬥爭”的精神一致的。

我認為，做為海軍政委的蘇振華，在海軍兩種建軍思想和路線的認識上，在中央關於羅瑞卿問題決定的認識上，沒有與中央決定保持一致，他是有錯誤的。

當時蕭勁光、蘇振華都在會議上做了書面檢討。

不久，送來的簡報中，我看到軍委已派出由劉德裕、朱光為正、副組長的工作組參加海軍的擴大會議，工作組成員中有葉帥的辦公室主任莫陽。

7月初，突然聽說葉帥指示：會議休會。並傳出葉帥認為會議“出現異常情況”。

没过幾天，又看到賀龍主持的中央軍委常委會議有關文件，其中葉劍英傳達了中央常委會議對海軍黨委擴大會議的指示。在指示中，尤其看到中央常委會指出：“不能搞也不允許搞地下活動”，“蕭、蘇已進行了自我批評，其他同志也應該洗洗澡”等。指示中批評海軍擴大會議“地下活動錯誤是第一位的（指王宏坤、張秀川），路線錯誤是第二位的（指蘇振華）”時，我非常驚訝。當時我就感到，這不僅對王、張是不恰當的（沒有根據說王、張在

方塊字讀書社區

會議期間搞地下活動），對蘇也是不恰當的（會議並沒有給蘇定性為路線錯誤）。同時在葉帥講話中說：“中央和軍委注意到海軍會議的發展，認為繼續發展下去很危險”，“要把蕭、蘇搞成羅瑞卿分子了”。他還說“會議要罷蕭、蘇的官，王宏坤上臺，黃袍加身”。等等。

會議突然休會，又突然傳達中央和軍委對會議的指示，遠在廬山養病的我看完文件後，大為迷惑不解。

擴大會議包括學習討論中央關於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在內，才開了不到二十天，揭發批判羅瑞卿才剛剛開始，就休會，究竟出了什麼問題？聯系海軍實際，擺事實，講道理，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肅清羅瑞卿在海軍的影響，怎麼成了“要把蕭、蘇搞成羅瑞卿分子了”呢？有根據嗎？王、張的“地下活動”有根據嗎？海軍黨委給蕭、蘇定了“路線錯誤”和“搞成羅瑞卿分子了”嗎？對會議“繼續發展下去很危險”的擔心有理由嗎？蕭、蘇做了檢討，其他人為什麼也要“洗洗澡”呢？難道錯誤也要“人人有份”嗎？當時我既不了解“地下活動”指的是什麼，也不了解應該怎樣“洗洗澡”。我百思不得其解。

無論會議出沒出現“異常情況”。實際上，會議一直是由第一書記蕭勁光、第二書記蘇振華和會議領導小組在領導。

至此，海軍黨委擴大會議由開始批羅及肅清在海軍的影響，轉向一邊倒的揭發批判王宏坤和張秀川，并把攻擊的矛頭指向我。有人說“李、王、張地下活動由來已久，早在1962年李、張到海軍就開始了”，有人說：“海政是李、王、張地下活動的基地”，有人說：“三屆二次全會常委內部爭論和對蘇振華、劉道生的批評是錯誤的”，有人說我是“搖鵝毛扇的”，“搞非法活動”，“在廬山幕後指揮會議”等等。總之，王、張的後臺是我。甚至有人把“李、王、張”所謂“地下活動”上綱為“陰謀奪權”、“搞反革命活動”，要“揪李、王、張的後臺”等等。

真是可笑！中央上海會議和方塊學讀書社區小組會議上，有葉劍英、楊成武、蕭華為代表的大量揭發批判羅瑞卿的材料擺在與

會者面前，在批羅的同時，還牽扯到了一些人和事。海軍黨委關於“軍事衝擊政治”的意見分歧也早已公開化，不是什麼秘密。蘇振華對批羅的態度和表現，在海軍是人人皆知的，我還有必要幕後指揮會議嗎？會議文件是按規定由機要部門送到廬山的，我在文件上批注的意見也全部是公開的，對於會議無秘密而言，何談“非法活動”，“地下活動”？

我當時在廬山還注意到一個情節，從7月初到8月中旬，四十多天時間，會議由批羅變成狂風暴雨般的批鬥李、王、張什麼“地下活動”、“黃袍加身”時，在王宏坤、張秀川多次檢查仍不能過關，病倒住院時，在有人甚至說李、王、張是“陰謀奪權”、“搞反革命活動”時，賀龍、葉劍英等軍委領導並沒有以任何形式表示“出現異常情況”的態度。原來李、王、張就是被這樣地“洗洗澡”。

在這期間，我曾給黨委擴大會議寫了一封信，信中我說：“如果李、王、張在過去幾年的工作中有缺點、有錯誤，主要由我負責。”我的用意是解脫會議對王、張的無端指責，有缺點、有錯誤我來承擔。這就是後來稱之為我的“檢討”。

後來才知道，所謂“地下活動”，就是吳瑞林（當時的南海艦隊司令員）、周志先（當時的南海艦隊航空兵政委）等幾個參加會議代表，帶着從海南島運來的西瓜，到張秀川家看望他，邊吃西瓜，邊議論會議情況，僅此而已。這就是所謂冠以“西瓜會議”的“地下活動”。

我對會議轉向批判“李、王、張”越來越想不通。但冷靜下來，我第一感覺是會議的問題嚴重了，複雜了；第二感覺是會議發展到這個地步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從大的方面講，與中央批羅有關，很可能與去年中央批羅會議前葉帥給我打招呼，中央批羅會議上“李、王、張”的揭發信中涉及到海軍問題和今年中央工作小組會議上，有人說我的書面材料中“有四根刺”有關。從海軍而言，很可能與去年10月召開的海軍黨委三屆二中全會通過的《三年工作基本總結》和上報林彪及軍委的《情況報告》有關。

本來我還計劃在身體稍康復後，再到井岡山住一段時間，並順路回老家看一下，再三考慮覺得時機不宜，也就祇得將思家心情按耐下去。因此到井岡山參觀時，祇在吉安市停了三天，與家中兄弟小聚一番。1949年南下作戰途中，是我參加革命十九年後第一次回家鄉，這次，又事隔十七年之後，是我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回家鄉看看。

我從井岡山回到廬山之後，會議簡報停送了一段時間，會議進展情況已不甚了解。但越想越覺得會議方向無法理解。究竟會議發生了什麼情況？該怎麼辦，心中無數。當時我知道林彪在大連休養，想轉到大連去請示林彪。于是便于7月底下山，經上海，8月初到達青島，一打聽，林彪回北京參加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已不在大連。

在青島休息了十天左右，大概是8月15日，蘇振華從北京親自給我打長途電話，要我立即回北京，並派專機接我。

回到北京後我才知道，首先是徐帥，之後是林彪，都不同意海軍黨委擴大會議轉向批鬥李、王、張。林彪在7月初就曾指示：“李、王、張是左派；李、王、張三年來工作是有成績的，工作好的。蕭、蘇要支持李、王、張的工作，如果撤了李、王、張，海軍的實際工作就沒有人做了。”這是林彪對海軍擴大會議的第一次表態。

8月13日（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前一天剛剛



方塊字讀書社區

1966年 井岡山

結束)，林彪又一次指示：“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同志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是擁護毛主席的，是突出政治的，是有幹勁的，對海軍工作轉變做了很多工作，反羅瑞卿是有功的。”這是林彪對海軍擴大會議的第二次表態。

8月17日，林彪召見葉劍英、楊成武、蕭華並指示：“海軍會議必須立即收兵停戰，再開下去就會錯上加錯。應以大局為重，團結起來，做好海軍的工作。”林彪要求海軍黨委擴大會議批判王、張“適可而止”，並說：“鬥了李、王、張四十多天，什麼問題也沒有搞出來”。林彪指示：第一、會議簡報不准再出；第二、會議文件不准再印發；第三、工作組起了很壞的作用，立即撤回。這是林彪對海軍擴大會議的第三次表態。

當天晚上，葉帥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召集蕭、蘇和我三人開會，楊成武、蕭華在座。葉帥走進大廳時，滿臉怒氣，沒頭沒腦地、很生氣的邊走邊大聲說：“幹部都是黨的幹部，不是私人的幹部，批評一下你的部下，就不滿意，就批評不得……。”蕭華面向葉帥勸說：“算了！算了！”然後坐下，葉帥對着蕭、蘇、李宣布說：第一，海軍黨委擴大會議立即停會；第二，會議簡報立即停發；第三，增補李作鵬為海軍黨委第三書記。整個過程不到十分鐘就結束了。

8月18日，葉劍英、蕭華向海軍黨委擴大會議的全體代表傳達了林彪對海軍黨委擴大會議的指示精神。

之後，我參加審查海軍黨委擴大會議決議初稿。當時王宏坤、張秀川均被批鬥病倒了，早已不參加會議。我對決議初稿提出八條反對意見，主要指出決議的實質是：盛錫福帽子店，帽子易戴不易摘，信不信由你們。

我側着耳朵想聽聽蘇振華的意見，可是他始終不表態，不發一言。起草小組也無人發言，就這樣結束了。

我拭目以待，看他們如何處理我的反對意見，如果不修改，我就不參加通過決議的會議，或投反對票。但還好，決議修改稿基本上吸取了我的意見，把原來那一大堆政治帽子，什麼“地下活

動”、“黃袍加身”，“要把蕭、蘇搞成羅瑞卿分子了”，“李、王、張的錯誤就是不按組織原則辦事”等等不實的說法全部刪掉了。但決議中還是保留了“海軍黨委三屆二次全會關於《海軍黨委常委內部爭論問題的情況報告》是錯誤的，除存檔外，一律銷毀。《三年工作基本總結》有原則錯誤，一律收回存檔”。這實際上說明羅瑞卿的錯誤對海軍工作沒有影響，也不必“徹底肅清”。

8月25日，會議倉倉促促通過了《團結起來，以大局為重，煥發精神，努力工作》的決議，長達兩個多月的海軍黨委擴大會議不歡而散。

此時海直機關的“文化大革命”之火已經熱火朝天的燒起來了，召開海軍黨委擴大會議的海軍第一招待所，牆上貼滿了對海軍黨委擴大會議不滿的大字報，將會議稱為“世外桃源”、“馬拉松會議”。

第三十一章 天翻地覆 (之一)

一、海軍機關開展“四大”

1966年下半年，海軍文化大革命的形勢與全國、全軍文化大革命的形勢是緊密相連的。

8月中下旬開始，軍以上機關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簡稱“四大”）先後展開，文體單位亂揪亂鬥也已經開始，海軍大院¹尤為熱鬧。

運動剛開始，群眾大字報所貼尚多屬於工作中的一

注1. 海軍大院是指位於北京復興路55號的海軍直屬機關駐地

般性的缺點錯誤，唯有羅斌（海軍航空兵政治部副主任），作為高級幹部，以“井岡山紅衛兵戰士羅斌”的署名，第一個寫了一張很長、很具體、很有“分量”的大字報。此人并未參加海軍黨委擴大會議，但他恰恰在會議結束當天，就把這次會議的基本情況全部公開出來了。

在葉帥、蕭華向海軍黨委擴大會議傳達了林彪的指示，特別是海軍黨委擴大會議形成決議後，這張大字報的內容就顯得格外刺眼，蘇振華也覺得不好，慌忙地把它移到一個大倉庫的空房子裏面，祇讓團以上幹部看，其他人不准看。這樣又引起營以下幹部群眾不滿了。

經過這張大字報的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很快就集中火力，“萬炮齊轟李、王、張”，“火燒油炸李、王、張”，“打倒李、王、張，再踏上千萬隻腳”的大字報、大標語像雪片一樣貼滿大院，我和王宏坤的家都在大院内，“炮轟”、“火燒”、“打倒”我們的大字報和大標語就貼在我們家的牆上和寫在門口地上，不時還有高音喇叭對着辦公樓和我的宿舍高喊口號，讓你既不能工作也不能休息。大有一口把李、王、張吞下去之勢。

事後，當時的全軍文革組長徐向前在一次軍委會議上也說，羅斌的根子是蘇振華，他的大字報是蘇振華指使貼的，羅斌是運動中的政治扒手。

羅斌是何許人？他是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紅軍，是原賀龍的部下。斯人資格雖老，能力不強，以前蕭、蘇對之也不器重。我到海軍後的初期，經常往我家裏跑，在談話中有意流露對蕭、蘇的不滿，無非是什麼蕭、蘇祇重視新幹部，不重視老幹部；祇重視有知識，懂業務的幹部，不重視工農幹部之類的牢騷。我當時對他是採取多聽少表態的態度。後來有一次他老婆手提着東西來送禮，我堅決拒絕接受，並發了脾氣，讓他老婆下不了臺。從此他就與我疏遠了。

誰曾想運動剛開始，他却突然跳出來，成為泄露會議機密，挑動不明真相的群眾，把群眾鬥爭的矛頭指向李、王、張的急先



文革期間，作者在海軍機關大樓看大字報

鋒。在當時，他這一跳，使我們已經舉步維艱的日常工作更加困難，說話、指示更沒有人聽，把我們搞的十分被動。

無獨有偶，與羅斌貼出大字報同一天，總參發生王尚榮、雷英夫事件。據說王尚榮、雷英夫帶頭寫大字報攻擊軍委辦公廳領導，引起國防部機關的大字報、大辯論。

軍委通知，要各軍兵種黨委成員到國防部大樓看大字報，看了以後要寫大字報表態，送給國防部。我參加看了大字報，由於大廳裏、走廊裏，滿牆都是大字報，不知道從何處開始，祇好走馬觀花的東看看，西看看。

忽然在大廳的一角，發現有兩張不甚顯目，但觀點對立的大字報。一張是毛家灣林辦（林彪辦公室）寫的批判王、雷觀點的大字報，一張是東交民巷八號賀辦（賀龍辦公室）寫的支持王、雷觀點的大字報（王尚榮是賀龍部下）。這兩張大字報，引起大家特別注意。透過林、賀兩個辦公室的大字報，可以看出兩位元帥的不同態度。

不久就聽說，中央軍委已決定將王、雷兩人審查，並指出王、雷大字報是錯誤的，是心懷陰謀野心的，是政治扒手。

當時總政也起了一個很壞的示範作用，即召開總政群眾大會，揪鬥梁必業，並向各軍兵種推廣其所謂“揪鬥幹部成功的經驗”。海軍蘇振華參加旁觀批鬥情況，回來向海軍其他領導介紹了旁觀批鬥經驗，說什麼要狠批狠鬥，要鬥得滿臉發白，滿頭流汗，全身發抖。要臺上鬥，臺下組織喊口號助威，一定要鬥得他低

方块字读书社区

頭認罪，決不能心慈手軟，決不能怕鬥得過火等等，這是軍隊機關文革初期極左思潮的表現之一。

9月22、23日，林彪兩次到海軍機關了解海軍開展“四大”情況和看大字報，並在視察海司、海政等單位後，在海軍黨委常委會議上，林彪說：“希望你們原班人馬都在海軍工作，我們沒有把你們哪一個人調出海軍，你們要把誰排擠出去，我們也不贊成。”又說：“全國都在學習解放軍，我們一定要做模範，做好樣子。要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全體指戰員的頭腦，使我軍徹底革命化，使我軍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林彪又針對海軍工作說：“是非要搞清楚，應該團結起來，全力以赴，做好工作。”

9月24日，海軍黨委作出了《關於貫徹執行林副主席對黨委常委指示的決定》。

自1966年秋冬起，形形色色的群眾組織搞的亂揪亂鬥之風特別猖獗。海軍領導幹部和直屬各大部領導幹部、各院校領導幹部、各艦隊領導幹部，大多數均被揪鬥或圍攻，沒有被揪鬥的是少數，沒有被圍攻的恐怕更少。今天揪鬥這個，明天揪鬥那個，戴高帽，掛黑牌，翻穿棉大衣，搞得雞飛狗跳，烏煙瘴氣，形成人人自危的恐怖狀態。有的人跳樓自殺，有的坐而待斃。機關處於半癱瘓狀況（院校全部癱瘓），黨委開會也要躲起來，打游擊式的召開，不然你開會，他就衝會。業務會議召開更困難，工作的進行幾乎是聽天由命，自流發展。幸虧我們有一批幹部，一邊挨揪鬥，一邊仍堅持工作，揪鬥時應付揪鬥，不揪鬥時堅持工作。他們這種精神，真叫人敬佩！

軍以下單位規定不准搞“四大”，應進行正面教育。但在那種“造反有理，革命無罪”，全國大動亂的形勢影響下，什麼規定也不起多大作用，或采取實用主義態度，對他有利的就起作用，對他不利的不起作用。

由于沒有辦法對開展“四大”實施强有力的領導，派性鬥爭

也惡性膨脹起來了，封自己是造反派，罵別人是保皇派。當時海軍領導機關基本上分為三派：反對李、王、張支持蘇振華派，這是主流，支持李、王、張這是支流。還有所謂觀潮派或稱“逍遙派”，這是極少數。一個大派之內又有許多小派。什麼紅聯總造反派，紅色艦隊造反派，井岡山造反派，毛澤東思想戰鬥隊，單獨一人也能成立一個組織，號稱“獨立團”，如此等等，數不勝數。除了派性結合之外，誰也管不了，各級黨委的話根本無人聽。

當時我們曾多次請示總政：“黨委能不能領導群眾組織？”答復的精神是：如果黨委是按照毛澤東思想辦事，是按照文革十六條辦事，群眾組織應該接受黨委領導；如果黨委不按毛澤東思想辦事，不按文革十六條辦事，甚至壓制群眾，不依靠群眾，那就不應該接受黨委領導，並且應該允許造反。所以黨委能不能領導群眾組織，要由造反的群眾組織來鑒別。

由于軍隊是隨時準備打仗的，因此軍事行政和軍事業務工作，必須堅持上下級的領導關係，同時規定任何造反群眾組織，絕對不允許衝擊作戰部門，破壞戰備工作。在海軍領導機關的“四大”剛剛開始後不久，海軍黨委根據軍委要求，就及時下发了《關於師以下部隊在“文化大革命”中切實搞好正面教育，加強戰備的指示》。指示強調，遵照黨中央、軍委和總政關於部隊要參加“文化大革命”，同時要保衛“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海軍黨委決定，師以下部隊堅持正面教育。當時，戰備值班部隊基本上是遵照這個精神執行的，但遇到的困難也是無窮無盡的，千千萬萬的。

二、軍隊院校 造反派衝擊海軍機關

1966年10月5日，總政向各軍區發出《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開展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指示說，軍隊院校文化大革命運動，

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樣，完全按照十六條規定，充分發揚民主，實行“四大”。凡被院校黨委或工作組打成的所謂“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應宣布一律無效，予以平反，當眾恢復名譽。取消不在軍種兵種院校範圍外和地方院校串聯的規定。等等。

中共中央對這個文件批語說：“完全同意軍委總政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中央認為這個文件很重要，對於全國縣以上大中學校適用”。

這個《緊急指示》發出後，軍隊院校一哄而起，完全脫離黨的領導，學員們像野馬一樣到處串聯，大批大批地涌進北京，衝擊各總部，衝擊各軍兵種領導機關。

1966年11月初，張家口電訊工程學院六百餘人乘總參、總政亂轟轟的局面，衝擊國防部大樓。當時用一個警衛連的兵力阻攔，未擋住。又增調了一個營的兵力進行阻攔。見此情況，很多指戰員敢怒不敢言。

海軍院校的所謂造反派，大批涌進海軍大院與機關造反派合成一股，衝擊領導機關，其主要矛頭又是對准李、王、張。於是，今天這個院校把我揪去批鬥，明天那個院校把我揪去批鬥。有幾次圍攻批鬥我的時間長達幾十個小時，有時是通宵達旦，有時是從早到晚，造反派不讓我吃飯、不讓喝水、不讓抽煙，甚至不讓上廁所。

有時蕭、蘇知道後，也來給我解圍，差不多每次都是他們一來，圍鬥的造反派就鼓掌歡迎，他們略微講幾句話，就把我解圍了。當時蕭、蘇說話還是很靈的。也有些造反派組織圍攻批鬥蕭、蘇二人，在此種情況下，凡是我能做到的，也總是盡力設法支援他們。

有一次院校造反派在海軍禮堂開批鬥蘇振華的群眾大會，同時把我和張秀川拉去陪鬥。碰巧那天蘇振華重病，不能起床，這樣他們就決定背靠背的批鬥。一邊高呼口號。當呼“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之類口號，我都舉手跟着喊，當

呼“揪出蘇振華，打倒蘇振華”之類口號，我既不跟着喊，也不舉手。我越不跟着喊，不跟着舉手，他們就越連續高呼，我一直堅持不喊不舉手。這樣他們就停止批判，把我拉到批鬥臺中央，怒責我為什麼不喊口號不舉手。我說：“把蘇振華當成人民內部矛盾批判我贊成，當成敵我矛盾打倒我不贊成。”因此，他們就把我使勁一推，並說：“滾下臺去！”我走下臺後，就退出了會場，以表示對他們行動的抗議。又有一次院校造反派把蕭勁光揪走了，當時既不知道哪個院校揪走了，也不知道揪到什麼地方去了。後來接到蕭勁光親自從天津某旅社給我打來電話說，他被海軍工程學院造反派揪到天津來了。我立即找到那個造反派組織的頭頭戴濤，把林彪對蕭勁光的三條評價告訴他們，同時要求他們立即把蕭接回北京，否則我要去報告林彪。他們答應派第二號頭頭到天津去把蕭接回來，結果第二天就接回來了。

1966年11月，全軍文革領導小組看到軍事院校造反派在北京橫衝直闖，搞得領導機關無法工作，因此決定於11月13日和27日，在工人體育場兩次召開十萬人大會，所有到北京造反的軍事院校造反派全部參加。會議由蕭華主持，葉劍英、陳毅、徐向前講話，在葉、陳講話中，對軍事院校造反派亂衝亂揪提出嚴肅批評，有的批評甚至相當尖銳，例如衝擊國防部，衝擊中南海就是反革命行為等等。由此類推，衝擊各總部、各軍兵種領導機關，也是反革命行為。

陳毅在11月13日大會上講話說：人民解放軍是七億人民的偉大的模範，是一支革命化的部隊，是一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部隊，是一支有高度政策水平的部隊，是一支能吃苦耐勞，不怕苦不怕死的部隊。……我們七億人口的中國，主要依靠的就是人民解放軍，其他可以亂，我們人民解放軍不能亂。……你們學生衝國防部，我堅決不同意。

葉劍英講話說：我們軍隊院校師生近幾年來大學毛主席著作，思想水平有很大提高。方映字讀書社區。但又看到有一小撮人……成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他們占着領導崗位，如

果不把他們揪出來，就要改變顏色，我們必須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你們回去後，要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牛鬼蛇神、反動權威、反動教員批倒、批臭。

11月27日，陳毅接見軍事院校師生大會上的講話就更加激動，他說：“我上次講了話，大家有意見，要揪出來批判，什麼罪魁禍首，什麼最後通牒，看起來很嚇人，但沒有打中要害，真正的黑幫沒有門，資產階級當權派沒有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沒有門，而鬥的是那些一般缺點錯誤的人。現在資產階級當權派，坐山觀虎鬥。你們搞擴大化、簡單化，你們這樣凶，這樣厲害，如果你們不改，我們交班也不交給你們。交給你們，我們不放心。”

葉劍英的講話就更加尖銳、更加嚴格，他說：“我們院校同志絕大部分是革命的、戰鬥的。可是也有小部分敗壞了我軍的光榮傳統。像這些人，如果我們不把你們當成一個反面教員，來教育廣大同志，我們不算是一個共產黨員，就不是一個解放軍幹部。……你們這一小撮人再不改，就會變成廢品，就會不能用，是要處理的，是要清洗的。再也沒有比衝最高統帥部、衝國防部、衝中南海更大的錯誤了，嚴格講起來，這就是反革命。”

老師們在大會上的講話引起軍事院校造反派普遍不滿，很快就將矛頭對準葉劍英、陳毅，到處貼大字報，刷大標語，進行炮轟、火燒。說他們是軍隊劉鄧反動路線的代表，非作公開檢討不行，否則要揪鬥。

周總理見此情勢，不得不親自出面，召集軍事院校和軍隊文藝單位代表開會進行解釋，總理說：“幾位老師都不是軍隊劉、鄧反動路線的代表，他們是反對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是反對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是堅決擁護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你們矛頭指向他們是不恰當、不符合實際的，他們在11月的兩次講話，是屬於說錯話，做錯事的性質”。

12月31日，葉劍英在八千人大會上被迫做了檢討，承認講話是犯了“壓制軍事院校造反派”的錯誤。陳毅也準備做檢討。

這樣才把這場風波逐漸平靜下來。

當時中央文革確認這場風波是總政副主任劉志堅“搞的鬼”，把幾位老師推到了第一線。劉志堅是中央文革副組長兼全軍文革組長，中央文革說他既未請示中央軍委，又未請示中央文革，擅自主張召開軍事院校十萬人大會，他向幾位老師提供了不正確的情況匯報，給幾位老師起草了不正確的講話要點。大會之後，他又想借軍委名義，下發幾位老師的講話稿。

由這個“錯誤”為導火起點，進而“揭發”劉志堅其他許多錯誤，因此中央文革決定把他當成軍隊劉、鄧反動路線的代表，交給群眾揪鬥。並決定改組全軍文革小組。

1967年1月4日，江青在接見軍隊部分院校和軍隊文藝造反派時，當眾宣布：“在軍隊內部貫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就是劉志堅為首的全軍文革小組，它既不向軍委請示，也不向中央文革小組請示，自作主張，不執行文化大革命的路線。”在江青策劃下，造反派迅速行動，1月5日，全軍文革小組被封，劉志堅被揪走。

1967年1月11日，經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改組了全軍文革領導小組，撤消了劉志堅的組長職務，成立了新的全軍文革領導小組。由徐向前擔任文革組長，江青擔任全軍文革顧問，領導小組歸軍委直接領導。

江青插手全軍文革後，借劉志堅問題，順藤摸瓜，追查所謂後臺，又一手製造了“蕭華事件”。

江青說，劉志堅的舊全軍文革是歸總政領導的，因此蕭華對劉志堅的錯誤“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又說：“劉志堅所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少是經過蕭華批准同意的。”等等。中央文革決定要對蕭華進行批判。

1967年1月中旬，經林彪同意，葉劍英在京西賓館主持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會議斷斷續續開了兩個多月。會議的主題，一是軍隊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穩定部隊，最大限度的減少地方造反派對部隊的衝擊。

會議初期，陳伯達、方块字读书社区等中央文革那一幫人，都盛氣凌人地參加了會議。他們不但在“軍隊如何開展文化大革

命”和“如何穩定部隊”方面與葉劍英等老師的意見針鋒相對，而且還揪住蕭華的所謂問題不放。

一天下午，江青在會議上大發洋脾氣，拍着桌子說，軍隊的運動沒有發動起來，總政對運動領導不力，“蕭華是資產階級政客”，硬逼蕭華當晚到中央文革召開的十萬人大會上去作檢討，其實就是要將蕭華交群眾揪鬥。葉劍英對此非常生氣，當即離席，去向毛主席請示。

當晚，蕭華住在葉帥家裏，暫時躲過一劫，但他的家被抄了，不少重要文件被抄走了。

第二天上午一開會，葉帥就向會議傳達了毛主席指示：“蕭華是好人，不同意江青的做法。”同時葉帥還宣布擴大會議的所有發言稿，不論是自己發言內容或記錄別人發言內容的筆記本，一律當場銷毀，並要絕對保密，不准外傳。

事後不久，中央文革一伙人說，現已查明，蕭華被抄家一事，是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泄的密，他把會議批蕭華的情況告訴了軍區文工團，因此文工團就星夜去揪鬥蕭華（沒有揪到人）和抄家。這樣蕭華被抄家一事被轉嫁給了楊勇，楊勇也闖下了滅頂大禍。中央文革小組搖身一變，決定把楊勇交給群眾揪鬥，還加了什麼“彭、黃漏網分子”之類許多罪名。

中央文革和江青一伙，就是這樣以各種各樣莫須有的罪名陷害打擊高級幹部，當年的英勇戰將、如今坐鎮一方的高級幹部，常常就莫名其妙地被打倒了。

此時，海軍直屬機關“紅流”等造反組織，積極串聯海軍院校造反派組織，在“炮轟”、“火燒”李、王、張一陣後，也開始策劃要把李、王、張揪出來戴高帽，掛黑牌子游街，並召開大會狠批狠鬥。

我得悉後，很快到楊成武家裏去，把情況報告了他，恰巧林彪來電話說，林彪有事找楊成武去，我即請楊把海軍情況順便向林彪報告。林彪聽完方塊字讀書社區，決定海軍向下傳達他在1966年8月13日作的關於海軍“李、王、張”的評價（既“李作鵬、

王宏坤、張秀川同志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是擁護毛主席的，是突出政治的，是有幹勁的，對海軍工作轉變做了很多工作，反羅瑞卿是有功的。”）。並要楊成武立即到毛主席那裏去請示，看看毛主席有什麼指示。毛主席當即同意傳達林彪對李、王、張的評價。毛主席還指示楊成武，由蕭勁光親自向海軍機關幹部傳達。

1967年1月9日，海軍機關在西苑旅社禮堂召開了十七級以上幹部會議，由蕭勁光以受毛主席、林彪、周恩來委托的名義，傳達了林彪的指示。1月16日，海軍黨委下發文件，將林彪指示轉發海軍各院校、海直各大部，並要求傳達到師以上單位的黨員幹部。這樣海軍機關和院校造反組織矛頭指向李、王、張的情況才稍有緩和。

三、軍委決定揪鬥蘇振華

1967年1月17日晚，在人民大會堂江蘇廳召開軍委常委擴大會議。有四位老帥（林彪、徐向前、葉劍英、陳毅）出席，各總部、各軍兵種負責幹部均參加。海軍蕭勁光、王宏坤和我三人參加。會議兩個議程：1、聽取和批准蕭華在文革中所犯錯誤的檢討。2、討論把蘇振華交群眾揪鬥的決定，其罪名是“彭、黃漏網分子、‘三反分子’、貫徹執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代表人物”。

徐向前代表軍委和全軍文革在會上了講話，他說：“當前文化大革命形勢很好，要繼續發動群眾，把運動搞深、搞透。今天院校的學員要開大會，要打倒蘇振華，打倒杜義德。海軍問題主要是蘇振華問題，蘇振華是堅決貫徹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是劉鄧、賀龍安在海軍的釘子，這個人不能保。海軍黨委擴大會議期間，不是肅清羅瑞卿的影響，而是把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置於死地。要把蘇振華鬥倒，鬥垮。蘇振華是賀龍政變的主要人物，班子都配好了，賀龍給蘇振華許的願，當軍委秘書長，許

光達當總參謀長。”

散會後，軍委文革派人（其中有軍委文革成員王宏坤）去向造反派群眾組織宣布軍委的決定，當晚造反派就把蘇振華揪走了。

第二天，即1月18日，海軍黨委召開174次常委會議，會議由蕭勁光主持。會上傳達和討論了軍委和全軍文革關於蘇振華問題的決定，在軍委決定的基礎上，會議統一了“蘇振華是海軍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軍事路線的代表”的認識。會議還認為，跟隨蘇振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軍事路線的骨幹分子是極少數，要縮小打擊面，擴大教育面，不能把鬥爭面搞寬了。會議還決定，絕不允許借批判搞武鬥，絕不允許搞打、砸、搶，絕不允許衝擊領導機關等。會議要求各級黨委不僅要把握好運動的大方向，正確對待群眾運動，還要把握好黨的政策，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常委會議的這些意見，均寫入了會議記要。

在討論海軍黨委常委今後的工作時，蕭勁光提出自己身體不好，希望不再主持常委工作，他提議由我主持常委工作。常委們一致同意，我也接受了這個任務。會議同時決定改組海軍文革領導小組：蕭勁光任組長，我任常務副組長，王宏坤任副組長，張秀川任辦公室主任。

順便說句後話，在“九·一三”事件之後，海軍把“一·一八”這一天（即1月18日海軍黨委174次常委會議）說成是“李、王、張”或者我李某人奪取海軍領導權的日子，把“一·一八”海軍黨委常委會議紀要說成是李、王、張奪權的鐵證文件。

我想說的是，第一、在當時文革大動亂的背景下，誰主持工作，誰就可能成為被造反派批判、被揪鬥的對象，成為造反派衝擊的“資產階級當權派”。除了毛、林以外，哪個敢說自己不會被揪鬥？不會被打倒？當沒有人願意承擔這個風險時，海軍工作也不能沒人管時，我擔起了這份責任。第二、蕭勁光提議由我主持常委工作，大家一致同意，我服從大家意見，這完全是堅持黨內民主集中制原則的正常做法。如果這也算是奪權，那蕭勁光的提

議，其他常委一致同意，又算是什麼呢？第三、當時，黨內職務我仍是海軍黨委副書記（葉劍英在1966年8月17日口頭所講“增補李作鵬為海軍黨委第三書記”，實際中央和軍委之後並沒有正式下文件），軍內職務我仍是海軍副司令員，而海軍的黨政一把手、文革領導小組的組長還是蕭勁光，“奪權”從何而來？

傳達了林彪對李、王、張的評價和軍委關於蘇振華問題的決定後，海軍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形勢發生了顯著變化。原來支持李、王、張的，當然興高采烈，覺得長期受壓，終於翻了身；原來觀潮派基本上轉向支持李、王、張；原來支持蘇振華的則發生了分裂，多數轉為觀潮派，部分轉為支持李、王、張。這樣凡支持李、王、張的就聯合起來，在機關中形成了占有較大優勢的機關群眾組織——“紅聯總”，由這個群眾組織按照全軍文革要求，組織進行了對蘇振華及那些擁護、緊跟蘇振華的骨幹分子的批鬥。但是海政“紅流”、海航“紅司”和文工團“思想隊”等群眾組織依然不聽海軍黨委的勸阻，曾參加衝擊國防部，衝擊海軍機關，並大搞打、砸、搶。雖然在機關中他們已是少數，但他們與院校造反派聯合在一起，造反的能力也不小。

當時聚集在海軍大院的院校造反派組織，在批判大會上搞武鬥，我是堅決反對的，因為這嚴重違反了海軍黨委常委“一·一八”會議的精神。

記得有一次，海軍各院校造反派組織，聯合在海軍大院廣場召開批鬥蘇振華等人的大會，我混在批鬥臺側面一個角落裏觀看。當時情景比農民鬥地主惡霸還利害。首先將蘇振華推倒在地，踏上一隻腳，再拉起來，向毛主席畫像下跪認罪，又拖起來向正面的造反派下跪認罪，再拖起來向兩側群眾下跪認罪，最後就是長時間的“噴氣式”。

我看了後，覺得這樣的殘酷批鬥會把人整死。因此我反復考慮，最後下決心將蘇振華保護起來。當天就派人，以海軍黨委的名義，把蘇振華從造反派群眾手裏要了出來，然後交給海政保衛部，負責把他秘密藏在北京以外的地方。經過多次與造反派搶

奪和反搶奪，東藏藏，西躲躲，終於保住了蘇振華，沒有被造反派再次搶走。形勢稍微穩定後，將他疏散到湘南海軍一個機場內隱蔽居住，生活上也給予適當照顧，救了他一條老命。

當時中央把他列在“彭、黃”專案組內進行審查。

四、對李、王、張的 衝擊圍鬥仍未停止

雖然海軍領導機關文革形勢有了變化，但海軍某院校有個“鎮虎口戰鬥隊”和海軍機關的“紅流”、“紅司”、“毛澤東思想戰鬥隊”等造反組織聯合在一起，對李、王、張的衝擊圍鬥仍未停止。

1月18日海軍黨委常委會議後，我們堅決不承認他們是“革命組織”，堅決不承認他們的打、砸、搶行為是“革命行動”，因此他們就宣布：海軍黨委執行的是“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一八”會議“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產物”，“一·一八”會議記要中所講“不能把鬥爭面搞寬了”是“劃框框，定調子，是保護蘇振華的狐群狗黨”。他們連續給海軍黨委貼出三張《公開信》的大字報，說海軍黨委“至今還抱着一條又粗又黑，又深又長的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李、王、張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嗎？我們的回答：不是。”

2月3日，他們一百多人突然包圍和占領了王宏坤的家，切斷了王家與外界的一切聯系，讓王宏坤站在雪地裏幾個小時回答問題，說是“與王宏坤對話”，實際是圍鬥王宏坤。我知道情況後，立即給林彪打電話請示，林指示先讓王到京西賓館避一避，我又把他的老婆孩子接到我家裏避難。但造反派仍不撤離王家，並揚言：“要與海軍黨委對話，不對話堅決不撤離”。我曾親自動員“鎮虎口戰鬥隊”先撤出王宏坤家，但與黨委對話，但他們根本不聽。

方块字读书社区

他們已占領王家二十餘天，我祇好以海軍黨委名義，把“鎮虎口戰鬥隊”占領王宏坤住宅及其活動情況報告了全軍文革，並建議將這伙人全部逮捕。全軍文革很快就批准了逮捕的建議。但為了做到仁至義盡，我請蕭勁光出面最後一次做工作，或下命令要他們撤出去，如果再不撤出，就布置捕人。經過蕭勁光出面做工作，結果甚好，第二天就撤走了。

當時，我也仍然受到衝擊圍鬥。北海艦隊機關造反派要來北京海軍領導機關造反，並圍攻北海艦隊副司令員潘焱，要他派飛機送他們來北京。潘焱請示我怎麼辦？我的答復是：第一不同意他們來北京，上級早有規定，艦隊機關不准大串聯。第二不同意派飛機送他們。這伙所謂造反派，聽到我的答復後很不滿，很生氣，改坐火車跑到北京，衝進海軍大院，大吵大鬧，並把我揪去圍鬥。從下午到半夜仍不放我，既不准吸煙，也不准吃飯，甚至連水也不准喝。我的老伴得知此情況，給葉群打了個電話，請她轉告林彪，林彪立即要葉群給我打電話稱：有緊要事情要我去接受任務。我向那伙造反派宣布了林彪電話內容，這樣才把我放走。

到了林彪家，林彪問我：“怎麼樣？”

我說：“真他媽的胡鬧，首先要我背毛主席語錄，背不出來就說我不學毛著，不學毛著就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主席就應該打倒。”

林彪聽後苦笑一下說：“你暫時避開一下，讓他們鬧去。”並要葉群把我安置到京西賓館。

1967年1月，在軍委擴大會議期間，林彪曾講話指出：葉劍英犯了一個錯誤，在處理海軍問題上，他支持非左派，打擊左派。海軍過去以軍訓為重點，轉為以政治為重點；以非高舉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轉為高舉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官僚主義作風轉為非官僚主義作風。海軍這幾年工作成績是不能抹煞的。李、王、張被扣上“奪權”帽子，扣上“地下活動”帽子，是不公道的。

當然我知道，林彪與葉劍英除爭奪軍委“三·三”會議和海軍黨委擴大會議的問題上有分歧外，林彪對葉帥還是非常支持

和信任的。

五、《中央軍委命令》 和“三支兩軍”

1967年1月21日，毛澤東對林彪指示：“林彪同志：應派解放軍支持左派廣大群眾。以後，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應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應重新發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廢。請酌。”毛澤東的指示，實際上是對林彪的批評，因為林彪在軍委擴大會議召開之前，確定了穩定部隊的重要原則，就是規定部隊不允許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運動。

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發布《關於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從此軍隊開始正式介入地方文革，擔負起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的“三支兩軍”任務。

1967年1月28日，毛主席批准了中央軍委對部隊文化大革命的《中央軍委命令》（即軍委“八條命令”）。

“八條命令”首先指出：“必須堅決支持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爭取和團結大多數，堅決反對右派，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採取專政措施。”

“八條命令”要求：“一切指戰員、政治工作人員、勤務、醫療、科研機要工作人，必須堅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要抓革命、促戰備、促工作、促生產。”

特別重要的是第三條，“嚴格區別兩類矛盾。不允許用對待敵人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允許無命令自由抓人，不許任意抄家、封門，不允許體罰和變相體罰，例如：戴高帽，掛黑牌，游街，罰跪等等。認真提倡文鬥，堅決反對武鬥。”

“八條命令”還要求方块字读书社区的院校師生、文藝團體、體工隊、醫院和軍事工廠的職工等，應迅速返回本地區、本

單位進行鬥批改，……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對於衝擊軍事領導機關，“八條命令”規定：“對於衝擊軍事領導機關問題，要分別對待。過去是反革命衝擊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衝擊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後則一律不許衝擊。”

“軍隊內戰備系統和保密系統，不准衝擊，不准串聯。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檔案和技術資料，一概不准索取和搶劫。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資料暫時封存，聽候處理。”

“八條命令”明確劃分：“軍以上機關應按規定分期分批進行文化大革命。軍、師、團、營、連和軍委指定的特殊單位，堅持採取正面教育的方針，以利于加強戰備，保衛祖國，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據我所知，此項命令是林彪親自口授的。

《中央軍委命令》，對當時穩定部隊，遏制地方衝擊部隊，特別是遏制軍事院校造反派衝擊軍隊領導機關和軍隊要害部門，起到了非常大的關鍵作用。

1月29日，葉劍英向軍委擴大會議傳達“八條命令”。關鋒也參加了這個會。葉帥在傳達講話中，既興奮又惱怒，說到最後一句話時落地有聲：“誰想把部隊搞亂，絕不會有好下場！”話語剛落，揮手“啪”的一聲，重重地猛力把桌子一拍，致使右手掌邊端骨折。關鋒就坐在葉帥旁邊，聽後一驚，立即叫喊：“你這是幹什麼？你向誰拍桌子？”尚未等葉帥回話，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立即站起來高呼：“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解放軍萬歲！”我們參加會議的人，都情緒激動地跟着高呼口號。然後散會。

害群之馬江青首先反對軍委八條命令，批評解放軍壓制了造反派的革命行動。

《中央軍委命令》公布後，海軍黨委立即組織傳達、貫徹。并大張旗鼓、家喻戶曉地宣傳《軍委命令》。因為《軍委命令》的精神與海軍“一·一八”會議記要精神是一致的，并更有權威性。

《軍委命令》對當時穩定海軍領導機關被衝擊的被動局面和穩定部隊起到重要的作用。有了《軍委命令》我們海軍黨委處理問

方块字读书社区

題腰杆更硬，說話更有底氣。

海軍的三支、兩軍工作，是經海軍黨委研究後，報全軍文革批准。從1967年3月開始，陸續抽調了數萬名幹部、戰士投入到三支、兩軍工作中。主要是以遼寧、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沿海省份的工廠、學校、黨政機關為主。當時東海艦隊和南海艦隊的情況比較穩定，沒有出什麼大的亂子。祇有北海艦隊面臨遼寧、山東、江蘇的情況比較複雜，其中山東地區、旅順地區、蘇北徐州、連雲港地區的問題最多、最複雜。

當時，山東有個王效禹，參加山東造反群眾戰鬥隊，很快就成為山東“造反英雄”。以王效禹一派為主，打倒省委書記譚啓龍，奪取了領導權，于2月3日成立山東省革委會，自任革委會主任。在王效禹的支持下，青島機車車輛廠造反派頭頭楊葆華，也打倒了市委書記張敬濤，奪取了青島市領導權。并很快組織“棒棒隊”（即每個造反派發一根棍棒），王效禹、楊葆華掌權後，不僅與不同觀點的地方群眾組織進行大規模的流血武鬥，而且是山東地區反軍亂軍的總頭目。

北海艦隊和駐蘇北徐州、連雲港地區的68軍在支左的問題上明確表態：既不支持山東的王效禹一派，也不支持青島的楊葆華一派。

因此，王效禹、楊葆華視北海艦隊為眼中釘，肉中刺，他們與駐青的政治學校、潛艇學校、401醫院護校等海軍院校相同觀點的造反派聯合在一起，衝擊艦隊指揮機關，衝擊戰備值勤部隊，打傷我多名值勤官兵。反軍、亂軍的氣焰十分囂張。

中央指定康生負責解決山東問題，但他“拉偏架”，表面上是各打五十大板，實際上是支持王效禹、楊葆華一派，使山東地區的問題長期得不到徹底解決。

六、我與賀龍不熟悉

我與賀龍很不熟悉，沒有什麼來往。國慶十周年時（1959年），他在民族飯店請兩桌客，專吃羊肉，不知怎麼也把我拉去了，我才第一次同賀龍說話閑談。

文革前，林彪養病，賀龍主持軍委工作。當時我參加羅瑞卿主持召開的軍委辦公會，有時賀也出席會議，做總結時講講話。

當時我感覺，賀龍對羅瑞卿的工作是很支持的。1964年底，林彪對全軍大比武“衝擊了政治”提出了批評，軍委辦公會議上，羅瑞卿提出了不同意見，并按“軍事、政治應該並重”，對林彪的批評進行了修改。會上，賀龍認為“修改比不修改好”。

文革初期的“王（尚榮）、雷（英夫）”事件時，到國防部大樓看了林辦、賀辦兩張觀點對立的大字報之後，我對賀龍問題才開始引起注意。以後通過正式或非正式的消息，逐漸得知賀龍在空軍要打倒吳法憲，準備由二方面軍幹部成鈞任司令員。還要提許光達為總參謀長。賀龍在體委鬧“獨立王國”，及賀龍在南昌暴動時曾經“叛變”，又說賀龍陰謀“政變”，又說賀龍是手槍不離身，羅瑞卿的後臺是賀龍等等。上述這些說法，情況是否屬實，我心裏沒有多大把握。

1966年深秋的一天，軍委辦公廳通知各總部、各軍兵種負責人到京西賓館集合，有什麼事情也沒有說。大家到齊後，由楊成武、蕭華帶領，隨即乘大轎車到西山葉帥家裏，在葉帥家會議室內擺了不少揭發賀龍的材料。葉帥當時說，這次看賀龍材料是根據毛主席“在小範圍內打招呼”的指示而進行的，並要大家看材料。

因為人多材料份數有限，每人拿一份，就差不多拿完了。看完一份之後，要互相交換看。我也看了幾份，多屬一般性問題，沒有看到明顯的敵我性質的材料。估計誰也沒有全部看完，就已到吃飯

時間了，這次“看材料”就結束了。

返回車內閑談中，有人說看到了很重要的敵我性質材料，究竟什麼問題沒有深談。當時我就感到，可能中央很快就要公開揭發批判賀龍了。但之後我一直沒有聽說和參加中央及軍委批判賀龍的會議。

不久，大街上出現“打倒賀龍”的大標語。以後又聽說，是江青最積極要把賀龍揪出來。周總理親自把賀龍身上的手槍繳下來。經中央批准，把賀龍軟禁在西山中央防空洞門口的一座房子裏。實際上就是被打倒了。由于賀龍出了問題，又必然要株連原賀龍部下的一批高級幹部。例如許光達、廖漢生、黃新廷、譚友林等等，均先後被打倒，被關押。

關於江青提出“揪鬥賀龍”問題，據說是1966年秋，毛主席主持一次中央會議，主要討論由解放軍派幹部進入學校“實行軍訓”，對學生進行加強組織性、紀律性的教育。就在這次會議上，江青提出要“把賀龍揪出來”。并說她“有大批材料，非常確鑿的，賀龍是個大壞蛋，要搞軍事政變。把賀龍端出來，你們不敢動他，我什麼也不怕，他老婆也不是好人。”毛主席稍微思考一下說：“此事現在不議。”但江青不依，面向主席發瘋似的說：“毛主席，你不讓群眾起來，我要造你的反。”毛主席果斷地宣布：“散會！”離席而去。江青放聲哭起來，陳伯達走到江青面前，勸她說：“太悲要傷心的，制怒，制怒，你也太過了一點。”結果江青站起來又同陳伯達吵起來了。

第三十二章 天翻地覆 (之二)

一、海軍仍處于 兵慌馬亂的大動蕩中

軍委文革決定揪出蘇振華之後，海軍仍處于兵慌馬亂、軍心不穩的大動蕩狀態中，一是多數院校領導全部癱瘓，院校造反派並不是什麼真正奪權，而祇是將幹部揪鬥打倒，將大印大章搶到手。由于派性爭權奪利惡性發展，誰也聯合不起來，誰也組成不了新的領導權力機構，誰也不服從誰的招呼。因此踢開黨委，搗毀和破壞黨的權力機關之後，長期處于各自為政、獨立王國的無政府狀態。割據和占山為王的狀態，把院校破壞得不像樣子。二是各艦隊領導機關也仍處于硝烟彌漫、混亂不堪的狀況。北海艦隊是打倒盧（仁燦）、潘（焱），東海艦隊是“窮追叛徒陶勇的狐群狗黨”，南海艦隊是揪鬥“吸血鬼”方正平為首的一小撮。加上家神野鬼，互相勾結，軍隊和地方派性鬥爭結合，形成軍隊內部派性鬥爭日益泛濫膨脹，嚴重的影響戰備工作。

中央早已規定，就地鬧革命，停止串聯，各地已經外出串聯的應當立即返回原單位。但各地來北京請願告狀和隱蔽串聯的仍經常有數十萬人。而海軍所屬單位來北京海軍大院串聯的也是經常一批又一批的絡繹不斷。

1967年2月的衝擊海軍報社事件（又稱“黃樓¹事件”），就是

方块字读书社区

注1、黃樓：海軍直屬機關辦公大樓，因外牆面為黃色而得名

由海軍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聯合其他院校造反派組織，非法查封海軍報社引起的。

當時，院校造反派組織查封報社的主要理由是：《人民海軍報》在過去的幾年中，刊登過不突出政治、不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文章，而登載了軍事大比武等單純軍事觀點的文章，是宣傳資產階級軍事路線。

造反派頭頭，在查封報社前先徵求蕭勁光的意見，蕭答復：“必須得到海軍黨委的同意。”以後又徵求我的意見，我說：“如果你們掌握的材料充分、確實，就交給海軍黨委，經我們調查後，如《人民海軍報》確有方向錯誤，由海軍黨委決定是否查封。”我又說：“你們應做貫徹執行軍委八條命令的模範，不要做違反軍委八條命令的事情。”我還說：“你們要相信海軍機關的廣大群眾，你們應按軍委八條命令的要求，停止在北京的串聯，盡快返回原單位。”

我們的意見非常明確，第一，報社的問題應由海軍黨委解決；第二，不能用衝擊的辦法查封海軍報社。衝擊報社就是衝擊海軍領導機關。這與軍委八條命令精神是相違背的。

但是他們根本不聽我們的勸告，也不顧黃樓警衛的阻攔，2月16日晚10時左右，一百多人高呼着“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口號，浩浩蕩蕩，旌旗招展的衝進海軍領導機關辦公大樓，直奔第五層樓，不僅查封了報社的編輯辦公室，而且在辦公樓的樓道內靜坐示威，在牆上胡亂寫大標語。

而其對立面組織“紅流”則組織人馬，把查封海軍報社的院校造反派重重圍困在辦公樓的樓道裏，水泄不透，搞得辦公樓內烏煙瘴氣，雙方情緒激動，武鬥一觸即發。

作為海軍領導機關辦公地，海軍主要領導人的辦公室和作戰指揮室、保密機要室等要害部門都在黃樓內。

事情發生的非常突然。當晚我知道情況後，立即通知海軍的主要領導同志到我家開緊急會議（當時已無法在辦公室開會了），研究解決辦法。17日凌晨，我們以海軍黨委的名義做了四條

決定：一、雙方不允許武鬥；二、雙方立即撤離現場；三、雙方有什麼不同意見，提交海軍黨委處理；四、凡是報社的文件、材料一律就地查封，任何一方不准將材料帶離現場。責成海軍文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到現場傳達海軍黨委的決定。

第二天，雖然現場沒有發生武鬥，但雙方也無撤離現場的跡象。當時又出現了新的情況，外圍的“紅流”派不准給參加查封報社的院校學員們送飯送水。黨委當時研究，不論哪一派，都必須遵守“軍委八條”的規定，不准衝擊軍事機關。我曾親自到各層樓道做說服工作，毫無效果。

要想撤出查封報社的院校造反派，必須要圍困的“紅流”組織讓出通道。21日，以海軍黨委的名義，下達命令，命令指出：爲了維護中央軍委八條命令和軍委2月8日通知的尊嚴，命令你們參加圍困的戰鬥隊組織立即撤離現場，否則海工“紅色造反團”等組織的同志不能按期和盡快返校的責任，由不執行命令的戰鬥隊組織的負責人承擔。

與此同時，我們與院校造反派代表談話，我們嚴肅地告訴他們，你們衝擊軍隊領導機關和要害部門，擅自查封海軍報社的行爲是極端錯誤的，是違背軍委八條命令的，如果你們不立即撤出辦公大樓，後果自負。

圍困行爲一直持續到24日。在海軍黨委強大壓力下，衝擊海軍報社的院校造反派和圍困他們的對立面組織，終於撤離了黃樓，

1967年2月份，在海軍大院内，先發生了部分院校造反組織非法占領王宏坤家，緊接着又發生院校造反派衝擊海軍機關辦公大樓。擅自查封海軍報社，而衝擊機關辦公大樓的性質更嚴重，情況更複雜。

我們海軍領導之所以能挺直腰杆，堅決地、果斷地連續處理“占領王宏坤家事件”和“衝擊海軍報社事件”，使海軍領導機關能夠相對穩定和堅持正常，方塊字讀書社區不久後的軍委八條命令，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廣大幹部和群眾擁護軍委八條命令，要求

機關和部隊穩定的願望是強烈的。

文化大革命就是這樣在我們無法控制，也無法擺脫的情況下進行着。這期間，有一件事情深深觸動了我，那就是沒有能夠從造反派手中搶救出國家海洋局局長齊勇。

自1966年冬開始，國務院系統的各委、部、局和地方院校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指使下，利用開展“四大”，煽動無政府主義思潮，到處奪權，到處打、砸、搶，對“資產階級當權派”抄家封門、揪鬥游街、私設公堂，逼供刑訊，武鬥成風。1967年1月，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就慘死在造反派的棍棒下。

我到海軍後，與齊勇不僅在工作上聯系十分緊密，而且私人關係也十分好。他任海洋局局長前，是南海艦隊主管海防工程建設的副司令員，是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每年我都要數次到南海艦隊所屬的福建、廣東、海南島等海防、空防前線去視察工程建設，齊勇是主要陪同者之一。我們一起爬山涉水，深入工地。齊勇抓戰備工程建設認真負責，年年超額完成工程計劃。幾年來，南海艦隊在機場、碼頭等重點項目的建設上，無論是數量、質量還是工程進度在全海軍都是名列前茅的。文革前不久，齊勇調國務院任國家海洋局局長。當時國家海洋局和第六機械工業部一樣，是國務院與海軍雙重管理，但以國務院為主。

大約是剛剛解決“黃樓事件”後不久，秘書轉給我一封群眾來信，信中說到：“齊勇被海洋局造反派抄了家，天天被挂着黑牌子、帶着高帽子游街。造反派拳打腳踢的批判他，人都快被打死了。救救他吧！”我一看這封信，遏止不住的怒氣一下子在心中湧起，這麼兢兢業業，埋頭工作的好幹部，調北京工作還不到兩年，也要被如此批鬥？簡直是豈有此理！

我立即讓秘書將海軍文革辦有關的負責同志找來，我對他們說：“你們立即與海洋局聯系，了解一下齊勇的情況，一定要找到齊勇的下落，立即向我報告。”我又與秘書說：“你每天都要與文革辦聯系，一有齊勇消息，”

方块字读书社区

第一天沒有消息，第二天仍沒有消息，我心急如焚。大概是

第三、第四天，海軍文革辦的同志向我報告，仍沒有找到齊勇的下落。他們告訴我，批鬥齊勇的主要是海洋局中的地方造反派，但也有海軍院校造反派參與。齊勇是什麼時候開始被批鬥、批鬥的具體情況、造反派把齊勇抓到什麼地方現在都不清楚。他們又說，據了解，來信中反映，批鬥中搞武鬥的情況是屬實的。

面對大批判中搞武鬥，我的態度非常明確，那就是不管被批判者問題多麼“嚴重”，不管是“三反分子”還是“狐群狗黨”，我都堅決反對搞武鬥，堅決反對搞人身傷害。

聽了文革辦的情況反映，我決定親自與海洋局各造反組織的頭頭談話，以盡早將齊勇保護起來。

很快，海軍文革辦就將海洋局各造反組織的頭頭召集到黃樓會議室。會上我說：“齊勇有錯誤可以批判。但海軍黨委的態度非常明確，堅決反對在大批判中搞武鬥。齊勇是海軍幹部，你們可以將齊勇的問題寫成材料，交海軍黨委處理，海軍黨委處理不了，我呈交周總理。”我說：“齊勇現在身體有病，需要盡快住院治療，你們要先放人治病，不然是要出人命的。”

這些造反組織的頭頭，根本不聽我的勸說，非讓我們承認他們批鬥齊勇是“革命行動”，齊勇是“頑固堅持反動立場，是罪該萬死”。

我拿出軍委八號命令，對他們嚴厲地說：“限令你們今天，必須交出齊勇，其他的問題以後再說。”

造反派頭頭說：“海軍黨委壓制了海洋局的運動，保護走資派，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們不僅要造齊勇的反，也要造海軍黨委的反。”他們說：“我們不執行軍委命令，也不執行你的命令。”他們圍着我，高呼“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的口號，會議現場一片混亂。

我又氣又急，當場犯了心臟病。門診部的醫護人員在會場搶救。

稍好後，醫護人員把我扶到病床上吸氧，一邊告訴秘書：“讓海軍文革辦起草一份有關海洋局齊勇情況的報

告，立即送周總理辦公室和全軍文革辦公室。”我當時想，現在祇有總理能把齊勇搶救出來了。

幾天後，我沒有等到救出齊勇的消息，等到的確是齊勇的噩耗。齊勇跳樓自殺的消息，是海洋局政委李長如打電話報告我的。在電話中我厲聲質問他：“為什麼齊勇被揪鬥情況你沒有及時報告？為什麼齊勇被造反派抓走的情況你沒有及時報告？為什麼你們黨委對齊勇不作任何保護？現在人死了你才報告，有個屁用！你們簡直是不負責任！”我把話筒狠狠地摔在辦公桌上。

爾後，秘書轉來齊勇愛人的一封信，我記得上面寫道：齊勇是個勇敢的戰士，他已經不在人間了……。

看到這裏，我當着秘書的面，黯然淚下。

1967年3月中旬，另一件棘手的事情又擺在了我們的面前。中央印發了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等六十一人“叛變自首問題”的調查報告。由此揪“六十一人叛徒集團”而引起的“揪叛徒”浪潮，波及全國，海軍自然不可能例外。有的造反派組織翻閱幹部歷史檔案，有的造反派組織到地方圖書館查閱歷史報紙、雜誌資料，有的到地方家鄉進行調查，有的到監獄提審歷史反革命索取口供。總之，不少造反派組織東奔西跑，無孔不入地尋找證據。一時各方面提供的所謂“叛徒”材料確實不少，經我過手處理的，概括有這樣幾種類型：

1、證據可靠，確有叛變行為。例如當年的共青團員登報公開申明脫團，或在戰鬥中被敵包圍，向敵人繳槍後釋放回來，或開始參加革命以後脫逃，並帶領敵人鎮壓過群眾等等。這類人由於隱瞞了歷史，有的已經成為高級幹部了。海軍也有此類性質的情況。但他們在長期革命戰爭中有過功勞。因此我們的政策是先給生活出路，待後再做政治結論。每人每月發給80—100元生活費，政治結論待後再說。

2、年幼無知，雖然打過白旗，但不屬於叛徒。在二十年代末期和三十年代初期，特別在“**方块字读书社区**”影響下，不少地方，蘇區與白區接壤地區“赤白對立”很嚴重，雙方群眾和地方武裝你打

過來，我打過去，形成拉鋸形式，甚至互相燒殺、搶糧、搶牛，群眾不堪其苦。爲了應付這種“赤白對立”鬥爭形勢，有時蘇區武裝越過邊沿打到白區去，白區群眾怕燒殺，就打着紅旗表示不對抗。有時白區地主武裝或封建會門，越過邊沿侵入到蘇區來，蘇區群眾怕燒殺也打着白旗表示不對抗。我們有的紅軍老幹部當時不過十幾歲，跟隨着群眾打過白旗，這算不算叛徒？我們認爲是年幼無知，以後又經過長期革命鬥爭考驗，爲黨爲人民立過功，不應算爲叛徒。海軍這種類型的若干名高級幹部，我們採取了慎重政策，結果平安無事。

3、爲了逃避敵人追捕，暫時跑到反動軍隊裏躲起來，或暫時把武器埋藏起來，停止了一段時間的革命活動，甚至參加了偽群眾組織，但沒有暴露自己身份，也沒有泄露黨的任何秘密，這算不算叛徒？我們認爲這是一種特殊情況，爲了保存黨的力量，是黨的原則所允許的，不是叛變行爲，不是叛徒。海軍某部部長就屬這類情況。他是山東黨早期地方黨員，敵人發現後通緝追捕，他就跑到國民黨軍隊裏當兵躲起來，既沒有暴露自己身份，也沒有泄露任何黨的秘密。當時某部有那麼一部分人，硬要將他當叛徒揪鬥打倒，海軍黨委不同意。但他們不服從黨委決定仍要揪鬥。所以我在某部的一份材料上寫了段批語，“堅決反對這股暗流，如果他們要與黨委較量，那我們就奉陪到底。”

4、同名不同人，經查實完全是誤會，根本不是叛徒。有的群眾組織，在敵人報紙上查出所謂海軍某政委在戰鬥中被俘，投降了敵人。又有的群眾組織，在敵人報紙上查出所謂海軍某副司令員是國民黨特務組織的成員。經過海政保衛部派人審核，完全證實是同名不同人的天大誤會。爲了慎重起見，我曾把調查某人的那份材料和結論，送呈周總理審閱，周總理看了後批示：“此材料應入檔保存，以免後代子孫再生誤會。”有的群眾組織揭發海政某主任也有歷史問題，經過認真調查并無其事，純系道聽途說，捕風捉影。

方块字读书社区

總之，“抓叛徒”這股惡潮，持續時間相當長，危害相當大。

1970年4月，爲了消除所謂“抓叛徒”運動遺留的惡果，盡早的解放被審查的幹部，海軍政治部發出《加強領導，落實政策，認真做好審查幹部政治歷史問題結論處理工作的指示》。主要精神是：一、做好結論的關鍵是“準”，要材料真實，根據充分，處理恰當。二、結論要突出重點，主要是審查幹部的政治歷史、政治思想。對過去重大歷史問題沒有做過結論和以前有結論，復查原結論不恰當的，必須做出新結論。三、審查問題要與本人見面核實。

這項工作使得受到審查衝擊的幹部甩掉了所謂“有歷史問題”的尾巴，可以大膽解放出來工作。

海政文工團是文革期間最早開展“四大”的單位之一，經過一場亂揪亂鬥的狂風暴雨之後，逐漸形成一個多數派群眾組織，名叫“紅色艦隊”。另一個以歌舞團部分青年組織的少數派，名叫“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揪出蘇振華之後，“紅色艦隊”傾向於支持李、王、張，而“毛澤東思想戰鬥隊”仍然炮轟李、王、張。

經過再三調查和考慮，我對文工團發表了三條意見：

1、海政文工團某團長的錯誤性質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不同意打倒，但也不宜繼續擔任團長工作，可另安排其他工作。文工團某政委的錯誤僅僅是工作上的缺點錯誤問題，因此更不同意打倒。

2、對幾個有才華的文藝幹部，如呂遠、呂文科等等，並沒有發現嚴重問題，我指示海政宣傳部、文化部應加以保護，他們可以參加演出和進行創作工作。

3、“紅色艦隊”組織不能有歧視和壓制“毛澤東思想戰鬥隊”的行爲，他們什麼時候願意聯合都應採取歡迎態度。他們不願意聯合不應強求，採取耐心等待態度。

這三條意見對穩定文工團的局面影響很大，雙方都不反對，並大體上按照這三條執行了。

二、青海流血事件與 軍委“十條命令”

1967年2月23日，青海西寧發生了開槍鎮壓群眾組織的流血事件。這是解放軍在支左中造成的一次重大慘案，打死打傷紅衛兵三百餘人，逮捕萬人以上。

我所知道的事件經過是：西寧當時紅衛兵有兩個觀點對立的群眾組織，一個名叫“八·一八”造反派，一個名叫“捍衛”造反派。青海軍區黨委討論決定支持“八·一八”造反派，并由司令員劉賢權接見了他們的代表，說明了軍區黨委的態度。“捍衛”造反派知道後，當然很不滿意，因為解放軍支持誰，誰就是左派，不支持誰，就表明不是左派。因此“捍衛”造反派就衝擊軍區，揪走軍區司令員劉賢權及副司令員張江霖等人，進行關押批鬥。軍區另一個副司令員趙永夫等少數領導幹部見此形勢，突然改變黨委決定，不支持“八·一八”造反派，而堅決支持“捍衛”造反派。並成立造反聯合指揮部，宣布“打倒劉賢權”，“撤銷劉賢權一切職務”。

《青海日報》機關工作人員，多數是“八·一八”造反派觀點，在報紙宣傳上有支持“八·一八”造反派傾向，趙永夫等人決定對《青海日報》實行軍事接管，由此引起“八·一八”造反派的反對。二十多個學校的紅衛兵先後擁進報社駐地和在報社駐地附近搭棚扎寨，名之曰“保衛報社”。趙永夫等人認為這是一種反革命暴亂行為，因此調用了十三個連隊的兵力，對手無寸鐵的紅衛兵進行圍攻，開槍鎮壓，造成嚴重流血慘案。

3月24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傳達了黨中央和中央軍委“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其主要內容是，青海軍區的問題是一個反革命政變，副司令員趙永夫等人推翻司令員、軍區黨委書記劉賢權的領導，篡奪了軍權。趙永夫篡奪了軍權之後，

丹塊學讀書社區

對西寧“八·一八”等革命群眾組織進行了殘酷的武裝鎮壓，打死打傷革命群眾三百餘人，甚至向十五六歲的女孩子開槍，逮捕革命群眾近萬人。中央決定趙永夫隔離受審，宣布“八·一八”為革命群眾組織，為死難革命群眾恢復名譽，被逮捕的革命群眾和幹部一律宣布釋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青海問題由劉賢權全權負責處理，並建立以劉賢權為首的青海軍事管制委員會。

之後，周總理做了一個簡短講話：“劉賢權、張江霖你們自由了，你們解放了。趙永夫你憑什麼權力撤消劉賢權同志的黨內一切職務？青海軍區的問題是一個反革命政變。趙永夫玩弄手段，打倒劉賢權，篡奪了無產階級的黨權、軍權，以後勾結了張曉川對西寧革命組織進行殘酷的法西斯鎮壓。趙永夫應隔離受審。”又說：“解放軍要堅決支持革命‘左派’，今後，不允許解放軍開槍，打死、打傷革命群眾。”

青海流血事件發生後的幾天中，軍委擴大會議主要討論青海事件的經驗教訓，並聯系到當前支左中存在的問題進行總結和檢討。

不久，軍委擴大會議即將結束，林彪到會作了總結性的講話：第一講階級鬥爭和階級觀點問題；第二講主流和支流問題；第三講軍隊支援地方問題。他特別強調在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打了大勝仗，得了大勝利，中國人民的大勝利，人類的大勝利”。我們的“損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績是最大最大最大”。在講到第三個問題時，林彪指出：“軍隊‘三支兩軍’是一個很光榮、很繁重的任務，但又是一個很新鮮、很複雜，過去沒有幹過的任務，搞不好就有犯錯誤的危險，這個錯誤一犯，比劉、鄧路線還厲害。”

林彪的講話錄音，中央文革通知，應向人民解放軍和全國紅衛兵播放。並號召批判“帶槍的劉、鄧路線”。

在中央文革的煽動下，全國到處揪鬥“帶槍的劉、鄧路線”，衝擊軍事機關，掀起了文革以來第一個反軍亂軍浪潮。

1967年4月1日，中共中央下達117號文件，指出“不得隨意宣布

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織”，“不得把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不准亂捕人”，“在左派組織之間，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擊另一方”。文件強調“革命無罪，大民主無罪”。毛主席在這個文件中加上了一段話，“許多外地學生，幾次衝入中南海，一些軍事院校衝進國防部。中央軍委並沒有斥責他們，更沒有叫他們請罪、悔過或者寫檢討。講清問題，勸他們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衝擊軍事機關一事看得太嚴重了。”

毛主席這段講話與陳毅、葉劍英去年11月的講話精神是對立的，是否定兩位元帥講話內容的。其實陳、葉兩元帥的講話精神，無論現在看還是當時看，都是完全正確的。無政府主義的亂打、亂衝、亂揪，是“全面內戰”，“全面奪權”，大動亂、大破壞的根源。

這個中央文件下發後，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要支持造反派”、要“反復辟”的背景中，中央軍委4月6日頒布“十條命令”，其中指出：毛主席指示中國人民解放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力支持左派，這是一個偉大的、具有戰略意義的決定。我軍廣大指戰員積極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在支左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近我們檢查了某些軍區的支左工作，有的做的很好，有的做的不好。目前出現的問題應當及時引起嚴重注意，為此特發布命令如下：一、對任何群眾組織都不准開槍，祇能進行政治工作；二、不准隨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三、不准任意把群眾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加予取締；四、對於過去衝擊軍事機關的群眾，無論左、中、右概不追究；五、對待較大的群眾組織採取重大行動前，應先向中央文革和全軍文革請示報告；六、一概不要進行群眾性的“請罪”運動；七、在軍隊中要深入進行兩條路線鬥爭的教育；八、派到地方上去支左幹部要防止趙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和思想很右的幹部；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學會做群眾工作；十、違反上述諸條的做法要立即改正。

毛主席對“十條”的批示是：林彪同志，此件很好。後交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一致通過。

方块字读书社区

4月中旬，毛主席說，過去的“八條”，現在的“十條”，結合起來是對的。左派起來了，對立面也起來了，這也不要緊，有點反復有好處。

我認為，《十條命令》的主要內容是對《八條命令》的否定，相當於表明前一段時期部隊支左“大方向”出錯了。這樣使得原來部隊不支持的造反組織更堅定了與部隊的對立，並組織更猛烈的行動衝擊部隊，搶奪武器彈藥用於武鬥。而原來部隊支持的造反組織認為部隊立場轉變，也對支左部隊大為不滿。

4月中旬，中央關於內蒙古問題做了決定。中央指出：內蒙古軍區的個別領導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支持了內蒙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烏蘭夫的代理人王逸倫等人及保守組織，把軍區黨委書記吳濤同志打成“三反分子”，擅自逮捕自治區黨委書記高錦明等同志，宣布他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中央決定由劉賢權同志擔任內蒙古軍區司令員，吳濤同志任軍區政委，負責處理善後問題。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烏蘭夫要在內蒙古公開揭露，王逸倫隔離審查。

三、“五·一三”流血事件

大約是1967年3月某天，北京軍區文工團多數派組織“燎原戰鬥隊”的頭頭王文浩等數人，來到我家裏請示，說他們準備串聯北京三軍（陸海空）文藝團體聯合演出，宣傳毛澤東思想，問我支持不支持，我覺得這樣比亂衝亂鬧好，因此立即答應：“完全支持！”

不久，由北京軍區文工團“燎原戰鬥隊”牽頭，海軍、空軍、工程兵、二炮等文工團的多數派群眾組織，聯合起來排練歌舞節目，並數次在北京軍區禮堂組織演出。我們這幾個參演單位的領導幹部都出席觀看。演出效果也非常好。

這樣以駐京部隊的文藝單位，聯合進行文藝演出開始，帶了

一個群眾組織大聯合的好頭，以後就逐漸擴大到這幾個單位領導機關中相同觀點的群眾組織也聯合起來了，採取了駐京“三軍”群眾組織的統一行動，即所謂“老三軍”派，他們是擁護軍委八條命令，支持黨委工作，支持部隊保持穩定，反對打、砸、搶，反對把軍隊搞亂。由此引起不同觀點的群眾組織也聯合起來，既所謂“新三軍”派，他們是中央文革支持的，並與清華、北航等地方院校造反組織相勾結的反軍亂軍的衝派。兩派彼此之間采取了一些更尖銳、互相對立的行動，直至發生了“五·一三”兩派大規模衝突和流血事件。

為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老三軍”派的文藝團體決定，在北京展覽館劇場舉行聯合演出《長征組歌》，歌頌毛澤東思想，歌頌工農兵。

演出前，演出單位請示了林辦（林彪辦公室），林辦轉達了林彪對演出表示支持的態度。

演出當天的上午和下午，演出單位又兩次報告請示全軍文革，但全軍文革均不同意演出，理由是防止不同觀點群眾組織衝擊演出，發生武鬥。

林彪和全軍文革對演出的不同態度，演出單位及時地報告了我們。當時演出的劇票、海報均已發出去了。

是演還是不演？我一直在思考中。要支持演出，就要冒很大的風險，其一，剛剛發生的“二月逆流”，幾位老帥因提出部隊要穩定而遭到批判；其二，“青海事件”後，中央文革在全國掀起反軍亂軍浪潮，到處揪鬥“帶槍的劉、鄧路線”，衝擊軍事機關；其三，“新三軍”派，是中央文革支持的衝派，在清華“井岡山”、北航“紅旗”等地方院校造反組織的支持下，打、砸、搶的氣焰十分囂張。他們已揚言：“祇要老保演出，就砸爛會場”；其四，全軍文革已表態不同意演出，那麼中央文革又是什麼態度呢？其五，我們當時“後院”還在“起火”，自身仍然難保。但是，要是現在突然宣布不支持演出，或者取消演出，不是衝派的“勝利”嗎？不是我們也被打、砸、搶行為嚇倒了嗎？如此下去，領導講話還管用

嗎？將來誰還敢支持黨委工作？

此刻，我們必須有旗幟鮮明的態度。我緊急與海軍的幾位領導商量，當我談了應堅決支持演出的意見後，蕭勁光等領導完全同意，很快就形成了海軍黨委支持演出的決定。之後，我們又聽取北京軍區、空軍、二炮等單位領導的意見。我們商量的結果是：第一、宣傳毛澤東思想正確，宣傳工農兵無錯；第二、聯合演出比亂打、亂揪、亂衝好，對穩定部隊和駐京機關有利；第三、如果演出成功，可以起到團結“新三軍”，實現大聯合的作用；第四、如果不演出，正符合衝派破壞演出，破壞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陰謀。勢必再次引起新、老“三軍”兩派的對立；第五、更嚴重的是如果衝派占了上風，將沒有人再敢支持各級黨委的工作，穩定駐京機關和部隊將更加困難，反軍亂軍、打、砸、搶將會愈演愈烈。因此我們同意仍然按照原定計劃演出，並要演出單位做好應付衝擊演出的準備。

為了支持演出和防止武鬥，我們幾個單位的領導還商定：都到現場去觀察情況，幫助他們處理問題。

海軍是我和蕭勁光、王宏坤、張秀川于13日黃昏分別前往，預定在展覽館劇場東側一座房內集合。但我的汽車走錯了路，開到展覽館西側去了，正陷在衝派的人群中。這些衝派估計有兩千人以上，他們有清華、北大、北航等院校造反派的學生，也有駐京部隊機關中與“老三軍”不同觀點的群眾組織，四路縱隊前進，一邊跑步，一邊叫喊，“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爭取勝利”。衝到劇場附近，發現四門緊閉衝不進去，就用磚塊、石頭劈裏叭啦把窗戶玻璃砸碎，然後從窗戶上蜂涌跳進去，既打演員，又打觀眾，一片對罵對打，混戰一團。

我坐的車子趕快退出來，轉到劇場東側小樓與蕭勁光、王宏坤、張秀川、余立金、曹里懷、李天煥、吳烈、熊伯濤、傅崇碧等人會合，我們商定由衛戍區調兩個連來制止武鬥，並打電話報告請示中央文革怎麼辦？
 方塊字讀書社區 附錄 文革大事記 答復說：“他們武鬥，你們不武鬥，不就解決了嗎？”蕭勁光聽此廢話氣得摔帽子，拍桌子，罵

陳伯達是“死官僚”。

這時兩派雙方互相對罵對打，衝派不僅用拳頭、磚頭、棍棒毆打不同觀點的演員、觀眾，還砸毀了劇場的演出設備和桌椅板凳。由場內到場外，由黃昏到深夜，你衝我殺，造成了一百多人受傷的流血事件。

我曾利用夜暗鑽到劇場內的群眾中去觀看，祇見雙方正打得火熱。

聽到一方大罵：“打砸搶是破壞文化大革命”，“衝擊演出是反對宣傳毛澤東思想”，“打砸搶是土匪行動”。另一方對罵：“打砸搶是教訓保皇派的最好武器”，“打砸搶萬歲”，“保皇派罪該萬死”，“祇准革命派造反，不准保皇派亂動”等。針鋒相對，寸步不讓。

到了後半夜，大部人員逐漸散走了，各自尚有數百人在那裏繼續相持，互不示弱。

14日天將黎明時，陳伯達、蕭華等人來到現場，召集雙方人員在劇場內訓話。陳伯達主要宣布，你們兩派暫時不要見面，天明後雙方誰也不准抬着傷員上街游行。蕭華則批評“老三軍”文藝團體不該演出，把武鬥責任強加在“老三軍”頭上。

這一下立即引起了“老三軍”派的強烈不滿。天亮後，“炮轟蕭華”的大標語就上街了，認為蕭華是破壞“五·一三”聯合演出的“罪魁禍首”。

這次武鬥雙方都有傷員，但沒有死人。“老三軍”派傷員更多，有的被打得昏迷不醒。“老三軍”派的傷員分別被送到海軍、空軍、二炮等醫院治療。

15日，林彪派葉群到各醫院看望“老三軍”派的傷員，進行慰問。這無疑是對“老三軍”派的支持和鼓舞，而對衝派則是最沉重的打擊。

16日晚，“老三軍”文藝團體要在北京軍區禮堂開大會，慶祝“五·一三”鬥爭勝利，我們幾個單位的領導都同意。並決定由我和吳法憲出面，到中央文革處匯報，並請示是否派人參加大會。

方块字读书社区

本來我們對中央文革派人參加大會，並不抱多大希望，祇是匯報情況和想了解一下他們對此事的態度。

沒想到的是，中央文革聽了我和吳法憲的匯報和請示，江青一反常態，當即決定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參加會議。我們同戚本禹一道到達北京軍區禮堂時，禮堂裏響起了熱烈歡迎的掌聲。戚本禹登臺講話，情緒頗為激動，完全支持“三軍”的聯合演出，批評了“衝派”破壞演出的錯誤。

事後我了解到，毛主席是支持演出的。

5月23日，“三軍”文藝團體在天安門午門廣場聯合演出，上萬人觀看了演出。特別是6月9日，林彪和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等中央領導親自到人民大會堂觀看“三軍”文藝團體的聯合演出，這對“老三軍”派的支持鼓舞就更加有力了。

第二天的《人民日報》是這樣報道的：“人民解放軍駐京陸、海、空三軍文藝戰士，為紀念毛主席的光輝著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聯合演出了豐富多彩的革命文藝節目。他們突出地宣傳了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生動地歌頌了歷史主人翁工農兵，熱情地歡呼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三軍文藝戰士的這個演出好得很，硬是好得很！三軍革命文藝戰士同志們，在臺下是堅定的革命造反派，在臺上是熱情的毛澤東思想宣傳員。他們為全國文藝界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這樣一來，蕭華就被動了。“炮轟蕭華”升級為“打倒蕭華”，認為蕭華是“衝派”的後臺，蕭華是對抗林彪指示的。

當時我考慮蕭華已經被打倒一次并抄了家，由于毛主席說：“蕭華是好人”，不同意江青的做法，才躲過一劫。現在群眾又在中央文革的煽動下要打倒蕭華，但是中央並沒有表態，我們不宜輕易跟着群眾情緒跑。（同時我與蕭華無論是工作關係還是私人關係都很不錯。抗日戰爭時期我們一起在山東，他是115師政治部主任，我是司令部參謀處長。以後到東北雖不在一起，但經常見面。）因此我向蕭勁光提議，召開海軍黨委常委會議進行研

究，經大家研究，一致同意將認識明確為：蕭華錯誤是嚴重的，支持了“衝派”，反對“三軍”聯合演出宣傳毛澤東思想，但性質屬於“講錯話”，是人民內部矛盾，決定海軍不參加“打倒蕭華”的行動。

“五·一三”事件不僅在北京影響很大，對全國也有一定影響。特別是對北京駐軍領導機關的文革形勢以及全軍的文革形勢起了扭轉局面、穩定局面的重要作用：第一、穩定了三軍領導機關的形勢，扭轉了亂打、亂揪、亂衝的無政府局面。初步恢復了領導機關的工作秩序；第二、實現了大聯合，對於多數派群眾組織由被動轉為主動，由相對優勢變成絕對優勢，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而“衝派”受到嚴重打擊，開始土崩瓦解；第三、由於北京三軍領導機關的穩定，為全軍在文革中的穩定帶了一個好頭；第四、從來不主動看樣板戲的林彪在周總理、陳伯達等人的陪同下親自觀看三軍演出，這在文革期間是極少有的。說明林彪對全軍和三軍領導機關的穩定是多麼的重視。軍隊穩定了，黨和國家才有保障；第五、對中央文革打着批判“帶槍的劉、鄧路線”旗號，實質是反軍、亂軍之陰謀，是有力的回擊。“五·一三”事件，毛主席和林彪的表態，迫使中央文革一伙承認“衝派”是“錯誤的”。

由於海軍在“五·一三”事件中及對蕭華問題上的態度十分堅定、明朗，因此當時社會上流傳有“地方看軍隊，軍隊看海軍”的說法。這種說法不一定全面，但卻準確地說明了軍隊在文革中的地位是舉足輕重的。

這裏還要提一句。文革開始後，中央文革和江青一伙把幾乎所有電影、戲劇都打成資產階級文藝黑線的產物，打成封、資、修的產物而禁演。廣大群眾和部隊指戰員能看到的祇有樣板戲和少量經中央文革審查通過的電影，除此之外就是“忠字舞”、“語錄歌”。

“五·一三”事件後，借《紅衛軍》成功演出，我指示海政文工團（當時叫“海政宣傳隊”）重排話劇《赤道戰鼓》，重



觀看海軍美術攝影展



接見海政宣傳隊《海空雄鷹》劇組

排反映“八·六”海戰的話劇《夜海戰歌》，又新創作了反映航空兵戰鬥生活的話劇《海空雄鷹》，深入部隊演出。

我們又決定舉辦了兵畫兵、兵攝兵的《海軍美術攝影展》，並到部隊巡展。我還要求各艦隊文工團組成文藝小分隊到機場、碼頭、海島慰問演出，豐富了部隊文藝生活，得到廣大部隊指戰員的熱烈歡迎。

三年後的1970年5月13日，晴空萬里。葉群邀請黃、吳、李、邱及夫人游覽長城。當時工作壓力很大，我們都很少出來散心。但這一天特殊，是“五·一三”事件三周年。在長城上，我們舉目遠望，心情十分舒暢。

我知道葉群代表林彪邀我們游長城的用意：一是“五·一三”事件為文革中穩定部隊開了一個好頭，值得紀念；二是部隊要像長城一樣堅固、強大，永遠是保衛黨中央，保衛國家，保衛人民的中流砥柱。

“五·一三”事件之後，我們這些人不但不再挨揪鬥，甚至開始出現“李、王、張是堅定革命左派”，“向李、王、張致敬”的大標語。我們在群眾中說話開始發生效果，我們的處境從此逐步好起來了。

方块字读书社区

1967年5月29日，中央軍委、全軍文革小組發出當前軍隊院校

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說：爲了勝利的完成“一門二批三改”的歷史任務，院校文化大革命應逐步轉入本單位的門批改，把本單位的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鬥倒鬥臭，把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深批透。認真提倡文鬥，堅決反



1970年5月13日，北京八達嶺長城。

左起：李作鵬、邱會作、胡敏、葉群、陳綏圻、吳法憲、黃永勝

對武鬥，不要外出串聯，已經外出串聯人員要迅速返校。應盡快建立由革命學生、革命教職員工和革命領導幹部組成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臨時領導機構，行使對本校的領導權力。中級指揮、技術、醫務學校要逐步做到一邊鬧革命，一邊上課。

自此指示後，全軍多數院校由兵慌馬亂，逐漸向恢復秩序方向轉變，一步一步地向大聯合、三結合、鬥批改、上課鬧革命的方向發展。

1967年6月9日，中央軍委命令，經中共中央批准，任命我爲海軍第一政治委員。

第三十三章 天翻地覆 （之三）

一、“痛打落水狗”和革命大聯合

1967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公開發表1966年5月16日“通知”，《人民日報》發表《紅旗》雜誌編輯部、《人民日報》編輯部的文章，題目為《偉大的歷史文件》。（當時，凡是《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的社論、編輯部文章，都要經過毛澤東審閱。）文章指出：“五·一六”通知是一個馬列主義文件。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集中到一點，還是政權問題。革命的主要對象是混入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內部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實踐中，正確地解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這標志着馬克思主義在現時代已經發展到了毛澤東思想的階段。這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第三個偉大里程碑。文章結尾引用了毛主席的話，指出：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後還必然要進行多次。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不要以為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

與此同時，《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發表了另一篇重要文章，指出劉少奇所寫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這篇文章是經過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的。毛主席曾說：「方塊字讀書社區」宣傳孔孟之道，是否定階級鬥爭，是欺人之談。」

當時中央文革那伙“英雄們”，瘋狂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開展大批判，“痛打落水狗”，“徹底埋葬中國赫魯曉夫及其徒子徒孫”。

全國文革進入第二階段，實行“全面奪權”之後，已經半年了。雖然中央領導人和中央宣傳機器大喊形勢大好，捷報頻傳，但實際上到處是亂糟糟的，看不到大好形勢。前階段是以打倒一切，揪鬥所謂“走資派”和“叛徒特務”為主。現階段似乎是以派性鬥爭、全面內戰，互相爭權奪利為主。舊的權力機構砸爛之後，已經實現大聯合，建立三結合的新權力機構，為數甚少。多數情況是奪權之前沒有大聯合，奪權之後無法實現三結合。因此長期處於無政府狀態。許多地方不得不實行軍管，由軍事管制委員會暫時成為權力機構，在軍管會之下設立抓革命和抓生產兩個班子，勉勉強強應付門面，如果不實行軍管，無政府狀態還要嚴重得多。

中央再三指示，按部門、按單位、按產業、按系統實行革命大聯合，並指出各革命組織祇要大方向是一致的，就應求同存異實行大聯合。實際情況是，各派組織猶如散沙一盤，互相指責對方是保皇派，互相指責對方是打砸搶派。先奪權的少數派，反對未參加奪權的多數派，未參加奪權的多數派反對先奪權的少數派。人數多的說，以我為核心，想把其他組織吞并。人數少的說，應以我為主，因為我人少精幹，你們人多是雜燴。造反早的說，我功勞大，覺悟高，應以我為核心；造反晚的說，你們造反雖早，但犯的錯誤最多，我造反雖晚，但我們沒犯錯誤，我們方向正確，因此應以我為主。受到解放軍支持的組織說，我們是響當當的左派；沒有受到解放軍支持的組織說，解放軍犯了帶槍劉、鄧路線錯誤，支持了反動組織，鎮壓了革命組織等等，各有各的理由。因此爭吵、對罵、打架、武鬥愈演愈烈，成為你死我活，勢不兩立的仇人。

中央再三指示要建立“三結合”的權力機構，並規定“三結合”有兩種形式，一種是革命的高級幹部、革命的中級幹部和革

方块字读书社区

命群眾代表的“三結合”。另一種是革命群眾代表、革命領導幹部和解放軍代表的“三結合”。

爲什麼“三結合”領導班子遲遲建立不起來呢？歸納起來，我看有這樣幾個原因：

第一、沒有大聯合的基礎，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三結合”的領導班子，不是真正“三結合”領導班子，就不可能爲廣大群眾所承認你是合法的權力機構。實際上就是一派掌權，其他組織就要進行衝擊，就要進行反奪權。

第二、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錯誤思想影響廣泛嚴重。不相信絕大多數老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不相信“犯了錯誤”的老幹部多數是可以改正的，特別對原來領導班子中的一、二把手，幾乎都被認爲是“走資派”或“叛徒特務”，都必須打倒，都不能“三結合”，都不能叫他站出來工作。

第三、中央文革和江青一伙人，煽風點火地多次提出，“三結合”要防止搞假三結合，防止恢復原狀，恢復原來的統治，恢復原來的秩序，如果這樣，就是資本主義復辟，那就等於文化大革命白費力氣。因此反對復辟的口號，反對復舊的口號流行全國，不敢大膽解放老幹部、不敢恢復正常秩序，生怕犯復辟、復舊的錯誤，生怕犯否定文革的錯誤。

原來的黨、政、工、農、青、婦領導機構被砸爛了，或癱瘓不靈了，新的大聯合“三結合”的領導班子又搞不起來，這種無政府狀態，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何時了？前途渺茫，人心隱憂。

“三支兩軍”任務壓在解放軍身上愈來愈重。解放軍與群眾派別之間的矛盾也愈來愈尖銳，打罵污辱解放軍戰士的現象愈來愈多，怎麼辦？誰也拿不出藥到病除的有效辦法。

二、震驚全國的 武漢“七·二〇”事件

7月中旬，毛主席對文化大革命運動有一個新的指示說：“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三年收尾。”此後就離開北京，視察大江南北，親自看看外地情況。當時由中央辦公廳和總參組織了一個精幹指揮班子隨行。由于此行有毛主席可能要在長江游泳的計劃，為了保護毛主席游泳的安全，周總理決定我也參加陪同。而周總理則是兩地跑，有時在外地毛主席那裏，有時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

這期間，發生了震驚全國的武漢“七·二〇”事件。我親眼目睹和參與處理了事件的前前後後。

楊成武、汪東興等人隨同毛主席乘專列火車于7月14日晚到達武漢，住在東湖賓館的別墅內。我隨總理乘飛機當日先期到達武漢的。

恰巧由中央文革派遣的工作組成員謝富治、余立金、王力等視察雲南、四川後到達武漢，也住在東湖賓館的別墅內。

7月15日，毛主席在別墅聽取華東、中南地區的領導匯報。周總理、謝富治、王力等人聽取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鐘漢華對武漢文革情況的匯報。我則隨楊成武及中辦、總參、海軍、武漢軍區的有關人員，按主席原定的行程計劃，到長江岸邊檢查主席游泳的準備情況。

7月16日，毛主席召集會議，聽取周恩來匯報武漢地區文革情況，楊成武、汪東興、謝富治、余立金、王力和我等人參加會議。

毛主席聽了匯報之後說：“要為武漢工人總部平反（當時被打成反軍亂軍的衝派），放掉朱洪霞等被捕的頭頭。武漢軍區對兩派都應該支持，不要屁股坐在‘兩派橫街’一邊。武漢兩派要達成協議，發表聲明聯合起來。要承認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錯

方块字读书社区

誤，承認錯誤，改了就好。要把‘百萬雄師’的工作做好，要把軍隊工作做好，轉過來就好。”又說：“軍隊犯錯誤，要承認的快，改正的也要快。”

毛主席的講話，對解決武漢地區的問題定了調子，一是要為“工人總部”平反，二是武漢軍區支左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要改正。

我當時心裏十分清楚，毛主席的講話，明顯地支持和袒護了武漢地區反軍、亂軍的衝派。

接着，17號、18號連續兩天，周總理及謝富治、余立金、王力又連續召開會議，繼續聽取武漢軍區負責人，對武漢地區文革情況和軍隊支左情況的詳細匯報。我也參加了旁聽（中央布置我的任務不是處理武漢問題，又因對武漢問題主席已定了調子，所以我一直未發言講話）。

匯報時，總理再次希望武漢軍區承認支左錯誤，並改正錯誤，總理說：“承認錯誤，寫檢討，是為了保護你們。”但陳再道仍表示想不通。

會上，王力對軍區支持“百萬雄師”提出了非常尖銳的批評，謝富治也同意王力的批評意見。王力的講話引起武漢軍區領導人強烈的不滿情緒。

依我旁聽者對兩天會議的感覺，匯報會上，中央領導與武漢軍區領導的意見十分對立，會議沒有解決多大問題。

武漢地區群眾組織基本上是兩大派。以漢口為中心的是“百萬雄師”派，以武鋼為中心的是“三鋼”派或“工人總部”派。武漢軍區支持“百萬雄師”，而與衝擊軍區並打、砸、搶的“三鋼”、“工人總部”勢不兩立。把自己地區稱為解放區，把對方地區稱為敵占區，把兩派接界地區稱為游擊區，互相對立，武鬥不止。

在這兩天中，謝富治、王力等人還到武漢各地（華中工學院、水利學院等）的群眾組織中講話，認為“百萬雄師”是保皇派，“三鋼”是造反派，軍區支左是支持保皇派，壓制了造反派，犯

了方向路線錯誤。並說武漢問題一定會解决好。毛主席、林副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堅定不移地支持你們。你們受壓受打擊的現象不允許存在，要把這種現象翻過來，一去不復返。

這樣一來，更加引起了兩派群眾組織的對立情緒。“三鋼”造反組織廣播了王力講話實況錄音，同時，武漢軍區匯報會上王力嚴厲批評軍區的講話，也很快傳播出去，激起了“百萬雄師”群眾極大憤慨。

18日晚，周總理帶陳再道司令員和鐘漢華政委到東湖別墅見毛主席，謝富治、楊成武、汪東興、余立金、王力和我等人參加接見。

毛主席在講話中指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更沒有理由分裂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為什麼不能聯合起來？”

陳、鐘在毛主席講話後，表示同意中央處理武漢問題的決定，並做好部隊的說服教育工作。

之後，周總理回北京。

7月20日拂曉前，“百萬雄師”數百人強行衝破警戒綫，突然包圍謝富治、王力等人住的百花別墅，破窗而入，將謝富治圍鬥一頓，將王力揪走，不知去向。同時數千人衝進武漢軍區領導機關，逼迫軍區領導對王力講話表明態度。

20日上午，“百萬雄師”用幾百輛汽車（其中有幾十輛高音喇叭廣播車）組織了聲勢浩大的遊行。據匯報，遊行隊伍中有的手持槍械，還有軍人參予其中並攜帶武器。

形勢急轉直下。誰也說不清，“百萬雄師”是否還要衝擊東湖賓館，毛主席的安全受到極大的威脅，當時我們在主席身邊的人都高度的緊張。

20日上午，中央知道了武漢情況，立即召開了緊急會議，會議決定，為了保證毛主席的絕對安全，要求毛主席立即離開武漢。

周總理當天下午由北京乘火車到武昌，江青等人來信與毛主席商量，決定毛主席秘密轉移到上海。中央過去有規定，為了

保證安全，毛主席外出一概不坐飛機，但是這次破例要坐飛機轉移，飛機夜航沒有白天安全，也斷然決定可以夜航。

當時毛主席住的別墅附近和周總理住的別墅附近，均有“百萬雄師”的人員活動（別墅裏的工作人員也皆“百萬雄師”觀點）。為了不使別墅內工作人員和別墅外“百萬雄師”的人員知道毛主席的轉移行動，毛主席一行人採取了秘密偽裝等措施。21日凌晨，毛主席靜悄悄地離開別墅，離開武漢，在余立金等人陪同下，上午順利安全地到達上海。

毛主席離開後，周總理留下來，繼續處理“七·二〇事件”的善後問題。因他身邊沒有帶助手，就決定把我留下來，協助他做點具體工作。

我隨周總理住在同一座別墅內，為了總理的安全，我們約定，夜間我秘密搬入總理住的那套比較寬大的房間內睡覺，並按照總理平時夜間辦公的習慣，凌晨3時後才熄燈，上午9時後拉開窗簾。而總理則搬到我住的那套比較小的房間內，於11時前就熄燈休息，上午7時拉開窗簾。採取這樣的辦法，我們一直住到離開武漢。

21日上午，周總理在別墅裏再次接見陳再道，我在場。

總理要陳再道把王力送回來，陳說：“我不知道王力在什麼地方。”

總理說：“你派人去找回來。”

陳說：“我找不回來。”

看到陳再道這樣，總理就生了氣，“啪”一聲拍了桌子，站起來大聲說：“你這是什麼態度？你不要以為你有‘百萬雄師’撐腰，‘百萬雄師’算得什麼？如果把你反對中央決定，威脅毛主席安全，揪走中央文革成員的事情通報全國，八億人民就要起來反對你們。你看是八億人民力量大，還是你‘百萬雄師’力量大。你既然採取這種態度，你離開這裏到北京去！”

陳再道低著頭，告

方缺字读书社区
當時周總理最關心的是王力的下落，派人到處尋找。20日和

21日上午均無任何消息。

21日下午，武漢空軍副司令員劉豐跑來向總理報告，王力找到了，現在被隱藏在武昌南郊一個部隊裏，並報告了王力脫險的大概過程：劉豐按總理指示到處找王力，結果在29師找到，之後劉豐秘密將王力轉移到武空的一個部隊隱藏起來。

總理聽了後很高興，表揚劉豐立了大功。不久就升任為武漢軍區政委。

周總理親自布置22日送王力回北京，要求北京在西郊機場組織歡迎。

21日深夜，總理指示，由我和劉豐兩人到武空部隊接王力並負責護送到山坡軍用機場。在機場，總理召開會議最後布置穩定武漢局勢的措施，其中包括部隊的調動。我參加了會議。

22日上午，王力坐一架專機先行起飛，總理和我們在機場送行。之後不久，總理和我乘上另一架專機，起飛後在中途加速，超過王力坐的那架專機，先在北京西郊機場降落。十五分鐘後王力專機降落，總理和其他歡迎人群數千人，在機場隆重迎接。因此王力一度成了“文革英雄”人物。

7月26日，武漢軍區發布公告說：7月20日，在武漢市發生了衝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派來武漢處理文化大革命問題的代表……。這是明目張膽地反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黨中央，反對中央軍委，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叛變行動。王任重和陳再道則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禍首。尤其是陳再道對上抵制毛主席，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的領導，對下壓制打擊群眾意見，長期地頑固地堅持錯誤。

7月2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一封信，指出：你們英勇地打敗了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極端狂妄的進攻，你們的大無畏精神和果斷手段已經使一小撮的逆流行為一敗塗地。武漢軍區個別負責人公然反抗毛，[方块字读书社区](#)，反抗中央軍委的正確指示，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小組，竟然

采取法西斯的野蠻手段圍攻綁架毆打中央代表。

7月22日，我隨總理回到北京後休息了兩天。當時北京街上日夜有“打倒陳再道”的游行隊伍，滿城都是“打倒陳再道”的大標語。

7月25日夜，北京群眾組織萬餘人，圍繞京西賓館游行，高呼“打倒陳再道”，“保衛中央文革，向中央文革致敬”等口號（他們知道陳再道住在京西賓館）。

陳伯達、戚本禹等中央文革一伙人，得意洋洋地到軍博廣場前面觀看游行隊伍，並表揚游行組織得很好。

7月27日，周總理給我打電話說，要我立即回到上海毛主席那裏去，並說現在長江水溫正好，如果游泳的話，由我負責選擇水域，組織海軍艦艇，絕對保證安全。

當天下午，我就飛到上海。

楊成武爲了請示八一建軍節招待會的問題也到了上海，究竟哪些人出席招待會，是當時國內外人們最關心最敏感的問題。毛主席同意北京提出的方案，並談到幾個老帥均應出席的問題。我和余立金均在上海未參加北京的八一招待會，但新華社報導參加招待會的名單中，仍有我們的名字，因爲當時誰不露面，報上無名，就可能引起一場風波。

爲了紀念八一建軍節，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關鋒主持寫了兩篇紀念文章。由于武漢“七·二〇”事件的原因，他公開地煽動“揪軍內一小撮”，引起全國各地紅衛兵瘋狂地衝擊軍隊領導機關和部隊。

王力也忘乎所以，尾巴翹得太高了，結果好景不長。王力于8月7日在外語學院接見紅衛兵時發表講話，煽風點火，動員紅衛兵打倒陳毅，支持奪取外交部的領導權，這就是流毒全國的“王八·七講話”。王力說：“有人說外交部的權不能奪，我要問一聲：爲什麼？外交部的權可以奪，陳毅的權可以奪！”有人說外交業務大權屬於中央的，王

方块字读书社区

革命與業務是不能分開的。”

毛主席、周總理批評這個講話是完全錯誤的，是反對中央的（中央早有規定，國防、外交、公安等部門不允許奪權）。8月中旬，毛澤東在上海看了《紅旗》雜誌社論和關鋒的文章後說：這兩篇文章是“大毒草”。爲了制止“揪軍內一小撮”的錯誤，毛主席在上海交代楊成武：“你回北京向總理報告，王、關、戚破壞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把他們抓起來。先抓王力、關鋒，把他們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無轉變，由總理負責處理。”不久，王力垮臺了，關鋒也垮臺了（1968年1月戚本禹也被宣布隔離審查）。

8月9日，林彪接見武漢軍區負責人曾思玉、劉豐時，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好得很，已經取得了偉大輝煌的勝利。我們發動文化大革命靠兩個條件，一是靠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軍的力量。在這兩個條件下，我們放手發動群眾，各種壞事讓他充分暴露出來。有了這兩個條件，壞事就可能變成好事。文化大革命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大革命，本質上是社會主義政治革命，是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如果沒有無產階級這個政治上思想上的大革命，就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

中共中央把這個講話全文批轉各省、市和軍區。

武漢“七·二〇”事件，起因是毛主席批評武漢軍區鎮壓了造反派，過程是“百萬雄師”反對中央文革，對抗周總理指示，衝擊毛主席駐地，抓走了王力，威脅到毛主席安全。

但我認爲，“七·二〇”事件的根源是毛主席的方針、路線所致，是中央文革的一伙人，妄圖通過全面內戰達到陰謀奪權所致，是毛主席對武漢地區的問題做出了不正確的判斷，確定了不正確的調子和采取了不正確的處理辦法所致。

“七·二〇”事件的結果怎樣呢？不但武漢地區的問題沒有解決，而且中央文革和江青一伙更加有恃無恐，變本加厲地繼3月“青海事件”後，很快掀起第二次全國性的反軍亂軍高潮。這樣“打倒陳再道，打倒張再道，打倒李再道，打倒廣再道，打倒寧再道”的反軍亂軍口號遍布全**方块字读书社区**凡是解放軍未曾支持的群眾組織，幾乎全部借機而起反對解放軍。

特別嚴重的是，衝派組織公開衝擊部隊的武器彈藥倉庫，搶奪解放軍手中的武器彈藥的行為到處發生。加上《紅旗》雜誌發表了關鋒主筆的公開號召“揪軍內一小撮”的社論，更是火上加油。

據我所知，當時全國八大軍區中，有五大軍區發生地方衝派大規模衝擊解放軍的事件。由于軍委有指示，對待群眾，對待造反派，要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更不准開槍。因此成千成萬件的槍枝被搶走，成千成萬的戰士挨打挨罵，被扒掉帽徽，揪掉領章。

由于衝派有了現代化武器，因此武鬥方式也升級了。開始武鬥是拳打腳踢，以後是棍棒石頭，現在是真槍實彈，槍炮齊鳴。有的地方還使用了坦克、大炮。流血的慘重不言而喻。

“七·二〇”事件剛剛發生，江青就叫囂“文攻武衛”，她說：“不能天真浪漫，當他們不放下武器，你們就放下武器，這是不對的。”她大叫大喊說：我們的原則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又說：“我們還要以強大的政治攻勢，壓倒敵人，摧毀敵人，瓦解敵人，這就是我們的‘文攻武衛’。”

因此，全國範圍的“內戰”愈演愈烈，越打越廣，越打傷亡越多，越打破壞越重。

江青一伙真是唯恐天下不亂，真是禍國殃民！

8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布了“關於開展擁軍愛民運動”的號召，指出：毛主席親手締造、親自領導和林彪同志親自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保衛我國國防安全和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支柱。毛主席說：“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了人民的一切”，“人民解放軍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為他的唯一宗旨是緊密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能夠勝利地進行，就是因為有人民解放軍這樣一個偉大的長城。為了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前進道路上取得更輝煌的勝利，這就需要人民解放軍同一切無產階級衛兵小將和一切革命群眾更緊密地團結起來，這就需要全國各地軍民更大規模展開一

個熱烈的擁軍愛民運動。

雖然中央號召“擁軍愛民”，但中央文革指使和支持的反軍、亂軍活動并未停止。

三、毛主席視察大江南北時的講話

毛主席從武漢到上海後，親自處理了當時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我跟隨主席在上海，了解的一些情況是：

第一，武漢“七·二〇”事件後，全國各地由于大規模武鬥的需要，造反派破壞了大量的交通設施，使全國不少重點鐵路中斷交通和運輸。當時，浙贛路諸暨附近，京滬路鄒縣附近，京廣路邯鄲附近的鐵路，均先後被切斷。嚴重影響工農業生產，形勢越來越使人擔憂。

毛主席說，破壞鐵路、切斷交通運輸的派別組織是壞組織，應由解放軍采取武力解決辦法，恢復鐵路正常運輸。總參按照毛主席指示，采用武力平亂，保證了交通運輸暢通。

毛主席還指示，用他乘坐的專列火車（此列車有特殊標記，鐵路各站均知道是毛主席的專列），由中央辦公廳派人負責，由上海出發，經南京、徐州、開封、鄭州、武漢、長沙、南昌、杭州再回到上海，視察鐵路沿線的通車情況。

8月1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命令調動解放軍維護鐵路交通，切實保障鐵路運輸的暢通。各站段鐵路公安人員統歸所在站段護路部隊指揮。

第二，南京地區的群眾組織有兩大派，一派是上海張春橋支持的“紅縱”，一派是南京軍區支持的“八·二七”造反派。“紅縱”力量占優勢，他們聯合江、浙、皖相同觀點的群眾組織，反對南京軍區，反對許世友。

武漢“七·二〇”事件後，[方块字读书社区](#)發動“打倒許世友”，“打倒寧再道”的黑風惡浪達到頂峰。許世友在南京無法立腳，

被迫跑到大別山軍區農場躲避，並決心在大別山裏打游擊，與揪鬥他的壞人鬥爭到底。

南京海軍軍事學院的造反派也跟着“紅縱”一起打倒許世友。我知道後，立即打電話，批評海軍學院群眾組織說：“參加打倒許世友的行動是方向錯誤，應立即糾正。”結果他們很快轉變立場，改為支持許世友，支持“八·二七”造反派，並引起了“紅縱”的分裂，不少人跟着改變態度。

不久，張春橋由北京回到上海來了，經常同我們一起在毛主席駐地聽候指示。

有一天，毛主席要張春橋親自去把許世友接到上海來商談問題，並具體指示派一架專機，飛到合肥降落，然後坐直升飛機到大別山軍區農場去迎接。許世友由張春橋陪同來到上海後，立即見了毛主席。毛主席肯定許世友是好同志，並說目前形勢很快會改變，你暫時在大別山農場休息或到北京休息均可。許世友對毛主席接見很感動，決定仍回到大別山農場去。這次接見對張春橋支持“紅縱”，反對許世友的陰謀詭計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毛主席在上海親自處理的上述兩件事，都與武漢“七·二〇”事件有直接關係。不難看出，“七·二〇”事件的後果是多麼的嚴重。

第三，姚文元也由北京來到上海，將他寫的《評陶鑄兩本書》的文章親自送毛主席審閱。毛主席看了這篇文章並作了若干修改，其中關於“五·一六”反革命組織問題那一大段話，完全是他增添的。指出：“‘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是一個陰謀反革命集團。這個反革命組織，不敢公開見人，他們祇在夜深人靜時派人出來貼傳單寫標語。”

這篇文章9月8日在《人民日報》上一發表，就造成了全國大抓“五·一六分子”的嚴重後果。

第四，不久楊成武也將他寫的題為《大樹特樹毛主席絕對權威》的文章，送上海給主席看了一部分後就對他身邊的人說：“這篇東西我不看了，盡是吹捧我的，退回去！”但

對於大樹特樹的原則錯誤，沒有明確指示，因此中央報紙仍然登載，大肆宣傳。

楊成武問題發生後，毛主席才指出：“絕對權威提法不妥。從來沒有單獨的絕對權威，凡權威都是相對的。凡絕對的東西都祇存在相對的東西之中，尤如絕對真理是無數相對真理的總和，絕對真理祇存在于各個相對真理之中一樣。”又說：“權威或威信祇能從鬥爭實踐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這樣建立的威信必然會垮下來。”又說：“權威不是由人樹起來的，而是要在鬥爭實踐中，群眾公認的。”這樣中央報紙才批判大樹特樹是唯心主義思想的產物。

第五，在上海，有一次毛主席找汪東興談話說：“鄧小平與劉少奇有三個區別，第一劉少奇有歷史問題，鄧小平沒有歷史問題。第二鄧小平有戰功，劉少奇沒有戰功。第三劉少奇發表了不少錯誤文章，鄧小平沒有發表什麼文章。把鄧小平安置在中央辦公廳搞點秘書工作，你看怎麼樣？”汪東興說：“楊尚昆、童小鵬等人的問題還未解決，鄧小平放在中央辦公廳不合適。”毛主席見此情況，就沒有堅持自己的意見。如果這個決策實現，樹立一個解放中央領導幹部的榜樣，對於全國、全黨、全軍必將產生巨大的深刻的影響。可惜這個非常好的決策（當然對劉少奇的看法仍然是錯誤的），遭到汪東興的反對，就被放弃了。

毛主席在上海兩個月時間，處理了許多重大的國際國內問題，我僅僅簡述了上面幾件具體事情為例，多少可以看出他在決策問題中存在正確和失誤兩者皆有的情況。

9月初，毛主席在上海批准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不准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命令中規定：任何群眾組織和任何人，不管是屬於哪一派，不許以任何借口搶奪人民解放軍的武器、彈藥、裝備、車輛、器材物資。不許搶奪軍火倉庫、軍用倉庫和國防企業中的武器、彈藥、裝備、車輛、器材物資。不許攔截火車、汽車、輪船上的武器、彈藥、裝備、車輛、器材物資。不許外部人員進駐人民

方块字读书社区

解放軍的指揮機關。已搶奪的人民解放軍的武器、彈藥、裝備、車輛、器材物資應一律封存，限期歸還。今後違反此命令者，當以違反國法論罪。當地駐軍在執行上述命令時，首先要耐心進行政治思想工作，講清道理進行勸阻。如勸阻無效可對空鳴槍警告，令其撤回。在勸阻和警告仍無效時，可宣布這種搶奪行為是反革命行動，並採取措施，對其少數的壞頭頭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辦。遇到這些人拒捕和抵抗時，人民解放軍有權實行自衛反擊。在邊防、海防、島嶼和國防、機要重地值勤的戰士遇有奪槍時，有權自衛反擊。

這個命令出臺時間雖然過晚，社會上已出現解放軍大量武器、彈藥被造反派搶奪，派性武鬥更加激烈，雙方傷亡人數增加的情況，但這個命令仍然對“打、砸、搶”者起了巨大的威懾作用，改變了軍隊罵不還口、打不還手，不准捕人，不准開槍等清規戒律，授予解放軍為了保護武器彈藥對不聽勸阻警告者進行自衛反擊，可以“捕人開槍”的權力。因此很快制止了搶奪解放軍武器彈藥的惡劣風氣，否則搶奪武器彈藥的形勢必然更嚴重，派性武鬥更激烈，雙方傷亡人數更多。甚至壞人混水摸魚乘機搶奪武器彈藥，進行武裝鬥爭，破壞社會主義。

9月中旬某天，周總理由北京給我打電話指示說：張學思（海軍司令部參謀長，原國民黨東北軍將領張學良之弟）出了問題，要我立即回北京處理海軍司令部的問題。我當天下午就飛回北京，向蕭勁光等人了解情況。當時海軍領導誰也說不清張學思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中央在決定逮捕張學思前未與海軍任何領導打招呼，逮捕張學思時，海軍任何部門也未參與。回北京後我得知的情況是，根據中央決定，公安部已將張學思等所謂“東北叛黨投敵反革命集團”的成員全部逮捕了。

張學思的專案組，既不歸海軍管，也不歸中央二辦管。所以被捕後的情況我一點也不知道。

張學思問題發生的很突然，但還是有前兆的。記得我隨主席視察大江南北之前的一天，葉群曾給我打電話說：“張學思在東

北是反林彪的，你們有什麼材料可以寫一些送來。”我在東北與張學思根本不認識（我在北滿，他在南滿），對張學思在東北是反林彪的情況也不了解。因此我交代海司辦公室，整理了一份曾是群眾大字報中批判張學思“單純軍事觀點”為主要內容的材料送上。之後此事就再無下文了。

以後張學思病死在309醫院中，海軍保衛部門曾請示我：可不可以讓家屬去看一下，我的答復是：不僅完全應該讓家屬去看，而且海軍派車。

這時，毛主席也離開上海去杭州、南昌、長沙巡察，于國慶節前夕回到北京。

國慶節後，由楊成武為主，我也一同參加，將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的重要指示，綜合整理成文。

10月7日，中共中央下發通知，將此指示記錄稿，轉發各省、市，各大軍區、省軍區，組織群眾學習，堅決貫徹執行。這個指示對當時文革有重大指導意義，其內容概要如下：

1、對形勢估計。毛主席說：7、8、9三個月形勢發展很快，全國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亂，其實那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

2、毛主席號召各地革命群眾組織實現大聯合。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有些人當了保守派，犯了錯誤，是認識問題。有人說是立場問題，立場問題也可以改變，站隊站錯了，站過來就是了。祇要兩派都是革命群眾組織，就應該求同存異，實現革命大聯合。

3、關於幹部問題。正確對待幹部，是實行革命三結合，鞏固革命大聯合，搞好本單位鬥、批、改的關鍵問題。絕大多數幹部是好的，不好的祇是少數。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要整的，但他們是一小撮。除了投敵、自首、叛變的以外，絕大多數在過去十幾年，幾十年裏，[方块字读书社区](#) 犯了錯誤的幹部，祇要不是堅持不改，屢教不改，都要團結教育他們，要擴大教育面。

縮小打擊面。要解放一批幹部，讓幹部站出來，不要一犯錯誤就打倒。

4、關於上下級關係問題。有些幹部為什麼會受到群眾的批判鬥爭呢？一個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群眾有氣。一個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為了不起，嚴重脫離群眾，不能平等待人，群眾就有意見。今後要吸取教訓，很好解決幹部和群眾的關係，遇事多和群眾商量，做群眾的小學生。

5、對紅衛兵要進行教育，加強學習。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要用我們自己犯錯誤的經驗教訓教育他們，對他們做政治思想工作，要鬥私批修，要擁軍愛民，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把各項工作做得更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四、海軍召開學習毛著積代會

此時的海軍文革形勢，同全國、全軍文革形勢大體相似，雖然派性仍然嚴重，但沒有發生武鬥，沒有人員傷亡。師以下部隊比較穩定，堅持日常工作。師以上機關多數仍然動亂不安，對戰備和指揮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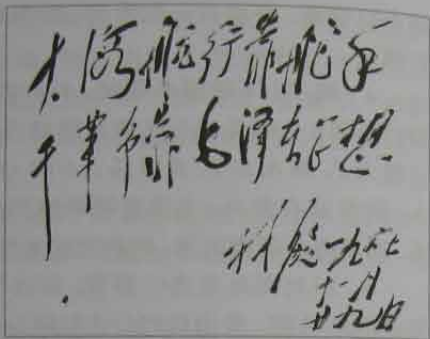
7月1日，軍委決定召開全軍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總政通知說，召開這樣大會，不但將對我軍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把我軍建設成為更加無產階級化，更加戰鬥化的革命軍隊，有巨大的推動作用，而且對全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對毛澤東思想在全世界的廣泛傳播，也將發生重大影響。

海軍黨委根據這個通知指示，決定召開海軍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以便選擇學習最優秀的單位和個人，出席全軍學習毛著積代會。

方块字读书社区

經過上下積極籌備之後，海軍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

大會于1967年11月15日在北京召開了，這是一次約五千人參加的、規模空前的盛會。全體代表榮幸地于12月3日受到毛主席和中央領導人的接見及合影留念，林彪書寫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的題詞，均對會議鼓勵很大。



林彪題詞

關於林彪的題詞還有一段趣事：11月29日，我從林辦得知林彪為大會題詞，非常高興。當晚，題詞送到我家，因第二天黨報、軍報都要公開報道，我將宣傳部同志找到家中研究新聞報道的問題，會議中，海政宣傳部長范丕忠發現題詞中有一處錯字，即11月的“月”字的兩橫中少了一橫，有人提議加上一筆，我當時考慮，不能讓錯字見報，請林彪重寫更是不可能，為保存原稿的真實，我同意并親自為公開報道的題詞中的“月”字加上了一橫。這樣，林彪的手寫稿與新聞稿中的“月”字不同了。

我在會議中作了《以林副主席為光輝榜樣，永遠忠于偉大統帥毛主席，永遠忠于毛澤東思想，永遠忠于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的政治報告。這個報告的重點是宣傳毛澤東思想路綫，同時以相當重的分量宣傳了林彪。

這個報告當時對海軍、對全軍產生了意料之外的影響，贊揚叫好之聲不絕于耳。《解放軍報》要求全文或摘要公開發表，我沒有同意。《人民日報》也要求全文或摘要見報，我也沒有同意。不少軍區和地方單位，紛紛到海軍政治部索要報告文件，我也指示要有限制地提供，僅作為參考，不要翻印，不要見報。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因為在這篇報告中，宣傳林彪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想借此提高解放軍的戰鬥力。當時反軍亂軍浪潮的一次回擊。但是這種提法是否合適？會不會有人趁機詭稱這是在

“揚林抑毛”？在當時複雜的政治鬥爭環境下，稍有不慎，都可能招來滅頂之災。在吃不准上層態度的情況下，考慮還是以低調處理，不擴散為宜。

為什麼強調以林彪為光輝榜樣呢？這並不是我的獨創發明。去年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對林彪已做了相當高的評價，以後不少中央領導人的講話，以及報紙廣播就不斷地為林彪加碼貼金。例如葉劍英在1966年11月21日的講話中明確指出：擁護偉大領袖毛主席，必須以林副主席為榜樣，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好的學生，他對毛澤東思想鑽得最深，學得最活，用得最狠，貫徹執行得最好，最徹底，他幾十年革命的實踐，就是擁護毛主席的幾十年，他用毛主席的人民戰爭的理論，武裝了我軍成為世界革命軍隊的榜樣。

張秀川也在會上作了一個報告，主要是總結學習毛著的經驗及今後的學習任務。

12月1日，海軍黨委作了《關於學習和貫徹林彪副主席為海軍首次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題詞的決定》。

12月5日，在積代會閉幕式上，海軍黨委作出樹立南海艦隊魚雷快艇第11支隊黨委、航空兵第4師“海空雄鷹團”、東海艦隊護衛艇第29大隊“海上猛虎艇”、南海艦隊護衛艇第41大隊“海上先鋒艇”等十一個單位和戰鬥英雄麥賢得、舒積成等十一名個人為海軍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標兵。



會議講話

12月9日，海軍黨委作出了《關於開展向麥賢得、張逸民和魚雷快艇第11支隊黨委學習活動的決定》。

海軍黨委的目的，就是要要在穩定部隊、加強戰備的同時，

方块字读书社区

減少來自社會的干擾，將部隊的注意力引向學習、宣傳海軍樹立的二十二個標兵和麥賢得等三個典型的活動中。

會議結束後的一天，林彪找到他家裏去談話，主要內容有兩條。林彪說：“第一，你在海軍積代會上作的政治報告我已經看了，總的說還是可以，就是對我的評價太高了，俗話說，人怕出名豬怕壯。”

我說：“我是爲了回擊‘揪軍內一小撮’，有意把你強調一下，這不僅是個人問題而是關係全軍的問題。”

我接着解釋說：“自武漢‘七·二〇’事件後，全國性的反軍亂軍，到處搶槍、搶炮，到處衝擊軍隊，到處打罵污辱‘三支兩軍’人員，有的大軍區司令員說話都不靈了，這裏要揪鬥張再道，那裏要揪鬥李再道。如果不把你強調一下，也許將來你的話也不靈了。”

林彪聽了後，沒有吭聲。

他低頭沉思了一會之後，又說：“第二，據說你們海軍機關群眾組織對蕭勁光很不尊重，這不好。你應動員海軍機關群眾組織立即解散（會議閉幕式上，機關群眾組織不讓蕭勁光在主席臺上與我并肩坐在一起，此事林彪知道後很氣憤）。”

又說：“寧願自己受委屈，不要別人受委屈，寧願自己吃虧，不要別人吃虧，寧要別人欠自己的帳，不要自己欠別人的帳。”

我一聽就明白，這段話顯然既有要我更好的尊重團結蕭勁光的意思，同時也有對我批評的意思。批評我對海軍機關“紅聯總”群眾組織的錯誤行爲沒有采取果斷措施。其實我對機關群眾組織某些人常常搞突然襲擊，有過嚴肅的批評，但沒有收到應有效果。據說他們要保持自己的什麼“造反派的精神”。現在雖然有林彪的“尚方寶劍”，要他們解散，仍經過相當長時間的耐心工作，才把這個組織徹底解散。

從此北京海軍領導機關開始恢復正常工作秩序。

方块字读书社区

第三十四章 天翻地覆 （之四）

一、祇要部隊穩定，就能打勝仗

從1967年秋冬到1968年春夏，雖然全國文革動亂情況仍很嚴重，但比較1966秋冬到1967年春夏的全國性至上而下的大動亂情況似乎略有“好轉”。雖然這種“好轉”並非是文革“取得偉大勝利”，祇能說全國性的大混亂、大動蕩的程度有所降低，造反派之間的大武鬥、大奪權由全國各地變為重點地區，文革對國家各方面的破壞有所減少。這種“好轉”的標志，據我觀察有三點：

一、各地中、小學校多數已復課鬧革命，全國性大串聯，不論乘車或徒步基本上已停止了。工廠、農村多數已開始恢復生產，就地鬧革命。但仍有不少學校、工廠、農村、企事業單位和機關，派性嚴重對立，爭吵不休。到北京上訪告狀、請求中央解決問題的人數，經常有數萬人或十餘萬人。

二、各級革命委員會領導班子建立速度明顯加快。到68年9月份止，全國各省市的革命委員會已全部成立。但還有不少省轄地、市、縣、公社及機關、學校、工廠的革命委員會尚未組成，這些地方的動亂情況仍很嚴重。

三、反軍亂軍第二個高潮基本上已經過去，强行硬奪解放軍武器現象，除少數地區外，多數地區已經停止。全國性持續的武鬥情況變為間斷發生的地區性武鬥，但反軍亂軍現象仍很嚴重，保定地區、徐州地區尤為突出。坊間流傳說駐保定地區的38軍要“發生兵變”，為繼續反軍亂軍推波助瀾。

當時，無論動亂多麼嚴重，武鬥多麼激烈，反軍亂軍多麼猖狂，我們海軍黨委始終克服重重困難，頂住壓力，排除干擾，堅持師以下部隊的正面教育，特別是戰備值班部隊和國防工程建設部隊的正面教育工作不受干擾。我們認為，祇有堅持了正面教育，部隊才能穩定，祇有部隊穩定了，才能隨時打擊敢于入侵的美蔣軍從海上和空中對我沿海的襲擾。

1965年“八·六”海戰大捷後，臺灣蔣海軍再也不敢用大型艦艇與我正面交戰了。他們變化了戰術，組成多支“海狼突襲隊”，並將“海狼”艇秘密運到金門、馬祖等島待機。他們使用的“海狼”艇目標小、隱蔽性強、速度快、機動性好、火力強。其主要目標是偷襲我錨地的船舶、伏擊我訓練中的艦艇、襲擊我漁船商船、掩護小股武裝分子登陸等。由于艇小、速度快，幾乎在浪尖上飛行，因此我雷達回波顯示與海鳥群相似，很難區別和發現。蔣海軍與我海軍玩起了“貓捉老鼠”。

根據敵情，我們要求南海艦隊，堅決打擊蔣“海狼突襲隊”。

1966年秋，我部隊發現蔣四支“海狼”艇，趁夜色從馬祖竄出，向我沿海靠近。指揮所命令海上待機的四艘護衛艇從兩個方向出擊。不到一小時就擊沉一支“海狼”艇，擊傷兩支“海狼”艇（其中俘獲一支“海狼”艇，並俘敵兩人）。

1967年6月26日，我海軍航空兵6師16團大隊長王柱書、飛行員呂紀良雙機起飛，在海南島文昌縣東南135公里上空，一舉擊落美F-4C戰鬥機一架。這是自文革開始後，在全國大動亂的局勢下，我海軍作戰部隊的首次戰鬥勝利。這也是海軍航空兵師堅持正面教育、穩定部隊，加強戰備的成果。海軍命令，給王柱書、呂紀良記一等功。

1968年2月14日，我航空兵第6師18團接到警報，副大隊長陳武祿、飛行員王順義雙機起飛，在海南島萬寧地區上空，一舉擊落、擊傷入侵美海軍A-1H轟炸機一架。這是該師在不到一年的時間中，第二次對敵空戰的勝利。參戰部隊受到中央軍委

的通令嘉獎，海軍給陳武祿、王順義各記一等功。

文革開始後，我海軍部隊在不斷打擊美蔣軍從海上和空中的襲擾外，又接受了中央軍委新的作戰命令。從1966年下半年，根據軍委的統一部署，我海軍高炮部隊（3—4個團）及對空雷達、探照燈部隊共計萬餘人，編入陸、空軍高炮部隊的戰鬥序列，入越作戰。

我海軍入越作戰部隊是採取輪戰式，既前期入越部隊，經一段時間的作戰後，由新部隊接替陣地。當時文革正處在大動亂、大武鬥時期。我們要求參加輪戰的入越部隊堅持正面教育，并在政治思想、戰鬥作風、戰術技術、武器裝備、後勤保障等各方面做好充分的準備。

1967年6月30日，我海軍高射炮第1團在入越作戰中，一天內擊落美機十六架，擊傷多架，創單日擊落擊傷入侵美機的新記錄。戰後，受到毛主席親自簽發的中央軍委通令嘉獎。

北海艦隊高炮2團3營入越作戰，在保衛友誼關至河內鐵路段七個月的作戰中，擊落敵機二十九架，擊傷二十八架，我人員、裝備無損。3營在戰鬥中不斷總結經驗，摸索出一套用老式裝備對付敵先進飛機的辦法。該營戰鬥總結被選入海軍作戰範例。

1968年2月中旬，海軍黨委指示海司、海政、海航組成工作組前往越南，向入越作戰的東海艦隊高炮獨立8營慶功和慰問。該營在入越作戰的八個月中，作戰四十一次，取得擊落敵機二十八架，擊傷敵機三十一架的重大勝利。

1968年1月3日，根據海防部隊、空防部隊和高炮部隊作戰新形勢對部隊加強戰備的要求，海軍黨委向全體部隊指戰員下發了《關於正面教育部隊必須堅持正面教育、保持部隊穩定的指示》。《指示》對當時穩定海軍部隊，加強戰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指示》中特別強調了幾點：

一、各級黨委、各級領導，要加強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全體人員都要懂得穩定部隊。面教育部隊一定要按照中共中央1967年11月14日通知以及過去中央歷次指示執行，堅決

抵制和克服無政府主義思想對部隊的侵蝕。

二、正確對待幹部，堅決制止隨便扣政治帽子、揪鬥幹部、抄家封門等錯誤做法；對領導幹部的缺點錯誤，採取黨內整風或辦學習班等方法解決。

三、正面教育部隊不得擅自干涉和插手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凡擔任戰備值班任務及其他特殊任務的艦艇支隊、航空兵師一律不參加“三支”“兩軍”工作；沒有戰備值班任務的艦艇支隊大隊以下、航空兵師團以下人員免除“支左”任務。地方群眾組織和軍隊開展四大的單位不許到正面教育部隊進行串聯。

四、各單位應遵守中央關於“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檔案和技術資料，一律不得索取和搶劫”的規定，任何個人不得已任何理由索取和查封“個人檔案材料”。

五、提高警惕，嚴防階級敵人破壞。

海軍黨委要求向海軍全體指戰員傳達，並堅決執行。

這是自去年軍委八條命令後，海軍黨委對所屬正面教育部隊和戰備值班部隊保持穩定、加強備戰的最嚴格的要求。

1968年2月底，海軍召開了政治工作座談會，會議的主要議題之一是在穩定部隊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基層政治思想工作建設。會議期間，會議代表受到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接見。

看到海軍部隊的穩定和作戰部隊不斷傳來的勝利捷報，我的心裏真的很高興。在文革大動亂的特殊年代中，既要把部隊穩定住，又要打漂亮仗，我肩頭的壓力千萬重！

二、“楊、余、傅”事件

1968年的3月，發生了震動極大的“楊、余、傅”事件。事件發生的真實情況，我始終沒有弄得很清楚。

“楊、余、傅”事件其實是兩碼事，並非一回事。勉強把他們

聯在一起，祇是因事件發生的時間相差不久。

楊成武、余立金問題的起因，據說是代總長楊成武有一個女兒在空軍報社工作，與空軍政委余立金的秘書關係密切，情況匯報到空軍司令員吳法憲那裏。爲了不影響楊成武的威信，空軍有關部門就把余立金的秘書控制起來了。事發後，楊成武女兒就鬧着要自殺。

這樣一來，不僅引起余立金的不滿，更引起楊成武的強烈不滿，因此都對吳法憲意見很大。楊成武的夫人和余立金先後到林彪處告狀，吳法憲思想壓力極大，也跑到林彪那裏訴苦，結果林彪同情和支持吳法憲，並報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知道情況後，連續召開了幾天的會議，江青在會上不僅詆毀楊成武，還說傅崇碧“帶人帶槍衝釣魚臺”。最後毛主席決定拿掉楊成武。

3月22日，經中央決定，撤消楊成武代總參謀長的職務，撤消其中央軍委常委、軍委副秘書長、總參黨委第一書記職務。撤消余立金空軍政治委員、空軍黨委第二書記職務。同時任命黃永勝爲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當天深夜，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召集王新亭、邱會作、我和江文（軍委通信兵部主任）四人開會，交待任務說：“楊成武犯了嚴重錯誤，毛主席、林副主席已決定其離職審查。由邱會作、李作鵬負責去把他立即找到這裏來。由王新亭負責封查他的文件和私人物品，由江文將楊家的軍綫電話切斷。”又說：“我已通知衛戍區，將楊成武家的警衛部隊換下來了。”

當時我毫無思想準備，我對楊成武的工作能力一直是敬佩的，總理突然交辦這樣的任務，使我的思想產生了極大的震動，但是作爲下級我祇有服從命令。

接受任務後，邱會作和我乘車至楊成武住宅，來到二樓辦公室時，楊很快地從臥室內出來，邊穿衣服邊驚慌地問我們兩人說：

“老邱，怎麼樣？出了什麼事？”

邱會作回答說：“周總理要我們來請你立即到人民大會堂

去。”

楊又問：“到大會堂幹什麼？”

邱答：“我們也不清楚。”

待楊穿好衣服，我們一起下樓。楊成武已經預感到將要發生的事情，要求見一下他的家屬子女。此時王新亭已將他的全家老小集中在會客室內，楊推開會客室大門，站在門口，同家屬說了幾句安慰的話，就同我們一起乘車到達人民大會堂。

我們到達楊成武家時，還發生了一件小插曲：楊成武家和徐帥家僅一牆之隔，當總理布置衛戍區更換警衛部隊時，引起了徐帥家工作人員的警惕，結果徐帥秘書未經請示報告，就將徐帥也給扣了起來，並收繳了徐帥保密文件櫃的鑰匙，引起了一場誤會。

到達大會堂後，林彪和總理在福建廳接見楊成武，由林彪批評了他的錯誤，並宣布離職審查的決定。

宣布之後，連同楊成武的家屬子女，先送武漢，後又送河南洛陽隔離審查。

而余立金據說是“叛徒”，由吳法憲負責，當時就將他關押起來了。

關於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的問題。據說是3月5日夜接受江青給予的任務，到某處尋找被遺失的魯迅的書信手稿，結果在中央文革找到了下落。傅崇碧很高興，於3月8日沒有請示批准，就帶上秘書（秘書手提公文皮包等）乘車親自到釣魚臺江青的住處報告情況。

到江青處後，傅的秘書精神過於緊張，一進會客室就被地毯絆腳，“啪”一聲摔倒在地，其皮包拋到江青的身旁，把江青嚇了一跳。

江青大罵傅崇碧：“你這是幹什麼？你身為衛戍司令，不經請示就衝進來，你要抓人嗎？你懂不懂紀律？”

傅崇碧說：“報告江青手稿找到了，現在中央文革。”隨後就告辭退出來了。

這就是傅崇碧的所謂武裝衝擊中央文革的“滔天大罪”。

後來，在中央碰頭會上，江青還多次說，傅崇碧秘書拿的那個皮包裹可能有手槍，是企圖謀害她的。因為沒有來得及用手槍，就企圖用皮包打斷她的腰骨。秘書倒在地上還斜眼狠狠地盯住她。這種“莫須有”的罪狀誰能相信呢？但是誰又能阻止類似情況的發生呢？

經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3月22日下令，撤消傅崇碧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的職務，同時任命溫玉成兼北京衛戍區司令員。

3月24日凌晨，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駐京機關和部隊團以上幹部會議，由林彪講話，中央碰頭會議成員均坐在主席團位置上。毛澤東最後也出臺露面，但沒有講話。

林彪首先講，今天這個會議，要向同志們宣布中央最近一個重要決定。最近我們黨的生活中間又出現了新的問題，發生了新的矛盾，發生了階級鬥爭新的情況。這個問題雖然沒有像劉鄧陶，彭羅陸楊那樣大，但也比一般其他問題要大一些。所以毛主席說，就是這樣一個不大不小的問題。這就是最近空軍裏面發生了楊成武同余立金勾結要奪空軍的領導權，要打倒吳法憲。楊成武同傅崇碧勾結，要打倒謝富治。楊成武的個人野心，還想排擠許世友、韓先楚、黃永勝，以及其他與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毛主席那裏最近接連開了四次會，是主席親自主持的，會議決定撤消楊成武的代總長職務，要把余立金逮捕起來法辦，撤消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的職務。決定由黃永勝同志擔任總參謀長，決定由溫玉成兼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

林彪接着講，生活就是矛盾，生活就是鬥爭。我們當然希望沒有矛盾，然而矛盾是事物的客觀規律。過去、現在、將來永遠也不能消滅矛盾。而矛盾總是通過鬥爭來解決的。我們盡量希望我們的同志不犯錯誤，少犯錯誤，不犯大錯誤，希望不出事，希望少出事，希望不出大事。這**方块字读书社区**是我們的願望。可是客觀規律總是矛盾的，總是要出事的。所以我們祇有面對客觀，面對現實，

揭露矛盾，解決矛盾。

林彪繼續說，楊成武的錯誤，主要是山頭主義，兩面派，曲解馬克思主義。關於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個人主義、派性，祇是名詞不同，本質上是相同的，它是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同共產主義是不相容的，同共產黨的黨性是不相容的，同黨的團結是不相容的。它是反共產主義的，反黨的，破壞團結的。關於兩面派問題，他是一個兩面三刀的人，他參加反羅瑞卿，但他實際上是一個羅瑞卿分子，他參加反對彭真的鬥爭，但實際上他是擁護彭真的。他當面一套背後一套，陰一套，陽一套，作了事情不承認。傅崇碧前一個時期帶幾輛汽車，全副武裝衝進中央文革的住地去抓人，這件事本來是楊成武的命令，三次給傅崇碧指示，但是楊成武不承認。他也反對賀龍在空軍罷官奪權，可是他自己却在空軍罷官奪權，要把吳法憲打倒。表面上他對毛主席是擁護的，但實際上他對毛主席是不忠誠的，對中央文革是不忠誠的。關於那篇大樹特樹的文章，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毛主席不贊成這樣提法。去年12月17日毛主席是這樣批示的：“絕對權威提法不妥。從來沒有單獨的絕對權威，凡權威都是相對的，凡絕對的東西祇存在相對的東西之中，猶如絕對真理是無數相對真理的總合，絕對真理祇存在各個相對真理之中一樣。”楊成武說，他有哲學根據，是合乎哲學的，這種說法是荒謬的，不但哲學上是荒謬的，就是在政治上也是不通的，所以是反馬克思主義的。

在毛主席決定拿掉楊、余、傅問題上，江青起了作用。會上，林彪說：“很顯然江青同志是我們黨內女同志中間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們黨內幹部中間很杰出的一個幹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同時對事物很敏感。過去由於她多年身體不怎麼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就看出她的作用。她不但政治上是很强的，文化藝術方面也是內行。”

事後，葉群告訴我，這是江青請林彪幫她說幾句話，說她現在處境很為難，不少人反對她，反對中央文革。林彪難推脫，

方块字读书社区

就照辦了。

講話完畢將要散會時，林彪站起來親自領導大家高呼口號，其中有一條就是“打倒劉、鄧”，我聽了之後覺得這樣喊可能不好，特別是林彪帶頭喊更不好。因為我知道，毛主席1967年夏秋時節在上海視察時講過“劉、鄧有三條區別”的指示，並想要為鄧小平安置工作。其實喊不喊“打倒劉、鄧”，我心裏也沒有底，因為文革從一開始就喊“打倒劉、鄧”的口號，而現在毛主席又講劉、鄧有區別。我們搞軍事的武將，真是跟不上政治家的思路。

過了兩天，我為此到毛家灣去見林彪。

我問林：“知道不知道毛主席講的劉、鄧有三條區別？”

他說：“不知道。”

我又問林：“知道不知道毛主席要安排鄧小平的工作？”

他說：“也不知道。”

我就把去年在上海知道的情況向他談了，他靜思了很久沒有說話。

我坐了一會兒，略談了一點其他問題就離開了。

當時我有些不解：毛主席講的劉、鄧有三條區別和要安排鄧小平的工作，都大半年了，怎麼連“親密戰友”，副統帥都不知道呢？林彪聽後靜思了很久沒有說話，他又在想什麼呢？

文化大革命將近兩年的時間，經過了五個大“戰役”。第一個大“戰役”，打倒了彭羅陸楊；第二個大“戰役”，打倒了劉鄧陶；第三個大“戰役”，擊退“二月逆流”；第四個大“戰役”，打倒“小爬蟲”王力、關鋒、戚本禹；第五個大“戰役”，打倒楊、余、傅。當時說這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三、參加軍委辦事組工作

楊成武垮臺後，由葉永盛擔任總參謀長和總參黨委書記，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軍委辦事組（1967年9月下旬成立，楊成武任組

方块字读书社区

長，吳法憲任副組長）也進行改組，由黃永勝任組長，吳法憲任副組長，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為組員。之後，又增加了謝富治、溫玉成、劉賢權為組員。1969年4月，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確定了新軍委辦事組及成員。

1968年9月，中央及軍委命令，任命我和邱會作為副總參謀長（吳法憲早已是副總參謀長了）。

參加軍委辦事組工作後，我肩上的擔子越來越繁重。除參加辦事組研究、討論和決定全軍戰備、調動、訓練、裝備、國防工程建設、抗美援朝作戰方案制定、三北防突然襲擊作戰方案制定和防止美、蔣軍的海、空騷擾等全軍重大會議和重大問題的處理外，“九大”後，中央又分工我擔任核潛艇工程領導小組組長、造船工業領導小組組長、電子工業領導小組組長，還是中央專案第二辦公室領導成員之一，並兼管饒漱石、蕭華兩個專案組具體工作（我的頂頭上司是江青領導的饒漱石專案組和陳伯達領導的蕭華專案組）。辦事組又分工我兼管解放軍報工作，總理又指定我兼管國家體委工作。

當時，不少地區派性依然嚴重，武鬥依然成風，反軍亂軍的勢頭依然不減。中央要求辦事組成員陪同中央負責人解決各地區派性鬥爭問題。當時指定我陪同總理解決徐州地區問題和內蒙問題，陪同陳伯達解決湖北問題，陪同康生解決山東問題，陪同謝富治解決保定地區問題等等。今天飛到這裏，明天飛到那裏，經常是點燈熬油的馬拉松式會議，搞得人困馬乏、精疲力盡。祇好利用飛



方块字读书社区 成員在北京西山
左三起：邱會作、吳法憲、黃永勝、李作鵬

機上的個把小時睡覺。

還有海軍（當時稱為“自留地”）大量的工作、會議和堆積如山的文件等待處理，更不能置之不理。待把中央和辦事組的工作處理完後，還要處理海軍的問題。每天的工作從早到晚安排的滿滿的，經常是走馬燈式的一個會接着另一個會，祇好利用在車上的時間，吸着氧氣，再看下一個會的文件和思考下一個會的問題。工作一直持續到深夜，回到家中身體像散了架子。

工作的繁重和壓力，搞得人日夜忙亂，精疲力竭，狼狽不堪，恨不得生出三頭六臂來處理工作。經常每天工作十五六個小時，睡眠祇有四五個小時，有時剛吃安眠藥睡下，電話一響，爬起來就要參加緊急會議。我也知道吸煙不好，但當時我每天至少要吸三包煙，這是我唯一的提神辦法了。

沒日沒夜的工作，使我的心臟病隨時隨地可能發作，當時，在我的衣袋中，在隨行警衛員的皮包中，在隨行醫生的保健箱中，各種搶救心臟病發作的急救藥物是必備的。為了保護心臟，醫生要求我，每天工作的空隙時間和睡覺之前必須吸氧氣。我的辦公室、家中和車上都放着氧氣瓶，以至氧氣瓶成了我所在地的標記。講個小故事：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和邱會作在北京見面時他告訴我，在秦城監獄時，他看見在一間牢房門外放着一個大氧氣瓶，就知道我被關在裏面。

當時，辦事組的其他人，也和我一樣被工作壓得喘不過氣。

盡管萬事忙，分別緩急辦。

第一、我負責解放軍報時，正是軍報最混亂的時期，隨時有停刊的危險。毛澤東的女兒李訥（又名蕭力）等人奪取了解放軍報社領導權，成立以蕭力為首的解放軍報新的臨時總編輯小組。他們以是否擁護蕭力為站隊標準，凡對蕭力領導有意見有批評的，就是反蕭力；凡是反蕭力的，就是反江青，就是反毛主席，就必須打倒。這樣的站隊使大批幹部靠邊或打倒。

我和黃永勝以軍委

方块字读书社区

集了軍報一個小型會議，對軍報把大批幹部靠邊或打倒提出批評，並說明群眾對蕭力的領

導有意見，有批評，不能上綱為反江青，反毛主席。同時指出，在軍報不能繼續工作的幹部，可以同各大軍區報社之間進行對調。記得當時，黃永勝還指示，解放軍報和解放軍畫報要少發軍委辦事組的消息和照片，要多宣傳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多宣傳林副主席。

不久會議精神被江青知道了，在一次中央碰頭會議上她又發脾氣。大罵黃永勝和我在軍報整蕭力，搞復辟，保護走資派，並報告了毛主席。她原想借機整黃永勝和我，不想，毛主席決定將蕭力調離軍報，下放中央辦公廳幹校鍛煉。這樣軍報工作才稍有好轉。可是擁護蕭力的那伙造反派就把矛頭對着我進行搗亂，當時的工作仍然困難重重。

因此我管軍報工作期間，僅僅維持“軍報抄黨報”，堅持出版而已，並未根本扭轉軍報的動亂形勢。

第二、協助辦事組處理一些情況。我記得“江文事件”和“軍科要求批判葉帥”兩件事就是我親自處理的。

1968年夏天，軍委通信兵部利用新技術，特制了幾十臺質量好，保密性能強的電話，準備給中央領導、軍委和軍委辦事組領導每人的辦公室裝一臺。這本來是件好事，但溫玉成却跑到江青處誣告：電話中安裝了竊聽器。江青聽後大怒，在中央碰頭會上責成辦事組徹底查清此事。

軍委通信兵部與電子工業相關，分工我管。黃永勝就把調查“竊聽器”的事情交給我負責。經查，根本沒有此事，純屬謠言。辦事組按“查無實據”報告了中央碰頭會和江青。

但是江青依然不依不饒。她強詞奪理地說：“那是我們發現的早，安放竊聽器的陰謀沒有得逞，”又說：“一定要嚴肅處理，江文是壞人。”

總理和黃永勝分別把此事向林彪做了匯報，最後決定，將江文調蘭州軍區任副司令員。

江文同志是我軍第一仿缺字读书社区業的幹了三十多年，是我軍通信兵事業的奠基人之一，做出了很大貢獻。江青一句話

就幹不成了，真是害人。

我和江文的關係不錯，他臨上任前，我在京西賓館請他吃了飯，他仍問我，他的工作調動是不是因為有什麼問題，我說：“辦事組報告中央是查無實據，”又勸他：“先出去避避再說吧。”

文革中，軍事科學院也很亂，兩派意見對立，主要表現在反對葉帥還是支持葉帥。科學院的領導說話不那麼靈了。

有一天王樹聲、閻揆要帶各派意見的代表到京西賓館，請示軍委辦事組怎麼辦？當時軍委辦事組派我接見了他們。

他們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一，他們提出要開批判葉帥大會，請葉帥出來參加可不可以？我說：“不可以！我代表軍委辦事組宣布堅決不同意。”第二，他們提出要把葉帥的住房圍起來，架上廣播喇叭向屋裏宣讀批判葉帥的文章，可不可以？我說：“不可以！堅決不同意！你們這麼一鬧，葉帥怎麼工作和休息？”第三，他們提出把批判葉帥的大字報集中起來送到他家去，可不可以？我說：“這一條我同意，但不能把大字報貼在牆上和院子裏，最好將大字報抄成小字報送去。”

王樹聲同志怕落實不了這三條意見，要我派一位軍委辦事組的工作人員去幫助他們落實。我答應可以派一個聯絡員經常到你們那裏看看，如有違反這三條意見的，立即報告我們。事後我向黃永勝匯報，他同意我的處理意見。

第三、由於國務院多數部門領導都靠邊了，幾個與軍工關係密切的機械工業部均實行了軍管。總理指示我負責造船、電子兩個工業領導小組的工作，同時兼管國家體委工作。

我的重點是抓造船工業，因為造船工業與海軍建設關係密切，與電子工業也有關係。

1967年4月，中央軍委批准了《海軍裝備科研第三個五年計劃》。該計劃提出了自主研制中型水面艦艇、潛艇和核潛艇的規劃與實施。該計劃的實現，將使我海軍裝備提高一大步，並發生質與量的飛躍。

方块字读书社区

我多次主持召開海軍、國防科委和造船工業的各種會議，

確定建造艦、船的方針、規劃和措施，解決和協調遇到的各種困難。多次到科研和生產第一線，檢查研制進度。

這裏着重說一下，我參加代號09工程的核潛艇的研制工作。核潛艇是一個國家國防實力的重要標志，是我們海軍從“近海防禦”走向大洋，衝破帝國主義對我沿海進行封鎖的裝備基礎。

經國務院、中央軍委決定，爲了加快09工程進度，於1969年10月成立了核潛艇工程領導小組，我任領導小組組長。主要成員有：國家計委主任余秋里；國防科委副主任錢學森、羅舜初、趙啓民；海軍有副司令員周希漢和裝備部副部長侯向之；還有一機部副部長周子健，二機部副部長劉偉，六機部副部長邊疆和第七研究院副院長陳右銘等。從小組成員可見，建造一艘核潛艇要諸多單位同心協力，須全國一千多個工廠協作，可見建造核潛艇談何容易。

1968年11月，第一艘核潛艇開工建造。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攻擊型核潛艇終於下水了，到1971年4月，各個系統在碼頭調試完畢，隨後準備裝填核燃料進行試航，填補了海軍遠洋攻擊能力的空白。

在六機部和多家大型造船廠的共同努力及各方面密切配合與協同下，造船工業情況逐步好轉，萬噸以上的遠洋貨輪下水數量逐年增加。

按照《海軍裝備科研第三個五年計劃》，1967年，新型獵潛艇批量制造，1968年代號053工程的導彈護衛艦開始研制，1969年5月，常規動力潛艇開始批量制造，1971年8月，第一艘代號051工程的導彈驅逐艦開始試航。同時，大型海洋調查船等紛紛下水或開工建造。新的造船廠、新的魚雷水雷廠、新的艦對艦導彈、艦對空導彈和岸對艦導彈、新的長波臺、新的衛星導航臺等也先後開工生產和研制成功，進展不慢，整個造船工業形勢不壞。

林彪見此形勢很高興，提出要建造航空母艦，要建造大型遠航登陸艦，要成立海軍陸戰隊。此形勢也很高興，提出要建造五十萬噸級的大型運輸船。但周總理很慎重，曾兩次提醒

我，造船花樣不能太多，要抓住重點。但江青却說在造船企業中“生產壓制了革命”。

負責電子工業工作，由於精力和業務水平有限，我是盡自己的力量進行了一點幫助，成績不那麼顯著。

國家體委的工作影響面不大，相對比較穩定，但重點是涉及國際交往和比賽的外事工作。當時，曹誠同志負責體委的具體工作，協助我處理了大量工作，對我的幫助很大。曹誠原是總參軍訓部的副部長，“三支兩軍”時，任國家體委軍管會主任。

我對國家體委的工作，印象最深的，是周總理親自導演的“乒乓外交”和江青一手策劃的“曹誠事件”。

1970年冬，國家體委一份關於是否派隊參加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的報告，放在了我的面前。這不僅是國家乒乓球隊中斷了兩屆（1967年的第29屆和1969年的第30屆）後重返該賽事，而且是中國體育代表團自文革以來第一次出國，並到未與我建交的日本參加大型國際賽事。這不僅是體育方面的大事，也是外交方面的大事。

事關重大，必須立即向總理報告。總理看了體委報告，沒有立即表態。幾天後，在政治局會議上，總理提出此事讓大家議一下。會後，總理與我說：“現在去不去還定不下來，但體委和運動員要做去的準備。”我把總理的指示轉告了曹誠。

當時，在政治局的會議上，江青一伙人以批陳整風是全國的頭等大事為由不同意派隊參賽，軍委辦事組的幾個人和總理表示同意參賽。

1971年初，周總理向毛主席請示，毛主席很快批示：“同意派隊參加比賽”。事情就這樣的定下來了。

事後，總理在召集外交部和國家體委開會研究具體參賽事宜時，道出了他堅持參賽的真正想法：第一、中國遲早要重返國際社會，並會在國際舞臺扮演着重要角色；第二、積極開展“民間外交”，體育沒有國界，今年你邀請我去，明年我也可以邀請你來，相互學習，共同提高；第三、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是這次中國乒

乒乓球隊的方針。

當時，中國派隊參加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的消息一公布，立即成為國際輿論關注的焦點。我乒乓球隊到達日本後的良好表現和高超球技也給國際社會和體育組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比賽期間，又發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美國乒乓球隊向我方主動提出希望到中國比賽的要求。

消息傳來，總理緊急召集外交部和國家體委開會研究對策。幾十年來，中、美兩國的關係處於敵對和隔絕的狀況，無論是政府層面還是民間接觸，都是十分敏感的問題。是否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當時除毛主席外，誰也不敢做主。

最後，毛主席親自批准同意邀請美乒乓球隊來華比賽。消息傳出，世界震驚！

美乒乓球隊來華接待的規格是很高的，在北京比賽時，總理不僅親自出席觀看，而且接見了美乒乓球隊全體，並合影留念。

美乒乓球隊順利結束訪問後，我和曹誠及體委的有關人員如釋重負，還以為圓滿完成了任務。不久，在一次總理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江青突然大聲說：“現在的國家體委執行了一條沒有榮高棠的榮高棠路線，問題性質非常嚴重。”又說：“現在體委推行了一條直接與毛主席革命路線根本相反的資產階級路線，嚴重破壞和干擾了毛主席的革命外交和體育路線。”

江青所指的，就是不久前來訪的美乒乓球隊。她說什麼：“像接待國家元首一樣接待美國人，崇洋媚外。”什麼“美國人在賓館大跳搖擺舞，怎麼沒有人管？”什麼“美國人到處照相，是收集情報，怎麼沒有人管？”等等。她提出：“要報告毛主席，要嚴肅查處體委的問題。”

會後，總理把我留下，了解曹誠的情況，我向總理報告說：“曹誠是好同志，這幾年把體委原來那麼一個爛攤子搞成現在這個樣子已經很不容易了，要不是曹誠在體委，莊則棟、李富榮他們還不能解放呢。”我又說：“曹誠長期在部隊工作，突然接觸到

方塊字讀書社區

這麼複雜的外交活動，大問題上是按總理的指示原則辦的，也許有些小的問題沒有注意到。”總理一邊聽我的講話，一邊點頭同意。最後我說：“曹誠早就提出體委不好幹，願意回部隊，我沒有同意。”

當時，體委的工作總體是好的，但文革以來，特別是重新恢復乒乓球等國際體育交往以來，也出現了一些並不嚴重的問題，例如莊則棟曾對朝鮮體育官員說：“知道朝鮮女排打敗了蘇修女排，我們很高興。”朝鮮體育官員回答說：“我們的主要敵人是美帝國主義。”又如西方記者問我乒乓球運動員：“中東戰爭中國是支持埃及，還是支持以色列？”我運動員不知如何回答等。

5月，中央召開了全國體育工作會議，經總理批准，我在大會上做了總結發言，發言中，我既總結了“乒乓外交”和國際體育交往中“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成功經驗，也提出了工作中的某些不足。

曹誠在會上做了檢討，會後，曹誠調離體委。

第四、全國不少地區派性鬥爭仍很嚴重，各派不能聯合，省以下各級革委會遲遲建立不起來，工農業生產無人負責。兩種不同觀點群眾組織代表，成千上萬涌來北京，請求中央解決問題。不知開了多少次通宵達旦的大會、小會，聽取兩派爭吵，再同他們協商解決辦法。有時一、兩個月也達不成協議。

軍委辦事組成員分別陪同中央常委負責人，先分工負責提出方案，後統一研究，拍板定案解決各個多事地區問題。由於中央常委有負責人和主管領導，我們這些人，祇是聽聽意見，提點建議，做點指定的具體工作而已。雖然不起主要作用，但也得陪着整夜通宵地熬時間。

至於各中央專案組的工作，也是由中央常委負責領導，他們不開口，不點頭，不搖頭，我們做具體工作的當然不便說三道四。有時提點建議，有時照例劃圈，什麼不說也可以。專案組中的專案對象都是一些重要高級幹部，不了解其複雜情況，採取少說為佳的慎重態度是比較明智的。

方块字读书社区

四、解放幹部和處理層層站隊問題

自1967年11月，海軍召開了學習毛著積代會之後，海軍黨委和李、王、張在海軍部隊中的領導威信有進一步的提高。因此我們利用這個有利條件，以及我隨毛主席南巡到上海時得知毛主席要解放鄧小平的意圖，開始更大膽地落實解放海軍幹部政策。當時的具體做法是：

第一、對明知沒有什麼嚴重問題，但群眾鷄毛蒜皮意見不少的高級幹部，實行上下左右互相調換，擺脫原單位群眾的糾纏。

第二、對基本上是好的，但問題不少，群眾抓住不放的幹部，採取辦學習班的形式進行解放。1968年2月底，海軍召開的政治工作座談會，除研究進一步加強基層政治思想工作建設外。另一主要議題就是研究通過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方式，分期分批的解放幹部。大家都認為這是解放幹部的好辦法。會議還總結了已經開始辦的第一期學習班的經驗。

從1968年1月起，海軍辦了六、七期學習班，每期時間二至三個月，每期人數有百餘人，參加學習班的幹部共計千人左右。學習班的學員，主要來自海軍開展四大單位中的團、處級以上的領導幹部和參加各省地方“三支兩軍”工作的海軍各級幹部。讓他們脫離開原單位，集中到北京學習。



万块字读书社区

1968年8月，接見第三期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成員

在學習班中的重要領導幹部

的檢討，海軍領導都表明同意其檢討的態度，一般領導幹部的檢討，學習班的領導也表明同意的態度，切實保護其過關。

學習結束時，海軍領導隆重接見，合影留念。這不是簡單的形式，而是故意做給造反派看的。當時有此需要，也有其一定政治意義。通過學習班的形式和海軍黨委的表態，使大批幹部得以解放並重新回到了工作崗位。

第三、對群眾揭露出有嚴重政治問題的幹部，由幹部部門組織調查組，負責復查核實材料，然後做出結論，並與幹部本人見面，允許其提出不同意見。

第四、對少數有嚴重歷史問題，又有嚴重現實問題的幹部，成立專案組進行審查。黨委分工由王宏坤負責專案領導工作。

由於採取了落實政策，解放幹部的大量措施和辦法，確實解放了相當數量的中、高級幹部，大批領導幹部重新回到了工作崗位。

海軍解放幹部的工作成績十分顯著，對穩定部隊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當時不少駐京軍兵種單位和大軍區來海軍學習經驗，也頗欣賞海軍落實解放幹部的政策、措施和辦法。

1968年5月20日，毛澤東、林彪及其他中央領導接見了海軍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全體同志。毛、林接見海軍學習班的學員，不僅使參加接見的學員倍受鼓舞，而且也是對海軍以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方式解放幹部的肯定。這樣，在解放幹部問題上，我們黨委心中就更有數、更有底了。

但在當時極左路綫的環境和影響下，以及怕犯復辟、復舊錯誤的思想顧慮，海軍仍有一批冤、假、錯案，沒有得到及時糾正。主要是與中央已決定的重大事件有牽連的人和事，如羅瑞卿問題、賀龍問題等。

此外，我們還着手處理海軍層層站隊問題。層層站隊也就是搞多中心的一種表現，它不是按照毛澤東思想和黨的路綫方針進行站隊，而是以擁護或反對某人或某幾個人的領導為標準，進行站隊。由於上行下效及站隊要具體化的錯誤思想指導，似乎中央

有正確和錯誤路線的代表，有“兩個司令部”的“搏鬥”，各級無例外地都應有這種現象。這樣形成各級都有不同觀點的正確路線的代表和錯誤路線的代表，各級都有“兩個司令部”的鬥爭。這兩種錯誤觀點，長時間相互對立，相互摩擦，爭吵不休。由政治思想上的錯誤，發展到組織上的錯誤。其惡果，既破壞了上下左右各方面的團結，又嚴重地影響了部隊穩定和革命化、戰鬥化的建設；既發展了資產階級派性，又掩護了某些人煽動無政府主義思潮。

海軍層層站隊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呢？

文革初期，毛澤東、林彪和中央軍委、全軍文革，首先肯定海軍李、王、張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是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的，同時又肯定蘇振華是“彭、黃漏網分子”，是“劉、鄧司令部的人”，是應該打倒的對象。這樣中央和軍委就在海軍黨委內部確定了兩個界限分明的陣營，這是形成層層站隊的主要根源。

當時各艦隊、各院校的主要領導幹部，有的“壓制了群眾運動”，犯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錯誤；有的平時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有錯誤，脫離群眾，引起群眾不滿；有的是過去反對李、王、張，擁護蘇振華的，政治風向一轉，他們就受到衝擊，說話無人聽，指揮機關處於半癱瘓或癱瘓狀況。

為了與中央和軍委保持一致及穩定部隊，堅持戰備的需要，海軍黨委支持和解放了各艦隊大多數受衝擊的幹部站出來工作，以各種不同方式進行表態，保護他們。而這批幹部又希望以支持海軍黨委和李、王、張提高自己的領導威信，取得群眾信任，這就是在中央確定的大背景下，海軍內部上上下下互相支持、互相依靠而形成層層站隊的主要原因。

其次是海軍部隊和院校主要分散在沿海各省市，並擔負當地的“三支兩軍”任務，海軍部隊不同觀點的形成又與所在地各大軍區、各省市群眾不同觀點相聯系的。例如旅大地區，一種觀點是支持海軍黨委和李、王、張，不支持沈陽軍區和旅大警備區。另一種觀點反之。山東地區一種觀點是支持海軍黨委和李、

方块字读书社区

王、張，不支持王效禹（省革委會主任）和楊保華（青島革委會主任），另一種觀點反之。沿海其他地區，皆有類似情況。總之，海軍部隊及院校基本上是以支持海軍黨委和李、王、張或反對海軍黨委和李、王、張的兩種相反觀點，劃綫站隊。

總之，由于層層站隊，又人爲的“制造”了一批犯站隊錯誤的領導幹部。

我們對於這種錯誤，自1968年就開始糾正：第一、強調要以擁護或反對毛澤東思想和黨的路綫方針爲標準進行站隊，而以某級黨委或某幾個領導人爲標準站隊是錯誤的；第二、立即停止突出李、王、張的宣傳，明確指出這樣做不是真正支持李、王、張，而是“幫倒忙”；第三、將地方派性陷得很深的部隊進行互相調防，使之與地方造反派的派性脫勾。例如，威海水警區與旅順水警區，青島水警區與海洋島水警區，沙埕水警區與長塗水警區，互相調防。各航空兵師也進行互相調防；第四、強調正面引導，堅持正面教育，開展“四好連隊、五好戰士”運動。要求各部隊，對地方運動不參與、不支持、不表態，減少地方運動對部隊的影響。

對於層層站隊這種頑疾，雖采取上述措施，收到一些效果，但沒有根本解決問題，一直拖延到1971年批陳整風，才引起大家嚴肅認真地來解決這個問題。海軍黨委帶頭作自我批評，並得到毛主席的表揚。

1968年6月28日，海軍召開第二次四好連隊代表會議，主要目的是堅持基層部隊的正面教育，表揚四好連隊建設搞的比較好的單位，宣傳他們的先進經驗，引導指戰員將精力轉到四好連隊建設方面來，以增強部隊穩定性，削弱或分散派性思想對基層部隊的滲透。我在這次會議上作了一個報告進行重新動員。

海軍黨委在會議期間作出了《關於樹立四好連隊標兵，普及四好連隊先進經驗的決定》。決定樹立南海艦隊快艇第11支隊11大隊3中隊、南海艦隊防堵字讀書社區第8團6連、東海艦隊航空兵第4師10團2大隊、北海艦隊潛艇第12支隊125艇等十四個單位

為海軍四好連隊標兵。

林彪知道海軍召開四好連隊代表會議，也及時作了指示。其大意是：總的講，軍隊不抓基層不行，抓基層不抓四好不行。政治不能鬆，其他也不能鬆。政治思想好與其他三好不能並列，必須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為中心，用



1968年8月11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海軍四好連隊代表大會代表

毛澤東思想掛帥。但抓好了政治思想工作，不等於把其他都抓好了。三八作風、軍事訓練、生活管理也要抓。如果基層搞不好，政治覺悟不高，那就會漏洞百出，堵不勝堵，就不可能搞好三支兩軍工作……。

毛澤東和林彪、周恩來等，於8月11日下午，接見了出席四好連隊代表大會全體代表。大會於8月13日結束。

五、在工作中發生意見分歧

從1968年秋季開始，我和王宏坤、張秀川之間在對海軍機關、部隊如何進一步穩定和解放幹部等問題上出現了分歧意見。當時由於我在軍委辦事組工作很忙，顧及海軍的事情確實少了一些，除了重大問題參與研究決定外，一般的事情基本就交由蕭（勁光）、王（宏坤）、吳（瑞林）和張（秀川）等常委成員集體研究辦理了。這期間，發生了三件我意想不到的事情：

其一，“海政文辦整風”。海政文革辦公室整風這件事，張秀川曾向我報告過，我也同意。周澤龍的初衷是統一思想，解決海軍政治部中，在落實幹部政策、加快解放幹部、清理階級隊伍

方块字读书社区

等問題上存在的不同意見，爭取通過整風，達成文革辦公室成員思想上的一致。

但在整風的過程中，却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意見，這本來也是正常的。身為海軍副政委的張秀川作為主管海軍政治部的領導，本應在兩種意見中進行協調，化解矛盾。但他却支持一派意見，反對另一派意見。非逼着海政文辦主任、海政保衛部部長蕭雲承認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要撤消蕭雲文辦主任職務。張秀川事先並沒有告訴我，整風的目的是要撤換誰，把本來並不複雜的問題搞的複雜化，我當然不能同意，并要求海政立即停止所謂的整風。

其二、王劍魂事件。王劍魂是海政文化部部长。1968年秋的一天晚上，王、張兩人到京西賓館找我說：“王劍魂現在表現不好，群眾意見很大，要求批判他。”并徵求我的意見，可不可以批判？我答復是：“可以批判，但要按人民內部矛盾批評教育。”我又強調：“要團結大多數。王劍魂，我也不說他很好，也不說他很壞，批評教育可以，打倒不同意。”但他們回去後，並沒有按照我的意見辦。在兩天的時間內，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大標語貼滿了辦公樓內外。

當時海軍機關大字報剛剛收起不久，牆壁也刷洗乾淨了，現在又鬧得滿樓風雨，亂七八糟。

一天凌晨，我由京西賓館辦公完後回海軍大院，路經海軍機關辦公大樓，發現牆上和地上又有大量的大標語和大字報，我就停車進樓觀看。大字報的數量如此之多，大字報的內容充滿了敵我矛盾的語句，還有什麼“砸爛王××狗頭”之類的惡語，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在場的人說是根據李、王、張的指示，要運用大字報大批狠批，不低頭認罪就不罷休。我看了之後很生氣，對在場的人說：“我沒有指示要搞大字報圍攻，要搞突然襲擊，要搞大批狠批，要砸爛狗頭。”

王劍魂既不是什麼大的當權派，也不是什麼反動學術權威，更沒有嚴重問題和錯誤，為什麼如此鬧師動衆，鬧得機關大院不得安寧呢？醉翁之意不在酒。原來王是個老老實實的文人，懂一

點古文詩詞，有時我請他到我家中給我解釋唐詩宋詞，不過如此而已。王、張大概以為我在海政安設了什麼對他們不利的“據點”和“釘子”，非要把它徹底“拔掉”不行。我當即決定停止批鬥。

其三、“青島潛士校事件”。1969年1月，青島楊保華反軍派開始策劃衝擊我北海艦隊潛艇士兵學校。這所學校不同于海軍的其他院校，它是我潛艇士兵的訓練基地，從文革開始就是正面教育單位，不開展“四大”。

地方反軍派的動向，北海艦隊及時報告了海軍文革辦，海軍文革辦又及時報告了主管領導張秀川。但張既不向海軍黨委常委報告，也不向艦隊布置對應的措施。幾天後，楊保華的反軍派大規模衝擊潛士校，造成了嚴重的流血事件。之後，反軍派又衝擊并一度占領了艦隊指揮機關，不得已，艦隊指揮機關祇好搬到東海飯店（艦隊第一招待所）辦公數日。事後，艦隊對海軍的意見很大。

這個事件，不僅驚動了海軍，也驚動了軍委辦事組。因為從1968年下半年開始，除局部地區外，地方造反派大規模衝擊軍事設施并發生流血事件已比較少了。張秀川在這個事情上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我回海軍召開了常委會議，批評了張不負責任的態度。

潛士校事件後，中央決定由北海艦隊領導出任青島市“核心組組長”職務，青島的形勢才趨于穩定。

記得早在1965年，張秀川就對我有某些意見，或是誤解。起因是幹部的任用問題。當時負責海軍幹部工作的杜義德副政委，在一次常委討論幹部問題時，悄悄向我提出，是否將張秀川提為副政委。我當時考慮，張秀川到海軍後的工作是積極的，但海軍老資格很多，張秀川剛到海軍才三年，另外部隊幹部任職，確有要看資歷的情況，還是慎重些好。因此我提出，請杜了解一下各大軍區是否有“三八”式幹部任大軍區副職的先例，待了解後再議為好。做為常委成員之一，**方块字读书社区**建議，提還是不提也不是我說了算的。但事後，杜義德却將我的想法和建議私下裏告

訴了張秀川，張對我的意見極為不滿，他曾當面指責我：“把我提為副政委你為什麼不同意？你是唯德、才論對，還是唯資格論對？”雖然張秀川對我的指責是毫無道理的，但杜義德違反組織紀律，挑撥是非，破壞團結的做法更是非常錯誤的。

李、王、張在工作中的不同意見公開化了，不久林彪也知道了，找我和蕭勁光、王宏坤、張秀川等人談話，指出海軍工作剛有起色，應繼續搞好工作，加強團結，不要受人挑撥，要互相支持。但沒有具體批評誰是誰非。談完後，我當場表了態，承認在海軍領導中，對海軍的某些工作中存在意見不一致的現象，並從海軍主要負責人的角度承擔了自己責任。其他人沒有講話。

結束談話後，我們幾個人在京西賓館開通氣會議，但毫無結果。事後，林彪又指示我，把工作重點放在海軍，並決定把張秀川調出海軍。

第三十五章 天翻地覆 （之五）

一、召開八屆十二中全會

1968年國慶前夕，毛主席提議召開八屆十二中全會，會議的主要議題有三項：一是劉少奇專案審查問題；二是批判“二月逆流”問題；三是討論和決定修改黨章，討論和決定“九大”代表產生的方案，並研究準備召開“九大”問題。

當時，八屆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大部分被打倒了，出席十二中全會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只有原中央委員、候補委員的一半。中央決定，中央碰頭會議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和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各大

軍區、中央國家機關的負責人也列席參加會議。

10月10日左右，參加會議人員到齊後，中央發下一份會議小組劃分、編組名單。其中指定我和潘復生為第一小組召集人。我們這個小組有黑龍江、浙江、雲南、寧夏等省負責人及中央國家機關參加會議的部分人員，包括李富春、胡耀邦等。會議以看文件、小組討論為主，各小組討論情況通過會議簡報進行交流。

10月13日全會開幕。這次會議的大概情況是：

一、關於劉少奇專案審查問題。會議之前，每人發了一袋關於劉少奇問題有關材料和一份中央決定（草案）。在《關於劉少奇罪行審查報告》的結論中稱：“經過廣大革命群眾和紅衛兵小將的廣泛揭發，專案組的深入調查，大量的物證、人證、旁證，充分證實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

在我們組的討論中，大家一致同意中央決定（草案），同意加在劉少奇頭上的“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同意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同意永遠開除黨籍。我當然也是毫無例外地同意（會上，我没有表決權）。

在大會上，我没有聽到包括老一輩革命家在內的任何人，對中央決定（草案）提出反對意見。因此制造了黨內有史以來的最大冤案。

二、批判“二月逆流”問題。為了批判“二月逆流”，中央劃分小組時，就把所謂“二月逆流”參加者分散在各組內，分別批判。

江青參加我們這個小組會議，她和謝富治在小組發言時，指名道姓的批判了幾位副總理和幾位老師，把他們批判的很厲害，上綱上線很高。

按中央會前的安排，我們這個小組主要批判的對象是李富春。在批判之前，我就向富春同志打招呼說：“關於‘二月逆流’問題，你要很好做個檢討”。方塊字读书社区 春同志說，他已準備作檢討。同時我也作了一些準備，按中央會前確定的統一口徑，準備

發言批判。

富春同志檢討得不錯，我改變了主意，沒有按會前中央的要求，再做批評發言。胡耀邦同志也作了深刻檢討，大家沒有提出批評意見。

在江青、謝富治小組發言後，我也不可回避地，違心地念了一篇事先準備好的批判“二月逆流”的發言稿，東拉西扯地批判了一番。我在準備發言稿時，思想上就明確了發言內容的原則：祇按中央定的調子大原則地講，既不上綱上綫，也不用過火的語言，更不指名道姓專批某人。

當時會上，就有人說我的發言是“明批暗保”。記得會議期間，陳毅曾拉着我的手說：“謝謝你對我們的幫助，聽了這麼多人的批評，就數你對我不錯，沒有任何失實之處，另外你對我的人身也採取了保護，和那些對共產黨有仇恨的人是不同的。”

當時在小組會上，江青除了批判“二月逆流”外，還講了劉少奇等人的其他問題。每次發言後都要我親自幫她整出一個記錄稿，然後親自送到釣魚臺她的家裏去。她一方面要我在那裏坐等，另一方面自己修改記錄稿，待修改好了，再找康生、張春橋等來幫她審定。她每念完一段就問：“康老，行不行？”再念一段又問：“康老，行不行？”康生當然很認真負責的，哪一段可以，哪一段或哪一句要修改，怎樣改法，都提得很具體。有時也問張春橋有什麼意見，但張春橋提得不多，偶爾也講幾句，待定稿後再由我轉送會議秘書組印發。

經過幾次為江青送審稿，給我的印象是，江青的政治靠山除毛澤東外就是康生。我多次聽到江青宣傳康生“善斷”。

三、討論黨章修改問題。大家意見最集中、最強烈的，是對毛主席和林彪的評價，要求調子要高，篇幅要長，內容要充分。我當然也不反對。

10月26日，林彪有一篇講話。其中他說，自古以來有四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第一次是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影響世界二千年；第二次是資產階級的意大利文藝復興；第三次是馬克思主義，是

人類思想的大革命，無產階級登上了政治舞臺；而第四次，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革命，不僅是七億人民的大革命，也影響到全世界。

我當時對這個講話不僅擁護贊成，而且親自原原本本地向之後召開的海軍三屆四次擴大會議進行了傳達。

毛主席在會議期間講話再次強調：“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又說，“過去我們南征北戰，那種戰爭好打，因為敵人清楚。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比那種戰爭困難得多。”“……問題就是犯思想錯誤的，同敵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時搞不清楚。因此清理階級隊伍，一是要抓緊，一是要注意政策。”又說，“我們已經取得偉大勝利，但是失敗的階級還要掙扎。這些人還在，這個階級還在，所以我們不能說最後勝利。幾十年都不能說這個話。按照列寧主義的觀點，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最後勝利，不但需要本國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努力，而且有待於世界革命的勝利，有待於在整個地球上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使整個人類都得到解放。因此輕易地說我們革命的最後勝利，是錯誤的，是違反列寧主義的，也是不符合事實的。”

中央八屆十二中全會於10月31日閉幕。11月7日，海軍黨委召開了三屆四次擴大會議。會議的議題主要有兩個：一是由我傳達了八屆十二中全會精神，並聽了毛澤東、林彪在全會上講話錄音；二是提出海軍出席“九大”代表的協商名單和決定“九大”後召開海軍第四屆黨代表大會。

會議提出的海軍出席“九大”代表的協商名單，共十八人。他們是：蕭勁光、李作鵬、王宏坤、吳瑞林、張秀川、段德彰、劉浩天、易耀彩、李長如、武毅、張逸民、王天保、舒積成、王瑞昌、陳運和、楊保貴、董其采（女）、張鳳彩（女）。

二、珍寶島武裝衝突

1969年3月初，冰河開凍之前，中蘇邊界發生了珍寶島武裝衝突事件。

珍寶島位于我國黑龍江省虎林縣內，在烏蘇里江中心綫靠近我岸一邊，歷來屬於我國領土。但蘇聯方面長期認為，中蘇邊境綫應以烏蘇里江我岸一邊為界，企圖霸占珍寶島及周邊地區。

中、蘇關係惡化後，特別是美國大規模侵略越南北方，戰火不斷升級後，蘇軍在我三北（東北、華北、西北）地區邊境及其遠東地區加緊軍事部署，陳兵百萬。對我三北地區的邊境安全構成威脅。

自1968年下半年開始，蘇軍在珍寶島及周邊地區多次向我方挑釁，其邊防武裝部隊經常侵犯我國領土，我邊防部隊保持克制的態度，多次向蘇軍發出警告，但蘇軍依靠着機械化裝備和大口徑武器，對我方警告置之不理，並首先使用武力，打死、打傷我邊防部隊多人。

當時，沈陽軍區就不斷地將珍寶島地區的雙方衝突情況報告軍委辦事組。辦事組及時將情況和對情況處理的意見與建議報告毛主席和林彪。

珍寶島地區雙方衝突的形勢日益加劇，中央曾召開政治局會議研究對應策略。中央的基本精神是：第一、根據蘇軍的挑釁，要求沈陽軍區、北京軍區、蘭州軍區及新疆軍區加強三北地區邊境的警戒，三北地區的東段為重點；第二、做好軍事鬥爭和外交鬥爭的兩手準備，既準備打，也準備談；第三、將珍寶島作為邊防鬥爭的重點。要“有理、有利、有節”，絕不首先打第一槍。等等。

軍委辦事組和總參謀部作戰部門根據中央的指示，具體負責三北地區和珍寶島地區的軍事部署，並將各軍區制定的作戰計劃

報毛主席、林彪批准。

3月2日，蘇軍邊防武裝巡邏部隊又進到珍寶島附近封凍的河面上，恰與我邊防武裝巡邏部隊相遇。我再三向其提出警告，令其退出，結果不但無效，蘇軍反而向我首先開槍，並向我發起進攻。我巡邏部隊被迫開槍還擊，我另一支巡邏部隊也立即上島參加戰鬥。一舉將蘇軍巡邏隊六十餘人大部殲滅，我方也有傷亡。

當天，珍寶島武裝衝突的情況就報到辦事組，並報告了毛主席和林彪。毛主席和林彪齊口稱贊說：“打的好！”

我外交部照會蘇聯大使館，對“3月2日，蘇軍邊防軍入侵我珍寶島地區，開槍打死打傷我邊防人員多人，制造了一次極為嚴重的邊境武裝衝突”提出最强烈的抗議。北京、上海等城市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群眾游行和聲討大會，抗議蘇聯入侵我國領土。

蘇軍惱羞成怒，不甘失敗。根據情報顯示，蘇軍正抓緊大規模調集兵力和重型武器，準備發動新的進攻。與此同時，我們也指示沈陽軍區，迅速調集兵力和反坦克武器裝備，以對付蘇軍的進攻。

3月15日到17日的三天時間裏，蘇軍在大炮、坦克、裝甲運兵車的支援下，連續向我珍寶島發起猖狂進攻，並多次越過邊境綫，衝上珍寶島。我軍也迅速調集兵力和火炮，進行自衛反擊。我猛烈的炮火首先將蘇軍的坦克、裝甲車壓制在島上，我守島部隊的輕、重武器在近距離射擊，大量殲滅蘇軍有生力量。最終將蘇軍驅逐出珍寶島。戰鬥中，我軍擊毀、擊傷蘇軍坦克、裝甲車十



方塊字讀書社區

和黃永勝總長在作戰指揮室

餘輛，繳獲62型新式坦克一輛及其他武器，打死、打傷蘇軍百餘人。

3月15日，我外交部再次照會蘇駐華大使館，對蘇軍入侵我領土，再次提出強烈抗議。《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同時發表了《打倒新沙皇》的社論。

3月21日，蘇聯總理柯西金提出，要同我國領導人通電話。3月22日，我國政府用備忘錄答復他們，說明從當前中蘇兩國關係來說，通過電話方式進行聯系已不適用。如蘇聯有什麼話要說，請通過外交途徑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

3月29日，蘇聯政府發表聲明，一方面仍堅持其侵略立場，一方面表示願意恢復“協商”。

4月以後，封凍的烏蘇里江面開化了，珍寶島戰鬥中在我方一側被擊毀的蘇軍坦克和裝甲車沉入了江底。爲了獲取蘇軍入侵的罪證，也爲了研究蘇軍的技術裝備，辦事組向中央報告，建議將蘇軍坦克打撈上來，中央批准了辦事組的報告。

辦事組將打撈任務交給海軍執行，海軍司令部將此任務交給北海艦隊旅順基地完成。旅順基地派出打撈小分隊，在沉入位置不明、打撈條件差、敵前作業和當時水溫還很低的不利情況下，發揚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順利完成任務。後來，打撈起來的蘇軍坦克被送到軍事博物館展覽。

同年7月，蘇軍又在我新疆邊境地區不斷挑起事端，侵占我領土，打傷我邊民，並在鐵列克奇地區開槍襲擊我邊防巡邏隊。

中蘇關係達到空前緊張程度，隨時有爆發更大規模戰爭的危險。

9月，經毛主席批准，軍委辦事組召開了全軍戰備工作會議。會議對蘇軍的戰爭準備和可能對我發動的突然襲擊，進行了充分的研究和認真準備。同時決定我軍從華東、中南等地調動數個軍的兵力，加強三北防衛。其中爲防止蘇軍從外蒙古的軍事基地，沿內蒙二連至河北**方块字读书社区**突然襲擊，直接威脅北京安全，故在河北、山西兩省的北部及張家口地區、承德地區、大同

地區部署了相當數量的兵力和重型武器。

後來我獲悉的情報材料證明，在珍寶島地區發生的中蘇邊界衝突，曾使莫斯科受到極大震動。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曾主張對中國使用核武器，以徹底消除中國的威脅。但蘇共中央政治局贊成格列奇科核打擊的人不占多數，認為這樣做就意味着世界大戰，蘇聯會陷于一場沒完沒了的戰爭，比美國在越南的處境將更壞。因此采取了不擴大戰爭的態度。

不久周恩來與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機場舉行會談，周總理對雙方邊境問題未解決之前提出了三點建議：第一、維持邊界現狀；第二、防止武裝衝突；第三、雙方武裝力量在有爭議地區脫離接觸。

三、林彪說： “無名小卒，野心不小”

記得在我尚未參加軍委辦事組工作之前，曾有一天晚上，在釣魚臺16號樓參加中央碰頭會議。在周總理談有關工作時，江青不知為什麼（據說是北京哪個紅衛兵組織搜集了大量江青的歷史材料，正偷送到西山某地進行整理）發瘋似的又哭又鬧，沒頭沒腦地罵總理，這也不是，那也不是，罵得總理低頭不語。

也就在這次會議上，她生氣地自言自語說：“有人說我是武則天，武則天有什麼不好？我要是成了武則天，那些人不要想好日子過。”又自言自語說：“有人說我不懂軍事，我怎麼不懂軍事？我跟毛主席幾十年，跟毛主席學戰略戰術，難道還不如你們？”

她發瘋似的又哭又鬧，罵够了就去睡覺。乘這個空子總理領導我們繼續研究工作問題。一會兒她睡醒了就又跑來胡鬧。總理見此情況，會議實在無法繼續下去，因而宣布散會。

我在乘車回家途中，方塊字读书社区的情景，感到江青真是狂妄囂張，令人氣憤討厭。為什麼參加會議的中央常委們對江青

的胡鬧不予批評、制止？難道中央高級領導層的政治生活是這種狀況？我真是很不理解，心中總覺得不是滋味，江青真是一匹害群之馬！

新軍委辦事組成立後不久，有一天，江青通知軍委辦事組成員，到釣魚臺11號樓她的住處集合（釣魚臺賓館小樓很多，她可以今天住這樓，明天住那樓）。人到齊後，她說要帶我們到林彪那裏去受領林彪的接見和指示。黃永勝當即說：“林副主席剛剛見了辦事組全體成員，對軍委辦事組的工作做了重要指示，我們將按林副主席的指示，做好工作。”江青聽後先是一楞，之後談了些無關緊要的事，她碰了軟釘子，不再提帶我們去林彪那裏的事了。

這是一種什麼關係？當時，立即引起我們幾個人的反感和憤怒！難道軍委辦事組是在中央文革領導之下？是在你江青領導之下？我們要見林彪還要你江青帶領？你江青既不是軍委主席或副主席，又沒有正式軍職，也不是黨中央什麼領導人，僅僅是一個普通黨員，中央文革的副組長，軍隊文革的顧問。你有什麼資格直接領導軍委辦事組？你有什麼資格在軍委辦事組面前說三道四？

據說毛主席曾說過：“中央文革等於以前的中央書記處。”可是中央文革組長是陳伯達，顧問是康生，如果等於原中央書記處，也輪不上你江青在軍委辦事組面前指手畫腳。

江青和中央文革一伙伸手抓軍權的野心早就有了。

1967年初，軍隊文革改組時，她已是軍隊文革顧問。加上解放軍報社，被江青女兒蕭力掌握，八一電影制片廠被江青的樣板戲控制。江青還要求部隊的三支兩軍問題要先經過她來決定和批准，然後再由她報告毛澤東和林彪。但江青並不滿足，得寸進尺，野心越來越大，現在她又想奪取軍隊指揮大權，要把軍委辦事組控制在她的直接領導之下，把林彪、周總理及其他軍委副主席架空。

方块字读书社区

軍委辦事組組長黃永勝認為，軍委辦事組是在黨的主席、軍

委主席、副主席和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負責軍委日常工作。毛主席、林彪和周總理是軍委辦事組的直接上級和領導。軍委辦事組與中央文革沒有領導與被領導的上下級關係，與江青更沒有領導與被領導的上下級關係。

我們軍委辦事組對江青和中央文革一伙伸手抓軍隊指揮權的野心早有警覺，並採取了堅決抵制的態度。

黃永勝出任軍委辦事組組長後，除參加中央碰頭會，並接受、執行毛主席、林彪、周總理及其他軍委副主席的指示外，根本不到江青那個廟裏去燒香磕頭，引得江青大罵黃永勝“目無中央文革”，“無組織，無紀律”。黃永勝到北京工作不久，江青就散布“總長選錯了”。

江青向毛主席提出謝富治、溫玉成參加軍委辦事組，黃永勝也向毛主席和林彪建議讓李天佑、張才千參加軍委辦事組，針鋒相對，寸步不讓。

江青要霸占八一電影制片廠祇搞樣板戲，不能搞其他題材的軍事影片，黃永勝堅決不同意。中央碰頭會議經常討論樣板戲，黃永勝很反感，不願參加會議，即使參加也是“徐庶進曹營——一言不發”。

中央文革一伙人極力吹捧江青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樣板戲是“文藝革命的里程碑”，黃永勝就說：“文化革命的旗手是毛主席”，“什麼樣板？樣板就是絕對化，就是沒有發展了嘛”。

黃永勝批評軍報不要以支持不支持蕭力劃綫站隊，江青則大罵黃永勝和我在軍報“搞復辟，保護走資派”，並到毛主席那裏告黃永勝的狀。造船工業形勢大好，江青就說“生產壓制革命”。

1968年夏，軍委辦事組向毛主席報告，建議凡涉及到部隊戰備、調動等重大問題的軍委文件，主送毛主席、林彪和周總理三人審批後即執行，其目的是傳閱軍委文件的人數太多既容易失密，又容易誤事，不利部隊隱蔽、快速的行動。主席批准：“同意”。但江青又罵黃永勝對中央文革“不請示，不報告”。並提出停止軍委辦事組組長、副組長參加中央碰頭會，檢討錯

誤。黃永勝說：“我沒錯，不檢討！”江青則說“黃永勝不檢討，就不能率團出訪阿爾巴尼亞。”誰給她那麼大的權力？簡直要凌駕于黨中央之上了。

1968年秋，中央決定黃永勝率黨政代表團訪問阿爾巴尼亞。江青又利用這次出訪發難，在中央碰頭會議上大發洋脾氣，指着鼻子對黃永勝進行批判。江青聲嘶力竭地怒罵黃永勝說：“國民黨搞黨國，你們搞軍國，你們搞軍隊領導一切，你們搞軍閥專政。你們戴五星軍帽，穿紅旗領章軍衣，不受黨的領導，不覺得耻辱嗎？”并生氣地把發給她的解放軍服裝全部退還給黃永勝。江青還提出中央應改變決定，不能讓黃永勝率團去阿爾巴尼亞訪問的無理要求。經周總理向毛主席請示，毛主席指示“按照原決定不變”。這樣又引起江青的不滿，進行消極對抗和搗亂。

爲了緩和矛盾，周總理曾帶領黃永勝、吳法憲、我和邱會作去見江青。事先，總理特別囑咐我們：“要團結，要求大同存小異”，又說：“不論江青同志說什麼，你們都不要說話”。

我們在樓下客廳裏站着等，江青由樓上緩緩下來，一見到我們，就邊下樓邊大罵不止，又是什麼“國民黨搞黨國，你們搞軍國……”。

黃永勝對江青說：“代表團後天走，一是來向江青同志請示，二是來告別。”

江青沒好氣地大聲說：“你們走我不送，你們回來我不接。”

黃永勝訪阿回京後，阿使館設宴感謝，應該出席的人員全出席了，唯獨江青不出席。這樣就不能發表新聞消息。經總理向阿使館解釋，并請他們過幾天再次設宴補救。可是第二次設宴，江青仍不出席，仍不能發表新聞消息。

一匹害群之馬，弄得總理左右爲難，非常被動。總理祇好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令江青做檢討。

江青並不糊塗，她知道軍隊的重要，知道軍隊的作用，隨着地位的提高，她妄圖控制軍隊的野心和慾望也越來越大，實際上江青是妄想
在軍隊中成爲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軍委常務副主席，妄想

把林彪也架空。她企圖奪取軍隊的指揮大權，就必須千方百計控制軍委辦事組，江青的陰謀詭計在屢屢遭到軍委辦事組的強烈抵制和反對而失敗後，便集中力量打擊黃永勝和軍委辦事組，大罵黃永勝，大罵軍委辦事組搞“軍國主義”，“不要黨的領導”，甚至提出總參謀長的人選“不合適”。

“九大”之後，江青當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員。更加專橫跋扈，目空一切了。她不僅沒有按毛主席“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的指示辦，而是加緊了分裂新一屆黨中央的陰謀活動。有兩件事情突出表現了她的險惡用心。

其一，煽動批判林彪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的講話。“九大”之前，江青還不敢把攻擊的矛頭直指林彪，而是集中力量打擊軍委辦事組。

“九大”剛開完不久，有一天，江青到京西賓館辦事組的駐地，名曰“找辦事組的人談談話”，實際祇找了黃永勝、我和邱會作（吳法憲當時不在家）。

閑談一陣後，江青突然話題一轉說：“林副主席在十二中全會的講話，是即席講話，祇有個講話提綱，講話內容事先也沒有與中央碰頭會通氣，我們都不清楚。”又說：“有些話講的不妥嘛，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怎麼與歐洲文藝復興相提並論呢？那是資產階級文化革命嘛。”

我們都沒有說話，但我們都立即警覺的感到，江青的講話是針對林彪的。

江青走後，黃永勝與我和邱會作議論，江青講這些話是什麼意思？為什麼與我們講？江青的膽子也太大了，竟敢批判林彪的講話。我們感到事情重大，決定立即到林彪那裏去報告。

聽完了我們報告的情況，林彪說：“讓她去說吧，看她搞什麼鬼。”

其二，1969年5月17日上午，江青召集黃永勝、吳法憲、我和邱會作，在釣魚臺11號樓她的工作室開會。我們到時，見江青正在和姚文元說話，隨後李德生也來了。李德生到後，江青宣布開會，她

要大家不要記錄，美其名曰“隨便和你們談談”。

江青首先談了她的家庭狀況和她的出身，以及參加工作的經歷，還談了在延安與毛主席結婚的前前後後。並說她當前的奮鬥目標是搞二十部樣板戲。

之後，她開始逐個評論“九大”當選的三個中央常委。

她說：“陳伯達是書呆子，不會辦事，沒有主張，經常講錯話，我們都給他‘擦屁股’。整個中央文革的擔子都壓在我身上。”又說：“陳伯達是組長，連文革小組會議也不召開，他是劉少奇圈子裏的人。”又說：“陳伯達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是唯生產力論的。”

她評價康生說：“康老有理論水平，同修正主義作鬥爭很堅決，是有功的，但他的實際工作經驗很少。”

她又談到總理說：“周總理有行政領導能力，勤勤懇懇，但他掌握大方向、大原則不行，看的不准，決心不大。在中央祇能做些具體工作……。”接着又說：“這與他在歷史上走機會主義路線有關，歷史上他就是東風來了擁護東風，西風來了擁護西風。跟着王明跑，蘇區損失很大……”等等。

江青滔滔不絕的講了一個多小時，還沒有講完的意思。我們軍委辦事組的人誰也沒有講話。當時我環視了一下參加會的人，姚文元在江青講話時頻頻點頭，表示贊同，吳法憲、邱會作、李德生低頭不語，祇有黃永勝一副極不耐煩的樣子。

不等江青說完，黃永勝突然插話說：“江青同志，我們還有重要的會議，向江青同志請假。”說完起身就走。吳法憲、邱會作和我也跟着出了會客室。

回到辦事組，我們在一起議論剛才的會。黃永勝不禁提出疑問：這是一個什麼會議？一個政治局委員召集另六個政治局委員，開會議論三個中央政治局常委，這種會議正常不正常？合法不合法？是不是背着中央政治局大多數，另搞一個小圈子？江青為什麼這樣做？她有

方块字读书社区

議來議去，我們大家一致認為這裏面有問題。

黃永勝說：“上車，我們一起到毛家灣去向林副主席報告。”

在毛家灣，林彪聽了黃永勝匯報江青的言談之後，很生氣地罵了一句：“無名小卒，野心不小，想凌駕于三個中央常委之上。黃永勝、吳法憲你們兩人到毛主席那裏去，據實向主席報告。”

隨後，黃永勝、吳法憲到了中南海毛主席住處。聽黃永勝後來對我說，毛主席聽了報告之後說：“你們不要叫她知道到我這裏來過，我也不告訴她。不然你們要挨整的呀。”

可是以後從江青的口氣裏我們知道毛主席告訴了江青。江青又記下我們一筆黑賬。

四、“九大”召開

1969年4月1日，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北平正式開幕，出席代表一千五百一十二人，代表全國二千二百萬黨員。大會議事日程為：林彪代表黨中央作政治報告，討論通過黨的章程，選舉新一屆黨的中央委員會。

毛主席在開幕時講了話，他說：“我們希望這次代表大會，能夠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大會之後在全國取得更大的勝利。”

林彪在大會做的政治報告，中心思想是闡述“文化大革命”問題。

這個政治報告的初稿，中央開始指定由陳伯達負責組織班子起草，林彪和周總理均主張既要抓文化大革命，又要抓生產和備戰。初稿寫好後，送毛主席和中央碰頭會議成員審查。毛主席看了後很不高興，召集會議對陳伯達進行了批評，並將其起草的初稿內容全部推翻。

毛主席全部推翻政治報告的初稿，是因為陳伯達起草的，以《為把我國建成社會主義強國而奮鬥》為題目的政治報告的基本精神，是偏重發展生產和加強備戰，沒有更多的強調文化大革

命的“偉大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沒有更多的強調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因此被中央文革一伙人指責是“唯生產力論”。

毛主席當然也不能同意這樣的政治報告，並指出：“八大政治報告中所犯的錯誤，祇講發展生產，不講階級鬥爭，現在又想重複。”並批判是“伯恩斯坦主義”，甚至聯系陳伯達陪同毛主席在莫斯科會談時發生的“船未沉老鼠先逃”的錯誤，一併批判。

之後，毛主席指定由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負責重新起草，限期交卷。張春橋等人起草的這個稿子，通篇是對文化大革命發生、發展、影響、作用、目的從理論到實踐的全面論述。毛主席認為可行，中央討論時通過。

但林彪態度沉默。對張春橋等人重新起草的政治報告在送審時，採取一言不發，一字不改的態度。在向大會做報告時，林彪像和尚念經，照本宣科，缺乏熱情，結結巴巴的念了兩個多小時。

對待兩個不同版本政治報告截然不同的態度，反映了毛主席和林彪對待文化大革命“偉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的不同認識和理解，雖然當時毛澤東對林彪的態度沒有做出什麼反映，但我相信林彪對待政治報告的態度，毛澤東是看在眼裏，記在心上。

“九·一三”事件後，特別是我出獄後，我一直在苦苦的思索這樣一個問題：毛澤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感到林彪靠不住了呢？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決心與林彪“分手”呢？根據當時我在中央工作的所見所聞，雖然至今沒有確切的答案，但我認為，毛、林對“九大”政治報告不同的態度，肯定是重大的轉折之一。可惜當年我們都被“九大”新黨章中明確林彪是“接班人”所蒙蔽。

開幕式後，從4月2日起，開始分組討論政治報告和黨章。4月10日大會通過政治報告和黨章。在新通過的黨章中明確向全黨宣布：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之後，又分組討論和選舉中央委員問題。候選人名單是由主席團匯集各代表團的意見提出的，再交各代表協商確定，然後進

行一次無記名投票預選。

當時出席會議代表的思想中，存在一個疑難問題，就是在極左路線指導下，如何看待那些“犯過錯誤”，受過“批判”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例如朱德、陳雲、李富春、陳毅、鄧子恢、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人，選不選他們為中央委員？有不少年輕的和造反起家的代表有可能不投他們的票。

毛主席提出了兩條意見：“第一要投他們的票，保證選上。第二票數不要求太多，有三分之二就可以了。”

經過預選結果，證明可以達到這兩個要求，然後方在大會正式無記名投票選舉。選出中央委員一百七十人，候補中央委員一百零九人。其中八屆老中央委員不到三分之一。

在討論選舉過程中，有一天，黃永勝在軍委辦事組辦公時自言自語地說：“我是不投11樓票的（江青當時住釣魚臺11樓，此即指江青）。”這話顯然是在表明黃的態度和暗示其他人也不要投江青的票。我們幾個人都把這句話聽進去了，都沒有投江青的票。

果然大會報告選舉結果時，江青少了幾票。當時江青的臉色就非常難看，如坐針氈（江青是想得全票的）。

選舉散會後，康生為此在毛主席那裏提出要進行追查，看誰不投江青的票。毛主席當即駁斥說：“那還追查得？你若追查，就要犯政治原則錯誤。”這樣康生才不敢亂來胡鬧。

大會完成預定議程，于24日閉幕。

28日舉行九屆一中全會，選舉中央主席、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名單如下：

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

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林彪

（以下按姓氏筆劃為序）

方块字读书社区

葉群、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陳伯達、陳錫

聯、李先念、李作鵬、吳法憲、張春橋、邱會作、周恩來、姚文元、康生、黃永勝、董必武、謝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紀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東興。

全會通過了中央軍委主席、副主席、委員和軍委辦事組成員。

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

中央軍委副主席：林彪、劉伯承、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

中央軍委委員：（略）

在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確定了新的軍委辦事組成員。

軍委辦事組組長：黃永勝

軍委辦事組副組長：吳法憲

軍委辦事組成員：葉群、李作鵬、邱會作、謝富治、李德生、李天佑、劉賢權、溫玉成。

毛主席在一中全會上講話說：“看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據我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裏頭，領導權不在真正馬列主義者、不在工人群眾手裏。過去領導工廠的，不是沒有好人。有好人，但是，他們是跟着過去劉少奇那種路線走，無非是搞什麼物質刺激、利潤掛帥，不提倡無產階級政治，搞什麼獎金，等等。”“社會主義革命還要繼續。這個革命，還有些事沒有做完，現在還要繼續做，比如講鬥、批、改。過若干年，也許又要進行革命。”又說：“團結起來，為了一個目標，就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要落實到每個工廠、農村、機關、學校。”“清理階級隊伍，要做過細的工作，粗枝大葉不行，粗枝大葉往往搞錯。每個支部都要重新在群眾裏頭進行整頓。不僅是幾個黨員，要有黨外群眾參加會議，參加評論。”

此外毛主席還談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問題，談到“不要心血來潮，忘乎所以”問題和“團結全國廣大人民群眾去爭取勝利”的問題。

方块字读书社区

五、海軍第四次黨代表大會

1969年5月16日，海軍第四次黨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參加會議的正式代表有六百六十九人，列席代表有一百二十五人。會議的中心任務是貫徹落實黨的“九大”精神。另外是選舉海軍新一屆黨的委員會。

5月19日下午，毛澤東、林彪及其他中央領導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出席會議的全體代表。

5月26日，我代表海軍第三屆黨的委員會做了題為《高舉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學說的偉大紅旗，為實現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的戰鬥任務而奮鬥》的政治報告。

在報告中，沒有全面總結第三次黨代會以來的工作。因為處於那種極左思潮情況下，各種意見紛紛，一時很難在思想上統一起來，對已往的工作，不可能做出正確的估價。

我在報告的最後部分用了較大篇幅講到準備打仗和加強團結兩大問題。

珍寶島中蘇武裝衝突後，我軍把準備打仗放在了突出的重要地位上。我在報告中提到：“提高警惕，準備打仗，粉碎美帝、蘇修和各國反動派的可能侵略。現在美帝、蘇修和各國反動派都在拼命擴軍備戰，已構成對我國的全面包圍形勢。我們的原則是‘敵不犯我，我不犯敵，敵若犯我，我必犯敵’。做好充分準備，準備早打，準備大打，準備打常規戰爭，也準備打核戰爭。”“戰爭準備包括思想準備和物質準備兩個方面，首先是思想準備，要深入進行戰備動員教育，要使幹部戰士認清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認清美帝、蘇修和各國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本質。”“還要做好物質準備，在作戰指揮、通訊聯絡、後勤保障、戰場準備、工程建設、軍工生產、裝備修造、**方块字读书社区**作方面，都要想到打仗，適應打仗，準備打仗。要認真總結歷次海戰、空戰經驗，認

真搞好軍事訓練。苦練過硬的技術和近戰、夜戰的戰術。各級指揮機關要嚴格值班制度，戰備值班部隊要做到一聲令下，立即行動。”

在報告中，我把加強黨的建設、大抓基層工作、樹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和擁政愛民光榮傳統等闡述，統歸于“一切準備打仗，一切爲了打仗，一切爲了打勝仗”。

在談到加強團結方面，我不僅提出要加强黨委內部的團結，同時也是針對海軍用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辦法，解放幹部而言。

我在報告中提到：“特別要注意搞好以下幾種人的團結。要加强新老幹部之間的團結；要加强未犯過錯誤的幹部和犯過錯誤的幹部之間的團結；要加强工農幹部和知識分子幹部之間的團結；要加强政治幹部與軍事幹部之間的團結；要加强上下級團結和官兵團結；要加强軍政團結和軍民團結。”

6月6日大會結束。

6月9日海軍黨委召開四屆一次全會。會議採取無記名投票辦法，選舉了海軍新一屆黨委常委和書記、副書記。

8月7日中央軍委批准了新一屆黨委會由四十七人組成，黨委常委由李作鵬、蕭勁光、王宏坤、吳瑞林、張秀川、趙啓民、周希漢、張敬一、潘焱、王政柱等十人組成。我爲第一書記，蕭勁光爲第二書記，王宏坤爲第三書記，吳瑞林、張秀川爲副書記。

海軍黨委四屆一次全會結束後的第二天（6月10日），乘各艦隊領導都在北京的機會，海軍黨委常委即召開了軍以上單位主要領導幹部座談會。主要議題是貫徹中央軍委準備打仗的指示和具體措施，海軍在“四五”期間戰場準備規劃。會議要求認真抓好戰備思想教育，繼續抓好基層建設，深入開展四好連隊運動。

第三十六章 廬山會議 (九屆二中全會)

一、在修改憲法小組工作期間

“九大”之後，全國形勢逐漸穩定，各級黨政領導機構逐漸恢復。

1970年3月初，汪東興回京（毛主席此時在外地），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毛主席關於召開四屆人大的意見。

在會上，汪東興說，毛主席最近提出，並請中央政治局研究幾個問題：一是要準備召開四屆人大；二是要修改原憲法；三是制定“四五”經濟建設計劃；四是防止蘇修突然襲擊，加強戰備工作。

汪東興還傳達說，關於憲法修改中，要不要設國家主席問題，毛主席說：“我的意見是不設國家主席，憲法中也不要國家主席這一節了，我也不擔任國家主席，如果要設國家主席，祇有林彪同志來當。”

根據汪東興傳達的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開會研究決定：以周恩來、李先念、李德生、余秋里、華國鋒等負責制定“四五”經濟建設計劃。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吳法憲、李作鵬、紀登奎等負責修改憲法。黃永勝領導總參，負責起草防止蘇修突然襲擊的“三北”戰備方案和起草戰備工作報告。

修改憲法小組於1970年3月中旬開始工作。

修改憲法小組首先集體討論了1954年的第一部憲法，該憲法規定設置國家主席，毛澤東擔任了第一屆國家主席。1959年

方峽字讀書社區

以後，劉少奇連任兩屆國家主席。在文革中，一些外事活動的場合，董必武也是以國家代主席的身份出面。

從建國以來的歷史角度和現實角度看，設國家主席在國與國的外事國務活動中是有必要的。因此，修改憲法小組在討論中，有一種意見認為，如不設國家主席，原來屬於國家主席職權的問題、國家元首的身份問題，還有國與國之間互訪和互訪中的接見等國務活動問題，均不好處理。

據我所知，林彪最初的主張是兩點：一是由毛主席兼任國家主席，名正言順。二是他自己既不擔任國家主席，也不擔任國家副主席。

毛主席和林彪，關於設與不設國家主席的不同意見，起初並沒有引起修改憲法小組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員們的特別注意。我們還是鑽在憲法修改後，其功能和實際作用的圈子裏打轉轉，並站在這個角度看，是設國家主席好呢，還是不設好呢。誰也不清楚毛澤東的真實意圖。

當時，政治局在研究修改憲法小組意見時，多數人還是認為在憲法草案中應保留設國家主席一節，並由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周恩來總理就是支持這一觀點的。他曾認為，從國家機構的組成形式上，應該有國家元首。

4月中旬的一天，林彪就設國家主席問題向政治局提出了三點意見。大意是：第一、贊同設國家主席，並建議毛主席兼國家主席；第二、國家副主席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第三、他自己不擔任國家副主席。

第二天，周總理就在政治局會議上，將林彪的三點意見給政治局委員們傳閱。會上，多數政治局委員都同意林彪關於設國家主席，並由毛主席兼任國家主席的建議。周總理也是同意林彪建議的。

但是此前，毛已提出不設國家主席和自己不擔任國家主席的意見，因此政治局決定，修改憲法時，提出兩個方案，第一方案是設國家主席，第二方案是不設國家主席。兩個方案寫好後，由政

治局討論選擇。

不久，周總理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毛主席對政治局關於林彪意見的報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

4月底，毛主席在政治局會議上，第三次提出他不當國家主席，他借古喻今地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要把他放在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當孫權。”

6月底，修改憲法小組將兩個方案寫成後，分送毛主席及政治局各位委員。政治局還沒有開會討論前，毛主席就第一方案（設國家主席方案）指示：“如果設國家主席，我不擔任國家主席，你們從工農兵中去選人。”

7月初，周總理主持政治局開會討論時，根據毛主席這個批示，基本否定了設國家主席的方案，並指示修改憲法小組在不設國家主席的那個文稿基礎上繼續修改。修改之後，再分送毛主席和政治局各位委員審查。

當我們知道了毛主席在設與不設國家主席問題的前三次批示和講話後，已意識到，毛主席已決心在新修改的憲法中不保留設國家主席一節，自己也不但任國家主席。但從國家機構形式而言，又無法解釋“不保留設國家主席一節和不設國家主席”到底比“設國家主席”好在那裏。

7月中旬，在周總理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形成決議，通過了按毛主席意見，不設國家主席的憲法修改草案。

這裏，我想多說幾句。“九·一三”事件前，毛主席在南巡講話時說林彪：“急于想當國家主席，急于分裂黨，急于奪權”，“九·一三”事件後更把設國家主席問題定為“反黨政治綱領”。

我至今想不通：

第一、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期間，在修改憲法小組工作期間，我從來沒有聽到任何人（包括林彪和葉群本人）說林彪想當國家主席，更不要說“急于”想當了。祇知道林彪有兩次建議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的意見，並遭方峽字讀書社區。同時，林彪也兩次表示他不擔任國家副主席。毛、林的不同意見，就是林彪“急于想當

國家主席”、“急于分裂黨”嗎？當上了這個有職無權的國家主席就是“急于奪權”嗎？那麼政治局在討論時，多數人認為在修改憲法的草案中保留設國家主席一節，并由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也是“急于分裂黨，急于奪權”嗎？林彪建議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而自己不擔任國家副主席怎麼就成了“反黨政治綱領”呢？

第二、林彪關於設國家主席，并由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的建議，得到包括周總理在內的多數政治局委員的同意。而作為毛澤東個人，多次否定政治局多數、甚至政治局常委多數的意見，是不是違反了“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呢？是不是個人凌駕于黨組織之上呢？是不是全黨要服從你毛澤東個人呢？

第三、林彪想當國家主席有根據嗎？當時的國家主席祇是個“虛職”，而林彪當時的地位是黨內排名第二的人，位高權重，有必要爭那個“虛名”嗎？國家主席的工作當時主要是友好國家間的“迎來送往”，林彪身體不好，最討厭此事。他連上天安門都當成負擔。我所看到的“根據”祇有一條，那就是吳法憲在“九·一三”事件後的交代稱：葉群告訴他“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那裏擺？”2007年初，我看到在吳的回憶錄中，對這句話做了重要更正，此話不是葉群所講，而是汪東興的話。是程世清把汪東興在二中全會前夕講的這句話傳給了吳¹。反正我是從來沒有聽到過此類說法。

第四、我所親耳聽到的，讓林彪當國家主席的人是毛澤東，汪東興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毛澤東的原話是：“如果要設國家主席，祇有林彪同志來當。”怎麼一年後，毛澤東的說法就變成了林彪“急于想當國家主席”呢？

修改憲法方案經過多次反複，于7月中旬基本定稿了。其它兩個文件也有初步頭緒，因此毛主席提議于8月召開九屆二中全會，地點廬山。議程三個：1、討論通過憲法修改草案；2、討論通過“四五”經濟建設計劃；3、討論通過防止蘇修突然襲擊，加強戰

方塊字讀書社區

註1，見《吳法憲回憶錄》下卷第788頁 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6年9月版

備工作。

1970年6月下旬，中央決定，以黃永勝和我爲正、副團長，率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朝鮮，

參加朝鮮慶祝



1970年6月24日，金日成在平壤接見中國政府代表團。

“六·二五”祖國解放日慶典活動。

訪問期間，我們和朝鮮政府、軍隊的高級官員進行了多次會談。有大型的政府之間的會晤，主要是黃永勝負責談我國對朝鮮的經濟援助問題，也有秘密的小型會議，主要是我先聽取朝軍方所需的軍事援助問題。

6月24日，朝鮮金日成主席接見了中國政府代表團。6月25日，中國政府代表團，參加了朝方組織的盛大慶典活動。

大概因爲此次出訪，我對朝鮮軍方提出的軍事援助項目比較熟悉，第二年，朝鮮吳振宇大將率領的軍事代表團來華訪問，由我陪同。

當時在中央，我還協助康生處理山東問題，協助周總理處理徐海地區問題。再加上北海艦隊黨委存在的一些問題，因此從朝鮮出訪回國後不久，我提出在二中全會之前，到山東走一趟。康生首先同意。以後我又向周總理提出，總理也同意。

這樣，在8月初我就先到了青島。

到青島後，我利用幾天的時間同北海艦隊的領導開了幾次黨委會，互相進行通氣，交換意見。之後又到駐青海軍的部隊看了看，與基層同志開了幾次座談會，又走馬觀花式的看了青島市若干工廠。並應軍隊和地方同志的要求，向全市部隊和地方縣團以上幹部講了一次話。

方块字读书社区

在青島停留約一周後，我轉到連雲港。看了看連雲港一般社

會和生產情況。那個地區過去武鬥很厲害，群眾對山東王效禹特別仇恨，公路沿途兩側電綫杆和大樹上，到處都綁着用稻草及廢紙扎成的形象醜陋的草人，均寫明“挑動武鬥的罪魁禍首王效禹”，進行當街示衆。由于連雲港地區屬於江蘇，群眾敢于同山東王效禹對抗。

8月14日我到達徐州，15日聽取徐州地區駐軍和革委會的同志匯報情況，大約上午10時半，黃永勝從北京打來電話說：“修改憲法小組發生很大的爭論，吳胖子很孤立。”要我立即回北京。我的原訂計劃，不得不半途而廢，當天下午就回到北京。

那時我們都住在西山，我很快就到黃永勝駐地，了解究竟發生了什麼性質的爭論。黃永勝告訴我說：“昨天修改憲法小組開會，張春橋公然反對‘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提法，說這是一種諷刺。同時反對在憲法中寫上‘毛澤東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吳胖子慷慨激昂地批駁張春橋謬論半小時之久，批得他們啞口無言。”稍停了一會兒，黃永勝又說：“現在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反對毛主席。”

我聽了這番話之後，一方面佩服吳胖子還有兩下，同時也感到有些突然。過去我參加修改憲法小組的多次會議，雖也有過爭論，但從沒有發生如此激烈的爭吵，怎麼現在突然出現這種形勢？

到了7月下旬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中，討論“八·一”建軍節發表的社論時，張春橋指着文稿說：“我不同意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提法”，江青幫腔說：“這是不符合歷史的”。張春橋又說：“應改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

當時黃永勝立刻針鋒相對的提出反對意見，他說：“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提法不僅是中央早已確定的對外宣傳的口徑，也完全符合人民解放軍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絕對領導和指揮下的實際情況。”吳法

憲、我、邱會作等政治局其他人都同意黃的意見，不同意改。

我見總理對黃永勝的講話也是點頭同意的，但爲了慎重起見，總理說：“這個問題我準備請示毛主席。”以後我們看到毛主席批示：“按照原來提法不變”。

以上這兩個問題，雖然在“八·一”建軍節社論中仍“按照原來提法不變”，在之後的政治局討論中決定在憲法草案中也仍寫上“毛澤東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但張春橋的兩次發難，在我的思想中是重視的，我感到“九大”後，江青和“上海幫”一伙將矛頭指向林彪，並連續不斷的向林彪發難，有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嚴重的趨勢。

二、上廬山之後

在北京停了三四天，我和邱會作同乘一架飛機赴廬山，此時吳法憲已先去廬山，指揮飛機接運各地開會的中委。中央決定黃永勝留在北京看家。

到達廬山後，林彪、葉群和我們軍隊幾個政治局委員，均住在福州軍區療養院。上山後，一直沒有開會的消息。

8月21日，葉群興致很高的邀請我們去游山玩水，觀景照相。廬山確有匡廬奇秀甲天下之稱，但我上過廬山多次，對此不太感興趣，祇是相陪。葉、吳、李、邱共一部小車。攝影員、保衛員共



1970年8月21日 廬山
右起：吳法憲、葉群、邱會作、林立果、李作鵬

一部小車，廬山主要風景區均去了。

葉群邊走邊和我們說：“這次到廬山就是一邊開會，一邊休息。過去我們都沒有時間好好休息一下。”又說：“這次全會內容不多，主要是通過新修改的憲法，研究‘四五’經濟發展計劃，加強戰備工作。全會後，就準備召開四屆人大了。”

葉群知道我剛由山東回來，就問我有關山東情況，我簡單地談了山東和徐海地區的情況。之後，她又問我知道不知道修改憲法小組爭論問題，我說黃永勝告訴我了。她說，是她要黃永勝把“老海”叫回來的。（因我在海軍，故稱我“老海”）

我們邊走邊閑談邊看風景，心情都不錯。攝影員每到一處風景點，都給我們照幾張像。至今，我還保留着幾張當時留下的合影照片。

散步個把小時後，我們就返回了駐地。

上山後的最初幾天，確實沒有多少事情，我主要是處理秘書送來的文件，有時也與到我住處的海軍中委談談部隊的情況。

三、林彪在開幕式上講話

8月22日下午，在毛主席住處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確定了全會的開法和安排。

8月23日下午全會正式開幕，主席臺上坐着毛、林、周、陳、康五位常委。由毛主席主持會議並宣布開會，周總理宣布了會議日程。

林彪在開幕式上做了長篇講話。我和絕大多數中委都認為，這是林彪代表中央作的開幕詞。

可以聽出林彪是離開講話提綱的即席講話。講了一個多鐘頭，其中大部分內容是他一貫的對毛主席及毛澤東思想的高度評價，是冠冕堂皇的，找不出什麼新意。講話中，既談到會議目的和任務，也擁護憲法修改草案，同時沒有再提出要設國家主席。

方块字读书社区

在這篇講話中，除了同意在憲法修改草案中寫上“毛澤東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外，祇有一小段話講的是關於毛主席天才問題，林彪說：“毛主席是天才，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把毛主席偉大領袖、偉大導師、最高統帥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非常必要”。又說：“有人說毛主席對馬列主義沒有發展，這是形而上學的，認為事物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活生生發展的，這種觀念不符合馬列主義起碼原則，值得我們同志們深思的，尤其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最高的一聲號令、一股風吹下去，就可能把整個事情改變面貌。”

其實這一小段話一帶而過，知道內幕的人，當然懂得其意思，不知內幕的人，祇當耳邊風，一閃而過，沒有在意。所以在林彪講話結束時，會場爆發出長久熱烈掌聲。

毛主席宣布散會後，大家退出小禮堂。葉群把吳、李、邱和汪東興拉在一起，走在人群後面，以後又把陳伯達也拉在一起，悄悄地對我們說：“林彪原來沒有準備講話，是臨時準備的，林彪的講話是經過毛主席批准的，他先到小禮堂休息室等待毛主席到來後，讓我在門外站崗放哨，不讓別人進去，林彪就將要講話的主要內容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林彪講，但說不要點名。”我們聽到這個消息都很高興，對林彪講話內容的正確性，更加相信無疑。

當天晚上政治局開會，原擬編組問題和第二天開始討論“四五”經濟發展計劃等問題，但汪東興、吳法憲却建議把林彪講話錄音再播放一次，加深大家的認識。主持會議的周總理同意，並確定次日（24日）上午在小禮堂放林彪講話錄音，下午開始分組討論。

第二天上午全會在小禮堂聽林彪講話錄音時，也沒有聽說有人發現講話內容有什麼問題。我注意觀察了一下會場情況，大家情緒很平靜，聽的很認真。錄音聽完了，大家熱烈鼓掌。

方块字读书社区

四、分組討論

24日下午分組討論，我和葉群參加中南組。臨開會前，吳法憲轉給我一份陳伯達搞的有關論天才的幾條語錄。當時，小組會上的發言者內容都比較一般化，一致擁護林彪講話。有的年輕中委旁敲側擊，順帶提到老同志應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新鮮事物，努力保持晚節等等。

下午的小組討論快結束時，我做了一個表態性的簡短發言。主要也是擁護林彪在開幕式上的講話。我在講話中曾籠統地說了一句：“林副主席在講話中提到：‘毛主席是天才’我認為完全正確，反對提‘天才’是不對的。”在我的發言中既沒有點名，也沒有引用陳伯達搞的天才語錄。當天下午中南組的討論很平靜。

除華北組之外，其他各組情況大同小異。

據我所知，陳伯達、汪東興參加華北組的討論，他們討論情況很特殊。陳伯達在發言中，點破“有人”把“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提法說成是一種“諷刺”；“有人”反對在憲法上寫“毛澤東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妄圖貶低毛主席，貶低毛澤東思想”等等。

在汪東興的發言中，他說“完全擁護林副主席的講話，林副主席的講話是很重要的，對這次會議有很大的指導意義”；“堅決向林副主席指出的這個方向前進，並且努力緊跟”；“完全同意陳伯達同志的發言”。他又說：“憲法肯定毛澤東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非常重要，這是憲法的核心，是靈魂”；“現在我們黨內仍有陰謀家、野心家，是劉少奇反動路線的代理人。誰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我們就堅決鬥爭到底！”

發言中，汪東興還突^方塊字讀書社區話的討論主題，說：“一定要堅持設國家主席。希望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

副主席。這是我們大家的願望，是中央辦公廳討論修改憲法時的願望，也是我個人的願望”；“建議修改的憲法中恢復設國家主席一章”；又說：“有人不僅不希望毛主席當國家主席，連毛澤東思想都不要。”陳伯達插話說：“反革命分子聽說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就一定會手舞足蹈，非常高興。”

如果說陳伯達的發言是挑明了中央“有人”反對“三個副詞”，那麼汪東興的發言，除堅決擁護林彪、陳伯達的發言外，又完全違背政治局早已通過的決議，在華北組突然提出堅持要設國家主席，強調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

因此，實事求是地說，林彪的開幕式講話用了很少篇幅談了他對“三個副詞”的理解和態度，知道內幕的人也清楚，林彪的這段講話是有分寸的，完全符合毛主席“不點名”要求的批評了張春橋的論點。

陳伯達在華北組的發言則是借林彪開幕式講話點了一把“有人”反對“三個副詞”的火，而汪東興的發言，除在陳伯達發言的基礎上“借火潑油”外，則更是借林彪開幕式講話，另點了一把與林彪講話毫無關係的“堅持設國家主席”的火。兩把火在華北組燒了起來。

會議秘書組把這些內容寫成當天華北組的簡報，于當天深夜，由李雪峰、鄭維山、解學恭、吳德簽字印發全會。

8月25日早晨起床後，秘書就把收到的華北組第二號簡報（即全會第六號簡報）送給我，當我看完了簡報，不覺吃了一驚。

簡報說：“伯達同志、東興同志出席了下午的小組會，都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大家聽了伯達同志、東興同志在小組會上的發言，感到對林副主席講話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別知道了我們黨內，竟有人妄圖否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強烈地憤慨，……黨內有這種反動思想的人，這種情況是很嚴重的，這種人是野心家、陰謀家，是極端的反動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是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反動路線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壞蛋，是反革命分子，應

方块字读书社区

該揪出來示衆，應該開除黨籍，應該批倒批臭，應該千刀萬剮，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簡報中還說，小組會上，大家一直擁護和贊成汪東興提出的，憲法中要恢復設國家主席一章和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林副主席擔任國家副主席的建議。

我拿着簡報反復看了幾遍。邊看邊想：汪東興的發言，強調設國家主席問題，爲什麼這樣突然又採取這麼尖銳地方式提出來呢？這不是故意違背政治局決定與中央唱對臺戲嗎？而且，設國家主席問題與“有人”（指張春橋）反對“三個副詞”並無直接聯系。

汪東興的發言，我當時就很反感。我在參加中央修改憲法小組工作期間，知道毛主席多次表示不願擔任國家主席，林彪也兩次申明不願擔任國家副主席，政治局也已通過在憲法中不設國家主席的決議，林彪的開幕式講話中，也沒有提到設國家主席問題。汪東興處於什麼想法、什麼目的，在中央全會上突然又提出設國家主席問題呢？當時我真是不理解。

由于汪東興的特殊身份，他的講話迷惑誤導了一大批參會的中委。

早餐後，我仍到中南組參加討論。此時，人人都看到了華北組第六號簡報，大家情緒非常嚴肅，非常緊張。對陳伯達、汪東興所指的“人”，也非常憤怒。會議氣氛與24日下午的小組討論完全不一樣了。

討論一開始，中委們就爭先恐後的報名要求發言，每人發言態度與昨天下午情況也完全不同了，有點像紅衛兵那樣，聲音大，調子高，措詞激烈。“機關槍”、“大炮”、“刺刀”、“手榴彈”同時使用，形成一場聞風起哄的混戰，大家群情激憤地“一定要揪出陰謀家、野心家，揪出劉少奇反動路線的代理人”。但具體鬥爭目標是誰，要達到什麼結果，誰也不清楚。尤其是那些壯年中委，他們火氣特別大，**庖坊宰读书社区**厚。

中南組有一批老一輩的革命家，例如：葉劍英、徐向前、李富

春、蔡暢、張鼎丞等等，他們經歷多，見識廣，比較沉着穩重，雖然也有上當受騙講錯話的，但多屬於一般性質。

中午午餐後，我準備再去參加下午的討論。吳法憲到我駐地同我和邱會作兩人打招呼（邱住在我的隔壁）。主要講了兩點：

1、汪東興來電話說，設國家主席問題，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一定要堅持。2、汪東興讓我（指吳自己）向空軍中委打招呼，要他們在小組會議上積極發言表態。讓你們（指李、邱）也應向海軍、總後中委打招呼，要他們積極發言表態。

我聽了汪東興的傳話以後感到，雖然汪在主席身邊工作，知道的事情多，但可以肯定這個意見是他自己的。因為國家主席問題，我知道毛主席的態度和決心，為什麼還要去干擾？我決心堅持不再提。關於向海軍中委打招呼，他也是沒有道理的。中央委員不是你海軍的私產，也不是你的下級，你和他們都屬於中央，祇有中央有權指揮，你有什麼權力去指東道西，干擾中央。因此我没有跟海軍任何中央委員打招呼。

這裏，我還要提一下汪東興。我和汪東興雖同是江西老表，但并不熟悉。“九大”後，我到中央政治局和軍委辦事組工作，才與汪東興有較多的接觸機會（他在毛主席身邊工作，雖然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但經常不參加政治局會議）。

記得大約是1970年春，汪東興曾邀請黃、吳、李、邱到他中南海的家中做客。當時汪對我們講了毛、江關係，他說：“主席對江青有講話，主席說：‘江青，我也不說她很好，也不說她很壞’。”又說：“主席和江青的生活關係不好，長期分居兩處，主席住某某處，江青住某某處。主席到外地視察，從來不帶江青”等等。汪東興又談到主席對樣板戲的看法，他說：“主席對樣板戲有批評，樣板絕對化了，現在不再提樣板了，改叫革命現代戲”，“樣板戲中，主席祇喜歡沙家浜，說沙家浜還有些故事情節”等等。談話中，汪東興透露了不少毛澤東與江青工作與私人的關係。

之後，汪東興的話題方塊字讀書社區法中，在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上，他說他擁護林彪建議設國家主席，并由毛主席擔任

國家主席的意見。他又說他和陳伯達在家中談話，“陳伯達不是坐在沙發上，而是躺在沙發上與我談話。”以表示他與陳關係的密切。

與汪東興的談話，多數時間我們祇是聽，沒有更多的插話。當時我感到：第一、汪知道不少外人極少知道的毛、江關係；第二、他對江青是反感的，是支持陳伯達的；第三、他堅決擁護林彪，堅決擁護設國家主席；第四、他所以向辦事組的人談這些事，也是在表示，他完全同意軍委辦事組抵制和反對江青抓軍隊的指揮權。他還說：“我經常與葉主任（指葉群）通電話，通報情況。”

閑談中，汪東興突然對我說：“我的幾個孩子，有的在陸軍當兵，有的在空軍當兵，都表現不錯，祇有在你們海軍當兵的兒子，不知為什麼，黨也入不了，五好戰士也評不上”。我知道這是他對海軍的不滿意。

文革初期，確實有不少部隊的老同志找到我，要求解決子女當兵的問題。我當時的態度是：想當兵是好事，凡是願意到海軍當兵，又符合條件的，海軍都接收（汪兒子到海軍當兵不是通過我）。但入伍後的事情我就不管了。

事後，我讓海司軍務部查了一下，知道汪的兒子叫汪春平，在北海艦隊的通信站做報務員。我把情況告訴了艦隊領導，不久，艦隊領導向我報告，已將汪春平調到快艇支隊導彈快艇大隊，又過了一段時間，汪的兒子不僅入了黨，還提了幹部。

汪東興是毛主席身邊的主要工作人員之一，他的政治地位是很重要的，他的政治影響力也是很微妙的。我認為國家高級領導幹部，特別是直接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人，應該忠于毛主席，不折不扣地執行毛主席的指示。但是在“設國家主席”問題上，他的言談始終與毛主席再三強調的“不設國家主席”的指示背道而馳。在廬山會議上他更是突然發難、煽風點火、上下串聯、極盡能事，違背毛主席的方針，違背毛主席的本意，推翻了政治局的決定，利用了參會中央委員的熱情，直至將廬山會議演變成埋葬

林彪和一大批高級幹部的墳墓，汪東興真是首惡元凶！我直至今日不明白他的動機與目的。當毛澤東後來痛批林彪、陳伯達設國家主席是“反黨政治綱領”時，他搖身一晃，成了無事人一樣，事後僅輕描淡寫地檢討一番就過關了。在汪東興的問題上，我真的搞不明白什麼叫實事求是，什麼叫真相、真實、真理。“九·一三”事件後，他又爬上了中央副主席的位置。1997年，他竟然寫了一本《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利用他的高位，對九屆二中全會上發生的事情，扯下彌天大謊，隱瞞自己的錯誤，蒙騙全中國人民。對於這樣的機會主義者，我們的黨竟然聽之任之，到底為什麼？至今在我心中仍是個謎。

25日下午，繼續參加小組會討論，我先到，葉群後到。我看下午會議情況仍同上午差不多，覺得“溫度”太高。因此在葉群來到後，我就在沙發茶幾上的一張紙上，寫了兩個字“降溫”。她看了片刻後，就表示同意我的意見。我就同當時主持會議的召集人曾思玉、劉興元建議，讓幾位老中委提前發言。這樣會議的激烈緊張氣氛略有緩和。

離休會還有約一小時，我發言了。我的發言是按照“降溫”精神表態的，沒有按照原來準備的內容講，所以陳伯達搞的有關天才語錄，一條也沒有采用，並且盡量縮短時間，祇講了十幾分鐘就結束了。主要是擁護林彪的講話，緊跟林彪開幕講話的調子說：

“黨內有股反馬列主義、反毛主席、反林副主席的風，這股風不能往下吹。”同時在插話中也講了：“有人連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提法也反對，說不符合歷史。”

最後是葉群發言，她講的時間比較長，引用了大量陳伯達摘錄的語錄，證明天才論觀點的正確，並慷慨激昂地說：“林副主席所講毛主席是偉大天才的話，堅決不能收回，刀攔在脖子上也不能收回！”

宣布休會後，葉帥小聲問我：“點名不點名？”我回答：“不點名。”接着曾思玉又糾纏着追問我：“究竟是誰？”我說了兩個字：

方块字读书社区

“東方。”

當晚深夜，大會秘書組把中南組當天討論情況的簡報整理好了，曾思玉派人送我審閱。這個簡報一般地反映了小組討論情況。在簡報的最後說了一句“葉群、李作鵬發言，另外整理”。我看後，把“葉群、李作鵬發言另外整理”之句刪掉了，並給葉群寫了一個便條，連同簡報一起送給葉群過目。便條的原文如下：“葉群同志：今天簡報看了一下，是比較抽象地接觸了問題，沒有更多實質性問題，似可以發，請您再過目。至於我們兩人發言的書面材料，可以整理。但在簡報上不掛號為機動。你意如何？”

因為我感到華北組的討論精神與林彪發言的精神不合拍，與主席的態度也不符。在當時小組討論時，我的發言，是否有過火之處，有些吃不准和隱隱的擔憂。對於葉群的做法，我內心并不是很欣賞，她的背後是林彪，任何時候都應該穩妥為好，故而寫此條。

其實在九屆二中全會期間，我的指導思想是：1. 遵循毛主席的指示，不再提“國家主席”問題；2. 我反感搞串聯的做法，我沒有聯絡任何中央委員搞什麼動作；3. 我有自己看問題和處理問題的原則，不會隨隨便便地跟着跑。不論什麼“表忠心”還是什麼掉眼淚的過分舉動，我從來不搞；4. 對自己的言行要負責任，敢做敢當。

其他各組討論情況大體與中南組相似。據說，吳法憲在西南組發言也非常激憤，邊講邊哭，引起不少人一起掉淚。主要講的是修改憲法中，有人反對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列主義的提法，及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反對毛主席，貶低毛澤東思想。邱會作在西北組發言與吳法憲所講的內容基本相同。康生在西北組，聽了邱會作發言後，還稱贊說：“你讀了不少馬列的書，水平高。”

晚上政治局開會時，周總理也對邱會作說：“你今天在西北組放了一炮！很有分量。”^①（方塊字讀書社區註，可能是她向總理反映的情況）邱會作以點頭作回答。李先念緊接着問：“是批評誰

呀？我怎麼一點情況也不知道。”當時誰也沒有回答先念的疑問。

五、全會休會

25日下午，毛主席召開中央常委擴大會議，除中央常委外，各分組召集人均參加。我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具體情況不了解。據說，毛主席嚴肅地批評了陳伯達：“不請示報告，在華北組發難，搞突然襲擊，搞分裂活動”；陳伯達的發言“違背了九大精神，違背了全會原定的三項議程”；又說“不要再提設國家主席問題了，要按九大精神團結起來”。

會議決定各小組立即休會，停止討論林彪講話，收回華北組六號簡報。毛主席要陳伯達、吳法憲、汪東興進行檢討。當時我仍在中南組參加討論，我和葉群發言後不久，小組召集人（大概是曾思玉）回來後宣布：“立即休會。什麼時候復會，聽候通知。”其它什麼也沒有說。人們的思想情緒立即發生變化，猜測為什麼突然休會？為什麼不說明休會原因？各人有各人的考慮和估計。

從26日開始，全會休會。在休會期間，各組均未進行集體活動，大部分中委在住處反復閱讀會議各種文件，獨立思考問題，思考會議形勢，思考自己在小組發言中的正確和錯誤程度，也思考其他人的發言內容。也有部分壯年的中委，他們性急坐不住，仍然保持紅衛兵互相串聯的某些老習慣，到自己上級、或到小組召集人或相識的朋友那裏，探聽“動靜”，打聽消息，了解究竟發生什麼性質問題，交換對會議形勢的看法。

在休會期間，毛主席尤其忙，不少老一輩革命家要求去看望他。據許世友和我說，他見了毛主席，問候毛主席健康情況時，毛主席說：“目前這個問題把我的手脚都整得發涼。”

據我所知，在休會期間毛主席處理的主要問題有這樣幾件：

第一，找林彪談話，批評了林彪性情太急躁。並說：“對張春

方块字读书社区

橋他們，為什麼不可以再觀察兩年呢？”林彪當即承認毛主席批評正確，檢查了自己性情急躁的錯誤。

毛主席指示林彪，要他召集一次小型會議，陳伯達、汪東興、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參加，主要批評陳伯達，教育其他人。林彪很快（大概是8月28日）在他的駐地召開了這個會議。首先談了毛主席對他的批評，並作了自我批評。林說毛主席批評他，對張春橋為什麼不可以再看二年，批評是對的。同時批評了陳伯達舊文人、舊知識分子習氣很大，清高散漫，文人相輕。最後講了幾句：“解放軍要特別謙虛，防止驕傲，軍隊要同地方搞好關係，老幹部要注意團結新幹部。”

第二、要黃永勝立即上山。全會召開之前，經周總理請示毛主席，決定黃永勝在北京看家。黃永勝曾在政治局會議上要求上廬山參加會議，總理沒有同意。現在廬山出了問題，牽連到解放軍，因此毛主席決定黃永勝立即上山。黃永勝到達廬山後，當天就去見了毛主席。毛主席略談了會議情況，重點是批評了解放軍有驕傲情緒，“背上背了兩個大包袱，一個是打仗有功的包袱，一個是支左有功的包袱，經常在這兩個包袱上滾來滾去”。

黃永勝上山後，在林彪那裏得知，康生曾到林彪那裏說：“吳法憲報告的關於修改憲法小組所謂‘天才’問題、‘指針’問題的爭論，根本沒有這回事，是吳法憲扯謊進的饞言。”林彪回擊康生說：“吳法憲這個人我觀察了二十多年，還沒有發現他扯過謊。”因此黃永勝告訴吳法憲說（當時我和邱在場）：“這個問題，你無論如何不能承認是扯謊，否則林副主席開幕時的講話，就站不住腳。”

第三、找陳伯達談話。休會第二天（26日）我們接到陳伯達電話，請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到他駐地去有事相談。我們到齊後，陳伯達說他剛從毛主席那裏談話回來，已經報告總理同意，向你們傳達一下毛主席對我的批評。這時他的情緒似乎有些恐慌，加上滿口福建方言，說得越快，我們越聽不懂。因此他就一邊講，一邊寫，大意是毛主席批評了他搞宗派分裂，參加了軍事俱

樂部。但毛主席態度很好，離開時毛主席面帶笑容的和他握手。經毛主席同意，他又見了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徵求批評意見，康生批評他把林副主席綁在自己戰車上。

當時我聽了之後，最深刻的感到“軍事俱樂部”這個提法意味深長，思想震動很大，估計可能要牽連相當一批幹部。後來事實證明，這并非杞人憂天，果然未出所料。

第四、8月31日毛主席發表《我的一點意見》。嚴肅批評陳伯達唯心論的先驗論，及煽風點火，制造分裂，進行突然襲擊，唯恐天下不亂。這是一篇短短的、但具有重大作用的文章。文章中還多處把林彪和毛主席拉在一起，用“我和林彪同志認為”如何如何的口氣，似乎兩人意見始終“一致”和“親密無間”，迷惑了很多不明真相的人。

為了使讀者正確了解毛主席發表的《我的一點意見》，現將全文抄錄如下：

這個材料是陳伯達同志搞的，欺騙了不少同志。第一，這裡沒有馬克思的話；第二，只找了恩格斯的一句話，而《路易·波拿巴特政變記》這部書不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寧的有五條，其中第五條說，要有經過考驗，受過專門訓練和長期教育，並且彼此能很好配合的領袖。這裡例舉了四個條件，別人且不論，就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同志來說，够條件的不多。例如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說很好的配合，僅舉三次廬山會議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懷那里去了；第二次討論工業七十條，據他自己說，上山幾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為什麼下山，下山之後跑到什麼地方去了。這一次他可配合的很好了，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我這些話無非是形容我們的天才理論家的心（是什麼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決不是野心）的廣大而已。至于無產階級的天下是否會亂，廬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轉，我看大概不會吧。上過廬山的**方块字读书社区**無事憂天傾”。我們不要學那位杞國人。最后關於我的話肯定幫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說

主要地不是由于人們的天才，而是由于人們的社會實踐。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為，這個歷史學和哲學史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即通常所說的，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們的知識（才能也屬於知識範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后天才有的，這是唯心論、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同時我們兩人還認為，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問題我們還要繼續研究，並不認為事情已經研究完結。希望同志們同我們一起，採取這種態度，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不要上了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

在休會期間，政治局會議更加頻繁，討論處理日常許多重大問題。現在我能回憶起來的幾個問題是：

第一、決定陳伯達、汪東興、吳法憲三人要向全會做出認真的檢討。當時吳法憲思想壓力特別大，心情緊張急躁，自己寫不出檢討提要，秘書幫助寫，又寫得不像樣子，很難過關。我和邱會作看到這種情況心裏不安，因此利用一個夜晚，同吳法憲共同商量檢討內容。把檢討輪廓確定後，由邱會作親自執筆，我就回家休息去了。邱會作寫成後，又把我叫醒，修改定稿。

8月底，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由林彪主持，首先聽取陳伯達的檢討，因為陳伯達講話多數人聽不懂，張春橋自告奮勇充當翻譯。陳伯達講一句，張春橋翻譯一句。陳伯達檢討完畢，接着吳法憲、汪東興作檢討。主要是念稿子，時間都不太長就念完了。以後有若干人發言進行批判，即算初步通過。會議結束時，江青等“上海幫”特別興高采烈，連走路都不像一般走法，簡直像跳快步舞一樣向前跳。他們魚貫而行，滿臉春色，同每個參加會議的人握手。

第二、討論毛主席《我的一點意見》。9月初，這次政治局會議是由林彪主持的，討論雖然嚴肅認真，但并不很深入。多數是表態擁護，聯系陳伯達在坊間讀書社區來打算除表達擁護之外，還想作點自我批評。黃永勝知道我的意圖，臨開會時勸我不要急

于作檢討，因為葉群沒有作檢討的準備，我與葉群又同是在中南組發言，如果我作了自我批評，勢必迫使葉群作自我批評，使葉群陷于被動。我接受了黃永勝的勸告，在我的發言中，取消了自我批評那一段。

第三、決定成立會議公報起草小組。會議開始時，政治局會議指定由陳伯達負責組織幾個人起草會議公報。現在形勢發生了變化，經毛主席批准決定改為由康生負責，張春橋、姚文元、葉群和我組成起草小組。實際上我祇參加了兩次討論，一次是在康生住處，討論公報應寫些什麼內容。根據毛主席說的：“這次廬山會議鬧了一個大笑話，什麼是唯物主義反映論，什麼是唯心主義先驗論，都搞不清楚。因此公報重點應提倡全黨學習馬列主義”的指示精神，確定了公報基本內容。另一次是公報草稿寫出來之後，幾個人在一起，逐字逐句逐段審查定稿。

在休會期間，政治局若干委員的活動也很忙碌。康生和江青很快把各組記錄集中到他們那裏進行審查。康生看了陳毅發言記錄後，在政治局會議上公然罵陳毅說：“這個老反革命，嗅覺真靈，遇有機會就跳出來”。當他們沒有查到葉群的發言記錄時（葉群把自己的發言記錄已取走了）立即報請總理迅速追究。

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毛主席問葉群：“你的發言怎麼收回了？”葉低頭不語。

毛主席又問我：“你的發言收回了沒有？”

我說：“沒有。”

毛說：“那你是‘英雄’。”

此時康生指着我插話說：“你的發言雖然祇有十幾分鐘，但內容是尖銳的。”

我知道，毛對我的發言也是不滿意的，而康生則是興災樂禍，落井下石。

“上海幫”的幾個人經常在一起研究會議形勢，研究各種對策。吳法憲檢討後，辦事組的幾個人，也常在一起議論會議形勢，估計可能出現的後果。葉群與王菊心別人來抄她的家，要求

方块字读书社区

我們無論如何要保住林副統帥。她說：“大河有水小河滿，大鍋裏有米小鍋裏就有飯。”

六、全會復會

休會一周左右，大約于9月初，又恢復了小組討論。討論中心是毛主席的《我的一點意見》，並聯系實際批判陳伯達。不但批陳的天才論，同時聯系陳過去歷史上所犯錯誤，系統地批判，也就是算總帳。總理、康生對陳伯達的歷史情況比較了解，由他們到各組講話，介紹材料。我親自聽到周總理在中南組的講話。總理從1957年陪同毛主席到蘇聯進行國事訪問發生的“船未沉老鼠先逃”講起，一直講到廬山會議，提供了不少大家不知道的材料。例如劉少奇寫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陳伯達幫助進行修改的，江青等早就把陳伯達劃在劉少奇圈子裏的人，將幫助修改《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看成一條重要罪行。

現在劉少奇平反了，《論共產黨員修養》成為經典著作，又怎麼看待陳伯達的功勞呢？為了政治鬥爭的需要，任意竄改歷史事實，典型的實用主義！實事求是早就拋到九霄雲外了。這是我黨歷次大錯誤的思想根源之一！

依我的觀察，全會後一段分組討論的氣氛基本正常。如果說，前段分組討論偏于盲目起哄，後段則偏于謹小慎微。因為大家覺得前段受騙上當了，應接受教訓。所以發言除表態擁護毛主席《我的一點意見》，對陳伯達盡自己所知所感進行批判外，似有少說為佳的現象。小組對原來規定的三個議程討論不多，主要是採取政治局擴大會議方式討論確定的。

9月5日開始，恢復大會。按原定三項議程，大會通過了憲法修改草案；通過了“四五”國民經濟發展計劃；通過了軍委關於加強戰備的報告。

9月6日下午舉行全會閉幕式，毛主席決定陳伯達不能出席會議，因此主席臺上祇坐有：毛、林、周、康，沒有陳伯達。除原則上通過了會議公報外，主要是毛主席講話。開始講高級幹部的學習問題，要讀幾本哲學書的問題，並說“不要上‘黑秀才’的當”；又講全黨的團結問題等等。

此時毛主席的言語還比較溫和平靜，但後來越講越生氣，特別講到國家主席問題，火氣更大。大意說：“你要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聽你的。你就代表人民嗎？我是十幾年就不代表人民了。因為他們認為，代表人民就要當國家主席。”又說：“誰想代表人民，誰就去當嘛，我是不幹。你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幹。你有啥辦法呀？”毛澤東聲色俱厲的這些講話，越聽越令人齒冷心寒，殊感問題嚴重。把黨的中央會議搞成這個樣子，汪東興的罪惡尤大。

散會後，吳法憲對我說：“有了毛主席這篇講話，問題全解決了。”我頂了他一句說：“你不要自我安慰。”

會終人散。

9月6日晚8時，葉群忽然通知黃、吳、李、邱同她一起到江青那裏去，看樣子是低頭向江青道歉求情。江青住在原來蔣介石的那座別墅裏。我們在會客室裏等了半小時，江青才緩緩由寢室出來，滿臉怒氣。抬眼將大家掃視一遍後就坐下來，半天不吭聲。

葉群緊靠江青身旁，低聲下氣地說：“這次我們本來動機是擁護毛主席的，結果反而干擾了毛主席，我們心裏很不安。我們上了陳伯達的當，犯了嚴重錯誤。林副主席批評我們頭腦簡單、頭腦發熱。我們都是從小就參加革命，我們都是一條藤上結的瓜……”沒有等葉群說完，江青就發開了洋脾氣：“你們要把我打入十八層地獄！你們，你們在毛主席那裏告我的狀，害得我好苦啊……，你們，你們不聽我的話，你們對我封鎖，你們搞軍國主義，你們搞軍隊領導一切，你們把我當成什麼人？……”看樣子根本無法談下去，祇好請江青回心轉意，我們告辭了。

方块字读书社区



在林彪專機上

我對這次低頭向江青求情非常反感，回來後我對黃永勝發牢騷說：“大丈夫做事，敢做敢當，該殺就殺，該剮就剮，何苦去跪求別人乞饒。”

9月7日告別廬山。當時毛主席準備去杭州，林彪飛蘇州，黃、吳、李、邱四人同機飛回北京。在九江機場，按計劃林彪乘坐的飛機先起飛，黃、吳、李、邱乘坐的飛機後起飛。因此，在林彪、葉群上飛機後，黃、吳、李、邱也跟着上飛機送行，并由隨行的記者照了幾張像。當時江西軍區、廬山交際處和全會服務人員都禮節周到地上上下下，川流不息前往送行。

政治局規定這次會議內容除傳達公報外，其它一概保密。同時對會議工作人員，隨身秘書都打了招呼，要絕對保密。陳伯達回到北京後，即停止參加中央任何會議，停止閱看中央任何文件，實際上處於靠邊軟禁狀態。

林彪已大難臨頭了。二中全會之後發生的事情是順“理”成章的。雖然當時我們都沒有認識到這層意思，但二中全會後，我曾在辦事組說過：“我們不適應高級的政治生活”，也反映了我對接下來可能發生的最困難情況的最壞思想準備。

第三十七章

批陳整風與南巡秘密講話

一、毛主席說： “你們的問題在我這裏已經完了”

1970年9月下旬，爲了參加國慶活動，毛主席由杭州起身回北京，在途中特地到蘇州看望林彪，了解林彪的身體、生活和工作情況。雙方交談兩個多小時，葉群在座做記錄。首先是談林彪的身體和生活情況，毛主席希望林彪搞點社會調查，經常了解人民群眾的生產和思想動態。以後更多的時間談到解放軍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當談到黃、吳、李、邱的思想和工作特點時，林彪在毛主席面前談到，黃、吳、李、邱雖然在廬山上了陳伯達的當，但是他們是擁護黨，擁護毛主席的，工作上有辦事能力，一旦發生戰爭，他們仍是骨幹等等。林彪和葉群由蘇州回到北京後，葉群特地在三座門一次有各總部、各軍、兵種負責人的會議上傳達了毛主席和林彪兩人談話內容。

我們由廬山回到北京後不久，吳法憲和葉群就寫了書面檢討，呈送毛主席，希望毛主席有個好的批示，以便盡早解脫。但毛主席給了他們當頭一棒，在他們的檢討上進行了嚴肅的批評。

10月14日，毛主席對吳法憲書面檢討上的批語是：“作爲一個共產黨人，爲什麼這樣缺乏正大光明的氣概？由幾個人發難，企圖欺騙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有黨以來，沒有見過。辦事組各同志（除個別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記了九大通過的黨章。林彪同志的

方块字读书社区

報告，又找什麼天才問題，不過是一個借口。什麼偉大謙虛，在原則問題上，從來沒有客氣過。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在廬山，我的態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10月15日，毛主席對葉群書面檢討上的批語是：“愛吹不愛批，愛聽小道消息，經不起風浪”，“‘九大’勝利了，當上中央委員，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線拋到九霄雲外，反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風”，“不提‘九大’，不提黨章，也不聽我的話，陳伯達一吹，就上勁了。軍委辦事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

對於毛澤東這樣嚴厲的批評，不但吳法憲、葉群思想震動很大（據說葉群當着林彪的面大哭了一場），我們軍委辦事組其他人也震動非常大，因為毛對吳、葉檢討的批示之快，批評之重，上綱上線之高是沒有想到的，特別是對葉群的批評，絲毫不顧及林彪的面子，使我們感到問題更嚴重了。

在吳法憲的書面檢討上毛主席還批語：“我願意看見其他宣講員的意見”。毛的意思很明確，就是吳、葉檢討了，黃、李、邱也要檢討。要人人過關了。

我們的心情都很沉重，坐臥不安，飲食無味，我想誰遇到這種情況也不會例外。廬山會議上，毛主席主要是對陳伯達的嚴厲批判，對其他人祇是旁敲側擊。現在看來，批判的矛頭是直接對着黃、吳、葉、李、邱了。

11月，黨中央轉發了毛主席在廬山會議發表的《我的一點意見》，及傳達陳伯達問題的有關文件。

1970年冬，林彪又到北戴河去了。

1971年1月初，經毛主席批准，軍委召開座談會，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領導參加會議。會議主要是研究當年的戰備工作和軍事訓練工作。黃永勝主持會議。因為黃和我同時還要參加華北會議，因此祇好兩面跑。當時的會議簡報每一期都送毛、林、周。

方块字读书社区

2月19日，毛主席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突然批示：“請告

各地同志，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時，重點在批陳，其次才是整風。不要學軍委座談會，開了一個月，還根本不批陳。更不要學華北會議前期，批陳不痛不癢，如李、鄭¹主持時期那樣。”

周總理看到這個批示後，很快召集黃、吳、李、邱開會，責令吳法憲和葉群重新寫檢討，責令黃、李、邱也要很快寫出檢討，呈送毛主席。並說：“你們不好好檢討，林副主席就要被動，你們檢討得越好，林副主席就越主動”。

當時，軍委座談會已結束，2月22日晚，軍委辦事組祇好立即召集在京各總部、各軍兵種、國防科委、軍委院校等單位領導三十餘人開會，會議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同時黃、吳、李、邱在會上作了檢討。我們不僅檢討了“軍委座談會，開了一個月，還根本不批陳”的錯誤，而且檢討了廬山會議陳伯達問題上的錯誤。會後，軍委辦事組給“毛、林、周、康”寫了《軍委辦事組關於傳達毛主席批示的報告》。報告中提到：“這幾個同志（指黃、吳、葉、李、邱）即將向主席寫出書面檢討，認真清理思想，檢查自己的錯誤”。3月1日，毛主席在報告上批示：“已閱，很好。有主動，力求貫徹。”

遵照周總理的指示，我們很快地寫出各自的檢討，黃、李、邱先後於3月21日、22日分別呈送毛主席。3月24日，毛批示：“黃永勝、邱會作、李作鵬三同志的檢討都看了，我認為寫的都好。以後是實踐這些申明的問題。”4月11日，毛又批示：“吳法憲、葉群二同志的自我批評，我已看過，可以了。請連同黃、李、邱三同志的自我批評，向政治局會議報告，作適當處理。”

毛主席看完我們各人的書面檢討之後不久，召集黃、吳、李、邱到中南海他家裏談話。這次談話語氣比較緩和，毛主席說：“你們的檢討我都看了，你們有的在信封上寫要我‘親收’，有什麼密可保？”又開玩笑地說：“你邱會作的字寫得不錯，你也可以當主席！”此後又很嚴肅地說：“你們的問題在我這裏已經完了，

注1. 李指的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李作鵬，吳指的是軍委辦事組副組長吳法憲；鄭指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

今後就看你們的實際行動了。”有了這句話，大家心裏暗自鬆了一口氣。

二、華北會議 和“批陳整風”會議

1970年12月22日至1971年1月下旬，根據毛主席提議，黨中央召開了華北會議。

這個會議的起由，是駐華北、京津地區的38軍給軍委的一件材料引起的。1970年12月10日，38軍黨委寫了一個《關於檢舉揭發陳伯達反黨罪行的報告》報送軍委辦事組和中央。報告中揭發，在解決保定派性等問題時，陳伯達在保定、唐山等地講話“千方百計地突出自己，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對抗毛主席革命路線。”“陳伯達不擇手段地插手軍隊，搞宗派活動，妄圖亂軍、奪權。”12月16日，毛澤東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以中央文件名義下發。毛澤東批示：“……建議北京軍區黨委開會討論一次，各師要有人到會，時間要多一些，討論為何聽任陳伯達亂跑亂說，他在北京軍區沒有職務，中央也沒有委任他解決北京軍區所屬的軍政問題，是何原因陳伯達成了北京軍區及華北地區的太上皇？……”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中央決定召開“華北會議”。

會議由毛主席、周總理親自領導並指定李德生、紀登奎、黃永勝和我負責會議的日常具體工作。黃永勝看到毛主席親筆排列上述四人的先後次序，徵求我的意見：工作怎麼搞法？我說：“最好由李、紀牽頭，我們協助。如果他倆不願牽頭，那你就應多尊重他倆的意見，挺身而出，大膽工作，絕對不可採取消極觀望態度。”黃永勝說：“難哪！”我又說：“遇事多向總理請示。”黃永勝表示同意。

方块字读书社区

華北會議採取小組會議、中型會議、全體會議相結合的方式進行，重點是批判李雪峰、鄭維山，其次是解學恭、吳德、劉子厚等人的錯誤。會議後期是其他有關人員自我檢查並在全體會議上檢討表態。會議進行情況除會議簡報及時反映外，我們四個人曾到毛主席那裏匯報並聽取指示。毛主席決定李雪峰、鄭維山隔離審查，北京軍區由李德生、紀登奎領導。並指示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從1971年1月下旬起（即華北會議結束後起）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批判劉少奇一類的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

大約是1971年4月初，根據毛主席指示，由周總理帶領黃、吳、李、邱，還有李德生、紀登奎，乘火車專列到北戴河會見林彪，主要由周總理把最近中央工作情況及今後打算（其中包括4月份中央召開“批陳整風”會議），向林彪匯報並徵求林彪意見。林彪表示完全同意，沒有提出任何其他意見。當周總理匯報黃、李、邱寫出檢討，毛主席已有批示時，林彪祇說：“錯了就檢討，按主席批示辦。”

現在回想起來，這次毛主席為什麼安排黃、吳、李、邱同總理一起去北戴河呢？我認為是毛主席希望林彪對“批陳整風”問題發表點意見，並對黃、吳、李、邱進行一番教育。更重要的，大概是在黃、吳、葉、李、邱都檢討後，在中央批陳整風會議前，探聽林有無自我檢討的意思。但這個希望落空了。

1971年4月15日，中央召開有中央、各省市、各大軍區負責人參加的“批陳整風”會議，實際是批判“軍事俱樂部”黃、吳、葉、李、邱的會議。會議印發了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向黨中央、毛主席做的書面檢討（唯獨沒有汪東興的檢討，汪東興得天獨厚，享受特殊保護因而幸免）。

會議開始時，葉群有些擔心，擔心中央“批陳整風”會議會像華北會議批判李雪峰、鄭維山那樣批鬥黃、吳、葉、李、邱，因此常來電話了解會議情況。以後聽說會議主要是分組討論，氣氛比較冷靜，不少負責人既批判又表揚。邱，又檢查自己的錯誤，甚至檢查多於批判。這樣她才放下心，並隨林彪於4月19日回

到北京。

會議中唯一發言最激烈的、政治上綱非常高的是毛遠新，他說：“廬山會議是一次‘未遂政變’。”（此說法一直延續到1981年的公審）“未遂政變”的這種說法，二中全會後我還是第一次聽到，因此十分警覺。當時毛遠新住在釣魚臺江青那裏，與毛主席來往密切，又具有毛澤東親侄子的特殊身份，當時我就感到“未遂政變”的說法太嚴重了，這已經不是一般的上綱上線。按此推理，矛盾的性質就有了根本的轉變。對五位政治局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領導幹部扣上這樣比鋼鐵還要沉重的大帽子，到底是何用意？！這未必是空穴來風，這樣的說法能够是你小小毛遠新發明的嗎？到底是誰有資格將廬山會議說成是“未遂政變”呢？不敢往下想！

會議最後由周總理做了總結，並通過了黃、吳、葉、李、邱的檢討。

林彪對這次中央“批陳整風”會議仍然是一言不發。這多少表明他的態度。廬山會議之後，毛主席批准先召開華北會議，把李雪峰、鄭維山批得臭不可聞，後又召開“批陳整風”會議，批判“軍事俱樂部”黃、吳、葉、李、邱。毛澤東的方針很明顯，步步升級，步步緊逼，步步圍攻，實際是“敲山震虎”，看你林彪什麼態度。毛澤東已下定決心，不投降就讓你滅亡。

劉少奇“投降”了，作了檢討，也未能挽救自己的滅亡。鄧小平多次檢討，表態“永不翻案”，站起來之後不久，又強加“走資派還在走”的罪名，被打倒了。

我看林彪不屈從、不檢討、不發言的態度是對的，反正檢討不檢討結果是一樣，黃、吳、葉、李、邱檢討多次，毛澤東表態“你們的問題在我這裏已經完了，今後就看你們的實際行動了”，中央“批陳整風”會議又通過了黃、吳、葉、李、邱的檢討，最後怎麼樣？結果不還是統統被打倒了嗎？

方块字读书社区

三、在武漢與劉豐的談話

初秋天氣，盛夏漸退，早晚已有涼意。1971年8月，朝鮮軍事代表團來我國訪問，會談武器裝備援助問題。按照既往原則，除原子彈外，凡我國庫存或能生產的常規武器裝備，一律滿足他們提出的要求。會談項目、數量基本確定後，我陪同朝鮮軍事代表團團長、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長吳振宇大將等一行到外地參觀訪問。先到海軍北海艦隊駐地的山東青島、煙臺、威海等地，參觀海軍艦艇、飛機、導彈及工程設施。以後轉回北京稍事休息，又到長沙、武漢參觀訪問。



陪同朝鮮軍事代表團參觀毛主席故居

大約是9月5日上午由長沙到達武昌，武漢軍區組織隆重的夾道歡迎。在將客人安排休息後，武漢軍區政委劉豐到駐地看望我。見面閑談中，劉豐談到毛主席在武漢接見中南各省負責同志時的重要講話，大體內容是：

1、談到接見經過時，說他參加了兩次接見，司令員曾思玉到東北去了，第一次沒有參加，祇參加了第二次。

2、談到毛主席批評（劉豐語是“罵了”）華國鋒問題。當時華國鋒向毛主席匯報農業問題，毛主席不願聽，批評說：“你祇知道抓農業，不抓政治，不抓階級鬥爭。”

3、談話中主席提出了“三要三不要”原則，即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

方块字读书社区

謀詭計。

4、主席在談話中說，不主張老婆當自己的辦公室主任問題。這很明確地是批評林彪，林彪那裏是葉群當辦公室主任，黃、吳、李、邱向林彪請示問題，都要經過葉群。

5、談到兩首歌的問題，毛主席提倡并親自領導大家唱了《國際歌》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

劉豐談話中我沒有任何插話，談完之後我也沒有表示任何態度。坐了不久，他就走了。

主席的談話內容再次在我的思想上引起很大震動，想了一想，很快就形成自己三點認識：

1、廬山會議問題沒有完結。原來我認為經過廬山批陳，又經過華北會議，再經過4月中央批陳整風工作會議，我們已經一而再、再而三的做了檢討，受了批判。在4月中央批陳整風工作會議之前，毛主席又親口對我們宣布：“你們的問題在我這裏已經完了，今後就看你們的實際行動了。”當時我認為毛主席接受了我們的檢討，廬山會議問題已經可以告一段落了。劉豐同我談話之後，才感到我的認識是不正確的。

2、在廬山會議的問題上，不但沒有結束，政治上綱的“罪名”比以前更高了，也更多了。在4月中央會議之前，什麼“反對九大路綫”，什麼“煽風點火，搞突然襲擊”，什麼“軍事俱樂部”，什麼“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之勢”，什麼“唯心主義先驗論”等，已經是嚇死人的罪名，現在更是增加了“修正主義”和“陰謀詭計”這兩條份量很重的罪名。

3、矛頭更明確地指向林彪。“辦公室主任”問題更直接地指向林彪個人。如果祇單純講三項基本原則，不講老婆當自己辦公室主任問題，我可能不會那麼敏感，不會有那麼大的思想震動。然而把三項基本原則與不主張自己老婆當自己辦公室主任聯系起來，就很容易判斷，毛主席所講的，就是針對林彪的。

劉豐走後，我獨坐思考了一會兒，心情愈來愈緊張，愈來愈不安。

方块字读书社区

當天下午陪同朝鮮貴賓參觀長江大橋及武昌造船廠。晚上軍區和湖北省革委會聯合舉行宴會，我祇是禮節性地陪着客人。我一杯茅臺酒，從開始到宴會結束，仍原封未動，完全是做樣子奉陪而已。晚宴後參加文藝晚會，劉豐半途退席，據說他犯了胃病，身體不舒服。文藝晚會結束後，曾思玉邀我共同到劉豐駐地去看他，到達劉豐寢室內，他很快坐起來同我們打招呼，看樣子不像有什麼大病，說了幾句慰問的話，我們就退出來，各自回駐地休息去了。據說毛主席在武漢談話時，曾要求大家絕對保密，不准把談話內容告訴北京任何人。但是劉豐無意中脫口而出，把毛主席的談話內容告訴了我，可能後來冷靜一想，發現自己做錯了事，感到後怕，因此就得了“胃病”。

9月6日上午，陪同吳振宇等回到北京，當天下午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和我，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同朝鮮軍事代表團舉行最後一次會談，把中央批准的援助項目、數目宣布之後，朝鮮軍事代表團非常滿意，會談很快就結束了。把客人們送出門外，我們仍回到北京廳。

此時離出席朝鮮使館宴會還有一個小時，我把黃永勝拉在會談桌的西北角，悄悄地把劉豐同我談的情況全部告訴了他。我還特別提醒黃永勝不要把劉豐談的內容告訴葉群和吳法憲。以後我們四人靠攏坐在沙發上，黃永勝告訴我們最近毛主席在外地視察時，所談關於黨內十次路線錯誤的指示。接着我們一起去參加朝鮮使館宴會。在人民大會堂北門上車時，邱會作想了解我在外地知道的消息，就面向我說：“我們共坐一個車行不行？”我說：“可以。”我們倆上車後，邱說：“有什麼消息可不可以告訴我一點？”我就把車內保密玻璃搖上，然後將劉豐談的主要情況告訴了他，並警告他說：“無論如何不要告訴吳法憲”。

大約過了兩天之後，我又把毛主席談的三項基本原則，向海軍黨委常委作了原文傳達，但其他內容沒有傳達。

四、毛主席講 關於黨內十次路線鬥爭

當時，黃永勝向我們傳達毛主席講的關於黨內十次路線鬥爭的“最高指示”，內容大致是：

主席講：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了一切，路線不正確，有了一切，也可以丟掉。我們這個黨，已經有五十年的歷史了，大的路線鬥爭有十次：開頭是陳獨秀搞右傾機會主義，以後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線錯誤，反對毛主席“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的觀點，後來他被國民黨捉住了，寫了《多餘的話》，自首叛變了。從1930年6月到9月，李立三搞了三個多月的立三路線，他主張打大城市，一省數省首先勝利。1930年到1931年，羅章龍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沒有成功。王明路線壽命最長，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組織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他們在全黨奪權四年之久。1935年1月遵義會議糾正了王明路線錯誤，王明倒臺了。在長征路上，一、四方面軍匯合後，張國燾搞分裂，另立中央。到陝北後張國燾逃跑了。全國勝利後，高崗、饒漱石結成反黨聯盟，想奪權沒有成功。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裏通外國，想奪權。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也跳出來反黨。他們搞軍事俱樂部不講軍事，講什麼“人民公社辦早了，得不償失”。劉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黨的，他們也沒有搞成。再就是1970年廬山會議，他們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五個常委瞞着三個，也瞞着政治局大多數同志。那些大將，包括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還有李雪峰、鄭維山，他們一點氣也不透，來了個突然襲擊，他們發難，不是一天半，而是兩天半。我看他們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理論綱領是天才論，組織綱領是國家主席。天才問題是理論問題，他們搞唯心論的先驗論。說反天才就是反對我，我不是天才。有人急于想當國家主席，

急于分裂黨，急于奪權。跟彭德懷的鬥爭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跟劉少奇的鬥爭也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對這些人怎麼辦？還是教育的方針，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對於林副主席還是要保，不管誰犯了錯誤，不講團結，不講路線，總是不太好吧。……

毛澤東南巡時秘密講的這篇中共黨內十次路線鬥爭內容，在毛澤東死後，歷史已經證明並且將繼續證明，其中有的是正確的，有的是錯誤的。他親自處理的王明路線和張國燾路線錯誤，是完全正確的。王明、博古錯誤領導的結果，導致蘇區損失十分之九，白區力量損失百分之百，錯誤時間達四年之久，當然是路線錯誤。但對犯錯誤的同志採取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寬大團結的政策，連王明、博古本人還很長時間內保持了中央委員的領導地位。因此毛澤東的領導威信大為提高，黨的團結大為增強。張國燾在長征時分裂紅軍、分裂黨，另立中央，其時間達一年以上，當然也是路線錯誤。張國燾逃跑了，而對其他犯錯誤同志，同樣採取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正確政策，結果使四方面軍的同志口服心服，紅軍更加團結。

但是毛澤東親自處理的彭德懷、劉少奇的兩次所謂“路線鬥爭”，歷史已經證明是徹頭徹尾的錯誤，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將正確誣成錯誤，將有功誣成有罪，將香花誣成毒草。不但把彭德懷整死，把劉少奇整死，而且打擊了一大片，給黨和國家造成了極大的損失。這樣的錯誤到底是什麼性質？如果是別的什麼領導人，早就該全黨共株之、全國共討之了。

1970年廬山會議，對林彪、陳伯達的所謂第十次路線鬥爭，究竟是正確，還是錯誤，至今尚未全面地、實事求是地結論。

五、南巡講話是 策劃批鬥林彪的前奏曲

方块字读书社区

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回到北京，結束了自8月中旬到9月11

日，將近一個月的南巡武漢、長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的行動。他在沿途各地的秘密講話中，除了“三要三不要”及黨內十次路線鬥爭之外，據知情者說還有這樣一些內容：

1、在講路線鬥爭時表揚了江青，批評了許世友。毛主席說：江青直接參與的是兩次路線鬥爭，就是同劉少奇，還有陳伯達和那個人（那個人是誰？不指名，聽者、讀者都知道）的鬥爭。這都是江青端出來的，她是立了大功的。和彭德懷、高崗、饒漱石的鬥爭，她在國外，沒有介入到核心裏來。這個人頭腦清醒，我的話她是聽的，也有她自己的思想。毛主席又說：我承認江青有她的獨特的優點，她看問題很尖銳，很準確，也很認真。對劉少奇、陳伯達、林彪的錯誤，都是她首先察覺到的。這一點我應向她學習，你們也應向她學呢。這是二中全會後，毛澤東對江青的高度評價。很明顯，毛把江青進一步推向政治前臺的目的，一方面將江青樹立成為文革的“光輝形像”，進一步加強和鞏固文革成果，推動文革繼續發展。另一方面表示出毛澤東是江青的後臺，是一家人。誰再膽敢反對文革，誰要反對江青，就是反對毛澤東，下場如同林彪以及黃、吳、葉、李、邱。

同時，毛主席批評許世友時說：張國燾搞偽中央，你許世友是清楚的。張國燾在長征路上搞政變，他是締造者、指揮者。他指揮軍隊搞分裂，拿軍隊作為本錢搞分裂，那樣不好嘛。長征時同我們一起的右路縱隊有四方面軍的第4軍和第30軍，李先念和你許世友同我們一起過的草地，張國燾打電報命令你們返回去，我們說，你們願意回去就回去，不願意回去我們也歡迎。後來你們還是回去了。你許世友同張國燾一樣是不對的。要接受這個教訓。現在你對我們的感情不如過去，我的話你也不聽了。

毛澤東為什麼特別批評許世友呢？因為許世友在廬山會議華東小組會議上，堅決擁護林彪講話，對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表示出極大的反感。以後又給林彪寫了一封表態信。毛主席借許世友的腦袋，又敲打了一大批心中有想法的老幹部。

2、毛澤東對林彪的批評就更嚴格了。他說：林彪同志那個講

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他們有話，事先不拿出來，大概總是認為有什麼把握了，好像會成功了。可是一說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麼大的勇氣，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可是過了幾天之後，又趕快收回記錄（葉群確實在講話當天就把記錄拿走了）。既然有理，為什麼收回呢？就說明他們空虛恐慌。又說，廬山這次的鬥爭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結論，這次保護林副主席，沒有作結論，當然他要負一些責任。回北京之後，還要找他們談話，他們不找我，我去找他們。有的可能改過來，有的可能改不過來，要看實踐。前途有兩個，一個是可能改，一個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則錯誤，犯了路線方向的錯誤，為首的改也難。歷史上陳獨秀改了沒有？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改了沒有？沒有改。

又說：我同林彪同志說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嘛。譬如他說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嗎。馬克思、恩格斯是同時代的人，到列寧、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麼能說幾百年才出一個呢？中國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怎麼能說幾千年才出一個呢？什麼頂峰啦、一句頂一萬句啦，你說過頭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麼頂一萬句？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我講了六次（筆者聽到五次），一次就算講了一萬句，就是六萬句，他們都不聽嘛！半句也不聽，等于零！陳伯達的話對他們才是一句頂一萬句。什麼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人，說穿了是樹他自己。還有什麼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和領導的，林彪親自指揮的，締造就不能指揮呀？締造也不是我一個人嘛。

3、主席說：你們對廬山會議怎麼看法？譬如華北小組六號簡報，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我個人認為，是一個反革命的簡報。九十九人的會議（即中央批陳整風會議）你們都到了，總理也作了總結講話，發了五個大將的檢討，還發了李雪峰、鄭維山兩個大將的檢討，都認為問題解決了。其實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他們要拍住，連總參二部部長一級的幹部都不讓

方块字读书社区

知道，這怎麼行呢？我說的這些是當作個人的意見提出來，結論要由中央來做。

4、主席說：軍隊要謹慎，地方也要謹慎，不能驕傲，一驕傲就犯錯誤。軍隊要統一，軍隊要整頓。我就不相信我們的軍隊會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黃永勝能夠指揮解放軍造反。軍隊下面還有師、團，還有司、政、後機關，你調動軍隊搞壞事，聽你的？

5、主席說：要學唱《國際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僅要唱，還要講解，還要按照做。《國際歌》的詞全部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那裏面講的是奴隸們起來為真理而鬥爭，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在廬山會議時，我寫了一個七百字的文件，就是提出了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創造歷史這個問題。國際歌就是要團結起來到明天，共產主義一定要實現。學馬克思主義，就講團結，沒有講分裂麼！

又說：我們唱了五十年《國際歌》了，我們黨有人搞了十二次分裂。我看還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產主義就沒有鬥爭了？我就不相信。到了共產主義，也還有鬥爭的，祇是新與舊，正確與錯誤的鬥爭就是了。幾萬年以後，錯誤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當我從方方面面知道了毛主席這次南巡期間多次秘密談話的主要內容後，很自然，思想上產生了很大震動。但仔細想一想，又有不少問題想不通，疑惑不解：

第一、毛主席這麼多重要的講話內容，為什麼不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為什麼不在中央華北會議上講？為什麼不在中央批陳整風會議上講？而要借南巡，到外地對少數幹部講，並規定所講的內容要絕對保密，不能告訴北京任何人。這究竟為什麼？這種做法就是馬列主義？就是團結？就是光明正大？我不想無限上綱，說這是陰謀詭計，是破壞團結搞分裂。我祇根據自己對光明正大、對團結與分裂、對實事求是的理解來判斷：這種做法非常不妥當，是非常錯誤的！

方块字读书社区

第二，林彪在廬山的講話，是在中央九屆二中全會上經毛主席批准公開講的，黨中央主席、中央常委、全體中央委員全部在座，並以熱烈鼓掌表示贊成。第二天，經政治局討論通過，并由總理報主席同意，又給全體中央委員重放了林彪講話的錄音，當時沒有任何人提出反對意見，而是熱烈鼓掌表示贊成，這怎麼說是搞突然襲擊，是搞地下活動？

“九大”黨章並沒有規定，黨員在黨的會議上發表意見必須經過黨中央主席審查批准，相反，黨章規定黨員有權向黨的組織和各級領導人提出批評和建議。黨員對於黨組織的決議指示，如果有不同意見，允許保留。彭德懷給黨中央主席寫了一封意見信，就成為反黨路線錯誤。林彪在黨中央會議上發表意見，又成為反黨路線錯誤，實在令人難于理解。難道這就是黨內民主集中制嗎？難道這就是黨內群眾路線嗎？難道這就是黨內知無不言、言者無罪嗎？難道這是“有集中又有民主，有紀律又有自由，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政治局面嗎？

至于林彪的講話沒有事先向毛主席商量，據我了解并非如此。雖然現在當事人大部分都死了（陳伯達、吳法憲的回憶錄都講到了這段事實），但是我還沒有死，可以作證。當林彪講話完畢，毛主席宣布散會後，葉群就向我和吳法憲、邱會作等人說：

“會議開始前，毛主席和林彪在禮堂休息室時，林彪就向毛主席報告了，他準備在會議上講一點意見，毛主席同意了林彪講話，但不要點名。”林彪還要葉群站在休息室門口，不讓別人進去干擾。由于毛、林的談話致使大會開幕式沒有按時開始。

我認為，葉群的這番話是可信的，因為在黨的全會上，特別是全會開幕式上的講話及講話內容是必需請示毛主席，並經毛主席批准的，作為黨的副主席的林彪，這點起碼的常識和紀律還是知道的。現在毛主席說事先沒有同他商量，是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究竟造謠扯謊的是誰？還是他老人家太健忘了？

第三、關於“人民解放軍是黨領導的，黨是人民解放軍的領導，黨直接指揮的”的提法，是經毛主席同意，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

的統一對外提法。但1970年7月下旬，政治局會議討論“八一”建軍節社論時，江青和張春橋突然提出這一提法“不符合歷史，要修改”，這樣就與黃永勝堅持的“完全符合現在事實，不應修改”的意見發生爭論。參加會議的太多數人是支持黃永勝意見的。周總理請示毛主席後，我們看到毛主席批示：“按照原來提法不變”。這應該是毛主席第二次對這一提法的肯定。可是這次南巡談話中，却用此事批評林彪說：“締造就不能指揮呀？締造的也不是我一個人嘛。”真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出爾反爾。

第四、關於天才問題。“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提法，在文革之前就是黨中央確定的對國內外宣傳的統一口徑。林彪在廬山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時的講話中提到“毛主席是天才，我仍堅持這個觀點”。由於林彪堅持了這個觀點，毛主席就說是“反黨理論綱領”，難道反對這個觀點，就是馬列主義嗎？我當然保留我的不同看法。

第五、關於國家主席問題。林彪在二中全會上自始至終根本沒有提到設國家主席問題，根本沒有像會前那樣再堅持要毛澤東當國家主席，證明他已接受毛主席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並改變了會前的態度。

祇有汪東興首先在華北小組會上“發難”，帶頭堅持要設國家主席，並要毛主席兼任國家主席。而毛主席把設國家主席說成是“反黨組織綱領”，又把“急于想當國家主席，急于分裂黨，急于奪權”強加在林彪頭上，這從何談起呢？

思前想後也得不出正確的答案，但有一點我已隱隱感到：二中全會的問題沒有完，陳伯達問題沒有完，毛主席南巡各地的秘密講話包含着深刻用意的，可能是發出策劃批鬥林彪的信號。我真不希望是這樣，想想都不寒而栗……。

第三十八章

“九·一三”事件

一、周總理的電話指示

1971年9月12日，星期天。我在西山的家中。

早飯後，孩子們興致很高的提議去頤和園玩玩。劉繼祥秘書也說，今天沒有接到中央和辦事組開會的通知。

自8月以來，先是陪同江青到青島，之後就是陪同朝鮮軍事代表團到青島、長沙和武漢。在北京的時間，也是一個會議連着另一個會議，根本沒有休息的機會，也很少有時間與家人相聚在一起。老伴也勸我：“既然沒有會，就和孩子們出去散散心吧！”我同意了。

當時頤和園閉門謝客，沒有對外開放。經過秘書與有關部門聯系，頤和園做了專門安排。走進園內，非常安靜，近處鳥語花香，遠處青山綠水。我與老伴隨孩子們在園中散步、照相。頤和園還專門安排了講解員，陪同我們一路講解園中歷史。秋高氣爽的天氣，我的心情很不錯，多年都沒有這樣輕鬆了。直到快中午，全家才回西山。

下午起床後，劉秘書報告，仍沒有中央和辦事組開會的通知。我要劉秘書把前一段因陪同朝鮮軍事代表團在外地，而未來的及處理的海軍文件，抓緊送來。在當時，我們不僅要參加中央和軍委辦事組的工作，還要顧及“自留地”。

晚飯後，孩子們又拉我方块字读书社区燈片。沒看多久，我就回辦公室繼續處理文件。大約10點半過後，全部文件都處理完

了。

這一天很安靜，沒有別的事情打擾。既到頤和園散了心，又把“自留地”的事處理完。心裏很高興。老伴進我的辦公室說：“既然事情都辦完了，就早點休息吧。”她一邊幫我收拾文件，一邊與我閑談。

此時，劉秘書進來說：“總理秘書來電話說，總理要找首長講話。”我聽後說：“立即轉過來。”劉秘書拿起我辦公桌上的軍委一號臺電話說：“請把總理電話接過來。”

我拿過來電話，等待總理講話時，看了一眼手表：23時整。

周總理在電話中指示我：“你查問一下山海關機場，今天下午是否有一架空軍飛機飛到那裏去了，查的結果告訴我。”

我回答：“好的。”

平時，總理指示我了解這樣或那樣的情況，也是很平常、很經常的事，當時總理的語氣也很平靜，我沒有聽出任何異常的感覺。

23時05分，我就同山海關機場接通了電話。

我問：“你是誰？”

回答：“我叫李萬香，是場站航行調度室值班主任。”

我問：“是否今天下午有一架空軍飛機到達山海關機場？”

回答：“是的，有一架空軍三叉戟飛機。”

我問：“什麼時間落地的？”

回答：“20時15分。”

我問：“飛機走了沒有？”

回答：“沒有走。”

我說：“好了，就問這件事。”

我放下電話，立即要軍委一號臺總機接通周總理電話。接通後，我把查問山海關機場那架空軍三叉戟飛機的情況，如實地報告了總理。此時大約是23點10分左右。

聽完我的報告，總務處學讀書社區的語氣說：“有這樣一個情況，第一……”，當我聽到“第一……”時，立即拿起筆準備記

錄，並用手勢告訴老伴幫助我記錄。

在電話中，總理向我做了四點指示，按照通常接受上級指示的習慣，也為了讓我老伴能夠記錄準確，總理每說一句，我都要按原話復述一遍：

第一、北戴河那位（我一聽就明白是指林彪）可能要動，要飛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飛夜航。

第二、他要飛夜航，你就告訴山海關機場，待他到達機場後，請他給我來個電話。

第三、空軍那架飛機的行動，要聽北京我的指示、黃總長的指示、吳副總長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飛。

第四、我已告訴吳法憲到西郊機場去了，作必要準備。

總理指示完畢後，我示意要過老伴做的記錄，再次向總理復述了他的四條指示。在復述時，將第一條指示的“北戴河那位”改為了“林副主席”。總理在電話中聽完我的復述說：“那就這樣吧。”此時大約是23點30分左右。

兩次復述總理的指示，這是我長期做參謀工作，在複雜的戰爭環境中培養出來的工作習慣。軍情無小事，不能正確的接收、傳達上級的指示，是要貽誤大事的，因此現場核對上級的指示命令，是高級指揮人員必備的素質。

接完總理的電話，當時給我的第一感覺是，林彪可能要回北京，但總理出于安全考慮，不同意林彪飛夜航。

23點35分我要通了山海關機場調度室電話，隨即將總理指示的前三條（因為第四條與機場無關）向調度室值班員做了傳達。同時，我在此次與機場調度室值班員的通話中，對總理的第三條指示，又補充說：“四個首長中，其中任何一個首長指示均可放飛”。這是我當時對總理電話指示精神的理解；其一，除周、黃、吳、李的指示外，其他人的指示不可放飛；其二，難道周總理一人，或黃總長一人決定放飛也不行嗎？

我要求值班員復述

方块字读书社区。

23點45分左右，周總理又打電話問我三叉戟飛機號碼，我又

立即打電話詢問機場調度室，機場值班員開始報告為256號，我將飛機號碼報告了總理，幾分鐘後，機場調度室又來電話更正為252號，我又將更正後的情況再次報告了總理。此時大約是23點55分左右。

在9月12日23點之後的約一小時中，周總理（包括總理辦公室）給我打了兩次電話，我回總理四次電話。同時，我給山海關機場場站航行調度室值班員打了三次電話，機場調度室值班員給我回了一次電話。

通完電話後，我對照總理的電話指示，又仔細地想了想與機場通話的情況。我感到，在傳達總理的第三條指示時，我曾補充說：“四個首長中，其中任何一個首長指示均可放飛”的話不夠準確。當時我考慮，雖然周總理一人，或黃總長一人完全可以決定是否放飛，但又想到總理電話指示的第四點，吳法憲已受命到達西郊機場，空軍直接領導的中央首長專機師和指揮系統都在西郊機場，而且山海關機場那架飛機是屬於空軍專機師的，機組人員也是空軍的，如果吳法憲不知道總理“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飛夜航”的指示，他可以隨時直接調動飛機。這樣就不能保證總理指示的落實。

因此，我覺得應向機場再強調、再明確一下總理的指示。

9月13日0時06分左右，我又接通了山海關機場調度室的電話，還是值班主任李萬香接聽的。

我說：“空軍那架三叉戟飛機要經北京周總理、黃總長、吳副總長和我四人聯合指示才能放飛，如果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不管是誰的指示要報告我，你們要切實負責。”

在這次通話中，我特別強調和明確了兩點：第一、強調“四人聯合指示才能放飛”；第二、強調“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不管是誰的指示要報告我”。

當時我認為，這樣是更準確、更完整地傳達和落實總理的指示。但我有一點疏忽，就是沒有讓接聽電話的對方復述一遍。

通話結束後不久，山海關機場場站航行調度室又接連來了兩

次電話。

第一次大約是0時20分左右。電話接通後，值班員先報告我說：“李政委，場站領導要同你通話。”

我答：“好，請講。”

頃刻對方說：“我是場站站長潘浩，李政委你還有什麼指示？”

前幾次電話都是機場調度室值班人員接的，現在場站領導來了，我再次向他傳達總理電話指示的前三條。其中，總理指示的第三條，我是按照0時06分給李萬香的指示，即“聯合指示才能起飛”向潘浩傳達的。

通話中，潘站長請示我：“你傳達的總理指示，可不可以告訴空軍機組的負責人？”我回答：“可以告訴。”

潘站長突然在電話中又請示：“如果飛機要強行起飛怎麼辦？”我拿着電話思索片刻：潘浩的請示出人意外。即使總理不同意林彪專機飛夜航，也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呀？況且，總理並沒有指示飛機強行起飛該怎麼辦，是阻止？還是不阻止？我不敢決定。

我答：“可直接報告周總理。”當時，在總理沒有明確指示，也沒有授權他人處理的特殊情況下，我祇能先答復機場緊急處置的辦法，因為總理在親自了解和處理林彪專機的問題，祇有總理有決定權。

這裏我要說明一點：當時，山海關機場是海軍航空兵第5師所管轄的戰備值班機場。機場作戰值班電話與海軍通信總站有專用綫路，而通信總站與軍委一號臺也有直通綫路，因此山海關機場作戰值班電話具備和軍委一號臺、和總理直接通話的條件。當晚，總理對我的電話指示第二條（“他要飛夜航，你就告訴山海關機場，待他到達機場後，請他給我來個電話”）就說明機場與總理的通話條件是具備的。

放下潘站長的電話，我本想立刻給總理打電話，報告潘浩請示的情況。但轉念又一想，**方块字读书社区**沒有報告機場發生了什麼異常情況，他怎麼能夠預先設想到飛機會強行起飛？從來沒

有過不經機場塔臺指揮，就有飛機自行起飛的事情出現過，何況這是空軍專機師的飛機。必須把機場的情況先搞清楚再給總理打電話，不然，總理問我“強行起飛”的根據是什麼？我如何回答呢？

大約0點30分左右，我正準備給機場打電話，機場的電話就打了過來，我當時接到的電話報告詞祇有一句話：“飛機強行起飛了！”

太突然了！我來不及多想，立即向總理報告：“飛機強行起飛了。”總理十分鎮靜的“哼”了一聲，重復問了一句：“強行起飛了？查一下航向。”我又向山海關機場打電話查問航向，回答：“西北。”我將飛機航向立即報告了總理。此時大約是13日凌晨0時55分。

從13日0時06分之後的五十分鐘內，山海關機場場站領導給我打了一次電話，機場調度室值班員給我打了一次電話。同時，我給機場調度室打了兩次電話，我向周總理電話報告兩次。

以上就是從12日23時到13日凌晨0時55分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內，我處理“九·一三”山海關機場事件的全部過程。

此後我雖躺在床上準備睡覺，但翻來覆去怎麼也睡不着，滿腦子都是：林彪的飛機強行起飛了。為什麼強行起飛呢？出了什麼事？機場雷達報告已向西北方向飛行，是不是要回北京？但回北京為什麼要強行起飛呢？越想越想不明白，越想越覺得有問題。我的思想祇圍繞在總理指示不宜夜航，夜航不安全的思路中。當時，我最怕出現不安全問題，更不能在自己的工作責任範圍內出問題。

二、政治局緊急會議

剛剛躺下兩個多小方块字读书社区告說，政治局通知召開緊急會議，立即到人民大會堂。由于睡眠不好，我迷迷糊糊地從床

上爬起來，穿好衣服就趕往大會堂。

到大會堂後，政治局委員們都陸續來了。周總理主持召開了政治局緊急會議，周總理報告林彪13日凌晨“外逃”的經過。

我從周總理的講話中，了解當晚的大致情況：12日晚21點左右，是林彪女兒林立衡發現了林彪、葉群要離開北戴河住地的異常情況，首先報告了擔任住地警衛的8341部隊負責人，由8341部隊負責人用電話報告了汪東興，汪東興立即報告了總理。總理曾打電話給葉群勸阻不要夜航。13日0時20分左右，林彪、葉群、林立果等人在住地開槍打傷了警衛人員後，由北戴河開汽車到達山海關機場，8341部隊曾派車在後面追趕，但無濟于事。林彪的汽車開到三叉戟飛機旁邊，很快就上了飛機，0時30分左右，強行起飛。總理說：“1點55分，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飛機在中蒙邊境越過邊境綫向外蒙方向飛去了。”當時尚不知飛機在蒙古境內溫都爾汗附近迫降時已機毀人亡。會上，周總理估計林彪是投奔蘇聯去了。總理要求：“目前此事要暫時絕對保密！”

原定當天上午我要到體委參加11月在北京舉行的亞非乒乓球邀請賽領導小組會議，因為總理指定我是組長。政治局緊急會議結束後，我向總理請示，是否還按計劃召開領導小組會議，總理說：“一切按正常進行。”

因為離開會的時間還早，我在大會堂吃了早點後，坐在沙發上想睡一會兒，但睡不着，腦子裏很亂，對總理剛才的講話，我真是異常驚訝！一是林彪“叛逃”，太出乎意料了；二是原來總理在12日夜早已知道林彪如此詳細的情況，但是却没有向我透露任何蛛絲馬迹，把我蒙在鼓裏，茫然不知所措的處理機場問題。

上午參加完體委會議後，我回到西山家中吃午飯。劉秘書又報告，政治局通知下午三點在大會堂再次召開緊急會議。

會議上，周總理宣布：軍委辦事組暫時離開西山辦公。總理問黃永勝：“林彪去過西山你們辦公地點沒有？”黃永勝回答：“去過。”總理說：“為防方塊字读书社区，軍委辦事組人員分散一下，黃永勝、吳法憲在大會堂同我一起處理軍隊日常問題，辦事

組其他人員回家(各自單位)辦公。”爲什麼如此，大家是心照不宣的。我當時被指定住在京西賓館。總理講完話會議就結束了。

14日晚政治局會議上，周總理通報了兩件情況：一是14日下午，我國駐蒙古使館就獲得了我一架大型客機于13日凌晨2時半，在蒙古境內溫都爾汗墜毀。我情報偵聽部門也從蒙方通信中證實這一點。後又接到蒙古外交部向中國政府提出交涉：有一架中國民航飛機，侵犯蒙古領空，在溫都爾汗墜毀。隨後，我駐蒙古大使館，向我外交部來電報告：有一架中國民航飛機在溫都爾汗附近機毀人亡。二是會議上總理又講了另一件嚴重事件：13日凌晨3點左右，空軍一架直升飛機從北京的沙河機場起飛，機上除正副駕駛員外，還有三名空軍的幹部。飛機一直向北飛行。中央命令攔截此飛機。該機之後在懷柔某地降落，已查明該機駕駛員死亡，三名空軍的幹部中兩人自殺死亡，一人被俘。

會議還確定了全軍新的作戰部署。其中決定，海軍各艦隊就近歸大軍區領導。海、空軍的機場派陸軍部隊進駐。雖然我已感到這是對我政治上的不信任，但我仍表示堅決執行。

15日晚上的政治局會議上，周總理宣布：“經情報證實，三叉戟飛機確實墜毀並起火燃燒。林彪、葉群、林立果全部燒死。”又說：“已指示外交部與蒙方交涉，盡快安排我使館人員勘察現場。”

18日晚上的政治局會議上，周總理宣讀了由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經毛主席批准即將下發全黨的中央文件《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通知》中說：“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倉惶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

18日傍晚，我駐蒙使館人員在蒙方安排下趕到現場，進行調查及拍攝現場照片。22日派人送回北京。當時我們在政治局會議上都看了這些照片。機毀人亡的原因，蒙古方面認爲該機是在“沒有外來影響的情況下，由于自身不明的原因，進行緊急降落，試圖用飛機腹部着陸，被燒”。我駐蒙古大使館調查人員認爲，從墜機現場周圍並無高大目標，迫降場選擇合理，

着陸點到燃燒區滑行了幾十米距離，以及死者軀幹燃燒不重等情況看，飛機不像空中爆炸後解體，而是着地後爆炸解體并起火的。

三、總理圈閱了電話記錄報告

13日下午四點多，開完政治局緊急會議後，我回到西山。一下車，我就通知劉秘書：“準備一下，下山（意指回海軍）辦公。”

一天一夜沒有休息，雖然很疲倦，但一點睡意都沒有。老伴給我沏了一杯茶，我一邊喝茶，一邊小聲告訴老伴：“出大事了，昨晚林彪、葉群乘空軍飛機外逃啦！”我感到中央出了這麼大的事情，是非常嚴重的，也感到林彪是從海軍機場跑的，可能海軍也要有責任。

我和老伴一邊談論林彪外逃的事，一邊清理昨晚與總理、與機場前前後後通話的過程。

大約17時左右，劉繼祥秘書拿着一份報告進到辦公室，這份報告是海航5師整理的《山海關機場九月十二、十三日情況報告》，是海航5師用電話報告，劉繼祥秘書電話記錄的。

我正在回顧清理昨晚的情況，正好聽聽山海關機場的報告。我就讓劉秘書念他記錄的報告。

當他念到報告中記錄着：23點35分，我向機場調度室值班員傳達總理指示，並補充說“四個首長中，其中任何一個首長指示均可放飛”時，我點頭說：“對！”

當他又念到報告中記錄着：0時06分，李政委來電話，再次強調中央首長指示，四個首長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才放飛，誰的指示要報告李政委。要負責任。我立即打斷劉秘書的話，說：“不對！這次電話記錄不對。”

我告訴劉秘書：“這次報告的是要四個首長聯合指示才能起飛。”

方块字读书社区

念完報告後，我對劉秘書說：“你與他們再核實一下我的講話，不要記錄錯了。”

此時已快18點了，下午政治局會議上，總理指示我們都“回家”辦公，我通知劉繼祥秘書，準備隨我下山回海軍。

晚飯後，我在海軍407樓辦公室中看文件，劉繼祥秘書拿着海航5師的那份報告進了辦公室，對我說：“我已打電話與機場核實了，你0點06分的那次電話指示，機場值班員根本沒有聽清楚。他們說沒有聽清楚首長指示的原因，一是當時調度值班室人很多，電話也很多，很嘈雜；二是首長的口音重，聽不太清楚。他們就把你23點35分的電話指示又重復的追記了一遍。”劉秘書又說：“這個報告，是航5師張師長今天上午從錦西師部趕到山海關機場，聽完匯報後整理的，張師長對昨晚的情況也不是很了解。”

劉繼祥說完，我才知道，原來機場值班員沒有聽清楚我的話。如果是這種情況，也不能責怪機場值班員。我讓劉秘書把報告放在辦公桌上，準備再看一遍。

我看到報告中記錄的原文是：“0點06分，李政委來電話，再次強調中央首長指示，四個首長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才放飛，誰的指示要報告李政委。要負責任。”

我看了這段報告原文以後，覺得完全不符合我在通話時講話的意思。我沒有必要在短短半小時內，重復兩遍完全一樣的話，實際上，我這次的電話指示，就是對23點35分電話指示內容的進一步明確和補充。

因此，我將報告中我講的話進行了修改。修改後全文是：“0點06分，李政委來電話，再次強調中央首長指示，四個首長聯合指示才能放飛。如果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不管誰的指示要報告李政委。你們要負責任。”

這樣才基本上符合我的指示精神。

修改之後，當即要劉繼祥秘書用電話同山海關機場再校對一下。經雙方再次校對後，**方块字读书社区**我說：“校對結果同你修改的完全一致。”

劉繼祥秘書將報告謄抄後送我，我又閱讀了一遍，一個字也沒有改動，就在這個文件頭上寫上：“呈總理批示”。

幾天後，總理看完了報告，劃了圈，一字未改，在一次政治局會議後退回給我。看了總理的圈閱，並按照中央領導批閱文件的習慣，我當時就認為，總理是同意這個文件的，而且一字未改。之後，我將這個文件交給劉繼祥秘書存檔保存。

我認為這個文件（指《山海關機場九月十二、十三日情況報告》）是在“九·一三”事件中，反映山海關機場場站情況最真實、最全面、最準確，並經總理在第一時間圈閱同意，一字未改的最權威的文件。我十分清楚的記得，在這個文件中，就如實地記有：第一，總理電話指示的前三條，其中第三點指示中，沒有“四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飛”的話；第二，我第一次（23點35分）向山海關機場傳達周總理指示時曾補充說到的：“四個首長中其中任何一個首長指示均可放飛”；第三，我與山海關場站值班員（0點06分）通電話時強調：“要四個首長聯合指示才能放飛，如果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不管誰的指示要報告李政委。你們要負責任。”這關鍵的三個情況都有如實記載。我當時閱讀這個文件時就意識到自己前後說法不一致，但我沒有做任何修改，因為事實經過就是如此。直到此時，我並沒有意識到“四人聯合指示”與“一人指示”之間，竟存在着天上地下一般的距離。

四、處理山海關機場的善後工作

13日下午，山海關機場報告：從沈陽方向，有一架飛機要在山海關機場降落，是否可以？我立即請示總理。總理回答：“不可以，關閉山海關機場。”我很快把總理指示向山海關機場傳達，令其立即關閉山海關機場，不允許任何飛機起降。

14日下午，又接山海關機場電話報告說：“未來得及上空軍256號專機的剩餘機組人員還有留在山海關機場，他們是：西郊

方块字读书社区

機場調度室李主任、副駕駛員、領航員、通訊報務員、空軍黨委辦公室于秘書和兩位飛機上的女服務員。”又說：“他們現在的要求是，不要送他們回空軍，怕空軍殺人滅口，他們願到海軍接受審查。”

是日晚政治局會議上，我將此情況寫了一張便條交總理。總理看了後，將便條壓在文件夾內。

散會後總理叫我單獨留下，當面對我布置兩條任務：第一、由海軍負責，將未上256號飛機的機組和有關人員接到北京，海軍負責安排住處，要注意安全，要注意保密；第二、海軍負責對他們進行審查，並將材料直接送我（指總理）。

15日上午，我將此任務交給海政保衛部負責，我親自對保衛部長蕭雲交待了如下三點：1、駐地要加強警衛，不能讓任何人自殺，不能讓任何人逃跑，不能讓外面歹徒搶走了；2、要他們寫揭發交待材料，也可以面談，你們派人前往記錄，他們說什麼，你們記錄什麼，他們說多少，你們記錄多少，不准搞逼、供、信；3、伙食標準，每人每天一元（吃了幾天，覺得高了，保衛部提出意見，經我批准，按中灶待遇）。

保衛部門在準備了適當駐地後，告山海關機場，令他們坐火車來北京。

之後的幾天中，凡是他們揭發和交待的材料，海政保衛部都送我處，我都一字未改動，一件未扣留，全部原封送總理閱示。同時，每隔兩三天，總理要我寫成綜合材料，呈送毛主席，我也全部照辦了。

當時，我一直在京西賓館辦公。到了第五天，即9月17日，周總理又宣布：軍委辦事組成員仍回西山辦公。

“上海幫”那幾個人得知林彪機毀人亡的消息，手舞足蹈，興高采烈。有一天政治局開會後，張春橋特地買了瓶茅臺酒與政治局成員碰杯，表示熱烈慶賀。葉劍英看到他們的這種表演說：“沒有什麼值得高興的，沒有什麼值得慶賀的！”文痞姚文元紅着大臉叫囂：“難道這不是好事嗎？”葉帥嚴肅地提高嗓音說：

方块字读书社区

“是好事，也是醜事。共產黨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叛國逃跑，在國內、國外將產生什麼影響？”這幾句落地有聲的話，駁得他們啞口無言，低頭不語。

第八篇

獄中人的心聲

第三十九章 天塌地陷 (之一)

一、特殊的會議

北京的中秋季節，氣候非常溫和，藍天白雲，天空遼闊，秋風送爽。

1971年9月24日早晨，我住西山，照例是6時起床，6時半正在衛生間內，一邊解便，一邊批閱文件，這是我多年的習慣。

忽然，秘書劉繼祥進來告訴我：“中央辦公廳通知，上午9時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政治局會議。”我迅速把緊要的文件批完後，即刷牙洗臉，吃完早點。這時還不到7點半鐘，我就同我的老伴在室外散步。

方块字读书社区

我對老伴說：“過去政治局開會都是下午或晚上，而今天則

是上午9點（上午通常是毛主席和周總理休息的時間），這個會議很特殊，可能凶多吉少。”

老伴說：“林彪叛國後，把我們搞的日夜不安，活人不如死人乾淨。”

我說：“死不得，死了就說不清楚了，自己做的事，自己心裏有數，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東西。”

老伴又說：“現在是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

我說：“千錯萬錯，不該到北京來，不該當政治局委員，否則與老子無關。”

盡管也知道歷史上有“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的說法，但總覺得那是封建帝王搞的一套，與共產黨不沾邊。所以作為行伍出身，也沒有考慮過在全國戰爭勝利後解甲歸田。談了一會兒，時間到了，我就上車進城了。

我在人民大會堂北門下車，一停車就與往常不同，8341部隊兩個幹部等在我的車旁邊，一個從我的保衛員手裏接過公文包，陪我進入大會堂。另一個押着我的保衛員和汽車向東開去（保衛員身上有槍，汽車內也有槍，過去保衛員是隨我一起進入大會堂的）。

我進了大會堂北門，跟着我的那個幹部用力把我推進北門內的衛兵室。我見到兩個人正對先到的劉賢權進行搜身，就大喊一聲：“這是幹什麼？”那裏的人立即高聲回答：“偉大領袖毛主席指示，參加今天會議的人，都要進行檢查。”我心裏很快明白了，這是大禍臨頭的徵兆。兩個軍人正對我搜身的時候，黃永勝也被推進來了。

搜身檢查什麼東西呢？凡是衣服口袋內的香烟、火柴、眼鏡、語錄本、剪指甲小刀、擦汗手帕、衛生紙等等，全部扣下，公文包當然也扣下了。

檢查完畢後，由兩個軍人把我押送到福建廳。我一進到福建廳，見到的是：大廳中央擺着方桌，方桌上放着沙發，并按着黃、吳、李、邱的次序排好了每個人的座位。我們所坐的沙發後面，坐着

兩個軍人。我進去的時候，吳法憲、劉賢權先坐在那裏，讓我緊挨着吳法憲左邊坐下。現在情況完全明白了，不僅是把我們趕進了囚籠，而且是陷入了萬丈深淵，悲劇的命運就此開始了。

人到齊後，周總理、葉劍英、紀登奎、李德生才緩緩進入。

由周總理代表毛主席講話，他說：“林彪叛國事件發生，幾乎要使我們五十年的黨毀于一旦，紀登奎曾說，這是十次路線衝擊最嚴重的一次。”又說：“已經上了黨章的，現在很被動。你們現在不能指揮部隊了，另外安排有地方，你們暫時離開工作幾天，到那裏去好好睡個覺，再交代自己的問題。你們不交代怎麼行呢？林彪還準備了一架飛機，準備把你們帶走，不走就綁架你們。”（事後審查我們的十年中和公審時，沒有任何人和任何文件再提“綁架”兩字，而是黃、吳、李、邱要“南逃廣州，另立中央”）

總理對吳法憲說：“法憲，你們空軍已被人家在下面挖空了。”

對我說：“作鵬，你應很好檢查海軍層層站隊的問題。”

又對邱會作說：“會作，你應當檢查‘兩華’問題。”

總理最後說：“你們的家屬子女，我們會照顧的，絕不會像楊成武對葉副主席子女那樣。關於軍委的工作，以後由劍英主持，他也是政治局委員嘛。黨仍對你們寄予希望，不要辜負毛主席。”

總理講完後，稍停了一會兒，站起身就喊：“黃永勝你先走”。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帶兩個武裝幹部，把黃永勝押走了。

接着總理又喊：“吳法憲你走。”中央警衛團負責人楊德忠帶兩個武裝幹部，把吳法憲押走了。

然後總理又坐下，面對我們，先把眼睛掃視一遍，問了一句：“你們有什麼意見，可以談一談。”

首先劉賢權說：“黃永勝是個惡霸。”並說黃對鐵道兵如何亂指揮、亂決定。

接着我也講了幾句，大意是吳法憲如何巴結林彪，討好葉群。我講完後，紀登奎說：事實。”

談了不到半個小時，總理又喊：“作鵬你走。”我站起來，總

理、葉帥等人和我握了手後，由衛戍區一個副司令員帶兩個武裝幹部，把我押出福建廳，再乘電梯到地下室。在地下室出門處，擺了三輛小車。前面一輛是北京吉普，中間一輛是伏爾加臥車，後面是一輛老式臥車。把我塞進中間小臥車內，左右各一軍人，把我夾着，大概是防止我破門跳車。那位副司令則同司機并肩坐着。全車五個人，人人表情嚴肅，一言不發。

車子出了人大會堂地下室東北門，即向南拐，到天安門廣場南端轉向東，並繼續向通縣方向駛去。這條路線，我比較熟悉，但究竟到哪裏去，一點也不知道。此時生死榮辱已不屬於自己掌握，祇好聽天由命。

在汽車上，我反復回味周總理說的話，思緒中翻騰着一個又一個問號。但是我找不到答案，我無法理解今天這種處理辦法的含義。第一，要我們交代自己的問題，廬山會議問題我們都寫了檢討，毛主席批准了，中央批陳整風會議也通過了，我們還檢討什麼？第二，總理要我檢查海軍層層站隊問題，這個問題海軍黨委曾召開擴大會議進行了批評與自我批評，會議簡報全部呈送毛、林、周，同時這種問題是文革中普遍現象，不是敵我問題。第三，林彪叛逃問題，這是最大問題，我們可能要成為替罪羊，應了老伴的話：“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我當時估計，林彪叛逃，我們要成為替罪羊的可能最大。

距通縣縣城尚有五公里左右，汽車向北折，開進衛戍區部隊一個團的營房內，在營房靠公路不遠的地方，有一座汽車庫，旁邊是一排破舊的平房，汽車就在平房東側停下，並立即把我塞進這排平房內一間很小的房間裏。

那位副司令員對我說：“你就在這裏，有什麼事情找看守工作人員，我走了。”

我當時回答說：“請你轉告周總理：我不會自殺，我不會逃跑，我相信黨，我相信人民，我相信自己。我想我的問題早晚會搞清楚的。”

方块字读书社区

那位副司令員面無表情的點了下頭，就冷冰冰的離開了。

真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9點鐘以前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副總參謀長兼海軍第一政委，轉眼間，就一落千丈，從政治高峰跌入深谷，變成囚中新客，成了斷綫的風箏，失群的孤雁。嗚呼！悲哉！痛哉！“朝為水師首，暮為階下囚！”

二、馬廐裏的隔離人

自古牛驥不同槽，人牛或人馬豈可有共居之說。奴隸封建勢力大家族，在沒有專門監獄設施的情況下，犯了族規或家規的下等人，多半是關在牛棚內，與牛同居，或關在馬廐內與馬共駐。

不知為什麼那樣巧合，現在我被關押的地方，原來確實是一座馬廐，不過現在是有棚沒有馬匹了。在建設營房時，這個步兵團基本上是騾馬化，車輛很少，因此當時修建了這個馬廐。部隊摩托化後，才把騾馬取消，這個馬廐改為戰士家屬來隊探親時的臨時住房。

“文革”初期，這裏曾經關押過沒有定案的“走資派”和“叛徒特務”，經過審查定案後，有的釋放恢復了自由，有的關到正式監獄去了。

我住的這間小囚室，至多不過八至十平方米，安設一張硬板木床，下面鋪着潮濕生了草蟲的稻草，再鋪上一個懾得發臭的褥子，一張床單，另有一床蓋身的棉被。室內還有一張寫字的桌子，一把木椅，一個痰盂，一把暖壺，其他什麼也沒有了。

由於這座平房原是馬廐，所以地基低，我住的那個小囚室有四分之一面積尚汪着一片濁水，小青蛙在裏面歡樂的跳來蹦去。秋天的蚊蟲也特別多，一到晚上就“饑來柳絮輕，飽去櫻桃重”，咬的無法入睡。加上思想上的巨大壓力，常常是通宵“衆人皆睡我獨醒”。一個不大的窗戶也被用稻草堵死了，白天光綫陰暗，陽光、新鮮空氣根本^{方块字读书社区}棚很低，蹣腳伸手就能觸到屋頂，因此像我這樣有嚴重心臟病的人，進去後立即感到胸悶憋

氣，特別不舒服。住到11月份，天氣冷了，增設了一個燒蜂窩煤的火爐。過去在戰爭年代，住過這樣的房子，但進城二十多年來，還想不起住過這樣既小又低，又潮濕，蚊蟲多的房間。

現在這就是我的天地，這就是我的世界。睜着眼看不見外界，豎着耳聽不到聲音，“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日日夜夜，一切活動均憋在這個小天地裏，孤坐如僧，青蛙為伴，不見日月，也不知陰晴。所以當時我的心臟病經常發作，平均每月二三次之多。雖然該團有一位由化驗員提升為醫生的“蒙古大夫”，但他對心臟病的治療完全外行，靠一邊翻書一邊治病。幸虧我自己“久病成醫”，由我向他交待，如果發現我心臟病發作，應採取三條辦法：第一，就地休息，不准隨便搬動；第二，立即向我口內塞進速效硝酸甘油；第三，盡快的上氧氣。這樣，幾次犯病，轉危為安，保住了這條老命。

飲食方面更簡單，按戰士大鍋飯待遇。每天三餐，早餐多半是玉米面粥，加饅頭和咸菜，中午米飯，晚飯面食。據我看，比國家三年自然災害的1959年，我作為“將軍下連當兵”時的伙食，似乎差不多。那時我在舟山群島的一個炮連當兵，副食少，糧食不夠吃，甚至是半乾半稀狀態，戰士祇能吃半飽。現在雖然可以吃飽，但伙食的質量極差。

對我來說還有三個小困難：第一，菜飯是涼的。我駐地在營房南端，團司令部食堂在營房北端，所以把飯菜打回來就沒有熱氣了。特別是在雪花飄飛、朔風肆虐的寒冬，這個困難就由小變大了。第二，年輕力壯的人都愛吃硬飯、硬面、硬菜，這對年近花甲、牙齒不好的我，確是一個小困難。到11月以後，室內安了火爐，才解決了上述兩個問題，我自己在火爐上加工後再吃。第三，這個團的戰士多是湖南、湖北人，既喜歡辣又喜歡咸，不論什麼菜不是太咸，就是太辣。我是江南人，本來也喜歡辣椒，但得了痔瘡後就不敢多吃了。現在祇吃了不長的時間，已舊病復發，脫肛便血。這些雖然是生活小困難，但忍受，時間長久了，就無法壓抑對這種慢性折磨的憤怒，因此就絕食不吃或把飯菜

碗筷推翻落地，借此發泄一下心中的不滿情緒。飲食是維持生命的重要條件，這是迫不得已的表現。

看守人員由該團抽調的排連幹部擔任，一共八人，由團保衛股長負責，此人調走後由其副股長代理。他們的工作是輪班看管，負責到伙房幫我打飯。開始時他們誰也不敢同我說話，問什麼他們都答：“不知道”。輪流坐在我的門口，無事看毛主席語錄，其實是“裝模作樣”。有時我要求到走廊散步，回答說：“爲了你的安全不要出來”。夜間天涼，開門睡覺有風，要求把門關上，回答是：“爲了你的安全不能全關”。爲什麼不能全關呢？因爲關起門來坐在門外看不見室內動靜，怕我自殺。

整整半年之久，看守人員未讓我離開這間又潮又冷又陰暗的小房間半步。以後他們在門板中間挖了一個大洞，由外向內可以監視，才允許把門關起來睡覺。

總的來說，被關押起來以後，物質生活條件是很差很差的，行動限制是很嚴很嚴的，完全與外界隔絕了。長期享受高級幹部比較優厚的生活待遇，猝然下降到囚人的生活待遇，確實是相當不習慣的，沒有一點艱苦奮鬥精神，是不易忍受的。不過也并非苦得活不下去，活不好，至少也死不了。

每當覺得艱苦困難時，我就回憶長征時，爬雪山過草地；回憶抗日時，敵人頻繁掃蕩圍攻，封鎖蠶食和慘酷實行“三光”政策下的游擊戰爭情景。那時連黑豆地瓜都吃不上，在山溝荒嶺露宿是常有的事情。這樣就會覺得目前的困難沒有什麼了不起。一個有骨氣的人，應是在一切逆境中微笑的人。

三、究竟爲什麼

我們究竟犯了什麼樣天大的罪行而被隔離審查？老實說，對我們如此處理完全方塊字讀書社區據說當時毛澤東講過，“九·一三”事件發生後，他等了十天，仍不見黃、吳、李、邱有誰

出來向中央交待問題，因此採取了“九·二四”措施。我相信周恩來是參加了“三巨頭”會議（當時中央常委祇有毛澤東、周恩來、康生三人）決策的。但又期待我們交待什麼問題呢？“九·二四”特殊會議上，周總理講話中，除了對黃永勝應交待什麼沒有指出外，對吳法憲指出：“空軍下面被別人挖空了”，其意當然要吳法憲交待這個問題。對我指出：“要很好檢查海軍層層站隊問題”。其實這個問題過去有海軍黨委會議文件，向中央作了交待，毛澤東還表揚過寫得好。同時這個問題是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一般性的問題，與林彪逃跑，沒有直接關係。對邱會作指出：“交待‘兩華問題’”，此事底細我不了解，聽說是與陳伯達有關的問題，而與林彪逃跑問題也無直接聯系。把我們關起來，難道是上述問題沒有檢討？沒有交待？

公審之後我才大悟，當時毛澤東經過十天考慮後，確定黃、吳、李、邱的隔離審查，是在毫無根據和“寧信其有，不信其無”猜疑心理的共同作用下決定的。理由其一，完全失去了對軍委辦事組的信任（以林立果偽造的林彪“手令”為據），其二，武斷認為黃、吳、李、邱就是林彪“死黨”，必定知道林彪逃跑和林立果暴亂的陰謀，但他們不主動交代（江騰蛟就主動交代了），其三，根據以上判斷，防止發生“軍事政變”。而“九·二四”特殊會議上總理的講話祇不過是扣押我們的借口。

我又聯想起毛澤東自“九·一三”事件後處理的三件事上，或許可以就我們為什麼被關押的問題猜到一點眉目：

第一，要軍委辦事組成員離開西山辦公，各回自己的家去住，名曰以防蘇修突然襲擊，實際上就是把軍委辦事組解散，防止發生“軍事政變”。當時周恩來令黃永勝陪同他住人民大會堂，吳、邱各回空軍、總後自己駐地，我經總理批准住京西賓館。對這個決定，開始我隱隱有些感覺，但回頭再想，反正我與林彪沒有陰謀，根據歷次運動的經驗，大不了中央可能要改組辦事組。可是過了幾天，看沒有什麼動靜，辦事組成員全部回到西山集體辦公，這就使我麻痹起來，以為安然無事了。

第二，停止國慶游行活動。原來規定，當年的國慶仍然同往年一樣，毛主席在天安門檢閱群眾游行和晚上觀看焰火慶祝活動。由于“九·一三”事件發生，毛主席決定取消國慶游行活動，為什麼取消呢？當然是為了防止意外和為了中央的安全。

第三，決定海軍各艦隊就近歸大軍區領導。過去各地空軍是歸就近大軍區領導，而各艦隊是歸軍委海軍總部直接領導，艦隊與就近大軍區是工作指導關係。當時這個突然變化，我已感到是對我政治上的不信任和指揮權的限制，但我對決定仍表示同意和堅決執行。

總而言之，毛澤東採取“九·二四”措施，我認為根本沒有任何根據，既沒有發現黃、吳、李、邱有什麼發動“軍事政變”的徵兆，同時林彪摔死了，所謂“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的企圖也烟消雲散。首都北京跟平常一樣平靜，全國特別是部隊沒有任何異常現象。軍委辦事組已回到西山照常辦公，處理全軍重大問題。但是毛澤東心裏仍不踏實，似乎還潛伏着重大問題未被發現。因此等了十天，仍不見黃、吳、李、邱有誰出來交待報告問題，故採取“關押反省”措施，這反映出毛澤東對當時軍隊領導的高度不信任。

為什麼不在政治局提出責令黃、吳、李、邱“交待問題”呢？為什麼那樣輕率獨斷地不見“交待問題”就決定四個政治局委員的命運呢？

後來我才知道還有一個重要原因。1971年7月的一天，毛澤東突然召見當時正忙于接待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助理基辛格的總參二部熊向暉副部長。熊以為是要匯報基辛格訪華問題，而毛澤東却說“那個不忙”。毛澤東關心的是總參批陳整風小結會上，黃永勝講了什麼，他們講沒講廬山的問題？熊向暉回答：講了。并簡要匯報了會議情況。毛澤東問熊向暉：黃永勝和他的軍委辦事組——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他們在廬山搞鬼，黃永勝講了沒有？熊向暉怔了怔，回答：沒有聽黃總長講過。毛澤東又問看沒看過“五個大將”的檢討、聽過這件事的傳達。大半年來，

熊除了批陳，一致埋頭于國際問題的研究，對毛的問題，回答依然是“沒有”。毛澤東問周恩來：“五個大將”的檢討，你在批陳整風匯報會上的講話，發給總參沒有？周回答，發了，軍委和總參發了六十多份。應該發到熊向暉這一級幹部。毛澤東用手拍了一下茶幾，說：“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臺。”

毛澤東接着說：“實踐證明，他們的檢討是假的，是陰謀，連熊向暉這樣的幹部都不讓知道，這不是陰謀？……黃永勝他們搞陰謀，搞分裂，他們是暗藏的反對派。……黃永勝他們光明正大嗎？完全不是。總而言之，廬山的事，根本沒有完。”¹

這時正是毛澤東秘密策劃批判并決心打倒林彪的輿論準備時期，這也可能是“九·二四”把黃、吳、李、邱“隔離審查”的重要根據之一。

四、生活條件略有改善

為了使中央了解我被隔離後的一般情況，一個半月之後，我向周總理寫了一個報告，全文大意如下：

周總理：

被隔離審查已經快兩個月了，我的問題審查是否有了初步結果？這仍然是我日夜懸心、坐臥不安的大事。我認為盡快地弄清問題，得出適當的結論，不論對我對黨都是有利的。毛主席歷來主張除了不可救藥分子外，允許改正錯誤，允許革命，這對我這樣犯了錯誤的人是深受感動的政策。

國慶節進行很順利，北京沒有發現不正常現象，解放軍是穩定的，海軍部隊也是穩定的，證明我們並沒有搞什麼不軌行為，因此我提出如下要求。

注1. 熊向暉《我的情懷與外交》，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3月第二版。

第一、請求黨中央盡快把問題查清，做出適當的結論。我雖然這樣想過：“不能急躁、安靜等待！”但在這種處境中，想不着急、安靜等待，是不可能的。況且我的身體不好，性情急躁，也許不知哪一天就離開了人間。現在壓力多麼沉重，度日如度年，常常是通夜不眠。因此多麼希望越快越好，弄清自己問題，解除痛苦。

第二、如果目前一時不可能把問題弄清，做出適當結論，那麼我請求中央放寬政策，給我讀書學習方便，給我身體鍛煉和治療方便，給我生活調濟方便。請黨中央放心，我絕對保證：不自殺，不逃跑，不行凶，不搞對黨不利的任何活動。我有決心和勇氣，改正錯誤，繼續革命。

完全沒有想到我的問題那麼嚴重複雜，審查這樣久的時間，仍無結果。但我並不悲觀，自己的問題自己明白，不管有多大的困難，我決心忍受。現在我把我所處情況，向您報告：

1、身體情況不好，心臟病經常發作，幸虧不是大發作，服點藥、吸點氧，安靜休息，就過去了。如果大發作，可能麻煩。這裏有一位軍醫，是由化驗員提拔起來的，醫術不高，工作不認真，藥物又缺少，對心血管病臨時翻書應付，我對他信心不高。

2、我住的一間小平房，不足十平方米，是過去的馬廄改成的，很潮濕，有積水，青蛙在水裏跳來跳去，蚊子很多，睡的草墊子有草蟲。又因房子很低很小，窗戶又堵死，總覺得空氣不夠，心悶氣短，不能到室外呼吸新鮮空氣，沒有見過太陽，現在大地是什麼樣子，知道了。

3、這裏伙食是戰士灶大食堂，此部隊多南方青年軍人，米飯太硬，菜太辣太咸，吃不習慣。特別是我住在營房南，食堂在營房北，現在天氣冷了，打回來的飯菜是冷的。再是菜飯的花樣變化不多，也不易適應。因為伙食不好，我也發過脾氣，倒了不吃。我的體重下降不少，大腹便便不存在了，這對我來說也許是好現象。我有爬雪山過草地的思想準備。

4、每晚有八個小時睡覺時間，至少有三分之二時間不能入

睡，有時通宵不眠。因此夜晚比白天更難過。軍醫怕我服安眠藥自殺，所以給的安眠藥很少，也可能不是安眠藥，吃了同沒有吃差不多。

5、這裏有由排連幹部組成的看守班，他們把我當成敵人管制，一切行動均受限制，隔離室同監獄牢房一樣，具體問題我不想說了，人倒霉了活該！當官和囚徒自有天堂和地獄之別！

以上種種情況，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我盼望盡快結束這種狀況。我請求改善現在的生活條件，放寬人身限制。能多活幾天，看到自己問題的解決，那就謝天謝地！

李作鵬

1971年11月11日

1972年春開始，我的境況有了若干變化。

第一、整修房子。首先擴大了房間的面積，把我住的這間和旁邊的一間房子中間的隔牆拆掉，兩間變成一間較大的房間，面積擴大一倍，約有十六平方米。同時用磚加高地基，再鋪上一層水泥，使地面乾燥、整潔了不少。並沿牆壁一周增修暖炕，保證冬天不冷。室內兩個窗戶，由我自己掌握打開或關閉。

第二、改善伙食。在我住的那棟平房內，撥出一間作小伙房，裏面壘灶及購置炊事用具，在看守人中指定國軍需股副股長管伙食（司務長出身）。小灶伙食標準，除在食堂一份戰士口糧及油鹽粗菜外，每天增加六角錢由臨時炊事員掌握，購買稍好的細菜。那時通縣豬肉八角一斤，活魚五角一斤，由大灶改小灶，想吃點什麼就作點什麼，這樣我的伙食就稍有改善。

後來我聽說，毛主席曾有指示：黃、吳、李、邱應該吃好，有資格吃好，也有條件吃好。尊敬的毛主席，你在政治上毀滅我，你在生活上沒有忘記“有資格吃好”。我雖然沒有參加南昌暴動，也沒有參加秋收暴動，但我參加了贛中農暴，打土豪分田地，參加了紅軍粉碎敵人各次圍剿，**方块字读书社区**長征，參加了打敗日本軍國主義，參加了消滅蔣介石八百萬軍隊，參加了社會主義建

設，因此“有資格吃好”，我問心無愧。

第三、可以自由在庭院內散步。什麼時候到庭院散步都可以，願意多少時間就多少時間，不加限制。以後還允許我在庭院內栽花種菜，養雞養兔。他們給我種子、工具、肥料和水源的方便。這樣我可以勞動，可以消愁解悶，覺得日子過得愉快一些。

第四、照顧特殊嗜好。我長期有吸煙、飲茶的習慣，每月可以供給高級煙、茶。我本來喜歡烈性白酒，但進入囚室後，不能經常供給酒喝，過年過節或星期天，喝二兩也是可以的。水果也大體上經常保持，質量差一點，勉強對付。

第五、可以自由看書寫字。經周總理批准，看守人員到我家取來各種書籍百餘部，文房四寶俱全，想看書就看書，想寫字就寫字，不加任何限制。如果書不夠，他們可到通縣圖書館借。由於這個條件保障，我看了一些書，多少有點收穫。消磨時光的消遣作用更大。

第六、治療有了保證。經周總理批准，保持原來在北京醫院和解放軍總醫院的醫療關係。由兩個醫院組織聯合治療小組，曾到我駐地對我進行身體全面檢查。並規定心臟病發作，祇要他們接到報告，即可前來搶救。凡所需的藥品，到北京醫院或解放軍總醫院領取。

1973年初秋，可能是因為中央處理我們黨籍問題的文件傳達到了基層，（1973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批准了中央專案組《關於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罪行審查報告》，開除林彪、陳伯達、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雪峰等八人的黨籍。）我的處境突然發生了變化。小廚房停伙了，仍然到食堂打飯吃。原來給我的蚊帳、涼席、電扇等一律撤銷。庭院的圍牆加高加厚，看守人員增加衝鋒槍，如同面臨大敵。兩個多月之後，也不知為什麼又變了，小廚房重新開伙，看守人員態度也轉好，又為我從市場購買新的蚊帳、涼席，總之又恢復了原來的待遇。由於我對外界情況一無所知，**方块字读书社区**復復的做法搞的我莫名其妙，也不便打聽，祇好一切任人擺布。

由于上述情况的改善，比較開始時，我的心情要好一些。雖然過着特殊的囚犯生活，但是政治問題遲遲未作結論（其實已作結論，祇是未向我傳達），精神上的壓力和痛苦并未減輕。

“九·二四”（被關時間）後，我始終認為，不管中央如何隔離審查，我的問題毫無理由構成敵我矛盾。

五、學習與鍛煉

在被關押不久，我就寫信給周總理，表示要認真讀書，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及學習一點歷史知識，並且想看一點文學方面的東西。因此要求將我家中的存書給我一些，總理批准了我的要求，凡我所要的書籍都給我送來了。這不僅給我提高理論知識水平提供了方便條件，同時給我消愁解悶也提供了方便條件，讀書已成了我囚中生活的主要内容。

我在1972年到1976年共五年的時間內，毛著五卷（第五卷送審本也送來了）及中央規定高級幹部必讀的馬列主義三十本書，每本至少通讀了一遍，例如：《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自然辯證法》、《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等馬列著作。甚至連普列漢諾夫的《論一元化歷史觀之發展》及《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等書也通讀了。

若問讀懂了沒有？收獲如何？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但“開卷有益”，讀比不讀好，多讀一遍比少讀一遍好。毛主席說共產黨宣言他看了有一百遍以上，還沒有完全讀懂。按照我的政治水平、知識程度、理解能力，對任何一部馬列著作，通讀一遍就說讀懂了，那是吹牛。讀一讀，想一想，品品其中滋味。覺得有味，就可能稍微懂一點，滋味愈濃，可能懂得更深一點。不覺得有味，甚至越看越昏昏欲睡，則等于白讀。我讀書的習慣是不求快，而求品味。看不懂，品不出滋味的書或段落，乾脆掩卷不看。

方块字读书社区

待看了其他的書或段落，也許能觸類旁通，頓開茅塞，再看就可能看懂了。年已花甲，過時又忘，不知說的是什麼，是常有之事。

在以學馬列主義、毛主席著作爲主的情況下，我還讀了若干歷史書籍。例如：中國通史、世界通史、聯共（布）黨史、史記、漢書等等。還讀了一點古典文學：《紅樓夢》、《三國演義》、唐詩、宋詞及近代小說，也涉獵了一些外國文藝小說。大體上每天讀書約四個小時。其他時間是休息，看報紙和參考消息。有時寫寫毛筆字來消磨時光、調劑生活。“幸有書本來相伴，我在書中尋歡樂”這句話，可成爲當時我讀書心情的概括。

由于我的心臟病已有多年病史，不時發作。除此之外我身體並不壞。一方面隨時準備心臟病發作，搶救無效離開人間。另一方面加強身體鍛煉，爭取延長壽命，爭取看到自己問題有公正結論，則死也瞑目。爲了隨時準備因心臟病突然死亡，我不但寫有遺書交代子女，並寫了一首自言自語的《憑吊子虛詩》。現抄錄于後：

嗚乎子虛！久病殞亡。生死永訣，舊誼懷傷。
思今撫昔，源遠流長。悲痛哀歌，汨雨橫淌。
吊君贛江，青少好強。耕讀漁樵，玩刀弄棒。
農暴蜂起，揮戈離鄉。北上迎敵，兵臨南昌。
吊君壯力，鵬飛萬里。東征西討，槍林彈雨。
五次“圍剿”，四次勝利。雪山草地，從未垂翼。
吊君抗戰，波瀾壯觀。縱橫華北，驅寇反頑。
游擊齊魯，還我河山。八載硝煙，兩創半殘。
吊君東北，卧冰爬雪。三下江南，輾轉連捷。
反攻會戰，更未遜色。鷄鳴天曉，入關華北。
吊君南下，鞭加快馬。鄂贛曙光，粵桂彩霞。
大江橫渡，瓊海直跨。掃平中南，直搗天涯。
吊君興學，利刀重磨。英雄雲集，拜師蘇俄。
日夜辛苦，白髮幾多。不辭勞苦，桃李遠播。
吊君北京，背負千斤。埋葬教條，驚雷夢醒。

東南海防，飛舟騰鷹。殲敵竄犯，美臺心驚。
吊君文革，披星戴月。三支兩軍，嶺南塞北。
匡山妖風，天昏地黑。路綫錯誤，身敗名裂。
吊君禁錮，愁雲慘霧。是非黑白，心中有數。
任憑千鈞，等閑萬苦。鮮血可流，人格拒辱。
哭君永逝，往事重思。飛禍橫災，池魚失制。
哀君情切，愁腸百結。神州安定，堪慰誤解。
歷史教訓，牢記深刻。嗚呼痛哉，泣歌長絕。

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這是我的人生觀。幾十年的鬥爭歷史，成千成萬、成萬成千的人，為革命犧牲了。我也是從戰場上，死人堆裏爬出來的幸存者。“一將功成萬骨枯”，一點也不誇大。1947年在東北戰場夏季攻勢中的四平之戰，我1縱部隊在戰場上傷亡一萬三千多人，其中犧牲五千多人。1948年遼沈之戰，為堵擊廖耀湘兵團向沈陽撤退，我6縱16師有九個連隊幾乎完全打光了，每連祇剩下幾個未上戰場的炊事員。類似苦戰、血戰我還可以舉例若干。我已經看到了新中國，我已經看到了社會主義，我已經活六十多歲了，我可以死了，我可以瞑目了。為革命而死，為黨為人民利益而死，在所不惜，視死如歸。

隨時準備死亡是次要的，絕望是人生最大的悲哀，更重要的是爭取多活幾年，看個究竟，看個明白，然後再死亦甘心。因此我特別注意加強鍛煉，“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在又小又低的囚室裏活動不開，就原地跑步，原地做體操，原地打太極拳。後來限制放寬，可以到室外活動時，那就更方便了。加上栽花種菜勞動，這樣我的身體狀況才沒有更快惡化。否則我的身體早垮了，早完蛋了。生活就是戰鬥，有人想摧殘我的身體，我就鍛煉自己的身體。有人希望我的生命及早毀滅，我就偏偏爭取多活幾年。有人不准我見陽光和呼吸新鮮空氣，我就千方百計打破這個限制。

方块字读书社区

既不怕死，又隨時隨地爭取多活幾年，這是我當時的人生哲

學。病魔就像蛀蟲一樣無情地把身體蛀空，使身體愈來愈虛弱。對病魔要同戰場上的敵人一樣，你軟弱它就強硬，你強硬它就軟弱，你退却它就進攻，你進攻它就退却。但要實事求是，蠻幹也是不行的。

第四十章 天塌地陷 (之二)

一、多次上書

被關押起來，蹲在又小又低的囚室內，眼前一片天昏地暗。思想像海潮一樣，一波接一波，一浪接一浪的翻騰，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有生以來，從未遭此痛苦，從未這樣煩惱，從未這樣坐臥不安。叫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問水水流淚，問山山傷心。怎麼辦？究竟怎麼辦？

“自古英雄多磨難，能伸能屈大丈夫”。對！越是艱難越要以英雄為榜樣，在磨難中作個大丈夫。既不能坐而待斃，也不能卧而待死，更不能跪下求饒。要站立起來奮鬥，要活得光明磊落，要死的清楚明白。因此決心首先清理自己的思想，其次是與林彪“劃清界綫”，再次是看書學習，提高政治理論水平。

為了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我向毛主席、黨中央寫的報告不少。現在根據我保存的不完全材料和回憶記錄如下：

第一次上書。

於1971年9月26日，向毛主席、中共中央呈送。

主要內容是，擁護中共中央清查問題，對我進行隔離審查。我相信經過審查之後，黨會做出正確的結論。我相信自己是

經得起審查的。

由于我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時，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在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錯誤，在這種情況下，黨對我懷疑和審查是應該的。爲了黨的利益，爲了革命的利益，爲了人民的利益，我應該接受黨的審查，並協助黨把我的問題弄清楚。

關於林彪潛逃事件，我完全可以向黨中央、毛主席保證，我與之沒有任何聯繫，也沒有任何察覺，如果黨審查後，發現我參與了這個反革命陰謀活動，或任何知情不報，我願意接受黨紀國法最嚴厲的制裁。

1、1971年8月上半月我在青島，下半月接待朝鮮軍事代表團，並兩次陪同其外出訪問。在武漢訪問時，劉豐告訴我一些毛主席接見河南、湖北、湖南負責同志時的重要講話精神。9月7日在北京，我把所知道的毛主席講話精神告訴了黃永勝，並特別指出我講的不一定完整準確，請不要告訴葉群，也不要告訴吳法憲。當時吳法憲看到我同黃永勝談什麼，他也想了解其內容，我一句也沒有告訴他。在出發去朝鮮使館赴宴時，邱會作坐到我的車上打聽消息，我把毛主席講話精神告訴了他。以後我在海軍黨委常委會議上也傳達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則：要團結，不要分裂；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2、廬山會議以後，我對林彪在思想上保持一定距離，在今年除了4月初遵照毛主席指示，同周總理和軍委辦事組其他成員一起，到北戴河見到林彪之外，我個人沒有去見過他，他也沒有找過我。至于同葉群有過幾次電話接觸，但沒有談什麼重要政治問題。

3、林彪叛國事件的發生，主要是由于其堅持錯誤路線的結果，特別是強調設國家主席，並由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究竟是善意或其他原因，我不敢斷定。自毛主席提出不擔任國家主席後，我從未強調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因爲我估計剛把國家主席劉少奇打倒了，自己擔任國家主席，政治上要受到損失。這一點難道林彪不知道？我心想可能是由于九大政治報告初稿中

方块字读书社区

強調恢復生產和加強備戰，被毛主席否定了，引起陳伯達、林彪不滿而採取了爲難、燒烤毛主席的做法。無奈多次建議毛主席不接受，並批評林彪是搶班奪權，突然襲擊。最後林彪祇能叛國潛逃，自取滅亡！

第二次上書。

於1971年9月29日，向毛主席、中共中央呈送。

主要內容是根據周總理指示，檢查海軍部隊層層站隊問題，摘要如下：

在1966年夏天，海軍召開三屆三次黨委擴大會議，議題是批判羅瑞卿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但在會議進行過程中，把批判羅瑞卿的會議內容變成批鬥李、王、張。此時海軍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起來了，由於受黨委擴大會議的影響，群眾造反的矛頭，是對着李、王、張。林彪知道後，有針對性的給予李、王、張以高度評價，李、王、張成爲海軍左派的代表。

1967年1月，軍委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把蘇振華交群眾批鬥，蘇振華成爲海軍右派的代表。由於開展文革以來，各級領導班子和群眾組織中，都有擁護李、王、張的，也有支持蘇振華的，因此出現凡支持李、王、張的就是正確的，就是革命左派。凡是保蘇振華的，就是錯誤的，就是保皇派的現象。按照這個公式往下套，各級都有革命左派和保皇派，各級都有兩條路線鬥爭，這就是層層站隊的問題。以人劃綫，互相對立，互相爭吵，影響部隊團結。我作爲海軍主要領導，負有重大責任。

經過毛主席、黨中央的批評，我們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我們在71年6月的海軍四屆四次會議上，着重檢討和解決這個問題，我在會議上做了檢查，海軍黨委做了決議，堅決貫徹毛主席的指示，徹底解決海軍層層站隊問題，搞好海軍部隊團結。

第三次上書。

於1971年10月19日，呈送毛主席、中共中央。

主要是對林彪叛國叛黨的初步看法。摘要如下：

1、林彪是一個什麼樣的黃色？

方块字读书社区

林彪是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叛徒，是社會主義時期人民公敵，是修正主義份子。

2、林彪是怎樣墮落到反黨、反毛主席，野心搶班奪權的反革命罪惡道路？

林彪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民主革命運動中，其主流是進步的、革命的，為黨為國是做了有益的工作，是有重大的貢獻的。特別是打仗有戰功，軍事工作有軍功。但在社會主義革命不斷深入的鬥爭中，就逐漸動搖了，不再繼續革命了，資產階級思想、個人主義逐漸膨脹起來了。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確定他是毛主席的接班人，這樣他就開始有了野心，不是兢兢業業為革命事業接班，而是為了個人主義搶班奪權。

3、林彪為什麼叛國外逃投奔蘇修？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修正主義分子一定要跑到修正主義那裏去同流合污。林彪對蘇聯有好感，是列寧故鄉并且是兩個超級大國之一，有強大的軍事政治力量。

4、不能低估林彪在軍內外、黨內外、國內外的影響和欺騙作用，但也不能過高估計。

他的影響和欺騙作用，不僅超過高、饒，超過彭、黃，甚至可能超過劉、鄧。他不僅在四野部隊中有較大影響，自他主持軍委工作後，在全軍中的影響也是不小的。但是林彪的叛黨叛國行動，自己替自己作了政治崩潰、政治死亡的結論，自我爆炸，自我毀滅，自己埋葬了自己，一切欺騙的影響不攻自破。……

第四次上書。

于1972年1月26日，呈送毛主席、中共中央。

主要內容是：我所犯錯誤現在已經認識到有三條：1、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犯了政治方向路線錯誤，及組織上宗派主義錯誤。2、對林彪有迷信崇拜，錯誤地進行過歌功頌德的吹捧，起了自欺欺人的作用。3、在文化大革命實際工作中，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缺點錯誤，例如海軍屬屬站隊問題，及推行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

方块字读书社区

但對下列幾個重大問題，向毛主席黨中央表明我的看法：

1，九屆二中全會上，我支持了林彪的錯誤路線，但我不知道、也沒有參加其叛國的罪惡活動。因此他墮落分裂，應同張國燾一樣，由他自己負責及參與其陰謀活動的人負責。

2，關於空軍“小艦隊”陰謀暴亂的反革命分子，口供中涉及對我的誣陷問題（如參加南逃，另立中央之類的誣陷），他們的陰謀是徒勞的，我根本不知道。

3，71年4月，中央批陳整風會議上所做的“路線錯誤和宗派主義錯誤”的結論問題，我對那個結論已表示擁護。但是可能因林彪叛國事件發生而有所改變，我看可能升級，但不能無限上綱，強加罪名。

4，關於我的缺點錯誤，我認為構不成敵我矛盾，有的是思想認識錯誤，有的是執行中央政策的錯誤。

第五次上書。

1973年9月6日，呈送毛主席、黨中央。

主要內容是擁護黨的“十大”精神，並請求保留我的黨籍，給我改正錯誤的機會。“十大”文件中指出的黨內十次路線鬥爭，及一個傾向掩蓋另一個傾向等問題，我表示同意。

第六次上書。

1975年1月25日，呈送毛主席、黨中央。

主要內容是慶祝四屆人大勝利閉幕。完全擁護憲法，擁護政府工作報告。我特別強調了兩點：

第一、關於不設國家主席問題，這是全黨、全國同林彪鬥爭中的重大原則問題，不知為什麼在修改憲法報告中，沒有詳加闡述。不設國家主席究竟有什麼優越性？設國家主席究竟有什麼壞處？我至今認識仍是模糊的。

第二、關於兩個超級大國爭奪重點問題，我同意爭奪重點是在歐洲的看法。但我們要有隨時應付突然襲擊的準備。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指示是英明的。

第七次上書。

于1976年10月25日，呈送華主席、黨中央。

主要内容是擁護華主席，擁護粉碎“四人幫”。黨中央對“四人幫”反黨集團，採取英明果斷、高屋建瓴的措施，粉碎了他們陰謀篡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野心，消除了黨內一個大隱患，拔除了黨內一顆定時炸彈，確實是振奮人心的。

“四人幫”反黨集團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利用他們的權力，稱王稱霸，為所欲為，不知幹了多少壞事。他們是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進行武鬥的罪魁禍首，是亂黨亂政亂軍的罪魁禍首，是破壞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罪魁禍首。

.....

我先後多次向毛澤東、黨中央呈送報告。但毛澤東、黨中央是否看到了？究竟有什麼表示，我半點也不知道，好像泥牛入海，連響聲也未聽到，浪花也未看到。當前我最苦悶的是不知為什麼審查這樣久，仍無結果。

從第四次上書之後，我開始作最壞的準備，拋棄一切幻想，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迎接天翻地覆，迎接折磨到死，迎接殺頭槍斃，不死在國民黨、日本帝國主義的刀槍下，死在共產黨的刀槍之下，是非功過讓後人評說吧。

今天看來，當時的想法太簡單、太天真了！處于對毛澤東的無限信任和對自己無敵我問題過錯的自信，最初抱有幻想，幻想與林彪“劃清界線”，給林彪扣上幾頂“帽子”（這幾頂“帽子”是從報紙上批判林彪的文章中抄下來的），給自己也扣上幾頂“帽子”，就可以盡快解決我的問題。

在七次上書中，前四次是在我被隔離審查開始的半年內寫的，在當時特定的環境與條件下，我寫的內容觀點，不能沒有錯誤，違心的話不少，不敢說的話也不少，特別對林彪的“批判”，違心的話更不少。在那種高壓形勢下，不能不這樣做。“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但我在今天所寫的**方块字读书社区**，基本上保持歷史真實。

二、與中央專案組的交鋒

隔離後半年多的時間內，很少見到中央專案組的活動，也沒有與中央任何負責人有什麼直接的接觸。因此這段時間內，我有什麼想法，有什麼意見，唯一辦法祇有向毛主席、黨中央寫信，寫報告，可是得不到任何回音，聽不到任何指示，因此心情苦悶。

從1972年3月到1973年2月，整整一年中，中央專案組七次與我談話，逼迫我交代問題，與中央專案組的交鋒從此開始。

1972年3月12日，春光明媚，大地復蘇。看守負責人通知我，下午有中央首長找我談話。我聞此消息非常高興，暗自猜測，也許我的問題經過半年審查，已有初步結論。特地換了一套乾乾淨淨的衣服，擦亮軍帽上的五角星紅帽徽，擺正軍裝衣領上的兩面紅旗，穿戴整整齐齊。

下午1點鐘，我與幾個看守人員、軍醫等，分乘兩輛北京牌吉普車，半年來第一次出了營門，沿津京公路向北京駛去。看到沿途景色，樣樣新鮮，心裏甚為歡喜。

汽車進到北京德勝門突然向北，沿着北京昌平公路開去。這立即引起我的懷疑。不對！不能高興的太早，凶多吉少！思想上又翻騰起來，進行種種猜測。

到了清河鎮，汽車向西北走了一段，進入空軍一個學院的營房，開到該院招待所附近停車，把我帶進一個設備相當高級的套間內休息。看守人員告訴我，這是林立果在這個學校安設的一個黑據點，過去他常來這套房間休息和進行陰謀活動。

稍事休息之後，把我帶到二樓一個高級會議室內，裏面坐有公安部長李震，中央組織部長郭玉峰，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公安部副部長于桑。另外還有幾個不知名的工作人員。他們指定一個沙發位置要我坐。方塊字读书社区就是李震。

先由李震講話，宣布他們是“中央專案組”。

李震說：“時間過得真快，轉眼就是半年了，今天第一次對你審訊。”

我一聽“審訊”，就大失所望，心裏有氣，回答他們說：“你們時間過得快，我是度日如年。”

有人插話說：“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說：“意思不是明明白白，還用解釋嗎？”

這一下子就把審訊空氣弄得緊張起來了。

之後，李震及郭玉峰、吳忠、于桑等人提了一系列問題：有關於毛主席在武漢談話泄密問題；有關於林彪寫的《重上井岡山》的詩詞問題；有關於“九大”時你們搞了什麼陰謀，為什麼不投江青票的問題；有關於廬山會議後，在九江飛機場送行林彪去蘇州時，你們搞了什麼陰謀的問題；有關於華北會議你們搞了什麼陰謀，等等。

我很冷靜地將我所知的情况，一一作了回答。

關於毛主席在武漢接見各省負責人談話失密問題，我將前前後後的情况回答後，李震說：“問題的實質是，劉豐通過你、你通過黃永勝向林彪秘密通報情報。”

我說：“我一直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毛主席在南巡時與那麼多地方和軍隊的同志談話，他在各地的講話內容，不祇是劉豐一人告訴我，其他人也與我談過，在京的政治局同志提前一點知道毛主席的講話，是失密問題嗎？至于通過黃永勝向林彪‘秘密通報情報’問題更是談不上，如果我要向林彪通報情報，我辦公室設有各種保密電話機，完全可以直接向北戴河林彪通電話。”

中央專案組的人無言相對。

關於為林彪《重上井岡山》詩譜曲的問題。我答：事情經過很簡單，1970年初，林彪從井岡山回北京不久，葉群就把這首詞裝裱好了，送給我留念。我當時祇覺得詩意不錯，沒有看出其他問題。以後不知怎樣擴散，**方块字读书社区**譜成歌。他們拿此歌錄音帶放給我聽。我聽了之後，講了兩點：第一，歌調不那麼好

聽；第二，此詞沒有對外發表，不能擴散。

李震說：“此詞是林彪對毛主席1930年批評他的翻案。”中央專案組其他人指責我是有計劃、有目的地把這首詞譜成歌曲，進行廣泛宣傳，幫助林彪翻案。

我當然不能承認，說：“你們有什麼根據說林彪寫此詞是要翻案？有什麼根據說譜成歌曲是幫助翻案？純粹是主觀猜想，強加人罪。”

關於“九大”選舉，為什麼不投江青票的問題。我回答的很乾脆：“是有此事，我沒有投她的票。”

中央專案組的人又開始指責我：“不投江青票是原則錯誤！”對此，我堅決反駁說：“黨章上並未規定必須投什麼人的票，不准不投什麼人的票。我承認我沒有投江青的票，我想請問，這是什麼原則錯誤？你們又在無限上綱。”對我的反駁，中央專案組的人再次無言相對。

關於在九江飛機場給林彪送行問題。中央專案組的人問：“廬山二中全會後，林彪下山，準備飛往蘇州。黃、吳、李、邱到飛機場送行，登上林彪飛機，你們搞了什麼陰謀？”

我回答：“在飛機上，既沒有談什麼政治問題，也沒有談什麼工作問題，坐了一會兒，照了一張像片，就離開了。什麼‘陰謀’、‘陽謀’也沒有。”

關於華北會議問題。中央專案組的人問：“你們在華北會議搞了什麼陰謀？”

我答：“我認為在華北會議搞的都是‘陽謀’，沒有搞什麼陰謀。”

我又說：“華北會議是毛主席、黨中央直接領導下召開的。紀登奎、李德生、黃永勝和我是在毛主席、黨中央指示下做具體工作的。會議期間曾兩次向毛主席當面匯報，聽取指示。我認為華北會議開的是正常的。我不知道你們所指的是什麼陰謀問題。”

1980年公審後我**方块字读书社区**議確實有問題，確實是很不正常。問題就在華北會議是在極左路線指導下進行的亂批亂鬥，

無情打擊，無限上綱。不正常就是表現在又將批鬥矛頭指向一批黨政軍領導幹部，批鬥重點是李雪峰、鄭維山、解學恭、劉子厚等人，並在行動上限制他們的自由，最後把他們撤職，隔離審查。會議如果沒有“陰謀”，為什麼以後又給李雪峰等人平反呢？但陰謀的制造者不是我們。

這次中央專案組對我審訊，是隔離審查後的第一次接觸，審訊過程中我與他們多次發生針鋒相對的爭吵。

李震、郭玉峰等人指着我說：“你李作鵬至今仍在死保林彪，仍在抱着林彪僵尸不放！仍在頑固對抗，不交代問題！”又說：“你們反對文化大革命，不要以為你們的陰謀做的天衣無縫”等等。

我說：“今天，你們除了無限上綱，亂戴又大又臭的帽子之外，有什麼具體材料？有什麼真憑實據？你們一件證據也拿不出來，這也陰謀，那也陰謀，又是反黨，又是反對文化大革命，還有什麼天衣無縫，你們為什麼不把縫揭開一點給我看看。我倒想知道我搞了什麼陰謀！”

我大聲地對李震、郭玉峰說：“我懷疑你們無中生有，搞逼、供、信！”

審訊了兩個多小時才結束。把我帶回到原來休息室吃晚飯。學院為他們準備了宴席，我也沾了一點光，給了我一小盤清炖鷄，一小盤紅燒肉。可惜我一肚子火氣未消，吃得很少，食不覺味，也就算了。

然後乘車返回通縣。晚上睡不着覺，大失所望。但并不悲觀，我下定決心，丟掉幻想，準備持久戰，準備應付更殘酷的折磨。

3月18日，中央專案組來了幾個一般工作人員，在我駐地臨時設立的審訊室內找我談話。

首先他們詢問了一下我的生活情況和身體情況，并表示生活上需要什麼提出來可以解決。方塊字讀書社區品問題也可以解決，過去給你看病的大夫，可以隨時來給你治病。之後，他們又說12

日你對中央專案組負責同志的談話，態度是很不好的，以後應很好注意。

我明確回答他們：“我的態度祇能是那樣，你們所說的，這也是‘陰謀活動’，那也是‘陰謀活動’，這也是‘反對文化大革命’，那也是‘反黨反革命’，還有什麼‘死保林彪不願交代’，什麼‘不要以為你們所作所為是天衣無縫’等等。難道這是實事求是嗎？你們有本事就拿出證據來，否則就是逼、供、信。”

這幾個工作人員不承認這是“逼、供、信”，但又說不出什麼理由，談的時間不長就走了。

我知道，這次談話，他們是硬的一手不行，想來軟的一手。但他們又打錯了算盤，我祇承認真理，我祇相信實事求是，其他我是軟硬不吃！

經過兩次交鋒，彼此雙方都有了一些了解。我心裏也有了底。

1972年3月21日，中央專案組三個一般工作人員，來到我的駐地同我談話。他們這次態度比較好，我的態度也比較冷靜。主要談廬山九屆三中全會期間的問題，採取一問一答的方式。

問：“憲法小組爭論的真實情況是怎樣？”

答：“我參加憲法修改小組多次會議，沒有發現重大原則爭論。70年8月15日中午，我在徐州接到黃永勝的電話，意思是，憲法修改小組發生很大爭論，要我立即回北京。我回北京後，是黃永勝把憲法修改小組的爭論情況告訴我。”

問：“你對廬山會議林彪在開幕式上的講話怎麼認識？”

答：“開始我們是準備在廬山開神仙會議，一邊開會一邊度暑。林彪在開幕式上的講話，使我們感到鼓舞。開幕式結束之後，葉群對我們說：‘林彪講話內容報告了毛主席，得到毛主席同意才講的’。這樣我們心裏就更加高興。”

問：“林彪的講話是政變的動員令，你是怎樣看法？”

答：“林彪講話完畢，令關林到放掌。我沒有聽出，也沒有察覺林彪講話是什麼政變動員令。”

方块字读书社区

問：“林彪講話之後，你們搞了什麼陰謀活動？”

答：“我認為作為黨員在黨的會議上發表和交流個人看法是正常的，合法的，我不認為這是陰謀活動。”

問：“你8月24、25日在中南小組發言的內容是什麼？”

答：“24日下午的發言是表態性的，我擁護林彪開幕式上的講話，並說林副主席一貫宣傳毛主席思想，是有偉大功績的。我還說‘毛主席是天才’我認為完全正確。”“25日我發言的時間很短，不超過十分鐘。是按照‘降溫’的精神講的。主要還是擁護林彪的講話，我說了在我們黨內有股風，是什麼風呢？是反毛主席的風，反林副主席的風，這股風不能往下吹。在別人發言時，我還插了一句話說，有人連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締造和領導，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提法也反對，說不符合歷史。這個問題政治局在北京開會時就發生過爭論，周總理請示毛主席，毛主席的批示是‘仍按原來提法不變’。我是以此為根據的，我認為我的兩次發言沒有原則性錯誤。”

問：“二中全會休會期間，你們還搞了哪些陰謀活動？”

答：“8月26日，陳伯達找吳、李、邱到他的駐地談話。大意是，毛主席批評他參加了“軍事俱樂部”，康生批評他‘把林彪綁在自己戰車上’。8月28日，林彪根據毛主席指示，召集了陳、吳、李、邱及汪東興，在他駐地談話。林彪自己檢查了幾句，說毛主席批評他，對張春橋為什麼不可以再看二年，批評是對的。林彪批評陳伯達舊文人、舊知識分子習氣太重，然後着重講解放軍要同地方搞好關係，要謙虛謹慎，防止驕傲，老幹部要團結新幹部等等。”

“之後，政治局決定，陳伯達、吳法憲、汪東興三人要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進行檢討。吳法憲的檢討是邱會作起草的，我作了修改。我現在還沒有認識到林彪、陳伯達找我們談話是什麼陰謀活動，可能我參與修改吳法憲的檢討有些不妥。”

問：“你還有什麼問題”

答：“我想一想，以後再說吧。”

方块字读书社区

半年後的1972年9月7日，又用汽車把我拉到空軍學院第一次審訊的地方。中央專案組的李震、郭玉峰、吳忠、于桑等大官全體出馬。看着他們耀武揚威的樣子，我知道來者不善，暗暗做好了堅決鬥爭的準備。

這次仍是談九屆二中全會問題。

一上來，李震板着臉，眼皮都不抬的問我：“廬山會議你搞了哪些陰謀活動？”

我面對李震說：“廬山會議，我們兩人是在一個組的，你的發言我聽到了，我的發言你也聽到了。”我反問李震：“咱們兩人的發言有什麼不同嗎？你的發言不是很精彩嗎？”此問一出，李震頓時臉色大變，白一陣，紅一陣，欲怒又止。其實李震在廬山會議的發言比我的發言還要激烈尖銳。25日的小組會上，他與別人搶話筒，爭着先發言，在發言中，他不僅堅決擁護林彪的講話，而且堅決擁護第六號簡報，堅決支持陳伯達、汪東興的發言，堅決要把“劉少奇反動路線的代理人揪出來示衆”。他是中南組積極參加起哄者之一。

李震原想給我來通“殺威棒”，結果，我先給他來了個下馬威。

他們出示了8月24日晚，我看了中南組簡報草稿後，給葉群寫的那張便條。追問我：“寫這個便條的動機是什麼？”

我向他們說了三條：“第一‘比較抽象’，其意思是同意簡報這樣一般性的寫法。‘沒有更多實質性問題’，當然是指小組發言中沒有提到具體人和具體事的問題，這符合毛主席‘可以講，但不要點名’的精神。第二‘擬可以發，請她再過目’，其意思就是我同意發，看她還有什麼意見。第三‘我們兩人的發言可以整理，但在簡報上不掛號為機動’。其意思是，原在簡報的最後有一句：‘葉群、李作鵬的發言另行整理’，我不同意這樣寫，把它刪掉了。所謂‘不掛號為機動’，很明顯我是不同意突出葉群、李作鵬。同時整理後發表不發表，也不要確定。”

可是李震一伙人不願意聽我的解釋，硬說這是“有組織、有

計劃、有預謀地向黨進攻的一個鐵證”。硬說“不掛號為機動，就是因為你們搞陰謀詭計，心裏有鬼，要躲在幕後看一看形勢”。

我當然堅決不能同意他們這種胡說八道，因此我也動起火來。

我說：“小小的便條，竟有如此之大、如此之多的罪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這是什麼鐵證？我看是紙老虎。在這張便條上能證明是‘密商向黨進攻的反革命策略’嗎？能證明是‘搞陰謀詭計’嗎？能證明是‘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地向黨進攻嗎？’完全是放屁！”我拍着沙發大聲重復說：“簡直是放他媽狗臭屁！”

我當時已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我接着說：“你們既然已有了‘鐵證’，我又不肯交代，那你們就可以按照抗拒從嚴處理，你李震不是公安部長嗎？你公安部長難道這點常識也沒有？你們有本事現在就做結論吧。該殺就殺，該斬就斬，何必多費口舌。”

我用手指着李震的鼻子大聲說：“幾百萬日本鬼子和國民黨軍隊老子都不怕，我還怕殺頭？還怕你們的誣陷？”我抱定一死的決心，也要和他們的污蔑陷害鬥爭到底。

此話一出，李震等一行十幾人，目瞪口呆，沉默了幾分鐘，都沒有回過神來。

當時我真是太氣惱了！心裏想，“九大”通過的黨章，明明白白的寫着“黨員有權向黨的組織和各級領導人提出批評和建議。”這一條還算不算數，還有效沒效？正式的黨的會議，不指名對某個領導人提了批評意見就犯了滔天大罪，就是反黨、反革命，黨內民主的原則，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原則還存在不存在？

同時，我必須向他們表明我的態度（李震、郭玉峰、吳忠、于桑等人是中央專案組的負責人，我必須讓他們把我的態度帶給中央）：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我是半步也不會退讓的，就是千刀萬剮我也要堅持真理。

這次，連飯都沒有“招方块字读书社区通縣了。

審訊後，我冷靜地想了想，中央專案組為什麼特別重視這張

便條呢？我明白了，因為他們對我在廬山二中全會期間，找不到更重要的“犯罪”證據，想在這張便條上打開我“搞反黨陰謀”的缺口，結果仍然是徒勞的。

幾天後的9月12日，中央專案組來了七個一般工作人員，與我又談了兩個多小時。可能上次剛談話不久，我就發了大脾氣，中斷了他們事先準備好的談話內容。

他們首先批判我9月7日同中央專案組負責同志談話的態度很不好，說他們是“重證據，不重口供的”。

李震、郭玉峰等主要負責人不敢再出面了，我也就不發脾氣了。我反駁說：“無限上綱，事先定下罪名，然後往我頭上壓，這完全不是重證據的表現。”

他們再次追問我那張便條的思想動機。

我說：“動機很簡單，就是同意那份簡報可以發，但不同意突出葉群和我。”同時我也“檢討”說：“中央沒有指定我審查簡報，我根本不該看，而應退回小組召集人。再有就是我不應轉送葉群，應將我意見提出後，退回小組召集人去處理。”

我又強調說：“就那張便條而言，也是公開的，是光明正大的，二中全會上，我沒有撤回便條，二中全會後，我也沒有撤回便條。這是在黨的全會上的個人意見。當時我不認為有任何問題，現在我也不認為有任何問題，更不承認是什麼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地向黨進攻。”

這一次，他們仍然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入冬之後的幾個月，中央專案組的人沒有再來過，一切又恢復了平靜。

1973年初春的一天，突然三四輛臥車浩浩蕩蕩來到我住地的營房裏，把團部會議室當成審訊室。然後把我叫去，坐在指定的沙發位置上。

在我對面坐着一個穿着呢料便衣，架子很大的“大官”，究竟是誰，我不認識，估

此人首先把一包高級雲烟往茶幾上一放，然後看看茶杯內的

茶葉，大概嫌茶葉不高級，把它倒在痰盂裏，再從皮包內拿出一個精致的小茶葉盒，倒出高級茶葉，重新泡了一杯茶。他又是掏烟，又是品茶，足足沉默了幾分鐘。我端坐在那裏，看着他可笑的表演。我心裏想：“別看你強裝鎮靜，也掩蓋不住你的內心發虛。”

他點上一支烟，翹着二郎腿，拉着長音向我發問：“你是李作鵬嗎？”

我說：“是的。”

他問：“你現在怎麼樣？”

我說：“什麼怎麼樣？我不懂你的意思。”

他問：“你對你的罪行交待得怎麼樣？”

我說：“我有什麼罪行？我所認識到的錯誤都交待了，都報告毛主席和黨中央了。”

他突然拍着沙發大聲說：“你胡說！你打倒蘇振華就沒有很好交待。”

我壓着火回答：“你說話要有證據！是誰決定打倒蘇振華？是中央軍委決定揪出蘇振華，並同意把他交造反派揪鬥，我違背中央軍委和全軍文革小組的決定，把蘇振華從群眾手中要出來，並把他秘密隱藏起來，是我救了他一條老命！”

“大官”叫起來：“你還狡辯！你無情打擊、殘酷陷害蘇振華。”

我反問他：“請你解釋一下，什麼叫無情打擊、殘酷陷害？”

我指着他的鼻子大聲說：“搞逼供的就是你們，無情打擊正是你們！”

“啊！你還想抓我的小辮子？”

我說：“不！抓小辮子算什麼水平。我要抓的是大辮子，是原則問題！是大是大非問題！”

那個“大官”瞪着大眼、張着大嘴，呆若木鷄，狼狽不堪。

據我看，這幫人來此，根本不是來搞審訊的，而是借審訊之名，來試探我李某人，看看身為階下囚的李某人如今是什麼樣的

態度、什麼樣的風采。沒想到我李某人現在是鐵了一條心，在事實面前針鋒相對，在真理面前寸土不讓。

1973年2月12日，中央專案組工作人員三人來到通縣我的住地，主要審訊1971年9月12日晚，我處理山海關機場的過程。

他們將當時山海關機場原始電話記錄影印件帶來給我看，一口咬定我兩次篡改周總理指示，一口咬定我塗改與山海關機場聯系的電話記錄，一口咬定我放走林彪叛逃，並掩蓋罪責。

我冷靜地回答了他們提出的問題，實事求是地詳細描述了自9月12日23時起，我與周總理保持電話聯系，接到總理多次電話指示的情況和與山海關機場通話及電話記錄情況。

不管中央專案組人員如何咬定我篡改周總理指示也好，還是放走林彪也罷，當時我始終堅持兩點：

1、山海關機場是海軍航空兵機場，我是海軍主要負責人，我又是根據周總理指示，處理林彪乘飛機轉場問題，因此不論發生什麼問題，不論有多大的責任，我都應該承擔。我既不能把責任推給下面，也不能把責任推給上面。

中央專案組工作人員抓住我這種態度，進行高壓，逼我承認他們指出的罪責。

2、我特別強調，9月13日下午，劉繼祥秘書送我審閱的，處理“九·一三”事件自始至終的全部來往電話的記錄稿，我閱讀之後，一個字也沒有改動，就在這個文件上寫上：呈送總理批示。總理看完後，劃了圈，一字未改的退回給我。我交劉秘書入檔保存。總理對此文件沒有表示任何不同意見。

以上我祇是寫與中央專案組交鋒的幾個典型例子。

此後，從1973年3月到1976年4月，三年時間中，共審訊了三十多次。主要內容是廬山會議和山海關機場問題。其次是武漢談話“失密”問題、“九大”不投江青票的問題、華北會議問題等等。

每次交鋒的結果始終是你說你的，我說我的，他按他的主觀主義、事先制定好的無限上綱的罪名做結論，我依照事實以理據爭。

事後我才知道，他們從1972年開始的近四十多次對我的審訊，都是先定性，先做結論，後找證據。早在1972年，中央專案組就先後向全黨公布了林彪罪行的《材料之一》、《材料之二》、《材料之三》，嚇死人的罪名滿天飛。僅廬山九屆二中全會問題，就有什麼“反革命政變”，什麼“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向黨進攻”，什麼“天才論是反黨理論綱領”，“設國家主席是反黨組織綱領”，什麼“分裂我黨我軍，向毛主席黨中央奪權”，什麼“反黨地下活動，大搞陰謀詭計”，什麼“背叛‘九大’路線，背叛新黨章，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舉不勝舉。堪稱誣陷有術，無限上綱有術，置人死地有術。

第四十一章 天塌地陷 (之三)

一、悲喜交加

197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1月，周恩來總理與世長辭了。噩耗傳來，哀樂幽咽分外悲。

三十年代初，當總理來到江西蘇區時，他帶來一本電臺通訊密碼，名為“豪密”（紅軍時期，周恩來的化名叫“伍豪”，可能是這種密碼名稱的來由）。當時我們紅軍剛建立電臺，不久開始與上海中央通報，就把我調到紅軍總司令部機要科當機要員，掌握這本“豪密”，專門負責翻譯與上海中央通報的來往電報。以後我不作機要員工作，又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在中央軍委二局作參謀工作，做偵聽破譯敵人電報，並直接向總理直接報告情報，接受

方塊字讀書社區

總理指示。因此我早就認識總理，總理也早就認識我。“文革”中，我目睹總理夜以繼日的繁忙工作，苦口婆心的與“造反派”講道理，沒完沒了的應付江青與“中央文革”的糾纏。真是做到了“鞠躬盡瘁”。當時林彪曾交待軍委辦事組：“對待總理的指示要像對待我的指示一樣去完成。”當我聽到總理去世的廣播，不禁老淚縱橫，異常悲痛，許多往事涌上心頭。

總理火化那天，我填了一首詞：

敬悼周恩來總理

哽咽文化宮，抽泣英雄碑。痛悼偉人無限悲，八億傾盆淚。一生爲人民，鞠躬盡瘁殞。恨望長空送英靈，斷腸復羞愧。

7月初，廣播裏又傳來朱德委員長與世長辭的噩耗。舊悲未消，新悲又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令人痛苦不堪。

早在中央蘇區，1931年紅軍時期，我曾擔任過朱總司令的衛士。朱總司令留學德國時，購買了四支德式自衛手提機關槍（類似現在的衝鋒槍）和一支二十響的卜殼槍。那支卜殼槍和皮制子彈轉帶，總司令經常背在自己身上。我們四個衛士則背上德式衝鋒槍，隨着總司令形影不離。我們負責總司令的保衛工作，不論平時和戰時，總司令走到那裏，我們就跟到那裏。康克清大姐是我們的支部書記，也是我入黨介紹人。因此我與朱德總司令的接觸是由來已久的，感情也是深厚的。不過後來我調做其他工作後，和總司令的接觸就不多了，聞悉他逝世，我心裏也是很悲痛的。

1976年7月7日，我也填寫了一首詞，以表達我的哀思。

敬悼朱德委員長

悲歌傳噩耗，四海起哀潮。痛悼豫章風暴首，哭失國英豪。一代老元帥，九州光輝照。南征北戰寰球震，功比泰山高。

方块字读书社区

緊接着，9月初，毛主席又突然逝世了。這就更加悲痛欲絕了。

當時大家對毛主席的崇拜迷信，可以說是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天天祝願毛主席萬壽無疆，長壽健康。聽到訃告廣播，好像晴天霹靂，心碎膽寒，哭泣之聲，處處可聞。不僅在國內震動，世界也震動。我同大家心情一樣，“贛江追隨四十年，幽禁更思引路人”。一方面悲傷，一方面關心中央領導層的變化。當時我填寫的一首詞：

敬悼毛主席

秋風烈，晴空霹靂天似黑。天似黑，統帥永眠，領袖長絕。解放中華傾心血，功高偉績冠群杰。冠群杰，五卷寶書，遺志不滅。

正在非常悲痛哀悼的日子裏，從《參考消息》的外電報道中，模模糊糊看出來一點異常情況，報道說：有的地方在批判“白骨精”。我立即想到中央領導集團內，果然出了問題。

“白骨精”是誰？我是能够猜到的，但絕對不可能是“白骨精”一個人。毛主席死後，這些家伙要鬧事，要奪權，早在意料之中。可是在《人民日報》上，看不出任何暗示。心裏彷徨了好幾天。

1976年10月中旬，到底于無聲處聽到了驚雷。中央廣播電臺連續廣播了打倒“四人幫”，宣布了華國鋒擔任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決定。到處鑼鼓震天，鞭炮動地，山歡水躍，普天同慶。

我同全國人民一樣，興高采烈。這是我被隔離審查五年以來，第一次覺得心情愉快，第一次覺得秋色宜人。

廬山會議之後，這幫王八蛋已經興高采烈，手舞足蹈。“九·一三”事件和“九·二四”事件之後，更加忘乎所以，尾巴翹上了天。到了“十大”之前，當領袖的願望似乎已經勝利在握，迫不及待了。

我雖然“愚蠢”，但對他們的禍國殃民，爭權奪利，野心勃勃，早看在眼裏，恨在心上。

打倒“四人幫”後，在我身邊的看守人員知道我了解“四人幫”

方块字读书社区

的情況，每天總是好奇地問東問西，希望我滿足他們的要求。由於他們都是連排幹部，政治水平有限，所問多屬生活方面問題，至于政治路線問題、爭權奪利問題，談的比較少。從他們談話中，我也略知道一點“四人幫”新的陰謀活動情況。

沒有料到，正在高興之中，樂極生悲，發生了令人難以理解的災難，被“四人幫”迫害的我們反而受到更為嚴厲的懲處。

二、打入十八層地獄

當時看守我的負責人，是團司令部軍務股副股長，姓徐，我稱他“老徐”。老徐是山東膠南人，解放戰爭時期入伍，曾參加渡江戰役、解放福建戰役及抗美援朝戰爭。他文化程度不高，為人尚老實。

1976年11月初，大概他是奉命來了解我對打倒“四人幫”的認識。我把打倒“四人幫”的認識談了以後，接着談到康生問題。我說，康生是“四人幫”一伙的，是“四人幫”的後臺，尤其是康生與江青是同鄉，是江青的靠山。從延安一直談到“文化大革命”中我所知道的康生所作作為。談了之後，這位看守負責人，當然要向中央專案組匯報。但我並不知道，更沒有意識到揭露康生問題是犯了滔天大罪。我仍蒙在鼓裏。可是看守人員很快對我態度冷淡，不再問東問西了。

有一天，一位看守人員悄悄告訴我說，公安部于桑來了。我估計可能又要找我談什麼問題，結果沒有見面。到了12月份，看守人員中有兩三人數次坐汽車早出晚歸。問他們幹什麼去了，均含糊糊塘塞不做正面回答。我當時喂養了四隻大母雞，吃雞蛋既新鮮又省錢。一天，老徐告訴我，現團部規定在營房不准養雞，讓我趕快把雞殺吃了。三天吃一隻，十二天吃完。萬沒想到，這就是打入地獄的前兆。

方块字读书社区

1976年12月29日晚飯前，該團一位負責人通知我說：“今晚上

級首長找你談話，你做好準備。”

晚飯後，開來兩輛北京吉普車。黃昏時上車，向北京方向開去。進到德勝門向北拐，我猜測還是到沙河那個空軍學校老地方。可是到了沙河仍沿北京昌平公路北去，一直開到昌平、南口之間，向西到靠近燕山脚下的秦城監獄附近。因為距這個監獄不遠的地方有一個炮兵射擊場，過去我在總參管軍事訓練時，曾多次到過這個地方，知道那裏有一座監獄。因此汽車開到秦城附近時，我心裏就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

進入監獄大門內，在一棟樓房旁邊停車，把我帶入一間審訊室內，室內正面牆上有八個大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下面有一張長形桌子，在桌子前面有一個木墩。

當時由監獄長和兩個監管員進行搜身檢查，其實什麼東西也沒有檢查出來，祇把我穿的棉鞋鞋帶抽走，把手表摘下來。而後就由隨車押送我的看守人員，把我日常用的衣物和其他用品拿進來，由監獄監管員一件一件的登記。

最後監獄長向我宣布三條：“第一，以後不准叫自己原來的名字，祇叫監獄編號，你的監獄編號為7103；第二，不准在獄室的牆壁上亂寫亂畫；第三，不准在獄室內大喊大叫。”

宣布完後把我帶到二樓西走廊，塞進一間獄室內。獄醫量了一下血壓後，立即把門關閉，外面一個軍人站崗看管。

現在我是名符其實的政治囚徒了。

這間獄室是像棺材一樣的長條形，不到八平方米。裏面全部設備有：一張離地三十公分高的單人床板，一張約六十公分高的小條桌，一個抽水馬桶，一個湯碗那樣大小的洗臉池。

進入獄室時，大約是深夜12時左右，雖夜闌人靜，但怎麼也不能入睡。

人躺在床上，思想則像海潮一樣翻滾。這裏可能就是我葬身之地！這究竟是為什麼？毛主席在世時，沒有把我關入監獄，毛主席死後把我關入監獄。“**方块字读书社区**”明，沒有把我投入監獄，“四人幫”打倒了，反而把我投入監獄。我反復思考，估計有三

個可能：

第一、我揭露康生是“四人幫”一伙，是“四人幫”的後臺，犯了滔天大罪，尤其1977年1月初，我入獄三天後，《人民日報》還大登特登康生相片，甚至連康生老婆曹軼歐的相片也同時登出。報紙上還公開辯護說，康生在黨的“九大”時期，並沒有向毛主席提議要江青擔任政治局常委。這就更加證實了我的估計。其實康生確確實實向毛主席提議過，毛主席不同意，康生才低頭不語。

第二、我對華國鋒為人沒有認識清楚。公布華國鋒為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後，我曾表示擁護，認為他斷然打倒“四人幫”，這是一件非常英明的決策。可是立即把我打入十八層地獄，肯定也是經他批准的“英明決策”。難道他比毛主席、朱德、周恩來更高明？更革命？

第三、在目前位居高位的中央領導人中，最希望置我們于死地的人應該是汪東興。他在毛澤東、江青、林彪三角關係中的周旋與投機，我們知道情況不少，他當然不願意讓更多人知道他的齷齪勾當。

到了1978年《人民日報》開始不點名地批判康生，說明我以前的揭露是正確的。更覺得華國鋒執行的是缺乏實事求是的極左思潮路線，因此後來對華國鋒的兩個“凡是”的批判，我在思想上沒有抵觸。撤銷華國鋒兩主席的職務我也擁護。

三、共產黨監獄的滋味

共產黨和國民黨的監獄，中國和外國的監獄，可能都差不多，都是專政機器。我沒有蹲過國民黨的監獄，我也沒有研究過外國的監獄，我祇從中外小說描述中了解一點情況。究竟差別在什麼地方我也說不清楚，按道理應該說，共產黨監獄是思想改造重于鎮壓，給出路重于整死。方塊字讀書社區 殘酷折磨。

秦城監獄是五十年代新建的，據說是學習蘇聯某個監獄模

式修建的，管理方法也是學習蘇聯的經驗。而蘇聯又是參考沙皇時代辦法而形成制度的。這個監獄分兩個區域，西區一片樓房是關押普通犯人，東區有四座樓房是關押特殊犯人。東區這四座樓房雖然互相緊靠在一起，但又互相隔絕，用高牆厚壁加上電網，把每座樓房圈起來，祇留人員進出小門，由軍人站崗看守。每座樓房均是口字形，共三層。每一層三個武裝獄警，日夜站崗看守，警戒非常森嚴。任何時候，犯人不准互相見面，外人不能接觸。每座樓房有一個監獄長，七八個監管員。他們的責任是分水、分飯、送報、送書、看管犯人放風，禁止犯人違犯獄規等。

我是被管押在東區一座樓房內。

這座樓房大約有一百多個單間獄室，在二樓我被關押的那個小單間裏，我大約住了一年多的時間。以後進行了獄室修改，把兩個單間中間的隔牆拆掉，合成一個單間，這樣每個單間的面積擴大了一倍。

我于1978年搬進了大間獄室。但室內設備沒有任何增加，鐵門鐵窗，依然如故。

開始時的牢飯還說的過去，中餐、晚餐都是兩菜一湯，午餐米飯，晚上面食。每星期有一次菜多肉少的餃子，半月一次的小油餅，就算改善生活了。

可是這種待遇也好景不長，1977年春節之後，不知為什麼，伙食質量明顯下降了。有時一個煮雞蛋加一個炒青菜，一個開水煮菠菜，這就是兩菜一湯。或一個稍有點肉片炒的蔬菜，加一塊四川榨菜，開水添幾片黃瓜，這也是兩菜一湯。我因是病人，隔天早餐有一碗牛奶，每星期發給一點水果，這可能是一種“優待”。

實事求是地說，保證吃飽不成問題。可能我們過的是“有資格吃好”的特殊牢犯的生活。

生活中困難之一是禁止吸烟喝酒。我平日酷愛烟酒，過去行軍打仗時，烟酒不離身，久之成癮，成為生活習慣。吸烟喝酒既能提神，又能解除疲勞，同時翻騰，我祖傳之樂趣。高興時烟酒可添加高興，不高興時烟酒可減少煩惱。盡管知道烟酒多了也傷人，

方块字读书社区

還曾幾次和黃永勝、邱會作等打賭戒煙，終因意志不堅，半途而廢。現在突然斷絕，頗為難受。因為是被他人強制停止，心中就將此作為入獄後的第一個考驗。——不吸煙，不喝酒，有什麼了不起，死不了人。咬咬牙，跺跺足，不能為此低頭，不能為此丟人。自此之後，煙酒不沾邊，戒了一個徹徹底底。直至後來“出獄”，條件好了，也沒有“復辟”，倒對我的身體有利，壞事變好事。

開始時學習條件非常不好，除了《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外，就是毛著五卷，其他什麼書也不讓看。我攜帶的所有書籍物品全部被監獄封存。借讀馬列書籍不給，借讀魯迅的著作更不給。監獄的意思是剛發下毛著五卷，應集中精力把這本書學好。

到了1978年情況變了，監獄圖書館開放，由監管人員用一個平板車，裝滿各種書籍（其中主要是馬恩列斯理論書和中外文藝小說），到各獄室門口，打開室門，由犯人出來選擇一本或數本。半月之後，平板車又挨門送來，交舊換新，自由選擇。這樣看書學習問題基本上解決了。

每天上午、下午各放風一次，每次放風半小時。這裏放風也特殊，為了絕對防止犯人互相見面，樓房院內修築有成排成排的放風房，每間放風小房有牆有門，但沒有頂蓋，以便通風望蒼天。將犯人單獨關在各放風小房內活動。在每排放風小房頂上設有吊橋，看守人員在吊橋上來往走動，由上向下監視每個犯人的活動情況。對我因是病人則稍微特殊，在樓道指定一段沒有犯人的走廊畫地為牢，來往散步，或在院內規定某一地段道路，無人來往，為我散步活動地點。時間也不加限制，願意活動多久就活動多久。

雖然規定犯人在獄室內不准大叫大鬧，但辦不到，經常有人喊天呼地，叫爹叫娘，大哭大鬧。有的腳踢手砸獄門，大叫大罵。還有人不停地高聲唱歌。看樣子監管員除了對唱歌的不制止外，對其他的行為都予以制止，但很難制止得了。結果都要大吵一頓，大訓大罵一頓才了結。有時我問監管員：“他們鬧什麼？”回答說：“那是瘋子神經病。”

方块字读书社区

1978年的一天，聽到樓下東面的一間牢房傳來“咚咚、咚咚”拼命的手擊腳踢牢門的聲音，並且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凶。看守人員怒吼起來：“他媽的，你打門幹什麼？你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這是監獄，祇准你規規矩矩，不許你亂說亂動！”等看守剛剛離開，“咚咚、咚咚”的敲門聲又響起來了。看守又跑過去怒吼起來：“你他媽的老實點，想找死嗎？你不老老實實是要吃苦頭的！”等看守剛剛離開之後，“咣當咣當，咣當咣當”又響起來，聽聲音不像是手擊門，而是腳踢門的聲音，踢的特別震耳。看守又跑過去了，大聲怒吼：“我警告你，你再鬧，再不老老實實，那我們就對你不客氣了，你這樣鬧得大家不安寧，是違反監獄規定的，你是罪上加罪，你知道嗎？再鬧我們就把你手脚銬起來！”警告一頓之後走了，可是仍然沒有完全安靜下來。

有的犯人不論白天晚上高聲唱歌，唱一會兒停一會兒，不但唱“國際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也唱抗日時期的歌，唱解放戰爭時期的歌。看樣子是想用歌聲來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

在我的牢房下面一層還關押了一名女犯，她的特點是經常放聲大哭，白天哭，晚上哭，哭得非常淒慘，非常傷心，哭的聲音很大。從哭的聲音判斷，此人不過二十多歲的女青年，看守也勸說制止，但效果不大，時斷時續。數天以後安靜下來了，可能轉到別的牢房去了。總而言之，各種稀奇古怪的事情天天有。

監獄內有一個醫療單位，設有內外科、X光室、心電圖室、牙科、配鏡室等，有獄醫值班。如果犯人有病，由監管員找值班獄醫治療。但獄醫對犯人的工作態度很成問題，基本上不相信犯人口述的病情，祇憑器械檢查。例如對心臟病人，首先測試血壓，再診聽心率情況，最後用手指按一按腳背，是否有浮腫現象，必要時作個心電圖，很少過問自覺病情，你說他也不相信。

有一次我發高燒，獄醫按一般感冒用藥，我告訴他自己曾經有過數次急性肺炎的病史，他根本不聽。以後發燒到四十度，又發現祇要咳嗽就大口吐血，這才確診是急性肺炎，注射青霉素，拖延了幾天時間。

方块字读书社区

又一次，我的一顆牙痛，不能吃東西，經牙醫檢查要拔掉。我同意拔掉，並告訴他我有心臟病，請拔牙時注意一下。牙醫認為拔牙簡單容易，不會影響心臟。可是當她拔牙的時候，漫不經心，把牙折斷了。爲了把牙根取出來，不但把牙床挖得稀爛，用了一個半小時也沒有取出來，結果引起我的心臟病發作，才停止拔牙手術，轉爲搶救心臟病。幸虧我這個人命大，又避免了一次生命危險。

按照獄規，犯人是不能受到人身侮辱的，犯人有權向監獄工作人員的違法亂紀行爲提出控訴。這個問題實際執行最差，因爲屬於日常生活中發生的問題，我不想多去觸動。有了一兩次實際經驗，我就更加採取約束自己言行，少說爲佳。對於那些小人行爲，採取橫眉冷對的態度。如果欺人太甚，我的脾氣也不會客氣的。小人們是欺軟怕硬的，你臭罵他一頓，雖然他可能借機報復，但可稍稍消除心頭怒火。鎮壓與反鎮壓之間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古今中外一切監獄概不例外。

在獄中，最使我苦惱的是不能自由寫東西，甚至平常寫日記也不行，因爲不給筆，不給紙。我多次提出要求，根本不睬不理。有時中央公布了一個什麼重要會議，或公布一個什麼重要文件，要我們表態時，臨時給支筆給幾張紙，寫出後立即全部收回。如果發給你五張紙，祇用了四張，還剩下一張白紙，或有一張寫壞了作廢，那麼收回時這張白紙和寫壞了的廢紙也得收回，半點也不能少。

沒有紙和筆我就自己想辦法。我把從通縣帶來的一件白汗衫疊起來偷偷的放在床底下。每當監獄管理員發紙筆讓我寫材料時，我就盡量背對牢門，用手遮住白汗衫，不讓獄警發現。把早已打好腹稿的草詩寫在白汗衫上，有時也把中央專案組和公、檢預審我的主要問題，我準備回答他們的提綱，簡要的寫在白汗衫上，寫好後再將白汗衫藏在床底下。

在秦城監獄關押的四年中（1981年公審後，基本在復興醫院住），我的這一行動一直未被獄警和監管人員發現。幾年來，白汗

衫上密密麻麻，裏裏外外寫滿了小詩和提綱。

幸運的是，1981年我保外就醫時，在通縣隔離審查時寫在筆記本上的小詩和在獄中寫有小詩的白汗衫都退還給我了。

我原想一直保留這些物件，傳給後代做紀念。一來讓他們知道我在獄中的生活，二來自古以來“詩言志”，讓他們知道我在獄中的感受和思想。可是在太原，我老伴每看到白汗衫就傷心萬分，泪流不止。我祇好把小詩抄下來，把白汗衫燒掉了。這部分小詩就發表在我的回憶錄《悲愴詩篇》一節中。

四、平靜中的波瀾

時間就像長江、黃河的水，永遠不知疲倦，永遠不可阻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在歷史的長河中向前奔流。

自1977年到1979年，我被打入秦城監獄已整整三年的時間。國內外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唯獨我的狀況和處境依然如故，似乎沒有什麼變化，似乎很平靜。中央專案組也很少來，每年有時來兩三次，多是外調性質，談別人的問題多，談我自己的問題主要是海軍的問題。中央也無人過問，似乎我這塊料已經不在人間，已經徹底埋葬了。其實任何事物都是發展變化的，平靜中有不平靜，平靜中有波瀾，平靜中有起伏。

打倒“四人幫”後，我從報紙上獲知，中央再三提出“有錯必糾”，對於“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錯案，必須徹底清查，徹底糾正。這當然是具有重大深遠意義的工作。同時再三提出，要實事求是，既不擴大也不縮小，本來面目是怎樣就是怎樣，該誰負責就由誰負責。從理論上又勾起我一線希望的幻想。如果能這樣，我一百個擁護，一千個擁護。

但實踐中證明并非如此。

入獄前中央專案組審方塊字讀書社區會議的有關問題，及山海關機場問題。現階段中央專案組審訊的重點是海軍的問題。問

題不同，但態度、方法我看不出有多大的變化，甚至比以前更加惡劣。

我對海軍的冤、假、錯案負有領導責任，但具體問題應具體分析，即不能顛倒是非，也不能張冠李戴，更不能強加罪名，否則就是主觀主義、“實事求非”。

舉幾個在獄中審訊我的例子來說明。

第一，專案組硬說蘇振華是被我打倒的，並受到我的殘酷迫害。我回答他們：“你們完全顛倒是非，混淆了黑白。關於中央軍委決定，打倒蘇振華的情況，我已經說了多次，而且說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

第二，專案組硬說陶勇（東海艦隊司令員）是我迫害致死的。我回答：“這是胡說八道！”我反問專案組：“你們有陶勇是我迫害致死的證據嗎？我可以肯定的說，你們沒有！”我接着說：“事實是：1967年初，在誰也沒有決定打倒他，誰也沒有揪鬥他的情況下，此人就跳井自殺了。當時我尚在被群眾圍攻批鬥的焦頭爛額之中。”

我說：“事後，許世友曾對我說：‘陶勇是被文化大革命嚇死了’不信，你們去問許世友。”

第三，專案組硬說張學思（海司參謀長）是我迫害致死的，我的回答是：“完全無稽之談”。我說：“我承認，按葉群的意見，我交代海司辦公室寫了一份張學思的材料送給她。這份材料是整理群眾大字報批判張單純軍事觀點的，就此而已。”我又說：“張學思問題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由中央決定將張學思作為‘東北叛黨投敵反革命集團’的成員而逮捕的。張被捕以後，我根本沒有過問，一切由中央專案組處理。張學思是在被逮捕後病死的。”

我向專案組的人說：“寫了一份批判張學思單純軍事觀點的材料，與中央決定將張學思作為‘東北叛黨投敵反革命集團’的成員，並逮捕，有什麼關係？而且我們寫了一份批判張學思單純軍事觀點的材料，張學思就成為‘東北叛黨投敵反革命集

團’的成員嗎？你們不覺得這個邏輯可笑嗎？”我說：“批判‘單純軍事觀點’（人民內部問題）與‘叛黨投敵反革命’（敵我問題）的性質能一樣嗎？”

最後我說：“張學思病死于逮捕之後，是誰‘迫害’，如何‘致死’不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嗎？硬說是我把張學思迫害致死，這不是無中生有的強加罪名又是什麼？你們哪裏有半點實事求是的精神呢？”

第四，專案組硬說齊勇（國家海洋局局長）是我迫害致死的，我的回答同樣是：“完全胡說八道”。我說：“我承認，我雖然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沒有把齊勇從造反派手中搶救出來，齊勇是海軍幹部，我有責任。但是我没有將齊勇搶救出來，就是我把齊勇‘迫害致死’，你們造假誣陷的水平也太拙劣了吧？你們對我的誣陷，是不攻自破！”我對專案組說：“要證明齊勇是我迫害致死的，必須拿出證據。海軍文革辦公室就是最好的證明，我當時的秘書就是最好的證明，李長如就是最好的證明，呈周總理有關海洋局的情況報告就是最好的證明。你們在給我扣大帽子之前，難道沒有做調查研究嗎？”

第五，專案組硬說雷永通（南京海軍軍事學院政委）是我迫害致死的。我反駁他們：“紅軍時期，我就和雷永通在軍委二局一起工作，我們是爬雪山過草地的生死老戰友，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解放後，我們的關係一直很好。文革中，特別是“七·二〇”武漢事件後，海軍學院的造反派與張春橋支持的“紅縱”攪在一起反對南京軍區許世友。我知道後，立即告訴海軍政治學院，不准反對許世友，不准把矛頭對准南京軍區。海軍學院造反派按照我的表態，逐漸轉向支持許世友和軍區，許很感謝。後來，按照軍委指示要求，南京軍區把海軍軍事學院的“鬥、批、改”工作交由江蘇省軍區具體負責。省軍區派工作組進駐學院。工作組給雷永通扣上“叛徒”的罪名，刑訊逼供，最後迫害致死。”我又說：“事情發生後，南京軍區兩方塊字讀書社區明情況並道歉，許世友也親自給我打來電話說：‘對雷永通之死負有責任。’對江蘇省

軍區這種做法，我是堅決反對的。這件事許世友清楚，蕭勁光也清楚。現在你們把雷永通之死的罪名加到我頭上，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僅舉上面五例，已經可以說明，在“殺人償命”這樣天大的問題上，他們也敢毫無根據的捏造事實，無罪被誣陷，結論純胡說。他們的所作所為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釋，所謂“實事求是”，連一點影子也沒有。

1978年7月29日，中央專案組和總政代表在秦城向我宣布，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決定，永遠開除林彪、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雪峰的黨籍。我當時依然相信黨中央，依然相信毛主席（1973年毛主席還健在）遲早會把我的問題弄清楚，同時又不了解整個案情，因此我表示：“祇要對黨、對人民、對國家有利，自己個人生死榮辱置之度外”。話雖如此說，但內心的痛苦如同刀割，難以忍受。

1973年黨的“十大”時，我曾向黨中央寫過報告，請求保留我的黨籍。現在看來，打倒“四人幫”後的1978年，宣布1973年“四人幫”猖獗時的決定，我自然覺得非常荒唐，當時我沒有拒絕簽字，現在很後悔。但簽完字後，我把簽字的筆狠狠摔起一尺多高落在桌上，心裏又氣又悲。

我現在一無所有了，革命資歷、黨籍、職務、待遇全部一筆勾銷了。戰爭年代出生入死，我沒有掉眼淚，長期坐牢受折磨，我沒有掉眼淚，妻離子散，我也沒有掉眼淚，可簽完字回到監室，心如刀絞，兩行熱淚早已濕滿了前襟。現在每當想起被開除黨籍，總是傷心落淚。黨籍比我生命還寶貴十倍百倍！四十多年為黨、為國、為民拼死奮鬥，用生命和鮮血得來的無尚光榮，就這樣糊裏糊塗的丟掉了，哪能不痛苦！哪能不悲傷！落到這個下場，誰碰到也寒心！天下公理何在啊？

1979年國慶三十周年紀念活動時，葉劍英在講話中對我們的罪名的提法又“更上一層樓”，不是“反黨集團”而是“反革命陰謀集團”。這樣反黨集團主要成員，升級為反革命集團主要成

員了，我就更加想不通了，更加難以承認了。

1979年12月22日上午，監獄長突然來到我的監室通知說：“你的孩子來探視你，你準備一下。”

我說：“沒有什麼要準備的。”

他說：“第一刮刮鬍子，把穿的衣服也弄整齊一點，第二祇談生活問題，不要談政治問題。”

下午起床後，把我帶到監獄大門外一間接待室內，見到了我的兩個兒子李冰天、李炎天和小女兒李小征及女婿蘇天祥。相隔八年多了，竟然在監獄中相見。

我的小女兒一見到我，就忍不住悲痛，抽泣不止，一頭倒在我的懷裏說了一句：“爸爸，你受苦了”。到底還是兩個兒子堅強一點，生怕引起我更加傷心，強忍住了眼淚，其實心也在流淚。我也生怕引起孩子們難受，有淚強往肚裏咽。天地無情人有情，骨肉之情人皆有之，此種場合，誰沒有悲傷與激動？

孩子們告訴我他們這幾年的情況，最使我高興的是，第一次知道我的老伴還堅強的活着，知道了她的下落，知道了她的情況，這是我八年來日思夜想，牽腸挂肚的事。我的判斷沒有錯，她正直、堅強、善良，是我的生死戰友，是我的好老伴，孩子們的好母親，雖然老伴已年近花甲，體弱多病，但不管千難萬苦，我相信她一定會頑強地活下來。聽到老伴的情況我高興極了，也放心了許多。

孩子們還告訴我，他們都從部隊轉業了，在地方安置了工作，結婚成家了，兩個女兒還生了孩子，李家已是三代同堂了。但是他們因我而受到的株連痛苦一句也沒有說。孩子們經受了大風大浪的鍛煉，長大了，成熟了。當時，我也是報喜不報憂，告訴一點我的身體和生活情況來安慰孩子們。我們談話時，旁邊坐着監獄的工作人員在監聽。

我們一邊談話，一邊吃孩子們送來的各種各樣的食物，時間過的真快，大約兩個小時。經過這次久別重逢的相見，我的心情稍微舒暢一點，但遺憾的是不允許談心裏的真實

話。

後來規定，每三個月親屬可來探監一次。經過幾次探監，才把全家老小都見到了。八年多時間，全家還人人活着，應該謝天謝地，應該熱烈慶祝。

現將對我家屬子女的“照顧”（“照顧”的話出自周恩來1971年9月24日）略述如下：

我的妻子董其采，上校軍銜，11級幹部，1939年在黨的“抗日救亡”的召感下離家出走，從天津跑到冀魯邊游擊區參加了八路軍（我的老丈人在天津的報紙上登‘尋人啓事’尋找）。在八路軍115師中擔任醫生，救治傷員。是游擊區隱蔽休養所的所長。解放戰爭時是四野機關衛生所的所長。解放後曾擔任武漢高級步校醫院院長，161陸軍醫院院長和武漢軍區總醫院副院長等職。“文革”開始時任海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九·二四”事件後，她被專案關押多年，污蔑“參與在海軍奪權”，1978年做了“敵我矛盾”的結論，海軍召開幾千人的大會批鬥後，送河北漢沽農場看押勞動改造。快六十歲的人，身體被摧殘的渾身是病，還要下農田勞動，幹不動了，還要受到看管人員的申斥。在此期間，她多次向中央、中央軍委申訴自己的冤案，後改爲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但沒有恢復黨籍軍籍。

大女兒李大征，上海第二軍醫大學畢業，原在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當大夫。受株連後被調出解放軍總醫院，安排到晉西北五寨山區的一個部隊醫院工作了幾年後轉業地方，隨丈夫落戶沈陽。其丈夫劉偉欽，沈陽魯迅美術學院畢業，參軍後在北京軍事博物館工作，受牽連先專案關押幾年，又發往山西忻縣部隊農場喂豬，後轉業回原籍沈陽。

二女兒李幼征，已在總參三部工作多年，被株連後也是先被專案關押，又調湖北鐘祥部隊農場工作，後轉業到地方農場工作至今。

大兒子李冰天，原在北海艦隊驅逐艦大隊的某導彈驅逐艦上擔任航海長，“九·一三”事件後，被中央的某位大人物污蔑爲

“海軍的林立果”，隔離審查多年，結論為“犯有嚴重政治立場錯誤”，然後被趕出軍隊，轉業到內蒙古，他多次向中央申訴不白之冤，1978年底，胡耀幫對他的申訴書親自做了批示，並將批示登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和中央組織部的簡報中，之後回到北京，在交通部門工作。

小女兒李小征，北京大學畢業，原在海政宣傳部新聞處工作。被株連關押幾年後趕出海軍，轉業到地方工廠做搬運工。

小兒子李炎天，1971年剛剛十六歲，尚無獨立生活能力，也被以“辦學習班”的名義關押在海軍農場幾年，要求與我“劃清界限”，揭發“林彪反黨集團的罪行”。放出來後無依無靠，到處流浪，後被安排在農場勞動，幼小心靈遭到嚴重的傷害。

“九·二四”事件之後，無論是年幼的小兒子，還是年過半百的老伴，全家都無一例外的被以“專案組”、“學習班”的名義分別進行隔離審查和關押，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短者二三年，長者五六年，身心受到嚴重摧殘。

這就是對我家屬子女“照顧”的實際情況。

重復說一句，所幸的是全家人的生命力極強，既無上吊、跳樓，也沒有被整死。現在都成家立業，依靠自己的本事養家糊口，過着平民百姓的生活。

第四十二章 預審抗爭

一、預審的折磨

烏雲滾滾，寒風暴雪，預審的日子裏，是天昏地暗，殘酷折磨的歷程。

方映宇讀書社區

1979年12月下旬，公安預審人員在秦城監獄審訊室開始提審我，並令我用寫材料的辦法，交代問題。我當時表示用寫材料辦法交代問題沒有意見，但我這裏既無筆，又無稿紙，應如何解決？他們答曰：由監獄供給你筆和稿紙。

回憶了兩天後，我就向監管人員要筆要稿紙，他們滿足了我的要求，我即開始動筆。

當時我已感冒多日，低燒不退。我帶病堅持寫到第二天下午，心臟病突然發作，而且極為嚴重，胸區疼痛、四肢抽搐、痙攣，血壓逐步下降，心率由快變慢，心力微弱，人處於昏迷狀態。醫生護士搶救了兩個小時，經過含藥、打針、輸氧、輸液等措施，才逐漸恢復過來。這一次犯病驚動了監獄主要負責人。大概由於剛剛開始預審這個特定的時間，我這個重要的犯人要是死了，他也不好交代，於是第一次到獄室來看我。不久他們通知我，待稍穩定後，送我到北京復興醫院治療。于夜11時，用擔架把我抬到汽車上，仍不斷輸氧，不斷含硝酸甘油片，堅持到北京復興醫院，也就是公安部的監獄醫院。

到醫院後，經醫生檢查，規定臥床兩周，進行中西醫結合治療。臥床到第十天，我覺得身體已恢復正常，要求起床寫材料，醫生勉強同意，並規定每天寫材料的時間不得超過兩小時。這樣我的材料拖拖拉拉一直寫到1980年1月27日才結束，共寫了四十八頁，約一萬三四千字。

在材料中我重點回答了公安預審人員提出的“現在哪些問題想得通，哪些問題想不通”的問題。我在材料中這樣寫道：

人的思想總是不斷地在想各種各樣的問題，“存在決定意識”，由於長期與世隔絕，坐井觀天，不了解情況，因此有的問題想得通，有的問題想不通，也是很自然的。現在就有關自己的問題談一點想法：

第一、1973年，中共中央的決定中，說我是林彪反黨集團主要成員之一，決定永遠方缺字读书社区我曾表示服從中央決定，但內心痛苦萬分。為黨為國，流血流汗，拼死奮鬥一生，得到的結

果是如此下場，我很難想得通。

第二、國慶三十周年，葉劍英講話中對林彪集團的提法又升級了，不再提反黨集團，而是反革命陰謀集團，這樣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升級為反革命陰謀集團的主要成員了，我就更想不通了。我是“反革命”？殺頭也不承認！

第三、關於廬山會議是“未遂政變”，反黨理論綱領是“天才論”，反黨組織綱領是“設國家主席”及“專了我們兩天半的政”等等，我始終沒有想通。“天才論”怎麼是反黨的理論綱領呢？

“設國家主席”怎麼就成了反黨組織綱領？在黨的全會上，中委們討論同意“天才論”也好，不同意也罷，討論設國家主席也好，不設也罷，難道不是黨內民主的正常生活嗎？全會上，有人（我暗指汪東興）始終堅持設國家主席，至今無事，而我根本沒有提設國家主席一個字，怎麼就成了反革命呢？我實在想不通。

第四、毛主席在武漢談話失密問題。劉豐把談話內容告訴了我，我回北京後告訴了黃永勝、邱會作，并向海軍黨委常委作了傳達。有人說這是“超級間諜”，是“向林彪告密”，我很難想通。為什麼中央主席的重要指示，不能告訴中央副主席？不能告訴中央政治局委員？不能告訴軍委辦事組組長？不能告訴北京的任何人呢？

第五、關於被長期關押的問題，內心是矛盾的，有時想得通，有時想不通。既然我是林彪反黨集團主要成員，又是反革命陰謀集團的主要成員，如果有充分的事實根據，罪名真能成立，不但坐牢，就是長了十個腦袋也是不夠殺的。可是有什麼證據證明我“反黨”？有什麼證據證明我是“反革命”？有什麼證據證明我進行了“反革命陰謀活動”？有什麼證據證明我的錯誤是敵我問題？難道林彪叛逃了，我們就應該坐牢嗎？我想不通。

總而言之，我參加文革五年，既擁護毛主席，也擁護林彪，結果被打倒了。別人參加文革十年，既擁護毛主席和林彪，也擁護和支持“四人幫”，可是安然無恙，甚至得到提拔（這裏我話鋒仍指向汪東興，此時他已經當上了中央副主席）。這究竟是為什麼？

方块字读书社区

我能想得通嗎？！

1980年1月底，我將寫的材料送走了。

1980年2月初，開始公安預審。有海軍的、總政的、公安部的幹部參加。其負責人可能是海軍保衛部或檢察院的什麼人，自稱是“中央代表”，實際是個典型的主觀唯心主義者和搞“逼、供、信”的能手。他架子很大，張牙舞爪，來勢汹汹，其實是一個“大草包”，是隻不堪一擊的“紙老虎”。

他們在復興醫院布置了預審室。

第一次提審我，那個“中央代表”就聲嘶力竭，胡說八道，橫加指責。

他趾高氣揚地說是“代表中央”來審查我，並全部否定我寫的四十八頁材料，指責那個材料不是老實交代，而是“以假亂真”，逼我承認這個材料就是“以假亂真”，逼我承認張學思等人是我迫害致死的。

“中央代表”狐假虎威的這一套，我早有準備。他們根本不是實事求是、心平氣和地來談問題，而是想用高壓政策來壓服我。我不能對他們客氣！

我抓住這個“中央代表”的胡說八道的結論，進行猛烈的反駁，我大聲地說：“你憑什麼說我的材料以假亂真？憑什麼說我不老實交代？你的證據在那裏？你以為你用代表中央的大棒子，用胡說八道的大帽子，就能壓服我，就能嚇住我，做夢！妄想！你根本沒有資格代表中央來審問我……”就在這時，我的心臟病再次復發了，祇感到胸區陣陣刺痛，呼吸越來越急促，豆大的冷汗從額頭流下，我雙手緊緊壓住胸口，再也不能說話了。他們祇好趁機停止審訊。

在復興醫院，每當我身體稍好一些，他們便開始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的審訊，但我始終抓住“中央代表”全部否定四十八頁材料，並定性為“以假亂真”的結論，逐個問題進行駁斥，系統地闡明我的觀點，世豈得他們不能招架，狼狽不堪。

我要他們回答：“我的材料中，寫了四大問題，哪個問題是

‘以假亂真’？每個問題又寫了若干條，哪一條是‘以假亂真’？全文寫了一萬多字，哪一個字是‘以假亂真’？”他們當然是無法回答。

他們又企圖詭辯說：“並沒有全部否定那個材料。”

既然沒有全部否定，我又追問：“那你們肯定了哪一條？肯定了哪一頁？肯定了哪個字？”

他們仍然無法回答。

以後，他們想把這個問題攔在一邊，再說其他問題，我的態度非常堅決，我說：“這是重大原則問題，你是代表‘中央’對我的材料做的結論，若不談清這個問題，其他問題無法談”。

這些人此計不行再生一計，企圖採取換人的辦法，讓別人主持審問，“中央代表”在幕後操縱。我識破了他們的把戲，仍抓住“中央代表”說的“以假亂真”的結論不放，並痛斥所謂“中央代表”。

我說：“你究竟代表哪個中央？是共產黨中央，還是國民黨中央？誰委托你代表中央宣布我的材料是‘以假亂真’？你究竟是中央代表，還是政治騙子？兩者必居其一，請明確答復這個問題。”

他們知道這是重大政治原則失誤，企圖抵賴。但是白紙黑字，兩個記錄員在案記錄，又有十幾個人共同旁聽，怎麼抵賴得了呢？同時我又痛斥其搞“逼、供、信”。

我說：“你以‘中央代表’名義否定我寫的四十八頁材料，逼迫我承認材料是‘以假亂真’，逼我承認張學思等人是我迫害致死的，逼得我當場心臟病發作，差點把我逼死了。此情此景，你們大家都看到。‘四人幫’時的專案組搞逼供，我飽嘗其苦。你們搞逼供，比‘四人幫’時的專案組更為嚴重，更為惡劣。這是我親身比較得出來的。”

這樣從2月相持到6月份，毫無結果。於是，他們採用更惡劣的辦法，想逼我就範。

方块字读书社区

第一、趕我立即出院，回到秦城監獄。五個多月，十幾次的公

安預審，一方是高壓逼供，一方是針鋒相對，依理據爭。當時我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轉，而且相當嚴重，基本上離不開氧氣，離不開急救藥品，離不開醫護人員的監護。而他們根本不管我的死活。這樣更激怒了我。當時我就有一個信念：“鬥死也不折腰”。對付邪惡的“特效藥”，除了跟邪惡堅決鬥爭之外，別無他途。

第二、由總政保衛部某副部長來秦城監獄宣布將我逮捕，要我在逮捕證上簽字。

我說：“已經坐牢八年多來，為什麼現在宣布逮捕？以前八年多算什麼？”

答曰：“過去法律被‘文革’破壞了，現在補此手續，以前八年多也算逮捕。”

我簽字後，把筆摔得一尺多高，表示我的態度。

第三、我被趕回秦城監獄後，拖着重病的身體，立即向監管人員、監獄長要求供給筆和紙，有重要問題要向中央報告。開始幾天，他們根本置之不理。以後我發了脾氣說：“你們這樣做，究竟為什麼？請把你們這樣做的明文規定給我看一看。”他們以後推辭說，已請示上級，尚未答復。簡直急得我快要發瘋了。但又有什麼辦法呢？

到了6月下旬，才給了一支筆和幾張紙。我于6月26日向黨中央寫了一個報告。標題是《請求澄清我的三個冤案》。報告中談了三個問題，一是關於年初我所寫的四十八頁交代檢討材料，受到自稱“中央代表”的人，主觀唯心主義的亂下結論、被誣“以假亂真”的問題；二是關於1976年秋，我揭發康生是“四人幫”一伙而遭到迫害打入監獄的問題；三是關於1967年初我違背軍委決定、違背海軍黨委決定，先公開後秘密保護蘇振華而遭到誣陷的問題。這個報告的重點是講了揭發康生而遭到迫害的問題。

後來，總政保衛部那個副部長對我寫的四十八頁材料給予了重新結論，認為有正確部分，也有錯誤部分。由于不敢再堅持“以假亂真”的結論，不敢再以“中央代表”資格審訊，同時換了人馬，改由范維綱（原海軍老保衛部長）主持公安預審，原來那個

“大草包”不敢再露面了。

范維綱對我說：“希望改變頑固對抗態度，老實交代問題。”

我說：“頑固如此，不頑固也如此，老實如此，不老實也如此。我的態度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我沒有其他態度。我的思想、我的性格、我的脾氣、不管你怎麼壓，怎麼逼，怎麼欺、怎麼騙、怎麼折磨，依然如故，很難改變。”

爲了觀察這幫公安預審人員下一步的情況，我同意回答其他問題。

有一次提審，在談山海關機場問題時，他們把山海關機場幾個當事人用汽車拉到秦城監獄作證。我當時祇觀察他們的言行，並沒有插話。

當他們做完證明，退出審訊室後，我向預審人員說：“你們看到了吧。第一、證人李萬香講話時頭冒虛汗，全身發抖，說話結結巴巴，證明他是心虛有鬼的；第二、最後講話的那個證人（機場場站政委）也說，0點06分的電話中，我曾說過要四個人聯合指示才放飛，證明我當時的指示沒有錯。”

這一下把幾個預審人員又搞得狼狽不堪，無言以對。爲什麼後來在公審時李萬香作證講話，氣壯如牛，那是經過半年訓練的“豐功偉績”。

不知爲什麼，到了8月上旬，在我並未發病、並未搶救，也並未要求住院的情況下，忽然又把我由秦城監獄送回復興醫院。我心中暗想：這絕對不是爲了給我治病方便，可能“十二級臺風”還在後面。我估計我不再抓住“中央代表”的“以假亂真”不放，而開始談其他問題了，或許才放寬一點，誘你鑽進他們早已定好調子的框框之內。

公安預審一直到9月初才結束，但如同進入萬山叢中，一山放過一山攔，緊接着是檢察預審。

檢察預審的負責人是海政檢察院副檢察長張肇圻，此人我也認識，是海司原航保處（方塊字讀書社區）流人物。檢察預審就是公安預審的翻版，逼供、詐供、誘供、騙供，內容如出一轍，手

法如出一轍，如同出自一名導演的兩幕戲，沒有絲毫調查研究和實事求是的精神可言。

在公安和檢察預審的全過程中，凡是他們提出的虛假的、無中生有的、無限上綱的、誣陷的問題，均被我用事實、用道理，針鋒相對的加以駁斥。這些都是有錄音、有記錄可查的。每份記錄均經過我簽字存檔的。

一直到9月底預審全部結束。八個月之內，共提審七十多次，心臟病發作六次之多，體重下降二十六斤。醫生們甚至以為我患了癌癥。老實說，如果不是多數時間住在醫院，治療條件稍好，不然的話，恐怕折磨得早已命歸黃泉了。大難不死，絕處逢生，真是有福之人。“滿目青山俱是樂，一時屈辱無須驚”。

二、請求澄清我的三個冤案

1980年6月26日，在公安預審的高壓下，我在監獄中向黨中央寫了一份報告，揭露公安預審大搞“逼、供、信”的惡劣行經，再次向黨中央表明我的態度。

這份給黨中央的報告，實際上也是我的“遺書”。因為當時我決心以死抗爭到底，絕不低頭。我就是被折磨死了也要喊冤！

《請求澄清我的三個冤案》

黨中央：

關於我1980年初所寫四十八頁交代檢討報告，受到自稱中央代表主觀唯心主義，顛倒是非，強加于人，以假亂真的結論問題；關於我1976年秋，揭發康生是“四人幫”一伙，而被打入秦城監獄問題；關於我1967年違背軍委文革決定和海軍黨委決定，先公開後秘密保護蘇振華而遭到誣陷的問題。以上三個問題，我已多次向提審人方塊字讀書社區至今未見一個字的答復。

對於四十八頁材料問題和蘇振華問題，我向提審人員講的比

較清楚，有記錄在案，應該隨時可查。對於康生問題，雖然基本情況提到了，但我的思想觀點沒有全部講出來，因此有必要補充如下兩個問題：

一、我揭發康生是“四人幫”一伙，是揭發對了，還是揭發錯了？是揭發有功，還是揭發有罪？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經過三年多的實踐，尤其經過中央對康生的揭發批判，舉國上下人人都很容易回答這個問題，結論是揭發康生是“四人幫”一伙是沒有罪的。改變毛澤東的“隔離審查”決定，把我投入監獄是不正確的。

二、我揭發康生是“四人幫”一伙之後，為什麼把我打入十八層地獄？黨的政策是立功贖罪，為什麼對我是立功加罪？

我揭發康生是“四人幫”一伙，算不算立了功？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至少不是犯了過。為什麼？我的理由有兩條：

一是有“先見之明”。我是1976年秋打倒“四人幫”之後，大約是10月底就向當時看管我的負責人揭發康生是“四人幫”一伙的。《人民日報》批判“顧問”，批判“理論權威”，大約是在1978年冬。我的揭發比《人民日報》提早兩年以上。當我揭發康生是“四人幫”一伙時，《人民日報》還大登特登康生的照片，拼命宣傳康生。大約是1977年2月某日《人民日報》還刊載一篇短文，為康生在“九大”時要在中央常委名單中增加江青進行詭辯。

實際情況是“九大”時，康生向毛主席提出：中央常委中增加江青。毛主席聽了這個意見很生氣，手拍沙發說：“我不能同她在一起工作，我受了她半輩子的氣。”把康生頂了回去。所以《人民日報》的那種詭辯，祇能欺騙那些不了解情況的人。古人曰：千智可能有一失，千愚可能有一得。我是千愚之人，但在某一件事情上，也可能是對的。對康生的揭發即是“千愚一得”。

二是有膽量，有勇氣。康生生前是黨中央副主席，死後中央對他的悼詞又評價非常高。據我看，某些地方超過對周總理悼詞的評價。什麼“堅定的反修戰士”等等，在周總理的悼詞中都沒

有這樣的提法。因此康生在當時也是一個龐然大物。他雖然死了，但他在黨內的影響還存在，他還有一伙忠實的追隨者。沒有膽量，沒有勇氣，是不敢惹這個龐然大物的。

陳毅在文革初期講了一句“延安搶救運動擴大化”，康生恨之入骨，罵陳毅是反對延安整風運動。直到九屆二中全會（廬山會議）時，康生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還罵陳毅是一個老反革命。其原話是：“陳毅這個老反革命嗅覺真靈，這次又跳出來了”。當時所有政治局委員都在場。

所以我揭發康生並不是沒有考慮後果的。但我有膽量，有勇氣揭發，主要是相信兩條：

1、我相信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既然把“四人幫”打倒了，就一定要把“四人幫”的後臺、靠山、謀士推倒。蓋棺不能定論，因為他的醜惡影響流毒存在。不推倒就很難肅清流毒，就很難平民憤。

2、我相信徹底的唯物主義是無所畏懼的觀點。我認為我手裏有真理，我掌握了一部分康生與“四人幫”，特別是與江青的確實材料。

康生介紹江青與毛主席結婚時，我正在延安，當時我聽到的流言蜚語不少。搶救運動時，我雖不在延安，但我也聽到許多不滿情緒的談論。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所看到、聽到的就更多了。特別是在“九大”中的兩次惡劣表演，遭到毛主席的痛斥，給我的印象尤深。一次是大會選舉中委時，江青少了六票，康生主張追查，看誰不投江青的票，遭到毛主席的痛斥：“那還追查得，違反黨章！要犯政治原則錯誤。”一次是要提江青為中央常委，又遭到毛主席的痛斥。

文革初期，我誤認為江青的所作所為，可能代表毛主席。直到十二中全會時，我才真相大白，她的靠山是康生。

是不是對我立功加了罪？我的回答也是肯定的。

主要表現是兩個**方块字读书社区**是“四人幫”一伙後不久，就把我從原隔離審查所在的衛戍區部隊，投入秦城監獄，打入

十八層地獄。第二把我所有的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等書籍、手稿以及治病的藥品、器具全部抄走沒收。有人會說，關押在衛戍區部隊和關押在秦城監獄性質是相同的。對，性質是相同的，但程度是不同的。我關押在衛戍區部隊時，我可以自由閱讀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我可以自由看歷史書籍，包括中國歷史、世界歷史和古代歷史；我可以自由看近代和古典文學作品，包括紅樓、三國、唐詩、宋詞；我可以看報和參考消息；我可以自由寫字，“文房四寶”俱全，願意寫什麼就寫什麼，願寫多少就寫多少；我可以在院內種菜栽花，既可勞動消遣解悶，又可獲得勞動果實，改善生活。至于我的飲食情況和治療情況，那比秦城監獄更是好得多了。

提到秦城監獄，除了重門鐵窗，六面碰壁外，其他就微不足道了。據說對我的生活還有點特殊照顧（我不覺得有什麼特殊照顧，體重降了二十多斤）。

總之，三年多時間，我的身體垮得特別快，最後住了半年醫院，目前情況稍有好轉。

除了上述三個冤案請求澄清之外，我還有其他不少問題請求澄清。第二批需要澄清的問題也是三個。這是人命關天的問題，並且在《人民日報》見了報的。雖然沒有對我指名道姓，但一提林彪死黨，林彪在海軍的死黨，人人都知道是我的代號。

這三個問題是：（1）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跳井自殺是不是我迫害致死的？有什麼真憑實據？（2）海軍參謀長張學思被關押，死于醫院中，是不是我迫害致死的？有什麼真憑實據？（3）國家海洋局局長齊勇跳樓而死，是不是我迫害致死的？有什麼真憑實據？如果都有確切證據證明是我迫害致死的，我願意賠命謝罪。否則我保留以後提出不同意見。我要申冤！除了上述六個問題待澄清之外，我還有其他問題，將繼續提出，目前可以暫時擱下。

方块字读书社区 李作鵬

1980年6月26日

第四十三章 公審實錄

一、起訴書中的五大“罪行”

1980年9月29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決定，“鑒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是特別重大案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建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特作如下決定：一、成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進行檢察起訴。二、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

明眼人不難看出，在未開庭審判前，全國人大的這個決定，就已經從標題到內容，把審判定性為“反革命集團案”了。按照這

個定性，被押上審判臺的被告人，就是“反革命集團”的主犯了。實際上不再用開庭審判，這些被告人已經被判決了。

對我來說，則是被人所迫，以犧牲自己一生的追求、理想、奮鬥、成就、名譽為代價，而成為替他人承擔罪名、對歷史承擔責任的“替罪羊”。

這樣大張旗鼓、興師動眾的電視轉播的大審判，在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
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第五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鑒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是特別重大案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建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特作如下決定：

一、成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進行檢察起訴。

任命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黃火青兼特別檢察廳廳長，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喻屏、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史進前為副廳長；馬純一、王克林、王雪、王振中、王德勝、王耀青（女）、馮長文、曲文達、朱崇正、江文、許耕峰、李天相、沈鳳真、侯中加、張基忠、張慶芳、黃慶昌、周們、謝樹敏、袁朝江、耿飭為檢察員。

方塊字讀書社區

《人大決定》的影印件，標記處是作者所畫。

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1980年11月2日，特別檢察廳提出了起訴書。副本于11月13日送到了我的手裏。全文四個大問題共四十八條，兩萬多字。其中直接與我有關的問題共有五處，抄錄如下：

1、“一九六八年四月三日，李作鵬伙同海軍第二政治委員王宏坤、海軍政治部主任張秀川寫材料，誣陷‘賀、葉配合劉、鄧、陶企圖篡軍反黨’”。

2、“林彪、葉群、康生、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等，誣陷羅瑞卿‘裏通外國’，是‘內奸’，‘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對海軍‘懷有巨大陰謀’”。

3、“李作鵬伙同王宏坤、張秀川誣陷、迫害海軍大批幹部、群眾。一九六八年一月李作鵬提出專案工作‘是共產黨打國民黨’。同年十月又說要‘猛打、猛衝、猛追’。李作鵬直接誣陷、迫害的有一百二十人，雷永通等三人被迫害致死”。

4、“……六日，李作鵬在武漢得到武漢部隊政治委員劉豐關於毛澤東主席在武漢同一些負責人談話內容的密報，當天返回北京，分別告訴黃永勝、邱會作”。

5、“林彪叛逃前，周恩來總理決定，256號專機必須有周恩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四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飛’，但李作鵬給海軍山海關機場場站下達的命令篡改為‘四個首長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才放飛’，並說‘誰來指示要報告我，要負責任’。九月十三日零時二十分，256號專機準備起飛、尚未發動時，場站領導人打電話請示李作鵬：飛機強行起飛怎麼辦？李作鵬不採取任何阻止起飛的措施，竟推托說：‘可直接報告請示總理’，以拖延時間，使林彪得以趁機起飛。李作鵬又塗改電話報告記錄，掩蓋罪行”。

4013

副本

中華人民共和國
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
起 訴 書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日

反復看完了起訴書，對於強加給我的這些“罪名”，心裏有了底。在將近十年的時間裏，國家的專政機構對我從身體上到精神上，從心理上到生理上，從我個人到整個家庭，施以高壓與摧殘，真是“烏雲滾滾寒流急”，大有將我碾成齏粉之勢。但真正揭開泰山壓頂般的問題蓋子，那裏邊到底有哪些問題能够構成“罪行”？有哪些真憑實據能够證明“罪行”？

所有從那個時期經歷過的人心裏都明白，在毛澤東、黨中央發動和領導的那場全民投入的、狂熱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這一切問題的發生與發展，並不是孤立的，而是有背景、有根源的，祇要是客觀的、全面的、實事求是的看待這些問題，答案自在人心中。

11月18日，我在起訴書的空白處用一首白話詩表達我看完起訴書的感受：

評起訴書

1980年11月18日

妄圖欺世難欺我，落井投石心腸惡。
略舉一例雷永通，造謠誣陷千萬確。

我在第26頁“李作鵬直接誣陷一百二十人，雷永通等三人被迫害致死”後，重重地寫上“完全偽造”四個字。（見圖1）

1980年11月17日，我接到特別法庭的傳票及法庭規則（見圖2）。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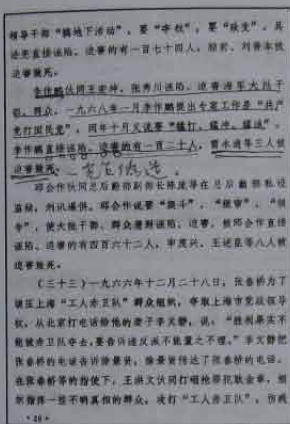


圖1



圖2

票上是這樣寫的：“1980年特法字第1號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一案”，並定於11月20日下午3時到特別法庭接受審問。

那天，他們用汽車把我拉到公安部禮堂。一進門，祇見得法庭布置森嚴，審判區軍警林立。

審判臺上，一邊坐着特別檢察廳廳長、副廳長、檢察員，一邊坐着特別法庭庭長、副庭長、審判員。審判臺的一側坐着記錄員，另一側坐着辯護律師。在被告席的後面，是一片各種各樣的旁聽人員，及文化大革命受害的家屬。另外還有不少記者，忙着攝影、照相、錄音。

這一天，所有活着的十名被告均到場，聽取特別檢察長黃火青照本宣讀起訴書。因為人多，禮堂小，室內溫度特別高，空氣特別壞，聽到一半，我就感到有心臟病發作的癥候，心慌胸悶，呼吸越來越困難。醫護人員將我扶到一旁，進行吸氧、打針等措施搶救。稍有緩解，我仍坐到自己的被告位置一直堅持到整個過程的結束。

二、四次庭審和一次辯護陳述

特別法庭第二審判庭由伍修權主持，對我個人單獨進行了五次公開庭審。

第一次庭審。

1980年11月25日下午，對我進行第一次公開庭審。庭審調查的內容是關於毛主席巡查武漢談話失密問題。法庭上宣讀了劉豐和黃永勝、邱會作的證言。

我如實回答了審判員提出的“劉豐告訴你毛主席談話內容是什麼？”“你回北京後又告訴了什麼人？”等問題。

當審判員問我為什麼要把毛主席的講話內容告訴黃永勝時，我當時感到這個問題問的可笑，我心想，告訴黃永勝有什麼錯？告訴黃永勝、邱會作我就犯了“大罪”嗎？我回答說：“黃永

方块字读书社区

勝是我的直接上級，他是總長，我是副總長，毛主席這麼重要的指示，我應該向他報告。”

當時在場的特別檢察廳廳長黃火青突然插話說：“你明知黃永勝與林彪、葉群的關係，是有意告密。你不要利用工作關係來掩蓋陰謀活動！”我心中立刻火冒三丈，我反駁說：“我不知道你說林、葉與黃是什麼關係？也根本不存在什麼有意告密，更沒有陰謀活動……”。我正準備反擊黃火青的話，可未等我的話講完，二庭庭長伍修權立刻打斷我的講話說：“不要多羅嗦”。當時我真想要再回擊伍修權，法律明文規定允許被告辯護，你為什麼不讓我把話講完？什麼是羅嗦？哪一句是羅嗦？我想問問黃火青：“有什麼證據說‘我有意告密’？又有什麼證據說我‘陰謀活動’？”我向我的直接上級，原原本本地報告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與“有意告密”、“陰謀活動”之間能構成法律上的因果關係嗎？堂堂的特別檢察廳廳長，就是這樣將一件非常普通，非常正常的上下級談話硬說成是“告密”，是“陰謀活動”，是我的一條“罪行”。是無知？還是有意？

退庭後，我將伍修權阻止我發言的事告訴了我的辯護律師，並正式通知他，如果以後再發生此種現象，不按照法律保護被告人應享受的權利，我就要當場回擊。

第二次庭審。

1980年11月28日下午進行第二次庭審。庭審調查的主要內容是關於處理山海關機場林彪叛逃問題。江華、黃火青、伍修權等大人物均到庭坐鎮。法庭以明顯地定好調子的態度出示了兩三份證據，並由他們指定的山海關機場場站的當事人出庭作了證言。

審判員首先提問，1971年9月12日23點10分左右，周總理向我說的四點電話指示執行情況。

審判員說：“周總理給你的電話指示是‘四個人一起下命令飛機才能起飛’，你算一位首長指示放飛才能放飛”。

芳塊字讀書社區

我回答：“我不記得周總理的電話指示中有‘一起下命令’這句話，總理講空軍那架飛機的行動，要聽北京我的指示、黃總長的指示、吳副總長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飛。”

我堅決否認篡改了總理的電話指示。我說：“我如實傳達了總理的電話指示。”

在山海關機場場站李萬香出庭作證時說，我在23點35分和0點06分兩次在電話中說“其中任何一位首長指示放飛才能放飛”，並說兩次他都向我復述了電話內容。

我回答：“我不必要在半個小時內，重復兩次內容完全一樣的話。實際情況是：23點35分傳達總理指示後，我補充了‘四個首長中，其中任何一個首長指示均可放飛’的話。0點06分我說的是‘四人聯合指示才能放飛，’的話。後一次的電話是對前一次電話的修正，這是我打兩次電話的目的。”

我又說：“23點35分的電話，值班員向我復述了電話內容。但0點06分的電話對方沒有復述，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聽清楚我的電話內容。這也是我的失誤。”

審判員又說：“事後李作鵬又塗改電話報告記錄，掩蓋罪行。”

我回答：“機場的電話記錄我看了以後，認為記錄我0點06分的講話不對、不準確。”我說：“我在報告中修改了機場場站值班員0點06分對我電話指示內容的記錄。修改之後，我要劉繼祥秘書同山海關機場再校對一下。經雙方再次校對後，劉繼祥秘書報告我說：‘校對結果同你修改的完全一致’。這樣我才在報告上簽字，並報總理。”

同時我要求法庭出示我呈送給周總理，並經總理親自圈閱後，退我存檔的那份報告的全文內容。我說：“這份報告是最及時、最全面、最準確的向中央和總理的報告，這份報告是當時處理山海關機場林彪叛逃的全過程中，總理、我和機場場站之間的全部通話的如實記錄。”

方块字读书社区

這份報告（特別是報告的前半部分，總理和我與山海關機場

數次通話情況記錄)本應該是處理山海關機場問題的最原始、最直接的證據,它不僅能說明事實真相,而且能說明總理看後的態度。這樣一份極其重要且特別能說明問題的證據,特別法庭始終未拿出全文(我記得法庭當時祇拿出了那份報告的後半部分的某一頁,即有關飛機強行起飛內容的影印件給我看)。

我在法庭上又要求我的秘書劉繼祥到庭作證,因為劉秘書一直協助我處理機場問題,這樣重要的證人他們也不答應出庭。

在對我最關鍵的“罪狀”進行審問時,最關鍵的證據、最關鍵的證人全都不能見天日,這到底說明什麼?

第三次庭審。

1980年12月3日,第三次庭審的內容是關於我同王宏坤、張秀川于1965年11月給林彪寫材料誣陷羅瑞卿問題、1968年4月向林彪寫材料誣陷賀龍、葉劍英問題和1967年7月向林彪寫材料誣陷張學思問題。當庭出示了三份材料的復印件和王宏坤、張秀川等人的證言。

我承認是有此事,但事出有因。不能把這些“誣陷材料”置於其大背景之外,也不能在衆多人寫的“誣陷材料”中因人而異的搞雙重標準。沒有了“大背景”和“衆多人”,就談不成這些“誣陷材料”的起因、過程和結果,就無法搞清楚,到底誰是誣陷的最大制造者,誰是誣陷的幕後總指揮者。

第四次庭審。

1980年12月4日,這一次庭審圍繞關於我同王宏坤、張秀川誣陷迫害海軍幹部問題進行。法庭出示了十一份證據,有一些材料有我的圈閱和批注,但沒有一份證據能夠證明是我直接誣陷迫害的。至於雷永通等三人被迫害致死,更無任何直接的或間接的證明。

但是我還是承認“要負領導責任”。

雷永通之死的真相,方峽字讀書社區許世友司令員最清楚,他曾兩次派人到海軍就此事表示道歉。在法庭上,我要求許世友到

庭作證，他們不敢答應我的正當要求。

從特別法庭開庭到四次對我單獨庭審，前後經過了整整半個月。這半個月把我的身體徹底搞垮了。雖然醫生每天給我吃藥、吸氧，但胸悶心慌、心區疼痛、血壓升高、頭疼頭暈、四肢無力的癥狀不僅不見好轉，而且有加重的趨勢。醫生令我卧床休息，要求我少說話、少看材料、少寫東西。

但是，我知道不久就要開庭，進行最後的辯護陳述了，因此我每天在病床上帶病堅持寫自我辯護提綱。辯護提綱主要是根據起訴書的指控和四次庭審情況，逐條進行反駁。辯護提綱大致內容為：

1、關於“失密”問題。我強調，第一，不是我主動向劉豐了解主席講話情況，而是劉豐主動告訴我的；第二，我與黃永勝是上下級關係；第三，我曾告訴黃永勝不要告訴葉群和吳法憲。我從動機到目的都不存在“有意告密”，更沒有證據證明是“掩蓋陰謀活動”。

2、關於山海關機場問題。我強調這個問題比較複雜，原因是涉及到總理的四條指示。我可以承擔全部責任，但保留意見。希望將所有材料保存起來，讓歷史學家去做結論。

3、關於所謂誣陷賀龍、葉劍英、羅瑞卿、張學思等人的問題，我強調，要考慮大環境是在文革期間的“四大”中發生的，當時有當時的特殊情況，是事出有因的。我強調，我是違背軍委文革小組的決定，冒着風險保護了蘇振華的。我特別強調，張學思被逮捕并病死，說成是我“迫害”的，毫無根據。

4、關於“誣陷、迫害一百二十人”的問題，要看背景，要有區別。這些問題同樣是發生在文革期間，有些人是中央決定，并與中央專案組審查的案件有牽連而揪出來打倒的；有些人是中央軍委和軍委文革小組決定揪出來打倒的；有些人是蘇振華主持常委時，經常委決定揪出來打倒的；有些人是我主持常委時，經常委集體決定（至少包括蕭勁光在內的四個以上常委同意），并報

中央軍委和軍委文革小組批准後打倒、半打倒的。還有一種情況是，我在某些材料上的批語，祇講了某些現象，根本沒有點任何人的名，但下面批鬥了一些幹部。

我認為，對“誣陷、迫害”的人和事，要每個人、每件事的嚴格甄別，區分對待。起訴書中籠統說我“直接誣陷、迫害的有一百二十人，雷永通等三人被迫害致死。”完全不符合事實。我要求對“直接”兩字做出準確的解釋，我要求提供受誣陷、迫害的一百二十人的名單和旁證材料，我要求指出除雷永通之外，另兩個“迫害致死”的人是誰，法庭不僅不出示證據，連另兩個“死者”的姓名我至今都不知道。

斷斷續續地寫了一周左右，完成了自我辯護發言的提綱。之後，我一邊繼續治療，一邊等待開庭。此時的病情沒有好轉的跡象。

第五次庭審。

1980年12月22日下午，第五次開庭，進行法庭辯論和最後陳述。

首先，公訴人講了一篇又長又臭的“公訴詞”。在那份公訴詞中，什麼“以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的、篡黨篡國的反革命罪惡活動”，什麼“參加組織反革命集團，陰謀顛覆政府”，什麼“篡改總理的命令，故意拖延時間，使林彪得以乘機外逃”，什麼“誣陷、迫害海軍幹部的大量鐵證在案”等等，簡直是一派胡言！

我坐在被告席上，越聽越生氣，越聽心中的火越大。我極力的克制自己，但胸區已開始陣陣的刺痛。

公訴人講完後，是我辯護發言了。我預感到，今天我可能要在法庭上犯心臟病。我要抓緊時間，表明我的主要態度和觀點。

我辯護發言內容的主導思想有三條：

第一、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實事求是，有錯認錯，有“罪”認“罪”。起訴書中所指出的有關我的問題，凡是有事實根據的，應當承認；無中生有、無限上綱、與事實有出入的，應當申辯。我絕

方塊字讀書社區

對不為“過關”而下跪，不為“寬大”而撒謊。同樣也不在確切的事實面前進行狡辯。

第二、從大局出發，不以個人得失為標準，而以黨的利益、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為標準。個人的生死榮辱微不足道，國家大局是第一位的。在這個思想指導下，我咬緊牙關，決心犧牲自己，承擔起山海關機場林彪逃跑的責任，以此掩蓋周恩來總理處理不當的事實，以免總理的負面影響公布于世。我在法庭上就山海關機場這個問題祇講了一句：“保留意見！保存資料！”

第三、起訴書中將我的問題無限上綱為“反革命集團主要成員”、“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等等罪名，這是最大的政治原則問題！我絕對不能承認！

在辯護發言中，我對涉及到我的問題，基本上按辯護提綱都做了說明，並表示了態度。在特別法庭的特殊環境下，我的想法和做法祇能是：你說你的，我說我的，你定你的案，我保留我的意見。

在辯護中，迫于環境與自身思想上沉重的壓力，我違心承認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我犯有“罪行”如下：

第一、參與誣陷羅瑞卿，我承認有“罪”。

第二、參與誣陷賀龍，我承認有“罪”。

第三、海軍“文革”前期，我執行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路線，不但有領導責任，也有直接責任，我承認有“罪”。

第四、處理山海關機場林彪強行起飛問題，開始我承認有錯，然後承認有“罪”。

之後，律師張思之、蘇惠漁發表了辯護意見，我記得有這樣幾條：

1、沒有參與制定《五七一工程紀要》之類的武裝政變的策劃，沒有證據證明直接參與和策動武裝政變的反革命活動；

2、沒有證據證明，向黃永勝密報毛澤東南巡講話的目的是為了促使林彪採取行動殺害方塊字讀書社區有證據證明參與了殺害毛澤東主席的種種陰謀策劃；

3、沒有證據證明，參與南逃廣州、分裂中央的犯罪活動；

4、誣陷羅瑞卿、迫害海軍大批幹部群眾的罪行，有些是在林彪的直接指使或授意下進行的。

在開庭之前，特別法庭曾徵求我的意見，要不要委托辯護律師。開始我是堅決拒絕。以後經過勸說，列舉了一些可能發生的情況，比如我的身體不好，有時因病不能講話，律師可以代我念稿子，遇到法律程序不明白的問題，他可以給我解答，這樣我才同意委托辯護律師。但是我內心真正要申辯的問題，關於我是不是“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主要成員”，我是不是“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我是不是“要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對這些重大政治原則問題，律師根本不敢涉及。我知道，這些問題誰也不敢說三道四的，因為這是中共中央定的調子。

雖然律師不敢涉及我真正要申辯的核心問題，但律師的發言還是負責的、實事求是的。應該說在那種場合下，律師面對着全國觀眾，也是需要講真話的勇氣。聽了律師的發言，我的心情稍稍好了一些。

律師發言後，是我最後陳述。我拿出準備好的辯護提綱，開始發言。也許是開庭時間太長了，我的體力已經不支，發言中途，心臟病又一次發作，緊急退場搶救，在治療中，法庭建議我不要繼續講了，我沒有同意，稍微恢復後，我堅持當庭把原準備陳述的主要內容講完：第一、劉豐的證言完全是偽造的，是百分之百的謊言；第二、1971年9月12日夜至9月13日凌晨，我處理山海關機場的問題，起訴書所指控的內容與呈周總理的原始電話記錄存在矛盾，還沒有得到實事求是的解決；第三、說張學思是我迫害致死的，我堅決不承認；第四、在海軍迫害幹部的問題上，需具體分析、區分對待。

最後，法庭宣布“等待宣判”。

幾天後，律師找我徵求對他們辯護的意見。我說：“你們的發言對我有一定幫助，但幫助不大，你們起了敲邊鼓的作用，但沒有敲到鼓的中心點上。”我又說：“你們不可能對我幫助很大，我

方块字读书社区

心裏明白，不能怪你們。我還要謝謝你們。”

最後我告訴他倆，我寫了一首五言詩，評論他們的發言。張思之律師急不可待地要求給他看看，我說：“二十年後，你們可以看到。”張思之律師說：“我等二十年。”

三、判 決

1981年1月25日上午，在公安部禮堂召開了宣判大會。特別法庭庭長江華宣讀《判決書》，全文將近一萬五千字。

判決書總綱是：本庭確認，以林彪為首的反革命集團和以江青為首的反革命集團，都是以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為目的而進行陰謀活動的反革命集團。這兩個反革命集團，有共同的推翻我國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包括國家機構、軍事機關，在本案中也包括上述機構的領導力量中國共產黨）的犯罪動機和目的，有共謀的犯罪行為，形成一個反革命聯盟。

在“犯罪事實和應負的刑事責任”條文中的第（八）條，是對我的判決，全文如下：

被告李作鵬，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是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李作鵬積極參與林彪奪取最高權力的活動。

一九六八年四月，李作鵬誣陷賀龍等人“篡軍反黨”。李作鵬在海軍點名誣陷迫害一百二十名幹部。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十一時三十五分和十三日零時六分，在林彪、葉群叛逃前，李作鵬兩次篡改了周恩來總理的命令。十三日零時二十分，海軍航空兵山海關場站站長潘浩打電話緊急請示：飛機強行起飛怎麼辦？李作鵬沒有採取阻止起飛的任何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飛機叛逃。事後，李作鵬修改電話報告記錄，掩蓋罪行。

方块字读书社区

被告李作鵬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八條組織、

交给林立果。使林立果得以组织特赦反革命集团谋逆毛泽东主席、策动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联合舰队”。

被告人吳法憲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八條
出獄。領導民衆革命勳章，第九十二條頒發給政府部，第
一百三十八條頒發給勳章。

(八) 被告李作鹏，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李作鹏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运动。

一九六八年四月，李作鵬诬陷某等人“篡军反党”。

李林鵬在海軍立名，沉船迫援一百二十名干部。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十一时三十五分和十三日零时十分，在韩起、叶鹏航遇害前，李作鹏两次传达了周总理赴港的命令。十三日零时二十分，海军航空兵山海关站站务员拨打电话紧急请示：飞机强行起飞的怎么办？李作鹏应声立即阻止起飞的任何措施，就按韩起得以用飞机逃跑。事后，李作鹏修改电话通话记录，篡改飞行。

被告人李作鹏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招徕颠覆政府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

觸犯刑律一舉？

放屁 29

图 1

是針對山海關機場問題的。

判決之後，我繼續關押在復興醫院。經過兩個月的公審，我已經身心極度疲憊，心臟病一次接一次地發作，天天離不開氧

領導反革命集團罪，第九十二條陰謀顛覆政府罪，第一百三十八條，誣告陷害罪。

判處被告人李作鵬有期徒刑十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我對上述沒有任何事實
證據的判決堅決不能同意！

判決書第29頁第(八)條(見圖1),是對我判決的原文。文旁,我寫了兩句話,第一句“放屁!”是針對判決條文的,第二句“觸犯了刑法那一條?”

阿拉伯盟军和波兰军队，镇压迫害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社会财富群众，毒害广大青少年，杀害少数民族人民，践踏生命财产和自治权。想通过革命集团活动进行毁灭，同谋杀革命无伦比。江青革命集团活动造成民族灾难，想通过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同历史过不去，毁灭全国各个地区各个阶级，使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受到极其严重的危害，使我国经济和其他各项事业遭到严重的破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危害国家和社会的行为，也根据当时的法律、法令，还是按照自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构成了犯罪。本案的犯罪事实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犯下的罪行，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请最高人民法院各审判人员遵照宪法的规定，秉公裁判。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重創的紅衛兵軍閥下，

林彪、江青在革命集团内部搞篡权夺势，组织我国人民反党反社会主义。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林彪向全军宣读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方针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镇压、打击、专政、镇压。”“镇压是手段，打击是目的，镇压和打击”。

書

方块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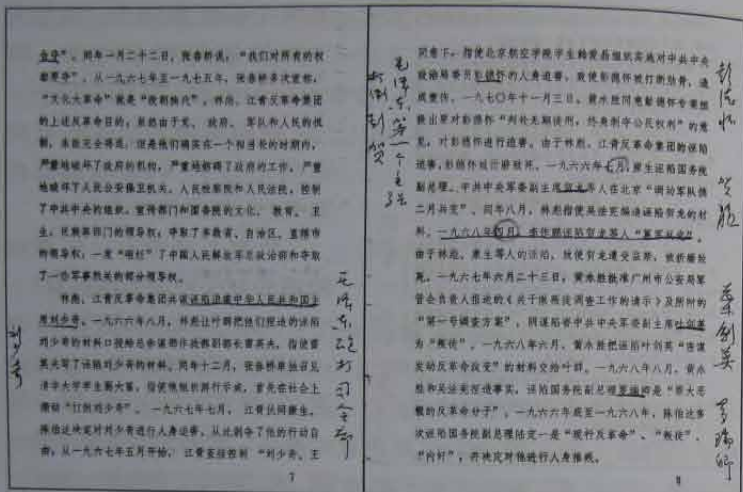
圖 2

氣。

我躺在病床上，一遍又一遍地看這份終審判決的《判決書》。

從判決書第6頁開始，就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的犯罪事實”。我連續在文旁標注我的看法：在第6頁（見圖2）“林彪確定奪取黨和國家領導權”的文旁注：

“毛澤東號召全面奪權”；在第7頁（見下頁圖1）“誣陷迫害”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文旁注：“毛澤東炮打



司令部”；在第9頁（見圖2）關於彭德懷、賀龍、葉劍英、羅瑞卿問題的文旁注：“毛澤東第一個主張打倒彭賀”。

因為所發生這一切的禍根，就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我始終認為“冤是有頭的，債是有主的”，我堅持“既不欠別人的債，別人的債我也不扛”的態度。

反復看完之後，我在判決書上寫到（見下頁圖）：

我反對判決中的幾個原則問題

1. 有什麼事實證明“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
2. 有什麼事實證明“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是反革命集團的主犯”？
3. 有什麼事實證明“積極參與林彪奪取最高權力的活動”？
4. 關於强行起飛問題，我在申辯中的理由是充分的，站得住腳的。同時在當時情況祇能請示總理，不可能有其他措施。如果總理事先告訴我林彪可能逃跑，那我可以保證林彪跑不掉。退一步說，按現在說法又觸犯了刑法哪一條？
5. “掩蓋罪行”問題，在9.13我向總理報告中，兩種相互矛

方块字读书社区

[illegible]

1946年一个冬夜，在铜川时，答李为什么有的人是反革命，有的人则是解放军的干部？
 在当时的解放战争期间，西南人公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王 华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王 华

副局長	伍修权	曹汉周	黄玉昆	
判判員	王文正	王志强	王战平	甘 萍
	尤爱清	宁晓军	司徒琴	曲育才
	朱理之	任惠庭	任耀云	刘菊庭
	刘能光	许崇洪	严信臣	苏子廉
	罗空三	李研晔	李 毅	吴茂祥
	代 靖	阮世崇	阮 范	范 之
	殷卓雄	鄒同治	鄒朝勉	高 斌
	曹漢士	曹德潤	顧子軒	

事件証明与原本无异。



150 卷之三

19

盾的說法同時存在。我究竟向誰掩蓋了罪行？修改電話報告記錄，為什麼我没有把相互矛盾（的）說法修改？

6、在一個文件上，幾個人同時簽字，為什麼有的人是反革命，有的人則仍是解放軍高級幹部，應如何解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欲加人罪，何患無詞。因為可以造假扯謊，欺騙不明真相的人。天呼！歷史呼！冤情幾時澄清，相信總有一天會澄清。

7. 評判決

“九二九八”¹強壓頭，
毫無證據窮理由。

事未觸法何罪有，輕罪重判泄私仇。

同時，我在判決書的封面上寫下了防止萬一的遺囑：“如果我突然死亡，此件務請交給我的子女，由他們將我對判決書的看法抄送黨中央。 李作鵬囑 1981.1.27”。

我寫遺囑的目的，一是防止突然犯病死亡；二是無

位1,“九二九八”指刑法92,380條。而“九一三”指處理“九·一三”事件問題究竟觸犯了刑法哪一條?我沒有查到。

論五十年，還是五百年，讓我的子子孫孫知道我的冤情，替我申冤。

應該講，與特別檢察廳對我提出的起訴條文相比，特別法庭對我的終審判決條文確有了一些不同之處。最大的不同有兩處：一是沒有寫“雷永通等三人被迫害致死”這樣一條大罪；二是在“九·一三”事件中不再提“……竟推托說：‘可直接報告請示總理’，以拖延時間”。

此外，判決書上沒有再寫“誣陷羅瑞卿對海軍‘懷有巨大陰謀’”和“……六日，李作鵬在武漢得到武漢部隊政治委員劉豐關於毛澤東主席在武漢同一些負責人談話內容的密報，當天返回北京，分別告訴黃永勝、邱會作”這兩條起訴書中列出的“罪行”。

其次，將《起訴書》中寫的“直接誣陷迫害的有一百二十人”，在《判決書》中改寫成“點名誣陷迫害一百二十名幹部”；將起訴書中寫的“誣陷‘賀、葉配合劉、鄧、陶企圖篡軍反黨’”在判決書中改寫成“誣陷賀龍等人‘篡軍反黨’”。

十年來，在中央專案、公檢預審中，那些不再寫進《判決書》中的所謂“罪行”，却把我折磨的死去活來，為什麼《判決書》與《起訴書》祇相隔兩個多月，就不再提了呢？《起訴書》所列那些毫無證據的，致死人命的“滔天大罪”，是不是對我的誣蔑和誹謗？

《判決書》中的某些變化，並沒有改變公審判決的實質。我的心情仍然十分沉重。

第一、《判決書》中的某些變化，是我十年來，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始終堅持講真話，堅持真理的結果，是我同那些誣蔑誹謗的惡劣行為堅決鬥爭的結果。

第二、“九·一三”事件仍然成為我最關鍵的“罪行”。

第三、判決書中“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是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李作鵬積極參與林彪奪取最高權力的活動。”的鋼鐵大帽子也壓在我的頭上，並按照鋼鐵大帽子的框框又判了我“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陰

謀顛覆政府罪”和“誣告陷害罪”這樣三條重罪，並判“有期徒刑十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這樣的重刑。

“罪行”內容可以刪減，但無限上綱的鋼鐵大帽子不能摘，無限上綱的重罪重刑不能減。我認為這份判決書不是“應負刑事責任”的刑事判決書，而是讓我永遠做“替罪羊”，在政治上永遠不能翻身的政治判決書。

第四十四章 自辯和沉默後的話

公審就這樣結束了。我被特別法庭判了刑！要坐十幾年大牢！我被剝奪了一切！我被流放他鄉！

轉眼已然過去了二十多年。盡管把我打入了地獄，但我的內心是坦然的。我自信，我的所作所為對黨、對國家、對人民問心無愧。

在隔離審查和獄中的十年中，我經過長期的苦思與分析，對“九·一三”事件的前前後後，早已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和判斷。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又陸陸續續的看了不少相關的書籍和有關的文章，更證實了我當初的看法和判斷是正確。

一、對“最關鍵罪行”的自辯

在隔離審查期間、公檢預審期間和法庭上，在提供給我的一切機會中，我都盡最大努力說明情況，提供證據，實事求是地給予答辯。但對於審判庭庭長仇修權聲稱“九·一三”事件“是李作

方块字读书社区

鵬最關鍵的罪行！”我采取了沉默。在法庭上，我祇講了一句話：“承擔責任，保存資料，保留意見！”

現在我要說出深藏心中的話。1971年9月12日晚上和13日凌晨，我到底做了什麼？我為什麼沉默？

二十多年過去了，那天晚上的情景對我來說仍然歷歷在目。但是對於讀者來說，可能就是混沌一片了。過程我在前文(第三十八章)中有所敘述，現在我舉出事件中最關鍵的幾點問題來做分析，以表明事實的真相。

特別法庭的《判決書》共33頁，約一萬五千字左右。從第20頁開始，就是當庭十名被告的“犯罪事實和應負的刑事責任”一章。其中第17頁中的“第(八)條”就是對我的判決(上一章已全文抄錄并附有影印件)。

對“九·一三”事件的描述，在《判決書》中共出現過兩處。

第一處在第15頁至16頁間，全文如下：“當晚十一時三十五分和十三日零時六分，李作鵬兩次向海軍航空兵山海關場站下達命令，將周恩來總理關於256號專機必須有周恩來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四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飛’的命令，篡改為‘四個首長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才放飛’。九月十三日零時二十分，海軍航空兵山海關場站站長潘浩已經發現當時情況異常，打電話請示李作鵬：飛機強行起飛怎麼辦？這時李作鵬仍然沒有採取任何阻止起飛的措施，致使林彪、葉群、林立果得以乘256號專機叛逃”。我在此處文旁注：“林彪潛逃并非‘一起’或未‘一起’引起的結果”。

第二處在第17頁的“第(八)條”中，全文如下：“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十一時三十五分和十三日零時六分，在林彪、葉群叛逃前，李作鵬兩次篡改了周恩來總理的命令。十三日零時二十分，海軍航空兵山海關場站站長潘浩打電話緊急請示：飛機強行起飛怎麼辦？李作鵬沒有採取阻止起飛的任何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飛機叛逃。事後，李作鵬授意秘書記錄，掩蓋罪行”。我在此處文旁注：“觸犯了刑法那一條？”

方塊字讀書社區

在《判決書》中，保留了三處最關鍵的問題：一是“兩次篡改”總理電話指示；二是“沒有採取任何阻止起飛的措施”；三是“塗改電話報告記錄，掩蓋罪行”。

下面我分別闡述。

1. 我在“九·一三”事件中的“罪行”之一，就是“兩次篡改”總理電話指示。我如何“篡改”的呢？就是將總理“四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飛”的指示，篡改為“四個首長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才放飛”（這是李萬香的證詞原文）。

這裏，核心的問題是：總理在電話裏所做的四點指示中，到底有沒有“四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飛”的明確表述？

真相很簡單：總理的電話指示中根本沒有這句話！總理電話指示的原話是：“空軍那架飛機的行動，要聽北京我的指示、黃總長的指示、吳副總長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飛”。

當時總理在電話中的口氣平和，沒有強調“四個人一起”，更沒有提到“命令”兩個字。

我是軍人，是從戰火硝煙中拼殺出來的軍人。在你死我活、槍林彈雨的無數次戰鬥中，錘煉我處處嚴謹的軍人素質。緊急狀態、危機時刻，訓練我時刻保持軍人的職業敏感。我是作戰參謀出身，在千鈞一髮的戰場上，在炮火連天的轟鳴下，我準確無誤地接聽和傳達過無數次上級的電話命令，準確無誤地執行過無數次上級的作戰命令，我絕對相信我的耳朵，也絕對相信我的記憶。當年剛進入東北，我在林彪身邊做參謀處長時，他要求我們“傳達上級命令，報告下級情況，你們一個字都不能錯！”。幾十年來，這一直是我作為軍事指揮員的工作準則之一！假如當時總理的電話指示中有“命令”二字，有“四個人一起”的明確要求，我會有極深刻的記憶，絕對不會有絲毫誤差或模糊。

在前文中（第三十八章）我已經提到，我紀錄下總理的四條指示後，曾向總理兩次復述（逐條復述和全文復述），不僅得到總理的首肯。而且加芳块字读书社区示的記憶。第二天（9月14日），我親自閱改了包括總理電話指示在內的呈總理的報告。更

加深了我對總理電話指示的記憶。

公檢預審和法庭上，多次審問我這個問題，我幾十遍地重複總理電話指示，並依據事實堅決不承認總理在電話指示中說過“四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飛”這句話（在巨大的壓力下，我祇能用“不記得”來回應，這樣的回應就是不承認的態度）。

2. 我在“九·一三”事件中的“罪行”之二，就是“沒有採取任何阻止起飛的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飛機叛逃”。

從始至終，包括場站站長潘浩在內的所有山海關機場給我的電話報告中，根本沒有人提到機場有任何異常情況。潘浩“強行起飛怎麼辦？”的報告有什麼根據？到底是真實情況？還是場站的推測？我一點情況也不了解，更無法判斷與確定。《判決書》中說：“……潘浩已經發現當時情況異常……”，他“已經發現”了什麼“情況異常”？他根據什麼“情況異常”就能斷定林彪專機要強行起飛？他為什麼不立即向我報告？當晚，在周總理與我多次通電話時，並沒有指示飛機強行起飛該怎麼辦。是阻止？還是不阻止？採用怎樣的辦法阻止？周總理不作指示，誰敢擅動！我不敢決定，也無權決定。

這裏，我還要提一提《起訴書》中所說：“李作鵬不採取任何阻止起飛的措施，竟推脫說：‘可以直接報告請示總理’，以拖延時間，使林彪得以乘機外逃”。《起訴書》所說此段話的用意，是指責我有意“拖延時間”，“趁機”放跑林彪（事後，我看到的一些公開出版的作品中也是這樣描述）。飛機強行起飛是意外的緊急情況，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我能果斷地指示機場場站‘直接報告請示周總理’，這不正是分秒必爭地向最高指揮員請示處理緊急情況的最快速、最有效的措施嗎？戰爭年代的四野部隊中，越級指揮和越級報告是兵貴神速克敵制勝的法寶，和平年代越級指揮和越級報告也是處置緊急情況的最佳辦法。“直接報告請示周總理”怎麼是“推脫”？是“拖延時間”呢？請問：還有比“直接報告請示周總理”更好、更快的措施嗎？

據我所知，專機強行起飛的當時，山海關機場場站對256號

專機沒有提供必要的塔臺指揮系統、通訊系統，也沒有打開必須的跑道照明系統。事發九個月後的中發[1972]24號文件中，這樣說：“在沒有夜航燈光和一切通訊保障的情況下，便在一片漆黑中，于零點三十二分，強行起飛，倉皇逃命。”¹ 沒有塔臺指揮，沒有通訊保障、沒有跑道照明，這麼專業的禁飛狀態，這麼明確地要求專機飛行員停止起飛，就是採取的阻止起飛措施！怎麼能說“沒有採取任何阻止起飛的措施”呢？

3，我在“九·一三”事件中的“罪行”之三，就是“事後，李作鵬又塗改電話報告記錄，掩蓋罪行”。

關鍵是12日23點35分和13日0點06分兩次通話的電話記錄。

第一次通話，向山海關機場場站值班員傳達周總理指示時，我補充說“四位首長中，其中任何一個首長指示均可放飛”，第二次通話時，我修改了第一次通話中我的補充講話，我說：“空軍那架三叉戟飛機要經北京周總理、黃總長、吳副總長和我四人聯合指示才能放飛，如果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不管是誰的指示要報告我，你們要切實負責”。

前文中(第三十八章)我已說到我前後兩次在電話中補充的內容不一致，是有自己的思想活動的。我意識到我的兩次指示有不一致之處，但當時我並沒有意識到這裏有什麼大的失誤。我是在一次比一次加深對周總理電話指示的理解和傳達指示的準確性。何錯之有！

問題的關鍵是，山海關機場場站值班員李萬香根本沒有聽清楚我0時06分的電話指示，而祇是將23點35分的電話指示重新追記一遍，這樣就完全不符合我在通話時講話的原意了。對不準確地記錄我的話，我不僅必須要修改，而且有權力修改。何錯之有！將不正確的電話記錄改為正確的，僅此而已，我不知道在掩蓋什麼“罪行”？

《判決書》中所謂“兩次篡改”、“沒有採取任何阻止起飛的

方块字读书社区

註1，中發[1972]24號《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三）》第83頁，標題為《林彪、葉群等倉皇逃命日記記》一節

措施”、“塗改電話報告記錄”的用意，無非是讓不明真相的人們相信：其一，周恩來曾“下命令”阻止林彪專機起飛；其二，林彪是我李作鵬有意放跑的。

下面談談我的認識和想法：

第一、勸阻林彪夜航是周總理電話告訴我的。但“九·一三”當晚，北戴河、山海關發生的所有事情，我完全不知道！

第二、我希望所有關注“九·一三”事件的人們注意：林彪的三叉戟飛機是強行起飛的！不是“放飛”的！當時不要說“四人一起命令”，就是四十人一起命令也擋不住！有周總理的電話指示，飛機就能停下來了嗎？林彪就能走下飛機嗎？有場站要求停止起飛的措施，飛機就能停下來了嗎？林彪就能走下飛機嗎？

機場發生的一切情況都是突發的、不正常的和出乎意料的！是我無法控制的！周總理的電話指示不起作用，場站禁止起飛的專業措施也不起作用，難道專機強行起飛的責任就應該由我來負嗎？

第三、在我毫不知情的前提下，我沒有任何理由不如實傳達總理的指示。我兩次所補充的話，是我對周總理指示的理解和對機場執行周總理指示的再強調。實際上，在“九·一三”事件的整個過程中，我祇起了“傳話筒”的作用！

第四、我為什麼要放林彪逃跑呢？當時，我根本不知道林彪要去向何方，更沒有任何情由放林彪外逃蘇聯。我也可以斷定，黃永勝、吳法憲也決不會放跑林彪的。在我們的心目中，忠于毛主席、忠于黨中央是至高無上的原則，林彪如果有反毛主席的舉動，我們不會跟着跑。事後，毛主席懷疑我們，是因為他自己喪失了自信。

第五、我請事後“諸葛亮們”給我出個主意：當時我應該怎樣採取“阻止起飛的措施”，你們認為才是對呢？我估計答案是：怎麼做都不對。阻止成功，林彪說不對，阻止不成功，毛澤東說不對。結果是阻止起飛是我的“罪”，不阻止起飛也是我的“罪”，強行起飛還是我的“罪”。實際上我接受的是一件死路一條、死

方块字读书社区

罪難逃，且無法完成的任務。為什麼周總理要交給我無法完成的任務呢？

當我將飛機强行起飛的情況立即報告總理後，總理直至毛主席、黨中央都未采取任何有效的攔截措施，誰又追究他們的責任？

第六、法庭應該是公正的，公正的基礎是最講究證據。《判決書》中“四個首長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才放飛”是采用場站值班員李萬香錯誤記錄0點06分我的電話指示的原文，是唯一在法庭上出示的孤證。法庭可以采用李萬香的孤證作為定罪證據，而我多次提出的人證、物證為什麼不能作為證據呢？為什麼我向總理呈送的、最原始的、有總理圈閱的報告全文不能在法庭上拿出來公布于眾？為什麼要隱匿最為重要的證據？為什麼幫助我處理機場問題的秘書，這個最直接的證人不能出庭？這不正大光明的行為本身就能說明很多問題。

第七、請不要忘記，我當時祇是一個普通的政治局委員，海軍政委。在政治局常委、在軍委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面前，我祇是執行和落實各項指示的工作人員。在國家大事、國家最高級別的領導人面前，我沒有權力自作主張，除非領導授權！

二、誰是真正的責任人？

周恩來是處理“九·一三”山海關機場問題的總指揮，到底應該如何認識他采取的處置措施呢？

在公檢預審時，在特別法庭上，為了維護周總理的領導威信，我沒有一句涉及到總理的指揮措施，我咬緊牙關保持了沉默。現在，我想把自己的看法公之于眾：

第一、周總理有沒有處置緊急情況的經驗和能力？我的回答是：周總理可以算是中國中央處理緊急情況的第一高人！

第二、周總理事先是否知道內情？衆所周知，林立衡在飛機起飛前幾個小時就向中央做了報告，總理是完全知道內情的。

1998年，我看了《汪東興回憶錄》，他這樣記述：“晚上9點20分左右，張宏、姜作壽聽到林立衡的報告，姜作壽立即打電話報告給在北京的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張耀祠。張耀祠立即趕到我的辦公室，說：‘情況很緊急，林彪要走動，怎麼辦？’我馬上打電話找周總理。”又說：“他（指總理）打電話給我，要我不離開電話機，隨時掌握北戴河那邊的情況。”¹

2007年，我看了《吳法憲回憶錄》，他是這樣記述的：（1）“9月13日零時左右”，吳到達西郊機場。這與總理當晚給我的電話指示第四條是一致的。（2）書中說：“我要秘書張叔良打電話到山海關機場，找到三叉戟駕駛員——空三十四師副政委潘景寅。我在電話裏命令潘景寅：‘要絕對忠於毛主席，飛機絕對不能起飛，不管什麼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飛’。當時在電話裏，潘景寅滿口答應”。（3）書中又說：“但是，當我打電話把潘景寅的表態報告周恩來時，他却告訴我說，林彪、葉群已經上了飛機，而且飛機已經起飛了。這大約是九月十三日凌晨一點鐘”。²

汪東興、吳法憲在回憶錄中的這幾段話，我認為起碼表述了這樣二層意思：一是周總理不僅在給我打電話前一個半小時，就掌握了北戴河的情況，而且讓汪東興“不離開電話機”的隨時掌握北戴河情況；二是周恩來在當天晚上，通過吳法憲控制專機駕駛員。

第三、所謂四條電話指示是阻止飛機起飛的最佳措施嗎？這個指示是很模糊、很難執行的，甚至是根本無法執行的。

“四人聯合指示”到底應如何執行呢？發生緊急情況後，究竟是由山海關機場負責人先報告周總理，由總理分別徵求黃、吳、李意見呢？還是由山海關機場負責人先報告我，由我再報告

注1、見《汪東興回憶錄——毛澤東身邊的人》，香港明報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方塊字讀書社區

注2、見《吳法憲回憶錄》下卷第863頁 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6年9月版

總理，並分別請示黃、吳的意見？這怎麼能夠稱為阻止飛機起飛，不“拖延時間”，不“使林彪得以趁機外逃”的最佳辦法呢？這完全不是總理處理緊急重要問題的作風和風格，是一種推諉和搪塞的托詞！

第四、周總理為什麼不直接打電話給在北戴河的林彪、葉群，力勸林、葉不要夜航呢？當得知林立衡的報告後，為什麼不採取攔截的措施呢？

據汪東興回憶錄說：“晚上11點半鐘，周總理親自打電話給葉群。”¹汪東興在另一篇文章《毛主席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變陰謀的日子裏》再一次說：“晚上11點半鐘，周總理親自打電話給葉群。”²吳法憲回憶錄中也透露，12日夜，周總理與葉群通了電話，葉說林彪要到大連“轉一轉”，“要吳胖子調飛機來”。葉又給吳打電話，要調飛機，吳說：“調動飛機的事情，我不能決定，要請示總理”。³

周總理大約是12日23點15分左右，在電話中對我做的四條指示（23點35分，是我第一次向山海關機場場站值班員傳達周總理指示。那麼，周總理與我通話的時間，肯定在此時刻的前十五分鐘至二十分鐘。這個時刻判決書是認定的）。而23點30分周總理才給葉群打電話，此時的林彪、葉群並沒有離開北戴河駐地。為什麼周總理不直接與林彪通話力勸不要夜航，反而先于葉群，在電話中對我說：“他要飛夜航，你就告訴山海關機場，待他到達機場後，請他給我來個電話”。不在北戴河駐地與林、葉直接通話，而捨近求遠地要到機場讓別人傳話後與林彪通話，如果汪東興反復說的周總理與葉群通話時間是正確的（他在當時的地位、權力，完全可以掌握周與葉準確的通話時間），總理這樣的做法也太不合情理了，我真的無法理解！

注1、見《汪東興回憶錄——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第205頁 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7年11月第一版

注2、見《回首“文革”》下冊 方塊字讀書社區 2000年1月北京第一版

注3、見《吳法憲回憶錄》下卷第862-863頁 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6年9月版

暫且把汪東興的話放在一邊。事後，我一直在想：第一，周總理曾打電話給北戴河的葉群，力勸不要夜航，但是勸住了嗎？第二，如果沒勸住，有沒有第二方案？第三，到機場後林彪能聽場站的傳話，給總理回電話嗎？他不給總理回電話又該怎麼辦？

林彪駛離北戴河駐地前，開槍打傷了警衛人員，這是9月13日上午的政治局會議上，我才知道的。當夜周總理並沒有把這一情況向我透露半個字，而他卻告訴了吳法憲。吳法憲的回憶錄中透露，周總理告訴他：“林彪已經和葉群、林立果乘車離開北戴河，車正往山海關機場方向開去，臨走的時候開槍打傷了警衛人員”。¹

林立衡向中央的報告和開槍打傷了警衛人員，不僅足以證明林彪要離開北戴河的決心，而且完全說明事態的嚴重並不像葉群所說林彪要到大連“轉一轉”這麼簡單了，此時的周恩來，不但向汪東興下死命令在北戴河攔截住林的專車，而且仍沒有立即採取攔截林彪的第二方案，即向我下死命令關閉機場。如果當時周總理下死命令關閉機場，不准專機起飛，我會拼着老命，指揮機場場站採取一切可採取的措施攔截飛機，因為時間還來的及。但周恩來卻語氣平和地做了“待他到達機場後，請他給我來個電話”的指示，再次失去了攔截的機會。

總理為什麼要那樣做？總理一生獨自處理許多國內外、黨內外的緊急重大問題，他完全有資格、有權力、有能力、有經驗獨自專行處理這個問題，根據當時他所掌握的情況，他祇要向我下達：“立即關閉機場，不許任何飛機起飛！”這一條死命令就足夠了，根本無須什麼四條電話指示，完全是多此一舉。

第五、事後我一直在反復思索，周總理用電話遙控我來傳達他的指示，但又不把當時他所掌握地全面情況告訴我（總理告訴我的情況還不如告訴吳法憲的多），是為什麼呢？周恩來是真想在山海關機場攔截林彪的專機嗎？是真真的不信任嗎？是退身之

注1. 見《吳法憲回憶錄》下卷第863頁 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6年9月版

策嗎？還是另有其他的目的呢？

第六、“九·一三”凌晨，總理面臨着十分棘手的問題，內情深處太複雜了！把林彪放跑了，不管林彪跑到哪裏，都不亞于爆炸一顆原子彈，對國家、對黨中央都是極大的損害，特別是對毛主席的權威是極大的損害。但是如果硬攔下來，林彪是還沒有倒臺的黨中央副主席，是還沒有否定的接班人，如果林彪怪罪下來：你周恩來有什麼權力限制我的行動自由，總理又怎麼解釋？真是左右為難！周恩來心裏很清楚，這是一件怎麼做都不對的事。

但林彪跑不了比跑了好的多，這是大局！我認為周總理在當晚有充足的時間權衡利弊。但他兩次貽誤了攔截時機，最終也沒有下最後的決心。

2003年底，我看了一本高文謙寫的《晚年周恩來》（書中記載，高文謙曾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書中這樣寫：“如果周恩來當機立斷的話，一竿子插到底，直接下令把山海關機場控制起來，林彪是根本走不成的。”文中又說：“這種明顯的舉措失當，對為人行事一向精細周密的周恩來來說，實在是有些反常，不免讓人感到其中可能另有玄機。”¹我在文旁注：“對！”

第七、汪東興是否與我同罪？《判決書》說我“沒有採取任何阻止起飛的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飛機叛逃”，我因此犯了“大罪”。那麼汪東興在明確得知林立衡的緊急報告、得知葉群等人整理行裝，調動專車和開槍打傷警衛人員的情況後，並沒有指揮三步一崗、五步一哨，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8341警衛部隊果斷地攔截林彪專車。攔截汽車比攔截飛機容易的多，辦法也多，如設路障、闔大門、慌稱專車故障等。同時時間也很充裕。既有辦法，又有時間，却没有擋住林彪，為什麼汪東興沒有承擔絲毫責任？汪東興在“九·一三”芳草地讀書社區扮演什麼角色？

注1. 見高文謙著《晚年周恩來》第348頁 香港明鏡出版社

周恩來是領導處理此事件的總指揮，他的指示是否得當？他的措施是否有效？對於最後發生的不可挽回的後果，他應負什麼責任？退一步說，包括周恩來在內的所有當事人都不能勸林彪不夜航，都不能阻止專車，都不能阻止專機强行起飛的話，怎麼把“致使林彪得以乘飛機叛逃”的罪名強加在我的頭上呢？

綜上所述，我認為：周恩來在全面掌控北戴河林彪、葉群的動向和企圖，全面掌控山海關機場和256號飛機的情況下，未採取果斷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飛機叛逃”更符合歷史的事實。

當然，他未能採取果斷措施，可能還有更深的原因和背景。林彪“得以趁機外逃”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麼？到底林彪趁的什麼“機”？到底是想“真攔”還是想“真放”？為什麼要放？誰又是真正放跑和希望放跑林彪的人？這個事件的背後是不是還有文章？歷史最終會解開這重重謎團。

周總理的人品我歷來是敬佩的，但是，對這樣一件驚天大事的處理，是失誤的。他在掌握了大量情報的前提下，不是同林彪“叛逃”做堅決鬥爭，而是出于自保的需要，在猶豫和權衡個人利弊之間，錯過了最佳攔截時間和最佳方案，同時還找了一個墊背的，把我當作替罪羊。我毀于一旦是小事，讓林彪跑了、毀了國家的聲譽、毀了共產黨的威信是大事。

誰應該在“九·一三”事件上，負第一位的、最主要的責任呢？事實面前，史學者和讀者們自有評判吧。

三、我的沉默和其他“罪行”

在法庭上我為什麼沉默？公審前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我對處理“九·一三”問題的認識，采取了全部承擔的態度，在法庭上我選擇了沉默。我選擇沉默的原因有兩點：

第一，過去我認為林彪是在山海關機場“叛逃”的，山海關機場是海軍的機場，我是當時海軍第一政委和黨委第一書記，并且

又是遵照總理指示處理山海關機場“九·一三”事件的，因此山海關機場發生的問題，不管性質多麼嚴重，我不但有領導責任，同時也有直接責任，我不能把責任推給山海關機場場站，更不能把責任推給周總理身上。總理在處理“九·一三”問題上，不管我覺得有什麼樣的不妥，寧願我自己承擔，多吃虧，多受委屈，也不要涉及到總理。況且總理已不在人間，更不能把錯誤推在死人身上。我的骨頭雖已老朽，但應當擔負的責任，即使壓得粉碎也不能推脫。

第二，我是工農出身，是軍人，受黨的培養和教育幾十年。從樸素的階級感情出發，我熱愛共產黨，熱愛毛主席，敬重周總理，也同樣信任與尊重老首長、老上級林彪。“九·一三”事件，我雖早已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斷，但種種不合道理的迹象表明，在“九·一三”事件的背後，還有常人、常理無法解釋的謎團。面對這宗懸案，我寧可相信這是責任問題，由我來承擔，也不願意、更不敢相信在謎團的背後還隱藏着什麼。“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是將我的看法在法庭上公布于衆，還是不公布于衆？處于這樣非常矛盾、非常痛苦的複雜心理中，我在法庭上選擇了沉默。

最終結果是林彪跑了，總理、汪東興免責了，我被判刑了。

現在我認為這種沉默的態度是不正確的，是違背事實真相的，是說明不了問題的，更是對歷史不負責任的。

有一本書叫《重審林彪罪案》，書中有王年一寫的《對林彪集團的再認識》一文，說：“伍修權在一篇文章中說‘李作鵬的要害問題，我們抓的是913事件中，由他放跑了林彪的座機問題。’¹那麼請問伍修權：專機明明是强行起飛的，你有什麼證據證明是我“放跑了林彪的座機”？又請問：我處理山海關機場問題的做法，觸犯了《刑法》哪一條哪一款？

我終於明白了，有人想隱瞞真相，讓我來承擔“九·一三”事件的歷史責任是早已安插好的，特別法庭的任務就是不顧一切歷

方映宇讀書社區

注1，見丁凱文主編《重審林彪罪案》上冊第11頁 香港明鏡出版

史事實，把“最關鍵罪行”強加到我的頭上，把我打成“最關鍵罪人”，使我成為真正責任人的替罪羊。然後“宜粗不宜細”的一了百了，蓋棺定論。

以上所述，就是我的“最關鍵罪行”的全部真相與我的認識分析。對於《判決書》中我的其他兩條“罪行”，我又應該怎樣認識呢？

一條罪狀是：“一九六八年四月，李作鵬誣陷賀龍等人‘篡軍反黨’”。這個問題我不想多說了，凡經過文化大革命，經過兩次廬山會議的中高級幹部和中央委員都應該知道，祇要毛主席一點名，黨中央一決定，再召開個中央（或軍委）會議，與其劃清界綫的人是爭先恐後，所謂“誣陷材料”就會成百上千、鋪天蓋地。賀龍問題，早在1967年1月，經毛主席批准，周恩來就代表中央向賀龍宣布中央對他進行隔離審查的決定，從此賀龍就被打倒了。高喊賀龍“篡軍反黨”并“揭發”的人還用等到1968年嗎？

祇認定我寫的就是誣陷材料，而其他別人寫的就不是誣陷材料，這不是在法律面前的雙重標準嗎？僅舉三例：其一，1966年3月4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小組會議上，葉劍英、楊成武、蕭華等人分別做的長篇批判羅瑞卿的講話，是不是“誣陷”？其二，1966年秋，衆多各總部、各軍兵種的高級領導被有組織的到葉劍英家，看幾十份有關賀龍問題的材料，是不是“誣陷”？其三，1968年10月，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通過的《關於叛徒、內奸、王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是不是“誣陷”？文革中犯有《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條“罪”的人，何其多？

另一條罪狀是：“李作鵬在海軍點名誣陷迫害一百二十名幹部”。“雷永通等三人被迫害致死”不再提了，“直接”和“點名”的含義法庭都沒有做出任何解釋，但可以肯定“點名”不同與《起訴書》中所說的“直接誣陷迫害”。我曾要求法庭提供被“誣陷迫害”一百二十人的名單和證據材料，法庭沒有做出任何答復。

“直接”也好，“點名”也罷，法庭既不提供被“誣陷迫害”的人證，又不出示“誣陷迫害”的物證，以至我根本就沒有機會在法

庭上為自己辯護。我堅持認為，不看特殊歷史背景，不加客觀分析區別，不講實事求是，甚至這一百二十人是誰我至今都不知道，就統統都歸罪于我“誣陷、迫害”，我認為是極不公正的。

四、什麼叫“審罪不審錯”？

我認為，定罪判刑的依據是兩條：第一條是犯罪事實、情節；第二條是法律依據。沒有犯罪依據，沒有犯罪情節，無限上綱，強加罪名，是經不起歷史的考驗的。

我反復地看了中央[1972]24號文件和十年後的《起訴書》、《判決書》，最大的不同之處是“反黨集團”變成了“反革命集團”。

但是，無論是24號文件，還是《起訴書》、《判決書》，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給我定的所謂“罪行”之上再大大的扣上幾頂鋼鐵帽子，因為沒有這幾頂鋼鐵帽子，僅憑所謂“罪行”是無法“審罪”而量以重刑。這一共同點十年（1972年-1981年）沒有變。請看：

在中央[1972]24號文件中，是這樣的提法：“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罪行”，“林彪反黨集團謀害偉大領袖毛主席，另立中央，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和失敗後叛國投敵的罪行”等等。

《起訴書》是這樣的提法：“策劃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謀害毛澤東主席，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等等。

《判決書》是這樣的提法：“以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為目的而進行陰謀活動的反革命集團”，“策劃顛覆政府，推翻我國人民民主專政”，“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等等。

在特別法庭最終判決我的三條“罪行”中，哪一條與這些鋼鐵帽子有絲毫聯系？其實我心裏很清楚，所謂“罪行”多幾條少幾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須扣上鋼鐵帽子。

這裏，我還要提到一個情況。那就是中央24號文件和《起訴書》、《判決書》中全部提到了“九·一三”事件山海關機場問題，但對周總理電話指示却有不同提法，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在中發[1972]24號文件中，這樣記載：“當晚十點半左右，中央根據林立衡向八三四一部隊的報告，立即追查三叉戟飛機調到山海關機場的情況，并由中央下達命令，必須有周總理以及軍委辦事組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的聯名指示，256號飛機才許起飛。但是，李作鵬在向駐山海關機場某部下達命令時，竟兩次篡改中央命令，將四人聯名指示放飛才放飛，篡改為‘四人中一人指示放飛才放飛’”。¹

請特別注意，該文中的“中央”就是指周恩來。該文中兩次出現“聯名指示”。如果中央文件是準確的，那麼與我所說的“聯合指示”基本是一致的。

但是，在1980年後的《起訴書》和《判決書》上，在同樣的事件描述過程中，再也找不到“聯名指示”的字迹，却改為總理說：“四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飛”。到底是中央文件說的對，還是《起訴書》、《判決書》上說的對？

2007年春，我看了一本書，叫《特別辯護》，看後才恍然大悟！原來周恩來的講話出處在這裏。書中是這樣寫的：周恩來總理1971年10月9日看了這段電話記錄內容，在旁邊批示：“我說要4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飛行。周注。”²

1972年7月發的24號文件為什麼不引用1971年10月9日周恩來親批的“一起下命令”的“標準講話”呢？周恩來看了此文件後，為什麼不修改或統一他的講話呢？為什麼周恩來的講話又突然在十年後出現在《起訴書》、《判決書》上呢？

但現在可以肯定，“我說要4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飛行”的

注1. 中發[1972]24號《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三）》第77頁，標題為《十八. 李作鵬篡改中央命令的陰謀和山海關機場值班記錄. 值班員的說明》一節

注2. 馬克昌主編：《特別辯護》第183頁 中國長安出版社 2007年4月版

話，是周恩來在“九·一三”事件發生後近一個月，我已被隔離審查兩周後才說的。這就說明，我反反覆復強調的總理電話中祇說了“四人聯合指示”，而從來沒有說過“四人一起命令”，是正確的！

為什麼會出來“一起下命令”和“聯名指示”兩個不同版本的“中央說法”？可能解釋祇有一個：“聯名指示”的說法是“錯”，而“一起下命令”才能稱得上“罪”吧。

還有，為什麼會出來“在沒有夜航燈光和一切通訊保障的情況下，……強行起飛，倉皇逃命”和“沒有採取阻止起飛的任何措施”兩個不同版本的“中央說法”？可能解釋也是前者說法是“錯”，而後者說法是“罪”吧。

“無罪推定”的原則，是對被告人有利的事實可以推定，對被告人不利的事實不能推定。有罪無罪證據不足的情況下，祇能推定被告人無罪，罪輕罪重證據不足的情況下，祇能推定被告人罪輕。我承認我是法盲，但根據我所敘述的事實和真相，請史學家、法學家和讀者們分析：我是有罪還是無罪？

什麼叫“審罪不審錯”！罪與錯的標準是什麼？標準是誰定的？根據什麼定的？這樣的問號可以羅列一大堆。說到底，那就是一塊遮羞布！想用沒有事實根據的、無限上綱的所謂“罪”，把我們釘死在法律的耻辱柱上，以此掩蓋其政治鬥爭的虛偽與殘酷！不要以為號稱“法庭”，就代表公正；手握“法律”，就代表正義。

文革中，國家主席劉少奇被誣陷為“叛徒、內奸、工賊”，難道當時黨中央不是號稱“證據確鑿”嗎？在八屆十二中全會討論時，毛主席、周總理、朱德委員長、董必武副主席等一大批老革命家不都舉手同意嗎？鄧小平被誣陷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及“走資派還在走”，難道沒有相當“證據”嗎？結果又怎樣呢？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最終祇有“事實和證據”才是決定一切的根據，祇有依據事實和證據做出客觀分析才能得出公正的結論。當然這個結論也不是短期內就可以做出來的。有的要經過

相當長的歷史實踐和思考時間，才能做得出來。

很多在文革中負有相當責任的領導人，很多在文革中推波助瀾想渾水摸魚的領導人，需要一個卸下自己責任的機會。他們迫不及待地利用這個掩蓋歷史真相的機會，將一切自己的錯誤甚至罪行的髒水統統潑在我們身上。利用把控的權力，篡改歷史，顛倒黑白，掩蓋真相，撒彌天大謊，遮擋其不光彩的一幕，欺騙不明真相的老百姓。

不能否認，在長期封閉的社會裏，對我們進行公開審判，是有“進步”意義的。公審唯一的“進步”表現在，將某些人的態度公布于衆，將某些人的表演公布于衆，將我們的所謂“罪行”公布于衆，將法庭的“公正”和法律的“應用”公布于衆，這樣就可以直接接受億萬群眾的審視與分析。今天，我將真相和自辯詞也毫無保留地公布于衆，同樣是接受億萬群眾和千百年歷史的考驗。

這篇《獄中人的心聲》，寫的是十七年囹圄時期，前十年的實際情況。一般地說，關押起來坐大牢，完全失去了自由，除了吃飯、睡覺、拉屎拉尿三件大事之外，不可能有其他什麼活動。其實不然，監獄就是學校，監獄就是考場，監獄就是戰場。

我的態度、我的原則就是兩條：第一條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第二條是“不怕死、不怕苦”。我始終堅持這兩條原則，實事求是，光明磊落，沒有做錯的事情，不是我犯的罪行，堅決不承認。我運用這兩條原則，同那些誣蔑誹謗、無限上綱、強加罪名、嫁禍于人的惡劣行爲，進行我認爲是正義的原則鬥爭。

但最使我羞愧不安的，是由于我遭受毀滅性打擊後，有許多幹部、家屬、群眾被牽連，遭受苦難；我的家人，我的親屬，也無端地被隔離審查，失去自由，遭到迫害。我有難言的痛苦和慚愧，無地自容。我寧願自己一人坐牢，不願他們爲我受折磨，我寧願自己一人走上刑場，不願他們爲我陪斬。但這不是主觀願望能辦到的，特別是在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思想指導下，更祇能對天仰嘆，終生遺憾！

方块字读书社区

我還要大聲疾呼，我李作鵬一輩子跟着共產黨，一輩子信仰

不要封建主義，不要資本主義，不要修正主義，不要帝國主義，不要霸權主義，不要剝削、壓迫制度，而要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民主、平等、文明、富裕的共產主義，不管天翻地覆、天塌地陷、山窮水盡，海枯石爛，我的世界觀是永遠如一的，我的信念是永遠不動搖的，不管向我身上潑多少髒水，強加多少罪名，我還是我！最大的悲劇莫過于我没有倒在敵人的槍炮中，没有倒在我的工作崗位上以身殉職，而是最終成為黨內鬥爭的犧牲品，這真是天大的冤枉，這真是千古的悲劇！我想給世人留下的，正是這悲劇人的心聲！

第四十五章 判決之後流放并州

一、與家人見面、通信， 是最欣慰的事

1981年1月25日，判決我十七年徒刑，從未決犯變成已決犯了。

此時，我已經隔離審查和坐牢九年零四個月，屈指計算還要苦熬七年零八個月。沒有什麼了不起，“千磨萬擊還堅勁，任你東西南北風”。九年多的時間過去了，自信剩餘的七年多時間也可以熬過去。

長征中，吃草根樹皮都能克服，戰場上，槍林彈雨都能頂過去，坐牢的折磨又算得了什麼！早已橫下一條心，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

經過一年多的突擊，[方块字读书社区](#)的巨大折磨之後，我已變成身心交瘁，天天不離藥物的維持。堂堂七尺男兒，整得人不像

人，鬼不像鬼。

判決之後，讓我繼續住院治療。已決犯的待遇有三個新的變化：

第一、伙食標準和質量明顯下降。過去午餐、晚餐均可要一個甲菜、一個乙菜。現在降為每餐祇能要一個菜，並且午餐點了甲菜，晚餐必須是乙菜，午餐是乙菜，晚餐才可點甲菜。不過主食仍保持原來狀況。所謂“甲菜”就是多少有點油星肉丁，而“乙菜”則是白水煮青菜、豆腐。對於我這樣虛弱的病體，營養顯然是不夠的。

第二、如果你願意的話，在已決犯中可以有限制地互相來往。陳伯達、黃永勝均住在我的隔壁病房，雖可來往，但陳伯達仍是整天啃《資本論》，黃永勝整天臥床不起（後來知道，他已經病的不輕，出獄不久就去逝了）。還有一個空軍什麼幹部也住在我的隔壁病房，是屬於未決犯，但精神已折磨得像傻子一樣，呆頭呆腦，不願說話。雖然稍微開放，但活動範圍仍是畫地為牢，不能隨便走動。

第三、停止了近兩年的探視又恢復了，子女們可以按規定時間來探監。同時，經監獄管理人員的檢查，也可以與子女書信來往。

2月下旬的一天，孩子們到復興醫院來探視我。這是判決後的第一次。醫院把獄區的治療室臨時改為接待室，我與孩子們又重逢了。孩子們帶來了老伴這兩年的消息，知道老伴的身體、生活都還好，我放心了。他們還帶來了水果、點心、肉罐頭和營養補品，滿滿的放了一桌子。

可能對已決犯的



方块字读书社区

探視放寬了規定，監管人員祇在接待室門口監視我們的見面了。因此，孩子們帶來的錄音機和照相機沒有被發現。他們偷偷的照了十年來我第一次與家人的照片。照片中，坐在我身旁的是大女兒李大征，後面站立的是大兒子李冰天。

那時，能見到孩子們並與他們通信，是我最欣慰的事。至今，我不僅保留孩子們當年的全體照片，我還保留與孩子們通信的草稿。下面就是給我大女兒李大征一家人的信，他們已安家沈陽。

親愛的欽、征、焱、烜：「你們好！

六月五日的來信、寄來的近照，及《芒種》兩期中偉欽的三幅作品，我都收到了。第一我高興地知道你們一家一切都好。第二我高興地知道兩個小外孫成長得很快。小焱識字進步快，小烜學話進步快。小焱性格文雅，小烜性格活潑，我都喜歡。第三我高興地看到偉欽的三幅作品。三種不同的風格，我都欣賞。特別是“成長”最佳。無論主題思想、取材布局、人物神態，都妙筆生花，恰到好處。我把它擺在我的床頭小桌上，每天看他兩眼。

你們來信說：明年春天來看我。我總覺得心裏不安，因為，（1）到北京沒有一個落腳的地方。如果我回到秦城去了，麻煩更多。沒有住宿的地方，孩子大人都受苦。（2）路程遠，來回乘車，住宿，要花很多錢。可是互相能實際見面時間，祇有兩個小時，多麼不值得。（3）耽誤工作，來回至少要一個星期以上的時間。因此我主張兩年或三年來一次，估計那時旅遊事業進一步發展，找個小旅社住幾天，既可看我，又可讓我兩個小外孫看看北京名勝。

我的身體仍然還好。過去伙食標準，每天一元，另外一磅牛奶，我吃六兩糧的飯。現在伙食標準，每天八角，另外一碗牛奶，我吃六兩、有時七兩糧的飯。體重維持140斤左右。最近軍博常來人，要我談戰史，已經談了多次。由此引起我一個想法：擬趁我現在身體還好，腦子也還可用，準備系統地寫戰爭回憶錄。既可保留歷史資料，又可以消愁解悶。困難是手邊沒有參考材料，

方块字读书社区

注1、欽、征、焱、烜指的是：大女婿劉偉欽，大女兒李大征，大外孫子劉焱，二外孫子劉烜。

因此能否辦到，現在還很難說。再見！

作翁手筆（1981年6月25日）

二、寧願把勳章丟到大海中

5月底的一天，一位解放軍軍事法庭的幹部到醫院來見我，給了我一份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法院刑事裁定書。裁定書寫到：根據1980年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決定，依法剝奪李作鵬被授予的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全國人大常委會1980年的“八月決定”，既沒有在特別法庭上公布，也沒有在報紙上、電臺和電視臺上向世人公布。特別法庭最終判決我有期徒刑十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的判決書中，也根本沒有剝奪我的三個國家勳章。為什麼人大常委會將“八月決定”提交由軍事法院公布？為什麼1980年8月26日的決定，軍事法院拖延了九個月，才冒出個“刑事裁定書”？

我要質問：“依法剝奪”，依的是什麼法？

我的三個國家勳章既不是偷的，也不是搶的，更不是騙的。是我戎馬二十年，南征北戰，浴血奮鬥，為黨、為人民、為新中國，殺敵立功的榮譽，是1955年周恩來總理代表國家授予我的。試問，何罪之有？！

我下定了決心，不管誰來剝奪我的三個國家勳章，我都堅決反對，我活着反對，我死了也反對。我相信，我的子孫後代將世世代代的反對。

反復看了刑事裁定書後，前思後想久久不能平靜。憤然提筆，在裁定書上給中央寫了一封信（見下頁圖）。全文如下：

總政主任、軍委主席、中央主席：“公檢預審時，曾多次向我傳達中央負責人指示說：你們與別的地方不同，你們打過仗，你們吃過苦，你們有一段光榮的歷史。按照此件裁定書，不但完全



否定了過去中央負責人的指示，也是徹底的違反歷史唯物主義，是徹底歷史唯心主義。因此我堅決的反對。我雖然人已快入土了，我至死決不接受此項裁定書。李作鵬 1981年7月20日”。

當時，我已做好最壞的準備，如果再有人來要我的勳章，我寧願把勳章丟到大海中，也誓死不交。

戰爭年代，我們這些革命軍人，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消滅了八百萬國民黨反動

派，為新中國的建立，爬雪山、過草地，拋頭顱，灑熱血。文革期間，我們這些革命軍人，始終反對江青、康生一伙的反軍亂軍陰謀，以自己的微薄之力，維護着人民解放軍的神聖形象。“十年動亂”的前五年中，我們從未停止過與江青、康生一伙的鬥爭。

這是一個為共和國創建浴血奮戰，為保衛人民軍隊不被塗炭的革命軍人應該履行的歷史使命。我們的歷史功績是任何人也不能抹殺的！

三、保釋出獄，流放并州

1981年7月底的一天，不知天上刮的什麼風，也不知太陽從哪邊出來的，秦城監獄負責人、公安部代表來到復興醫院，向我宣布“保釋出獄”的決定。

我問他們：“以誰的名義保釋我？”

他們回答：“是中

這對我來說真是太突然了，完全沒有想到。

他們接着說，中央決定要我離開北京，安置到太原居住和治病，并要求我到太原後不能用真名，而改名叫“李明”。當時我無論如何不想改名，他們說這是中央統一規定，是爲了保密和安全的需要，都得執行。又說中央的方針是“從寬從快”處理。

此後，住在醫院的陳伯達很快就出獄了，不久黃永勝也走了。

我没有匆匆地辦理保釋出獄的手續，因爲當時秦城監獄在退還我的東西中，缺少了我的全部手稿（大部分是在通縣專案審查時的手稿），他們爲什麼扣留這批手稿呢？我追問他們多次，他們都不說明理由，採取裝聾作啞拖着不辦的態度。

我祇能給秦城監獄寫信說：“8月25日的信，諒已收到了。但又過去10天，仍無回音，不知何故？我希望你們採取光明磊落態度，或者將我的手稿全部退回，或者拿出不能退回的理由，給我令人折服的說明。兩者必居其一。不要採取裝聾作啞、腐朽官僚主義的做法，那樣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我現在一方面表明我的態度，另方面繼續等待你們的回信，在沒有獲得你們明確的答復之前，我是不願輕易離開北京的。”

在給秦城監獄寫信的同時，我連續給軍委辦公廳、海軍黨委和公安部黨組寫了三封信，草稿如下（見圖）：

軍委辦公廳主任：

特別法庭并未判決沒收我私人的東西。因此凡是我私人東西應歸還給我。文革時軍委辦事組在西山辦公，我駐的那座房子內，有我的一部分私人東西，和我的講話文件等。我被關押後可能爲軍委辦公廳查封了。現在中央對我有新的處置，將很快離開北京。因此我請求你們將查封在西山我的私人東西，全部歸還給我。由李冰天接受。

李作鵬

軍委辦公廳主任
特別法庭並未判決沒收我私人的東西。因此凡是我私人東西應歸還給我。文革時軍委辦事組在西山辦公，我駐的那座房子內，有我的講話文件等。我被關押後可能爲軍委辦公廳查封了。現在中央對我有新的處置，將很快離開北京。因此我請求你們將查封在西山我的私人東西，全部歸還給我。由李冰天接受。
李作鵬

方块字读书社区

海軍黨委
最近中央對我有新的處置諒你們已知道。特別法庭并未判決沒收我的私人東西。因此根據法律有關原則，我的私人東西仍不應受到侵佔。請將我所有私人東西（衣被物，用具物，書籍文物，手稿文件）全部交給我的子女接管保存。凡不是我的東西一件不要，凡是我的東西一件不應少。據說有人趁機發家難財，將我的東西拿走不少，我要求全部追回。現由李冰天、李炎天前往接洽，希予指教。

李作鵬

我由通縣轉至秦城，公安部把我的全部書籍、用物、手稿抄走，如果已轉到海政保衛部，亦要求退還。

海軍黨委：

最近中央對我有新的處置諒你們已知道。特別法庭并未判決沒收我的私人東西。因此根據法律有關原則，我的私人東西仍不應受到侵佔。請將我所有私人東西（衣被物，用具物，書籍文物，手稿文件）全部交給我的子女接管保存。凡不是我的東西一件不要，凡是我的東西一件不應少。據說有人趁機發家難財，將我的東西拿走不少，我要求全部追回。現由李冰天、李炎天前往接洽，希予指教。

我由通縣轉至秦城，公安部把我的全部書籍、用物、手稿抄走，如果已轉到海政保衛部，亦要求退還。

我由通縣轉至秦城，公安部把我的全部書籍、用物、手稿抄走，如果已轉到海政保衛部，亦要求退還。

李作鵬

公安部黨組：

1971年（應為1976年注）秋冬間，打倒四人幫後，由于我犯了揭發康生是四人幫一伙的“罪行”，因此你們將我從通縣軍管押轉秦城監獄。並將我經周總理批准的，馬列書籍和其他書籍、

公安部黨組
1971年秋冬間，打倒四人幫後，由于我犯了揭發康生是四人幫一伙的“罪行”，因此你們將我從通縣軍管押轉秦城監獄。並將我經周總理批准的，馬列書籍和其他書籍、用品和我的手稿（其中有我寫給中央報告的底稿，和我寫的兩本詩詞草稿等）全部抄走。除了衛戍區已將我的醫療器材、藥品退回給我，其餘至今未歸還。1981年特別法庭并未判決沒收我的私人東西，應全部退還，交由李冰天接受（他是我的長子）。同時我對你們這種做法，

李作鵬

用品和我的手稿（其中有我寫給中央報告的底稿，和我寫的兩本詩詞草稿等）全部抄走。除了衛戍區已將我的醫療器材、藥品退回給我，其餘至今未歸還。1981年特別法庭并未判決沒收我的私人東西，應全部退還，交由李冰天接受（他是我的長子）。同時我對你們這種做法，

方塊字讀書社區見。

李作鵬

可是你寫你的信，他們仍然裝聾作啞，既不答復，也不退物。我估計目前退物退稿是不可能。

9月中旬，我又給秦城監獄寫了一封信，表明我的態度是：退還私人物品和手稿的問題沒有完，我決定9月25日前後離開北京去太原。到年底，他們把我的部分私人物品和手稿送到了太原，是否全部退回不敢說。反正若沒有我的強硬態度和要求，同時，大概也沒有審查出任何政治問題，否則是不會退回的。

9月28日晨，由監獄和公安部工作人員及我的小兒子李炎天護送，乘火車離開北京。

第四十六章 悲愴詩篇

一、逆境白話

鄙人祇有初小文化基礎，根本不懂詩詞。什麼平仄、對仗、典故、比興等，均不會運用。知識淺陋，何敢言詩。

但是看到別人又寫又填，詩文并茂，自己心裏甚是羨慕，於是買了幾本古詩詞及詩律詞韻的書，看書自學。同時採取照葫蘆畫瓢的辦法，一邊學一邊試寫。這樣沒有功底的文字，一定是詞淺意拙，不合詩律，自己祇能美其名曰“打油詩”。

什麼是“打油詩”？是一種語言通俗，格律隨便的順口溜。內容通俗大衆化，使粗通文墨的人能讀能懂，音律琅琅上口，易記易背，這就是“打油詩”的優越性。馮玉祥先生創作的白話詩（自稱“丘八詩”），既體現出鮮明的個性，又與百姓心聲共鳴，我很欣賞。同為軍人，我也努力向他的寫作方法學習。

方块字读书社区

“九·一三”事件的影響，決定了我的詩作內容不可能有更多豪放、高遠的思想意境。相反，却滲透出不少淒涼、低沉的格調，因此沒有什麼社會意義。但我不願仿照《紅樓夢》中林姑娘的辦法把它燒掉，除自我欣賞外，祇想留給我的子孫後代、親朋好友，作為了解我在逆境中思想情緒的參考。我選擇部分當時寫的打油詩，收錄在我的回憶錄中，祇為讀者提供我的一個思想側面。

二、通縣隔離

一、幽 禁¹

1971年10月于通縣

百戰何愁幽禁苦，坐牢權作息肩處。
馬廐牛棚堪一笑，青蛙相伴觀蚊舞。
若問此時我心情，死都不怕豈怕苦。
一身光輝滿腹愁，口含黃連難吐露。

二、禍從天降

1971年冬于通縣

莫道天無絕人路，不應絕人還絕族。
狂風暴雨無止境，人有失誤天亦誤。

¹ 注1。隔離室八平方米，原是馬廐牛棚，又潮濕，一角落汪着水，青蛙在內戲鬧。室內蚊蟲飛舞，床墊潮蟲蠕動。

三、聲名裂

1971年冬于通縣

終生奮鬥紅變黑，將軍百戰聲名裂。

別鳥懷憤忽驚起，不啼清泪長啼血。

四、夜思（四首）

1972年于通縣

（一）

食物難咽，輾轉無眠。

通宵苦思，泪枕一片。

（二）

國家爲大，成竹在胸。

犧牲一己，報酬萬衆。

（三）

誣陷攻擊，大放狗屁。

忍氣吞聲，眼望千里。

（四）

衆口毀譽，石浮木沉。

積非成是，孤掌難鳴。

五、指鹿爲馬

1972年于通縣

誰謗從來不可辨，

指鹿欺騙爲駿馬，胡說八道無人信。

六、武人不怕死（三首）

1972年于通縣

（一）

家貧讀書愁，從軍征戰久。
沙場多死戰，政壇少智謀。
兵書半瓶醋，詩文一缸油。
內亂毀長城，高唱滅資修。

（二）

傾一腔熱血，拋七尺軀體。
與先烈相依，同仇敵殊死。
不為名和利，祇求江山新。
國強民富裕，戰死染赤旗。

（三）

捐軀赴國難，視死最俊雄。
見死臉變色，不能稱英勇。
揮師掃群寇，勢如風雨疾。
獻身在沙場，鯤鵬萬里騰。

七、視死如歸

1973年于通縣

將軍應裹馬革還，為國捐軀分內事。
南征北戰二十年，槍林彈雨不怕死。
艱難險阻具備嘗，流血犧牲天地知。
一代英雄千秋業，胸懷夢想常深思。

方块字读书社区

八、鐵石心

1973年于通縣

往昔烏紗千斤重，而今罷官誰高興？
逆境不墮青雲志，愈挫愈奮鐵石心。

九、讒言可畏（四首）

1973年于通縣

（一）

武人不畏虎，獨怕讒言夫。
造謠誣蔑語，真相難清楚。

（二）

某受誣陷久，頗似園中韭。
日日被刀割，無中還生有。

（三）

讒言亂黑白，惡臭三寸舌。
舌上有毒物，殺人不見血。

（四）

蠟燭未燒盡，忽被讒風息。
水清看底石，心潔見天理。

十、破謠言

1973年于通縣

一人造謠，萬人起哄。
人雲亦雲，買空賣空。
共產黨員，盲目服從。
民主人士，側旁觀風。
實事求是，人民大眾。
敢說敢辯，破謠先鋒。

十一、冷對小人（二首）

1973年于通縣

（一）

艱難險阻皆備嘗，槍林彈雨人未亡。
戰將落馬仇敵樂，橫眉冷對小人狂。

（二）

身懷冰雪再三思，冷清頭腦是非明。
突然平地起風波，或毀或譽任人評。

十二、真金不怕火煉

1973年秋于通縣

京都不見久，時作夢中游。
獨仰高天蒼穹，小院今又秋。
門外日新月異，世上白雲蒼狗，唯我獨依舊。
烏雲未見散，寒風冷颼颼。

文革事，多思忖，少煩憂。
福禍倚伏，塞翁失馬知因由。
收集極左廢鐵，鑄成人間悲劇，領導却無罪。
我輩何功錯，評說後人留。

十三、夢秋江¹

1973年于通縣

魂消已多年，今見君顏。
風度瀟灑猶如前。
久別重逢語今昔，悲慘難言。
非命歸西天，遺憾萬千。
未能奉勸心不安。
狂風急浪盼平靜，堪慰長眠。

方块字读书社区

注1、秋江，即孟秋江，著名記者。原香港《文匯報》社長。

十四、咏 蟹¹

1974年于通縣

常將冷眼看螃蟹，看汝踉蹌到何方。
人雲霸道背甲硬，我說橫行腳爪長。
細眼珠，短目光，腹內空虛竟無腸。
漁人湖海網具設，豐收酌酒鮮味嘗。

十五、寄語友人

1974年9月24日

海岳隔三年，常思夢中見。
覆巢無完卵，災難定株連。
寄書欲問事，天變斷飛雁。
真理當堅持，時窮節操現。

十六、幽禁四周年

1975年9月

吾人立志無他求，鞠躬盡瘁為革命。
少年農暴贛江邊，壯歲參軍萬里征。
華南華北風與露，東北東南烟與塵。
戰爭流血漸消逝，和平塵埃逐揚勝。
四十春秋猶閃電，柒拾年代黑淵沉。
馬列知識恨知少，歷史經驗愧浮淺。
拜領批判聽高論，奉讀華章說借鑒。
真金不怕烈火燒，地久天長多慧眼。

方块字读书社区

註1、以“蟹”比喻當時橫行霸道的“四人幫”。

十七、白骨精滅亡

1976年10月于通縣

齊魯無名江，濁流久不清。
無風黑浪三尺，有風帆船沉。
禍水直衝橫撞，勝似牛鬼蛇神，疑是白骨精。
夜居釣魚臺，日革文化命。

造反風，奪權雨，武鬥頻。
四妖橫行亂國，鷄犬不安寧。
天怒人恨除害，妖魔一網打盡，舉國歌舞慶。
呂武笑江妖，黃袍成泡影。

十八、咏 冬

1976年冬

漫天雪，房頂樹梢遍地白。
遍地白，消蟲滅害，苗壯樹疊。
嚴寒蒼翠古松柏，更喜梅花香飄烈。
香飄烈，送冬迎春，更季換節。

三、秦城囚禁

十九、咏懷（二首）

1977年1月在秦城獄中

（一）

千層地獄萬丈坑，任憑閻王惡鬼行。
生死存亡兩不顧，有膽有識頭腦清。

（二）

為黨為國掃強敵，流血流汗堪豪舉。
身在囹圄心在黨，痛心煮豆燃豆箕。

二十、南冠徒

1977年于秦城獄中

壯歲旌旗擁萬夫，暮年竟成南冠徒。
龍困沙灘翻身難，來生為國舉兵符。

二十一、囚禁六周年

1977年9月24日

幽禁戍營五周年，怒譴康禍投秦城。
四圍荊棘全不顧，六面鐵壁添堅定。
白髮蒼蒼膽量壯，丹心耿耿志不移。
生死榮辱何足論，真理永存終必勝。

方块字读书社区

二十二、感 憤（二首）

1978年于秦城獄中

（一）

渴飲蔣匪血，饑食倭寇肉。

恨不戰場死，留作小人辱。

（二）

寧願爲民死，痛恨株連亡。

不清不白冤，實乃替罪羊。

二十三、懷念海軍

1978年春于秦城獄中

十載微薄奉獻，萬里海防踏遍。

擊落入侵賊機，消滅竄擾敵艦。

碼頭機場倍增，核艇導艦新添。

建設强大海軍，宜爭早日實現。

二十四、丹 心

1978年于秦城獄中

革命熱情未稍減，老兵豪氣豈能殘。

雪山草地皆橫闖，南征北戰凱歌還。

汗馬失蹄遭侮辱，烏鴉得勢狂翩躚。

粉身碎骨渾身，方塊字讀書社區可對天。

二十五、囚禁八周年

1979年9月

十八子，生猶死。波瀾靜，風雲止。
鐵籠鳥，陷阱獅。“靈魂”失，¹情難逝。
血汗年，俱往史。晚節敗，終身耻。
冤刻骨，憤難平。山壓頂，幾時已？

二十六、親人相會²

1979年12月于秦城獄中

屈指離散八春秋，災難滿腹愁。
梁毀屋傾，鷄飛狗跳，生死共憂。
意外相見喜泪流，甚慰階下囚。
吾兒皆健，風雨霜雪，自強苦謀。

二十七、勸君宜心寬³

西山離別不相逢。天空雲，地面風。
近在咫尺，互未知行踪。
鳥籠牛棚各西東，常見樂，邯鄲夢。
閉鎖九年魚雁通，人殘存，事相同。
視山唱歌，苦難是親朋。
試觀神州江山色，心身事，宜從容。

註1. 開除我的共產黨員黨籍，極力奪取我的靈魂。

註2. 關押八年，第一次允許子女探視，百感交集。

註3. 與子女見面后，得知老伴情況，心聲互融。

四、審判風雲

二十八、不求瓦全

1980年于北京復興醫院

寧爲玉碎，不求瓦全。含冤九泉，古今相傳。
誣陷頑抗，殘暴枉然。是非黑白，歷史公斷。
重見天日，國泰民安。沙場鍛煉，氣節未寒。

二十九、不幸碰鬼

1980年于北京復興醫院

出生入死打天下，不幸碰鬼千罪加。
革命誣成反革命，宿將被斥“南霸天”。¹
免死狗烹自古傳，文臣武將遭橫禍。
斷頭臺上刃具鋒，赤膽何懼千刀剮。

三十、酷吏

1980年于北京復興醫院

封建御吏首，走狗是心腹。
禍首罪如山，不敢稍懲處。
沙場豐功將，誣陷滅三族。
冤案何其多，作惡勝猛虎。

方块字读书社区

注1.“南霸天”：誣陷林彪和我們南逃廣州，另立中央。

三十一、竇娥冤

1980年于北京復興醫院

竇娥絕無殺人罪，屈打冤殺弱女人。
六月大雪三年旱，天地有情人無情。

三十二、夢見老伴

1980年于北京復興醫院

茫茫生死十年間，一枕黃粱一場空。
斷腸人思斷腸人，猶疑夢中喜相逢。

三十三、公審冤情（二首）

1980年于北京復興醫院

（一）

強加罪三條，兩條是偽造。
無罪判重刑，執法何殘暴。
服法不服罪，歷史評公道。
鋼鐵帽子廠，誣陷不折腰。

（二）

文革大動亂，是非皆顛倒。
造反毀棟梁，禍首皆安然。
誣陷強加罪，判刑無公平。
權勢壓山岳，雖屈老夫心。

方块字读书社区

三十四、評律師

1980年12月于北京復興醫院

尊敬公正人，天知無偏心。
官方辯護詞，和尚照念經。¹
遵命防風險，明哲可保身。
邊鼓敲兩下，有聲勝無聲。

三十五、寄語難友²

1980年冬

我鎖陰房君關牢，患難相共，風雨霧雪煞。
不惜斷頭血污草，何愁鐵窗和鐐銬。
誰將鹿馬強顛倒，五洲四海，鸚鵡學舌少。
正氣歌聲風節高，粉身碎骨羞跪饒。

三十六、險渡一九八零年

1981年元旦信筆

去歲垂危年，嗚呼哀哉險。
病魔狠毒心，瘟神爭獐臉。
幸喜妙手醫，堪慰苦舌戰。
除舊依稀夢，迎新鞭炮烟。

註1。律師的辯護詞要經官方修改。
萬塊字讀書社區

註2。公審期間，托子女抄送家書。

三十七、展 望

1981年春節

萬物經常變，世事不斷新。
庚申猴年捧桃，辛酉鷄啼明。
十億發奮圖強，工農生產自立，民心盼安定。
災難化烟雲，春風楊柳青。

奔四化，拔左根，鏟右傾。
實事求是成風，馬列重國情。
不怕山攔水阻，何愁風吹雨淋，開始新長征。
倏忽年華度，滿目琳琅景。

三十八、自 壽

1981年4月

人生征途談何易，九死一生六十七¹。
沙場鐵窗送葬頻，白髮病魔催命急。
天限七十古來少，祇因流水尚能西。
老夫困境爭八十，身世沉淪壽奇迹。

三十九、懷念家鄉親人

1981年5月

蒼茫贛水向北流，揮戈離鄉半百秋。
大江南北風霜烈，長城內外烟塵稠。
勘定寇賊平四海，喚起工農興九州。
風雲突變江山亂，身陷囹圄心負疚。

方块字读书社区

¹註1，自我紀念67歲的生日。

四十、孤燈夜思鄉

1981年夏

夜闌望孤燈，惡境思故鄉。
魂游山水田園，幼年苦生長。
適逢星火燎原，村村紅旗飄揚，揮戈鯤鵬飛。
輾轉滿頭霧，折翅燕山旁。

風淒淒，雨瀟瀟，夜茫茫。
武夫不問生死，誰管臭與芳。
草木一秋榮枯，人生一世興亡，監牢憶滄桑。
寒風摧葉落，難忘華鄂堂。

四十一、黑夜將黎明

1981年7月31日

疾風知勁草，烈火識真金。
誣陷恨山高，誹謗仇海深。
痛罵投機客，怒譴虎狼心。
歷史路曲折，事實樹常青。
求實上軌道，冤錯必澄清。
烏雲難持久，黑夜將黎明。

四十二、八一述懷

1981年8月1日

追隨旌旗五十年，驚馬汗血未偷閑。
先是沙場弓箭兵，後為帷幄運籌員。
大陸除惡才能疏，疆海天冠智謀淺。
名位祿榮空俱高，古稀橫加悲劇篇。

四十三、心有明燈

傷心往事記最深，豪氣猶存創痕新。
莫道前程天色晚，心有明燈江山青。

第九篇

到太原之後

第四十七章

在太原的酸甜苦辣

一、治病送瘟神

我在太原的定居之所由山西省政府提供，是新建金剛里小區的省政府宿舍。到太原後，給我準備的房子暫時不能居住，主要原因，一是房子新建不久還比較潮濕；二是鍋爐房尚未完工，無法提供暖氣；三是四壁空空，什麼家具也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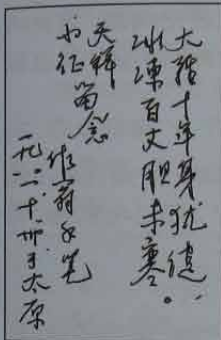
這樣下了火車，就用汽車把我拉到山西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在那裏的幹部病房樓，給我預備一個單間病房，由我的小兒子李炎天陪床，住院治病。

我們是半夜到達的，醫院的心血管專家、內科主任王珈璣尚在醫院等待我們的來到。很快進行了身體初步檢查，初步了解我的

方块字读书社区

病史情况，吃完藥就休息了。

從第二天起，開始對我的身體進行全面檢查，大約一周後，做出的結論是：心血管動脈硬化，供血不足，高血壓，腦血管動脈硬化，心律不齊，忽慢忽快并有早搏，初步診斷為竇房結綜合癥等等。隨即輸液服藥進行治療。



1981年10月 山西太原

住院治療約一個月後，身體稍有好轉，我就在醫院附近的小照相館，照了到太原後的第一張照片，並在照片的背面題寫：“大難十年身猶健 冰凍百丈膽未寒”。

那時的體重不到一百四十斤。

這裏的醫院和北京復興醫院不同，那裏是監獄醫院，活動範圍很小，不能隨便與其他病人接觸（判決以後可以同陳伯達、黃永勝接觸），一切行動受監管人員的監視。那裏的伙食條件差，治療條件也一般。太原山醫二院治療條件很好，伙食條件不太好，以面食為主，連米飯都吃不上，菜也簡單（我是南方人，喜吃米飯）。但陪床的孩子們，可以到街上的飯館買些米飯、炒菜和熟肉制品等，調劑一下伙食。

這裏幹部病房祇要遵守院規、遵守病房規則之外，行動是自由的。可以在樓上平臺散步，可以到樓下大院内散步，祇要不耽誤自己治療，可以同一般病人接觸，也可以到附近商場購買物品等等。

幹部病房住有各種各樣的病人，有抗日時期的幹部，有解放戰爭時期的幹部，也有建國後的幹部。大部是在山西工作的幹部，也有曾在山東工作過，及在東北工作過的幹部，及在115師和四野工作過的，以後轉業到山西的幹部。

方映宇讀書社區

開始時，我按照公安部的要求，一直自稱叫李明，但病友很快就知道我是誰了。

因此，有戰爭年代和我在一個地區或一個部隊工作過的老戰友們，慢慢的，既謹慎又友好地向我接近，從互打招呼，到問候病情，到串門交談，問長問短，熱情相處。開始多談身體、生活、社會新聞、戰爭年代的往事。以後就慢慢地談政治問題，談我的問題，談不久前的公審問題。這些老幹部們，無話不談，我也祇好有限度的與他們交談。

有人問：“公審對你的判刑你服不服？”

我回答：“不服也得服，法庭宣布是最後判決，有意見也不能上訴，因此祇好‘理解也執行，不理解也執行’。啞巴吃黃連，有苦不能說，有什麼辦法。”

有人問：“林彪為什麼要謀害毛主席？”

我回答：“這個問題我也說不清楚。‘九·一三’事件之後，我看到林彪兒子林立果為首搞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其中心內容是：第一對‘四人幫’，搞文革打倒大批老幹部不滿；第二對所謂‘國窮民也窮’的政策、老百姓生活很苦，沒有改善表示不滿；第三特別對廬山會議對林彪的批判不滿。至于組織什麼‘教導隊’，密謀用火箭筒打毛主席乘坐的火車，陰謀殺害毛主席等等之類行動，據我看，不像是一個久經沙場，指揮過千軍萬馬的林彪的作為，更像是沒有打過仗、沒有聽過槍響，連屁也不懂的林立果等人，像小孩過家家似的搞的胡作非為。”

有人問：“林彪為什麼往蘇聯逃跑？”

我回答：“這個問題我也說不清楚。但我想可能是避難，是害怕毛主席整他，害怕變成劉少奇、彭德懷第二。像朝鮮、越南個別領導人往中國跑一樣。這是我的估計，不一定正確。有的說是綁架走的，我看也有可能。”

有些老同志也向我表露他們對公審的態度。有人說：“你的問題主要是山海關機場問題，我看山海關機場問題的關鍵，也不是經過一人批准，也不是四人聯合命令，而是林彪飛機強行起

方块字读书社区

飛。其他都是次要的。”也有人說：“你向黃永勝報告毛主席在武漢接見各地領導幹部談話內容，這是政治生活中的正常現象，上下級通通情況，還有錯啦？”

遇到這種議論，我一般不做正面回答，而說：“古人曰，旁觀者清。”

還有些人，關心我目前的生活待遇問題。

有人問：“你現在的生活怎樣？”

我回答：“每月給我一百元，同太原普通市民生活水平差不多，我是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什麼困難也能克服。有吃、有穿、有住，餓不死，凍不着就行啦！與戰爭年代的條件相比好多啦！”



當時太原市公安局為老伴開具准予遷入的證明

在醫院住了兩個多月，到1981年12月下旬出院，搬到金剛里宿舍。

此時我的老伴，也由北京來到太原，我的二女兒和她的丈夫及外孫女兒一家三口，也來到太原定居，照顧我們兩個老人。

我們住太原金剛里一棟宿舍樓的二層。包括相鄰的兩套單元房，共140多平米。一套三間半，約90平米，我們兩個老人居住，其中向南的兩間，一間是我們的臥室（床頭放着公安廳配給的氧氣瓶），一間是書房。向北的一間半，一間是飯堂（兼客房，孩子們來時臨時住），半間是儲藏室。另一套一間

半，約50平米，住我的女兒一家。我們老少六口人（還請了一位小保姆），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吃飯。

當時，太原老百姓的住房非常緊張，條件也很差。我不能與過去的住房相比，但與坊巷字讀書社區住房相比，我住兩套房已經很不錯了。

從1981年到太原住院開始，到1991年的十年左右時間內，我共住了七次醫院。其中除一次眼睛犯了青光眼、白內障，一次是急性肺炎、缺鐵性貧血之外，其他各次均是心臟不好而住院的。有兩次心肌梗塞特別嚴重，差點兒“閻王”去了，由于搶救及時，結果起死回生，把瘟神趕走了。

一次是1985年11月21日，早晨6時起床，然後上廁所、洗漱完畢，尚覺沒有什麼問題。在室內散步時，覺得心慌胸悶，即停止散步，在書房靜坐，含了一片硝酸甘油仍覺不好，覺得又要大便，到廁所坐了一會兒沒有便出，心慌胸悶更厲害，全身無力。

這時腦子還清醒，趕快出廁所，想到臥室躺下。剛出廁所歪歪扭扭走了幾步，就毫無支撐地摔倒在地，此時已經完全昏迷，失去知覺，什麼也不知道了，同死人一樣，瞳孔放大，脈搏微弱。

我的老伴是長期做醫務工作的，發現我摔倒在地，立即趕來急救。首先上了二顆“炮彈”（亞硝酸异戊脂），才慢慢蘇醒過來，脈搏也有了，這時人才算活過來了。犯心臟病的人，最忌諱搬動。我的老伴深知這一點，整個搶救過程都沒有搬動我，祇是將我平躺在地板上，她跪在我身邊實施搶救措施。

半個小時之後，基本平穩下來了，我的老伴、女兒和小保姆三人把我抬到床上，再吸上氧氣，再含硝酸甘油。這時才知道頭痛，是摔倒在地造成的腦震蕩。多虧搶救及時，措施得當，閻王老子沒有把我抓走。在北京的兒女們，聽到此消息都嚇了一跳，紛紛跑到太原探望。

又一次犯病是1986年7月29日，午餐炒了新鮮豬肝，我喜歡吃，又好久沒有吃了，結果多吃了兩口，飯後不久就覺得飽脹不舒服。

我即在室內進行消食散步，越走越覺得心慌胸悶，全身無力，趕快服用硝酸甘油，並在臥室躺下，仍然難受，呼吸越來越困難，同時發生嘔吐，小便失禁，人處於昏迷狀態。老伴當時又立即使用“炮彈”衝擊，緊跟着方峽字讀書社區漸漸恢復知覺，聽到身邊有人說話的聲音。我的老伴又一次把我從死亡線上拉回來。



在山醫二院住院

此時醫院救護車已趕到，把我送進醫院治療。我的大兒子李冰天，次日從北京趕到太原，到醫院陪床。幾天後，我的小女兒李小征，也由北京來到太原，接替李冰天的陪床任務。半月後，我的大女兒李大征由沈陽來到太原接替小征的工作。那時大家都擔心我可能一命歸西，都要來為我盡孝。誰知我的命大，不是閻王把我忘記了，而是我的老伴憑借對病情的了解、運用醫治技術得當、當機

立斷進行搶救，終於把“瘟神”驅逐走了，因此我仍然活着。說我的老伴是我的救命恩人，一點不過分。

這是我的生命危機的第二次紅色信號，比去年11月那次危機還要嚴重。在醫院輸液、打針、吃藥。住了半個多月，病情基本上穩定了，但身體沒有完全恢復，心電圖仍然不好。

我于8月下旬出院回家療養。出院時心血管專家王主任警告我說：“李老，你的心肌梗塞已經再一再二的發作了，無論如何不能再三，這種發作肯定是一次比一次嚴重，死活各占百分之五十。搶救及時得法可以救活，搶救不及時不得法就可能死亡。這不是我嚇唬你，而是我的經驗之談。”又告訴我：“你今後要特別注意幾點：一是要保持心情愉快樂觀，不要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二是注意飲食，不要吃得太飽，少吃多餐，少吃不易消化的食品；三是適當運動，到室外運動時要有人陪伴，防止發生意外，鍛煉要適可而止，不能過度疲勞；四是按時服用治療藥品，必須隨身攜帶急救盒。”

方块字读书社区

由于病情複雜，雖然按照醫囑盡量注意，但小的發作、中等程度的發作仍然不斷。有情緒性的心絞痛，有排便性的心絞痛，

有睡覺姿勢不當引起的心絞痛等等，防不勝防，稍不注意就出毛病。

開始是山醫二院的大夫經常出診到家裏來看病開藥方，由我們派人到醫院取藥。以後改為我是山醫二院的“家庭病床”的病人，由負責“家庭病床”的大夫和護士每周或隔周到家裏診斷開藥方，由護士隨即供給藥品，這樣就更方便了。

在太原期間，山西省衛生廳對我的治療問題還是重視的，我對山醫二院的治療也是滿意的，我很感謝他們。我曾將多年病情和各種心電圖材料送沈陽我的大女兒（也是大夫）處，由她送沈陽有名的心血管專家研究，他們也對我的病情提出了寶貴的醫療建議。

總而言之，狂風不能把我摧折，暴雨不能把我衝垮，雷電不能把我擊倒，冰雪不能把我埋葬，瘟神病魔也無可奈何。

二、生活苦與樂

到太原的初期，給我的待遇標準是每月100元生活費。我的老伴給80元生活費，兩人合計180元。這些錢用于生活，祇能做到粗茶淡飯不寬裕，餓不死、撐不着，也算勉強過得去。但付出了伙食、房租、水電費之後，在添置其他生活用品，或者想增加一些營養，就很困難了。

從1985年開始，我的生活費提高為每月200元。老伴每月也可拿到270元左右。這樣我們的生活才有了一些鬆動，才有可能逐步地購買了必需的沙發、書櫃等家具，和電視、冰箱、洗衣機等必備的家用電器，訂閱報紙、雜誌，並自費安裝了電話。

我的生活規律是早晨6時起床，洗漱之後即到室外散步一個多小時。我住的小區就在汾河岸邊，每天沿着綠樹成行的岸邊小道走走，心情很是舒暢。我還可以逛逛早市，買點新鮮蔬菜，買點油條（太原人稱油條為“麻葉”）、豆腐腦都很

方便。

散步回家後，7時半吃早餐，上午寫作或看書。12點吃午餐，12時半到14時半午睡。醒後躺在床上看訂閱的報紙、雜誌。下午多躺一會兒，可以使兩腳浮腫的現象緩解一些。起床後，稍微做一些活動，吃點水果，聽聽音樂。18時晚餐。而後看電視，22時半睡覺。如果是喜歡看的電視節目，就一直看完（我最喜歡看的是成本大套的京劇和各種球類比賽），不喜歡看的，根本不看，用這段時間看一些消遣的閑書。

每周還要帶着小保姆，到二華里外的柳溪菜市場，集中採購肉、魚、蛋、糧、油等食品，並在那裏瀏覽各類商品，了解市場物價，觀看來往人群，也是自成樂趣。

剛到太原時，仍保持過去家中的習慣，看書、看報、看喜愛的雜誌，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項內容，自費訂購了不少的報紙、刊物，如《人民日報》、《山西日報》、《太原日報》、《紅旗》雜誌等。可是後來因報紙刊物價格上漲的太高、太快，實在承受不了，祇得忍痛取消了大部分，祇保留了三種報紙：《太原日報》，了解居家所在的見聞；《參考消息》，略知國際大事；《文摘報》，看些雜聞、奇聞，跟上潮流。

以前我很喜歡逛書店，見到喜歡的書就買。迅速提高的書價，將我逼出了書店。見到好書祇是拿在手裏反復翻看，而很難下決心購買。至於電影院、戲院則基本上與我無緣。

我們平常伙食很簡單，早、晚面食為主，午餐米飯，兩菜一湯，菜是一葷一素。星期天改善伙食，菜飯均好一些。兒女們來團聚，就要吃得好一些。過年過節也吃得好一些。所謂“好一些”，也不過是餐桌上增加些鷄、魚、肉、蛋之類的菜肴。

和過去一樣，老伴管家、管錢。我們的辦法是精打細算，省吃儉用，購買最基本、最經濟、最實用的物品，因此我們的生活仍然過得去，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知足者常樂。

來太原時，據說**方塊字讀書社區**省公安廳勸我外出時戴墨鏡、戴口罩，以防意外。其實這不過是掩耳盜鈴，公審提高了我們

的知名程度，想在百姓中隱姓埋名，不暴露廬山真面目，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第一次外出，就碰上太原海校認識我的一位幹部，並很熱情的與我握手。第二次外出又碰上抗日時期曾在山東軍區司令部機要科工作的一位幹部（已離休），互相談往言今甚久。

第三次外出碰上第十三冶金建築公司一位五十歲左右的中年婦女，她擋住我的去路，問我姓什麼。

我答：“姓張。”

她說：“你不是姓張，你姓李。”她肯定的說：“你是李司令”。

我說：“你怎麼知道我是李司令？認錯人了吧。”

她說：“我在電影裏看過你，我們十三冶東北人很多，有不少人知道你，經常談論你們在東北打仗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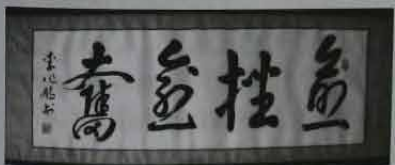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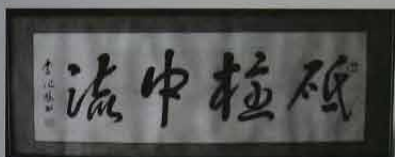
類似的情況不少。一傳十，十傳百，很快金剛里、十三冶、旱西關、新建路一帶的居民、商店、小攤，知道我的人越來越多，街談巷議、說長道短的不少。

他們對我的態度大體有三種：一是友好關心，具有同情之心，敢于接近我，同我談話，也敢到我家串門，誠懇地表示，沒有你們打江山，就沒有今天的社會主義。我生活中的困難願意協助解決；二是平平常常不好不壞，鄰裏相待，見面點頭問安，一笑而過，敬而遠之，但也沒有什麼惡意；三是心懷惡意，仇恨很深，你在前面走，他在後面罵娘。

是年（1982年）4月正是冰化雪融春暖花開之際，有一天在我所住的宿舍樓西端牆壁上，貼了一張大字報，我沒有看到，是次日晨房管負責人發現的，立即將其撕下。據說其內容主要是“此樓內住的是林彪死黨、大反革命李作鵬，他沒有資格住在這裏，限三天之內搬走，否則我們要採取革命行動”，雲雲。同時為了收到報紙，我自己安裝在樓下大門內牆壁上的一個信箱也被人丟掉。為此事當地派出所還進行了調查，結果如何，我不知道。我認為小事一樁，心中泰然處之。方塊字讀書社區 一位派出所副所長住在我宿舍不遠的地方，據說是為了保護我的安全。

開始兩年確實“門前車馬稀”，鬼都不登門。後來逐漸和我們交往的人越來越多。我們也逐漸溶入當地老百姓的汪洋大海之中，與大家同喜同怨，地方新聞、小道消息、群眾議論也都成為我們與大家交流的內容。

與此同時，有些人知道我在練字，向我要字的人也開始多起來，交流書法感情，也成了我以“字”交友的一種形式。其實我的“書法”是鬼畫桃符，不像樣子。但有些人說：“一要你的字，二要你的名，有了你的名字，就有價值了”。我是一個“臭名遠揚”的人，還有什麼“價值”？但也可以看出有些人的獵奇心理，有些人的思想“解放”。我大體上是“有求必應”，你願意要，我就答應寫，不管你是幹部也好，是工人也好，一視同仁。



有兩幅字不論是住在太原，還是以後住北京，我始終挂在客廳內，供大家欣賞。一幅是“砥柱中流”，寓意我的前半生經歷，一幅是“愈挫愈奮”寓意我的後半生經歷。寫的雖然不好，但我喜歡。

前來看我的人，北從東北，南自廣東，全國各地都有。多數是我過去的部下、同事和戰友，也有我的親屬。我非常感謝他們的好意和關心，對我這樣倒霉的人是極大的安慰。

但我決心不見記者，不論什麼記者，我都拒絕接見。文藝作家我也不見。為什麼不見？因為我的要求是：公開發表的內容必須是我的原話，一個字也不能改動！在當時，我的要求是無法滿足的，這樣也就堵住了借我之名瞎說亂寫的口子。1985年，香港某報社有位記者想見我，被我拒絕。想要我一張近照，我也不給。他想利用我外出散步，我就閉門不出。結果他祇好失望地走了。甚至某知名軍史作家要求見我，我也沒有答應。我

到沈陽，他隨後跟到沈陽，再次要求見我，我仍然沒有答應。

三、拙筆寫春秋

1981年12月下旬，由醫院搬到金剛里宿舍時，我在北京被抄家和封存的衣物、書籍、日常用品等，除沒收、散失和損壞外，其餘均已退回並運到太原。而我所有在各種場合（包括戰爭年代）的講話稿件、各種報告稿件、各種發言稿件、各種筆記日記、各種詩詞底稿、各種信件和文章底稿等等均全部抄走，至今一字未退回。這是我最大的損失，是精神和心血的損失，是多少金錢也買不到、也補償不了的。由此造成我今日寫回憶文章的極大的困難。至於物質上的損失從數量上來講，也是相當大的。

對於經過文化大革命的人來講，對“抄家”的內涵是清楚的，更何況我的家被抄過多次。退還的箱子上，封條多達七、八層，不管什麼衣物，一律塗上膠水，並多次貼上各種標籤，標籤也是種類繁多，有海軍的，有中央專案組的，有公安部的，有秦城監獄的，很多照片看得出是經過多次展覽，並在照片上進行了塗改。經過這樣篋子梳頭般的清理，所剩還能多少，就可想而知了。

1982年元旦我們過得很簡單，但春節過得很熱鬧。冰天一家、小征一家，均來到太原，加上幼征一家，我們老老小小十一口人，每天在一起圍桌而坐吃團圓飯，有說有笑，談家常、憶往事、論今天，這是我們十年來第一次高興的團聚，第一次開心痛飲，骨肉情深，其樂融融。過了元宵節他們才散去。

春節之後，我曾想在春暖花開時節到農村看看分田單幹、包產到戶的情況，到工廠礦山參觀開開眼界。我想關押的國民黨戰犯都可以四處參觀，我為什麼不可以去參觀呢？十年沒有接觸社會，沒有接觸工農群眾，農村變化了，工廠企業變化了，各條戰線的情況都變化了，我的思想則長期閉塞於區區，孤陋寡聞，深有隔世之感，跟不上形勢。問今是何時，不知有漢，不知有魏晉。

方块字读书社区

這個想法尚未正式提出來，有一天山西公安廳來了一個幹部，向我宣布了三條禁令：第一不准與外國通訊；第二不准接見外國記者；第三離開太原要請示批准。

我問：“這是哪裏的規定？”

回答：“上級的規定。”

我問：“哪個上級？”

回答：“那你就不要問了。”

我對這種空口無憑，不見文字，不見文件的處理辦法有疑問，因此立即給山西省公安廳及省委省府寫了一封信，明確提出：

“今後凡中央和山西省對我在太原的生活有什麼要求和規定，一律以文字為證，以防魚目混珠，不便執行”。

自此之後，山西方面再沒有提出什麼要求了。為什麼那麼怕外國人？大概有點心虛。其實經過長時間大吹大擂的公開廣播、報刊宣傳，全世界哪有不知道的。問題是祇講一面之詞，不准有異議，害怕泄露不同意見，害怕暴露真相、使欺騙蒙蔽破產。

既然參觀農村、工廠不可能，那就實行考慮已久的一件事——坐下來寫回憶文章。

雖然我的寫作計劃不算龐大，但也不是輕而易舉的。開始，我初步打算寫三部曲（分三個小冊子）：第一部是我的戎馬生涯，寫戰爭；第二部是文革經歷，寫文革前期五年；第三部是幽禁悲劇，寫“九·一三”事件之後的經歷。之後，我還想寫一部戰爭年代有關林彪的文章。“到太原以後”的那一部分是後來增加的，是九十年代以後補寫完成的。這樣算起來就是五大部分了，分五個小冊子。

根據手中的材料，我採取先易後難的辦法，由近至遠，先寫“九·二四”之後，隔離審查、銀鐐入獄和公審的實情，再寫到海軍工作後的經歷，以及戰爭時期烽火年代的回顧，最後再寫戰爭歲月中的林彪。寫作同時，千方百計搜集歷史材料。

我寫回憶文章的目的，既不是為名，也不是為利，而是為歷史，為子孫後代留下一點我親身經歷，我所見所聞的真實資料。

方块字读书社区

我也許看不到出版，但人亡物在。

我是工農出身，文化很低，初小四年級水平，主要是參加革命之後不斷學習，及長期做參謀工作，在實踐中鍛煉提高的。高級機關的參謀工作要“會寫、會畫、會算”：會寫通知、命令，會寫作戰計劃，會寫訓練計劃，會寫報告、總結，會寫各種電報；會畫敵軍態勢圖，會畫我軍態勢圖，會畫敵我態勢圖，會畫我軍進攻戰役部署圖；會計算敵人兵力，會計算我軍兵力，會計算敵我兵力對比，會計算敵我雙方行進路程、行進速度、到達預定地點的時間，會計算我軍傷亡、消耗、補充等等。由于上述原因，我的文化水平才有所提高，但永遠是一個小學生。

寫回憶文章與做參謀工作不盡相同，但也有相通之處。同打仗一樣，寫文章要有充分的準備，“不打無準備之戰”。準備愈充分，則成功可能性愈大。倉促上陣，急于求勝，“打莽撞仗”，則成功可能性甚小。應有正確的思想指導，應有充分的材料，應有一定的寫作技巧，這三條都重要，缺一不可。其中充分地占有史實材料尤其重要，在史實材料的基礎上產生觀點，產生思想。史實材料是文章的基礎，材料越多越好，越具體越好，越真實越好。回憶文章是歷史，是紀實，不是文藝小說，不能虛構空談，要對歷史負責。

從1982年起，我用了整整兩年的時間，進行思想準備和史實材料的準備。思想準備是對任何一篇文章要確定一個中心。大中心裏面有小中心，突出什麼問題，以什麼為主，以什麼為次。首先寫什麼，中間寫什麼，最後寫什麼。根據手中的材料要認真獨立思考，提倡“三思而行”，沒有想好就不要動筆。同時，千方百計到處收



方块字读书社区

集有關史實材料，然後對材料進行分析選擇，哪些可用，哪些不可用，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真實的，哪些是虛假的，按次序排列，以便使用方便。

1984年，我開始動筆寫回憶文章。因為帶病寫作，速度極慢，寫寫停停，停停寫寫，到年底，我被閹押後的實錄部分，基本寫成初稿，共約十萬字左右，書名為《獄中人的心聲》。

1985年，我乘勝前進繼續寫作。經過一年的努力，我的第二部作品又基本寫成初稿，約十五萬字左右，書名為《兵荒馬亂的文革前期》。

1986年起到1988年，花費了三年的時間，完成了戰爭年代回顧的初稿，共三十萬字左右，書名定為《沙場回憶》。

因為健康原因，在此期間內四次進醫院，耽誤時間不少。出院後醫生規定，每天祇能寫兩小時，我有時照辦，有時也不照辦。文思涌來，不寫完一個章節是很難停筆的。但身體是第一位的，寫作是第二位的，這是必須遵守的原則。所以拖拖拉拉，兩天打魚三天曬網，從準備寫作開始，搞了七年才完成。

三部作品完成了初稿，共五十五萬字左右，我才鬆了一口氣，懸挂的心也放下來了。完成了心願，祇覺得格外的輕鬆，祇感到其樂無窮。下一步的任務是寫第四部《蓋棺論英雄——戰爭歲月的林彪》。

1988年12月，我們到北京、沈陽探親訪友，半年後返并。1990年10月我們再次到北京，1991年7月返并。我在北京將前三部作品手稿進行整理打印。這樣就可以集中精力考慮第二步寫作計劃，即動手著筆《戰爭歲月中的林彪》。這是攻堅戰，困難更多，1993年此稿停筆，共二十萬字左右。這樣“十年磨一劍”的任務基本完成了。

從1994年（我已滿八十歲了）開始，我着手寫《到太原之後》，主要是根據我的日記，寫到太原後十年的生活情況。接着我又將建國初期（1950年後）到調任南京（1962年前）的工作經歷，寫了一篇《風雨十二年》。這篇小冊子，主要寫我在武漢高級

步兵學校、在南京軍事學院和在總參軍訓部工作期間的情況。這樣，我的回憶錄就比較連貫，比較完整了。同時，我又將能收集到的、曾公開發表過的文章進行整理。這樣，用了三年時間，寫了約五萬字，整理發表過的文章約五萬字。到1996年，前前後後十四年，我寫了（包括整理文章）八十多萬字的初稿。

從1997年開始，我一邊修改初稿，一邊整理我寫的詩集、雜文等（約十萬字左右）和保存下來的千餘張歷史照片。

在寫回憶錄的過程中，我一邊寫，一邊重溫自己一生的歷程，一邊寫，一邊反思自己對林彪事件的認識過程。2004年，在對回憶錄多次修改，基本定稿之後，我心中的石頭終於落地了。此時我意識到，在自己已是耄耋之年，要用最後的機會，向黨再一次說出自己的看法。我給中央寫了兩封近萬字的長信，題目叫《不平則鳴》。現在我決定將這兩封信，也收錄到本書中（見附錄）。

四、家中被盜

1988年3月25日凌晨3時，老伴起來上廁所，拉開臥室門出來，隱約看到走廊的地下一堆黑糊糊的東西。開燈辨認，是我們平時外出穿用的兩件呢子大衣被扔在地上，當時不知所措，便急忙將我喚醒。經查看，我的書房被翻得亂七八糟，飯廳擺放的酒櫃、抽屜也被翻亂，儲藏室的窗戶被打開，進出的大門是虛掩着的，很顯然，是盜賊破窗竄入室內進行偷盜，然後從室內打開大門揚長而去。我們馬上向省公安廳及太原北城區公安局報了案。

當天上午，省公安廳及北城區公安分局均來了人，有七八名偵緝專業人員，詳細察看了現場，進行了拍照並取到鞋印、衣印、指紋等線索。

特別莫名其妙的是，盜賊還留下兩張字條才離去，一張寫着“窮生盜，并兩日記，不會外傳”，另一張寫着“情深”兩字。公安人員說他們破了幾十年的案，從沒有看到這種現象，偷了東西不

方块字读书社区

但不消滅痕迹，還故意留下痕迹，真是欺人太甚。

盜賊沒有進我們的臥室，如果進入臥室就可能發生意外。我為了防止壞人謀害，早在我的床頭備有自衛的鐵棍。幾十年的老兵，防人暗害的常識是懂得的。

經過清查，被盜走的物品主要是我的日記手稿和一些抄家後歸還的物品等等。

這次失盜給我最沉重的打擊是，盜賊偷走了我的兩本日記和部分文章、詩詞手稿。

25日晚上，省司法廳梁廳長來到我的家裏，研究今後如何防盜及保證人身安全，並親自察看了被盜情況及宿舍門、窗情況，最後做了四點指示：第一，這個賊不是經濟盜賊，是與政治有關的文化盜賊，此人可能到過你家，知道你們的情況，你們好好回憶一下，看有什麼可疑的人來過，協同公安機關破案。第二，你們的門窗要全部加固，由我們負責將所有窗戶安上防盜鐵欄，同時加固門鎖。第三，把重要的物品集中放在臥室，一旦有事固守臥室，不要輕易與盜賊相碰，否則可能要吃虧。第四，公安機關已組織專門破案小組，確定這是一個特重案件，要力爭限期破案。我認為梁廳長這幾點指示很好，但這個案一直到今天仍沒有破。

五、刑滿釋放

1988年9月22日上午，北京公安部、秦城監獄、省司法廳、太原北城公安分局、三橋派出所等單位共七人，來到我的宿舍，宣布中央有關決定：第一刑期已滿，恢復自由，恢復原來名字。訪親會友，旅遊觀光，願到哪裏均可；第二在太原安家落戶，生活費每月250元，醫療費實報實銷，機動補助費由單位掌握；第三剝奪政治權利五年仍要繼續執行。在此期間內沒有選舉和被選舉權，沒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自由，也不能擔任社會團體領導職務。可以發表戰爭回憶錄，但發表關於文革的文章要經過政治審查。

方块字读书社区



對外國記者要回避，不能舉行記者招待會；第四對安置問題、生活問題有意見仍可向中央反映。

以上決定宣布之後，發給我一張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釋放證明書”，三橋派出所給我發了戶口本，以後又發了身份證。

從此我由一個久經大難的囚徒，變成了一個沒有政治權利的賤民。這一場“持久戰”，已經熬出來一點頭

緒，黑暗中已經看到了一點曙光，困難中已經看到了一點希望，烏雲萬里又露出了一點晴空。

恢復自由，心情當然輕鬆多了，但還有五年“尾巴”，壓力并未完全解除。爲了慶祝恢復自由，我的大兒子冰天、小女兒小征勸我到外面走走。

9月27日，我和老伴及冰天、小征乘車游覽了太原名勝——晉祠。六十年代初，我到太原巡視國防生產情況時，曾去過晉祠，印象不錯。這次流放太原七年，這是第一次到郊外游玩。由太原到晉祠有新修的公路，汽車半小時就到了。晉祠“難老泉”的水也“老”了，快枯竭了，幾座廟殿也老化陳舊，沒有修整，唯公園的花草林木修整的甚好。我們東走走，西看看，一直玩到下午四時才返回城內。

回家後興致猶在，又賦小詩一首：

游晉祠詩 1988年秋

晉國分封勝迹留，老夫興到喜重游。
懸山晉水奪眼底，樹色嵐光翠若浮。
桐封功業陡波去，胸中塊壘一時休。
大難不死夕陽短，無意再登百尺樓。

在宣布中央決定之前的**方块字读书社区**，山西省委、省政府寫了一封信，其內容是：飽嘗十七年服刑的滋味很快就要到期了，恢復

自由之後的去向問題，當然應遵照中央的安排執行，如果徵求我的意見，最好是回北京。因為我的子女大多在北京工作，而在太原是舉目無親，四顧陌生。但中央如果決定我留在太原，我也一定服從。唯一希望是在醫療方面、生活方面、安全方面有所改善。如果這三方面的情况不如現在或同現在一樣，那我何必離開司法廳。我知道我現在的處境不敢有任何的奢求，但我有許多實際的困難，希望放寬政策，適當照顧……。

後來事實證明，我的要求無人置理。我和老伴都歸了太原第一軍隊幹部休養所，按一般退休幹部待遇。

1993年9月24日，剝奪政治權利五年的期限已到，但不見任何人來向我宣布，因此我向有關領導提出“嚴重抗議”，現將信件抄錄如下：

山西省委、省政府并請轉中央：

1988年9月22日，北京公安部、山西省公安廳、太原公安局派人代表中央向我宣布刑滿釋放，發給釋放證，恢復行動自由。并宣布，自1988年9月24日至1993年9月23日，剝奪政治權利五年仍然有效。但現在剝奪政治權利五年期限已滿，仍不見任何人前來向我宣布恢復政治權利，這是為什麼？我不知道。

我認為這是有關領導官僚主義、忽視法律、不關心人的政治權利的表現。這是執法機關嚴重的失職。這是極不嚴肅、不公正的對待公民的錯誤行為。

據悉山東公安廳已于十天前派人代表中央，向在濟南的吳法憲宣布，剝奪政治權利五年已期滿，完全恢復公民政治自由權利，并每月增加生活費100元。

期滿之後，我又等待了兩天，仍不見任何動靜。因此我特向有關領導提出嚴重的抗議，并保留追究其錯誤責任的權利。

自9月25日起，我決定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的條款，堅決執行。

方块字读书社区 李作鹏

1993年9月26日

至此，特別法庭判決我的超級刑罰徹底完成了。我所欠國家的政治債務徹底償還清了。但是，我所遭受的冤屈，我所承擔的錯誤結論，仍然像泰山壓頂，將我深埋其中，我的心情隨時隨地處于痛楚之中。

六、在誕辰家宴上的講話

1971年之前，我和老伴從來不過生日，一是工作忙，二是沒有這個習慣。

1984年4月22日是我七十壽辰，也是出獄的第三個年頭。在孩子們的強烈要求下，我同意過壽日。我們的五個兒女及家人，大小一共十三口，分別由北京、沈陽來到太原為我做壽，這是我們妻離子散十三年後的全家大團圓。為此，我們還照了一張全家福的照片。



1984年4月 太原 賀七十壽辰

此時，我已有了兩個孫子，兩個外孫子和兩個外孫女。大家濟濟一堂，熱熱鬧鬧，七手八腳的擺設了很豐盛的家宴，我做了簡短的宴前講話。

我說：

1930年，我十六歲參加紅軍，從那時開始，南征北戰，出生入死，打了二十年的仗，參加了粉碎敵人對中央蘇區的各次“圍剿”，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參加了八年抗日戰爭，參加了解放全中國的解放戰爭。從華南打到東北松花江，又從東北、華北、華中，打到華南海南島。隨着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由勝

方块字读书社区

利走向勝利，我也因立戰功，打勝仗，由一名普通戰士不斷晉升到初級幹部、中級幹部、高級幹部的工作崗位，水漲船高，青雲直上，成為解放軍的將軍，成為解放軍的領導成員之一，成為中共中央領導成員之一，成為中外新聞名人。

由于毛主席、黨中央發動和領導的那場非常錯誤的文化大革命，我沒有看出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我擁護了文化大革命，我參加了文化大革命，我執行了文化大革命中的路線和政策，因此犯了很嚴重的錯誤，跟着毛主席犯錯誤，跟着黨中央犯錯誤，跟着廣大群眾犯錯誤，所以我的錯誤也不是普普通通的錯誤，而是更加嚴重、更加廣泛的錯誤，負有重大領導責任的錯誤。

林彪是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是軍隊日常工作主要領導人。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一切行動聽指揮。這是我四十年部隊生涯鍛煉出來的原則，而且戰爭實踐也驗證了這一點。因此我在他直接領導下，他的命令、他的指示，我是堅決執行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三支兩軍”是正確的，在廬山會議上，反對“四人幫”是正確的，我不相信他會謀害毛主席，我也不相信他會“叛國投修”。

我事先不知道他從山海關機場起飛要到什麼地方去，周恩來總理也沒有告訴我林彪的企圖，把我蒙在鼓裏，祇說夜航不安全，要四人批准才能放飛。9月13日0點20分，林彪汽車到達機場，0點30分就飛走了，祇有十分鐘時間，要四人批准放飛，根本不可能。

別有用心的一群人，以捏造的“有意放跑林彪”的罪名，把我打入“林彪反革命集團”，純是冤案，純是替罪羊，純是誹謗誣陷。我當然不能說瞎話，我當然不能承認，我當然不能求饒下跪！批判我是“頑固份子”，我覺得這是對我的肯定。

我不反對共產黨領導，我不反對人民民主專政，我不反對社會主義，我不反對馬列主義。因此強加在我頭上的“反革命”罪名，不管如何高壓，我始終沒有承認，我始終不可能

承認，我始終堅決抵抗。我的肩膀是硬的，是不怕壓的；我的骨頭是硬的，是不怕碎的；我的思想是清醒的，是不怕誣陷的；我的精神是頑強的，是不可能屈服的。我認為這是天大的冤案！我認為這是對我最殘酷的迫害，我認為這是某些人假公濟私的報復。歷史是公正的，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錯誤的東西是不可能持久的。

我的一生，除了童年時代外，有三個時期：推翻舊中國，建立新中國，戰爭年代二十年。反帝反修，建設社會主義二十年。倒霉垮臺，遭受災難二十二年。六十多年的經歷，有勝利，有失敗；有光明，有黑暗；有歡樂，有痛苦；有功勞，有冤枉！我這一生的經驗教訓，是十分豐富的，是非常深刻的。希望大家好好理解，好好體會，不要盲目相信那些胡說八道和流言蜚語的誹謗。

我的態度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我的理想是共產主義。

我的信仰是馬列主義。

我的奮鬥精神是不怕苦，不怕死。

我的主要敵人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及黨內修正主義、和平演變投降主義。

我相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最終會勝利！

宴席上，孩子們都講了話，互相鼓勵向前看，渡過黎明前的黑暗，前途是光明的。我們是打不爛、壓不碎、隔不斷、催不垮的。我們不靠天，不靠地，不靠鬼，不靠神，靠我們自己的本事吃飯，靠自己雙手勞動養家糊口，我們要為父母爭氣。

過了十年，八十歲壽辰（1994年4月22日）是在北京過的，除了五家孩子們外，還有世賢老大姐（老伴的姐姐）一家和世鐸老弟（老伴的弟弟）。人太多，家裏坐不下，祇好下飯館了。

宴前我講：人生道路不是鮮花，人生道路不是美酒，人生道路不是紅色地毯，人生道路不是輕歌曼舞，人生道路不是平坦無阻，人生道路不是一帆風順，人生道路是坎坎坷坷，人生道路是彎彎曲曲，人生道路是風風雨雨，人生道路是山山水水，人生道

路是勝利與失敗，人生道路是歡樂與痛苦。我一生的經歷更是千難萬苦，九死一生。我從沒想到能活到今天八十歲，這確確實實是我生命頑強的奇迹。

我提議：爲了八十歲的生命奇迹，爲了祖國的富強，爲了人民的幸福，爲了大家的健康，爲了明天比今天更好，乾杯！

我又說：“我現在八十歲，身體不算太壞，我的生命計劃是：最低綱領再活五年，最高綱領再活十年。人早晚是要死的，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萬壽無疆，永遠健康是唯心主義的幻想。因此我要宣布三件事情：

第一、如果我犯重病，無法挽救，就讓我安樂死去。

第二、我死後穿一身平常服裝，送火葬場火化，不留骨灰。

第三、死後，一切個人遺物由老伴董其采爲主，長女李大征，長子李冰天共同商量處理。

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我們是尊重科學的，我們不信天，不信地，不信鬼，不信神，紅、白都是喜事，生死都是必然現象。我們都是革命樂觀主義者，對於我宣布的三件事，不要有什麼不愉快”。

最後我再次提議：我們歡歡喜喜再乾一杯！

又過了十年，九十歲生日（2004年4月22日）也是在北京過的。那天，晴空萬里，風和日麗。我的心情也格外的好，因爲我基本完成了回憶錄修改的任務，完成了八十歲時定的最高



作者九十歲壽辰與老伴合影。



2001年老伴八十壽辰

方块字读书社区

目標“再活十年”的計劃。而且目前的身體狀況也不錯。

遺憾的是老伴的健康情況愈來愈差，基本上是臥床了，很少到室外活動了。孩子們辦的生日家宴她也參加不了了。沒有老伴的參加，家宴也辦的簡單。吃完飯，帶着生日蛋糕回家陪老伴，晚飯時與老伴一起吃蛋糕，她祝我生日快樂。我保留了兩張照片，一張是我九十歲與老伴的合影，一張是2001年老伴八十大壽時的全家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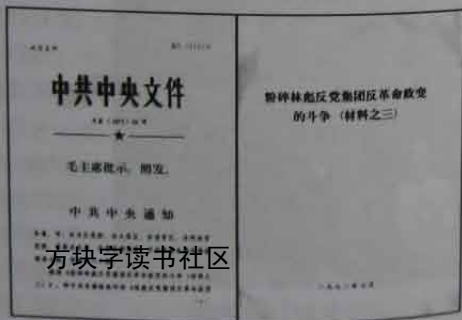
第四十八章 看到中央[1972]24號文件後

一、流傳很廣、影響極大的中央文件

到太原後，經過醫院的治療和在家中的安靜修養，精神和身體都得到了很大的恢復。

1982年夏秋之際，我看到一份中央文件，是中發[1972]24號文件。文件的題目是：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三）——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罪證。毛主席批示：照發。

文件首頁的中共中央通知說：“請



你們按照中發[1972]3號文件的精神，立即組織傳達、閱讀和討論”，要“開辦學習班，重點培養骨幹，然後向群眾普遍展開傳達宣講的辦法”。該文件同時翻譯成蒙、藏、維、哈、朝等少數民族文字。

這份文件，經過數十年的反復宣傳，已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達到了“深入人心”的地步。林彪與黃、吳、李、邱已成為“國家公敵”和萬惡不赦的“魔鬼”。這份流傳很廣、影響極大的中央文件，也是對我們蓋棺定論的重要依據。

二十多年過去了，如果說特別法庭對我們的《起訴書》、《判決書》人民早已記憶模糊的話，“九屆二中全會”、“林彪要當國家主席”、“南逃另立中央”、“謀害毛澤東”、“‘九·一三’事件，林彪投敵叛國，折戟沉沙”、“林立果組織小艦隊”等事件，老百姓依然記憶猶新。

雖然我看到這份文件的時間，與它發布的時間已相隔整整十年（“材料之一”、“材料之二”我一直未看過），但看完這份文件後，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林彪與黃、吳、李、邱的問題早在“九·一三”事件後的十個月內就已經定性，並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告之全黨。

我萬萬沒有想到，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開幕式的講話被定性為“發動反革命政變的動員令”，我們在小組發言被定性為“向黨發動的猖狂進攻”和“地下陰謀活動”，所謂林彪陰謀攜帶黃、吳、李、邱“南逃廣州，另立中央”早已作為事實被定性；萬萬沒有想到，我在十年後收到的《起訴書》、《判決書》中，所指山海關機場256號飛機強行起飛問題與這個文件如出一轍，早被定性。

同時，也萬萬沒有想到，吳法憲在隔離審查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竟寫了兩份“交代”材料。

前面，讀者已看過了我在回憶錄中，披露的我所知道、所親身經歷的事實。現在請讀者再回過頭來看看這份文件中部分列舉的“罪行”，並與我所說的加以對照。文件中所說的“罪行”我不愿再多加解釋了，但我相信，功過是非、黑白曲直，讀者們會用

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和實事求是的態度做出自己的公正評價！

二、文件中說：“九屆二中全會期間發動反革命政變”

文件第一部分的標題是：林彪反黨集團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期間發動反革命政變的罪行。全文如下（見圖1）：

在一九七〇年黨的九屆二中全會期間，林彪反黨集團進行地下活動，大搞陰謀詭計，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制造謠言，欺騙同志的惡劣手段，向黨發動了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進攻。他們的反黨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對“九大”路線，推翻九屆二中全會的三項議程。他們的罪惡目的，是妄圖分裂我黨我軍，向毛主席、黨中央奪權。它的性質完全是一次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變。（標題和文中的重點號、重點綫是

第一 部 分

林彪反黨集團在黨的九屆 二中全會期間發動反革命政變的罪行

在一九七〇年黨的九屆二中全會期間，林彪反黨集團進行地下活動，大搞陰謀詭計，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制造謠言，欺騙同志的惡劣手段，向黨發動了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進攻。他們的反黨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對“九大”路線，推翻九屆二中全會的三項議程。他們的罪惡目的，是妄圖分裂我黨我軍，向毛主席、黨中央奪權。它的性質完全是一次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變。

一、林彪發動反革命政變的 動員令和提出的反黨綱領

1、林彪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的反黨講話錄音記錄稿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中舉行的講話，發表了反黨言論。講話大意：制造謠言，欺騙同志的講話。他堅持“設國家主席”的惡劣陰謀詭計的同時，又打出“天才”的反黨旗幟，鼓吹叫黨堅持“今天反黨”這種“天才”說法。林彪的這個講話，是林彪向反革命政變的動員令。他通過我們黨和國家各個地方黨委，傳達，他通過講話中要說一句，向黨和毛主席發動的黨爭，向我們黨“要一個中爭”、“要一個一爭”等，一鼓作氣之下，把整個的事情搞成反黨、反革命，反黨綱領。這個講話，林彪在八月二十四日就傳達了，經過傳達，十餘天的時間，向我們黨傳達了林彪的講話，林彪講話中要說一句，向黨和毛主席發動的黨爭，向我們黨“要一個中爭”、“要一個一爭”等，一鼓作氣之下，把整個的事情搞成反黨、反革命，反黨綱領。林彪的講話，是林彪向反革命政變的動員令。他通過我們黨和國家各個地方黨委，傳達，他通過講話中要說一句，向黨和毛主席發動的黨爭，向我們黨“要一個中爭”、“要一個一爭”等，一鼓作氣之下，把整個的事情搞成反黨、反革命，反黨綱領。

下面的片以說明林彪（甲），是林彪反黨講話錄音記錄稿全文，共二十四頁。（乙）、（丙）是林彪講話稿中的兩張照片。

（甲）



圖2

方块字读书社区

圖1

作者看後親筆畫上的)。

在“林彪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的反黨講話錄音記錄稿”一節中說(見上頁圖2):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開幕的會議上,發表了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制造謠言,欺騙同志的講話。他在堅持“設國家主席”的反黨政治綱領的同時,又打出“天才”的反黨理論綱領,瘋狂叫囂堅持“個人天賦”這種“天才”觀點。林彪的這個講話,是他發動反革命政變的動員令。

我在文旁注:應該發表全文,讓群眾見識。

在“林彪反黨集團在九屆二中全會上向黨發動的猖狂進攻”一節中說: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林彪指揮下,陳伯達、葉群、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請注意:沒有汪東興),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口徑,一起出動,分別在全會的華北組、中南組、西南組、西北組,同時宣講經過林彪審定的“稱天才”的材料(請注意:我

沒有宣講“天才”語錄,我也沒有聽說那些語錄是經過林彪審定的),制造和散布大量謠言,向黨發動了猖狂進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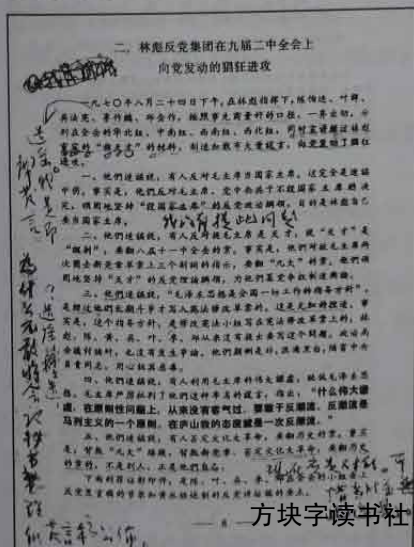
(請注意:不指名地批評了張春橋,難道張春橋就是黨,黨就是張春橋嗎?)

我在文旁注:造謠。

我是即席發言。(見圖)

又說:他們反對毛主席、黨中央關於不設國家主席的決定,頑固地堅持“設國家主席”的反黨政治綱領,目的是林彪自己要當國家主席。

我在文旁注:我沒有提此問題。



又說：他們造謠說，“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是經過他們長期鬥爭才寫入憲法修改草案的。這是無恥的捏造。

我在文旁注：為什麼不敢將會議秘書處整理的發言稿公布？造謠！捏造！

又說：背叛“九大”路線，背叛新黨章，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翻歷史的案的，不是別人，正是他們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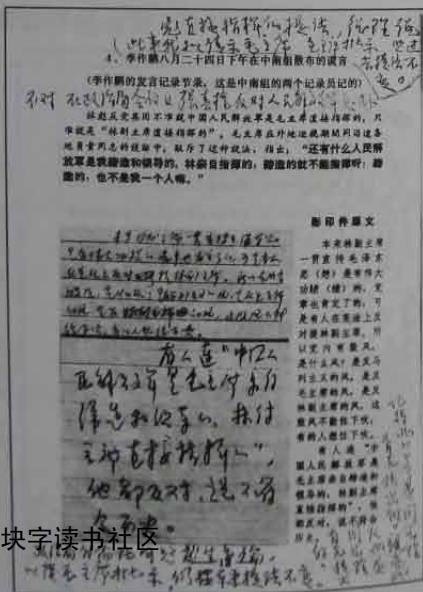
我在文旁注：現在應是對的。可惜當時並無此遠見。

在“李作鵬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南組散布的謠言”一節中說：林彪反黨集團不准說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直接指揮的，祇准說是“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中，駁斥了這種說法，指出：“還有什麼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和領導的，林親自指揮的，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締造的，也不是我一個人嘛。”（見圖）

我在文旁注：不對，在政治局會議上張春橋反對人民解放軍是林彪直接指揮的提法，總理說此事我擬請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 照過去提法不變。

我又在文旁注：記得此口號是周總理首先提出的。親密戰友也是周總理首先提出的。政治局討論此問題發生爭論，以後毛主席批示，仍按原來提法不變。

在“林彪反黨集團在九屆二中全會期間的地



機場飛機上的合影”一節中說(見圖1):一九七〇年九月七日,林彪、黃、吳、李、邱下山到九江機場,由葉群導演,在飛機上合影留念,表示他們要進一步加強反革命勾結,伺機反撲。

又是一張照片,能證明“加強反革命勾結,伺機反撲”嗎?我在文旁注:唯心主義。廬山會議中毛主席發表了我的一點意見,把林彪拉在一起,那不更是反革命勾結?既然毛主席都沒有發現林彪是反革命,當時我更無此水平。

三、文件中說: “李作鵬篡改中央命令的陰謀”

文件第三部分的標題是:林彪反黨集團妄圖謀害偉大領袖毛主席、另立中央,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和失敗後叛國投敵的罪行。文中說(見圖2):



圖1

第三部分

林彪反黨集團妄圖謀害偉大領袖毛主席，
另立中央，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
和失敗後叛國投敵的罪証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反黨集團按照《“371工程”紀要》反革命綱領，“破釜沉舟”，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在林彪直接指揮下，他們妄圖乘毛主席巡視南方的機會，謀害毛主席，并策划于同一時間，在北京誣害中央政治局同志，誣蔑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當這一反革命計劃破產後，林彪先期謀害黃永勝、吳法憲、叶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南逃廣州，另立中央。

毛主席的行動打亂了林彪反黨集團的部署，他們蓄謀已久的篡奪最高權的反革命陰謀徹底破產了。林彪威利附謀就害，末日來臨，罪惡深重，九子和几个死党急謀逃命，叛國投敵，叛黨叛國。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二時半，林彪等乘原计划的256號三號飛機，在蒙古境內溫都爾汗附近墜毀。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絕死，成為死有餘辜的叛徒賣國賊。

黃、吳、李、邱等在林彪叛國投敵以後，為了掩蓋自己的罪行，誣害了大量群眾。

造謠，我聽過什麼罪証。

圖2

在林彪直接指揮下，他們妄圖乘毛主席巡視南方的機會，謀害毛主席，並策劃於同一時間，在北京謀害中央政治局同志，陰謀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當這一反革命計劃破產後，林彪又陰謀攜帶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南逃廣州，另立中央。我在文旁寫道：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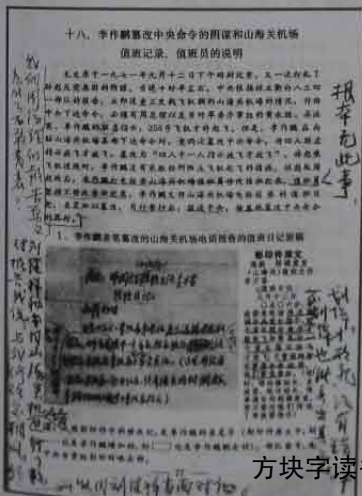
文中又說：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二時半，林彪等所乘外逃的256號三叉戟飛機，在蒙古境內溫都爾汗附近墜毀。林彪、葉群、林立果等全部燒死，成為死有餘辜的叛徒賣國賊。

黃、吳、李、邱等在林彪叛國投敵以後，為了掩蓋自己的罪行，毀滅了大量罪證。

我在文旁注：造謠！我毀了什麼罪證？

在文件“李作鵬篡改中央命令的陰謀和山海關機場值班記錄、值班員的說明”一節中說（見圖）：當晚十點半左右，中央根據林立衡向八三四一部隊的報告，立即追查三叉戟飛機調到山海關機場的情況，並由中央下達命令，必須有周總理以及軍委辦事組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的聯名指示，（重點線是作者親筆畫上的）256號飛機才許起飛。但是，李作鵬在向駐山海關機場某部下達命令時，竟兩次篡改中央命令，將四人聯名指示放飛才放飛，篡改為“四人中一人指示放飛才放飛”。

林彪乘飛機逃跑後，李作鵬打電話要山海關機場值班員修改值班記錄，值班員堅持不修改值班記錄。我在文旁寫道：根本無此事。李作鵬又將山海關機場電話報來的值班日記，親筆加以篡改，另行謄抄後，報送中央，掩蓋他篡改中央命



令的罪行。我在文旁寫道：我向周總理的報告原文為什麼不敢發表？

我在文旁注：劃掉“才放飛”沒有錯。不劃掉也能看出其意。

我在文旁還注：劉繼祥秘書同山海關機場進行了校對報告我說：與我修改處相同。我可以同劉繼祥當面對證。

這就是那份李萬香在1972年4月7日寫的半頁紙的孤證（見圖1），它成為了中央文件中“兩次篡改”的證據，也成為十年後特別法庭《判決書》中的“罪證”。誰能證明這份孤證的真實性？它能成為判我大罪的證據嗎？而我有給總理的報告和劉繼祥做旁證，但特別法庭却不出示給總理報告的全文，也不讓劉繼祥出庭作證。

我在文旁注：原始記錄為準，這是半年後的說明，有假。

我要求場站將“飛機要強行起飛”的情況“直接報告周總理”。

李萬香在文中說：關於飛機強行起飛的一切情況，我們沒有

1. 山海關機場值勤員李萬香同意的底稿

林彪、叶群等位機師自述印件原文

1. 1971年9月13日，在唐山山海關機場發生的一起重大空難事件。當時，我（李萬香）在山海關機場值勤，負責引導飛機起飛。在飛機起飛過程中，發現飛機有異常情況，隨即向塔台報告。塔台人員表示，飛機在起飛過程中，機頭上仰，機尾下垂，機翼顫抖，機身搖晃，機身發出異常聲音。我隨即向塔台報告，並請求塔台人員採取緊急措施。塔台人員表示，飛機在起飛過程中，機頭上仰，機尾下垂，機翼顫抖，機身搖晃，機身發出異常聲音。我隨即向塔台報告，並請求塔台人員採取緊急措施。塔台人員表示，飛機在起飛過程中，機頭上仰，機尾下垂，機翼顫抖，機身搖晃，機身發出異常聲音。我隨即向塔台報告，並請求塔台人員採取緊急措施。

國家萬香等同志的說明印件原文

1. 1971年9月13日，在唐山山海關機場發生的一起重大空難事件。當時，我（李萬香）在山海關機場值勤，負責引導飛機起飛。在飛機起飛過程中，發現飛機有異常情況，隨即向塔台報告。塔台人員表示，飛機在起飛過程中，機頭上仰，機尾下垂，機翼顫抖，機身搖晃，機身發出異常聲音。我隨即向塔台報告，並請求塔台人員採取緊急措施。塔台人員表示，飛機在起飛過程中，機頭上仰，機尾下垂，機翼顫抖，機身搖晃，機身發出異常聲音。我隨即向塔台報告，並請求塔台人員採取緊急措施。塔台人員表示，飛機在起飛過程中，機頭上仰，機尾下垂，機翼顫抖，機身搖晃，機身發出異常聲音。我隨即向塔台報告，並請求塔台人員採取緊急措施。

我們在機場發現有叛亂分子林彪、叶群、林立果及其死黨周志強等人七性逃命，預備殺害的慘劇。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零點二十二分，林彪一伙乘坐紅旗轎車，較高的速度到停靠在機場的三叉戟飛機附近，李延榮停機，林彪一伙跳離座下車。叶群、林立果、劉仲平等人手執手槍，亂喊亂叫：快！快！快！快！快！快！飛機快起飛！飛機快起飛！葉群跳上機，林彪光着膀子，慌張地跑到飛機駕駛艙門底下，在沒有客艙梯子的情況下，這伙叛徒試圖跳上飛機駕駛艙的小梯子，一個一個往上爬，第一個上去的是叶群。叶群往上爬的時候，林彪緊跟着往上爬，林彪的靴子滑落了叶群的腳。他們說客艙人員上客，通行駕駛員，機艙員，通訊室人員跳上機，飛機滑行燈也沒亮，機艙門還未关上，飛機緊急起飛，竄行滑出。在滑行中，在客艙環形通道內連環打滾，油桶口噴，刺破了機翼上的帆布，撞破了機翼上的綠色玻璃打穿，新機艙中，在沒有航行燈和一切通信保障的情況下，便在一片黑暗中，才零點三十二分，竄行起飛，全機逃命。

趙德勝 許志強 王守清

周樹山 劉三兄

一九七二年四月九日

由此可見，至不是一人指亦可放飛造成此等惡果

向總理報告過。我在文旁注：爲什麼？

在“林彪、葉群等倉皇逃命目擊記影印件原文”一節中（見上頁圖2），當時在機場的目擊人證實說：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零點二十二分，林彪一伙乘坐紅旗轎車，極高的速度開到停在機場的三叉戟飛機附近。車還未停穩，林彪一伙就急忙下車。葉群、林立果、劉沛豐等拿着手槍，亂喊亂叫：快！快！快！快！快！快！飛機快起動！飛機快起動！……他們沒等機組人員上齊，連副駕駛員、領航員、通訊報務員都沒上機，飛機滑行燈也沒敢開，機艙門還未關上，飛機就急促起動，強行滑出。……在沒有夜航燈光和一切通訊保障的情況下，便在一片漆黑中，于零點三十二分，強行起飛，倉皇逃命。

我在文旁注：由此可見，並不是由于一人指示可放飛造成的惡果。

四、吳法憲說： “林彪怎麼辦，往那裏擺？”

在這份文件中，有1971年10月21日和12月23日的“吳法憲的親筆交代影印件原件”。其中10月21日的交代材料內容，在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內，被作爲林彪急于“搶班奪權”，要當“國家主席”的“罪證”，是唯一的孤證。

我看完吳法憲的“親筆交代”後認爲，可能出于某種巨大的壓力，在隔離審查後，吳沒有說實話。

吳在交代中說：林彪要我和李作鵬在憲法工作小組會上，提出寫上國家主席一章。

我在文旁注：我不知道，我也從未提過。吳法憲你爲什麼不告訴我。

吳說：七〇年七月，葉群曾向我當面說過：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麼辦，往那裏擺？（原文中吳加了記號，見下頁圖）

方块字读书社区

吳說：七〇年八月初葉群打電話對我說：林彪的意見還是要堅持設國家主席，你們應在憲法工作小組提議寫上這一章。

我在文旁注：我未聽到你在憲草小組提此問題。

吳又說：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在廬山，黃昏前葉群邀吳、李、邱去游仙人洞。葉群說：設國家主席還要堅持。

我在文旁注：我未聽見。

我又在文旁注：在廬山會議小組討論時，25（日）我聽吳法憲告訴我和邱會作，說中午汪東興來電話說要堅持提設國家主席問題。

2007年初，我看到吳法憲在他的回憶錄中，對“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那裏擺？”做了特別聲明。他說：“這句話是我從程世清那裏聽到的，是汪東興傳來的話。葉群從來沒有對我說過這句話。”¹

吳法憲的廬山交代與原作原文

（一）一九七〇年四月中旬和下旬，主席兩次召集林彪等開會談設國家主席問題。五月中旬有一次他見林彪時，就問他對設主席有什麼意見，他說：他主張要設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國家就有一個大，是不正當不

嚴，他就要我和李作鵬在憲法工作小組會上，提出寫上國家主席一章。 *（他不同意，我也不同意，提出。）*

（二）七〇年七月，叶群曾向我詢問設主席問題，如果不在國家主席，林彪會生氣，往那裏擺？

（三）七〇年八月初叶群打電話對我說：林彪的要求還是堅持設國家主席，你們應在憲法工作小組提議寫上這一章。 *（林彪所提設國家主席問題）*

（四）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在廬山，黃昏前叶群邀吳、李、邱去游仙人洞。叶群說：設國家主席還要堅持，我根據林彪、叶群的要求，八月廿三、廿四、廿五先後向王秉璋、王德順、陳再道等人轉達設國家主席問題，對其中有些人還強調不設國家主席林彪生氣，往那裏擺。

（廬山會議小組討論時，吳法憲曾向葉群、邱會作、汪東興等轉達設國家主席問題，說要堅持設國家主席問題。）

我
未
聽
見

第四十九章

老伴日記和我寫的悼詞

1971年10月上旬，在我被隔離審查半個月後，老伴也被中央專案組從家中帶走，隔離審查了。從此我和老伴天各一方，杳無音信，生死難料。那一年，老伴五十歲整。等再見面，已是整整十年後的1981年底，在太原團聚。

在太原最初的幾年中，我曾問過老伴，那十年是怎麼度過的，她總是避而不答，或輕描淡寫。

在獄中，我曾聽孩子們說起老伴的情況，但那時是報喜不報憂，現在老伴仍然不願談起那幾年，想必是不堪回首。

至今，對老伴那十年的生活，我也祇知道個大概情況：一是從1971年10月至1978年7月，在北京亞非學生療養院隔離區，專案審查。失去人身自由，二十四小時有專人監管；二是1978年7月11日，海軍召開數千人的公審大會，批鬥老伴兩個多小時，會上宣布：董其采按敵我矛盾處理，開除黨籍、軍籍，發配到農場勞動改造；三是1978年7月以後，在河北漢沽農場勞改，直至1981年底到太原。

後來在太原，我含淚看完了老伴在那幾年中寫的部分日記（從1977年開始），百感交集。幾十年來，我們相依為命，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將她



方块字读书社区

出來，收入我的書中，因為缺了誰，我的書都不完整。

2005年2月10日，老伴撇下我和孩子們，走了。

一、艱難歲月的記錄

日記片段一：在亞療最後一年的生活

“莫道梅花香傲骨，丹心一點到春時”。

烏雲遮天難持久，紅日永遠放光芒。

一念不混，壯志彌堅，我要依靠自己堅韌不拔的意志，排除目前萬難的熬煎！

“這不過是暫時的現象，黑暗即將過去，曙光即在前頭”。下戰鬥的決心、有耐戰的勇氣！

——77.6.9

前途漫漫，風雲變幻，我似應該無論經歷怎樣的艱難曲折，面對何等嚴峻的考驗，都不應該消極、氣餒。即使是冤案打擊，也不應該苦悶、彷徨、動搖、屈膝！祇有堅強的挺起胸膛，生活下去！

——77.12.18

獨自呆在鬥室裏，臉貼着冰冷的玻璃窗，望着天上閃爍的星斗，不由輕輕地唱起了“五月的鮮花開遍了原野，鮮花掩蓋了志士的鮮血”。想叫這微小的聲音，在寒冷的夜空裏傳得遠些，歌聲中寄托着深厚的感情和堅定的信念。親人們，你們聽到了嗎？不由得兩頰已淌下兩行熱淚：親人們！你們看見了嗎？

——77.12.24

78年1月4日晚8點鐘，突然傳訊，這是將近兩年沒有找我，78年迎來了。是悲！是喜！到現在還在揭發，什麼時候是個頭？難道一生就因在這裏等揭發？七年還在揭什麼綜合材料，我現在完全陷在艱難痛苦裏面，迷惑不解。七年了，孩子最大的已經34歲多，最小的也已經23歲了。這一方塊字讀書社區！想不下去了。

——78.1.6

不到六點就把我從睡中弄醒，又是板凳響，又是關門聲，最後我還“沒醒”，索性開燈，強行叫你不到六點就得起來。這究竟是誰違反規定呢？如果是我，他們早就大吵大鬧了。忍！最後還是忍下來了。現在我覺得，忍是個好辦法，對待這些沒水平的人，祇有以無言這個最高的蔑視辦法以對立。他們報復我，不給我衣服拿出去，你們不祇有這一招嗎？這算什麼！真叫人嗤之以鼻。可笑！當今的每天每時的生活中，都有各種嚴肅的現實鬥爭。

——78.1.18

十八(日)早晨發生的事情，晚上9-12(點)就得到了報復，整整折磨我三個半小時，但是這一套玩藝，已經飽嘗過了。這算什麼，不叫我睡覺就不睡，這是家常便飯，對我來說並不新鮮。你以為這就整治了我，你們講話“沒門”！祇能說明你的無知和沒有水平。反映！20號已經第一次上書，不行就第二次、第三次，直到你三月半滾開為止。

我不需要你們的憐憫，但也不受你們欺壓，捉弄！忍耐是有限度的，直起腰來，挺起胸！對抗！鬥爭！

——78.1.21

好像是要過節？我也不自覺地把衛生大概搞了一下，理理髮，換洗了衣服，這一切好像本能似的，不然我哪裏有這個心思呢？別人在過節，我又該不知有多少天不能放風了？這就是我過節！

——78.1.31

用“沉默”來抵制眼前的一切；用無言來表示對他們的蔑視，因為他們把我當作反革命來對待，逼得我不能不如此。

——78.2.8

七年牢房坐，眼望咫尺遠。說不盡的痛苦啊！周圍都是一片冷漠。2月20日，突然血壓升高到150/98，醫生治了一陣子，算是堅持吧。

兩周一次的洗澡，真比什麼都寶貴，就是爬也得去洗，不然就是一個月。生活就是**方块字读书社区**日，血壓又猛降到90/50，這一上一下，弄得我真難受。可是25日又是走起路來東倒西歪。醫

生說美尼爾氏綜合癥，叫我躺幾天，據說祇有這個辦法，也不叫我放風活動了。

——78.2.25

思想考慮了許久的問題，昨天終於下了決心，用了整整三個鐘頭，將這蛛網密集的牢房大大打掃了一場。雖是囚人，但總還是衛生點好，起碼空氣好像新鮮了一些。我不是迎節日，我沒年沒節，天天一個樣。不，我天天在過節，能出去放風一小時，這就是節。真正的節日，我反倒不能出去了。例如，春節關四天，國慶關三天，在別人是節，在我就是囚日了！我天天夜裏腿痛，通宵達旦，有誰來過問，什麼醫生，在他們嘴裏統統算是“年紀大，血管硬化”，是理應該如此。

——78.4.20

多麼艱難的歲月啊！心情沉重地盼望着早日弄清問題，早日得解放，可是真難哪！等得頭髮都白了，還是沒有迹象，七、八年了，我這個受牽連的無辜的人，每日同樣被關着、監視着，真是想起眼前這一切，真如利劍刺心啊！落得個生不如死。

——78.6.2

六月十二日，我正在放風，把我叫去審訊，題目是XX的問題，看起來XX已被審查，不然有老子撐腰，怎能搞到頭上了呢？一定還牽連很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我要有精神準備，實事求是，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錯了就錯了。如果是開除黨籍軍籍，我也在等着呢！可是，就是現階段難熬啊！剛寫完材料呀！

——78.6.13

日記片段二：海軍批鬥

1978年7月11日晨五時，突然從夢中叫醒了，說是“有事叫你到前面去”。我當時以為又有什麼問題向我對質。結果謝科長通知我：“快洗洗臉，七點到前面去，會告訴你情況”。並說把東西整理好。我心裏已經明白了七八分。但是，宣告判決時，雖是所料，也曾想着要做最壞的打算，可是萬萬沒想到，是那樣的結論！是那樣的結果！當時的心情既平靜又鬥爭，個人得失已經置之度

方塊字讀書社區

外，最後我祇講了一句話：“有些問題不真實，我不知道”。就這樣被海軍接走了。

到了大院，接受了兩個小時的批判。內容將來有機會和可能再將不實之處加以澄清吧！隨後被押送到海司農場（良鄉）住了不平凡的三天。

——78.7.12

十一號批鬥後，下午一點到達良鄉。我一切臥具都沒有，農場借了一床被褥、蚊帳，用報紙當枕頭，可算是到抗戰時期的情景了。但此時此刻的心情則與此相反。想起批鬥的情況，心情是平靜的，不管你們如何無限上綱，但自問與心無愧！

十三日下午，突然通知我，領導上叫我與孩子們見面。這個驚雷般的通知我連夢中都不敢要求的。是夢嗎？不是，是真的。我將怎樣迎接我的孩子們？又怎樣爭取多談一會兒？祇有坦然處之。

這個時刻到來了，小征，我一直想念的孩，也是我擔心的孩子，正是她走在最前面，叫了一聲“媽媽”，分別六年來，終於又聽到了有人叫我“媽媽”，真是心情久久不能平靜。我握着小征的手，不能認出她是誰，她變了。

久久我才問：“你是誰呀？”

“我是小征呀！你不認識了嗎？”

“這是誰呀？”

“是炎天呀！”

我自言自語地說：“一點也不像了。個子也沒有長多高！變了！變了。”

我目不轉睛的看着三個孩子，祇有小桓（注：即幼征）沒變，但是更瘦了。按別人安排的調門，拉了拉家常，問了問其他孩子的情况和姐姐的情況。看起來偉欽還是不錯，不因此而丟了大征。我放心了，孩子們都成了家，沒有我們，生活得也很好。祇有小征，沒有深談，她是條什高馬。方塊字讀書社區歲了，千萬找個理想的吧，媽媽就是惦念你了。這個短暫的會見，使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興奮的我一夜沒有合眼。想呀！想！想那短暫的一條那。

——78.7.13

日記片斷三：農場勞動改造

十四號早七點鐘，走上了新的征途。

下午兩點多鐘，到了我勞動的地點，地址是“河北省國營漢沽農場三分場九隊”。這裏條件還不錯，比我想象的要好，所以，凡事要往最壞方面想，就能覺得一切滿意。否則，就會給思想帶來很多不便。我很快就在生活上熟悉了。怎樣提水，怎樣買飯，怎樣團結同屋的兩個年輕人。領導向我談話，政治上的要求很嚴，在群眾的監督下參加勞動，改造思想。明天就要勞動了。

——78.7.16

十五號早七點上工了，第一天是在蔬菜地裏拔草，兩者我可以分清。勞動得很猛，和小王，我一步不拉的追趕她。可是，中午收工兩腿打戰，是小王把我牽回來的。下午兩點繼續幹，臨收工前，我活動了一下，效果很好，自己能走回來了，高興極了。就是三天後能解決腿痛問題。不錯，十七號以後，腿痛問題解決了。可是腰痛直不起來，到最後連自理都成了問題，開始思想負擔很重，因為腰痛不能很好的勞動，效果一天不如一天了，我很着急！按邏輯應當是一天天加快進度，可是我却因為腰痛，一天天慢下來了。怎麼辦？堅持！出我意外的是蚊子多的驚人，第一天沒防護，凡是露在外面的部分都咬腫了。但是不顧這一切，一心拔草趕進度。

——78.7.18

黑夜是漫長的，結果是痛苦的，現在的處理并不比過去的七年好多少。因為過去總盼望能做個恰當的結論，但是，現在一切都表面化了，今後的道路和歸宿是什麼？自己還是不能掌握命運。生活費沒有確定，是否比老頭好些，結論為時尚早，苦日子還是今後的唯一道路。孩子們雖然聯系上了，但都有困難，我也不想給他們增加負擔。

方块字读书社区

——78.9.2

小征、炎兒可來了，26號從車站走來的，領導還可以，勉強叫住了三天四夜，知道些情況，今早走了。

——78.9.29

日記片斷四：老伴與我的“對話”

一九七七年的十一，二十八個年頭的國慶。七年前的今天，你還可以登上那雄偉的天安門，毛主席檢閱的地方。可是七年後的今天，却是這樣的悲慘！沉思，凝想，何時能洗清這不白之冤！

但是有多少好同志隨你一樣的受到這屈辱的牽連！我每一想到這些，似鋼刀刺心，痛苦難言！不由的泪流衣裳。

——77.10.1

三哩（作者注：三哩是我的乳名）你如今在哪裏？五孩兒你們如今又在何方？機械的生活又已開始，想啊，想啊！很難控制，一天祇有不停的看書、看報，把腦子分散到那個上面，否則，就立即想過去、想現在、想將來。一天天好想過的很快，不然怎能已經快到八年？但是，這八年有如八十年，是漫長的時間呀！這樣生活還能有幾天？不，是幾多年！今天總算吃到點咸菜，多麼不易呀！

——78.4.12

三哩的生日，祇有在心裏想着你，我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給祝賀的。你現在想什麼？囚犯！我知道你的心理，你冤枉啊！可是有誰知底？你最大的缺點是太老實，誰說什麼你都信，誰幹了什麼，你爲了表面的“團結”，你也不吭氣。但是對支持你的人，老婆孩子，你可是使勁壓、大聲叫。想起這些，我心裏真難過。你呀！三哩！

——78.4.22

又過了一天，是那樣漫長、思緒複雜的一天，簡直就不能控制自己的思想，前後將來想的很長、很遠，這都是生日引起的，三哩！怎麼辦？你闖下了這場大災難，株連了自己的孩子還不算，有多少好幹部也是有嘴說方缺字讀書社區的聽天由命了嗎？

昨天吃了一餐紅燒肉，還分了一塊小烤餅，就算給你和偉欽

過生日了吧！

——78.4.23

你是鋒芒畢露，還是老氣橫秋呢？如今都說你“抗上”，這是給那些大人物的印象，可能有一點！好好想想吧！

——78.4.23夜

日記片段五：思念兒女

日想日盼，何時能夠團圓？孩子們是我唯一想念，惦記的親人啊！你們在那裏？你們可安然？媽媽的情況你們不知道，自顧自吧，今後媽媽也管不了你們了。我唯一惦記的是小五，我出來時還是孩子，現在我算了算，已是二十好幾了。誰人給你們安排生活？你又能等到那一年媽媽再能來管你。我後悔，經常想起我出來以前，没能給你安排一切，直至你能再見到我。苦、罪、難我都能受，唯獨想起孩子們，汨如泉涌。

——77.11.19

孩子呀！你們是我的心病，現在給你們增添了壓力，你們從小都是好孩子，多麼要強！外人對你們祇是說：“從你們身上看不出高幹子弟來”。是啊！炎天穿着一身補了又補的褲子，很少做一件新衣服，都是穿哥哥不能再穿了的衣服，窩窩頭大口大口的吃，真是潑辣。在小學時就能給鄧叔叔（作者注：家中的炊事員）、哥哥姐姐們裝半導體，一天到晚不出屋，畫綫路圖。可是沒有想到在十五歲時就給小小的心靈上增加了難以想象的刺激！現在是我最大的思想負擔，沒有你們，我就一無牽挂了！姐姐（作者注：老伴的親姐姐董世賢）！我唯一的親人，你現在哪裏？又是怎樣在生活呢？無依無靠的老人哪！我想念你！

——78.3.12

炎天你還小嗎？當我離開你的時候，還祇十五歲，可是現在你已經是二十三歲了吧？但在我的心中你還是孩子，胖胖的孩子，你現在是什麼樣？每天都幹些什麼事？你怎樣生活呢？我想起來真後悔，沒有給你安排今後的生活。是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根據自己的表現，按黨的政策辦事，又誰知海軍是如何

方块字读书社区

呢？祇願如此！

——78.4.14

小征，今天是你的生日，媽媽想了幾天了。該怎樣給你過這個生日呢？孤獨的媽媽，祇有在心中想念着你呀！但是晚上我還是吃了一個鮮紅的蘋果（5.1買的），補償了想念你的心意！你怎樣？媽媽特別惦記你和炎天，因為我離開你們的時候都還很小，你又處在不利的單位，有誰能管你們？雖說有黨的政策，但畢竟是“死黨”的後代，你們都是要強的孩子，但偏偏遇上不幸的事件，什麼時候能搞清白就好了。熬吧！總有一天！

——78.5.9夜

二、悼 詞

2004年10月，老伴因肺部感染住進了北京中日友好醫院。體檢時發現肝部有問題，經進一步檢查，確診為肝癌晚期。

轉年1月下旬病情惡化，再次住進中日醫院。雖全力搶救，終因肝昏迷三天後，于2月10日18時心臟停止了跳動，終年84歲。

按照她的遺願，沒有開追悼會。2月16日上午，我帶全體子女到八寶山公墓向她的遺體告別。我強忍悲痛，一字一句的念完我親筆寫的悼詞。如下：

親愛的老伴——董其采老太太：

我和孩子們及幹休所的幹部來和你告別。來送你上極樂世界，祝你一路平安。

1939年你在黨的鼓動之下，和三位女青年離開大城市，十八歲到冀魯邊游擊區參加八路軍，打日本鬼子。開始擔任醫生，救死扶傷，救治了許多八路軍指戰員。以後擔任培養醫務人員的教員；擔任隱蔽休養所的所長（敵後游擊戰，傷病員都分散隱蔽農村老百姓家裏，由醫生去

方块字读书社区

解放戰爭期間，擔任四野機關衛生所所長。



解放後，任武漢高級步校醫院院長，1955年授予中校軍銜，團級幹部，任武漢軍區陸軍161醫院院長，後任武漢軍區總醫院副院長。1964年晉升上校軍銜，師級幹部。

調北京後，任海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

你不論做任何工作均保持積極負責，艱苦奮鬥，團結群眾的優良作風。嚴于律己，寬于待人，作風正派，為八路軍、為解

放軍、為黨、為革命做出了卓越貢獻，是任何人不能否定的。國家授予你兩枚勳章（一枚是三級獨立自由勳章，一枚是三級解放勳章），就是證明，你是問心無愧的。

但最大的遺憾是晚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至今仍未完全解決。開始被誣陷為敵我矛盾，被開除黨籍、軍籍，被隔離審查、農場勞改，先後達十年。以後雖改為人民內部矛盾，但待遇降級，沒有恢復黨籍和軍籍。

你是被迫害含冤而死的。你的冤案，子子孫孫都會牢記。我們的子女和多數群眾，對那些不實之詞是堅決反對的，是要求主持公道還以清白的，你在九泉之下理應感到安慰。

親愛的老伴，你好好的安息吧。我和孩子們會更加保重身體，過好日子。但我已是九十多歲的人，可能不久就會同你匯合一起，共同在極樂世界生活。

最後我們一起向你鞠躬致敬。

第五十章 與律師再見面

2001年5月，是我與張思之律師詩約二十年後，在北京的首次見面。我把1981年特別法庭審判後，在復興醫院寫的白話小詩《評律師》按約定送給了他。說實話，我沒有想到，張大律師苦等二十年索要我李某人小詩的執着。

我和老伴像見到老朋友一樣，與他愉快地暢談了兩個多小時。談話結束時，他把他的新作《我的辯詞與夢想》作為回禮送給了我。

幾年後，孩子們拿來一篇他寫的《詩評律師，可堪入史》的文章，我看後，覺得寫得不錯。經作者同意，將此文收錄我的回憶錄中，供讀者從另一側面了解當時的那段歷史。

2007年2月，孩子們將張思之律師接受香港鳳凰衛視《口述歷史》節目採訪的錄像拿給我，我認真的看了兩遍。我讓冰天打電話，將我的觀後感告訴張思之，我的評價是：“這次‘邊鼓’敲的不錯，比上次好”。

據說思之先生在電話中哈哈大笑，連說謝謝。

鳳凰衛視對張思之律師的採訪節目影響不小，節目在全球和國內播出後，美國、加拿大等國及國內的不少朋友



方塊字讀書社區

2007年4月 攝于北京安貞醫院

紛紛給我來電話，一是詢問我看節目了沒有，二是對張思之律師實事求是，敢講真話、實話的精神表示欽佩。

2007年4月，我在安貞醫院住院期間，再次見到了老朋友。

詩評律師，可堪入史

——重訪李作鵬前副總長索詩瑣記——

張思之

1993年的夏天，為自編的集子寫了個長篇《後記》，交待了一些訴訟的庭外資料，其中涉及李作鵬案，我講的是——

“對於李作鵬一案，倒有兩點可說：第一，人們都說，那時的辯詞都是上面定的，律師念念而已。這話，出之于估計，有對的一面，但也絕非全對。關於李案，辯詞中有兩點是我頑強地堅持下來的。一是律師認為‘庭審活動符合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這不是多餘的廢話。在我看來，庭審活動是否合法，律師有責任發表見解並請求法庭予以確認，從而加強律師制度對於審判活動應有的廣泛性的監督作用。二是對於李案的判處應考慮他‘早年革命的歷史’。辯詞中的這點意思表達得極其委婉，反映着當時意見的不一。我至今認為，對林、江‘兩案’中的五位武將的罪過，如能考慮到各人的歷史因素，會判得更為公允。作為律師，似乎應把這層意思說到。

“第二，案結後，我與蘇惠漁教授再次會見李作鵬，徵詢他的意見。他微笑着，把手從棉衣袖筒裏利索地抽了出來，說了這麼一句：‘你們的辯護，好比敲小鼓，可祇是敲了個邊兒，沒敲到中心點上。’‘呵，敲邊鼓！能不能說具體點？’——我問道。這位年輕時專事破譯密碼的行家，腦子的確轉得快，他並不正面回答，有點漫不經心地說：‘不怪你們！’他不直說，倒使我聯想到一曲著名的山西民樂——‘滾核桃’。樂手們把鼓槌揚起，擊打得有聲有色，但卻始終在鼓的邊緣處滾動，並不觸及核心，閉目靜聽，宛如許多核桃在滾動。難道這是他對律師工作的刻畫？難道我們在滾核桃？心裏很不自在，一時却又無言以對。臨到談話

方块字读书社区

結束行將道別時，他冒出了一句：‘寫了首詩給你。’我有點情急，想馬上看看，不料他却告訴我：‘二十年後給你！’我無可奈何地答復他：‘那好，我等二十年。’”

“幾年前就聽人說，李已經被釋放，在安度晚年。他那首寫給律師的詩作却還沒見到，我一定等到2001年！”

待到2001年春節剛過，是整整20年之後，探聽到李作鵬安居太原。于是情托在山西有知交的一位作家代為打

探。她很熱心，很快傳來消息：“據作協同志說，前兩年還見過他，近年不見，聽說回北京了。”幾經輾轉，解放軍總後的一位同志通過我們事務所主任吳以鋼律師告訴我：“李作鵬在北京，很少見人，願不願意同你聯系，得問問他的意見。”兩天後，傳來李的電話號碼，總後的那位同志說：李願意見。我當天就與他通了話，表示想去看他。從聲音裏能聽出他挺高興。祇是說：“五·一前後，孩子們都回來，人多，家裏亂。”于是相約五·一節後見面。通話中沒說起寫給我的詩。

5月16日，恰是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通知》的25周年，當時却沒想到。那天，風沙狂襲京城，行路極難；早幾天約定的時間，又不想再改，于是商請傅可心律師駕車作伴，准于上午10時到達他在京郊的新居。門啓處，他和夫人已在門口。他左手握着一卷紙，揮動右臂，連聲說：“歡迎！歡迎！”一邊把我們讓進客廳，一邊說：“這些年，我不見人，你是例外！”我覺出了這話的份量，同時忙把傅律師介紹給他。他依然很爽快，應道：“好呵，你們一塊的，歡迎！”沉鐘似的聲音，加深着入門時的第一眼印象：



2001年5月16日 北京望京方舟苑

20年前的囚徒晦氣盡掃，仍舊一派軍人風采。不知他是怎樣熬過或者闖過了那漫長的鐵窗生涯？

坐定，他說：“20年了，你還記得我，想到我，真的很感激！”不等我開口，董夫人跟着發揮了一句：“可得謝謝你爲他作了辯護。那年頭，誰還會替他說話？”我理解夫人的心意，但仍然有一點莫名的不自在，因爲自覺有愧，可一時又不知該如何答對。李接過話頭，使勁拍擊着我的左腿，大聲地說：“是得謝謝你喲！兩條大罪，給我抹掉了。”我說：“講謝，可不敢當！實在沒做好。”他站了起來，竟又重複着20年前對我說的一句話：“不能怪你！”同時就把手握着的那個紙卷遞給了我：“當年寫給你的詩。”真的是心有靈犀！他還記得這首詩，並且不忘20年前的詩約，料到我爲索詩而來。我頓時興奮起來，幾乎是語無倫次地說：“等了20年，太好了，真的想看看。”隨即舒展開那薄薄的紙卷，是張打字紙，大號仿宋體，逐字看去，寫的是——

評律師 (1980年于復興醫院)

李作鵬¹

尊敬公正人，天知無偏心。官方辯護詞²，和尚照念經。遵命防風險，明哲可保身。邊鼓敲兩下，有聲勝無聲。

一首典型的即興打油詩，明白如話。所謂“公正，無偏”，在那個年代，承辦那樣的政治性大案，對處于萌芽狀態的弱小律師，非不爲也，實不能也。個中況味，天人共知！但這是20年前的被告人寫給他的律師的詩作，更因其正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代中國法制建設的歷程，又自有其不同尋常的價值，遂轉手遞給小傅，不知這位年輕律師是否能從中體察出一點東西。傅輕聲念着，尚未終篇，作者可能是擔心我不能承受，或者怕我面對詩作中關於律師并不公正的譏諷會不免尷尬，急切地打斷她，衝我作着解釋：“這是當時寫的。要是現在寫，不會是這樣。”我應道：

注1. 簽名是手寫體

注2. (作者原)注：律師的辯護詞，要經官方修改批准，然後照本宣讀

“等了20年，想看的就是當年原作。要是現在寫的，又是另一回事了。”

“你的意見呢？我想知道你的意見。”——他問我。

“遵命有之，風險却並沒有，用不着‘保身’。講‘明哲保身’，不大符合實際情況。”

小傅接着爭了一句：“張老師他們不會明哲保身的。”

李毫不遲疑，立馬表了態：“要允許明哲保身，那個整人的年代，能自保也不易！”

話一出口，從內容到情態，無不讓我感到：還是那種“狗屎”脾氣，依然那副剛硬性格，真是秉性難移，一樣地“要改也難”呵。不過話說回來，考察一部黨史，又不能不認為他講得對。那些年月，陽謀陰謀，時時處處，交互為用，得心應手，人人自危，自保不易。因而不必也無意爭辯。更何況，各抒己見有什麼不好？一個“一致”，一個“一律”，把十幾億國人弄得好苦。意見相異，即使不能互補，難道就不能互相寬容？記得上世紀80年代中期，朱厚澤同志主政中宣部，他按照耀邦的思路，提出“寬容、寬厚、寬鬆”的“三寬”方針，深得民心；實踐證明，行之有效。此中經驗，實宜銘記。

至于詩中“官方辯詞，和尚念經”之論，前引《後記》已有說明，不必重復。祇是他的“邊鼓論”却如20年前一樣，重重地敲打着我。一方面，覺得有點尖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認它擊中了我的要害，他倒是敲到中心點上了。把律師辯護喻之為敲邊鼓，統觀全篇詩意，無疑就是對律師作用的評價，正點詩題。不過，細一琢磨，此喻又反映着權利與權力的深刻矛盾及其解決渠道的未暢，是故邊鼓之聲是否真的會勝“無聲”，怕得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了。于是信口說了一句：“這最後兩句，挺有意味！”話說得如此含渾，實由于有難言之隱。我心中想的是：否掉兩條大罪的辯詞猶被視為“邊鼓敲兩下”，如觸及鼓心，不涉禁區才怪！當年我是“馴服工具論”的忠實執行者，明知“兩案”審判是政治任務，怎麼可能將鼓槌移向禁區敲擊？他說“要

是現在寫，不會是這樣。”容我套用一下：“要是現在辯，也不會是那樣！”律師工作經過了20多年的礪磨，敲打邊鼓的形象已經漸少漸淡，這是很值得欣慰的。但走過的彎路既有鑒戒作用，敢不銘記？

一次短暫交談不易說清，決計撥開話茬，轉而問他：“那場審判，你那時有沒有意見？”他没加思索，衝口而出：“還是那句話，是我的，我決不推！不過，今天可以對你講，當時我替兩個人打了埋伏。”

“誰？”

“毛和周！”

如此這般點出最最敏感的兩個人，我為之一震。他這話來得疾，止得也脆。我與人交談，一向信守一條原則：對方不講的要聞，決不探底。不過說實在，我很難猜中他是怎樣地為他們打了哪些“埋伏”，事後揣測，可能事涉“9·13”林彪從山海關強行乘坐三叉戟出逃的那緊張一幕及其背景。因為這件事據《起訴書》的指控李作鵬負有他特定的責任，對此他當時就曾表示過讓歷史作結論的意見。然而，他們那代人，也包括我這一代，要做到對歷史負責可真不容易。周臨終無一言留下，盡管他親歷身受的種種終有解密大白之日，但他的所思所想，他的感悟和心態，也許有很多東西會成為“千古之謎”。我不知道對歷史負責與對人民負責能不能分割分裂，但我敢說，一個人如果祇會唯上是從，到頭來恐怕既做不到對歷史負責，也不見得就能完全做到對人民負責。

接不上他這話茬，祇能沿着自己的思路說話：“不管別人怎麼看，我至今堅持在“兩案”審判中，幾位有戰功的老將，同那五個文官的情況大有不同，對於這一層，下結論時應當有足夠的考慮。”

他並不直接回應我的想法，提高了嗓音，像吼似地說：“什麼戰功！當個普通公民挺好！”
方块字读书社区 一句：“老實說，當年過草地，不是我，也難！”

我一向自以為看過一點戰史，却聽不懂他這話的含義，於是急急問了一聲：“怎麼回事？”

他可能有點動情，擊打着我的腿，說道：“那時，敵人兵分幾路，圍截，圍攻，圍剿，他們想怎麼打，怎麼搞死紅軍，不是我們破譯了他們的密碼，對他們的行動了如指掌，怎麼走得出草地。”說完，把頭揚起，似在回味當年情景。端詳他此時神態，依稀能見他草地突圍14年之後，在遼西戰場圍堵廖耀湘兵團，終致其全軍覆滅的英姿。這位當年四野六縱的副司令員，年僅34歲。赫赫戰功，何止密碼破譯！

“這些，為什麼不寫回憶錄，留下來？”

“寫了。100萬字。”

“有些問題，比如四野和林，怎麼下筆？”

“實事求是。我從來不信那一套：說一個人好，比香花更香；說一個人壞，比狗屎還臭！”

簡簡單單，三言兩語，已把問題概括起來，點透了。我當然知道，在當代中國，實事求是，不是最難也屬很難，但我相信，他的回憶錄在主要之點上會做到。

“什麼時候發表？”

“等我死後。”他答得沒有商量餘地。

“可得保存好。”

“輸入電腦了。”他透出一副開心又有點詭密的模樣說：“還有備份。誰也拿不走。”

言者無心。這句“誰也拿不走”鉤起20年前審李期間的一段使我終生難忘的舊事——

李案開庭前不久，“兩案指導委員會”辦公室得到獄中發來的報告，說李作鵬天天都在寫東西，自稱是“最後陳述”。寫時很詭秘，似在防着看管人員，因此無法知道內容。

審判庭庭長伍修權將軍在軍中曾是李的直接上級，對他深有了解，也猜不出他會寫些什麼東西，又擔心他在法庭上不顧三七二十一的扯出不好收場的問題，於是要求律師“再去見

見，摸清底數。”我和惠漁都沒有抗不執行的能力，在我甚至連“抗”的願望都沒有。我們次日就到了復興醫院，他因病在那裏治療，其實無非是換了個關押環境，依然是囚徒待遇。我們去會見，“兩案辦”的一個電話通知，就完成了通常需要的手續。

會見的氣氛是輕鬆的。先是言不及義地問了他的近況，而後再次交代了特別法庭的審理程序，扼要說明了被告人享有的訴訟權利，包括“最後陳述”權。他聽完就來了一句：“我寫了份最後陳述。”我們正專注地聽着，他却拐了個彎，似乎是漫不經心地說道：“縫到棉襖裏了。”隨着用手捂了捂厚厚的棉衣，又跟了一句：“誰也拿不走！”這句“誰也拿不走”仿佛是有的而發，我與惠漁交換了一下眼神，心想：要是他竟能料到我們此次來見的目的，他可太“鬼”了。此情此景，我們的嘴讓他堵得嚴嚴實實，還能再說什麼？看來祇好草草收兵，無可奈何地告別了。

回來復命。法官們也祇好靜待他發出他的書面陳詞再作理論。

這是我律師生涯中的最大敗筆！

奉法庭之命，意圖從被告人手上取得他視為隱密的自辯材料，上交法官，便利他們預籌對付之策，這麼幹，還有什麼公正與道義，律師的良知又在哪裏？還侈談什麼維護當事人的權利和利益？更何況這是中國律師在制度復興之初，在全世界面前的第一次公開亮相！日後每一憶及這段史實，就會感到有愧於後來者。人們也許會以“中國特色”解嘲，然而我却不能。記得事過12年之後，我又接手一件政治性甚濃的訴訟，得知有位同行在我介入之前將被告人寫給律師參閱的自辯材料，轉手交給了控方，我對這種做法極為反感，認為是對律師職業道德的背叛。假如他是仿效我在李案中的做法，試問其過在誰呢？誰是始作俑者！

能够用“組織服從”或者“顧全大局”自贖麼？都不能！半個多世紀以來，在人們的政治活動乃至日常生活中，這兩條既是行為規範，又是高尚情操，然方块字读书社区有多少人沒在這“高尚”的境況中逐漸地演化成了思想上的奴隸，有時還掩蓋着莫大

的謬誤、無比的荒唐！什麼是案中的“大局”？對於律師來說，依據法律去維護當事人的權益，維護人權，才是。即使當局把你的當事人視為仇寇，也應如是。什麼叫“組織服從”？說到底無非是用奉命辦事為自己的某些行為開脫。在訴訟中，作為律師，祇應遵從法律之命，按照法律規定辦事，即使有權威的、高層的組織發令于前，也該如是。遺憾的是，20年前我在不少環節上都没能做到，但願我和我的同行而今都能做得稍好一些。

誠然，中國律師的先天不足，突出地表現為自始就沒有法律上的獨立地位。特別是在現行體制下還受着行政權力的種種束縛，更有各類“組織”發出的各式限制。其中最令人不能接受的是指令律師不得受理某件訟事，或者不管案情如何，都不允許作“無罪”之辯。但我一個長時期裏都無能擺脫這些束縛與限制，咎由自取，無可推諉。我們多年的經驗證明：不能脫開集權統治的律師，根本不可能發揮出他應有的作用，不可能對公權力有所制約。初春3月從報上讀到一位同行發表的壯語，頗有感觸。她說：“作為律師，祇要嚴格按照法律辦事，誰也不敢把我怎麼樣。”這句豪言中的內容決非當前實際狀況的客觀反映。言論有自由，不妨任她發揮，而我所不能忘懷的是：《律師法》完全沒有解決這些非常、非常重要的問題！據知已有修改《律師法》之議，祇是不知能否改得稍如人意，讓律師們工作得更好些，發展得更健康些。

李作鵬本人在他作最後陳述中的表現，彌補了我這個辯護律師當年的不足。他自始至終念着他寫的《最後陳述》。主持審判的伍修權庭長不止一次地提出建議：“你身體不好，是不是不念了，把寫好的材料交上來，我們同樣會加以考慮。”而李每次的回答都是：“我能念完，我要念！”其間他也確曾犯病，當庭輸氧、服藥，而在稍緩之後，就又逐字逐句地念了下去，直止終結。伍修權庭長不是科班審判長，但他耐心地讓被告人把話說完說滿的審判作風，讓人欽佩。方缺字读书社区 人們會視他為“法盲”，可是，他知道該如何維護自己的訴訟權利，寸步不讓；這一層能够

做到，也屬不易。

這段史實發生、發展的全過程，那天沒有說起。他一直没有明說他對那場審判的意見，却又換了個話題：“給你個材料看看，是一個專門機構交給我‘參考’的。他們正在研究林的問題。”說着轉身回到內室取來厚厚一卷，用袋子裝着。我没打開，在想：他哪裏像是88歲老翁，看他邁出的健步，挺得筆直的腰杆！我情不自禁，說了一句：“真沒想到，蹲了那麼多年大獄，你身體還這麼好！”他聽得很得意，邊笑邊說：給你講個故事——

“關了一陣子以後，有一天，飯送來了，我一下子把飯桌掀翻，衝他們吼了起來：‘沒肉不吃！老子要吃肉！’後來聽說，毛作了三點批示：‘我們現在有條件給他們吃好些。他們有資格吃好些。我們應該讓他們吃得好些。’最高指示一出，伙食立刻改善。有了肉，我又提出要喝牛奶，接下來，又要水果。這麼一弄，比我在家里吃得還好。身體自然結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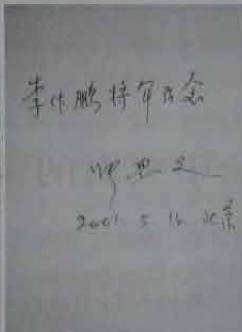
講時，一直流露着孩童能有的調皮情態。我和小傅聽得津津有味，笑着送了他一句：“欺軟怕硬，獄中居然也這樣。”董夫人這時發話了：“他没受罪，我可吃苦了。現在身體比他差多了！讓人氣不過的是：就算他上了賊船，當上反革命，憑什麼株連我？憑什麼把我這個當年的紅小鬼關起來？這筆帳，到今天也沒清。不清不行！祇要不死，我就得講！”

我對董夫人當年的入獄種種，一無所知，祇好寬慰她說：“株連的人很多，問題又複雜，一時怕不易清。”她說：“祇要有口氣，我就要申訴！到時候，請你來為我辯護。”我雖知渺茫，却未猶豫，應道：“好！責無旁貸。”李作鵬對夫人似有歉意，輕聲說道：“把她也弄起來，毫無道理，把身體也搞垮了。”跟着又指指一直立在旁邊的女兒，“孩子也受牽連。早早就退休了，陪着我們，照顧我們的生活。”

我也不知道他女兒往昔的工作和目前的生活，但有一點我是清楚的，假如他那一度顯赫的軍階官職不變，以其中共政治局委員、海軍第一政委的權勢，他的子女，或任高官，或充富豪，自在

當今權貴們的情理之中。不過，我想，作一個普通公民，與人無爭，與事不爭，退離崗位，行行孝道，也沒什麼不好。我至今猶記兩年前她為我們開門時的那種淺淺的、真誠的微笑。她在大家整整一個小時漫談中始終一語不發地在案頭立着，看去心態平和，顯出很有教養。……

該怎樣來評價這個富有傳奇色彩，而又溫馨情濃的一家呢？——我離題太遠了。



拉拉雜雜的記下20年前這段經歷中的瑣瑣碎碎，回顧走過的路，途中的坎坎坷坷，出自十分複雜的客觀情勢，任何個人恐怕對它都無能為力；但走得歪歪扭

扭，那就祇能怨一己的無能，這怪不上誰！誠然，時間證明：我們邁出了步子，在我，也做了；然而無情的歷史終將記下，我因丟掉了獨立的精神，放棄了自由的思想，也就必然缺乏求是的智能與勇氣，是故不可能做得合于自己的使命，那歪歪扭扭的步子不會合乎時代的鼓點。我沒有抱恨終天的怨尤。我也許還留有一點激情：願餘生能做得稍好一些，即使再當“吹鼓手”，也要盡力事事都把鼓槌擊向鼓心！僅僅為了這個緣故，也該感激詩評律師的作者，感謝他那發人深省的詩！

二〇〇三年五一節寫完，時SARS肆虐京城

附 錄

一、給中央寫的兩封信

作者說明：

2004年，我已是九十歲的人了，自我感覺仍然很健康。總結我長壽的原因，恐怕有四條：一是能吃。每日正餐無肉不行，無酒不行；二是能睡。保證每天睡眠六小時以上；三是能走。每天散步一小時以上，風雨無阻；四是堅持看書寫字，活動手腳，充實思想。

經歷文革並在中央工作過，現在還活着的人越來越少了。黃、吳、李、邱四人中，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都已走了，我是僅存的還能說話的見證人了。我做了一個決定：再次向中央寫信，實事求是的反映三十多年前的情況，並表明我一貫態度。

年過九旬，毫無顧慮，不吐不快。是對是錯，讓歷史去檢驗吧！

思來想去，我把這封給中央的信定名為《不平則鳴》。這也許是我有生之年寫的最後一篇文章了。

又過去了兩年，送出去的信石沉大海。我做了必要的修改後，收錄在此集中，供學者和讀者看吧。

方块字读书社区

不平則鳴（之一）

九十歲 李作鵬

一、林彪是反對“四人幫”的先鋒

廬山會議林彪為什麼反對“四人幫”？主要是林彪與江青的矛盾日益尖銳，江青要奪軍權。

由于江青獨尊自己是文革首領，企圖控制軍委辦事組，架空林彪，由她直接調動解放軍進行“三支兩軍”工作。黃永勝在林彪、總理的領導下對此不滿，很少到她那個廟裏燒香磕頭，報告請示，因此江青就很生氣，多次罵黃永勝：“國民黨搞黨國，你們搞軍國，你們搞軍隊領導一切，不受黨的領導。你們目無中央文革，對我封鎖消息，你們戴紅星軍帽，穿紅旗領章軍裝，不覺得耻辱嗎？”康生也曾指責軍委辦事組是反江青的“俱樂部”。江青怒罵黃永勝，實際上是怒罵林彪。

林彪對軍委辦事組曾有三條決定：不許江青一伙進入軍隊；不許軍隊中有江青一伙的代理人；不許江青一伙插手軍隊工作。林彪也曾痛斥江青“無名小卒，野心不小”。

林彪在廬山會議上不點名的批判張春橋反對毛主席是“天才”，也就是批判江青一伙反軍亂軍、陰謀奪取軍權的野心。所以林彪在廬山會議登高一呼，全場熱烈鼓掌擁護（臺上除毛澤東外，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均鼓掌）。第二天，再次聽完林彪講話錄音，仍然全場熱烈鼓掌擁護。

林彪蒙冤垮臺後，江青更加忘乎所以，不但反軍亂軍“火燒荒山”，要奪軍權，還要奪黨權，奪政權，野心越來越大。

毛澤東去世後，華國鋒打倒了“四人幫”，功不可沒。但糊裏糊塗的，同時把黃、吳、李、邱打入十八層地獄，魚龍混雜，玉石俱焚，是完全錯誤的。

方块字读书社区

據說胡耀邦主張“一風吹”，有人批判他右傾，他忍氣吞聲，不久就去世了。

江澤民上臺後，對林彪問題未見有任何表示，令人失望。可能是顧慮違反《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無能為力。《決議》出世時，客觀形勢仍是極左思想餘毒嚴重，《決議》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確。

其實廬山會議問題並不難解決，打倒“四人幫”就是給廬山會議的重要平反。李雪峰、鄭維山的解放，也就是為廬山會議第六號“反革命簡報”的平反。

毛主席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徹頭徹尾是錯誤的，各種大、小冤案都平反了，難道文革中唯獨林彪一案是正確的、不能平反？祇有華國鋒的“凡是”思想，才是如此邏輯！如果說林彪“叛國外逃”，處理有困難，可是黃、吳、李、邱及其許多受牽連的高級幹部並未叛國，為什麼不能平反！

二、否定两个反党綱領

毛澤東說，廬山會議主要就是兩個問題，一個是國家主席問題，一個是稱“天才”問題。

反黨的“理論綱領”——天才論，“組織綱領”——設國家主席。這是對林彪廬山會議講話的結論。

天才論如何正確解釋，我自認不懂，甘拜下風。我的粗淺感性理解，從“天才”兩字的字意講：天，是無限大，無限高；才，是能力、智慧。兩字合起來說，“天才”就是偉大的才能和智慧。《現代漢語辭典》中對“天才”的解釋是：卓絕的創造力、想象力，突出的聰明智慧。

廬山會議上，林彪講了一句：“毛主席是天才，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這就惹起來了毀滅自己的大禍。毛主席定性其是“唯心主義先驗論”，是“反黨理論綱領”。我認為這是文不對題，強加罪名的批判。林彪並沒有說毛主席的天才是先天就有的。陳伯達搞的馬列主義語錄中，也**方块字读书社区**天就有的內容。毛澤東根據什麼得出“唯心論、先驗論”的結論？這個定性難道不是無

中生有、假的放矢、歪曲原意的嗎？難道不是完全不應該的“失誤”嗎？

關於國家主席問題。文革以前設有國家主席，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不論接見外國友好人士及出國訪問，爭取團結第三世界各國，實行和平共處，功不可沒。劉少奇蒙冤後，國家主席空缺。

1970年春，修改憲法時，毛澤東主張不設國家主席。關於副主席問題，林彪一開始就主張可設可不設。林彪不僅不願擔任國家主席，也不願擔任國家副主席。

由於政治局討論同意毛主席意見，不設國家主席，所以廬山會議自始至終林彪根本沒有再提國家主席問題。陳伯達搞的馬列主義語錄，也沒有涉及國家主席內容，可見他們已同意政治局的決議，並沒有再堅持設國家主席問題。

祇有汪東興在廬山會議華北組發言時，特別強調要設國家主席，并由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閉幕時的講話，講到國家主席問題就很不生氣地說：“你們有飛機大炮原子彈，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當國家主席！”這不是生汪東興的氣，而是生“有飛機大炮原子彈”的林彪的氣，不承認林彪已經“改正錯誤”。

事後，毛澤東更嚴厲地批評林彪是反黨、是奪權，難道這不是強加罪名，而是馬列主義？誰相信？我是不相信的！

毛澤東去世後，仍然恢復了國家主席制度，可見國家主席制度有優越性，不能取消。

現在江澤民、胡錦濤先後擔任黨、國家、軍委主席，既不像曹操那樣害怕放在“爐火上烤”，也沒有像某人那樣將擁護自己的人誣成是“反黨、奪權”。結果是黨、國家、軍隊統一領導，搞得不錯。我擁護，我支持。

三、否定無限上綱、強加罪名的極左路線

“一個是無限上綱，另一個是亂戴帽子的帽子廠”。這是毛澤東說的，應該自作自受。其主要表現是：顛倒是非黑白，

把是當非，把非當是，把黑當白，把白當黑；正確的認為是錯誤的，錯誤的認為是正確的；順流認為是逆流，逆流認為是順流。其次是以小化大，半兩當作千斤，說錯一句平常話，做錯一件平常事，不是原則錯誤誇大為原則錯誤，不是路線錯誤誇大為路線錯誤。甚至把出生入死革命幾十年的共產黨人、高級幹部，誇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的三反分子。這是文革中的普遍現象，廬山會議並不例外，舉幾個無限上綱、強加罪名的例子，可以證明：

1、廬山會議是黨內第十次路線鬥爭，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

2、林彪那個講話，是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

3、那些大將包括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還有李雪峰、鄭維山，他們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理論綱領是天才論，組織綱領是設國家主席？？？

4、解放軍有驕傲情緒，背上背了兩個包袱，一個是打仗有功的包袱，一個是支左有功的包袱？？？

5、華北小組六號簡報是反革命簡報？？？

6、表揚江青“參加兩次路線鬥爭，就是同劉少奇，還有同陳伯達、林彪的鬥爭，都是江青端出來的，她是立了大功的”。要向江青學習？？？

以上各條除了最後第六條外，有什麼確切事實根據？是實事求是嗎？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嗎？是治病救人嗎？是黨內民主作風嗎？我懷疑，我不相信。最好由參加廬山會議的中共九大二百餘中央委員評論，由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評論。

在中共中央會議上，不點名地批評一個黨員，竟惹起這樣多、這樣大、置人死地的滔天罪惡，結果毀掉一個豐功偉績的元帥，毀掉一批豐功偉績的將軍，毀掉一個著名的政治家、理論家，還有一批其他高級領導幹部，你不覺得痛心嗎？我覺得異常痛心！難道這是光榮、偉大、正確的共產黨的偉大勝利，值得高興、值得慶賀嗎？不！！這是自己毀滅自己的大悲劇、大災禍、大

錯誤！第一位全黨擁護的接班人毀掉了，第二位全黨擁護的接班人又毀掉了，誰高興？第一是反共反華分子高興，他們手舞足蹈的慶賀。第二是黨內“四人幫”高興，他們與反共反華分子互相呼應，也是手舞足蹈的慶賀。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領導人之一，是創建工農紅軍的領導人之一。在戰爭年代，他的豐功偉績是誰也不能否定的。

我過去對他一直是擁護的，我現在對他既擁護又反對，正確的擁護，錯誤的反對。

林彪對毛澤東的擁護，比誰都早，比誰都堅決，比誰都積極。毛澤東順境時他擁護，毛澤東逆境時他也擁護，林彪遭到毛澤東嚴格批評時，仍然擁護毛澤東。他是毫不動搖，幾十年如一日擁護毛澤東的“頑固份子”，“死硬派”。可是最後擁護毛澤東是“天才”，擁護毛澤東當國家主席，本來是“名正言順”，為黨為國的忠誠好心，開始毛澤東也說是“順流”，不是“逆流”，“二月出現逆流，八月出現順流”。以後却出乎意外的變了，“擁護”變成錯誤，拍馬屁拍到馬腿上，烈馬揚腳一踢，把林彪踢翻了，落在臭水坑裏，慘不忍睹，臭不可聞。

毛澤東對待幾十年南征北戰、出生入死、同甘共苦的親密戰友，多麼無情無義！

歷史京劇《打金磚》，其主要內容是漢光皇帝劉秀喝醉了酒，糊裏糊塗把同他一起同甘共苦的開國大臣殺得一乾二淨，在要殺某武將時遭到強烈反抗，就地拾起一塊磚頭，要砸昏君，皇帝迅速躲開，沒有砸着，最後武將砸自己頭腦而亡。皇帝酒醒後，知道皇後為了報殺父之仇，陰謀詭計故意把已戒酒的他灌醉了，結果將皇後也殺了。

這個故事雖然荒唐，但我感興趣，有教育和啓發作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像喝醉了酒一樣，糊裏糊塗的昨天打倒彭羅陸楊，今天打倒劉鄧陶，明天打倒二月逆流。同時把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和各省市主要負責方塊字讀書社區。可是至死之前毛澤東也未酒醒過來，糊裏糊塗地表揚作惡多端的江青“立了大功”。劉秀

是真喝醉了，難道毛主席也是真的“糊塗”嗎？

四、兩党性質相近的廬山會議

廬山風景幽雅，是軍事、政治、文化齊聚的奇山。

三十年代，蔣介石坐鎮廬山，指揮贛湘鄂地區“剿共”，在廬山召開多次高級軍事會議，並辦廬山軍官訓練團。

解放軍在廣大人民支持下打敗了蔣介石後，共產黨也在廬山召開過各種重要會議。其中特別是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及一九七零年八月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均是兩次不成功的會議，給人印象非常深刻。

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會議是討論以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為三面紅旗的經濟建設形勢，並總結經驗教訓。會議期間，彭德懷向毛主席呈送了一份書面意見，其中內容有一句：三面紅旗、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這句話刺痛了毛澤東的心，很快發起了所謂黨內第八次路線鬥爭，毛主席無限上綱，誣蔑彭德懷“裏通外國想奪權”，又說：“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也跳出來反黨，他們搞軍事俱樂部，不談軍事，談什麼人民公社辦早了，得不償失”。還說：“我同彭德懷相處幾十年，祇有二八開，二分合作，八分不合作”。會議胡批亂鬥，搞得彭帥撤銷職務，臭不可聞。

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小組指揮紅衛兵把彭德懷拉出來胡批亂鬥，甚至將他折磨得死去活來，最後蒙冤死去。毛澤東一句挽救的話也沒有說。彭德懷是工農紅軍創始人之一，不論國內反蔣，還是抗日和抗美援朝，均是中外名將，竟遭如此下場。

一九七零年八月，中央會議主要討論憲法修改、發展經濟計劃和戰備，林彪在開幕式大會上講話，其中有一句不指名批評張春橋的話，林彪說：“毛主席是天才，我仍堅持這個觀點”。陳伯達搞了幾條馬列主義關於天才的語錄，以證實林彪講話是正確的。

批評張春橋，刺痛了毛澤東的髮髻，手脚都整涼了”。什麼是要害？是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是全體中央委員、候補中央

委員對江青、康生、張春橋一伙人倒行逆施的群起而攻之。

毛澤東坐不住了，很快發表了《我的一點意見》。明門陳，暗批林。

會議結束下山後，在北京首先召開了批判“反革命簡報”的華北會議，撤銷了李雪峰、鄭維山的職務，並隔離反省。然後召開批陳整風會議，批判“軍事俱樂部”的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會後，毛澤東召集上述幾位談話說：“你們的問題在我這裏解決了，主要看今後實際行動”。

可是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南巡時，態度突然大變，在外地秘密講話，策劃批林，其內容不准告訴北京任何人。毛澤東宣布廬山會議沒有完，批判林彪廬山講話是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毛澤東背着黨中央，背着中央政治局，秘密策劃批鬥林彪，其行為就不是光明磊落的。他自己提出的“三要三不要”，自己做到了嗎？我看“不要分裂”、“不要搞陰謀詭計”他就沒有做到。

林彪為什麼“逃”往蘇聯，衆說紛紜。但我認為，“逃”往蘇聯不是叛變，而是躲難、躲批鬥、逃禍。像朝鮮、越南有的高級幹部跑來中國躲難、逃禍一樣。

有的批判文章說，國民黨有汪精衛叛逃，共產黨有林彪叛逃，他們的罪惡，永遠不能翻案。我認為這是胡說八道，是“四人幫”式的思想言論。汪精衛永遠不能和林彪相提並論。汪精衛是徹頭徹尾的叛國投降日本帝國主義，當日寇在中國偽政權傀儡主席和偽軍統帥，配合日軍侵略中國，殘殺中國人民。難道林彪是這樣嗎？你能拿出半點根據嗎？

我過去說過：林彪出走是“逼上梁山”，是毛澤東秘密策劃批鬥林彪的結果，對不對，請大家評論。生在中國，死在中國，出走是錯誤的。毛主席則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讓他去！”不久還高興地同幹部開玩笑說：“你們傷風感冒了，我的親密戰友、副統帥、參謀總長，哪裏去了？”由此可見，和當年對彭德懷的態度一模一樣。

方块字读书社区

彭德懷是杰出軍事家，排名第二的國家元帥。林彪也是杰

出軍事家，排名第三的國家元帥。他們的一生對革命事業做出卓越貢獻，為黨為國為民立下豐功偉績。對他們的功績，任何無限上綱、強加罪名都是誣蔑不了的。彭德懷早已平反，林彪仍是懸案，早應平反，三十多年了尚未平反，什麼時候平反，拭目以待！

五、否定林彪搞軍事政變謀害毛主席

如果林彪要搞軍事政變並不困難，利用他在全黨、全軍、全國的政治威信和黃、吳、李、邱掌握的陸、海、空軍大權，搞軍事政變可能易如反掌。但林彪根本沒有“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的反動陰謀。黃、吳、李、邱也根本沒有這種反黨、反毛澤東的邪惡禍心。

共產黨、毛澤東把我們提拔到重要領導崗位，寄以很大希望，中共九大時又進入中央政治局，更加感到光榮又責任重大，應不辜負黨的重托。因此廬山會議期間，根本不可能搞什麼軍事政變。有的人說是“未遂政變”，言之無憑，不能成立。毛澤東說是搞“軍事俱樂部”，也沒有根據。

後來，林立果認為黃、吳、李、邱“這些老總政治水平低……指揮軍事戰役可以，指揮政治戰役不行，今後政治鬥爭不能靠他們，真正領導權要掌握在我們手裏”。因此出現“五七一工程紀要”。

我認為林立果那些不切實際的反革命武裝叛亂的空想，與林彪無關。什麼“小艦隊”，什麼“教導隊”，什麼火箭筒和火焰噴射器……，他們野心不小，要謀害毛主席，要襲擊釣魚臺，要由他們這些無名小卒掌握國家大權。但其具體措施、具體辦法則是很低能的，白日做夢、志大才疏，像小孩玩家家一樣胡鬧，根本不像是指揮千軍萬馬的軍事家、國家元帥、著名戰將林彪的作為。

還有，我在中央24號文件中看到的林彪給黃永勝的所謂“親筆信”，內容：“永勝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時候都要樂觀，保護身體，有事時可與王飛（另塊字讀書社區，林彪）”。我認為這封“親筆信”一定是偽造的，是欺騙無知人的劣等作品，根據有

三：

第一，林彪的鉛筆字體，我稍有了解，我一看所謂“親筆信”的字體同林彪的字體，就覺得似像非像，不是林彪親筆寫的。

第二，黃永勝與北戴河林彪處有保密電話暢通，林彪不論重要指示和一般指示，均用保密電話告訴。而黃永勝與北戴河天天有電話來往。我在軍委辦事組工作，還沒有見過林彪有書面指令。

第三，林立果手中的林彪給黃永勝的所謂“親筆信”，為什麼不送給黃永勝，而是給他們死黨傳閱？這不是明明白白的借林彪的權威，欺騙他們死黨，拼命去幹壞事。最後這份“親筆信”還是從他們死黨手裏收回的。

“四人幫”利用所謂“手令”和這份“親筆信”，誣陷林彪要謀害毛主席，搞軍事政變，那是百分之百的冤枉。有些批判文章也把這份所謂“親筆信”當成“珍奇寶貝”，胡批瞎批，是盲目無知的。

一個傾向掩蓋另一個傾向，不平則鳴，現在就鳴到此，還有其他問題，以後再鳴。其實廬山會議情況，在我的回憶錄中已有所記錄，但那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寫的。現在寫的是補充過去的不足。

九十高齡老人，能不能繼續補充很難說，可能帶到火葬場燒掉而了結。但物質不滅，歷史是人民寫成的，我很樂觀。

不平則鳴（之二）

九十歲 李作鵬

一、含冤負屈

特別法庭判決我三條大罪：第一是組織領導反革命罪；第二是陰謀顛覆政府罪；第三是破壞學讀中社區。這三條大罪，根本沒有出示任何證據，完全是誣蔑陷害。

其實當時國外評論很多，有的說：“黃永勝等幾位大將的罪行，沒有明確的證據”，有的說：“證據不足有失公平”，有的說：“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等等。

現在主要談林彪在“山海關機場”外逃”問題。在這個舉足輕重、震驚中外的問題上，特別法庭對我定罪三點：1，“兩次篡改周恩來的命令”；2，“沒有採取任何阻止起飛的措施”；3，“事後塗改電話報告記錄，掩蓋罪行”。

參加公審領導人之一伍修權曾說：“李作鵬主要是山海關機場問題”。

公審及以前，我對山海關機場問題采取了全部承擔責任的態度，因為林彪是在山海關機場“逃走”的，機場是海軍機場，我是海軍第一政委和黨委第一書記，又是遵照周總理指示處理機場問題。因此當時我認為，山海關機場發生的問題，不管性質多麼嚴重，我不但有領導責任，而且有直接責任。我不能把責任推給周總理。我對周總理領導的高水平、工作才能、人格風度歷來是敬佩的。他在處理“九·一三”事件的過程中，不管我覺得有什麼不妥，有什麼失誤，寧願自己承擔，寧願自己吃虧受委屈，也不把錯誤推給周總理。為了黨、為了國家、為了大局，即使蒙冤負屈、粉身碎骨，也不說一句怨言。

在特別法庭公審高壓下，我咬緊牙關忍耐着，絲毫不涉及周總理，祇說了一句：“承擔責任，保存資料，保留意見”。同時我還表示，“希望特別法庭把處理山海關機場事件的全部資料長期保存，以留給爾後的史學家、法學家研究參考”。

應該說，我這種做法不是實事求是，不是歷史唯物主義，沒有把真實情況反映出來。

經過十七年的刑期折磨，苦也吃了，罪也受了，人也風燭殘年了，才決心將含冤負屈、閉口不講的情節，吐露出來，並將詳細情況寫在我的回憶錄中。

二、簡述過程

方块字读书社区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深夜二十三時，周總理電話查問：“山

海關機場今天下午是否有一架空軍飛機到了那裏？”我經查問後報告周總理：“有一架三叉戟飛機于晚二十時十五分到達，現仍停在機場”。周總理聽後語氣平和地對我做了四條指示：

一，北戴河那位，可能要動，要飛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飛夜航。

二，他要飛夜航，你就告訴山海關機場，待他到達機場後，就請他給我來個電話。

三，空軍那架飛機的行動，要聽北京我的指示、總長的指示、吳副總長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飛。

四，我已告訴吳法憲到西郊機場去了，作必要的準備。

九月十二日23點35分，我將周總理指示精神向山海關機場進行傳達。但是由于我并不了解北戴河發生的情況，對總理電話指示中的第三條，當時我確有思慮：“難道周總理個人指示，或黃總長個人指示也不能放飛嗎？”因此在向山海關機場場站值班員傳達總理第三條指示後加上了我的補充：“四個首長中，其中任何一個首長指示均可放飛”。

九月十三日零點06分，我再次打電話告訴山海關機場說：“空軍那架三叉戟飛機要經周總理、黃總長、吳副總長和我的聯合指示才能放飛。如果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不管是誰的指示要報告我，你們要切實負責。”

九月十三日零時20分左右，當場站領導電話請示：“如果飛機要强行起飛怎麼辦？”我不敢決定。我答：“可直接報告周總理。”

九月十三日下午，秘書劉繼祥向我報告，海航五師整理的《山海關機場九月十二、十三日情況報告》。其中山海關機場記錄零點06分的通話原文，完全不符合我的指示原意。因此我進行了修改，修改後全文是：“零點06分，李政委來電話，再次強調中央首長指示，四個首長聯合指示才能放飛。如果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不管誰的指示要放飛，都要負責任。”這樣才符合我指示的原意。同時我要劉秘書與山海關機場校對，劉秘書經過

校對後，報告我說：“完全與首長改動的情況一樣。”（劉秘書仍然活着，可以查證。）

之後，劉繼祥秘書將報告謄抄後送我，我一個字也沒有改動，就在這個文件頭上寫上：“呈總理批示”。

事實過程就是如此。

三、周恩來的失誤

九月十三日晨，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由周總理報告林彪“外逃”的經過。我從周總理的報告中，才大致了解林彪乘飛機“外逃”的情況。當時我聽後非常震驚！原來周總理早就知道林彪要坐飛機“外逃”，但卻沒有向我透露任何蛛絲馬迹，顯然是對我政治上不信任！

我認為周總理處理山海關機場“九·一三”事件的過程中，存在重大失誤，他採用的既不是上策，也不是中策，而是下策！

什麼是上策？當總理知道林彪要“外逃”的情報，應立即指示北戴河擔任林彪警衛的8341部隊加強警衛，加強監視，控制林彪的交通工具。同時總理完全可以直接與北戴河林彪或葉群通電話，明確告訴他們，中央不同意夜航，不同意現在離開北戴河。

什麼是中策？周總理既然對我政治上不信任，不便告訴我林彪要“外逃”的情報，那就不應該讓我處理這個問題，應該命令其他人或海軍司令員蕭勁光來處理這個問題，明確告訴他林彪要“外逃”，立即關閉山海關機場，嚴格控制三叉戟飛機，軟禁空軍機組人員不准亂動。這樣林彪即使到了山海關機場，也無法“外逃”。

什麼是下策？上面兩策皆失，採取了對我政治上不信任，而又要我處理這樣重大問題，既不敢告訴我林彪“外逃”的情報，又不敢指示我採取強有力阻止林彪“外逃”的措施，把我蒙在鼓裏，糊裏糊塗不可能有什麼好的高明辦法，周總理違背了“用兵不疑，疑兵不用”的原則，犯了兵家大忌結果導致林彪飛機“逃跑”。

方块字读书社区

周總理知道林彪要坐飛機“外逃”，為什麼提出“四人一起”的辦法？這完全不是他處理緊急重要問題的作風。周總理一生獨自處理許多國內外、黨內外的緊急重大問題，他有資格、有權力、有能力、有經驗，獨自專行處理，根本無須什麼“四人一起”，完全是多此一舉。

但是當時一個是黨的副主席、接班人，一個是中央常委、國務院總理，一個要夜航，一個不讓夜航。擺在面前的確實是一個難題，怎麼辦？把林彪放跑了，不亞于爆炸一顆原子彈；把林彪扣住了，林彪不承認“外逃”，還會責問總理為什麼限制我的行動自由，周總理就很為難了。找“四人”共同負責，似乎會好一些。

其實“四人一起”是無法處理緊急情況的，很容易貽誤時機，不是好辦法。夜間四人並不是集中在一起，而是分散在各自住宅。林彪飛機要起飛夜航，山海關機場先向我報告請示，我立即報告周總理，報告總長，報告吳法憲，徵求意見後，才向山海關機場作回答。或山海關機場直接請示周總理，由總理徵求黃、吳、李的意見，也要一定時間。這才是拖延時間，放跑林彪的辦法。

在這裏還要提一句，無論“四人一起命令”，還是“四人中任何一人指示均可放飛”，還是“聯合指示才能放飛”，都無法改變林彪强行起飛的事實。祇有周總理按上策或中策的原則果斷處理，才有可能阻止林彪的行動。

總而言之，特別法庭回避周恩來的重大失誤，把我打成替罪羊，似乎是顧全大局。其實我個人犧牲，關係不大，最重要的是不執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及沒有明確證據，有失公平，自毀長城的政治影響甚大。

公道在人心，千古奇冤，歷史遲早會還個清白。祇要我們黨的領導能夠真正實事求是，做到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敢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任何重大歷史問題都可以公平、公道、正確的解決。黨的領導威信大為提高，人民心情舒暢，全心全意擁護。如果我們黨的領導對**坊學讀書社區**問題過分依靠“宜粗不宜細”，不敢觸及問題的根本原因，不敢觸及問題的關鍵，為了找替死鬼，

甚至無限上綱，強加罪名，把好人誣成壞人，把小錯說成大罪，用這樣不公平、不公道的錯誤處理辦法，來維持領導威信和權力，是困難的，不能持久的。人民不會心服口服，不會心情舒暢，不會團結一致，共同奮鬥。民心似水，可以載舟，可以覆舟，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

二、步兵營進攻演習的 幾點經驗

作者說明：

這篇文章發表於1953年10月《八一雜誌》第40期。本文通過組織步兵營進攻演習，論述對諸兵種合同演習的組織工作要點，強調學員要在模擬實戰演習中訓練。



爲了了解諸兵種合同戰鬥的戰鬥組織與協同方法，52年我校在漢口北橫店附近，組織了一次聯合兵種的步兵營進攻實兵演習。茲將此次演習的幾點體會寫出，以供參考。

一、演習前的準備工作

演習成效的好壞，決定於演習前準備工作的好壞。凡準備不細緻，計劃不周密，均將影響演習的成效。

1. 選擇演習地區——演習前從地圖上概略決定演習地區，然後詳細現地偵察，務求能適合兵種合同戰鬥

的演習。首先應適合坦克進攻（如祇有小起伏地，農作物少），其次應有良好參觀地點及交通方便的地形。橫店附近，就是具備上述條件——有公路，有鐵路，有便于坦克運動的小起伏山岡，有便于諸兵種協同組織的地形，有足够的正面與縱深，也有高地便于參觀。

2. 構成想定——演習地區決定後，組織戰術教員和各兵種的教員到現地詳密的組織想定。想定組織，必須針對美帝防禦特點，以及現代化作戰的特點為着眼。要表現出合同戰鬥的功用。為此必須對現地詳密偵察，反復研究。務使想定內容基本上是完備的，然後印制出來，再組織預演。演習者有了想定作依據，即易于理解演習內容。如果想定制定的粗糙，必將引起預演中的許多修改和變動，而浪費了人力和時間。

3. 組織演習指揮部——組織一次演習，無異于組織一次戰鬥。諸兵種合同戰鬥的演習組織工作和組織諸兵種合同戰鬥是一樣複雜的。必須有統一的、健全的指揮機構，有各種專門人材，具體分工，各行其實，才能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演習。千萬不要臨時抽調指導人員，或一人兼數職，這樣則易于混亂指導步驟。指揮部幹部，不要有臨時應付公差或幫忙觀點，必須正確認識這是完成諸兵種合同戰鬥訓練的重大任務之一，要充分發揮其積極性和創造性。

4. 演習分隊的訓練——演習分隊是從各種不同建制的單位調集一起的，軍事素養不一致，技術無聯系。因此訓練步驟須根據各分隊具體情況，圍繞演習內容，先予以分別的訓練和指導，而後再聯合實地預演，這種訓練完全是突擊式的，強調各兵種動作熟練和協同一致，特別要遵守時間，嚴格執行計劃。據我們的經驗，先將演習分隊在演習地區全部擺開，使各分隊明了他們在各時期、在各地點的動作；然後分散，在其預定演習的地區，從單兵到班、排、連反復演習；最後總和預演，使各兵種動作一致，有步驟地逐次修正。這方映字讀書社區

聯合演習要求。其次演習分隊，必須確認演習就是訓練自己的最

好時機，應愉快地努力訓練和學習。這次演習證明，有正確認識的演習分隊，經過反復演習，無論幹部戰士，在戰術上、技術上、體力上均有顯著的進步；相反，有些分隊存在幫忙應付公差的觀點，則收獲不大。

5. 預演及器材消耗——組織一次正式演習，須有三至四次的正式預演，使用一部分器材，才能期望正式演習比較完善。據我們的經驗，預演所需器材，最少須與正式演習時相等。否則預演時看不出缺點，而正式演習時，反而使用器材過多，發現缺點亦來不及糾正，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6. 工事構築——工事構築包括敵防禦工事及我方進攻工事，這些應和真實陣地完全一樣的構築，特別注意偽裝，嚴格規定紀律，務使在攻勢發起前，戰場上形成假空虛的狀態。兵種雖多，但看不出目標來。這樣才能顯示出現代戰鬥特點。

7. 組織參觀——假設參觀者能够深刻體會內容起見，在演習前一天，參觀人員有組織地先到演習場參觀。由演習指揮部有組織、有計劃地派專人到每一陣地上，現地結合圖表、沙盤、實兵、實物介紹每一階段的各兵種動作，使參觀者有一個全面演習內容的概念。這樣既便利於他們次日的參觀，同時也就等於上了一次步兵營進攻現地研究的課。正式演習時，須到指定的參觀地點參觀。由戰術教員利用廣播器，結合演習進程，按時逐段介紹，特別是容易使人模糊的地方，詳加說明。否則演習進行很快，容易形成走馬觀花，看看熱鬧，印象不深。

二、從這次演習中解決的一些問題

1. 接觸敵人的進攻方式：過去進攻方式一般由行軍隊形開進、展開，經過接敵運動然後到進攻階段。對於近代戰爭通常採取的衝鋒準備，衝鋒實施，縱深戰鬥三個階段，思想上是有抵觸的，尤其是初級幹部。經過這次步兵營的演習，大家才明白：因為現代戰爭，雙方軍隊數量眾多，戰綫漫長，自動火器和機械化部隊的增加，以及築城器材的進步，常使雙方形成膠着狀態。因此進攻部隊常是在接觸敵人陣地前沿200—400公尺的距離，進行

方块字读书社区

綿密攻擊準備，然後發起總攻。這樣不但突入敵陣容易，而且減少突入敵陣地內不必要的混亂，縮短戰鬥過程。這種沒有經過接敵與進攻階段，而直接接觸敵人的進攻，是近代諸兵種合同戰鬥通常採用的進攻方式。

2、從步、炮、坦、工及空軍的互相關系，證明單一兵種不能獨立完成任務。現代作戰是各兵種協同動作爲基礎的全軍戰鬥。經過這次演習，更顯著地證明了這一點。如在演習時，炮火準備未開始前，空軍開始轟炸破壞；炮火準備的末期，坦克到達衝鋒地綫，工兵施放烟幕，炮兵開始延伸射擊，坦克引導步兵衝鋒。但在炮火已延伸射擊，而坦克與步兵尚未衝到敵第一塹壕的空隙期間，敵人的火力復活了，營的直接瞄準的步兵炮及營迫擊炮，重機槍，則猛烈地壓制敵復活的火力點，使坦克、步兵順利地實施衝鋒。

坦克與步兵保持200—400公尺距離，在炮兵護送射擊掩護下，坦克、步兵一波一波地前進。在坦克受到敵反坦克火力或防坦克障礙物阻止不能前進時，工兵則協同步兵，除以火力消滅敵反坦克手及反坦克武器外，很迅速地排除了一道一道的防坦克障礙物，使坦克順利前進。同時坦克又以火力掩護工兵作業，引導步兵向敵陣地突進。這就是諸兵種合同戰鬥互相依靠、互相幫助的關聯性。也必須這樣，在諸兵種的合同作戰中發揮每個兵種的特性，才能完成共同任務，徹底消滅敵人。

從這裏有力地證明了無論強調那一個兵種，都不能單獨完成現代化的戰鬥任務。我們這次演習，有一輛坦克掉在敵人第一塹壕裏，步兵、工兵祇顧前進，沒有及時幫助坦克克服困難，到演習結束後才把坦克救出來，這是合同作戰演習中不應有的現象。

3、進攻正面、縱深及其速度：大家知道，按戰術原則，通常主要突擊方向上的團，進攻正面在1500公尺左右，縱深3—5公里，當前任務是奪取敵人第一陣地，後續任務是占領敵團預備隊陣地及其炮兵陣地；主攻營進攻正面在700公尺以內，縱深1500公尺左右，當前任務是奪取敵第一、二道塹壕，後續任務是占領

敵第三道塹壕，并殲滅敵營預備隊及其炮兵。進攻速度平均每小時1.5至2.0公里。有些同志對這些原則始終有所懷疑，認為進攻正面太寬，縱深太長，尤其對於進攻的速度，認為太快。

這次營進攻的演習，正面是700公尺，成兩個梯隊，既不感覺兵力火力的擁擠與密集，亦不感覺兵力分散與薄弱。至于突破敵營防禦陣地1200公尺的縱深，祇經過45分鐘（從發起衝鋒計算起）就解決戰鬥。從這次演習，由于現代化裝備的部隊出現于戰場，這個進攻正面和縱深及其速度的數字，證明是正確的。

4. 炮兵保障：從這次演習，大家對於炮兵保障有了深刻的認識。如：在炮火準備時，營八二迫擊炮歸團炮兵群長指揮，參加炮火準備，團配屬於營的步兵炮，擔任直接瞄准射擊。這就使壓制和破壞射擊都起着很大的作用。衝鋒發起後，師、團炮兵群以逐次集中射擊護送坦克與步兵衝鋒，團、營部分炮兵則在炮火延伸後擔任壓制敵復活火力點，直接掩護坦克、步兵的衝鋒。縱深戰鬥時，營的戰鬥地區雖然仍在師、團衝鋒護送射擊範圍內，為取得步、炮更進一步的密切協同，及時對敵壓制及粉碎敵之反衝鋒，團炮以一部轉屬到營，營炮以一部轉屬到連。如此分割指揮，不但火力仍然是集中的，而且機動靈活，足以應付一切變化，加速戰鬥的進程，解決了不會使用大量炮兵的模糊認識。

5. 現代化進攻與防禦陣地組織：這次演習，在進攻方面，距敵前沿200—300公尺處挖掘第一道塹壕，并有各種火器掩護的交通壕、掩壕、掩蔽部、防彈坑、指揮所及防坦克障礙物和坦克出發陣地及炮兵陣地等工事設備。敵軍方面陣地，按照美軍防禦特點，結合現代化防禦原則而組成的。包括主陣地、預備隊陣地及炮兵陣地。此次我一個營進攻敵人一個連的正面，該連以兩個排展開在第一塹壕內，另一個排在第二塹壕內，其第三塹壕則為營預備隊與營炮兵陣地。第一塹壕與第二塹壕距離約為200—400公尺，第二塹壕距離第三塹壕約為600—800公尺，有兩個主干交通壕貫連其整個防禦陣地，并塊學讀書社區補充塹壕在第一、第二塹壕間斜交，加強陣地組織，在陣地周圍及其縱深圍繞着防坦克

地雷區及各種障礙物。

由于上述進攻與防禦陣地編成，使學員對於現代化進攻與防禦陣地組織，得到明確的認識，同時也解決了各兵種、各階段、各時期的協同問題。

6. 通信聯絡：這次通訊聯絡組織是經過團通信樞紐部、團、營指揮所、觀察所等系統組成的。在演習過程中，通信聯絡得到有力的保證，大家對於各種通信手段亦有了深刻的認識。

在有綫電方面：于進攻準備時期，必須構通各梯隊以及各兵種指揮員間的通信聯絡，並應架設雙綫，防止指揮聯絡中斷。但在我軍現有電話技術裝備下，一般趕不上步兵發展速度。所以在進攻發起後，應採取無線電聯絡為主，以有綫電為輔助，這樣才能保證通信及時。無線電方面：以我現有的通信裝備及技術條件，報話機祇能配屬到營，步行機運動輕便，使用手續簡單，可以配屬到連。經過這次實際經驗，無線電的使用應更進一步發展到排才能通信自如，對空聯絡則主要使用布板。

三、今後對諸兵種合同作戰教育的改進意見

由于這次演習規模小，祇有步兵一個營、坦克一個連（十輛）、工兵一個連、炮兵一個營（實際祇有二個多連）、一個通信連、飛機祇出動了一架參加，未能呈現出諸兵種合同作戰全般動作。營進攻過程很短，一閃而過，參觀者所得的印象也不十分深刻。特別是兵器陳舊，顯示不出新兵器的威力。如坦克太舊太慢，稍遇坡度就爬不上去，使步兵與坦克動作都不够緊張，飛機未按預定計劃出動及行動，表現不出什麼戰鬥動作，形成象徵性的配合。這都是演習中的缺點，根據這次演習經驗，對今後合同戰鬥教育，提出下列四點改進意見：

1. 組織諸兵種合同戰鬥實兵示範演習，最好有現代化的裝備，特別是坦克、飛機、炮兵，同時要有充足的物質器材保障，這樣才能表現出現代化的戰鬥特點，對幹部與部隊教育才會深刻，否則雖耗費很多人力物力，**方块字读书社**意。

2. 諸兵種合同作戰，要使各兵種互相協同，充分發揮各兵種

特性，匯成諸兵種集體力量，否則，哪怕是很小地違反計劃的行動，必將影響全局的行動，這一原則無論演習或作戰均不能違背。遵守時間，遵守計劃成為合同作戰的高度要求。這種思想與習慣必須在嚴格的養成教育及日常生活教育中，同時進行培養。

3. 諸兵種合同戰鬥的戰術精神，必須貫徹到最小分隊。因為現代戰鬥已不是一連一排的單獨作戰，哪怕最小的一個步兵班，它前面一樣可能有坦克引導前進，有炮兵護送衝鋒，有空軍支援進行戰鬥，不能以孤立的單一步兵班、步兵排的戰鬥動作去教育部隊。步兵指揮員通常就是諸兵種合同戰鬥的指揮員，應加強其全局觀念及諸兵種協同動作的作戰指揮能力的訓練。

4. 步兵是完成最後殲滅敵人的兵種。無論哪一兵種，都應以協助步兵完成任務去協同作戰。“一切兵種的協同動作都為步兵的利益而組織”（摘自《蘇軍步兵戰鬥條令》第二部第一頁）。所以各兵種如果祇強調本兵種的特殊性及困難，各搞一套，否定步兵仍為主要兵種的地位，均將妨害團結，無法做到完善的協同動作，而勢必影響戰鬥進展及戰果。

以上就是此次步兵營實兵進攻演習的經驗初步歸納，是否正確尚請大家指正。

三、戰略上以一當十， 戰術上以十當一

——論毛澤東同志關於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思想

作者說明：

本文刊登于1964年12月，《紅旗》雜誌第23、24期。這是我調任海軍後公開發表的一篇文章，宣傳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理論性文章。

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一切工作的唯一正確的指針，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切工作的唯一正確的指針。中國人民解放軍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就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為戰勝國內外敵人，解放全中國，進行了長期的英勇的鬥爭。中國革命是以武裝鬥爭為主要形式，通過不斷地摧毀反革命軍隊，不斷地在一塊塊地區打碎反動的國家機器，最後奪取了全國政權，結束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的。中國革命取得偉大勝利的歷史經驗，生動地證明了毛澤東思想的英明、偉大和正確。

中國人民的革命武裝在開始建立的時候，同帝國主義支持的國民黨軍隊相比較，在數量上和裝備上都處於劣勢地位。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中國人民革命武裝經常處在強大敵人的包圍和進攻之下。因此，能不能在戰略上以一當十，敢于鬥爭，爭取勝利，能不能在戰術上以十當一，善于鬥爭，善于勝利，就成了一個十分突出十分嚴重的問題。正是毛澤東同志，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中國革命制定了正確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毛澤東同志從人民戰爭、人民軍隊的基本觀點出發，規定了人民軍隊的建軍方針和建軍原則，解決了人民軍隊以弱勝強的一系列戰略戰術問題，引導中國人民革命的武裝鬥爭，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

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是毛澤東同志關於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思想的核心，也是我軍的傳統戰法。這種作戰方法，是在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中，在同“左”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軍事路線的鬥爭中產生、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對於戰勝國內外敵人，奪取全國勝利，起了重大的作用。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中國紅軍以弱小者的姿態出現于內戰的戰場，其迭挫強敵震驚世界的戰績，依賴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¹又說：“實行這種

方块字读书社区

註1.《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19頁。

方法，就會勝利。違背這種方法，就會失敗。”¹

認真學習和研究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這一戰法，對於深刻地學習和領會毛澤東同志的軍事思想，全面地學習我軍幾十年來豐富的作戰經驗，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是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這一戰略策略思想在軍事鬥爭中的具體體現

正確地認識敵我形勢，建立正確的戰略策略思想，是取得革命勝利的重要關鍵之一。毛澤東同志根據長時期同國內外敵人作鬥爭的經驗，並根據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了中國和世界歷史以及當代國際形勢，提出了“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點，形成了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這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戰略和策略思想。

毛澤東同志反復指出：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雖然貌似強大，但是，它們代表的是反動的、腐朽的、沒落的階級。歷史發展的規律注定了它們必然滅亡的命運。因此，從本質上看，從長期上看，革命人民必須如實地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看成是紙老虎，在戰略上藐視它們，敢于鬥爭，敢于勝利，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戰略思想。同時，毛澤東同志又反復指出：和一切事物都具有兩重性一樣，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也具有兩重性。在它們最後被消滅以前，它們暫時還有力量，在軍事上暫時還占有優勢，它們還要吃人。在這點上說，它們又是活的鐵的真的老虎。因此，在戰術上，在具體鬥爭中，革命人民必須重視敵人，採取謹慎態度，講究鬥爭藝術，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策略思想和戰術思想。祇有把大無畏的革命氣概和靈活巧妙的鬥爭藝術結合起來，才能奪取每一次具體鬥爭的勝利，最後達到戰勝敵人的目的。

毛澤東同志在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時曾說過：“我們的戰略是‘以一當十’，我們的戰術是‘以十當一’，這是我們制勝敵人的根本法則之一。”又說：“我們是以少勝多的——

注1.《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96頁。

我們向整個中國統治者這樣說。我們又是以多勝少的——我們向戰場上作戰的各個局部的敵人這樣說。”¹ 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也可以說是戰略上“以一當十”、“以少勝多”，戰術上“以十當一”、“以多勝少”這一思想的進一步的高度概括。

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方法，是戰術上重視敵人在軍事鬥爭中的集中表現，是戰術上“以十當一”、“以多勝少”的具體化，由於我們在軍事鬥爭上充分重視敵人，足夠地估計敵人的力量，因此每次作戰都強調作好充分的準備，不打無準備之仗和不打無把握之仗，反對一切僥幸取勝的心理和輕敵冒進的作法，力爭不戰則已，戰則必勝。毛澤東同志說：“幾個大漢打一個大漢之容易打勝，這是常識中包含的真理。”² 每戰集中二倍、三倍、四倍甚至五、六倍於敵的兵力以對付敵人，就是以幾個大漢打一個大漢。這樣，我軍就有勝利的充分把握，同時，我軍又十分講究指導戰爭的藝術，注意利用敵人的弱點、錯誤和敵人內部的矛盾，以及其他各種有利條件，實行各個擊破。毛澤東同志說：“打仗祇能一仗一仗地打，敵人祇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滅。工廠祇能一個一個地蓋，農民犁田祇能一塊一塊地犁……。這叫做各個解決，軍事書上叫做各個擊破。”³

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方法，同時又體現了在戰略上藐視敵人的思想。因為祇有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具有“以一當十”的革命氣概和戰鬥精神，才能在強大敵人面前保持清醒的頭腦，不為敵人的來勢汹汹嚇倒，不為複雜環境所迷惑，敢于集中兵力打擊敵人。另一方面，實行這個作戰方法，不斷地取得戰役戰鬥的勝利，又進一步教育了人民和軍隊，使他們從自己的切身經驗中清楚地看到敵人是完全可以打敗的，在戰略上藐視敵人是完全正確的。這樣，又必然會進一步增強人民和軍隊對敵鬥爭的信心，鼓舞他們為奪取更大的勝利而鬥爭。

註1、《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20、222頁。

註2、《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67頁。

註3、《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頁。

有人認為，戰術是服從于戰略的，既然戰略上“以一當十”，那麼戰術上就不能“以十當一”，否則戰術和戰略就是相互矛盾。這些人看問題的方法是形而上學的。他們不了解戰略和戰術的辯證關係。說戰術服從于戰略，是說一切戰術必須有效地保證戰略方針的實施和戰略目的的實現。戰略和戰術既是一致的，又是有區別的。戰術隸屬於戰略，服從戰略目的，這是它們一致的方面；但戰略學是研究帶全局性的戰爭指導規律，戰術學是研究帶局部性的戰爭指導規律，這又是他們區別的方面。如在抗日戰爭中，我們的戰略方針是“內綫的持久的防禦戰”，戰役戰鬥上的作戰基本方針是“外綫的速決的進攻戰”。兩者看來是相反的，然而，沒有後者，前者就不能實現。同樣，戰略上“以一當十”和戰術上“以十當一”兩者看來是相反的，但後者恰恰是實現前者的必要手段。如果抹殺戰略和戰術的區別，在具體作戰中也強調“以一當十”，就必然會犯輕敵冒險的錯誤。

當然，在某些情況下，如群眾基礎、地形、天候、打擊對象等條件對我特別有利，或為了完成某些特定的作戰任務，在戰役戰鬥中也有以少勝多的場合。但是，作為作戰指導思想來說，作為主要作戰方法來說，我們必須堅持以多勝少，堅持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

由此可見，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方法，既表現了敢于鬥爭、敢于勝利的革命精神，又表現了嚴格的科學態度和靈活巧妙的鬥爭藝術。它是戰略上藐視敵人和戰術上重視敵人這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戰略策略思想在軍事鬥爭中的具體體現。

二、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是轉變敵強我弱形勢，加速最後勝利的最有效戰法

革命的人民武裝，在開始的時候，甚至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總是處在強大敵人不斷的進攻和“圍剿”之中。這是通常的敵我客觀形勢。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看來，這種形勢是可以轉變的。戰爭是力量的競賽，戰爭力量的優勢和劣勢本身，固然是決

方块字读书社区

定主動和被動的客觀基礎，但還不是主動和被動的現實事物。在戰爭過程中如何推進、加速力量對比的變化，如何使弱小的革命力量，在敵人處於優勢的情況下，奪取主動，擺脫被動，達到制敵而不受制于敵的地位，從而戰勝強大的敵人，其決定因素是靠主觀的努力，即運用正確的戰法，多打勝仗，少犯錯誤，並經過持久的、艱苦複雜的鬥爭，不斷地消滅敵人，不斷地壯大自己，將我之戰略上的劣勢和被動，轉變為戰略上的優勢和主動。毛澤東同志指出：“我之相對的戰略劣勢和戰略被動地位，是能夠脫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們許多的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去剝奪敵人的許多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把他拋入劣勢和被動。把這些局部的東西集合起來，就成了我們的戰略優勢和戰略主動，敵人的戰略劣勢和戰略被動。這樣的轉變，依靠主觀上的正確指導。”¹ 這一正確指導，最主要的就是實行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戰法。

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這一戰法，在中國革命戰爭的各個歷史時期，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對於改變進退、攻守、內綫和外綫的形勢，使我軍由弱變強，由劣勢轉為優勢，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它在長期的革命戰爭實踐中，經受了一切考驗，證明是完全正確的。

在第二次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深刻地分析了敵人強大紅軍弱小的特點，指出中國革命戰爭既有順利條件又有困難條件的兩個方面，即紅軍的可能發展和可能戰勝敵人，但又不可能很快發展和不可能很快戰勝其敵人。這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根本規律。根據這一規律，毛澤東同志提出了“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戰中有把握地消滅敵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個擊破敵人”等一整套的作戰原則和方

方塊字讀書社區

注1，《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79頁。

法，解決了以弱小的紅軍戰勝強大敵人這一最困難的課題。

中國工農紅軍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運用上述的戰略戰術，在一九三零年到一九三二年間，勝利地粉碎了蔣介石發動的四次反革命“圍剿”，發展了紅軍武裝，擴大了革命根據地。一九三零年底，蔣介石集中了七個師約十萬人，採取分進合擊的戰法，“圍剿”江西中央紅軍，妄圖一舉將紅軍殲滅。當時我軍祇有四萬人，在敵我力量懸殊的形勢下，採取了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原則，以四萬人的全部力量突然攻擊張輝瓚師，全部殲滅敵人。繼而又追殲譚道源師一半。第一次“圍剿”就勝利地被打破了。一九三一年五月，敵人又以二十萬人的兵力發動第二次“圍剿”，當時中央蘇區紅軍祇有三萬餘人，比上次反“圍剿”時還少。我軍仍然實行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原則，利用敵人內部矛盾，先打王金鈺等部十一個團。初戰勝利後，接着打其餘各路敵人。十五天內，橫掃七百里，連打五仗，繳槍二萬餘，勝利地粉碎了敵人的第二次“圍剿”。一九三一年七月，蔣介石又親自出馬，組織三十萬人發動了第三次“圍剿”，分三路長驅直入，企圖壓迫我軍于贛江而消滅之。我軍在上次反“圍剿”中，苦戰之後，沒有得到休整補充，兵力仍是三萬人左右。針對敵我情況，我軍採取了“避敵主力，打其虛弱”的作戰方針，千里轉戰，機動靈活地在敵人大包圍圈內，利用敵人的空隙，穿插轉移，調動敵人，疲憊敵人，尋找戰機，終於在興國、寧都地區三戰三勝，繳槍逾萬。在敵人退却時，又消滅其一個師和一個旅。經過三個月的奮戰，第三次“圍剿”又被打破了。在第四次反“圍剿”中，敵軍分三路進攻中央蘇區，我軍集中兵力先打其西路，一舉殲滅兩個師，繼而又消滅其中路的一個師，兩役繳槍萬餘，這次“圍剿”也基本上被打破了。祇有第五次反“圍剿”，由於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者，完全違背了毛澤東同志的軍事路線，才沒有粉碎敵人的“圍剿”，而且使紅軍遭到了嚴重的損失。

方块字读书社区

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正確地分析了敵我雙方的特點和國內外的形勢，說明了抗日戰爭必然是持久戰，批駁了“亡國

論”和“速勝論”，科學地預見到了三個戰略階段的發展過程，從而規定了持久戰這個總方針，並提出了“防禦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戰，內綫中的外綫”的具體戰略方針。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這一戰法，在新的情況和新的條件下，有了新的發展和不同的運用。

毛澤東同志將游擊戰爭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提高到戰略地位，正確地解決了如何在敵人的後方開展游擊戰爭的一系列問題。首先，明確地提出了“我軍以分散兵力打游擊戰為主，以集中兵力打運動戰為輔”¹的方針，批判和粉碎了右傾機會主義者提出的所謂“運動游擊戰”的錯誤觀點。其次，強調必須建立根據地。根據地是進行游擊戰爭，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的戰略基地，沒有根據地，游擊戰爭是不能夠長期地存在和發展的，而“一切游擊戰爭的根據地，祇有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裝部隊，戰勝了敵人、發動了民衆這三個基本的條件逐漸地具備之後，才能真正地建立起來。”²第三，游擊戰爭的兵力使用的“主要的方法是分散使用、集中使用和轉移兵力”³，即所謂時而化零為整，時而化整為零，忽南忽北，又游又擊。對於分散、集中和轉移三者的關係，強調指出：“游擊戰爭本來是分散的，所以成其為普遍的游擊戰，且在許多任務，例如擾亂、箝制、破壞和做群眾工作等，都以分散兵力為原則；然而就一個游擊部隊或游擊兵團，當着執行消滅敵人的任務，尤其是為着打破敵人的進攻而努力時，就仍須集中其主要的兵力。‘集中大力，打敵小部’，仍然是游擊戰爭戰場作戰的原則之一。”⁴在情況和任務需要時，游擊隊和游擊兵團還必須像流水和疾風一樣，迅速神秘地轉移其兵力。第四，在游擊戰爭已經起來並有相當發展之後，敵人向游擊戰爭根據地的進攻是必然的。因此，敵後“游擊戰爭的方針是打破這種圍

註1.《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97頁。

註2.《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15頁。

註3.《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03頁。

註4.《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00頁。

攻，採取反圍攻的形態。”¹如何打破這種圍攻？毛澤東同志指出：“應是以次要兵力箝制敵之數路，而以主要兵力對付敵之一路，採取戰役和戰鬥的襲擊戰法（主要的是埋伏戰），于敵行動中打擊之。”“一路打破之後，又轉移兵力去打破敵之另一路，這樣各個地擊破敵之圍攻。”²

我軍在八年抗戰中堅持貫徹了毛澤東同志的這些戰略戰術原則，廣泛地開展了敵後的游擊戰爭，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據地，抗擊了百分之六十四的侵華日寇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偽軍。粉碎了敵人殘酷的“合圍”、“掃蕩”、“蠶食”和“封鎖”。在最艱苦的時期，敵人曾集中了絕大部分兵力進攻我抗日民主根據地，僅在華北就用了八十萬兵力。在這種情況下，我軍主力部隊和民兵、地方游擊隊嚴密結合，在內綫和外綫靈活作戰，一方面以部分主力部隊分散配合民兵、游擊隊牽制敵人，襲擾敵人，用地雷、土槍、土炮、手榴彈殺傷敵人；另一方面，大部分部隊則轉到敵人“合圍”圈外，抓住戰機，集中兵力殲滅敵人一路或一部，以粉碎敵人的進攻。八年抗日戰爭，我軍總計消滅了日寇五十二萬七千多人和偽軍一百一十八萬多人，創造了十九個抗日民主根據地，解放了近一億人口的廣大土地。我軍由幾萬人發展到九十多萬人，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國民黨反動派的總兵力有四百三十萬人，在抗日結束時接收了日本侵略軍一百萬人的裝備，美帝國主義又為它裝備了一百零六個師，而且擁有三億以上人口的地區，控制了全國所有的大城市和大部分鐵路交通綫，其實力不能不說是相當雄厚。我軍當時的兵力祇有一百二十多萬人，不及國民黨軍隊的三分之一，並且被分割在幾十塊根據地裏，軍隊裝備差，沒有外援。一九四六年七月，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歷史上空前規模的大內戰，毛澤東同志深刻分析了當時的形勢，指出蔣介石政府的強大祇是暫時的、表面的，它實際上是一個外強中

注1.《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方块字读书社区](#)卷，第419頁。

注2.《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19-420頁。

乾的政府。它的進攻是能够打敗的，它的前途必然是衆叛親離，全軍覆滅。爲了粉碎蔣介石集團的進攻，毛澤東同志規定了“我軍應以集中兵力打運動戰爲主，以分散兵力打游擊戰爲輔”的作戰方針，並且指出“在蔣軍武器加強的條件下，我軍必須特別強調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方法。”¹以後，又在闡述十大軍事原則時，對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方法，作了具體說明。我軍貫徹執行了這一戰勝敵人的根本戰法，在四年的戰爭中，共殲敵八百餘萬，解放了全國大陸。

在戰爭開始時，國民黨反動派以一百六十萬軍隊向我實行全面進攻。我軍實行積極防禦的作戰方針，大踏步後退，大踏步前進，主動放棄一些城市和地方，誘敵深入，集中絕對優勢兵力，選敵薄弱或孤立的部分，在運動中予以各個殲滅。經過八個月的戰爭，殲滅敵軍七十一萬多人，敵人被迫停止了全面進攻，並改變戰略方針，對我山東和陝甘寧兩個解放區實行重點進攻。我軍在山東孟良崮等戰役殲敵五萬餘人，在西北地區七次戰鬥中殲敵三萬餘人，又粉碎了敵人的重點進攻。這樣，前後經過一年的戰爭，共殲敵一百一十二萬，迫使敵人轉入了全面防禦，我軍則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一九四七年七月，首先由晉冀魯豫野戰軍強渡黃河，挺進大別山，接着各野戰軍相繼發動大規模的攻勢，構成了全面性的戰略進攻的總形勢，並從此將戰爭的主要戰場引向國民黨統治區域。到一九四八年六月，共殲敵二百六十四萬人，並繳獲了大量的武器裝備。我軍不僅打退了蔣介石的進攻，而且在戰爭中發展到二百八十萬人。雙方軍事力量的對比和戰略形勢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此時，國民黨五個戰略集團，分別陷在東北、華東、華北、中原、西北五個戰場上，祇好被動挨打，作垂死掙扎。

毛澤東同志根據戰爭形勢的發展，洞察到戰略決戰的時機已經到來，就在蔣介石企圖收縮兵力，向南總撤退之前，當機立斷，抓住大好戰機，組織和實施了規模空前的遼沈、淮海、平津三

芳塊學讀書社區

註1.《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97頁。

大戰役，進行了偉大的戰略決戰。在三大戰役中，對於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這一戰法的運用，有了更高的發揮，達到了更加完善的階段。在我軍對敵人實施戰略包圍的同時，進行了戰役戰術的分割圍殲，即在戰略上將敵人的戰略集團分隔在幾個戰場上，而在各個戰場上，又把敵人強大的戰略集團肢解為若干孤立部分，然後集中優勢兵力，逐次予以殲滅。從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的一百四十一天中，總共殲滅了敵人一百五十四萬餘人，解放了東北、華北全境和其他廣大地區。我軍主力前進到長江北岸，使國民黨反動派賴以發動反革命內戰的精銳部隊基本上歸于消滅，大大地加速了解放全國的進程。

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證明，運用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這一戰法，不僅在我處於劣勢的情況下，可以將我之劣勢轉為優勢，而且在我處於優勢，敵處於劣勢的情況下，可以加速革命戰爭的最後勝利。

三、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基本思想是殲滅戰思想

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基本思想，就是殲滅戰思想。毛澤東同志說：“殲滅戰和集中優勢兵力，採取包圍迂回戰術，同一意義。沒有後者，就沒有前者。”¹殲滅戰，是我軍歷來作戰的基本方針和根本指導思想，是毛澤東同志偉大戰略戰術思想的精華。它貫徹在中國革命戰爭所有的作戰原則之中。打殲滅戰，就是力求每戰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敵人，使敵人被殲一個連少一個連，被殲一個營少一個營，被殲一個團少一個團，被殲一個師少一個師，這樣不僅使敵人消耗了人力物力，而且在精神上受到沉重打擊，士氣沮喪，人心不振，即使得到補充，也是越戰越弱。這種戰法，對削弱敵人最能發生重大影響。毛澤東同志說：“對於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對於敵，擊潰其十個師不如殲滅其一個師。”²這是對殲滅戰思想的精辟論斷。

方块字读书社区

注1.《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32頁。

注2.《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31頁。

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是打殲滅戰的一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作戰原則。集中兵力與各個殲敵，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互為條件的辯證關係。祇有集中了優勢兵力，才有可能實現各個殲滅敵人；同時，祇有採取各個殲滅敵人的方法，才容易形成和保持兵力的優勢。正確地運用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原則，即解決了打殲滅戰的物質基礎，又解決了打殲滅戰的具體方法。

集中兵力是打殲滅戰的物質基礎。馬克思指出：“戰略的奧妙就在于集中兵力。”¹毛澤東同志也指出：“主動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體的，物質的。這裏最重要的，是保持并集結最大而有活力的軍隊。”²戰略、戰役和戰鬥上都應集中兵力，但集中的形式、程度則是不同的。戰略上的集中兵力，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主要是通過戰役、戰鬥來實現的，在我強敵弱的條件下，更容易採取直接的形式來實現。但是，不論是敵強我弱或我強敵弱，都應當集中兵力作戰。特別是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祇有集中了優勢兵力，才能有足夠的力量實施殲滅戰，並且能夠速決。當實施進攻作戰時，就能夠迅速地突破敵人的防禦，就能夠有力地粉碎敵人的增援和反突擊，就有足夠的兵力進行迂回包圍和穿插分割，就能夠進行連續作戰，快速擴大戰果。當進行防禦作戰時，就能夠大量消耗、削弱進攻的敵人，就能夠爭取時間，並且可能由防禦轉入進攻。反之，如果沒有集中優勢兵力，就達不到殲滅敵人的目的，也不可能求得速戰速決，而可能形成戰役戰鬥相持不下的局面，可能打成擊潰戰或得不償失的消耗戰，甚至有被敵人各個擊破的危險。

各個殲敵是打殲滅戰的重要作戰原則，是我軍在戰略、戰役、戰鬥中必須貫徹到底的一個作戰原則。當兵力集中之後，是企圖一口吞掉敵人，還是採取各個擊破的方法逐次消滅敵人？很明顯，祇有採取各個殲敵的方法，才能順利地殲滅敵人。特別是

方块字读书社区

注1、《印度起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第326頁。

注2、《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17頁。

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對優勢之敵，祇能采取分割包圍的戰法，造成我局部的優勢，將敵人逐個殲滅。就是對絕對劣勢之敵，仍須采取各個殲敵的方法，才能以最小的代價迅速徹底地殲滅敵人。如淮海戰役，我軍在總的兵力對比上雖然略少于敵軍，但在局部戰役中集中了優勢兵力，采取了各個殲敵的方法，首先殲滅黃伯韜兵團，再殲滅黃維兵團，最後圍殲丘清泉、李彌兵團，因而取得了整個戰役的偉大勝利。

毛澤東同志指出：“敵強我弱，敵之要求在於我集中主力與之決戰。我之要求則相反，在選擇有利條件，集中優勢兵力與之作有把握的戰役和戰鬥上的決戰，……而避免在不利條件下的無把握的決戰。”¹這就是說，由於敵強我弱的特點，運用各個殲敵的方法，又必須是從小口小口吃做起，集小勝為大勝，逐步發展為大口大口吃。這種從小到大、逐次殲敵的方法，要求在戰役戰鬥上與敵進行多次決戰。這是在敵強我弱條件下消滅敵人的一個客觀發展過程。如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初期，敵強我弱的基本形勢尚未改變，所以祇能從一次殲敵一個營、一個團、一個旅做起，隨着敵我力量的消長變化，逐步發展為一次殲敵一個師、一個軍，最後則發展為一次殲滅敵人一個到數個強大戰役兵團，打更大規模的殲滅戰。

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又辯證地解決了殲滅敵人有生力量和保守或奪取城市的關係，即戰爭的勝負，不決定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決定於有生力量的消長。毛澤東同志說：“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原則，以殲滅敵軍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地方為主要目標。”²在強敵進攻面前，為了集中兵力殲滅敵人，或為了使我軍主力避免被迫作戰而遭受敵人的打擊，不但完全允許暫時地放棄某些地方，而且必須以地方換取敵人兵力的分散，使敵人陷入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越陷越深。這個暫時的不保守，正是為了永久的保守；暫時的放棄，正是為了永久的不放

方塊字讀書社區

注1.《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96頁。

注2.《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97頁。

弃。毛澤東同志指出：“關於喪失土地的問題，常有這樣的情形，就是祇有喪失才能不喪失，這是‘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原則。如果我們喪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戰勝敵人，加恢復土地，再加擴大土地，這是賺錢生意。”¹如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第一年，我軍爲了集中兵力機動作戰，誘敵深入，爭取在運動中各個殲滅敵人，主動地放棄了延安、張家口、承德、沈陽、安東等一百零五座主要城市，給敵人背上了包袱，使敵人機動兵力大爲減少。我軍則避開了敵人進攻的主力，將兵力轉移至敵人側翼和後方，尋找戰機，在運動中大量地殲滅了敵人，不僅收復了失掉的城市。而且還解放了新的城市。

當然，不以保守城市和地方爲主要目標，並不意味着可以隨意放棄城市和地方，可以輕易地兵不血刃地就把根據地大片土地和城市，讓給敵人占領。毛澤東同志說：“凡在敵我力量對比上能够保守或奪取的地方和在戰役上戰術上有意義的地方，則必須保守或奪取之”。²

我軍堅決貫徹執行了毛澤東同志的這一指示，在戰略防禦階段，在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同時，堅決保守了必須保守的城市和地方，作爲戰略反攻和戰略進攻的出發陣地。在戰略進攻階段，又將殲滅敵人有生力量與奪取城市和地方緊密結合起來，即達到了殲滅敵人的目的，又完成了保守或奪取城市、地方的任務。

我軍作戰的基本方針是殲滅戰，但這並不意味着完全否定消耗戰。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我們主張戰略上實行消耗戰，在戰役戰鬥上則必須是殲滅戰，並通過戰役戰鬥的殲滅戰達到戰略上的消耗戰的目的。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戰役的殲滅戰是達到戰略的消耗戰之目的的手段。”³因此，在一切有利的場合，都必須集中優勢兵力，採取包圍迂回戰術，堅持打殲滅戰。在特殊情況下，亦可採取給敵以殲滅性打擊的方法，殲滅其一部，擊潰

注1.《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05-206頁。

注2.《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97頁。

注3.《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90頁。

其另一部。在戰役戰鬥上，殲滅戰是主要的，但也有消耗戰。這種消耗戰是輔助殲滅戰的，不是在戰鬥上“拼消耗”。如當我軍主力對確定之敵實行殲滅戰時，在其他方向上爲了阻擊和牽制敵人，就有必要進行消耗戰。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東北我軍爲了全殲錦州之敵，在塔山和黑山進行的阻擊戰，就是屬於阻擊敵人、消耗敵人的性質。正是爲了實現殲滅戰而採取的一種手段。

四、如何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

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戰法，對實現殲滅戰速決戰，爭取全部勝利，是極爲重要。那麼，在實踐中，怎樣才能正確地運用這一戰法，真正做到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呢？

毛澤東同志說：“集中兵力看起來容易，實行頗難。”¹集中兵力的道理容易理解，但是要做到不僅是主觀上或計劃上的集中，而是戰場上真正的集中，並且貫徹始終，確不是易事。要做到這樣，戰爭指導者必須具有清醒的戰略頭腦，能够正確地分析敵我形勢，不爲複雜情況所迷惑，在任何情況下都能獨立自主地使用自己的兵力，正確地處理如下的主要問題。

第一，正確選擇作戰方向。確定主要作戰方向和次要作戰方向，是集中兵力並在部署上形成拳頭所必須首要解決的問題。主要作戰方向，在同一時間內祇應有一個。毛澤東同志說：“在有強大敵軍存在的條件下，無論自己有多少軍隊，在同一個時間內，主要的使用方向祇應有一個，不應有兩個。”²爲什麼主要的作戰方向祇應有一個呢？這是因爲，雖然戰爭的情況極其複雜，作戰任務很多，但應權衡利弊得失，分清先後緩急，考慮兵力的可能，集中力量于當前急需的而又與戰局發展有重大影響的戰略、戰役打擊方向。祇有這樣，才能奪取主動和保持主動，形成並保持優勢兵力，殲滅敵人。如遼沈戰役，先打錦州，置長春、沈陽兩敵于不顧，這就推遲了可以推遲的作戰行動，把主要兵力使用于急需

方块字读书社区

注1，《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17頁。

注2，《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19頁。

的戰場上，造成優勢，保證了戰役的勝利。

我們強調主要作戰方向祇有一個，不是說作戰方向祇許一個。在確定了主要作戰方向之後，還必須有機地組織次要作戰方向的行動，兩者是相互聯系不可分割的。如果祇有主要方向，而無次要方向的配合，就不可能分散、牽制敵人，也就不可能充分發揮主要方向的作用，保證主要方向的作戰勝利。但是，如果主次不分，就是軍事上平均主義，因此，在兵力部署上，既要突出主要，又要照顧次要，並應盡量注意節約次要方向上的兵力，以保證主要方向上的優勢，使二者在殲滅敵人的目的下統一起來。處於主要方向的軍隊，必須集中兵力實施主要的突擊，而處於次要方向的軍隊，同樣要集中兵力於自己的主要方向上，才能順利執行牽制敵人的任務。這就是說主中有次，次中有主，不論主要方向、次要方向，都必須確實貫徹集中兵力與節省兵力的原則。

第二，集中兵力，應集中到什麼程度才算優勢？這要根據具體情況來具體確定，沒有一個固定不變的死公式和比例。毛澤東同志說：“我們主張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證對於戰場作戰的絕對或相對優勢的原則上。對於強敵，或關係緊要的戰場作戰，應以絕對優勢的兵力臨戰之；……對於弱敵或不關緊要的戰場作戰，臨之以相對優勢的兵力也就夠了。”¹又指出：“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兩倍、三倍、四倍、有時甚至是五倍或六倍於敵之兵力），四面包圍敵人，力求全殲，不使漏網。”²這就是說，集中兵力的程度，要以確有把握地把敵人殲滅為標準，即每戰中必須在兵力上造成對敵人的優勢，有足够的分割圍殲敵軍的兵力，而有發展勝利追殲逃敵的兵力，和一定數量阻擊援軍的兵力，而不是盲目的無限制的無條件的集中。恩格斯說：“全部兵力集中在一起是不必要的。”³毛澤東同志也指出：“不是一切都要集中。”⁴

注1.《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21-222頁

注2. (26)《目前形勢和我們》，《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47頁

注3.《夢茨的陷害》。《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第164頁。

注4.《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21頁。

集中兵力的程度，根據全局性的戰場與非全局性的戰場，進攻與防禦，主要方向與次要方向，戰役部署與戰役突破口，初戰與續戰，強敵與弱敵，駐止之敵與運動之敵等等情況不同，根據具體對象、時間、地點、條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抗日戰爭時期，對日寇作戰我集中兵力的程度就高一些，對偽軍就低一些。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初期，國民黨軍隊全面進攻，銳氣正盛，這時我集中兵力的程度就高一些，到國民黨軍隊連遭殲滅，士氣沮喪，我集中兵力的程度就低一些。在平津戰役中，天津攻堅戰我總兵力對敵是二點三倍，而在主要突擊方向的突破地段上，集中兵力就高一些，達到五倍于敵。

掌握集中兵力的時機，是極為重要的。過早集中會暴露企圖，過遲集中則可能失掉戰機。這都對戰局的發展不利，甚至會造成不必要的損失。特別是在現代條件下作戰，適時的、迅速而隱蔽的集中和完成任務之後迅速隱蔽的分散，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正確地集中兵力，有賴于指揮員發揮高度自覺的能動作用。從戰鬥開始起，就要隨着戰況的進展，敵情、任務的變化，適時地轉移兵力，調整部署，不斷保持優勢。在戰役戰鬥過程中，又要隨時注意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的轉化，適時地把兵力集中到已經轉化了的新的主要方向上去，以期取得戰役戰鬥的全勝。

第三，爲了達到殲滅敵人的目的，還必須採取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正確運用各個殲敵的戰法。如何造成各個殲滅敵人的戰機？一方面要及時利用敵人暴露出來的弱點，出敵不意，乘敵之隙，突然攻擊；另一方面要以我之行動調動、分散敵人，創造戰機。例如運用誘敵深入，聲東擊西、圍城打援等辦法。

爲了把握地殲滅敵人，必須正確地選擇殲擊目標。當我面對着幾路或幾部敵人時，應當集中優勢兵力，首先打一路或一部，一戰獲勝，再及其他，不應當同時打敵人的幾路或幾部。而且應當先打敵人的弱小部分，**秀峽學讀書社**部分，先打分散孤立之敵，後打集中強大之敵，同時，最好是打擊敵人的弱點和要害。分

散孤立之敵，即使是強敵，由於處在分散孤立的地位，也就變成了弱敵。我集中優勢兵力打分散孤立之敵，容易形成以強擊弱，殲滅敵人的把握最大，有利于達到逐次殲滅敵人的目的。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中，遼沈戰役開始的主要方向，為什麼不選擇長春、沈陽，而選在錦州？這是從我軍力量情況和全殲東北敵軍的戰略要求着眼的。當時錦州之敵雖較長春之敵強，但比沈陽之敵弱，而且是東北敵軍戰略體系中的要害。我軍攻占錦州，就可以斬斷東北敵人退路，為全殲敵軍創造有利條件。又如同時期的萊蕪戰役，為了粉碎敵人以三十萬大軍對我山東解放區的重點進攻，我軍以少數兵力箝制敵南綫部隊，而集中八個縱隊（軍）的優勢兵力首先圍殲較弱而突出孤立的敵北綫部隊，一舉殲滅該敵七個整旅，因而大大地改善了山東戰局。

第四，正確運用包圍迂回和穿插分割戰術，是實現各個殲敵的重要手段，運用這一戰術，能把敵軍的有機整體分割成若干部分，使其失去戰役的或戰術的聯系，形成孤軍作戰，有利于我達到全殲速決的目的。包圍迂回和穿插分割，應根據不同情況靈活運用。對孤立駐軍之敵，可先包圍，後攻擊；對運動之敵，既可先斷其退路，再行攻擊，也可邊攻擊邊包圍；對據有綿亘陣地、無暴露翼側之敵，可先突破再分割包圍等等。對已經被我包圍之敵實行攻擊時，應集中我攻擊部隊的大部分兵力和絕大部分火力，形成一把銳利而有後勁的“尖刀”，實施主要突擊，而以其餘兵力布置成兩面、三面或四面的包圍，與主要突擊部隊密切協同，實施向心攻擊。祇要採取上述的攻擊部署，並實施強大的連續突擊，那麼，對於無論什麼樣的敵人陣地，總是可以突破的。一旦突破，被我打垮的敵人，在我多面包圍之下，也是難以逃脫的。

五、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是建立在人民戰爭，人民軍隊和辯證唯物主義思想基礎之上的，任何反人民的軍隊都難于利用和對付我們的戰略戰術

“集中優勢兵力”方塊字讀書社區 雖為古今中外的軍事家所熟知，也是許多軍事典籍所反復論述與強調的，但是，從來沒有

人把它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來看待，並辯證地加以運用。祇有毛澤東同志才完整地提出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戰略戰術原則，並將它辯證地運用于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其所以如此，是由于我們進行的是人民戰爭，我們的軍隊是人民軍隊，我們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思想來主導戰爭的。毛澤東同志指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衆之中。”又說：“軍隊須和民衆打成一片，使軍隊在民衆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于天下”¹。這是人民革命戰爭勝利的最基本的條件。

我們進行的是人民戰爭，實行了主力兵團和地方兵團相結合，正規軍和地方武裝、民兵相結合，武裝群眾和非武裝群眾相結合的方針。在戰爭中，有地方武裝、民兵和人民群眾廣泛參加，積極支援前線，鞏固後方，直接配合主力作戰，在敵後破壞交通運輸，牽制、分散敵人兵力，擾亂、威脅敵人後方，使軍隊的主力部隊能夠更高度地集中兵力，機動作戰。同時，由于有民兵和人民群眾參加站崗放哨，偵察敵情，封鎖消息，擔任向導等活動，又為我軍適時地隱蔽地集中兵力，出敵不意地包圍和殲滅敵人，創造了有利條件。如抗日戰爭初平型關之戰，我軍在距敵人前進道路之側三十里至六十里的地點，集結達一星期之久，由于群眾積極配合，封鎖消息，使敵特漢奸失其作用，因此，敵人完全沒有發覺。我軍則在人民群眾的幫助下，及時掌握了敵情，正確地部署了戰鬥，以神速的行動，殲滅了敵人。

相反的，由于敵人進行的是反人民的戰爭，得不到人民的支援，沒有人民配合，所以是孤軍作戰；侵占了我們的地方，又處處受到人民的反對，必須處處派兵防守。這些都必然會影響他們兵力的集中。即使在某一地區集中了兵力，因為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不了解情況，找不到目標，自己的行動又經常暴露，所以處處被動，難以完全實現其企圖。如一九四七年國民黨反動派以二十三萬多人的兵力，進攻解放區，由于人民反對，所

注1.《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01頁。

以像瞎子一樣，祇能到處撲空。白天武裝大游行，晚上集中大露營。

我軍是工農的武裝，是人民的軍隊。軍隊的性質，決定了我軍能够最大限度地發揮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這一戰法的威力。任何戰略戰術都是通過人去實施的。正確的戰略戰術在實踐中能不能得到貫徹，能不能發揮最大的效果，軍隊的素質起着重要的作用。我軍有黨的堅強領導，建立了堅強的革命政治工作，廣大指戰員有高度的階級覺悟，明確認識到自己是為人民利益而戰鬥。因此，在實行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這一戰法的時候，具有旺盛的戰鬥意識和勇敢的戰鬥精神。在集中時，行動迅速，不怕疲勞，不怕困難；在進攻時，勇往直前，前僕後繼，敢于大膽迂回穿插，孤膽作戰；在防禦時，能够抗住強大敵軍的連續攻擊，堅守陣地，頑強戰鬥。部隊之間能够主動協同，密切配合，為了整體利益，不怕犧牲自己。全體指戰員能够發揮最大的智慧，創造出許多戰勝敵人的方法。所有這一切，都充分地保證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這一戰法得到最好的貫徹，發揮出克敵制勝的巨大威力。

敵人的軍隊是反人民的軍隊。士兵絕大多數是被強迫或被欺騙而來的。他們同反動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上是對立的。軍隊官兵之間、上下之間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盡管反動統治階級也想盡方法，對士兵進行欺騙宣傳，實施反動教育，但是軍隊的士氣仍然不高，缺乏旺盛的戰鬥意志。這種軍隊害怕近戰、夜戰，害怕包圍、傷亡。軍隊各個集團之間，各個派系之間，互不信賴，互相傾軋，不能主動協同。由于敵人存在着這些弱點，因此，他們主觀上雖然企圖運用集中兵力的辦法來對付我們，但是，在具體實施中，特別是在遇到困難危急的時候，往往不能實現。

我們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觀察分析和指導戰爭的。我們之所以能够正確運用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這一戰法，并取得最大的效果，是由于能够正確地估計主客觀形勢，全面分析敵我情況，善于利用敵人的矛盾，一切從實際出發。同

時，我們能够正確處理在運用這一戰法中所遇到的各種關係，諸如：全局與局部，集中與分散，主要方向與次要方向，殲滅敵人與保守城市、地方，以及進與退，攻與防等等關係。所以，我們在與強大敵人作戰中，能够無往而不勝，達到既消滅敵人，又保存、壯大自己的目的。

敵人則是唯心主義者，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學的。他們往往不能正確全面地分析客觀形勢，不能從實際出發。他們總是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過低地估計革命的力量，主觀主義地判斷情況，輕敵冒進。他們看問題往往是片面的，不能正確處理軍事活動中所遇到的各種關係。如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中，國民黨反動派爲了對付我軍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戰法，忽而提出攜帶重裝，“用兵宜正不宜奇，駐軍宜聚不宜散，行軍宜緩不宜急”的所謂“密集平推戰術”。忽而又提出全軍輕裝，攜帶乾糧，祇走山頭，不走大路的所謂“鑽隙戰術”。有時這樣，有時那樣，莫衷一是。同時，由於他們所進行的戰爭是反人民的戰爭，因此，戰略意圖和具體行動總是要發生矛盾的。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初期，蔣介石也曾給自己定了一條“集中機動使用兵力”的原則。可是他要想占的地方那麼多，中原、蘇北、承德、沈陽、安東他都要，目標這樣分散，而手中的賭本很有限，侵占了一個城市，就要派兵防守，就背上了一個包袱，占的越多，背的越重，能機動的兵力就越來越少。所以他定的那條原則，祇能成爲一句空話。即或暫時在某一地區集中了相當優勢兵力，得到了某些便宜，但在其他地方就破綻百出。這些矛盾他們是無法克服的。

總之，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戰法，是建立在人民戰爭、人民軍隊的基礎上的，是建立在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的基礎上的，祇有人民軍隊才能有效地運用。任何反人民的軍隊都不能有效地利用這一戰法，也不能有效地對付這一戰法。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蔣介石匪幫和美國帝國主義的在華軍事人員，熟知我們的這些軍事方法。蔣介石方塊字讀書社區的將校，將我們的軍事書籍和從戰爭中獲得的文件發給他們研究，企圖尋找對付的方

法。美國軍事人員曾向蔣介石建議這樣那樣的消滅人民解放軍的戰略戰術；并替蔣介石訓練軍隊，接濟軍事裝備。但是所有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蔣介石匪幫的失敗。”¹

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是毛澤東同志的在戰略上“以一當十”，在戰術上“以十當一”這一戰略策略思想在軍事上的具體化，是毛澤東同志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結合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對馬克思列寧主義軍事科學的重大貢獻。它是中國人民長期同國內外敵人進行武裝鬥爭的經驗結晶。它不僅是戰役戰鬥的作戰原則，而且也是戰略的指導原則。它不僅適用於敵強我弱條件下的戰爭，也適用我強敵弱條件下的戰爭。它是進攻的原則，作為作戰指導思想，也適用於防禦。它不僅在中國人民革命戰爭中起了光輝的作用，具有巨大的歷史意義，而且對於我國當前加強國防建設，準備粉碎帝國主義侵略，也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作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集中兵力打殲滅戰，不但適用於軍事鬥爭，而且適用於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它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各項事業，都有指導意義。

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戰法，雖然是在中國革命戰爭的具體實踐中產生、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但是，由於一切革命戰爭和中國革命戰爭一樣，具有敵強我弱、敵大我小的共同特點，祇有經過艱苦鬥爭，才能取得勝利。因此，這一戰法對於一切革命戰爭，都具有普遍意義。當然，在運用這一戰法時，和運用其他指導戰爭的方法一樣，要按照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按照戰爭的發展而發展，按照不同的作戰對象和地域，靈活運用。祇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它的克敵制勝的作用。

四、“八·六”海戰 的基本經驗

作者說明：

這篇文章是1965年8月，我主持起草并送呈黨中央、中央軍委的“八·六”海戰的戰鬥總結。毛澤東主席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本文摘自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司令部1967年7月編《海軍戰例選 第一冊》

海軍南海艦隊所屬護衛艇四十一大隊及快艇十一大隊，一九六五年八月六日在兄弟嶼海區進行了一場激烈的海戰，一舉擊沉蔣匪“劍門”、“章江”兩艦。這一仗既打得英勇頑強，又打得堅決、乾脆，是一場漂亮的海上殲滅戰，也是海軍近幾年來海上戰鬥最大的一次勝利。這次勝利的根本原因：是高舉了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政治，堅持四個第一的結果；是在軍委、總參和廣州軍區首長正確的指揮、兄弟部隊的積極支援和民兵的密切配合下取得的。參戰部隊充分發揮了人的因素，貫徹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思想，繼承和發揚了我軍夜戰、近戰的優良傳統。這一仗使敵人又一次遭受了重大打擊；使我參戰部隊又一次得到很好的實戰鍛煉；并為我們今後海上作戰提供了許多有益的經驗。

此次戰鬥經過

蔣幫海軍大型獵潛艦“劍門”、小型獵潛艦“章江”，于八月五日六時許，由臺灣左營隱蔽出航，企圖輪送匪特在我閩南沿海之蘇尖角、古雷頭地區突擊襲擾，抓一把就走。十八時零五分，在福建東山島東南四十浬處

方块字读书社区

以打擊，并請示了總參。南海艦隊十八時三十分給部隊下達了預先號令，指定以汕頭水警區護衛艇四十一大隊、快艇十一大隊組成突擊編隊，由汕頭水警區統一指揮，于東山以南、南澳以東、南澎東北或南澳以南、南澎以西海域，予敵以打擊。部隊接到預先號令以後，護衛艇四十一大隊在兩個小時以內，快艇十一大隊約六小時，均完成了一切戰鬥準備。二十三時十分總參批准艦隊打擊方案，并指示：1.放進來打，越近越好；2.集中絕對優勢兵力打；3.不要打到自己的漁船和外國商船；4.不要上敵人的當；5.爭取晚上打，拂曉前撤回原地。

遵總參上述指示，我海上編隊的一部（高速護衛艇大隊主力）于二十一時三十分、二十三時十四分由汕頭啓航，另一部（快艇大隊第一梯隊）二十二時四十三分由海門啓航。當日海上氣象：陰天，西南風三級。輕浪，能見度五浬。我快艇、高速護衛艇隊在金剛山、南澳雷達站引導下，于六日零時三十一分到達預定會合點。此時，敵我距離為三點八浬。岸指考慮到敵艦可能向東南逃竄，即引導艇隊向外迂回接敵，以圖由外往裏打。六日零時五十八分敵我距離拉大至十四浬，敵艦又轉向北駛，我又引導艇隊向北高速接敵，向兄弟嶼東南海域前進。快艇第一梯隊（編成一、二、三衝擊組）用雁形隊航渡。約一時五十分接近距敵艦五浬時，判清是敵艦“章江”號，此時，已處于小舷角不利陣位，就采取高速穿越敵艦航向，重新占領陣位。于二時三十分發射魚雷，未命中。

一時四十二分，我高速護衛艇在左舷三十度、距離五十浬發現敵艦“章江”號，一時五十分敵向我射擊并打照明彈。一時五十三分，我護衛艇艇隊隨即向敵開火，但因距離過遠無效果。至二時五十一分，我第三次發起衝擊，艇隊高速接敵，抵近至五百米與敵同航向射擊，直打到一、二百米以內，敵艦“章江”號中彈起火。因我艇速過高，衝過敵艦，而被迫停止射擊。三時零一分第四次衝擊時，敵艦轉頭高速向我隊形衝來，企圖插亂我隊形，我各艇繼續抵近敵人猛烈射擊。經過短兵相接的死打硬拼，

敵艦隨即失去抵抗能力，我又組織第五、第六次衝擊，敵艦“章江”號中彈爆炸。經過一小時四十二分鐘的激戰，于六日四時十八分將敵艦“章江”號擊沉在東山島東南二十四點七哩處（北緯二十三度二十二分、東經一百十七度五十三分）。在我艇與敵艦“章江”號戰鬥時，敵艦“劍門”號開始以七六·二炮對我射擊，爾後見形勢不妙，便企圖向東逃竄。

我擊沉敵艦“章江”號後，經總參批准，三時四十五分決定對敵艦“劍門”號實施攻擊。高速護衛艇除一艘受傷退出戰鬥外，其餘于四時四十分向東追擊，我接近到敵艦四十鏈時，敵向我開火。五時距敵二十鏈時，敵小口徑火炮向我猛烈射擊，我未還擊，實施反炮火曲折運動，高速接敵。五時十分我接近至距敵艦七鏈時，集中火力猛烈向敵艦射擊，迅速壓住了敵人火力，敵艦當即中彈起火。我快艇第二梯隊（于三時三十五分由南澳出擊），在高速護衛艇掩護下，五時二十分接近敵艦二至三鏈施放魚雷，命中三條，敵艦隨即（五時三十六分）沉沒在東山島東南三十八哩處（北緯二十三度三十點七分、東經一百十八度零九分）。此時，天已拂曉，敵機十六架飛臨我艇隊上空，我空軍起飛待戰，我艦艇在我空軍掩護下，于十時十分前全部安全返航。

此次海戰的基本經驗

一、這次戰鬥的勝利，再一次證明了突出政治的强大威力。祇要突出了政治，用毛澤東思想武裝了頭腦，廣大指戰員有高度的階級覺悟，有了高度的對帝國主義和階級敵人的仇恨心，就有敢于鬥爭，敢于勝利，不怕犧牲的精神，就能克服一切困難，戰勝任何敵人。這次參戰部隊是剛進行了戰備教育和四好初評的，部隊情緒高昂，求戰心切，接到戰鬥行動命令後，在較短時間內迅速完成了戰鬥準備。在戰鬥中不論老干部、新幹部、老戰士、新戰士，機關幹部還是艇隊幹部都表現很好，這主要是靠人的政治覺悟。有了政治覺悟就不怕犧牲，不怕困難，敢于在敵人密集炮火射擊下，迅速勇猛接近敵艦，短兵相接，猛打猛衝，死打硬拚，出現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例如參戰的護衛艇四十一大隊二

方块字读书社区

中隊，部隊成員較新，四名艇長祇有一名參加過戰鬥，有一艇剛組成，但作戰中均表現英勇頑強，出色地完成了戰鬥任務。先鋒號和601號兩艇戰鬥了一小時四十二分擊沉敵艦“章江”號以後，在601艇中彈四發，艇長犧牲，戰士傷亡十二人的情況下，仍繼續執行突擊敵艦“劍門”號的任務。611艇人員是臨時配齊的，但他們在戰鬥中，敢于靠近敵艦打，表現英勇頑強，就是在艇中彈破損，三部主機打壞，舵機失靈，傷亡十四人，三個艙進水（錨鏈艙、前彈藥庫、前水兵艙，水深達一米多）的情況下，他們一面排除故障，搶修艇隻，一面繼續戰鬥，直至將敵艦擊沉，并把艇安全開回基地。有許多戰士負重傷不僅不叫苦，不讓別人照顧，甚至量過去一醒來就問機器運轉好不好，彈藥送上去沒有，敵艦是否打沉了等等，他們當時所想到的祇是消滅敵人。如601艇艇長吳廣維同志患病住醫院聽到有戰鬥任務自動回艇參戰，在戰鬥中身負重傷昏過去，一醒來，仍然指揮“打！打！打！”直至犧牲。槍炮兵朱永德同志，腹部負傷腸子流出來，沒有叫一聲痛苦，堅持戰鬥，叫同志們趕快壓彈，後因傷勢過重而光榮犧牲。611艇輪機兵麥賢得同志，頭部負重傷，腦漿溢出，一手捂住傷口，一手操縱機器，血流到眼裏，眼睛看不清，在機艙內爬着用手摸、耳朵聽，檢查機器，堅持工作。機電兵黃汝省同志，頭部、胸部負傷十七處（身上彈片有四十五個）鮮血滿臉滿身，一手捂住右眼繼續堅持工作，保證了艇的航行動力。像這樣的同志是很多的，這種革命的英雄氣概，硬骨頭作風，祇有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下的人民戰士，才能夠做到。這是突出政治的結果，是平時政治思想工作基礎在戰鬥中的反映。實踐證明，平時政治思想工作基礎越好，戰時發揮的作用就越大。同時在戰前的充分政治動員，在戰鬥中人人開口，互相鼓勵的群眾性政治思想工作，以及幹部以身作則，英勇奮戰都是重要的不可忽視的。也就是說在平時要強調突出政治，在戰鬥中也要強調突出政治。

二、這次戰鬥，由方塊字讀書社區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指導思想，取得了全殲兩艘敵艦的重大勝利。毛主席教導

我們，我軍作戰的基本方針是殲滅戰，對敵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每戰必須集中絕對優勢兵力，選擇敵人較弱的一點，猛烈地攻擊之，得手後，迅速擴大戰果各個殲滅敵人。這次海上戰鬥，我們首先使用了四艘高速護衛艇和六艘快艇打敵艦“章江”號，這樣我在兵力、火力、速度方面均占優勢。將敵艦“章江”號擊沉後，又迅速組織高速護衛艇三艘配合五艘快艇追殲敵艦“劍門”號，同樣在兵力、火力、速度方面是占絕對優勢的。

根據這次和過去多次海上作戰經驗，我以三至四艘高速護衛艇和三至四艘快艇打敵“永”、“江”字號一艘是絕對優勢，是有把握的。以五至六艘高速護衛艇和五至六艘快艇打敵“太”字號一艘，也是可能殲滅的，但打敵人“陽”字號，則須集中更大的兵力。對敵人兩艘以上的編隊攻擊，必須採取各個擊破的辦法，通常情況是先打小的、弱的，後打大的、強的，但特殊情況下，也可以先打大的，後打小的。

三、這次戰鬥的勝利，證明了在海上作戰更應該發揚我軍夜戰、近戰的優良作風。如這次攻擊敵艦“劍門”號時，相距四至五浬，敵艦就向我開火，我艇以高速曲折航行奔向敵艦，在距敵一千米左右時，突然猛烈的對敵艦射擊，大量殺傷了敵艦艙面人員，迅速地壓制了敵火力，使敵失去抵抗能力。據俘供稱：“你們火力真厲害，打的真准，靠近我們後，你們一打我們就躲下艙去了”。這充分說明了夜間海上戰鬥，小艇機動靈活，目標又小，易于隱蔽接敵，出敵不意。在遠距離時，敵艦大口徑火炮不易命中，而我們接近敵艦後，艇上小口徑火炮最能有效的發揮其威力。敵艦存在目標大，機動時不靈活，大口徑火炮射速慢等缺點，因此，祇要靠近了敵人，我們就變成了優勢。夜戰、近戰可以避敵空中威脅，這不僅打蔣幫適用，打美帝國主義更是適用的。美帝國主義所依恃的一是空中優勢，二是遠程火力。所以他害怕夜戰、近戰。我們最主要是政治優勢，近戰火力強，命中率高，靠近了就能以我之長擊敵之短。敵艦的火力掩護，快艇抵近發射魚雷，依托島岸突然出擊，就可達到速戰速決的目的。因

此，小編隊夜戰、近戰是我今後主要的作戰方法。夜戰是越黑越好，還是月明之夜好呢？應根據具體情況分別對待。單艇、雙艇或一個兵種的小編隊進行突然襲擊，似以月暗之夜為好。在兵力稍多，尤其有協同兵力時，一般應選擇在月明之夜或黃昏、拂曉，能看得清，對我有利。海上近戰，應近到何種程度為有利呢？一般地說，應接近到我武器能發揮最大威力，而又有機動餘地較為適宜。這樣，可以避免敵人衝擊我隊形，引起碰撞，又能緊緊咬住敵人。根據這次海戰經驗，高速護衛艇和快艇的射擊距離，一般接近到二至三鏈較為適當。

四、這次戰鬥的勝利也證明了，小艇不僅能够打大艦，而且也能够擊沉敵艦。如打敵艦“章江”號時，我高速護衛艇一抓住敵艦後，咬住不放，堅決攻擊，盡管敵人狡猾，幾次衝擊我戰鬥隊形，但我艇隊猛打猛衝，在一個多小時內，連續組織多次衝擊，終於把敵艦擊沉。主要方法是，先集中火力猛烈射擊敵艦艙面，特別是敵艦駕駛臺及炮位，使其遭到大量的死傷或站不住腳，往艙內躲藏，我再轉移火力射擊敵艦水綫下附近，特別是機艙、彈藥艙、油艙，使之引起爆炸或破壞敵艦之浮力，加快其沉沒。又如，這次戰鬥中，打敵在噸位上大于我十多倍的敵艦“劍門”號時，我先以高速護衛艇向敵艦衝擊，當我艇隊距敵艦四十多鏈時，敵向我開火，我祇進行規避，不還擊，高速接敵七至八鏈時，以猛烈火力向敵艦射擊，僅射擊九分多鐘，就使敵艦暫時失去戰鬥力，掩護了我快艇抵近發射魚雷，一舉擊沉敵艦。這說明了以高速護衛艇協同快艇作戰的方法，不僅是可行的，而且能取得速戰速決的效果。

五、海上作戰指揮和協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也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根據這次及以往經驗證明，在指揮上應以岸上和海上的指揮相結合，以岸上指揮為主。因近海作戰是在我岸上雷達有效觀察範圍內，岸上指揮員能較全面地掌握整個戰區的情況，能準確指揮引導艇隊接戰。海上指揮員因受種種條件的限制，對掌握整個戰區的情況有一定困難。這次戰鬥主要是由岸

上指揮員指揮的，海上指揮員有時祇抓住了兩艘高速護衛艇，甚至快艇要求其實施引導，由於不了解整個戰區情況，而轉由岸上指揮引導。海上指揮員雖對情況掌握有局限性，但對當面情況了解比較清楚，因此，在總的戰鬥意圖下，可以機斷行事，實施現場指揮。這次戰鬥原確定先殲滅敵艦“劍門”號，而艇隊當時抓住的目標辨不清是“章江”還是“劍門”，此時海上指揮員決定先集中力量殲滅已抓住的敵艦，這樣就爭取了擊沉敵艦的時間，而取得了各個擊破敵艦的勝利。高速護衛艇和快艇協同問題，從這次海戰經驗看，航渡協同方法可以是分別航渡，在預定海域會合協同攻擊，也可以是合同航渡協同攻擊。一般說，黃昏、拂曉或視距較好時，爭取前者為好，如在黑夜或視距很差情況，則以後者為好。協同攻擊方法，應首先以高速護衛艇抵近敵艦，集中火力猛打，大量殺傷和壓住艙面敵人，為快艇創造有利進攻條件，再使用快艇占領有利陣位，抵近發射魚雷，以求一舉將敵艦擊沉。這次海戰迅速擊沉敵艦“劍門”號，是高速護衛艇和快艇採用這種協同攻擊方法最成功的範例。

六、這次戰鬥的勝利，證明偵察、通信是兩項最重要的戰鬥保障工作。情報是正確決心、正確部署的基礎，通信是反映情況、傳達決心部署的工具，這兩項工作的好壞，直接影響戰鬥勝利。這次偵察、通信、保障都比較好。敵艦從左營出航，一直保持隱蔽航行，實施無線電靜默，當敵人進入東山東南四十餘浬海域，我偵察雷達和對海雷達即發現敵艦。在戰鬥過程中，及時、準確和連續不間斷地掌握整個戰區的敵我兵力活動情況。特別是金剛山觀通站更為突出，自五日十五時十二分距離七十七點一浬發現目標上報起（十八時零五分判明為蔣艦兩艘），直至戰鬥結束，在戰區有七類（敵艦、漁輪、漁船群、商船、快艇、護衛艇、炮艦）二十三批目標的情況下，自始至終掌握得比較清楚，先後上報敵艦位置一百四十多個，並及時正確地向指揮所提供指揮引導的數據，對這次戰鬥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今後敵人艦艇可能更多的採用隱蔽航渡的方法，對敵情掌握主要依靠我雷達偵察、觀

分块字读书社区

察。因此，必須加強觀通和勤務部隊的訓練，提高雷達偵察、觀察能力。這次戰鬥中，無線電通信組織也較嚴密，使用較好，充分發揮了無線電信號的作用；在有綫電方面，廣州軍區及時調整了專用綫路，保證了決心及時下達和情況的及時上報。所以這次戰鬥中的通信聯絡，基本上是順暢的。

通過這次海戰，使我們深深體會到，軍委和林彪同志近幾年一再強調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政治，堅持四個第一，發揚三八作風，創造四好連隊，加強戰備等一系列根本方針是十分正確的。這次戰鬥的勝利，就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是突出政治，堅持四個第一的勝利，是發揚三八作風，創造四好連隊的勝利，是加強戰備，常備不懈的勝利，是訓練中貫徹苦練二百米硬功夫及開得動、打得准、聯得上、合得成的勝利。因此，我們要爭取新的更大勝利，就必須繼續把軍委和林彪同志提出的上述一系列方針原則堅決貫徹到底，對這些帶根本性的東西任何時候都抓緊不放，永不動搖。祇要我們真正做到這樣，我們就能夠迅速提高部隊的戰鬥力，就能夠所向無敵，戰無不勝。

後 記

李冰天

一、最後的願望

1999年3月，在我們與太原軍幹所商定之後，父母從太原回到北京居住，由我們子女照顧他們的生活起居。在京的就醫問題，選擇了兩家醫院，一家是北京安貞醫院，專門診治心臟病，其他綜合性疾病則就診于中日友好醫院。

2004年，父親已九十高齡，醫院建議由過去的每年一次住院進行體檢（十天時間），改為每年上、下半年各一次住院例行體檢，父親勉強同意。因為在此之前，他的身體非常好，能吃、能睡、能走，還能每日堅持看書、寫作和練字。因此，他非常不願意看病，更不願意住院。

2005年2月母親病逝了，永遠地離開了相伴六十四年的父親，巨大的痛苦給父親精神上最致命的打擊，從此健康狀況一年不如一年。

2007年9月，父親在家中不慎摔倒，折斷了左側的一根肋骨。不得不住進中日友好醫院。

骨傷好轉，我們建議把下半年例行的體檢做了，父親同意了。可萬萬沒想到，檢查的結果是患了腫塊。因為年事已高，不便做進一步的探查，醫院初步診斷為肝癌。

雖然我們商定將此事瞞着父親，但他似乎還是有了“預感”。出院回家後，父親對我說：“明年（指2008年）我有三個願望：第一是過春節，第二是過生日，第三是看奧運會。”我鼓勵他說：“沒有問題，您明年的三個願望一定能實現”。

2008年的春節過得非常熱鬧。春節期間，最使父親高興的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不少老戰友、老同事、老部下打來拜年的電話，祝他“身體健康，生活愉快”。特別是家住廣州九十二歲高齡的宋維棧叔叔的拜年電話和八十七歲高齡的胡敏阿姨（邱曾作夫人）再一次來看望他（前一次是2007年春節），使他特別的高興。老戰友相聚格外親切，父親與胡敏阿姨暢叙了一個多小時。臨別時，胡敏阿姨悄悄塞給父親手中兩百元錢，父親看着“壓歲錢”開懷大笑。誰曾想，這竟是與胡敏阿姨的最後一面。

第二件事是我們子女輪流在父親身邊值班，每日不重樣地做他最喜歡吃的美味，什麼“米粉蒸肉”、“紅燒魚”、“清炖鷄”、“紅燒海參”、“梅菜扣肉”、“火爆豬肝”、“湖南臘肉”等等，中午飯還陪他喝一杯紅葡萄酒。其實，每到逢年過假，我們都在父親家輪流值班，並各顯其能，拿出做菜絕招。祇不過今年春節，當我們心中隱藏着父親病情和滿足他的最後願望時，我們把飯菜做的更加精細，把節日氣氛渲染的更加熱烈。

第三件事是見到前來給爺爺拜年的長孫與他的女朋友，雖然孫子還沒有結婚，但爺爺已樂的合不上嘴。可能父親心中非常遺憾，因為李家的第三代人（孫子輩）還沒有一人結婚，還沒有四世同堂。

父親第一個願望實現了。

初五過後，父親突然提出要去八寶山看望母親，父親對我說：“今年是老太太走後的第三個年頭，按家鄉習俗，我一定要親自去看望她，這是最後一次，將來我不再去了。”我勸他：“現在天氣很冷，您歲數大了，我們代表您去看望老太太吧。”但父親仍然堅持要親自去，無奈之下，我們確定了去八寶山。

的時間。

前一天剛剛下了雪，我們知道他確定的時間是不可能更改的。

由于悲喜交加和“外寒內熱”，從八寶山回來的當晚，父親就開始發低燒。吃了兩天藥，沒壓住，2月24日住進了安貞醫院。

住院後，父親仍低燒不退，並引起心律異常、尿瀦留等癥狀。住院第三天，主治大夫就向家屬發了病重通知書。

經過醫院積極搶救，一周後，體溫控制住了，感冒也轉好了，但心律異常却始終糾正不過來。3月中旬，主治大夫又向家屬發了病危通知書。那段時間，父親的心臟被24小時嚴密監控，一旦出現異常，病區護士臺就發出報警信號，最多時一天能“抓”住四十多次異常情況。父親被嚴格控制臥床，幾乎全天都在輸液。

4月清明節後，奇迹出現了！父親的病情得到有效控制，並逐步改善。他可以坐在床上了，不久，又可以下地，在沙發上坐半個小時了。但對心臟的監控，始終沒有撤掉。

4月22日，是父親九十四歲的生日。我們都到醫院祝賀，並在病房中擺放了鮮花。林豆豉來病房為他祝壽，黃春光、邱路光等很多老戰友的子女都來為他祝壽，有的人帶來鮮花，有的人帶來生日蛋糕，大家紛紛在病床前與父親合影留念。當時，父親雖很高興，但身體還很虛弱，也不能讓他過於激動。我們祇好把每批來人會見時間控制在15分鐘之內。

病區護士長也帶着值班的護士們來為他祝壽，並一起合影。護士長還專門安排食堂為父親做了長壽面。

他的第二個願望也實現了。

5月份，天氣漸漸轉暖。父親不僅可以下床做輕微地活動，還可以坐着輪椅到室外曬曬太陽。

5月中旬的一天，父親的兩位主治大夫找我談話，大意是，經會診，多數醫生建議，要使父親的心臟異常情況得到有效控制，唯一的辦法是在體內安裝心臟起搏器，否則，隨時還有生命危險。

我說服父親，告訴他安了起搏器，就可以回家了。父親想回家，于是答應安起搏器。

方块字读书社区

6月上旬，父親被推進了手術室，由心臟專家主刀安裝了起搏器。手術非常順利。接着又做了膀胱造瘻手術。大夫們見到父親的身體狀況又一天天好起來，都說：“老爺子的生命力真頑強！”。

7月8日，我為父親辦了出院手續。

回到家中，父親的精神狀況雖比醫院好一些，但家中的護理條件畢竟不如醫院。例如家裏就沒有吸痰器，有一次，一口痰堵住氣管，險遭不測。

7月下旬，護工發現父親的下肢功能出現障礙，行動困難。不久，上肢功能也出現障礙，右手拿不住筷子，要靠護工一口口的喂飯。

我把情況報告了醫院，大夫建議還是回醫院觀察治療。

8月7日（奧運會開幕的前一天）晚，父親又住進安貞醫院18病區。當時除肢體出現障礙外，神志還是清楚的。入院第二天晚上正是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父親興致勃勃看了一小時。之後的幾天中，他還看了籃球、排球、乒乓球等奧運會的比賽。

他的第三個願望也實現了。

8月18日，護工發現父親便血，經化驗證實“便潛血陽性”。由于無法接受探察，不清楚是胃出血還是消化道出血，大夫對我說：“無論何處有出血點，都不是好現象，可能癌細胞已轉移。”經過幾天的治療仍無好轉的情況下，主治大夫向家屬發了病重通知書。

8月下旬，父親出現吞咽功能障礙，不能自主進食，開始鼻飼營養液。9月中旬，意識開始模糊，不能說話，處於半昏迷狀態。情況越來越糟糕，搶救設備全部推至床邊。

11月底做的肺部對比檢查發現，肺部比10月底檢查時多了六處陰影，這是癌轉移的信號，12月1日，再次報了病危。

12月20日，腹部B超發現已有積水，病情在繼續惡化。

2009年1月3日晨，例行巡查病房，發現父親的呼吸急促，一量血壓，血壓也掉下來了，馬上報告醫生。值班醫生

趕來後，立即按照預定的搶救方案實施搶救。

7時30分，呼吸停止了，心臟監控器上顯示成了一條直綫，7時40分，院方宣布搶救無效死亡。父親在沒有痛苦的情況下走了，終年九十五歲。

二、為父親舉辦“家祭”

2005年10月，父親將最後的遺書交給我們。

遺書中寫道：“九十二歲，風燭殘年，危在旦夕。凡事必先有考慮，以免臨時慌亂。因此留此遺言。李冰天、李炎天是李家的主要繼承人，其責任重大。我死後的善後，由李冰天、李炎天負主要責任處理。進行家祭，不要公祭，越簡單越好。”

2008年下半年，父親的病情持續惡化。9月，我召集開了一次家庭會議，正式研究父親身後的有關事情。我們決定的原則是：按父親生前的要求，完全由我們子女主辦家祭。先在家中設置靈堂，後在八寶山殯儀館進行小規模的告別，祇請少數父親生前最接近的親朋好友參加。

父親離我們而去的當天，在處理完醫院各項事務後，我回到家中已近中午。下午14時，我向太原軍幹所報告了父親去世的消息。

當天下午約16時，國內各大網站首先登出父親逝世的有關消息。接着1月4日和5日，不少省、市的地方報紙也相繼刊登了有關消息。各大網站和地方報紙不僅有父親逝世的短新聞，還有長篇的文章報道。

消息傳播的速度之快，範圍之廣，一時間成為“熱點”新聞。父親的老戰友、老同事、老下級，原身邊的工作人員，以及老戰友的夫人們和子女們都從網上得到這一消息後，紛紛來電話、打手機和發短信表示哀悼和慰問。

方块字读书社区

1月5日下午，太原市民政局和軍幹所的領導一行四人趕到北

京，我和李小征與他們見面。我向他們匯報了父親自2008年12月初第二次報病危後的病情發展、治療和搶救過程，匯報了我們對父親後事安排的想法。我們雙方對父親後事安排達成了三點一致意見，即“小規模、家庭化和力求儉樸”。

1月8日，家中設置了父親的靈堂。

靈堂布置的很簡單，在客廳的窗前，將飯桌鋪上一塊黑布，擺上父親的遺像，這張遺像是父親1964年五十大壽時，着軍禮服照的標準像，從未公開發表過。這張遺像與網上熱傳的那張1955年的標準像相比，顯得更加莊重、慈祥。

遺像前擺着香爐和鮮花，桌前擺放着我們五家兒女子孫敬上的鮮花和挽聯。



窗簾上挂着橫幅與條幅。橫幅為：

“李作鵬將軍安息”，條幅是我選自父親在1995年寫的一首小詩中的兩句：“生為軍人，死為軍魂”，“為國為民，無悔無恨”。我認為，這十六個字，體現了父親一生的

追求和無悔的心願。

靈堂兩側擺滿了親朋好友陸陸續續送來的花籃和挽聯。擺放着《李作鵬將軍生平》。

1月11日下午，我到八寶山殯儀館辦理父親告別儀式的相關事宜。租用場地（東禮堂）、花圈，定制橫幅、鮮花等具體事項。不到兩個小時就全部落實了。告別儀式確定在1月17日上午九點半鐘。

方块字读书社区

第二天（12日），我即向幹休所領導報告了我們的安排。

1月13日，我們向來往最親近的親朋好友（約五、六十人，其中二十多人是直系親屬）發出告別儀式的通知。

1月15日下午，我再次到八寶山殯儀館業務室，最後落實告別儀式準備情況。接待我的



已準備好的告別室現場

的業務員仍是非常熱情，他引導我到工作間看正在制作的橫幅、花籃和遺像等，並承諾第二天下午（16日），所有制作的橫幅、花籃、遺像和花圈等均可擺放到告別室。

1月16日下午，我姐姐和妹妹等人按約到殯儀館告別室，往已擺好的花圈上別挂挽聯。她們回來後告訴我：“告別室的橫幅、花籃、花圈等都已擺放好，一切順利。”

此時我想，一切都已提前準備妥當，明天的告別活動用不了個小時就可以結束。

當晚21時，在我家附近的賓館內，中紀委干以勝副書記、交通部李盛霖部長等一行召見我。干副書記向我傳達了胡錦濤總書記、習近平同志對我父親喪事的三條重要指示。我“服從中央決定”，同意第二天的告別儀式和遺體火化不再進行。

17日當天，我們不斷接到電話、短信。

有人這樣發來短信：“救民革命本自心，作囚領過有別情，回首何人無憾事？放眼世事多不平。”

也有人這樣發來短信：“將軍浴血百命搏，赤膽忠心為黨國，隨他任何不平事，春秋九五駕鶴去。”

還有人這樣用短信發來挽聯：上聯是“掃北征南 作鵬鐵骨錚錚 魂魄繞昆侖 百戰勛業 傾蒙誤判”；下聯是“護海巡洋 將軍剛腸烈烈 肝膽昭日月 一代恩怨 頓成悲端”。

方块字读书社区

1月18日，在中紀委有關部門的直接安排下，父親的告別儀式

開始進行。

清晨，我們子女及親屬二十餘人，按計劃安排7點半前到達安貞醫院太平間的告別室。

7時30分，父親開始進行簡單的整容。

父親躺在靈床上，面色安祥。身著一套藏藍色西服，深藍領帶和淺藍條紋襯衣。那套西服是我大姐李大征夫婦去太原看望父親時，在太原最好的西服店為父親定做的，父親很喜歡，生前捨不得穿。

父親身上蓋了一塊紅絲絨布，代表“喜喪”的寓意。

告別室的電子屏幕上寫着《父親李作鵬將軍千古》，屏幕下放著父親着軍禮服的遺像。四周擺放着花圈。

我們兄弟姐妹及親屬們列隊站在父親的靈床前，最後向父親深深的三鞠躬。

此時此刻，我心中默默地說：“永別了，親愛的父親。您和母親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安息吧，一路走好。”止不住的泪水奪眶而出。

三鞠躬完畢，我們走到父親身旁。我輕輕地撫摩着父親那蒼白髮，心中默默地對他說：“原來，您的老戰友、老同事、老部下及他們的夫人、子女都要來送您最後一程，現在來不了了。許多人家中的靈堂悼念您。我代表他們向您做最後的告別。”我又說：

“還有許許多多素不相識的群眾，在網絡上祈願您‘一路走好’，人民沒有忘記您。如果您的在天之靈感悟到了這一切，您可以欣慰地瞑目了。”

所有的人都痛哭不止，我們輪流走過去，把臉貼到父親的臉上，最後一次吻別



方块字读书社区

他老人家……。

小征的女兒、女婿向姥爺行最後的軍禮。

炎天的愛人，替遠在國外學習的兒子，向爺爺念最後的告別信。并把這封信放在爺爺的上衣口袋中。

從家鄉專程起來的親戚代表們，按家鄉的風俗，在“族長”脚下長跪不起。

8時30分，靈車到了。

我兒子李羽（長孫）手捧着爺爺的遺像，走在最前面，六個抬靈人抬着父親的靈柩緩緩隨行，離開了告別室。

按照規定的行車路線，車隊一路綠燈前往八寶山殯儀館。

9時20分左右，靈車到達八寶山。通往殯儀館的道路旁停着警車，道路中央站着指揮車隊的交通警察。我們車隊被引導駛入殯儀館最北面的大門，這裏是殯儀館的後院。

9時30分，我們再次與父親最後告別。深深地向他老人家三鞠躬。

一個半小時後，我們捧着父親的骨灰回家，與母親骨灰一起，擺放在靈堂中。

三、為父親寫生平

《李作鵬將軍生平》是我們子女根據父親的革命經歷而寫的，早在父親病重時就已定稿。

《生平》內容如下：

我們敬愛的父親李作鵬，因病醫治無效，于2009年1月3日7點40分在北京逝世，終年95歲。

父親生于1914年4月，江西吉安流家坊村人。

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轉入中國共產黨。

紅軍期間，歷任紅一方面軍總司令部傳令兵、朱德總司令警

方块字读书社区

衛排衛士，中革軍委諜報科見習科員、機要科科員。1933年起，歷任中革軍委二局參謀。參加了反擊國民黨軍隊一至五次圍剿，保衛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等戰役。

1935年，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時任中革軍委二局二科科长。在長征途中多次截獲、偵破敵軍電報，為中央紅軍粉碎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四渡赤水，翻越雪山，走出草地，勝利到達陝北，做出了重要貢獻。

1937年下半年，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期學習并擔任軍事班參謀訓練隊隊長。

1938年任八路軍第115師偵察科長，1940年任115師作戰科長兼偵察科長，1943年3月任山東軍區司令部 and 八路軍第115師司令部參謀處處長。

抗日戰爭開始後，八路軍第115師在山西、山東廣大地區，堅持敵後抗日游擊戰爭，創建抗日根據地，擴大抗日武裝力量。父親參加并指揮了打擊日寇和敵偽頑固勢力的多次戰役，沉重打擊了敵人的軍事力量。1945年8月，指揮濱海第4團、魯中第11團及軍區特務團攻打和收復山東臨沂等城市，臨沂解放後，兼任臨沂警備司令。

1945年9月，奉黨中央的命令，協助羅榮桓政委，負責組織115師主力部隊分批開赴東北戰場。

1945年11月，任東北民主聯軍前方總部參謀處長，參加了著名的秀水河子殲滅戰。

1946年6月任東北民主聯軍第1縱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參加了“三下江南”戰役和1947年的夏季、秋季、冬季攻勢。

1948年6月任東北人民解放軍第6縱隊副司令員兼第16師師長。

1948年10月在遼西，指揮兩個師的部隊，切斷廖耀湘兵團向沈陽的退路，殲敵兩萬八千餘人，對全殲廖耀湘兵團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為遼沈戰役的

方块字读书社区

1949年4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第43軍軍長。

1949年5月參加了渡江戰役，7月參加湘贛戰役，8月參加贛南戰役，9月底參加向廣東進軍的戰役，并解放廣州市。

1949年11月，在解放廣西的粵桂邊戰役中，指揮43軍，擊潰白崇禧主力魯道源兵團，全殲張淦兵團，俘敵兵團司令張淦，消滅敵軍三萬四千餘人。

1950年春，指揮43軍參加解放海南島戰役。從強渡瓊州海峽，到解放海口、三亞，所向披靡。殲滅守敵一萬七千餘人。

1950年6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5兵團參謀長兼廣東軍區參謀長。

1950年秋，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南軍政大學副校長。

1951年3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高級步兵學校校長。

1953年1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高級步兵學校校長、黨委書記。

1955年至1957年，在南京軍事學院戰役系學習。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將軍銜。

1957年10月，任中央軍委訓練總監部陸軍戰鬥訓練部部長。

1959年1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軍事訓練部部長，兼任中央軍委軍事訓練委員會秘書長。

1962年6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副司令員。

1967年6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第一政委。

1968年3月，任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

1968年9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海軍第一政委。

1969年4月，在黨的第九屆代表大會上，當選中央委員會委員，在九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在第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任中央軍委委員。

1969年6月，當選為海軍黨委第一書記。

父親的一生是為中國人民解放奮鬥的一生，是為中國富強奮鬥的一生，是為實現共產主義信念奮鬥的一生，父親用其一生踐行着忠誠、正直、光明磊落、剛正不阿的品德。他曾說：“生為軍人，死為軍魂，為國為民，無悔無恨。”

方塊字讀書社區

父親是我們的人生楷模，父親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我們堅信：真理和事實是永遠不能磨滅的！歷史將證明一切！

父親在晚年筆耕不止，將心聲溶于文字，為我們留下寶貴的遺產。我們將整理出版，實現父親的遺願。

衷心祝願我們的父親、母親在新的世界裏生活的幸福安康！

李大征 李幼征 李冰天 李小征 李炎天

2009年1月3日

鑒於父親去世後的社會反映，在《生平》的最後，我們又另加了一段百餘字《致謝》。

《致謝》原文是：

自父親去世後，父親生前的老戰友及子女、原身邊的工作人員和曾與父親接觸、交往過的各界人士，都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並通過各種途徑向我們表達了深切的哀悼之情。

特別使我們感動的是，許許多多、成千上萬素不相識的人民群眾，在網絡上發出了“老將軍，一路走好”、“老將軍，人民不會忘記你”的祈願。

我們相信，父親在天之靈一定會有所感知，一定會深感欣慰！

在此，我們全家向所有表示哀悼、關切之意的人們，致以深深的感謝！

父親沒有離開我們！父親永遠和人民在一起！！

父親的一生結束了。九十五個春秋，濃縮在這本七十餘萬字的《回憶錄》中。每當我翻開《回憶錄》，那驚天動地、轟轟烈烈的場面就展現在我的眼前，“砥柱中流”，“愈挫愈奮”八個大字就浮現在我的腦海中。《回憶錄》留給我們的是那一代革命軍人崇高地精神、堅韌地信念和無盡地勇氣。父親是革命隊伍中的普通一員，他無畏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在我受父之命，整理他的書稿、珍藏照片和收集、核實歷史

資料時，得到了父親老戰友宋維楨、周倫、遲澤厚，父親老朋友張思之律師，學者余汝信、舒雲及黃春光、邱路光等人的大力支持與幫助。同時張思之、高文謙、丁凱文、舒雲、徐海亮、劉統等人還將其著作贈送父親。在此，我代表全家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謝！

書中許多照片由于年代久遠，已無從查找攝影者。在此，對留下珍貴歷史照片的攝影者表示衷心的感謝！

記于父親逝世一周年前夕

李作鵬回憶錄

李作鵬 著

責任編輯 季士柘
美術編輯 鐘 義 路 禮

出版人 北星出版社
地址 香港北角木星街3號澤盈中心1702室
電子郵件 hkstarnorth@hotmail.com
Star North Books Company
Room 1702 Com Yan Centre
No. 3 Jupiter Street North Point Hong Kong
E-mail: hkstarnorth@hotmail.com

發行人 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新界荃灣德士古道220-248號
荃灣工業中心16樓1609-1616室
電話 852-2381 8251
圖文傳真 852-2397 1519
電子郵件 info@lee-yuen.com.hk
LEE YUEN SUBSCRIPTION AGENCIES LTD.
RM 1609-1616,
TSUEN WAN INDUSTRIAL CENTRE,
220-248 TEXACO ROAD, TSUEN WA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el: 852-2381 8251
Fax: 852-2397 1519
E-mail: info@lee-yuen.com.hk

國際統一書號
定價

2011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962-86438-6-8

定價 HK\$ 218.00

方块字读书社区

北星出版社及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保留
版權所有 禁止翻印 轉載 復印 違者必究

本出版品不代表本社立場

作者簡介

李作鵬 漢族，1914年4月生于江西省吉安縣。

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1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紅軍時期，歷任紅一方面軍總司令部傳令兵、朱德警衛排衛士、軍要諜報科科員、軍要機要科科員。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時任中革軍要二局二科科長。

抗日戰爭時期，歷任八路軍第115師偵察科長、作戰科長和參謀處處長。

解放戰爭時期，歷任東北民主聯軍前方總部參謀處長，第一縱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第六縱隊副司令員兼第16師師長，第四野戰軍第43軍軍長。

建國之後，歷任第15兵團參謀長，第一高級步兵學校校長，總參謀部軍事訓練部部長，海軍常務副司令員，副總參謀長兼海軍第一政委。

1969年，在中共黨的第九屆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同時當選為中央軍委委員，并被任命為軍委辦事組成員。

方塊字讀書社 月因病去世，終年95歲。



ISBN 978-962-86438-6-8



9 789628 643868

定價 HK\$ 218.00

方块字读书社区